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巴金全集

（第十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1993年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1457-7/Z·78
定价 13.35 元



出席首届政协会议时

（蔡楚生摄，一九四九年九月，北平）



偕沈从文夫妇摄于北平府右街达智营沈寓

（一九三四年春）

《嘉兴杂忆》手稿之一页



出席二届世界和大时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右三为任德耀,右二为黄宗英)

集　外　编(上)

目　录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一九二一年

怎样建设
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近来“自由”、“平等”两个名词已成一般人的口头禅。但是问他们甚么是自由？他们回答说：“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书信秘密自由。”甚么是平等？他们说：“凡是一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个个都平等，没有什么尊卑的区别。”但这些绝对不是真正自由、真正平等。诸君不信，请看下文。

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我们想与世界的弟兄互相亲爱，但政府偏要我们爱国，叫我们去当兵，杀世界的同胞。在中国更不成了，甚至本国人杀本国人，像湖南、陕西、四川这几年杀得“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惨不忍见。这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好处。

那些资本家，垄断世界公有的财产，使我们贫民不能生活，政府不但不去罚他，反设法律来保护他。人民没有吃的，只得抢些来吃；没有穿的，只得抢些来穿；没有用的，只得抢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半月》第十七号。署名芾甘。

来用；这都是那些资本家强迫我们人民做的。但是政府又说我们是强盗，要拿我们去枪毙。我们固然不该，但不过把我们失去的财产夺些回来罢了，却要拉去枪毙，像资本家抢世界公有的财产，反安然活着。既不要人民抢人，便不得不流为乞丐。有时政府、资本家看不过了，把他们抢来的钱赏几个与贫民，却美其名曰慈善；甚至有些还要骂我们，说不去做工，却来要饭。诸君！未必我们不想做工吗？不过他不拿工与我们做罢了，却来骂我们。照这样看起来，前头所说的"自由"、"平等"，似乎与我们人民没有关系了！这样还算"自由"、"平等"吗？我绝不信世界上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平等！但什么才是真自由、平等？我说：安那其才是真自由，共产才是真平等。要建设真自由、真平等的社会，就只有社会革命。

什么是安那其？安那其就是废弃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机关，主张把生产的机关及他所产的物品属于人民全体。人人各尽其所能，各取其所需，并依各人的能力去分配工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医生就做医生，能做矿工就做矿工；事容易的就可多做几点钟，事难的、苦的就少做几点钟。你要吃，就有个机关拿饭给你；你要穿，就有衣服给你；你要住，就有房子给你。人人都受平等的教育，没有智愚的分别。法国某安那其党说"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全社会之需"；克鲁泡特金也说"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即可支持全社会的生活而有余"。照这样看来，我想这样少的作工时间，绝没有人不愿的。

没有政府、法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资产阶级，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劳动界的朋友们！你们看无强权的社会何等自由啊！何等平等啊！你们想建设这种自由平等的社会吗？那么就请你们实行社会革命，推翻那万恶的政治。那时，这自由平等的社会就要实现了！望你们赶快起来联合你们的朋友们啊！若是再一味的隐忍，那么，你们就要成为资本家的鱼肉了！你们不信，请看嘛！

五一纪念感言*

今天是甚么日子、我想诸位大概都知道的、简单说来、今天就是劳动者做人的日子、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欧美劳动者都是每天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一天除了做工以外、就没有时间了、那资本家所享的种种快乐都与劳动者无关、但劳动者虽然每天做许多时间的工、所得的工钱反不够自己吃饭、至于穿衣更不消说了、那些资本家每天虽不做工、却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他们吃剩了的饭、也没有劳动者吃的、穿剩了的衣服、也没有劳动者穿的、住剩了的房屋、也没有劳动者住的、简直不把劳动者当人了、一般的劳动者也以为这是天赐的、遂安安逸逸的给他们做工、并不敢反抗他们、这就是劳动者自以为不是人的日子、

到了一八八五年五月一日、美国全体工人举行大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为要求八点钟工作制、过了几天后、就有十几万工人成了功、于是这五月一日便成了美国工界的纪念日、从此以后、劳动者便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了、后来各国社会党遂议决把五月一日作为工界的神圣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必停工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人声杂志》第二号，署名芾甘。

日举行示威运动、

在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曾作出了绝大的牺牲、在这一天劳动者同警察冲突、警方开枪乱击、打得血肉狼藉、结果政府方面遂把这件事栽到社会党人身上、捉了八个社会党人、绞杀了四个、一个仰药自尽、其余的两个终身监禁、一个监禁十五年、这就是一八八六年美国的五一纪念日、

上文把五一运动的历史简单说了、现在把我的感想、记在下面、

我以为人生下来必要劳动、不劳动便算不得人、那些资本家既不劳动、却又要想些法子来抢那些劳动者用血汗所得的报酬、像这样简直不是人、乃是"社会之敌"、但为什么他们能支配劳动者、使劳动者没饭吃、没衣穿、啊、我知道了、是他们把自已抢来的钱、去养起那万恶的政府的缘故、若是我们要推翻他们、非先推翻那保障他们的政府不可、中国劳动界的朋友听着、你们要晓得你们从前所受的痛苦、并不是天赐的、实是你们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你们以为自己是十八层地狱的罪犯、其实你们是社会上的主人翁、你们既没抢人、又没害人、你们怕什么、你们有力量反抗他们、你们唯一的手段就是总同盟罢工、你们要晓得今天是你们做人的日子、望你们赶快起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争回你们的人格、推翻那万恶的政府和那万恶的资产阶级、你们没听见美国工人的大牺牲吗、他们何等的奋斗、何等的牺牲、他们是人、你们也是人、难道他们能够、你们却不能么、总之、以前的事、不必说了、从今天后、你们定要起来、定要把这"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变成中国劳动界

的神圣纪念日、只要你们肯牺牲、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俄国托尔斯太曾说过、"自由非赠品也、自由有代价、曰血与泪、"波兰廖抗夫也说过、"自由之代价、言之可惨、不过为无量之腥血耳、"你们想要自由吗、就请你们作出重大的牺牲、与其被资本家害死、不如为自由而战死、死得何等光荣啊、若是你们再忍受这种痛苦(或是忍见你们的同胞受这种痛苦)而不肯牺牲、那么世界的人道便灭绝了、你们的血也可以任意流了、那些自由平等的名词、都变成欺人的话了、所以我们当联合一般同胞、同那资本家奋斗、现在时候到了、望你们努力、你们要想从任人践踏的奴隶、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民、都在乎你们的奋斗、牺牲、流血、你们肯这样做、我们也定要帮助你们、我们也定要同万恶的政府资产阶级奋斗、牺牲、流血、那时快乐的、光荣的、自由的、平等的、无政府社会就要实现了、朋友、朋友、你们快努力啊、

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

自从柴门合甫把"世界语"供之于世后，如今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学"世界语"的人一天比一天的加多，用"世界语"著的书，也渐渐加多，并且听说俄国已承认它为世界的语言。这样看来，将来"世界语"必为世界人类公共的语言——这是预料得到的。

"世界语"之所以能受大多数人的欢迎，都因它有两大特点：一、结构完善；二、主义正大。"世界语"有了这两大特点，所以它能永为人类公共的语言。现在把它的特点一一说出来：

一、结构　世界语学者常常说，"世界语有六大特色，为各国文字所没有的"：

A.各国文字往往有不发音的字母，"世界语"却字字都有音，并且它的重音都在末第二音上。

B."世界语"每一字必有一定的语尾，看它的语尾，就可晓得这字是名词或动词。如 amo：爱(名词)；ama：可爱的(形容词)；ame：可爱的(副词)；amas：爱(动词现在式；过去为 amis；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半月》第二十号。署名甫甘。

将来为 amos；假定为 amus；命令为 amu，这样记一字就可以记几个字。

C. 他国文字中常有一字数义或数义一字，但“世界语”一字只有一义。如英文 order 一字就有四个意思：1. 命令；2. 次序；3. 勋章；4. 邮便汇票。在“世界语”就分成四字：1. instrukcio；2. ordo；3. ordeno；4. mandato。

D. “世界语”中每一字加以“接头词”或“接尾词”就可变出许多新字来。如 1. patro：父，patrino：母；2. tranĉi：割，tranĉilo：小刀；3. amiko：友，malamiko：仇；4. anarkio：无政府，anarkisto：无党人。

这类的字太多了，只好举一两个例。

E. “世界语”的文法是极简单的，所以凌霜先生说，“世界语”的文法，费一天的功夫就可完全学会。

F. “世界语”的字是极少的。现在世界上最占势力的各国国语，其含有字数如下（其实字数尚不止此）：

英　　语：	260,000字	德　　语：	80,000字
俄　　语：	40,000字	法　　语：	30,000字
西班牙语：	20,000字	意大利语：	45,000字
华　　语：	49,000字	（以上据胡学愚君统计）	

“世界语”只有二千六百多字，比英语少一百倍，比德语少四十倍，比法语少十几倍，比华语少二十几倍。学“世界语”几月就可学会了，这岂不是最便利的事么？

二、主义　“世界语”的主义在何处呢？柴氏著《希望歌》有一节说：“基于世界语（或作中立语）人人皆相识，彼此均辑

睦，组织大家庭”（见区声白译文），这就是世界语主义。

“世界语主义就是在使不通语言的民族，可以互相通达情意，而融化国家、种族的界限，以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

世界语的结构何等完全！世界语的主义何等正大！

今欧战告终，和平开始。离世界大同时期将不远矣。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使人人能懂“世界语”；再把“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输入他们的脑筋，那时大同世界就会立刻现于我们的面前。现在我们该做的事，没有比这事还要重大的了；同志诸君，我们应当努力向前！奋斗，开世界大同之路！

I.W.W.与中国劳动者*

一

我们现在尽管一味的空谈“劳动运动”，究竟对于中国劳动者有什么益处？我们尽管大吹特吹“劳工神圣”，难道劳动者享受过这“神圣”的幸福吗？“五一劳动节”这名词传到中国人耳里，也有几年了。但虽有几家报纸大大的鼓吹，究竟有几个劳动者懂得！照这样做下去，将来能得到什么效果？我们鼓吹“劳工神圣”的人，还不觉悟吗？

我相信美国的I.W.W.是有益于中国劳动者的，故特把它介绍过来。

二

I.W.W.是“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缩写，译成中文就是“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它是现在美国最占势力的一个劳动组合。美国这几年所发生的同盟罢工，差不多都与它有关系。它的势力几乎可支配美国全国。美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半月》第二十一号。署名芾甘。

政府和资本家把它当作眼中钉，要消灭它，但大多数的人都是狠信服它的，所以把政府弄得没法。总之，我敢说：将来美国的社会革命必定由它起始。

它起源于一九〇五年。那年秋间在美国有六个狠热心的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当时美国工人的情形。并决定在第二年开一次大会。到第二年又约了三十多个劳动运动者，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同年六月在芝加哥召集了一次劳动大会。那日赴会的有代表八十六名，所代表的劳动团体有三十四个(会员有几万人)。讨论了两星期，遂成立了一个团体，——就是最有名的I. W. W.。

三

I. W. W. 的主义和法国的工团主义狠相似，故有人说它是“美国的工团主义”。

它起先便主张打破资产阶级，它以为不把资产阶级打破，劳动者便不能得真正幸福。因为“国家”、“政府”、“法律”都是保护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它又主张打破这些怪物。

它以为资产阶级绝对不能和劳动阶级调和。必定要等劳动者把土地和生产机器取夺回来。并且必至消灭“工资制度”而后止(《I. W. W. 旨趣书》第二段)。

它以为打破资本主义，必须组织生产军：一面可同资产阶级战斗；一面为将来资产阶级推倒后处理生产品之用(同上末段)。

它又主张"联络一切产业的全体劳动者，协同一致，组织产业的劳动组合，一遇某产业有同盟罢工，或厂主闭门不纳等事情，各产业当共同一致援助，视一部的利害为全体的利害(同上第四段)。

它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就是"总同盟罢工"，这是他们最有效力的武器。若同盟罢工不能胜的时候就代之以"怠业"。

以上都是它的主义，也就是它的特点。照这样看来可见它是最好的劳动组合。不过我有点不满意它的地方：因它的组织是中央集权的，执行机关之理事会的权力狠大，可以任意命令某组合起同盟罢工。——这个缺点或者因为它的会员尽都是不熟练劳动者的缘故。

总之它是以激烈的手段，创造他们理想底真自由平等无强权的劳动者世界。

四

中国劳动者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纯粹劳动者组织的团体。这缘因，只举一个例就可明白了。如某工厂工人因工资太少的缘故发起全体罢工。但他们回到家，屋里又没有米了，若再不做工，又怎么能吃饭。然而他们的厂主，又要另外去招一起工人，他们便不得不去恳求他们的厂主收留他们，这回就完全失败了。这样看来，就可知道要救中国的劳动者，必定要先使他们自己起来组织一个极大的革命劳动团体，同心协力，打破"国家"、"政府"、"法律"等制度，推翻劳动者的最大敌人

资产阶级，再把生产机关及其产物收归劳动者所有。

这是最好的方法。I.W.W.的目的就是这样。可见它和中国劳动者的关系是再重大没有的了。

资产阶级的世界，快到末日了，劳动者的世界快来了。中国的劳动者，速速从好梦中醒来！联合你们的同胞，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庶几能生存于将来的世界，再不可做时代的落伍者了。

爱国主义与
中国人到幸福的路*

一

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它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命于天，即或有时实在受不得了，也只有往自杀那条路走，从没人敢反抗的。因此一天一天的弄下去，竟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中国，哪还有幸福之可言？现在有一般较为觉悟的青年，以为要把中国弄好，非提倡"爱国主义"不可，因此就把"爱国主义"当作中国人到幸福唯一的路，于是"爱国主义"之声遍于全国。我以为这种现象实在可怕。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份子，便不能昧着良心不去反对它，故不得不驳它一下，并且把我的"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的意见写下来。以下的话，都是本良心说的，我想这样大的中国，也许有几个不肯昧良心的人给我表同情——这并不算是苛求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警群》第一号。署名芾甘。

二

爱国主义究竟是甚么？托尔斯太说得好："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与平民生活无与焉。"这句话初看起来觉得无甚道理，若是仔细看下去，"爱国主义"的精义都在这里了。我们人类除却一般没良心的军阀政客外，没有一个不反对战争、诅咒战争的，但我们考察战争之起源，却是由于"爱国"。假使人类互相亲爱，欢欢喜喜的一伙做事，哪里还有战争呢？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它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的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还有一事足以证明"爱国主义"是个杀人的怪物，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政府奖励人民的爱国热诚，并且实行征兵制度，全国的壮年男子，都应服务兵役，就是文人、教士也要做杀人的事，听军阀政客的指挥，去杀他人，一旦有工人罢工等事发生，亦在该杀之列，有时甚至于杀自己的父母兄弟。唉！要是这样还不算暴虐、残忍，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暴虐残忍的事发生了。

三

上文把爱国主义驳了，我的意思以为爱国主义的发达，绝不能使中国人享幸福，只有使中国人越受痛苦。中国人要寻幸福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想走那条路，非先把下列的几种制度推倒不可。这些制度是什么呢？

一、政府。政府是一种强权机关，是保障法律的，它只有杀害我们，掠夺我们的衣食住，又能侮辱我们，帮助资本家杀害贫民的。我们人类本是自由的，它却造出许多法令来束缚我们；我们是酷爱和平的，但它却叫我们去战争；我们本应同各国同胞讲互助，但它却叫我们讲竞争。它种种举动都和我们多数人类的意思相反，从没有做过一件有益于我们的事情。而且它最大的坏处，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据地。我们要想寻幸福，第一步就要推翻它。

二、私产。私产是掠夺的结果。财产本来是人类公有的，乃有一二强有力的人，用他们的强力同知识，把公有的财产据为已有，遂使一般较弱的人流离失所，又用金钱收买别人劳力，替他们生产，所生产的物品，劳动者丝毫都不能用，他反享尽快乐。世界上不平等的事，这算是第一。且有私产，一般人遂起争夺的念头，欺骗盗贼的事常常出现，民众的道德扫地尽矣。我们又考察政府之所以能维持久远，都是有私产的缘故；我们能把私产制度废去，那政府也就容易推翻了。

三、宗教。宗教是束缚人群思想、阻碍人群进化的东西，

我们要想求真理，它却教我们迷信，我们要进取，它却叫我们保守。一般耶教徒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真理、正道、善良、美好、势力、生机；人类是诈伪、不平、罪恶、丑陋、无能、死；上帝是主人，人类是奴隶。人类不能自己找公正、真理，永久的生机只可由神力暗示之。上帝创造世界，那些君主、官吏等都是上帝派下的，是上帝的代表，所以人民应为吾主官吏的奴隶。"（英皇查理士第一说的"君权天赋"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耶教的精义。耶教为宗教中极有势力之教，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见了。巴枯宁说得好："若然有上帝，我们也应把他来毁灭。"我们起来试试罢！

四

上面所列几种，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到幸福路的第一步，就要推倒这些。这些东西消灭后，再分配财产，自由组织，互相扶助，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图众人之利益，众图个人之安宁。这岂不是幸福吗？但我们要先出代价，然后能得到这幸福。这代价是什么？就是无量数的热血。巴枯宁曾说："人生到世间，最痛快、最愉乐的事，莫有过于革命的事业！你们都一想，与其蜷伏于淫威之下苟延残喘而幸生，何若磊磊落落、赌一点自由新血，与魔王破釜沉舟一战而亡！"这话说得何等痛快！何等壮烈！我愿我们的朋友和我们预备着满腔的热血，来干这最痛快、最愉乐的革命事业，齐向这幸福的路上走！

一九二二年

被虐待者底哭声*

一

被虐待者底哭声何等凄惨而哀婉呵！
但能感动暴虐者底残酷的心丝毫吗？

二

天公！
想你也不忍听被虐待者底哭声了，
不然你怎么会流出这许多的眼泪哟？

三

战胜者！
留心你底失败的敌人底悲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四

在睡梦中的人们！
　不要过于快乐罢，
　你应当知道将来还有梦醒的时候。

五

真正的爱，
　也许只在小孩底天真里藏着罢。

六

听高树上不停地叫着的蝉声，
我便明白人生底真义了。

七

雨呵！落罢，不停地落罢！
把这世界洗成一个极美丽的罢！

八

火一般的悲愤在我底心里燃烧着，
我怎么能不瘦呢！

九

小孩子底天真
　与老年人底经验，
　是何等地相反的呵！

十

　一株被花匠扎过了的梅花
　在盆里死了。

十一

风能吹燃的，
水能淹灭的，
　不过是寻常的火罢了；
　但这是我底心里底火呢！

十二

青年人!

要想美丽世界底实现,

除非你自己创造罢!

可爱的人*

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因为一件要紧的事，要到我的友人家里去。这时雨还是不停地落，天色也阴黯。我知道要等雨在短的时间停住，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便不得已的叫了一乘轿子来。

两个轿夫抬着我慢慢地在街上走着。街很寂静，仿佛在寻常的夜里一样。除却两三个打着雨伞穿着革履的先生们，和戴着斗篷，下面赤足的劳动者而外，就没有看见什么了。但偶尔还有一乘三四个轿夫抬着的，四面都围着雨帷的轿子走过。我这时能听见的：就只有雨点滴在轿顶上和轿夫的斗篷上的响声，革履的橐橐声，赤足在水中走的声；至于寻常听见的闹声，叫卖声，笑声，哭声，说话声，现在都没有了。我在轿里想想："真寂寞呀！出门时又忘了带本书，不然还可以在轿里翻看。这样长的街怎么能一时就走完了呢？"我觉得有些烦恼了，便开始悔恨我一时的疏忽了。

又走了一阵，我偶然抬起头来，我的目光正射在前面的那个轿夫身上：他背上的短衣已被汗浸湿了；他的年龄像是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小；他口中这时正发出一声微微的叹息，似乎抬不起这轿子的样子。这时忽然有一种思想来到我心里。我于是又想道："我因要到友人家去商量要事，才受这样寂寞的痛苦；但轿夫呢？他们要到那里去做什么？为什么他们又要抬着我去呢？……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抬不起我了，为什么又不敢把我放下呢？……在这样大雨的日子，谁又不愿在家中安逸地玩耍，却跑到冷静的街上呢？……"雨越落大了。他戴着的斗篷周围都流水了，他的衣裤都被雨飘湿了，他的赤足在一两寸深的冷水里"花浪"、"花浪"地走着。这时我又忆起一件事了：几年前的一日，我从学校里刚要动身归家，忽落着雨，我没有穿革履，又没有见着轿子，只得借了一把伞脱了鞋袜赤足走回家。我的母亲知道了，急忙叫人烧水与我洗足；并且嘱咐我以后切不可再这样做。现在他在冰冷而且很深的水中走着，为什么他的母亲又不阻止他，却听他这样做呢？……或者他的母亲不爱他罢？

"你有母亲吗？"我不知不觉地就说出这句话。

"先生！我有母亲，她现在家里。"他居然不迟疑地答应说。

"她不爱你罢？"

"她是很爱我的。"

"但是为什么她听你在这样大雨下面的街上走着呢？为什么让你赤足在冰冷的水中走着呢？"

"先生！我们穷人无论什么苦的事都要去做，赤足在冷水里走，算得了什么事？我已习惯了，并不要紧的。当轿夫的在大雨下面怎么又能不抬轿呢？我的母亲今天看见这样的大雨，本不要我走的；但是今天我不出门找点钱回来，明天又有什么

钱来买米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她还叫我早些回去，说只要把明天买米的钱找够就是了。今天雨落得这样大，街上的行人都很少，不知能不能够呢？”他的声音里带着失望了。

“这时还早得很，不要紧！”我说了这句话来安慰他，但是他并没有喜色。他这时似乎说得高兴了，又接着往下说：

“我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兄弟，年纪都不大。我的父亲是去年三月死的，他也是一个轿夫，有四十多岁。他又吃鸦片烟；他原来本不吃，自从前年大病刚好后才‘动手’①吃的。母亲曾经劝过他，他说若是不吃，就没气力抬轿子了；我母亲只得由他。起初瘾还小，后来却大了。所以时常钱不够用，他每天从早晨出去，一直抬到夜里二更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得痨病死了。我当轿夫正是他死的那年动手的。那时我才十九岁，今年二十了。我的母亲本可补点衣裳，但是她前几天得病，今天还没有全好！这几天就靠我一个人找钱来供家了。”

“你一天找的钱够用吗？”

“有时不够用，那就只有吃稀饭了。一个月里总有六七天要吃稀饭，先生！你没看我这样的瘦么？李家二少爷——我常常抬过他的——他的年纪与我一样大，但他却比我胖得多呢！我每回抬他过后，回来总要喘气许久。不过他每回的轿钱总比别人给得多些。我们都愿意去抬他。……”

“你读过书吗？”他刚说到这里，我忽然说了这句话。

“我读过几个月，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再去读了。我读了一

---

① 动手：这里是开始的意思。

本《三字经》，《千字文》也读了小半本。我还记得《三字经》的起头是'人之初，性本善'咧！我想若是多读几年书，那我就可以同小的时候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张三哥一样：在什么营里当什么师爷了。现在也不来抬轿子了。唉！这也是我的命该这样的。

"我不晓得我前世造了什么孽？菩萨罚我来受这样的罪。我记得昨天我们抬一个先生到青石桥街去，我抬前头，本来应该给我二百文的轿钱，哪晓得他下了轿，只给了一百四十文。我去请他添三十文，他不但不添，反骂了我一顿；我这时说了一句气话，他听了打了我两个耳光。他又说要叫'警察局'①来拉我到厅里去。我们向来怕'警察局'，因为他是专欺我们穷人的。② 我听见这话，心里有些怕了；只得拿了一百四十文钱走出来。我将走出门的时候，还听见他骂我'该死的'声音。我想我死了还要好些，免得生着受活罪。……不过我死了，我的母亲又靠着谁人来养活呢？还有兄弟妹妹呢？……"

我听到这里，几乎要哭了。或者可以说我简直被他的话所占有了。我心中只是愤怒，只是悲哀，只是忧愁。我觉得他很可爱，虽然他每天的生活只有苦痛，但是他的心是很纯洁的，决没有害人利己的思想在他的心内藏着。他比那些戴着假面具的恶魔至少总要好一百倍罢！我对于他只有崇拜。我几乎要发狂了。

---

① 成都劳动阶级的人呼"警察"为"警察局"。

② 这话是实在的，并不是我说的。

这时已到友人家里。下了轿，把轿钱交与这个轿夫后，就被一个人领我到客厅里了。

从此这个可爱的人的悲惨的故事，好像印在我心上似的，不知何时才能消失呢。

1922，9，3，夜。

路上所见*

一只瘦的牛负着几袋米在前面走着，

一个雄壮的人拿着鞭子在后面跟着，

牛似乎负不起这几袋米了，

它的步子越走越慢，

却恼了后面的人；

“一！二！”鞭子举起而且打在牛背上了，

牛惊了，跳了一下，又向前急行了几步，

但它终于不能走了。

只是可怕的鞭子又举起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致《文学旬刊》*

…………

我很希望《文学旬刊》能改出周刊，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学刊物只有《小说月报》、《创造》、《文学旬刊》三种。《创造》是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次，时间太久了，并且还不能如期出版。《小说月报》要一月才出版一次。《文学旬刊》虽然十天出一次，但每次只有一小张，登了几篇文章就没有余地了，所以每回要目预告要登的文章总不能照样登出。若改出周刊每月要多出一张(有时还多两张)，要好多了。并且于《学灯》也无什么损失。想来总能实行的。

近来《礼拜六》、《半月》、《快活》、《游戏世界》等等杂志很发达，不能算是好现象。但是这也是应该的，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所以这种东西才能受人欢迎。西谛君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乃在于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积极的把他们的那种旧眼光变换过。"

有一些人说中国现代的"新小说"(指《小说月报》等杂志所登的创作品)不容易懂，所以一般没有高深学识的人看不懂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李芾甘。

这些才去看《礼拜六》等杂志。其实《小说月报》的创作只要读的时候稍稍用点心，就看懂了。无奈一些中国人总恨时间多，只是找消遣的事做，只是游玩、闲耍，舍不得用一点心，所以才不喜欢看非消遣的小说。我以为现在最好一面做建设的工作，一面做破坏的工作；双方齐进，那末就可得很大的效果；将来中国文学便可立足于世界文学之间，并能大放光明。这就是我的意见。

我很希望你们与我常通信教导我。

西谛君的《悲鸣之鸟》① 何等沉痛呵！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了。

① 《悲鸣之鸟》：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梦*

我有一次到了一个很宽广的地方。
在灰色的天底下面，
我看见污泥的地上
　横卧着许多的人。
他们是昏睡着的，
脸上还带着欢乐的颜色；
只是他们底身体已经瘦得不成样了，
他们底衣服已烂得不能蔽体了。
　并且一身都是污泥。
我这时实在不愿意看了，
　急忙把头掉过去；
但是各处都卧着这样的人呵！
只有把眼闭着了罢！

忽然听见了一种很微弱的呼声，
“起来呀！”“起来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我又睁开眼看：
一个穿着绿衣的人，
　站在他们中间叫着。
他只是叫，但却没有应声，
　也没有一个人被他惊醒。
他叹了一口气，又尽力地大叫一声，
　有一两个人在翻身了；
　但他们打了几个呵欠，又睡着了。
“起来呀！”声音更微弱了。
　他忽然倒了。
　眼也闭着了，口里发出微弱的叹息。
　现在他完全躺在污泥里了。
　天全然黑暗了，
　一切都看不见了。

疯　人*

假若有一个极富的人，
　将他所有的金钱
　散与一切的贫民；
　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
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

假若有一个商人，
　将他所有的货物
　散与一切的贫民；
　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
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

假若有一个大田主，
　将他所有的粗米
　散与一切的贫民；
　这时一般人定说他是疯人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但是现在世界中正需要一个这样的疯人呵！

我决意要在现在世界中，
　寻出一个——只寻出一个——疯人，
　但是失败了；
因为我是生在这聪明人的世界中呵！
这世界中已没有一个疯人存在了。

惭　　愧*

"少爷，给我一个钱罢！

　可怜我两天来都没有吃东西呵！"

路旁一个老丐底凄惨而且微弱的叫声，

深深地打入我底心坎里。

我便漠然地伸我底手进衣袋里，

摸索了许久，——许久，

但终于没有摸出钱来。

他呢？失望了，

他底眼紧紧地望着我。

我将什么礼物赠他呢？

只得无力地看了他一眼，

低下头儿走了。

可是我底心上便永远留有"惭愧"的痕迹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丧家的小孩*

"呵！看卖人呵！"
一阵微风吹过来的
带着轻蔑的笑声，
引诱着我底目光向前了。
一个约莫十一二岁的小孩，
穿着一件极褴褛的衣。
乱发蓬蓬的头上，
插着一个草标儿。
他底小脸是深黑的，
好像许久没有洗濯的了。
他底身躯是很小的，也很瘦的，
我知道他已许久没有吃过饱饭了，
街上的人都笑他，厌他；
　却没有一个可怜他。
因为他已是一个丧家的小孩，
没有母亲保护的人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署名佩竿。

没有母亲保护的，丧家的小孩，
在这世界中是任人践踏的。

（这是我眼见着的一件实事）

一九二三年

诗 四 首*

哭

可是我连哭的勇气都没有了！
哭是弱者唯一的安慰呵！

沉 没

受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以后；
那个乞丐便倒在街心寂然地死了！

锣 声

我偶然从梦中醒来
听悠悠地更夫沉重的锣声；
似乎都放在我底心上敲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草堂》第二期。署名佩竿。

母　亲

母亲呵！
每当忍受人们的冷酷待遇时；
便自然忆起了亡故的母亲呵！

诗四首*

一

没有母亲保护的小孩，
是野外任人践踏的荒草呵！

二

一株被扎过了的梅花在盆里死了。
她的一生原是这样的寂寞呵！

三

这个月夜与数年前的有什么分别呢？
但如今却只有我一个人徘徊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草堂》第三期，署名佩竿。其中第二题后题作《寂寞》，发表于同年十月《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号。

四

小孩时代的光阴如梦如烟地便过去了，
只剩下如今的几声长叹了。

报　　复*

本年一月十七日是黄、庞二君被赵恒惕冤杀的周年纪念日。黄、庞二君被杀已有一年了，而赵氏还安稳地在湖南做省长，想起来实在令人愤怒。这首诗就是在愤怒中做的，所以不像诗；但是只要能感动人，是不是诗也不要紧。

我们是量小的人，
一切过去的事都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
一刻也不能忘记呵！
我们的兄弟被冤杀了。
我们能忘记了么？
不！我们的心终究还在，
我们就实在不能忘记呵！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的血要为着我们的兄弟而流的；
我们的血原也是我们兄弟的血呵！
一切有良心的朋友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孤吟》第一期。署名P.K.。

我们用什么来安慰我们被冤杀的兄弟呢？
我们用什么来对待杀我们兄弟的仇人呢？
我们的兄弟正等着呵！
呵！我们有的是"血"呵，
我们青年的热血呵！
我们快起来报复罢！
还等着什么呢？
未必要等到杀我们自己的时候么？
呵！良心在何处去了？
我们的兄弟原也是我们自己呵！
我们还是"人"呵！
我们有"人"的热血呵！
如果我们"人"的热血还没有尽冷，
这杀兄弟的仇终究是要报复的呵！
并且我们的兄弟也是为着我们全人类的利益而死
　的呵。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是要报复的。
我们绝对不能让恶魔安稳地生存着，
因为我们终究还是"人"呵！
"你该死"，这是恶魔与我们"人"的宣战书呵！
也就是我们兄弟的"死刑判决书"呵！
如果我们能承认是"人"，
我们总要起来争回"人类之光荣"罢！

我们总要与恶魔决一死战罢！
这是我们与恶魔最后的决战呵！
一切有良心的朋友们：
我们记着我们兄弟的血，
预备着我们自己的血；
来与恶魔决一死战罢。
杀兄弟的仇是必要报复的呵！

小　　诗*

一

一株小草正想安静着，
忽然一阵风来，
便把它吹动了。
它真是不幸呵！

二

最可怜的是我家园里的桂花呵！
一阵的秋雨，
把它打落在地上；
一阵的秋风，
又把它吹到污泥里去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孤吟》第二期。署名佩竿。

三

夜深了，
躺在床上的病了的我，
静听着一个蟋蟀的亲切的叫声。

四

笼中的鸟也会高飞天空呵！
可是现在它嘲笑在空中徬徨的乌鸦了！

小　　诗*

——哭侄诗之一

"四叔！""四叔！"
从可爱的小口里叫出的这声音；
我能再听一回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孤吟》第三期。署名P.K.。共三节，此为第二节；因一、三节与《诗四首》中之一、三节同，此处略。

诗 二 首*

一 生

未开的——含苞了；
将开的——开放了；
已开的——凋残了，
花儿静悄悄地过了她的一生。

黑 夜 行 舟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呵，
请挨近一些儿罢！

---

* 这三首小诗最初同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号。署名佩竿（发表时未集于一起）。

嘉兴杂忆*(残稿)

一　夜雨中之火车站——火车中

我们原拟于十八日乘早车到南京的，后来接到江彝九君一封快信，他说若我们乘早车赴宁，到宁时则在晚间十时，下车后雇车甚为不便，可另改期。我们接信后，即与四伯祖商量，改订是日晚八时乘夜快车，计到南京当在第二日晨七时。

是日早间即将行李预备妥当，因为风大，晚间不便行船，所以四伯祖叫四婶早点与我们弄饭，五点钟我们便吃过饭，别过四婶和弟妹。船已由德良弟雇好，四伯祖因事要往友人处去，叫德良伴我们到车站。

走出门外，天正下着绵绵的小雨，街心的石板已湿了，我们三人转了一个弯，便到了小船停泊的地方，一个一个地下了船，行李早搬下船去了。嘉兴这种船很小，两头舱板，中间一块方的凹下的地方，两边有两扇窗子(其实算不得窗子，不过二个小方洞罢了)，可随时启闭，有一边放有一块木板，船内勉强可坐四个人，后面便是船橹以及煮饭的炉子家具等。我们

* 本篇于一九二三年末作于南京。其中第二则曾由嘉兴市志编纂室发表于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嘉兴日报》，发表时作者对其中个别字曾稍作改动。

的行李颇多，堆满了舱板上，我与三哥、德良弟便伏处船中，船篷甚低，我们的头只好埋着。我们下船的时候，天已近黑，风又甚大，摇船的便把前面的船篷扯下来，免得风吹进船中。这一来固然没有风进来了，然而坐在船中黑暗得很，真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慨。外面的风还不停地向着船篷吹来，弄出一种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中又夹着水流声、摇橹声和偶尔的人声，这些奇异的音乐是我毕生所没有听见的。船中虽有我们三人和后面的两个摇船的老妇，然而却没有听见说话的声音，她们的心我不知道，然就以我那时的心理来说，真是奇异得很，若仅仅描写我那时的心理，恐怕把这本书写完也不够。因人当了这种时候，心中的感觉奇异得很，复杂得很，第一便是万念俱消，往日心中所想慕的英雄事业至此完全成可悲的梦境，好像英雄末路一样，只有在荒凉中度其余生而已，不复有他念；继而又想到以前的情况，去年此时还在温暖之室中，今年此日便在与烈风奋斗之一黑暗小船中矣，人事之不常若是；后来又想象茫茫之前途与南京的情景。德良弟不耐黑暗，频开旁小窗，有光线随之而入，然甚微弱，船篷外风甚剧，雨亦未止，船行已久，尚不到车站，奈何，坐在此小船中，真正度日如年了。

在黑暗中不知过了许久，渐渐听见了远处的人声，愈走愈近，知离车站不远，乃随手推开身旁小窗，则见窗外红灯一二，荡漾水波中，久处黑暗中之人，睹此灯光，心为之一喜。俄尔人声嘈杂，盖船过铁路桥下也。过铁路桥后，行未久，即抵车站，船泊岸边，时已天暮，雨尚未止。我等行李甚重，摇船老妇不能搬上岸，德良弟乃先上岸，在车站中唤一搬运者来，将我

们的行李搬上去。然搬运者只一人，每次只能搬运一件，因上岸去的斜坡被雨润湿，滑不易行，而此时天暮风急，小船若不速返，恐迷归路，故先将行李搬在斜坡上。我两手提一网篮，篮中装满书籍，重甚，经数次努力，亦提至斜坡上。于是三哥把船钱交与摇橹老妇，德良弟与我等告别后，复下船，欸乃一声，小船载德良弟归去矣。

雨中火车站之情景，实出人意外，车站外竟无人，唯一盏大电灯清冷的放出光明。地上雨落不止，站内虽有人声，然并不十分喧闹，因此令人突生一种凄凉之感觉。三哥上岸入站内，留意已运至站内的行李，我仍留斜坡上看守未搬完之物，此时虽有细雨，我亦不畏。不久，搬运者已将行李搬完，我亦随之入站。站外微觉冷，站内则颇温暖。至站内微微将衣服上的细雨丝抖了一下，用手抚衣，微觉润湿。站内人不甚多，乘客待车者颇少，大都小贩之类耳。此类小贩，有手提篠篮者，有捧盘者，有摆摊者，所售不过纸烟糖果之类，亦有售滷菜者。我等购花生酥一盒，付价数百文，预备车中食之。此时离开车时尚早，售票之小圆洞紧闭未开（圆洞，是在售票室墙壁上作一个小圆洞，售票时则将此小圆洞打开，购票者将票价由圆洞交售票人）。与圆洞相对之一面有一排长椅，上坐有候车者十数人，行李则置于彼等面前，此等人皆乘三等车者。若乘头二等车者则在候车室，然乘三等车者，有时亦入候车室。我等前次随大叔乘车至上海时，亦在此室坐过。室内陈设清洁，唯室小人众，反不如外面之舒展也。

站内虽较外面温暖，然时有寒风吹入，冷气迎面扑来，有

如利剪。我们便把帽子拉下来，保护两耳及后颈。手虽戴有手套，然仍觉冷，只得时时将两手摩擦以取暖。时距售票时间尚早，心中焦急不堪，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在站内踱来踱去，然双目视线仍在行李上面。因为车站内为各色人等汇集之地，常有小窃扒手出没其间，偶不经意，则行李竟不翼而飞，故不得不时时留心。

来车站的人渐渐多了，大都坐黄包车来的，几乎每次乘车者付车钱时，总要与车夫吵几句。因为车夫常以为所付车钱不足，求多给予，而乘车者又不愿多给。车站内于是热闹了，行李渐渐堆多了，也有送别亲眷的，看他们依依话别的情况，引起了我潜伏在心中悲哀的情感。

为我们搬行李的人，在行李搬入站后，便不见了，也没有向我们索钱。我们等了许久，他还不来，我们很惊奇。我忽然想起《西游记》的神仙故事，这或者是神仙罢，不然他为什么不要钱呢？等了许久，他仍然来了，向我们把钱索去。

一个车站的警察出来了，我们知道要卖票了。三哥便站在木栏杆前（在卖票的圆洞面前有段四、五尺长的栏杆），我守着行李。那个警察面貌很和善，说话是山东的口音。他拿着一根短棒走到栏杆的那一端，因为售票的时间尚未到，他没有什么事，便与我们闲谈起来了。他问我们是不是到上海去的学生，又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他听着我们的口音，便猜着我们是从四川来的，他随后又谈了一些四川的事，我们也胡乱谈了几句。

车站上起了一阵铃声，不久圆洞便开了，但前面已立了几

个人，只得让他们先买票。买票的人都立在栏杆内，警察拿着棒立在栏杆的末端，买了票的人便向那边走去，警察便将短棒放下，让他过去，过后又将短棒举起。过了四五个人，三哥也把票买到了。买了票我们便将行李搬进行李房。不幸因为我们的行李过重，后来“过磅”后，应付两元多钱的行李费，我们没有法，只得照付了事。我们早已知道行李太重，要付行李费（因为我们□□□□① 学赴嘉兴时，在龙华站上车，站小，故行李未“过磅”），□□□留了一口箱子，未交行李房，由我们自己带上车，不□□□□行李费还要多呢！

行李安置妥当后，我便提着箱子同三哥走出□□，走到门前，拿出车票，由守门警察剪去一角。因车还未到，便在月台上等了一阵。是晚乘客不多，此时都立在月台上，伸出头望着前面黑森森的铁路。忽然听见一阵汽笛呜呜声，自远而近，接着便是火车在铁轨行走的声音，远远有两盏明亮的灯愈走愈近。

“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大声震耳，两盏大的明灯直射过来，有如千军万马杀过来一般。这时缩着颈项、弯曲着背的乘客，面上都有喜色（我们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原来癸亥年十二月十八夜由杭州到上海的夜快车于八点钟到嘉兴车站了。

火车到了车站，于是这冷静的嘉兴车站也顿形热闹起来了，上车的与下车的拥挤不堪。我们向前走正要上车，忽然听见后面叫道：“坐三等车的请到后面来，这里有空位子！”我们

① 此处及以下三处均系原稿残缺。

便转过身来，走到后面上了车。

今夜乘客还不多，我们便选了中间的一排位子坐下，正对着窗子。对面(即靠着窗子)也有一排座位，上面有放箱子的架子，我们便把箱子放了上去。

坐下后，因在车站内立了许久，人颇劳顿，便闭目靠着椅背休息了一阵。随后觉得精神好了一点，便取出先前在车站内购的《申报》慢慢的读下去。

《申报》读完放在身边，车声辘辘，催人入梦。三哥此时如何，我不知，我则闭目休息。然有时也把眼睁开望着窗外，不过是晚落雨，天甚黑暗，窗外模糊看不见什么。忽然对面坐的一个乘客把我们的报顺手拿了过去，其实大家都是出门人，看看报并不要紧，不过他一句腔也未开，好像是他的东西一样，因此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将他看了一阵。他年纪三四十岁，穿了一件旧的外套，戴着一顶小瓜皮帽，脸上颇有点霉气。他把报翻了几下，便折好，放在身旁，并不还我们。歇了一阵，三哥便把报拿过来。我此时甚觉困倦，对于一切都未留心，过了许久，忽看见对面那位乘客拿着一份折好的报放在他的皮包内，我侧过头来，而我们的报已不见了，三哥却向着我笑，……我明白了。

二　塘汇李家祠堂

我们由上海到了嘉兴——这是第一次——住在四伯祖家里。第一天下午，四伯祖特别办了几样菜，买了点酒来款待我

们。喝了两杯酒，谈了祠堂的事，由四伯祖口中，才知祠堂因斐卿二哥管理不善，加以年久失修，实在败坏不堪。并且斐卿又吸鸦片烟，有时没有烟钱，便把祠堂的东西拿去变卖，到了现在，简直不成样子了。四伯祖言下不胜感慨，我一团火热的心听了这话已冷了一半，我们梦想的“嘉兴祠堂”原来是这样！后来，大叔自上海回嘉，四伯祖便约定与我们一路到祠堂去。我们四个人——四伯祖、大叔、三哥和我——坐了一只小船，船里面只好容两个人，现在坐了四个人，实在不舒服。大叔坐在里面，只能把头埋着，不敢伸直，便把两手放在膝上，我正坐在对面。船虽然小，然而湖面却宽，望着一碧无际的水波，令人眼界爽快。两岸有几处种有柳树及其他的树木，投影于波中，载沉载浮。最妙的是摇橹的声音，橹一摇，水便起了一种声音，这是很有节奏，不急不徐，不高不低，并且很幽雅的。这种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边。

船到了岸，我第一个跑上去，然后三哥、大叔，最后我们又将四伯祖扶上岸。上了岸，到了一所茶馆，大叔叫我们在里面坐坐。这所茶馆自然比不上南京的“六朝居”、“清云阁”，也比不上成都的“双龙池”等，却与我们在泸州城内所见的一个茶铺差不多（下江茶铺的习惯不同，第一没有四川茶馆那样的茶叶；第二并不像四川人一人一碗茶的办法。这里大约二三个人泡一碗茶，另外要几个茶杯），然而却要比泸县那所茶馆大些，一面临着街，一面靠着湖，有一排破烂窗户，推开窗户便可望见绿波。非仅如此，因为地板也破了，中有缝隙，从此处也可望见地下的水波。

进了茶铺，便遇着一老人，他是才进来的，看见大叔便上前招呼。我们选了靠着窗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碗茶，五个杯子，随便谈起来。大叔和那位老人谈得正起劲，四伯祖便先到祠堂去，因为祠堂内没有桌子，四伯祖与斐卿商量借一张桌子来（这是大叔后来告诉我们的）。歇了一阵，四伯祖慢慢地走来了。大叔立刻收起他的"话袋"，与那位老者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付了茶钱。于是四伯祖——大叔——三哥——我四个人鱼贯的走出了茶铺。未走几步，到了一个地方的门口，又像破庙的大门一样，然而这里却很狭，破庙的门却要宽许多。路是不平的，两边堆着碎石残瓦，不到四五步便走进去了。天井中没有石板，是泥地，走上石阶约十余步便是神龛。神龛中放着神主（约有三隔，中间放着始祖的神主，但现在记不清楚了），外面嵌满了玻璃，玻璃窗上已落满了尘埃，中间的玻璃也有碎的了。神龛面前放了一张破烂的桌子，石阶两旁各有一排栏杆，上面有几扇窗户，但现在已没有了。靠着右边墙壁走过去有一道小门，四伯祖把门拉开，我们走去原来是一片堆着碎瓦的地。屋顶是漏的，抬头可见着青天。靠着栏杆放着几块破砖，围成一个小炉子，上面放着一个大瓦罐，是盖着的，不知里面煮的是什么东西。天井中放一张桌子，一个成衣匠在那里缝衣。① 这就是我们的祠堂！

四伯祖将蜡烛燃起，我们把礼行了。外面进来了一个半老的女人，又黑又瘦。大叔说这是友兰二婶。我们与她磕了

---

① 因为斐卿把祠堂租与成衣匠了。

一个头，随便说了几句话，四伯祖、大叔便引我们出来了。这是拜谒祠堂的第一次。

后来与大叔到了上海住在春江旅馆。大叔在《新申报》办事，离这旅馆很近，每夜必来谈许久。从大叔的谈话中，才知道祠堂的情形。我们曾将这些情形写成两封信分寄二伯与二叔。在五月二十日(大约五、六两日，但记不清楚了)，四伯祖寄来一封信，此信曾抄寄大哥，但不幸中途遗失，故现在抄在下面：

> 两侄孙如晤，前月二十二日车站一别，倏又匝月。十一日接初十所发手书，藉悉种种，就谂旅祺绥燕为慰。月初接青城侄来信，并洋八十元，嘱将祠堂房屋赶快修理，故已择二十一日开工筑修。无如斐侄孙因不能侵挪银钱，种种为难，无可理喻。此信到后，请三侄孙于明日九时半乘慢车来禾，相商一切，当即令亮孙到车站迎迓。至于被帐枕席，吾处已备，可不必带。余均面言(下略)。五月。

这封信由大叔转来外，端亮弟亦有一英文信，请三哥去。三哥不甚愿意。但因四伯祖来信既是这样，大叔又叫他去，也不得不答应了。那几天，我们正没有钱，大叔便拿了两块钱与三哥作车费。三哥在嘉住了几天，我们天天都要通信。他在嘉所做的事，详见他寄来的信中，但我已寄与大哥，故这里无法写出。总之一句话，祠堂修理好了。

管理祠堂的事又发生问题了，原来是斐卿管理的，现在他自然是不行了。大叔起初说四伯祖以为友兰二婶可管理，后

来才知道友兰二婶与斐卿哥一样。大叔又与我们商量拟请四伯祖管理，四伯祖后来回了大叔一信说明许多苦衷。二伯父后来兑了二十块钱来叫我们寒假回家祭扫查验工程，并替二伯祖做神主。我们腊月初八日在龙华乘车返嘉，但返嘉的前几天又听说斐卿把祠堂的大门拿去当了。到了嘉兴又同四伯祖到祠堂，这次见着斐卿哥了。记得前次写信与二伯和二叔，曾说斐卿"骨瘦如柴，面黑若炭"，这次见了面，才觉得前次的话有点过甚其辞，祠堂也算修理好了，各处都很清洁，供桌都是用砖做的，因为怕斐卿拿去当卖，这次又见两旁墙壁嵌了两块石碑，上面刻了许多小楷，是说蓉洲二伯祖建祠堂的缘起。

斐卿哥取出"当票"，我们垫付了钱，把两扇大门取回来。因为怕他再拿去当，故在隔壁棺材铺叫了一个木匠来，用铁钉铁圈把门钉起。木匠一面钉，一面笑说："现在总取不下来了。"嘉兴的当铺自然不只一家，但能当门的却只有塘汇那一家。这真是祠堂的运气！若祠堂不在塘汇，或塘汇的当铺不要门和窗子等物，便好了。我们看时间不早，事已办完，便把祠堂的门锁了，钥匙放在四伯祖处。以后四伯祖常来祭扫，斐卿仍住在祠堂外面的一间小屋(这也是属于祠堂的)内。

我们磕头时，附近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跑来看，走的时候却清静极了。斐卿送我们到船上，四伯祖说他过年时要到祠堂来，斐卿又叫我们过年也去，谁知我们十八便要离嘉，他想我们或在嘉过年，然后赴南京。斐卿哥曾写信到四伯祖家里向我们借钱，后来又当面说起，我们便送了他一块钱。最有趣

的是他向祖宗磕头时，一面说："莽洲公公二弟四弟一去高中……"斐卿人本不坏，然而毕竟坏了。这实在是鸦片烟的罪过。

1923年12月在南京写完

一九二四年

悼橘宗一*

一

我们且闭目想想罢：
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
被残酷的恶魔捉着，
光亮的刀锋刺进肥白的身体，
随着刀喷出的鲜血，
和从痛苦中迸出来的叫号。
这是何等的残酷呵！
这样的惨剧又现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二

可羞呵，卖友的叛徒；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春雷》第三部。署名芾甘。发表时附有作者注："橘宗一君，大杉荣之甥，其妹之独子。一九一七年生于美国。一九二三年六月同母亲来日本，九月一日震灾发生，君与大杉荣夫妇同为宪兵大尉甘粕正彦所杀。实是近年来一大惨剧！昨于《劳动运动》上见君的遗照，悲愤不已，便和泪写了这首诗。"

可恨呵，资本主义的恶魔。
难道这无抵抗的七岁的小孩，
便会破坏你们资本主义的根基，
捣碎你们天皇的宝座么？
你这残酷的行动，
只不过在世界上留下极大的污点，
使资本主义的罪恶更加明显，
你何尝能使他七年的生命永离人间？

三

可怜呵，我小小的橘宗一！
可爱呵，我小小的橘宗一！
可敬呵，我小小的橘宗一！
我们的小兄弟，
光明的先驱者，
你等着罢！
你的仇我们要报复的。
我们要使饮你的血的毒剑转去喝一切恶魔
　的血呵！

（于南京）

伟大的殉道者*

——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一

伟大的殉道者，
闭了目罢！
你的呼声是永久在我们心上的；
你的血染透的旗帜是永久在我们手中的。
我们是要举起而向自由的路上前进呵！

二

资本主义的淫威居然压到你头上；
帝国主义的毒剑居然染满了你的赤血；
三十余年贫困、流亡、监禁的生活从此完结；
但你的心却永不死去，
只永在东亚劳动者的心中活跃，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春雷》第三期。署名芾甘。

你的生命却永远不朽，
永远指挥着东亚的劳动者向光明自由的路
上走。

三

“为安那其欢呼，
这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候。”①
你全身的血光，
将永照耀全球，
使一切的恶魔战抖。

民众的呼声又在喧响：
“日本天皇”的根基已在动摇；
导火线已被你的血光点燃，
劳动者的部队将直往资本主义的阵上走。
且看数十年后的九月一日，②
最后的胜利究竟属谁手？

（于南京）

① 支加谷劳动运动殉难者 Adolph Fischer 临刑时高呼“Hurrah for Anarchy! This is the happiest moment of my life”。

② 大杉荣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殉难。

大杉荣著作年表*

一　自　著

1. 《生活之斗争》：大正三年(1914)十月出版，这是他最初的论文集。是将他在《近代思想》和其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搜集编印的(现已绝版)。

2. 《社会的个人主义》：大正四年(1915)十一月出版，这是将他在《生活之斗争》出版后一年内所著的论文搜集编印的(现已绝版)。

3. 《劳动运动之哲学》：大正八年(1919)三月出版，《生活与艺术丛书》的第四编，这是他关于劳动运动的论文集，论"工团主义"尤详，但出版不久即被禁止发卖。

4. 《狱中记》：大正八年(1919)八月出版，是他追忆狱中生活写成的，可说是他的"自传"之一部分。

5. 《乞食之名誉》：大正九年(1920)五月出版，这是他与伊藤野枝共著的短篇小说集。内有他的《死灰中》(El la cindre)，野枝的《转机》、《乞食之名誉》等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春雷》第三期　署名芾甘。

6.《克鲁泡特金研究》：大正九年(1920)十一月出版，这是介绍克翁思想的，最后两篇是《克氏之经济学》、《克氏之教育论》，现由惠林君译出。

7.《恶戏》：大正十年(1921)三月出版，与野枝共著，这是他为社会运动苦斗的纪录，也可说是他的"自传"的一部分。

8.《求正义之心》：大正十年(1921)八月出版，这是将他在《生活之斗争》、《社会的个人主义》、《劳动运动之哲学》中的重要论文选集编印的，末附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之译文。

9.《两个革命家》：大正十一年(1922)六月出版，这是他与伊藤野枝共著的。他著介绍巴枯宁(Michael Bakounine)的思想和行动的一篇；野枝则著介绍高德曼女士(Emma Goldman)的《思想和生涯》的一篇。

10.《游戏画》：大正十一年(1922)十月出版，这是《恶戏》的姊妹篇，并有望月桂的宣传画。

11.《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出版，这篇是说明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末附克鲁泡特金的"Revolution dans L'idée Revolutionaire"的译文。

12.《日本逃出记》：大正十二年(1923)十一月出版，这是述他怎样从日本侦探的监视下逃出来，拟往柏林赴万国无政府党大会后来在巴黎被捕的事，以及途中的见闻和感想。末附关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玛哈诺(Nestor Mahano)的论文。

13.《自叙传》：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出版，这篇是述他少年时代生活，陆续发表于《改造》杂志，直到述及他在陆

军预备学校的生活为止。

14.《自由的先驱》：大正十三年(1924)三月出版，这是《求正义之心》的姊妹篇。

其中末三种书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二 译 述

1.《万物的一族》：明治四十年(1902)出版，是译H. Moore的Universal kinship。堺利彦所编辑的《平民科学丛书》第四卷。这是他二十岁时在巢鸭狱中译的(现已绝版)。

2.《物质非不灭论》：大正三年(1914)十月出版，《近代知识丛书》第一卷，译自法国群众心理学家Gustav Lebon所著"Naissance et L'Evanouissement de la Matiére."及"L'Evolution de la Matiére"二书(现已绝版)。

3.《种之起原》：大正五年(1916)三月出版，达尔文(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之译本。

4.《男女关系之进化》：大正六年(1917)二月版，Letourneur的"L'Evolution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lie"之译本。

5.《民众艺术论》：大正六年(1917)六月出版，法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Le Theatre du Peuple"之译本。

6.《相互扶助论》：大正六年(1917)十月出版，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Mutual aid")之译本。

7.《革命家之追忆》：大正九年(1920)二月出版，克鲁泡

特金的《自叙传》("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之译本。

8.《人间之正体》：大正十年(1921)六月出版，这是把他从前翻译的《万物的一族》和《精神篇》编印的。

9.《昆虫记》(第一卷)：大正十一年(1922)十月出版，这是J.H.Fabre的"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Etudes sur, L'instinct et les Moeurs des Insects"的译文，他出丰多摩监狱后翻印的，全书共十卷。

10.《自然科学讲话》：大正十二年(1923)三月出版，这是Fabre所著的"Le Livre d'Histoires"之译文，是他与安成四郎共译的。

11.《科学之不可思议》：大正十二年八月出版，Fabre的"Maitre Paul"之译文，他与野枝共译的。

这篇短文是根据日本《劳动运动大杉荣、伊藤野枝追悼号》后面的"Biblografio de Osugi"一篇而作的。后来又依前面一篇《大杉荣著作年表》改了一两处。各书的日文原名，本想写出来的，因印刷不便，故略了。

芾甘启事*

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

* 本篇原刊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春雷》第三期。

大杉荣年谱*

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七日　大杉荣生于日本名古屋的新发田。他的父亲名大杉东，是个陆军少尉。他出生以后，他父亲转到东京近卫联队，他的家也迁往东京。

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五岁　随父亲再转回新发田联中，他住在这地方一直到十五岁。那时他受他母亲豪爽的性情的影响很深，他在小学校中很勤敏，很卓绝而又很顽皮。他又习击剑、柔术和游泳。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十五岁　他进名古屋幼年学校，二年六月后被斥退出校；斥退的动机是男色事件，而真因却是因他不守规律，不服从命令。

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十八岁　他到东京进顺天中学，完成他对于法语的研究。那时他很有在军事上服务的志愿。但不久他的母亲病故，他的思想很混乱；曾在本乡教会堂听海老名弹正的说教，随后就受洗礼而为基督教徒。他那时又很喜欢失龙野溪的《新社会》和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两书。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民钟》第一卷第九期。署名芾甘。

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十九岁　他卒业于中学，入外国语学校法语科。这年冬天万朝记者中因为非战问题起了意见，主张非战的幸德秋水、堺利彦、石川三四郎诸人便退出万朝报，另组织了"平民社"，并发行纯粹社会主义周刊《平民新闻》。他很表同情于幸德诸人，并且时常访他们。那时候他很爱读幸德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

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二十岁　他完全舍弃了他对于宗教的信仰。开始出席于平民社的研究会，并且帮助幸德编辑《平民新闻》。从法国社会主义杂志译了许多稿件载《平民新闻》。"海外消息"一栏，就是他担任的，专译载各国运动的情形。

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二十一岁　一月，《平民新闻》停版，二月又复版宣言，是年九月便停版了。十月"平民社"也解散了。社员分成两派：一派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发刊《新纪元》；一派是反对宗教的，便发刊《光》。自然他是加入《光》的。

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二岁　四月，他卒业于外国语学校。某日在街中遇着民众反对电车加资的运动，他便加入人丛中，与巡警战斗，后来竟被逮捕，判了二年六个月的徒刑，到了六月被保释出狱。八月，与堺利彦前夫人之妹堀保子结婚。他的夫人也是社会主义者。十一月《光》第二十一号上载有非军备运动的檄文一篇，这是译自法国无政府党报纸《安那共》上的《告新的兵士》一文，受着新闻纸条例违犯的起诉。不久他便与黑板胜美、千布利雄等人创立"日本世界语

协会”。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二十三岁　一月,幸德诸人发行《平民新闻日刊》,二月某日的报纸上便载他的一篇论文《欧洲社会党运动之大势》,公然宣布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意见。四月,《告新的兵士》的诉讼判决了,决定以朝宪紊乱监禁他五个月。他被投入巢鸭监狱,但入狱后,他译的《告少年》(克鲁泡特金著)又在《平民新闻日刊》发表出来了,于是他的监禁罪又加上三个月。四月十四日,《平民新闻》被日政府禁止,六月又在大阪发刊《日本平民新闻》。十一月他便出狱了。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二十四岁　一月里他们的“金曜日讲演会”被政府用武力解散了,那时他跳上会所的屋顶向街中的民众演说,与巡警战斗数次,终于被捕了,又判了一月半的监禁。六月他们在神田锦辉馆开山口义三出狱欢迎会,这会又被警察解散了。他同十四个男女同志手持赤旗,旗上大书“无政府共产”在街头游行,这十四人和他都被逮捕了,又判定二年六个月的监禁。自此以后,日本社会运动才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派。这件事叫作“赤旗事件”。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二十五岁　这年他完全被关在千叶监狱中。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二十六岁　二月中他的父亲死了。十一月他自千叶监狱出来,便加入堺利彦的“卖文社”。他在狱中时,幸德及二十三个同志因“大逆事件”(即反抗天皇的革命事件)被政府逮下狱。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四日

"大逆事件"判决的结果，幸德等十二人被处死刑，其余十二人终身监禁。这时同志四散，实在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凄惨荒凉的时代。各种革命的杂志和书籍都被政府禁止出版了，甚至连讨论也不许的。幸德诸人未判处刑时，他常往狱中访他们，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并且更坚定他对于主义的信仰。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二十八岁　十月他与荒细胜三(此人后来变为布尔雪维克主义者)共同创刊文艺杂志《近代思想》，以哲学社会学的抽象论，来宣传无政府主义于知识阶级的青年，这个文学团体中渐渐起了主义上的争论。

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二十九岁　这时他已是思想界中的明星。他又组织"工团主义研究会"，每月开会一次，但到会者多半是知识阶级的青年。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三十岁　《近代思想》更加发展，但到了九月便停版了。他也不以专向知识阶级宣传为满意，所以又创刊为劳动者的出版物《平民新闻》月刊，更为具体的宣传；这杂志一、二、三号都被政府禁止。"工团主义研究会"也改名为"平民演讲会"。这时他的新旧同志甚多。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三十一岁　《平民新闻》第四号因全面转载记事，得免禁止；但是第五、六号又陆续被禁止了。十月《近代思想》复活，内容包含《近代思想》及《平民新闻》两杂志的性质，更为精彩。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三十二岁　《近代思想》社内因社员对于主义的意见不一致，一月号便停刊了。同时"平民演讲会"因避免警察的压制，常常迁移集会所。这时他与他夫人

堀保子离异。他又恋爱神近市子、伊藤野枝二人；神近市子因为妒嫉的缘故，用匕首刺伤他的咽喉，他几乎被刺死。这件事遍传社会；有许多同志，因此就与他暂时脱离关系了。这件事是有名的“叶山事件”。

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三十三岁　自“叶山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便与伊藤共居，后来生了一个女儿，他叫她做“魔子”。十二月他们创刊《文明批评》杂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是很贫困的。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三十四岁　一月，他移居东京都的贫民窟中，与和田久太郎、久板卯之助二人同住。他们的杂志《文明批评》在第三号便停刊了。后来他得和田、久板二人的帮助，出版《劳动新闻》月刊，出了四期，因受政府的迫害便停版了。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十五岁　这年春间因为受了俄国大革命、全世界经济的恐慌、日本的米骚动，及国际劳动会议等事件的影响，日本的劳动组合，便突然兴盛。十月，他与同志近藤宪二、和田久太郎、中村还一、久板卯之助、伊藤野枝，共同发刊《劳动运动》月刊，他们的目的是促进反抗强横的劳动组合中自由联合的趋向。十二月，他因为殴打监视他的侦探，被判定监禁三月，送入丰多摩监狱，他的次女便是那时出生的。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三十六岁　三月，他便出狱了，六月《劳动运动》停刊，他便移居镰仓。八月，同志有组织“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计划，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不久他又潜往

上海，拟组织极东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盟，但未得到完满的结果，在上海一月后又回到日本。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三十七岁　一月，他和《劳动运动》的同志，又得到高津正道等布尔雪维克主义者的援助，再发行《劳动运动》周刊。二月中他忽然患病，并且很危险的，遂迁入医院治疗；幸而三月里他的病便痊愈，迁出医院了。但是不久《劳动运动》因经济困难，和布尔雪维克一派社员的阴谋的缘故，又停刊了。他的第三女就是在这时出世的。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三十八岁　一月，他和近藤宪二、和田久太郎、伊藤野枝再出《劳动运动》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并且鼓吹劳动组合中的自由联合，同时对于布尔雪维克的中央集权观察极端反对。四月，第四女出生。十月，“全国劳动组合联合”组织的协议会在大阪开会。但是“日本劳动总同盟”一派，采用中央集权主义，而“劳动同盟会”一派，主张自由联合主义，两方意见不相容，所以协议会便决裂了。这时他得到巴黎某同志的信，约他参加柏林的“国际无政府党大会”，于是他潜逃出日本来到上海，得中国同志的帮助，领到赴欧的护照，同一个中国学生到法国。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三十九岁　一月，搭轮到法国在马赛上岸，二月到巴黎，会见许多欧洲同志。五月一日，他参加劳动运动，在巴黎工人示威游行大队中对众讲演，语多激烈，遂被警察逮捕。后来被法政府发觉他的真姓名，六月解送回日本。八月，长子出世，他叫他做“奈司脱”，这是他在欧洲时最感兴味的“无政府主义将军奈司脱马夫饶的名字”；他并

且搜集了许多关于马夫饶运动的材料，著了一篇《无政府主义将军马夫饶》，现在这篇文章附在《日本脱出记》后面。九月一日，东京和横滨发生绝大震灾，在混乱中，他和野枝同他的甥橘宗一被麴町宪兵分队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逮捕。九月十六日，甘柏等在宪兵司令部中绞死了他们三人，并且把他们的尸体抛入井中，用泥土盖着，到九月二十日这件事才暴露于世。

这篇是参考《劳动运动》大杉追悼号上的《大杉荣略传》及 "Biografo de Sakae Osugi" 两篇写成的。后一篇末有一句话，是大家紧记着："用血来洗血。"

一九二六年

一封公开的信*

北京高丽青年社诸君：

来信收到了。你们要出版高丽青年周刊，“介绍高丽民众于友邦民众，并揭破敌对我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之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手段，以图被压迫民族间强固的结合”，这自然是很好的事。我呢，我是一个愿献身于克鲁泡特金主义，终身为自由、平等、正义、人道奋斗的人，对于你们的运动当然是要尽力赞助的了。

本来高丽民众的独立运动是和一般人心目中的独立运动不同的，他们并不想把高丽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只想使高丽人人都能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因此从事于独立运动的青年并不是国家主义者，而是争自由平等的战士（自然有少数是例外的）。我常与高丽青年接触，因此我能够深刻的了解你们高丽民众的独立运动。

你们数十年来所受的压迫实在残虐极了。记得在我的幼年时代，我便常常听见日本政府压迫高丽民众的故事，我知道他们怎样的用残酷的刑罚来对待手无寸铁的你们，然而同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民国日报·觉悟》。

我又知道你们怎样不屈不挠的反抗日本政府。这些事在我幼年的脑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我曾为你们痛哭过，我又曾为你们欢跃过，然而我对你们却不断地表示钦佩。后来常和你们接触，我对于你们的钦佩便更深了。去年到北京会着高丽友人“S”、“L”两君，他们更详细的告诉我高丽民众运动的详情。我尤其感谢“L”君，在一个沉静的晚上，明月高挂在天空，他细细的愤激的把高丽民众苦战的全景展示于我的眼前。他告诉我高丽独立军和日本军队在满洲苦战的情形：怎样二十多个高丽革命党被二三百名日本兵士围困着，其中有几个愿意把自己生命牺牲了而救出其他十几个人，怎样数千日本兵士在高山中被二三百高丽革命党歼灭的情形；他又告诉我怎样高丽革命党某君历尽千辛万苦跑进日本总督署抛掷炸弹而后从容的跑出来；怎样另一个革命党在电车上向日本警察署抛掷炸弹，逃走后被围于一所小屋内与警察苦战而死的情形；他更告诉我怎样赤俄压迫高丽革命军的情形。我细细的听着，我忘记了是在北京，好像我也在北满一带奔走，我实在感动极了；这些人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来为自由、平等、人道奋斗。他们的人格是何等的伟大，我实在不能不被他们那种精神感动了。

亲爱的高丽弟兄们，自那时以来，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却你们了。去年读到你们《告日本无产阶级书》，知道日本政府还预备重演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时屠杀高丽人的悲剧。我的愤怒真到了极点，然而我后来见着日本劳动团体援助你们的宣言，我又觉得宽慰了，因为这表现出来全世界民众

是互助、亲爱、休戚相关的。

本来全世界上的民众是应该互相亲爱，联合一致的。民众本无国界之分，所以甲国民众受了乙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乙国民众也应该起来帮助他们，打倒其本国（乙国）的帝国主义者。我知道日本民众是表同情于你们的，只有政府和资产阶级才是你们的敌人，所以你们应该联合日本民众来打倒日本政府和资产阶级。

“L”君曾诚恳的向我说：“请把我们苦斗的真相告诉中国民众”，我很惭愧，一年来只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这次你们自己出版刊物，把你们苦斗的真相告诉我们中国民众，使中国民众被你们这种精神感动，从睡梦中觉醒起来。这在我自然是十分感谢的，我们怎能看着别人苦斗而自己袖手旁观呢？

“L”君又告诉我，你们自从受了俄政府的欺骗在黑河流了血以后，便觉悟到民众解放是民众自身的事，所以你们的运动并不容野心家参加的。我敢说这种方法一定会把你们引到成功之路上的。

我诚恳的祝福你们胜利。

李芾甘 3月23日于上海。

五一运动史*

一 绪言

一九二六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民众社的同志们决定在这年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五一纪念会中散布一种叙述五一运动历史的小册子，编述的工作是归我担任的。于是我以两晚的功夫写成了这小册交给惠林拿去印刷了。到了开会的那一天，民众社的同志们随着"苏"所执的黑旗走到了会场，一千本的小册子除留了两百多本订在《民众半月刊》合订本之内以外，差不多全散布在到会的工人中间了。所以各处的同志见到这本小册的可算很少很少。

现在一九二九年的五一节快到了，我觉得《平等》虽然不必出什么五一纪念号，但应该登载一篇《五一运动史》，因此便把这篇旧作修改了一下，发表在这里。

二 第一次的胜利

五一节起源于一八八四年。然而在一八三三年便发生了

---

* 本篇曾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刊印单行本，后经修改，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署名黑浪。

缩短工时的运动了。是年伦敦缝工组合为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举行大罢工，参加者二万人。英国的纺织工人经过长久的骚乱后，也决定于一八三四年举行总同盟罢工来要求八小时制。一八四七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十小时工作制。美国工人看见这样的情形，加以一八七二年又发生纽约十万人的大罢工，一八八〇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总同盟成立，他们便于一八八四年议决以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实行第一次争八小时制的大罢工，以后每年五月一日都继续举行示威运动。

其实在一八七八年，八小时制已经被美国国会通过了，然而这仅是一纸具文，并未实行的，这样，自然激起了工人心中的怒潮，他们知道政府是不可靠的，工人的事非由工人自己做不可。因此便自己起来，以直接行动来完成那法令所不能完成的东西。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劳工组合(Knight of Labors，一八三四年成立于美国)同美国劳工同盟会的大会差不多同时开会，决议使八小时运动愈加扩大。并决定以明年五一为期，向资本家要求八小时制，如不能达到目的则举行罢工，从那日以后决不再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资本家知道工人这次下了决心，他们的势力是不可抵御的，所以不到次年(1886)的五月一日便应允了工人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钱自然是和从前一样的。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全国的工人都停了工作排队游行于街市，齐声唱道：

从今以后，无论何人

都不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作工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这次运动的结果是很可惊的。五月一日以后不到十天的功夫，便有十二万五千工人得到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再一个月后，作八小时工作的人竟增加到二十万人。

从此以后，每年的五月一日便永远是美国工人的纪念日。

三　全欧美的工人纪念日

五一的纪念运动从美国又传到欧洲。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举行的万国社会党大会决定采用五月一日为欧洲工人的纪念日。他们相信美国工人已得了很大的成功，假若欧美各国大陆的工人再联合起来一致举行大示威运动，必定有更大的效果。

一九〇〇年的五一，欧美各国无数的大小工业都市都起来举行这个大运动。如伦敦海特公园里的示威运动参加者的人数在二十五万以上，并且临时设了十六处演讲坛。

是年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此后每年继续的在五一节举行此种大运动。到了一九〇四年在安士潭开会的第六次大会又议决于每年五一节举行罢工和示威运动。一九〇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更刊行叫做《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的一本小册子，这是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写的。第一句便是"万

国社会党选定五月一日为无产阶级的觉醒的万国工人停工举行示威运动的日子”。结尾的几句话是：

> 五月一日，全体停工呵！
> 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呵！
> 祝工人的健康！

从此以后，五一节便成了全欧美以及全世界工人的纪念日。资本家每年都战战兢兢的等候此日的到来！

四　我们同政府战

到了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爆发，爱国主义的马蹄踏碎了工人阶级解放的信念。许多社会党忘却了他们的主义，投身战场为万恶的政府效忠。这种人杀人的战争支持了几年，把人类的兽性充分表现出来了。政府的御用学者更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工人。这样，五一的运动反不如从前了。

不过在其间也有少数人在这种爱国的狂涛热浪之中，居然能不为吞没而如巨岩一般的矗立着。他们公然表示反对战争。如高德曼、柏克曼、马拉铁斯达、李布克奈西等便是这样的人。

李布克奈西于一九一六年发表他的《五一宣言》的内容是：

> 贫困和灾难、需要和饥馑正管治着日耳曼、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这几处地方好像是几座大坟墓；那几

国人民的血正被帝国主义的恶鬼在吸吮。全世界所赞美的欧洲文明现在完全被此次大战剥夺尽了。

那些由战争获利的又要同美国开战了。也许明天他们便会命令我们用那无情的武器，去杀我们美国的工友，去攻打欧洲。我们应该仔细思量：要是我们日耳曼民众不站起来，不用那由自己意志指导的势力，那么这民众的暗杀仍将继续不已。这时有千万人的声音高叫着："消灭那无耻的绝灭人类的政策！推倒那些犯这罪恶行为的祸首！"我们的仇敌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那日耳曼的地主，是日耳曼的资本家及其执行委员会——政府。

前进！我们要同政府战！我们要同一切自由的大敌战！我们要为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而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前途而战！

工人们，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大战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对于帝国主义的屠户一点不反抗的，就空空的过去了。

五一这一天，我们要万众同声的高叫"消灭那绝灭人类的罪恶行为！推倒那些帝国主义的祸首！"

欧战结束后，各国社会党人才知道被骗了，因为德国战败后，世界的情形并不曾较好一点。一切政府是一样的靠不住的。这一场欧洲大战算给了各国工人一个很大的教训。这样战后劳动运动的勃兴，自然成了必然的事实。近年来劳工阶级

的势力已经极其雄厚了，资本家在他们之前终于是要俯首的。

五 支加哥的大悲剧

社会进步的历程是一部殉道者的记录。社会进步史和劳动运动史无不是血染成的。没有当时先驱者的热血，哪还有这较光荣的今日。所以要把这如火如荼的五一运动史写下来，一定不能忘掉这鲜红的一页——关于支加哥悲剧的记载！

这是一八八六年的事。在这年二月间支加哥的麦可米克农具制造厂工人实行罢工，被厂主驱逐出厂者有一千二百余人之多，同时厂主又雇来三百多名警察以保护那些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工人与厂主间的战斗日趋激烈。

同时美国各地进行八小时运动甚力，罢工风潮时起，资本家看见工人的势力不可侮，颇有畏惧之心，于是一面向工人表示好意，一面又暗中预备抵御工人的方法。美国的劳动运动确是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了。

第一个五一节在激烈的风潮中过了。第二日罢工工人曾开会反抗警察的暴行。柏尔孙司、司柏司等无政府主义者都到会演说。次日推运木料工人组合又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恢复工作的条件，会议地点在麦可米克工场附近。会场的秩序起初很好。在四点钟的时候忽然麦可米克工场的铃响了，那些破坏罢工的人出来了。于是一部分的群众便向他们走去。当时有极少数的人掷了几个石子，双方大起冲突，发生巷战。警察见势不佳，便打电话到局里。不久便有大队的警察到了

这会场，随后他们便与到会的群众起了冲突。警察居然向着那些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与小孩开枪，立刻击死了六个人，并且还伤了无数。

民众非常激怒了。于是司柏司立刻发通告，召集武装工人。同时恩格尔、斐失尔等决定于次日晚上在草市场开紧急会议。司柏司是《劳工新闻》的主笔，他当时便用英文和德文草了一篇宣言，共印五千份，散布各街。失瓦伯又在五月四日的《劳工新闻》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檄文：

> 阶级战争已经开始了！许多工人昨日在麦可米克工场前被枪击死了！他们的血正在那里叫喊复仇！现在万不可迟疑了。一群如鹰似虎的军警正要喝我们的血呢！然而工人们并不是一群任人屠杀的驯兽。白刃临头，红血相报！宁可为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然他们以枪炮来对待我们，我们也要使他们永远不能够安宁。在现在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起来了。昨天晚上正当许多寡妇哭他们被害的丈夫，许多小孩哭他们被害的父亲时，富人们正在他们的高楼大厦里举酒狂欢，庆祝胜利呢！妇人们，孩子们，擦干你们的眼泪；奴隶们，起来罢！暴动呀，革命呀！

听了这血泪中迸出来的呼声，谁又能不被感动呢？

五月四日，一万五千工人群集于草市场，但他们是动和平的，并未带武器到会。这日的演说坛是用一辆汽车来代替的。支加哥演说者均相继站在车上演说。尤以柏尔孙司、司柏司

诸人的演说最为动人。

这个会议是很有秩序的，支加哥市长哈利生亦曾到场。后来到会的人众渐渐的散去了。斐尔登已决定在数分钟后便宣告闭会。忽然警察长领了一百八十名带着手枪的警察跑进了会场，立刻下令解散这会议。他向斐尔登说："奉伊利诺瓦州政府命令来解散你们。"斐尔登回答说："我们这次会议是极和平的。"

警察长不再说话，便转过身来下令开枪了。在这个时候，突然从旁边巷子里掷了一个炸弹过来，落在警察队里，炸死警察一人，伤七人。警察队于是胡乱开枪，在混乱中没有标准，大半把他们自己伤了。结果警察死七人，伤六十余人；工人方面亦死四人，伤五十余人。

于是政府借口于工人施放炸弹击毙军警，大拘捕革命党人。草市场会议中的演说者司柏司、斐尔登、尼伯、失瓦伯、林格、斐失尔、恩格尔都被逮捕了。《警钟报》编辑部、营业部、印刷部的重要职员也都被拘去。柏尔孙司因事离开了支加哥，故未被捕。然而当审讯的时候，他却来自首了。他明知资本家要喝他的血，食他的肉，但他并不怕。他说："当我听见了这个审判的消息，我就立刻跑到这城里。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悔恨。我并不求你们的恩典，我只求正义，我只希望能够快快的和同志们在一块儿就死。"

劳动运动的主要人物都被捕入狱了，他们的住宅也被搜查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报纸也都被封禁了。此时警察的权力是万能的。资本主义也狂吠着要来喝社会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的血。

最卑劣的审讯开始了。司柏司等人被法庭认为犯着杀害警察的罪。这次审讯全是法官受贿的结果。陪审员名册中虽有千余人，然而只有五六个是属于劳工阶级的。那个手定陪审员名单的特别捕役曾公开的说："这些人应该绞死。"因此他只召集那些反对被告的人来作陪审员。那三百个领袖资本家所组织的支加哥市民协会便募集十万元公债来报酬法庭，对于警厅更允许在审判后每年以十万元报酬，计十年间，他们实际担任四十八万五千元。所以后来有一天某侦探自己查出了犯人的潜伏所，警察反设法令这个犯人逃亡，这是侦探自己向人说出的。

在审讯中政府律师居然说出一句"无政府在审讯中"，此辈法官的顽妄，于此可见。法律本是设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何况此时法官又受了贿赂。于是一种残酷无人道的判词通过了：除尼伯一人判为十五年的苦役而外，其余的人都被判处死刑。

判决既定，请求再审的事又失败了。现在只有要求减刑之法。于是一般稍有良心的人便请求法庭减轻先驱者的刑罚。结果斐尔登与失瓦伯改判为终身监禁。据说要是柏尔孙司在一个请减刑的状上签名，便可以把他的死刑改为徒刑。但他拒绝了，他说他是无罪的，他要自由，没有自由便要求死。

在法庭中每一个殉道者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教训。司柏司是第一个演说者，他的演说是极其光荣，极其动人的。

他说："我在这法庭中演说，如像一阶级的代表向另一阶

级的代表发言。我现在用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于同样的情形中向法庭演说的话，来作我这篇演说的开始。发利里是这样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于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便是你们的历史！’我被你们控告为犯着谋杀的罪，是一个共同犯或一个随从犯。你们根据这控告便要来判我的罪。省政府并不能指出证据来证明我曾知道那个抛炸弹的人，或者我与抛炸弹那件事有何种关系。……假若没有证据来明示我对于此事应负法律上的责任，那么，我的判罪与刑罚的执行，不过是故意的，仔细思量出来的谋杀。这种不公正的谋杀在宗教史、政治史以及任何种关于迫害的记载上常常可以寻得着的。”他又说：“格林奈儿君说：‘无政府在审讯中’，假若这是实情，先生，好得很，你可以判我的罪罢，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相信在有阶级的国家内——一阶级支配着并且依赖着另一阶级的劳力而生活的国家内，社会组织的这种野蛮形式是已交了死运了。让一个自由社会，自动结合或博爱的团结来代替它。可敬的法官，你可以处我以任何刑罚，然而却要让全世界知道一八八六年在伊利诺瓦州有八个人被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于较好的将来，因为他们并没有失掉对于自由与正义的最后的信仰。”

他最后的话是——“这些就是我的理想，它就组织成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不能脱离他们，就是能够，我也不愿。假若你以为你能够破灭这些分布日广的观念，假若你以为你能把我们送到断头台来破灭这些观念，假若你愿意使平民受死刑，因为他们敢于宣传真理，假若死是对于宣传真理的刑罚，那么，

我愿骄傲的来付这高贵的代价。叫你们的刽子手来罢！……”

失瓦伯继司柏司之后而演说于法庭。他的演说中有一节最沉痛的话是："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天天在各处杀人么？儿童们还未到作工的年龄，便被迫着去作工，夭折了多少生灵；妇女们因操劳过度而死者成千成万；男子们死于苦工者日有所闻。我却从未见着法律来阻止这些不人道的事。就以支加哥一地来说，数万工人拥挤于不能容膝的小屋内，既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日光，两三个小孩子同着他们的父母吃那极坏的饮食，瘟疫到处流行，男女小孩得病死者不计其数。然而富人们却住在高楼大厦；吃着丰美的饮食；穿着华丽的衣服。这样看来，所谓文明社会岂不是最可怕的么？”

他主张"革去这一切不人道的弊端，铲除这一般吸吮工人血液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财产尽归平民掌握。每人每日只须作工四小时，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着充分的安慰。其余的时间便用来探讨科学，研究艺术"。

尼伯的判罪很奇怪，便是政府律师也找不出反对他的证据。他是支加哥劳动运动的先驱者，但草市场的事，他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他宁愿死，不愿被囚，因为他以为"突然而死比较一寸一寸的被杀而死更要光荣些"。他说："我有一个妻子与几个小孩；假若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死了，他们要来埋葬他的。他们能够到他的坟墓那里去，跪倒在坟边；然而他们却不能到监狱里来看他们的父亲，——那个无罪而被处刑的父亲。我所要说的话已尽于此！先生，我很以不能与其他的同伴一同被绞杀为憾！”

斐失尔的演说："我并不说许多话，我只要说我反对我被处死刑，因为我并未犯过罪。我在这里因谋杀罪受审，因信无政府而受审。我抗议我被处死刑，因为我未曾犯谋杀罪。但若是我被处死刑，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爱自由平等的缘故，那么，我就并不抗议。假若死是我们爱自由爱人类的刑罚，那我便公开的说我已供献了我的生命了。……这是我一生最痛快的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我正要高声叫你们：绞死我罢！"

林格的演说是当时最感动人的一篇。他公然承认他对于暴行的信仰。他说："我明白的告诉你，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前已向夏克大佐说过：'假若他们用大炮来对付我们，我们也要以炸弹来对付他们'。我现在重复的说：我是今日之'秩序'的敌人。我更尽力的重复说着：只要我能呼吸一日，我便仍要来攻击这'秩序'。我再诚恳的，坦白的宣言：我是赞成用武力的。我更向夏克大佐说：'假若你用大炮来打我们，我们也要用炸弹来炸杀你。'你们在笑。或者你们会想：'你不会再掷炸弹了。'但是让我来使你们确信，我将快乐的死在绞刑架上。我相信那些曾听过我的演说的千万的人会记着我的话。他们会来掷炸弹！我怀着这个希望，我向你们说：我轻视你们。我轻视你们的秩序，你们的法律，你们用武力支持着的权力。"

恩格尔的演说也是很长的，我们只引一节在此。他说："你们说我是凶手，我有什么罪呢？我们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在这社会中绝对不会有一部分人坐拥百万的财产，一部分人却饥饿得要死的事。……我蔑视政府，我蔑视审判官，我

更看不起警察与侦探，……关于我的判决，我所要说的话，是我一点也不惊骇；因为那些努力求同胞进步的人，常常被投入监狱，或被处死刑：自古已如是！”

斐尔登在演说的开始，背诵了一首有名的诗歌，就是佛利格拉斯的《革命颂》。他的演说中有一节很动人的，我们特别引在下面：

> 汤姆生·古贝在老年的时候，有一次为他的友人所拜访。一个小女郎，手中拿着一本有图画的书，跑到他的面前，翻开书的前面，指着空白页说：“古贝，给我写点东西在这上面罢。”古贝便写着：
>
> 爱真理罢，我的孩子，爱真理罢，
> 拥护真理使你光明，
> 他将要使你青春之晨欢欣，
> 虽然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奋争，
> 但他将永远使你保存着正义和真诚。
>
> 假若我被判罪，因宣传真理而受绞刑，那个在“西边街”今天跪在他的母亲旁边的小孩子会告诉他的母亲说，他想他的爹爹回来。对于他，当他能鼓动如簧之舌的时候，我要把这美丽的感情教给他；那个小孩子最好不必教他读书，最好不要把这爱护真理的感情教他。假若他们因敢于宣传他们所认为真理而受死刑，那么，最好把你们的学校铲成平地，不要留一块石子在地面上。

他结论说：“我爱我的同胞与爱我自身一样。我恨虚妄，

我恨罪恶……假若我的死刑能够有点好处，我愿自由的牺牲了我的生命。我相信那个时代会来的，那时将有较好的理解与智慧存在，在那不平、罪恶与行贿的山上，我希望真理、正义、公道的太阳来以他的光明，洗浴出一个解放的世界来！”

柏尔孙司在法庭中足足演说了八小时。他将他一生所从事的无政府主义与劳工宣传运动完全重说出来。他说假若他希望那结党营私的残酷的审判官心中还有一点正义的感情，他便错了。他的演说以一首著名的劳动歌开始。其最后三节是非常著名的。

柏尔孙司说：“无政府是什么？——我因为他而被处死刑。政府是专制；政府是一个压制的组织，法律便是它的代理人，无政府是反对政府，反对治人者、反对独裁者、反对政党，无政府是否认武力，是要废除社会事务中的一切强权；它否认人管治人的权利。……在现在全世界中的劳动运动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要废除政府与强权；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政府管治一切。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以法律的力量来解放工钱劳动者，要以合法的法令来解放他们。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求选择治理他们的人的权利。无政府主义者不要任何种类的治人者，也不要任何种类的制造法律者。……我们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产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都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

判决定了。到了次年（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日，林格在狱中自杀；次日便是司柏司等四人受绞刑的日子。十日晚间

他们对守牢的军警演说，使他们明瞭革命的真义。柏尔孙司大呼："将来就在这个地方必有替我们报仇者！"

十一日十一点半钟的时候，执刑官到狱里来了。诸同志互相作最后一次的握手。司柏司临死时高叫："我们的沉寂比我们今天被你绞杀的声音更有力量的时候快要到了！"

恩格尔继司柏司之后高叫："无政府万岁！"

斐失尔在绞刑架上，高呼："无政府万岁！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

柏尔孙司慢慢的发出清晰的声音："美国的人们让我来说话。执刑官马司东，你许我说话么？让民众的呼声被听得见。"

支加哥工人望着先驱者受死刑，无法援救。在他们尸体下葬的时候，送葬的有十五万工人，在他们的坟上立了一个很大的纪念碑。

过了六年，新任省长阿尔基尔特自动的检查这个案件，发觉了真相，宣告被害的八个人无罪。然而司柏司等五人已死了，只有把尼伯、失瓦伯、斐尔登三人无条件的释放出来。阿氏并发出他的理由书洗去那些殉道者的罪名。然而那些人道之战士已荷充满天地之荣光永久逝去了。

从此支加哥警察和法官的受贿，以及那个不名誉的法官加利的罪恶显露于世界了。

六　法兰西的惨剧

法国的五一节也是经过鲜血的洗礼的。继支加哥悲剧而

起的惨剧，要算一八八九年的法兰西惨剧最惊心动目的了。

在富尔梅(Formies)——自这年四月下旬，织物工人便起了同盟罢工的风潮，为的是要求增加工资未遂。延至五一节还没有平息，罢工工人决定在五一游行。

五月一日到了。原来那一天本是法兰西的一个节日。往常到了那一天，法国的士女都要出游郊野，摘取野花，随着那个被选为五一姬的少女跳舞。所以这一天富尔梅地方的青年男女也成群结队，出游郊外。当他们以鲜花装饰身上笑语而归的时候，忽然街上布满了杀气。因为政府正藉保护工人之名派遣军警来镇压罢工潮，于是起了冲突，结果工人方面被捕去数人。

这种卑劣的暴行激起了这些由郊外归来的青年的愤怒。他们便高唱："他所欲得而甘心的是我们的同胞呵。"站在前面的引导者是一个名叫齐洛特的十九岁的青年和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十八岁的少女。女的手执白色花枝，男的拿着三色旗。群众并无武器，不过空声骚动罢了。"他所欲得而甘心的是我们的同胞呵"这呼声响遍了各处。

然而军警屡次用枪刀来袭击群众，最后指挥官竟发出开枪的命令，于是残酷的屠杀开始了。负伤者二十四人，死者十人。玛丽亚与齐洛特，一个血染三色旗，一个血染红了白花枝，都作了这次血祭的牺牲了。其余被流弹打死的无辜的人更不知有多少。

便是军警也觉得这太残酷了。有一个哭着大叫："我不能开枪。……我的母亲在那里呵！"军警的枪大半都是向空射

击的。

这次死者十人中除玛丽亚、齐洛特外还有狄欧(十九岁的少女)、雨陪(二十岁的少女)、斐娜丽(十七岁的少女)、柯尔奈依(十一岁的小孩)等八人。

在克利西 (Clichy)——同日发生了政府压制民众运动的惨剧。在那里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高呼着“无政府万岁”在街中游行。警察夺去了他们的旗帜，便起了冲突。游行的群众后来进了一所酒店，高唱工人解放歌。警察署长恼羞成怒，令向酒店进攻，工人方面不得不出以防卫。结果，警察方面伤了六人，只得暂行退却。

于是又作第二次进攻。这次警察得了胜利，把酒店占领了。并捕去德康、达尔德尔、鲁福依三人。三十个官僚对于这三个无政府主义者施以种种私刑，践踏拷打，无所不至。

这三个人的审判在四个月后才开始。最初检察官要求判决死刑。德康听见了便大呼：“你要我的头颅。拿去罢。我把它给与你。我自问对于良心是无愧的。我们的信仰是：‘废灭神，废灭主人，万人都得着自由的幸福’。”

因为陪审官较为公平。所以只判了德康监禁五年，达尔德尔监禁三年，鲁福依无罪释放。

一九一九年在巴黎也发生过惨剧。那天巴黎工人举行大示威运动，参加者以青年为最多。午后游行的群众和警察起了冲突，军警遮断了群众前进的道路，然而群众仍勇猛的前进；消防队便用水龙向群众乱击，群众仍不退却，警察又用棍棒乱打。群众齐声大呼：“推倒政府。”到了晚间，情形更加险

恶，骑兵又和群众冲突，实行巷战，死一十八岁的少年，警察负伤者四百二十三人，群众中负伤者也很多。这一天巴黎全市罢工。

七　结　语

话也说得多了，就此收场罢。我本来还想把各国五一运动的详情说一下，但是因为篇幅和时间的关系，使我不能再写下去。其实各国五一运动的状况，除了激烈二字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我们知道五一运动确实是民众自己的运动，它起源于民众中间，并由民众势力的集中而发达的。五一的起源虽由于八小时制的要求，然而经过了几次先驱者的热血的洗礼后，它已不是狭义的缩减工时的运动而是工人阶级解放的运动、推倒资本家实行社会革命的运动了。

八小时制本来是不彻底的。一般人所极赞美的"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不过是笑话罢了。他们完全忘却了一个人至少应该睡眠八小时！难道一个人除睡眠外，便不应该休息么？何况每日三餐还要费去许多时间！所以作工时间是应该不到八小时的。并且现社会的情形是这样的：一部分的人作工，一部分的人浪费时间。假若叫那一部分专门浪费的人也来作工，那么每人每日只要作四小时的工便够了。所以支加哥的先驱者失瓦伯在法庭上便说："每人每日只须作工四小时，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着充分的安慰。"工人应要

求的是四小时工作制，而不是八小时制。

四小时制怎样才能实现呢？失瓦伯告诉我们说："革去一切不人道的弊端，铲除这一般吸吮工人血液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财富尽归平民掌握。"殉道者司柏司说："让一个自由社会自动结合或博爱的团结，来代替社会组织的野蛮的形式——国家。"

所以五一运动的口号，不是"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而是：

"废灭神，

废灭主人；

万人的自由！"

杂　感*

太一同志在《无政府党的精神》一文里说无政府党和恐怖党一样，……他的意思以为无论用何种手段，如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都可以使得。……因为欲实现人类的最大幸福，非由暗杀或爆裂弹不成功。这种思想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一种目的并非任何手段所能达到的。……

暗杀和爆裂弹在革命运动中是不可免的，但社会革命并非能由单纯的暗杀行为所能成功的。暗杀也许胜于书报的传播，但暗杀之后必加以书报的说明。暗杀是个人行动，并非主义的运动，因为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现社会的罪恶叫他们去做的。

苦力同志说："一切集权的暗杀行为，完全违反无政府主义，因我们不信，可用政党的纪律去强迫同志牺牲生命。"这是不错的，集权的暗杀行为，便会产生俄国的那种"职业的革命者"来。

太一同志又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有特权者为义务"，这我以为也是错的。我从前在《无政府主义与暴行》中曾说过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民钟》第一卷第十五期。署名芾甘。

样错误的话："刺杀了一两个食人者总可减少贫民的痛苦。"后来和苦力同志讨论了一两次，我才发现我的错误。并不是人生来便是坏的，而是现社会的制度使他们变坏的。假若现在社会制度一天不推翻，那我们一面在杀坏人，它便一面在造坏人；那么我们虽以杀坏人为义务，一生也杀不尽的。

杀坏人的行为并非谋杀。莫斯特曾说："谋杀是杀一个人的意思，但我从未听见说警察是一个人。"

法国无政府党人朋诺杀了侦探和警察后，被捕处刑死了。他的遗嘱上写着："我是一个光荣的人，……难道我会悔恨我所做过的事么？也许我要悔恨；然而我必要过我的生活。……我与那些掠夺贫人的比起来，我并没有多大的罪。"

关于林肯被杀事件，知道详情的人很少。这"刺客"名叫布斯。他刺杀了林肯数日后，曾发出一篇宣言："我被人迫着像一只狗一样，跑过了树林和湿地；昨夜我又被炮艇追着了，便不得不逃回来；又湿，又冷，又饿，所有的人都不援助我，我在这里完全失望了。为什么呢？布鲁达斯刺杀凯撒，做了便受人尊敬，威廉退尔做了便成为一个英雄；而我，我刺杀了一个最大的暴君，现在却被视为一个平常的凶手了。这是甚么缘故呢？"这大约是由于一般人平常对于林肯表示尊敬，假若布斯不发出宣言，难道我们知道他的行为的意义么？这也是暗杀后需要书报说明的明证。

讨论如何进行的两封信附记*

这是格拉佛、君毅两同志给我的信，这虽是私人间的信件，但所讨论的全是关于主义进行的事。故依君毅的意思发表于此。关于组织的事必要与否，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全国同志都赞成组织，并且我们的全国大联盟也快要组织好了。

克氏的欧战论和马拉特斯达等的反对论（记得《民声》中曾载过几篇）我都看过。但我是反对克氏那种主张的。现在我们也不必举出甚么理由（自然马拉特斯达他们有理由的），必要时看看欧战的结果便知道了。"强盗似的德国"、"蹂躏文明"的德国固然打倒了，但欧洲的情形便因此好了一点么？实际上其他政府并不比德国政府好些，都是几个同样凶狠的虎。两虎相斗的时候，你帮助一只老虎把其他的打虎打败了，弄得精疲力倦，于是那只老虎便很容易的把你吃了。所以克氏所说的"两虎相斗，应先击最残忍者而毙之"的话，是不对的。至于兵士的凶横残暴，各国都是一样，德国兵士并不见得要特别利害些。这也不足为主战的理由。

芾　甘 附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民钟》第十五期。这里说的"两封信"，前者为"格拉佛与君毅写给芾甘的两封信"，后者为"关于克氏全集的两封信"。

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性*

一

谁都知道鸵鸟的方法(危险来时便将头藏起)是无补于困苦的。一切苦痛的然而却知道得很清楚的真实性，较之自欺还是要值得赞美的。我们现在要来考察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在现代的重大意义，便不得不特别注意这些久已知道的事实。假若我们要夸大的宣传，说出各国的联盟、联合，大团体、小团体来(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我们自然可以使人惊异的。在北美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欧洲各处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和联盟更以数百计。中国、日本、埃及、澳洲都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实在，哪一处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呢？现在世界中有一万或十万人自愿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虽有这许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实际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现象却不能满人意。我们因为怕敌人快意和讥笑的缘故，常常把这苦痛的事实隐藏起来，然而这举动反阻碍我们的认识力，并且表示出我们的无力，我们的错误，反而使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民钟》第一卷第十六期。署名芾甘。

那些我们所欲隐瞒的敌人快意。我们现在要来观察危机；我们的自述也许会被敌人利用，我们这一次却是他们对于别人失败而快乐的最后了。我们要防止我们这运动的退化，因此敲着警钟，要那些把我们运动的创伤视作个人自己的创伤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来静听！

固然在全世界中有千万个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们并没有联合成一个整体，并不曾走上同一的道路。他们所相同的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名称而已。除了那些终日与资本家企业主斗争的工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劳动团体的活动份子)而外，我们到处所见着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尼采的信徒、新虚无主义者，以及许多带有托尔斯太派或佛教或玄妙精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根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加入工团活动。还有一些终日在咖啡店或茶馆中销磨时间的人以及一些小资本家，他们自己也浪费别人的劳力的结果，也雇用别人的劳动力，然而他们却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人挂起无政府主义者的招牌而不做实际运动的。到现在这许多人还以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名称，把这许多抱着相反的意见的人团结在一起。自然，无政府主义，那是劳动群众的革命理想，那是以暴力推翻现在"秩序"而建设无压迫的劳动社会的解释；这种现在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革命的观念居然被人误解了，这是无足怪的。

约在四十年前克鲁泡特金便讥笑过那些自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其实他们的全生活完全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而他们居然自谓"在理论上"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要

是资产阶级都倾向于社会主义了，那么，至今为什么平等、自由、博爱还不能实现呢？（《大家都是社会党！》《一个革命者之话》中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到了现在，各种不同的份子又“在理论上”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了。大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各个人以为无政府主义是他个人所喜欢的那样的，譬如在十个人中间，每个人的主张都是不同的。唯心论者要和唯物论者称同志了，甚至资产阶级也和无产阶级称同志了；重视个人享乐的人也和在工厂作苦工的工人称同志了。这样一来，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便失去了。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看成无上的“救世仙方”，说它可以消灭全世界各阶级所感受的痛苦，可以救济各阶级。所以他们便说无政府主义是全人类的理想，建立在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于是他们自己也戴上博爱的面具，觉得自己是立在群众上面的超人，还有一些人他们完全忘却了无政府主义是从劳动阶级中生出来的，甚至把这种说法视作违背主义，所以他们反对阶级斗争。他们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派的主张，其实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派所主张的大异。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是直接的，并非为着政治的目的，所以排斥一切专政，便是马克思派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我们极端否认的。我们所注重的是经济的目的，即是用武力把现在社会的财富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回来，归还于社会，由生产者（工人）自己组织去接收。至于国家咧，政府咧，都是应该消灭的。

阶级斗争实在是无政府主义的特性，只有由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二

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史只能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时代算起。在十九世纪上期只有几个著作家有这种思想，然而这些人并不曾想到叫做"无政府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便是那个乡下人蒲鲁东，他是排字工人。他对于法国工人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曾予以绝大促进力。他也知道阶级斗争的重要。他曾说过："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战争是世界史的全部。"然而蒲氏的主张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所以他竟想在资产阶级中找寻他的信徒，这是一个缺点。第一国际的拉丁诸邦的工人大都是信奉蒲氏的教义的，他们喜欢自称为"互依主义者"(Mutualist)。他们相信蒲氏所主张的国民银行，并且和平的由资本制度进化到无政府。

后来在七十年代初期，巴枯宁和意大利、法兰西以及其他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中完成了无强权的劳动社会的理想，这种社会只能由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战争达到的。第一国际承认工人与资产阶级间并无共同利害，所以宣言"工人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资产阶级对于公社人员的一星期间残酷的大复仇，便指示出来在现社会中两个对抗的阶级中间，永远横着一条大沟，永无合作之可能。特别在"巴黎公社"被压服后，无政府主义者便尽力从事于工人阶级之组织，预备来举起反叛之旗，实行革命，来报这一次的大仇。

三

还没有人明白的宣言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阶级斗争上面的。在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创造者，第一国际的工人看来，无政府主义自然是工人阶级的理想，被掠夺阶级的理想，一直到支加哥的殉道者柏尔孙司、司柏司、恩格尔、斐失儿诸人上了绞刑台时还是这样。这可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起源及发展都是从工人阶级中生出来的，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一样。事实是这样：工人阶级用武力对付资产阶级的战争不到全胜不止，只有由这剧烈的战争才能使工人阶级从权力与资本的铁链中解放出来。当革命运动衰落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再造的国际便发达起来了，另一方面有一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倾向于都加（Tucker）、墨儿（Mackay）及司丁纳①一方面的"，组成了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完全注重在"我"（司丁纳的《自我及其所有》的第二部的名称便是《我》），忽略了群众，尤其忽略了劳动群众。不仅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并且还有许多自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信徒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在宣传满足各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他们也说到工人，说到群众及其自身行动，说到革命。但他们并不是说现在的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些人事实上是为较好的将来奋斗

① 司丁纳穷困以终，当时知道他的人甚少；后来德国诗人墨儿穷毕生之力，著成《司丁纳之生涯及其著作》一书，司丁纳的主张才为世人所知。

的),那些反对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为革命的到来好像是全人类互相宽恕的日子。他们虽说"革命",但他们所想象的却是:当民众起来把现政府和平的推倒以后,那些掠夺者和压迫者便会自愿的加入胜利的革命党中,——工人与农民也会和他们的敌人和平的握手。人类互相亲爱的日子来了,狼与绵羊会和平的在一块游玩。这样便会走到无政府共产的路上。——果然吗?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被压服,芬兰、莱多维亚、匈牙利国资产阶级的复仇,波兰、保加利亚的白色恐怖,意大利法西士特之横暴,智利政府屠杀工人,欧美各国反动势力的伸张以及苏俄"新资产阶级"(?)的赤色恐怖——这些足以证明出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鸿沟是永无法填塞的。狼与绵羊是不能在一块儿的。

巴枯宁在批评马克思派党纲时曾说过:"这党纲中的主张,最为我们无政府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的人)所引为痛心疾首的,便是他们把无产阶级的工人作为阶级看待,而不认为是一般民众。"我们不要忘记巴枯宁在十九世纪中叶便说过这样的话。他要把劳动阶级看作"民众"和"人类"。他在《与法国人的信》内曾鼓动工人去拘囚一切扶助旧制度的人,他把工人的利益和工人的胜利看作最重要的事。

克鲁泡特金也不是立在超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他一生都是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的。我们若读他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论文集《面包与自由》和他编辑的俄国无政府共产党人的议决案,便可知道他是赞成阶级斗争的,便在《现代科学与无政府

主义》一书内，我们也可看出这种主张。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友人都赞成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解放只有靠不宽恕的阶级斗争来完成。他们以为劳动阶级必需基础在日常生活的利益上面组织起来。武力的革命是不可免的；从旧的到新的中间是有一种过渡期的；那时对于那些拥护旧"秩序"的个人团体或阶级，不免要加以狂暴的攻击。至于有几个富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宣传的非武力的和平的革命，并且等着群众的自动，不去从事于革命前的组织，以为有一天资产阶级会痛悔前非，舍弃了以前的地位，来投身于民众的旗帜之下，无政府的社会便和平的实现了。那些终日坐在咖啡店或茶馆销磨时间的，以及过资产阶级生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大概如是。

四

我们应该起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了。无政府主义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理想和观念学，它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并非和平的，而是武力的。只有不屈不挠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然而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也不是不容许资产阶级中的"觉悟者"参加的。"无论何人，如生长教育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而真欲抛弃原有地位而为工人的友伴，则必须与原来的生活及一切资产阶级的习惯、感觉、思想完全脱离关系，并且还应认他们为仇敌，而与之宣战。"（巴枯宁语）假若他们仍然多少与

他们有点关系，则是工人的仇敌，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仇敌。

本来打算把 Hlcbopjok 在《自由工人》第二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译出，但是译到中间，竟加了不少的话进去，简直不像原文了。近来我译短篇东西，常常爱就自己的意思加以删改，虽然有时曾声明过，但究竟算是不忠实，对不起原作者，所以这篇率性连"译"字也不要了。

一九二七年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实际问题，我虽然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也不能否认这事实，不过我可以说仅有一小部分的同志是如此，并不能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有一些批评时事的文章，其内容只就一个原理演绎出一切，而不顾到事实。但陷于这种错误的，并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全体，而是少数的同志。我觉得对于那种意见我们仍有纠正之必要。

有一些同志往往只拿着一个原理，奉为天经地义，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于奉直的战争，以及国民党与北洋军阀的战争都以相同的话来批评；说我们是为着全人类谋幸福，于是反对阶级斗争，在谋全人类幸福的社会未能实现以前，对于其他的暴动以及没有带着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民众运动，都不去参加；说要谋民众的解放，而自己不与民众接近，对于民众的疾苦和要求不能知道，也不想去知道，仅仅把几个很好的名词写在纸上，而不想法去把它们给与民众……这种态度对于主义的进行并无利益。然而一

* 本篇原为《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中之第二节，署名芾甘。该书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由民钟社出版，惠林、芾甘、君毅著。

部分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并不如某一些人所想，是由少数聪明的个人在研究室创造出来的，它是平民的运动，最初发生于平民中间。起先只有微弱的趋势，后来逐渐明显，到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才把这种趋势弄成一种有系统的主义。所以有人说无政府主义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才成为一种理想的和实际的组织，这是不错的。克鲁泡特金之所以能完成无政府主义的系统，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卓越到某种程度，而是因为他是生在资本主义的崩坏和无产阶级活动的时代。克氏自己从不曾说无政府主义的某部分是他创造的。那么我们自然不能单把原理奉为神圣，而不顾实际问题了。

而且原理不是死板的，不是可以呆板地解释的，应该应用到实际问题上，由实际问题来证明它。假若原理不能解释实际问题时，我们也不妨修正它，因为我们并不是迷信的宗教徒。

我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原理有错误的地方，不过是说明一个原理不是垂诸百世放诸四海而准的东西。而且无政府主义是实际的民众运动的产物，所以特别不是可以离开实际的。实在说来，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超时代的空想，所以有系统的无政府主义不会出现于工业革命之前，而且无政府主义的发达也不会先于法兰西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很多说老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错误的。老庄的思想与近代无政府主义很少有相同的地方，而且在那样的时代决不会产生近代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来。

再说到原理的本身，我觉得许多的人对于原理多少也有点误解。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战争吧，但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只是军阀政客为争利夺权而起的战争，假若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战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战争，我们是主张的。为自卫而战，为自由而战，马拉铁斯达且认为这“战争是必要而神圣的”。甚而至于殖民地脱离“母国”的战争，弱小民族反抗强国的战争，虽然其目的与我们的理想不同，但我们也并不反对。说到为全人类谋幸福吧，有人便反对阶级斗争。《民声》第三十三期便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阶级斗争，而且还主张着。无政府主义乃是阶级斗争中被掠夺阶级（克鲁泡特金在《近代科学与无政府》里用“民众”这个名称）的理想和观念学。至于谋全人类的幸福的话，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类已不是整个的，早分成为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从来不是治人阶级的理想”（克鲁泡特金语），“无政府主义真正的创造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阿利兹语）。

所以就原理来说，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也是不合原理的。而他们竟从里面演绎出一切来，在不知道的人甚至误会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真相，致发出许多无谓的非难，于此我们不得不辩明。

既说过了原理与实际，现在再来说实际问题，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国革命问题。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朝夕所想念的，也就是怎样能使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唯物论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都是唯物论者），我

们知道社会革命之到来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好意所能决定的，而是社会进化趋势所必至，只能由历史的需要来决定的。个人的努力在物质条件的可能范围内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然而不是社会进化的唯一要素。我与惠林同志的意见不同，我是一个定命论者，而且定命论(Determinism)与宿命论(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认人类意志的表现，且承认人类不是被动的物质，不过他也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努力也要受环境的限制。惠林所说的并不是定命论。

革命与进化并不相冲突的，邵可侣说："进化与革命是同一现象的连续的行动：进化先于革命，而后演进到革命。"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就可实现的，乃是由不断的革命与建设积累起来，然后可以成功的。阿利兹说得好："无政府主义实现并不是突然而生的，我们最初不能把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完全实现，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实现它。"这样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之下，我们要立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全部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理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并不错误，而且并不是空想，不过它的实现是要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就是说它的实现不是像奇迹一样的突然降临，而是逐渐来的。我们每次的努力可以使它的到来快一点，但是也有限度。这纵然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但事实确是如此。譬如中国一旦起了社会革命，我们要使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完全实现，在生产事业完全不发达、日用品都要靠外国供给，甚至粮食多少还仰给于外国这样的情形之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理能够施诸实行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便不得不退让一步，多

少迁就一点。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失败，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所以我们在革命未发生时即要先有预备，同时以合作主义的方法使工人自已来发展生产事业。革命发生后，也只能引社会向着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走去，不是一步便可走到的。

这是假定中国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后的情形，而实在我们也不能断定这在最短期间是可能的事。一则中国物质的条件尚未完成，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民众的隔离还远得很。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只拿几个原理向民众宣传，而不问他们的宣传能否达到民众中间，而且不问民众的要求。譬如从事于工人运动而不明白工人切身的需要，叫他们饿起肚子来革命，是做不到的。自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刻发生社会革命，便不去做预备的功夫，我们要使它的发生快一点才对。

中国现在已进入了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现在的革命运动已不是国民党的运动，而是民众的革命运动了。许多万的工人罢了工，许多的青年跑到战场去作战，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的革命者带有献身的精神去受死刑，去进监狱，要说他们完全是盲目的受着少数人的指挥，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要说他们是新的军阀的走狗，要说他们是纯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要说他们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国民军的北伐是一回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一回事。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

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现在能给一个更好的东西与民众自然更好，否则，袖手旁观的空言反对，在资产阶级的学者可以做到，但在一个革命家，这便是一个罪恶。“不完全，则宁无”，个人主义者可以这样想，然而一个为民众福利而奋斗的革命家至少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民众的要求不会如此。难道在你不能带来完全的（？）幸福与民众时，你便连民众从别方面得来一点些微的幸福也不要他们享受吗？何况这次革命运动不是一党派包办的，倘没有民众参加，没有民众的后盾，北洋军阀孙传芳等会得那样的失败么？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自己的错误。若因此就站在旁边痛骂这次运动，说只是政治的斗争，只是军阀的战争，说国民党和张作霖等是一丘之貉，那么，国家主义者和研究系等定在旁边大声称谢哩！

我们要知道，参加这次运动的并不是纯正的国民党人，譬如一个罢工的工人，你能说他的意见会与蒋介石一样么？他完全懂得三民主义么？他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么？参加战争的学生，你能说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总司令蒋介石一样么？假若你注意到实际问题，你将知道事实决不是如此的简单。十一年前的《民声》第二十八号上恰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习闻劳动家及小本营商者平日恒痛心切齿于袁政府者，谓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苟叩以政府之恶迹何在，则曰增多恶税也，剥夺平民生计也，军队骚扰闾阎也，而一般伟人政客所揭示之大题目如谋叛民国，解散国会，总统专制，混乱宪法等等皆不与焉。”假若你说那些“劳动家和小本营商者”是和“一般伟人政客”一

样想法，要夺取政权，要升官发财，要建立一个好的共和国家，有谁肯相信呢？同样，你若向罢工的工人说蒋介石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丘之貉，他们也不懂的。他们的要求是与他们切身的利益有关的，他们并管不到政治，蒋介石究竟怎么样，国民党究竟怎么样，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只晓得几个口号，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工会"咧！他们知道北洋军阀封禁工会，压服工潮，帮助资本家，视工人如眼中钉，所以他们对之异常痛恨，他们要打倒它。他们这种举动，我们不能反对，因为这是关系于他们切身的利益的。总之，我们固然要记着原理，但同时不要忽略了实际问题。马拉铁斯达曾说过，无政府主义者从事工人运动时，有时为着工人的利益也要一点妥协，而一般从事于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曾鼓吹工人即刻去实现无政府主义，而且对于增加工资缩短时间的罢工运动也常赞助，并没有人因此种运动不彻底而加以攻击的。（增加工资缩减工时的罢工，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彻底，说工资虽增加而资本家同时提高物价，其结果与从前仍是差不多。其实问题不仅在这一点。每一次罢工胜利后，纵然实际上得不到多大的利益，而工人的组织便会更坚固一点，而他们对于革命的希望也更多一点。我们知道要有希望才容易起革命，因为每次罢工的胜利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不是不能抵抗资本家。这样的希望心一次一次的增加，到了一个时间他们便要起来革命了。那时工团的组织经过多次战斗后，也能成为极强固严密的团体，足以适合革命的需要了。）

所以对于这次中国的革命的漩涡，我们应该投身进去，不

仅空言反对是不对的，便是袖手旁观也不该，假若我们自认是革命家的话。

号称"暴动的天才"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他的一生参加了许多次的暴动，这些暴动并不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然而他总是热心去参加；他不因为它不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便加以攻击，他要跑到它(暴动)的里面去，想法使它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看一八七一年里昂的暴动便知道了。我们假若要做革命家，那么我们也应像巴枯宁那样投身入一切革命的漩涡里，把革命的潮流引向无政府主义之海里流去(不管流到多远)。如果你以为这潮流流不到多远，便想修造一座堤来防止潮流，那么结果这潮流一定会冲破了堤甚至淹没了你，而无政府主义之大海里仍不曾加上一点一滴。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我认为是极其公正的。

就拿俄国革命来说罢，当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尽力于革命运动，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受着残酷的迫害。有许多人定会说无政府主义者上当了，其实，俄国革命之所以带得有社会革命的色彩，成为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民众革命，还是多少靠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力量。"工人管理工厂"、"农民管理土地"等口号，最初还是从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喊出来的，后来流行于工人与农民中间，最后布党也不得不承认这口号。假若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只袖手旁观，那么俄国革命也许要减色多了，然而对于他们，对于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处！

固然俄国的结果与当时革命者的希望大相悬殊，然而我

们不能说革命后的俄罗斯一定不及沙皇的俄罗斯，只有反革命党才可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假若曾研究过历史上的革命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一桩事，即每次革命的结果是和革命当时的希望相差得很远的。在革命时的思想总要进步一点，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向后走的时期。法国大革命时，热狂勇敢的民众拿起武器奋不顾身地向巴斯提堡垒进攻，无产阶级的妇女向着凡尔赛猛进，逮捕国王路易十六，各地的民众都拿着棍棒去破坏市政厅和监狱……结果怎样？你能说那些人的目的只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么？"自由、平等、博爱"，这是当时的口号，在拿破仑政府以至于在现在普恩开雷内阁政府之下，这三个字眼实现了多少？假若你看见监狱墙壁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几个大字，假若你知道现在法国还有不少的王党，你也许要骂法国革命不彻底，你甚至要骂它是多事。然而假若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不知还在怎样一个时代里呵！

再说到中国的革命上来。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反对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的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反对国民党所建立的政府，反对它的一切建设罢了。(我从前在《民众》第一期的封面上印了一个口号："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弱小民族自己努力"，一部分武昌同志及湖南同志都来函反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帝国主义不能消灭，打倒帝国主义是舍本逐末的事。又说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承认人类中有弱小民族的

存在。这和我的意见完全不同。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同样，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便永不该独立吗？）一般民众同情国民党的地方，只有几个口号，在别的地方也许他们的意见是与国民党冲突的。在现在，国民党差不多是领导着群众（？），要是我们也跑到民众中间，投身于革命的漩涡里，引民众向较大的目标走去，那么，民众自然会离开国民党，跟着我们来，使这次革命运动多带一点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使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民众的脑筋中留个很深的印象。如此逐渐的做去，虽然不能立刻实现无政府的社会，但至少民众得着向这方面走去（至少总比现在好）。然而，要是我们努力，或许种下一点好的种子，但若我们要筑堤防止这革命潮流，我们只有被淹没的。

现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已有多少比较国民党主张还要进步的地方，譬如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在上海时曾看见报上载武汉劳动阶级"横暴"的情形，通信者的意思是反对这现象，而我却觉得是很好的。我相信若我们参加入革命的漩涡，我们也可造几个新口号如"农民自治"、"农民管理土地"、"废除工头制"等……在战争的混乱时期，我们也可以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以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的事，不要与政府发生多大关系。工人方面的运动，我们应该以工人的资格去参加，斟酌他们的要求创出新的口号，如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生活的

保障、工人教育的开办，在现在中国都很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鼓吹工人有直接监督工厂一切设施的权利，废除工头制，工人与厂主间的交涉由工会担任。至于工厂收归工人所有，在必要时可以鼓吹，但在中国现在是做不到的；在刊物上我们可以这样鼓吹，但做事时用的口号须与民众多少接近。

至于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可就原理上批评他们的主张，但决不应该用漫骂的口气。对于敌人，我们也应尊重他们的人格。自然，对于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野蛮军阀又在例外。有些同志主张在某一个事业上不妨与国民党取联络的手段，如打倒军阀等，俄国同志马哈诺（即大杉荣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将军的）甚至想到中国来参加国民军去打张作霖，对这种主张我尚没有一定的意见，这是要在做事的时候才能决定的。不过有人主张加入国民党，这我并不赞成。

总之，我们若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漩涡里去，虽不能立刻使无政府的社会实现，但至少能使中国民众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接近一点，使这次运动多少带上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样比袖手旁观的在旁边攻击好得多了。

我因感觉得对于主义缺乏深的研究，所以跑到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来，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这样我自己在中国革命的时期中像个逃兵一样的跑了出来，看着别人在战场里苦斗，哪里还有说话的权利！而且这篇文章的性质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但自己却置身事外，在良心上说是不应该的。不过我相信这些话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虽不配来说话，希望同志们不以人废言好了。

反动的欧美*

欧美近来又沉沦在反动的时期中了。在反动的势力下只有金钱是万能，法律是万能，权力是万能。正义么？人道么？仅仅是梦幻罢了。世界的第一次大战终止才不过十年，那些帝国资本主义者们又在切齿咬牙地预备着第二次大战了，反动的爱国思想发达成熟到了快实行大屠杀的时期，革命的思想自然是走到那被压服的地步了。果然到处白色恐怖流行着，意大利么，在法西斯蒂的独裁下面，人们只有去做奴隶。在英国鲍尔温的保守党政府，反动势力到了极点，他连那苏俄也害怕得像看见猛虎一样，还说到其他激烈的革命党！在法国普恩开雷的政府之下，只有王党和腐败的社会党才有自由活动的可能，五一示威运动也被禁止了，近来还大演驱逐外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怪剧！西班牙、保加利亚、比利时等等无一不在反动的势力下面！在美国呵，那"大拉主义"的美国呵！萨珂与凡宰特以莫须有的罪名已在死囚牢中过了六年了，虽然全世界有许多人反对这谋杀，但今年七月十日的死刑是要执行的了，同时还有许多 I.W.W. 的工人同胞呻吟憔悴在监狱中。——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义么？人道么？全欧美已沉沦在黑暗的地狱中了。反动！反动！在这反动的时代中对于信仰真理、主张革命的人，杀戮囚辱便是最好的酬报。然而这其间却有许多不怕杀戮不畏强暴的人，他们拿着火炬要燃起全欧美的光明，打倒黑暗的反动。靠了他们，全欧美还有一线的曙光，绝望的深渊中还有一点希望！这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已开始了。这便是今日的欧美，这也就是今日之世界！我们且揭起这帘幕来看罢！

法律下的大谋杀*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萨珂与凡宰特本是两个旅美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波士顿警察署杀害革命党的暴行，于一九二〇年五月被捕。最初麻沙秋谢州政府决定驱逐他们出境，但后来忽然收买一般证人，说他们两个曾犯过强盗杀人的罪，于一九二一年由该州政府法庭判决了他们的"电椅死刑"。但因多数的人都反对此种不公正的谋杀，政府也不敢立即执行了。这样，在死囚牢中那两个无罪的革命党竟整整的等待了六年多了。死，今天——明天——后天——六年，这便是法律的公道！而且去年夏天，一个强盗犯马德诺司在法庭自认，政府疑惑萨珂与凡宰特所犯的罪名实是他一个人做的，与萨珂、凡宰特无关。许多人因此要求再审，然而竟遭裁判官赛叶的拒绝。而且在轰轰烈烈的反对声中，今年四月由最高法庭宣布了最后的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定——七月十日执行死刑。萨珂与凡宰特泰然自若的静听死的宣告，随即开始发表沉痛的演说表明他们的无罪和他们的信仰，这使得旁听席中许多人都哭起来了，那裁判官赛叶也觉得异常惭愧。在以前全世界的有良心的人都表示过他们的抗议。现在从奥兰多、瑞典、德国、瑞士、葡萄牙、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有抗议书致美国公使馆或麻沙秋谢州政府。柏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也有沉痛的宣言檄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国的学术界也有主持正义的宣言。人权协会等团体也尽力于援救运动。至于无政府主义者运动的激烈更不必说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的老将福尔旅行各城市举行游历演讲，每次的结果都是全体听众一致议决反对这法律的谋杀。法国较进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组织一萨珂与凡宰特委员会，发出签名单四十万份，每份可容一百七十五人，预备在六月十九日得到五百万人的签名，送到美国公使馆，表示法国的民意。在美国反抗运动的激烈，为援救他们而举行的短期罢工，到处都有。波士顿的萨珂凡宰特援救会已成立了几年，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书报，尽力于援救的运动。最近总同盟罢工的日期已经决定，即将举行。这是黑暗与光明、支配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府与我们争胜负的日期了，大家快前进呀！

凡宰特四月六日在死囚牢中发出下面的与"到自由之路"社的某同志："这早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一个囚犯和一个狱卒告诉我麻沙秋谢州最高法庭昨天已拒绝我们的要求——要把我们交给刽子手。我不曾听见说过，但我相信列席的法官都已签了名。这事件的重大罪名使他们不得不全体团结一

致；我已向汤姆生君及其他希望以为法官中自己会闹意见的人们说过这样的话了。”

“好罢，这对于我就是电椅和死刑。然而愿你们大家勇敢罢，不要为我而悲伤。祝你们大家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们也来叫一声“无政府万岁！萨珂与凡宰特万岁！”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加索快被释放*

去年西班牙王来巴黎的时候，法政府为着讨好于他，特别把留在法国境内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二百余人驱逐出境。其中有三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阿斯加索(Ascaso)、杜鲁底(Durutti)、何威尔(Jover)便突然被捕，其罪名是想谋杀西班牙王。然而实际上所能判决的罪名，只是私带武器，故结果判处了几个月的监禁，去年刑期已满，应该出狱了，但最初西班牙政府要求法政府引渡，经法政府拒绝了，后来阿根廷随后智利都来要求引渡，法政府已有允意，但事实上若他们被引渡到阿根廷，则必定有生命之危险。阿根廷政府的意思，想把近年来阿根廷的激烈的无政府党运动全归咎于阿斯加索三人，以为杀了他们则无政府主义运动或可消灭。于是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及一九二六年正月的电车站被劫及圣马丁银行被劫的事件为名，说他们是这两件事的主犯，坚持引渡。其实这与萨珂和凡宰特的事件一样，全是捏造出来的。这种法律下的谋杀，自然引起了无数的人的反对。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未署名。

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尽力来援救他们。另外法国较进步的各党派对此谋杀也极反对，人权协会亦主持公道。议会中的许多的议员对于引渡的举动表示异议，他们议定了关于引渡的法律，即引渡的办法，若法庭不表同意，则政府不得单独行动；若法庭判决引渡，则政府有拒绝或承认的权利。然而事实上非但法国政府愿意引渡，即法庭亦甚赞成，故结果法庭的判决仍逃不了"引渡"两个字。这很可以看出来法律之所谓公道了。诉诸法律既无效，仍只有诉于人民的实力了。阿斯加索等三人便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亡命者权利防护委员会"也举行过一次大的会议，到者三千多人推举律师与新闻记者的代表到国务总理处请愿。无政府主义的反抗运动更是激烈，这样法国政府也不敢毅然决然地把阿斯加索、杜鲁底、何威尔交给阿很廷的刽子手了。据最近的消息，阿斯加索等三人不久便可以被释放。

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组织问题*

关于组织的问题，我的意见与全中国同志的意见一样，即是无政府党是需要组织的，而且需要严密的组织。在从前同志中也许有主张不要组织的人，但在现在差不多没有人会有这样的主张了，故在从前中国无政府党大多数是知识阶级，在中国的进步较迟缓的国家，他们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在秘密进行的活动中，他们完全不明白组织问题，甚至有人说无政府就是无组织。但后来，一方面由于原理上的研究知道无政府主义所需求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一方面由于过去的经验证明无组织便不能发展。所以在现在中国同志中最迫切的问题便是组织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先觉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赞成组织。巴枯宁常常说到组织团体的必需。而且从俄国革命以及中欧革命的经验中，我们更知道无产阶级如无组织能力，管理工业、农业、分配、生产等则决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故我们如要谋群众的解放，则必须发展群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壬平。

的组织力。我们要进行革命工作，也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力。

印一种小册子，出版一种刊物，这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然而实际的革命工作，有方案有策略的社会革命，便不是靠着个人的力量所能奏效的，这非由有组织的群众来完成不可，而为之先驱的，便是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从前有些同志深恐严密的团体组织只能妨碍个人的发展，这种思想实是错误的，团体组织非但不能妨碍个人的发展，反能帮助他发展的。团体组织所得的功效，除了各个人活动的效果外，还有一种群体活动的效果，这是分立的个人的活动所不能有的。

组织固然必要，但无政府党的组织是和其他政党不同的，这不是集权的组织，这一点，中国同志也是很明白的。中国同志所企求的组织是以自由联合的原则为基础的。关于此组织法，同志抱朴曾参考一九一八年乌克兰无政府党大会的议决案、同年全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两次议决案，以及一九一九年全俄无政府大会的议决案等并参照中国的情形，写了一本《中国无政府团纲领草案》，最初陆续在《民钟》等杂志上发表，后来又印成一本小册子。在大体上中国多数同志都赞成他的意见。其组织法的要点：团体的基本单位是以工厂、学校与其他机关内的同志组织的五人以上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与各村镇的小团体联合起来成立区同盟，再由各区同盟进而成立全国联盟。在这里我举出一个极简略的组织法如下：

一、目的　无政府主义是有阶级性的，它不是Bourgeoise

的空想，它是无产阶级的 Ideology。所以无政府团的目的在援助劳动阶级，进行革命的事业。

二、团员　凡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愿为劳动阶级尽力者均可加入本团，但须经团员一人以上的介绍，得大会通过登记后，才能为本团团员。

三、组织　凡工厂、学校内之同志有五人以上者得组织小团体，各小团体联合成立区同盟进而省同盟更进而为全国联盟。每小团体选举书记一人办理事务，任期是限定的。区同盟及省同盟组织书记部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选出。书记部须注意宣传事业组织劳动阶级。

如发生某项重要问题，各团体代表召集会议，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其议决案交书记部执行。

全国大同盟分书记、编辑、宣传、工农等部，其职务为经营出版、报纸宣传、召集大会、与各国同志联络。工农部专门应付工人农人运动。

四、规约　团员应执行一切团务，并向团体报告其所执行之职务。对于大会委派所做之事不得推诿。如破坏团体名义，不履行团员责任或无故不到会三次，即予以警告，如不听，得由大会通过开除之。

以上的大纲在大体上中国同志是同意的，不过各地所采用的组织纲领因各地的情形多少有点改变，有的更为严密了。

总上面的叙述，可略知中国同志对于组织的意见，全国同志意见既能大体一致，则组织问题已不复成问题，将由讨论时

期进到实行时期了。

这是预备致"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即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同盟)的筹备会的报告的一节,后因筹备会受法政府压迫,各国同志又多被驱逐出境,这篇报告便没有译出送去。现在录出一节在本刊发表。

空前绝后的妙文*

据说李石曾先生的大文《现今革命之意义》“见者曾惊为近世罕见之文字”（见《申报》），然而在学识浅薄的我，简直无法把它读下去。我只记得下面的两行：

第三层：阶级革命，或财产革命，或经济革命；
第四层：民生革命，或社会革命，或大同革命。

把社会革命或经济革命分开，又在阶级革命之外，创造出民生革命的名词。说“武汉之共产革命为第三层序”（其实武汉政府那一般人哪里会梦想到“共产”），“上海之护党为第四层序”。拥护国民党的政权杀了些假共产党人便是“大同革命”，便是“社会革命”，这样的社会革命真是别开生面。我做梦也不曾想到在上海已经发生了社会革命大同革命了。李先生的大文我不仅惊为罕见，而且觉得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空前绝后的一篇妙文！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黑浪。

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

国家主义者的首领们坐在租界里大骂共产党徒是卢布的走狗。自然共产党中有些为着卢布而去"革命"的人，但是其中却也有不少革命的青年。曾琦先生曾骂李大钊胆小，然而胆小的李大钊后来却以从容的态度，无畏的精神走上了绞首台，为主义而死。在法庭上那样慷慨申辩，临死时又如此勇敢！在主义上①……；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而那位曾琦先生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芾甘。

① 作者删去以下六字：虽是我的敌人。

国家主义者在捧蒋介石*

国家主义者曾在孙传芳保护之下做过拥护国旗运动的。现在"孙联帅"既然"下野"，他们也只得看着青天白日旗之飞扬而空叹国魂之沦亡了。这也是他们"正人君子"的本色!

现在不料在国家主义的刊物上又登出了许多向蒋介石送秋波的文章。虽然何应钦"将军"对于国家主义之痛斥，他们还在尽力辩护。这样的忠诚也许可驾前朝曾文正公而上之。曾氏有知，亦当称赞他们的"玄孙"曾琦"克继祖业"了。然而在大逆不道的我们看来，只知道国家主义者在捧蒋介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平等》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赤波。

给急弦的信*

急弦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我们异常高兴，同时我们还向你表示热烈的感谢。你的信想已由三藩市的平社同志回答了。因为这封信又转辗到了我的手里，并且很使我感动，所以我也与你写几句话，说得对不对，还望你指教。

其实我也没有多的话可说；因为你的见解已经很透彻了。像你这样明白而又虚心的人，是很容易了解真理的。我们要说的话，你大概早已知道了罢。

孙中山的人格自有他的相当价值，然而他说的话未见得就对。人是人，主张是主张。主张要是不对的话，无论是什么人说的，我们也要反对。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我们万不能因为信其人便推而信其主张！

你既然相信信爱先生的话是不错的，那么你便承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理由是不错的了，承认三民主义是不对的了。然而你却说出一个"但是"来。你说："三民主义是对中国现状而发"，是"对中国的过渡手段"。但在你所认为"对的"，信爱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黑浪。

先生的小册中却明明说："恭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怎样适合于中国国情，其实所谓三民主义的内容完全是西洋政治界中很普通的主张，孙先生并没有丝毫加以修正，就完全移用于中国……"可见三民主义还是洋货。那么所有的洋货都可以运到中国推销，何必定要三民主义牌的洋货来专利呢？其实只要一种主义是对的，便可行之于全世界，无所谓洋货土货之分。固然各国有不同的习惯风俗，但全世界的趋势则一。主义也就是世界进化的产物，他是就大体而立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由人民自己组织的自由联合的团体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业，这在各国都适合的。至于中国人应该吃米饭，西洋人应该吃面包，这些小事现在便管不到了。所以若拿风俗习惯等等的不同来反对从西洋传到中国的主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南方与北方的风俗习惯不同，因此三民主义是适应于南方的，北方应捧张作霖做皇帝，这岂不是很大的笑话吗？而且就事实来说，三民主义倒不及无政府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呢！

至于说舍近图远的话，你知道现在因为一般人都不懂无政府主义，怕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才远了一点；假若知道无政府主义好，就相信无政府主义，就宣传无政府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很远的事！在满清的时候，保皇党的梁启超，不是也说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同盟会是舍近图远，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吗？然而到了辛亥满清一倒，他自己的论调也就变了。

有人说中国要成了富强的国家后我们才可以讲无政府主

义，这种人大概见了列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历年来的暴行，受了很大的刺激，故有此种主张。自然中国富强了以后，一般资产阶级可以享一点福，资本家也不因内战而受损失，富人也不会被军阀敲榨，知识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会增高，留学生在外国可受优待，中国的资本家可占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地位，而得发大财，而平民呢？他们仍然苦于饥饿，疲于劳动，饿饭的仍然饿饭，作工的仍然作工，受苦的仍然受苦，做奴隶的仍然做奴隶。所谓国民革命只不过资产阶级革命罢了，可怜的平民，难道他们应该牺牲性命来替资产阶级谋幸福吗？难道他们还要永远做这二层奴隶么？看吧，欧美各国的平民何尝受着强国的福！他们的苦痛谁不知道！今天保不定明天的安全，自己拚命作工，到老便像狗一般的死去！可怜呵！中国的国民党员还拿这来骗中国的平民，还要他们牺牲性命求这样的幸福！

推翻国家是要在国家富强后才能推翻吗？那么女子放足也要等到把脚缠得极小，然后才能把它放开吗？外国人有时甚至没有中国人那样的自由，然而中国人却要拚命去入这种圈套咧！

就拿法国来说吧，那居留证把人民拘束得像笼中的鸟一样，一举一动政府无不知道。那野蛮的征兵制度更强迫人民去过非人的生活。甚至后来还定下法律，在战争的时候，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到战线上去防卫“祖国”。就是说要是法国政府和别国的政府闹了意见，法国的野心家要想满足他的权力欲，大资本家想把货物的市场扩大，那么全国的人都要去杀

人或被杀。为的什么？为的“祖国”！

中国的国民党员！你们的目的原是这样，自己照照镜子，能不惊心动魄！

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极同情，但打倒之后要建设一个强固的政府，要把中国弄成富强的民主国家，这我却极端反对。

假若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是为着人民的幸福的，那么我们便不应该拿三民主义做口号，我们便不应该重建政府！南京政府也好，汉口政府也好，都是一套鬼把戏！

我个人对于一般下级的国民党员是佩服的，我觉得他们的本心是好的，可惜走错了路！至于那些领袖们却有点骇人。好在先生说“我简直不敢恭维现在的国民党所谓领袖”。可见先生也和我们同意！而且先生更说“求一人如中山先生为我们信仰者，恐怕海底捞月还算易一点呵！”先生自己是国民党员，对于贵同志当然比我们局外人知道深些，先生既说国民党内无人，那么还有什么希望！难道中国的命运便随孙中山先生死去了吗？不！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先生，你若记得中国国内还有无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急待拯救的平民，那么请你抛开那无望的党！加入我们的队里来！我们是极其欢迎的。虽然现在我们无政府党在中国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大的势力，那样多的党员，但我们这里而尽是些诚心的人，我们的团体是自由的组织，没有野心的领袖，也没有盲从的人。只要真理不灭，这革命之少数未尝不可做出惊

天动地的事业来。希望先生勿自馁！不必坐等像孙中山那样的伟人出世！此复。并祝健康。

黑　浪　8月20日。

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

“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七月十五日维也纳工人与军警混战时候从群众中叫出来的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的了。维也纳的工人是不会忘记的，全奥国的工人是不会忘记的，全世界的工人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知道：徒手的工人所用的武器不过是碎石子，然而全武装的军警竟用快枪来射击。难道工人的生命真是一钱不值的么？这样的事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知道：维也纳的工人竟徒手和有枪的军警勇猛的搏战多时，直到死伤过多才往后退。这样的事我们也是不会忘记的。

世世代代流离辛苦生于忧患、死于饥寒的工人们的痛苦我们且不说了。那些统治阶级慢慢的吃着工人们的肉、喝着工人们的血，已经有无数的年代了。然而他们还吃得不安宁，还喝得不高兴。在慢性的杀害工人们的情形之下，他们有时还要举行残暴的血宴！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黑浪。

看呀！许多年以来，在哪一年代在哪一地方都有工人们整批的在排枪之下，在刺刀之下，在断头台上，在大战场上被人像猪一般地屠杀！这样的事哪一年、哪一处没有！

且不说别的，单说那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时的"血星期"罢！在一星期以内，工人们被资产阶级屠杀的数目在三万以上。五月廿八日的那一天成批的工人靠在墙上被资产阶级的军队用排枪来扫荡。对于那些失了抵抗力的工人必欲一齐杀尽，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下，工人只有往死的路上走了。

我们不必为过去的死者悲哀，我们应该援救现在及未来的将死者。今天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明天也许工人的血会染红伦敦、巴黎、柏林或纽约的。如果我们工人还想生存，不愿做资产阶级枪弹下的冤鬼，那么，我们只有起来向资产阶级的大本营进攻！勇敢的进攻！

我们要复仇，要向无人心的资产阶级复仇！我们工人的血既染红了维也纳，染红了巴黎，我们也要用资产阶级的血来洗净它。

不过我们革命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复仇，而在消灭阶级，而在建立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在那里只有工人才能存在着。

维也纳工人的血更证实了阶级斗争的事实。这一次的流血是资产阶级垂死的红光！第二次的流血的将不是工人，而是那曾经流过无数工人的血的资产阶级了。

工人们，我们且在血光中相见罢！

Les suisses avaient promis

Quils feraient feu sur nos amis

Mais comme ils ont saute!

Comme ils ont tons danse! ①

① 此为一七九二年法国革命歌之一节。末两句形容法皇宫前的瑞士守卫兵士与革命民众冲突，被民众乱枪击死的情形。

不要瞎做"劳资妥协"的梦*

今天与小工头大吵了一场。他告诉大工头定要把我开除。他竟然骂我是野蛮东西，是笨伯。大工头平日是很客气的，听了他的话也就声色俱厉了。在这里气冲牛斗的当中，回想了一下我的物质生活，我几乎要哭起来了。唉！还有什么话说，无论天大的痛苦都要和血吞下的。没法，只得放开小工头，去和大工头讲和。今天虽然换了一个部分，明天还不知道怎样？

我想我这条生命比狗还不如。狗子有主人爱，我呢，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不值得看重的东西罢了。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信里的一节。不知一般的工友看了作何感想。不错，在资产阶级的眼里看来，工人的生命比"狗"的还卑贱。那么在这"人"与"狗"之间是永无连接之可能的。而那些主张劳资妥协的人呢？他们所说的"妥协"不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黑浪。

法律下的大谋杀*

——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

吃人的魔王完成了它的工作。法律下的谋杀"大功告成"。电流通过了萨珂(Sacco)与凡宰特(Vanzetti)的身体，这两个无罪的人——我们的勇敢的同志终于死在电椅上了。

不管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援救，不管全世界各大城市的示威运动，不管各国报纸上的反对，不管我们无数的同志为正义为自由为人道的奋斗，甚至不管他们两个是无罪的人，那弗勒(Fuller)那赛叶(Thayer)和他们的刽子手们终于把萨珂与凡宰特烧死了。

千千万万人的援救是错误的！各大城市的示威运动是错误的！各国报纸上的反对是错误的！正义，自由，人道也是错误的！只有弗勒是不错的，赛叶是不错的，他们的几个刽子手是不错的！萨珂与凡宰特该死，无罪的人都该死，我们都该死！该活的只有弗勒，只有赛叶！这是不错的，他们今天杀了萨珂与凡宰特，明天便要杀其他无罪的人，我们不久也就会被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黑浪。

他们杀了。

法律胜利了，金钱胜利了，弗勒和赛叶胜利了！法律是甚么？吸吮无罪的人的血的东西！金钱是甚么？吃好人的肉的东西！弗勒和赛叶是甚么？——吃人的魔王！

我们不会忘记：当全世界无数的人苦痛地等着这最后的悲惨结局时，当萨珂的妻子和凡宰特的妹妹跪着向弗勒哭求，求他不要杀这两个无罪的人时，那弗勒一点也不动心，冷然地说他是依着法律而行。

我们不会忘记：全世界无数的人在哭着，忧愁着，等候着弗勒的最后决定，而弗勒却安然地玩他的果尔夫球。这是依着法律而行的！

"法律胜利了，无政府失败了。"资产阶级在支加哥悲剧闭幕时曾这样地高叫过，现在呢，这样的呼声又会响起来了。

法律果然胜利了么？无政府果然失败了么？告诉你——吃人的魔王！只要正义不死，真理不灭，法律是决不会胜利的，无政府是决不会失败的！杀几个人，烧几本书，难道就杀得死正义，烧得掉真理么？

而且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两个勇敢的同志却昂然地在电椅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死了，死得极勇敢极高贵，他们死得像殉道者，像伟大的英雄。正如法国《自由人》周报所说：他们像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生，又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死！就在电椅上，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表示出来他们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而死。而且他们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向全世界抗议他们是无

罪的人！这样他们的一生真算是“完全”的了。在生，他们是生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临死，他们又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难道在那一般困顿床褥，带着可怜和恐怖之色，终日哀号，终日呻吟，一秒一秒钟的，像脱了毛的狗一样的死去的资产阶级之中，我们能找着一个这样的人么？那么，究竟谁胜利了呢？

法律何尝胜利？金钱又何尝胜利？胜利的还是那两个不朽的人——我们的同志萨珂与凡宰特！

至于我们呢，我们不要忘记奈柴尔（R. Reitzel）四十年前在支加哥殉道者墓前的演说。他的最后的话是：

> 我们没有理由来哭死者，他们是死得极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曾是爱的象征那样，十九世纪的绞刑台（加一句：二十世纪的电椅）也就是自由的象征了。但我们应该哭我们自己，哭我们自己的羞辱，哭我们的优柔寡断，哭我们的懦弱。
>
> 我们离开死者的坟墓时，大家应该记着黑尔威（Herwegh）的话：
>
> 我们已经爱的够多了，
> 让我们最后来开始憎恨罢！

寄《革命周报》编者的信*

编者先生：

我曾反对过《革命周报》的主张，便在现在我也反对它的，——虽然我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虽然我曾攻击过《革命》，也许在将来我还要攻击它，然而我却要向你说，你们关于萨珂与凡宰特（你们译作凡齐蒂）的文章我是极表同情的。不但我，我想假若萨、凡二人还存在的话，他们也要感激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正如凡宰特向我所说的那样，默默地和那两个殉道者的感情共鸣，防护他们的生命，力争他们的自由，证明他们的无罪，辩护他们的信仰。

而且中国人素抱"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主义，只要没有人把他自己拉去坐电椅，那么，无论谁坐电椅，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当全世界千万个心痛苦着等候这可怕的悲剧结局"时，（见巴黎"L'oeuvre"报）中国的名流胡适之却在《现代评论》上大说风凉话。幸好胡适之的文章没有译成法文，否则 L'oeuvre 报的编辑会拿他骂美国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五日《革命周报》第三十四、三十五期。署名芾甘。

资产阶级的话来骂中国的大学教授了："在那边的人，那些有铁石心肠的人，是不愿意听怜悯和理性之声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读到《革命》的"萨、凡纪念号"怎能不令我感动呢？

人类这个东西真是可恶，他总是常常把他最爱的人杀掉，而把他最恨的人奉为神圣。过去殉道者的悲剧现在不必说了。然而我们谁也不能忘却的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一点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时间中，两个近代的伟大人物在麻沙秋谢州被烧死在电椅上了。这两个伟人便是萨珂与凡宰特。

胡适之在美国住过很久，他总知道美国著名文学家辛克拉(Upton Sinclair)的名字罢。(辛克拉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煤油》("Oil")也曾轰动过全世界。)那么，我把辛克拉四年前所写的文章抄一节与他看看："一年前我曾去拜访世界最优美的精神之一，他现在被囚禁在麻沙秋谢州的查理司登监狱中。他并不因为我不曾和他在一起被囚禁而责备我；他以他的精神的优美和温柔，使我觉得自己羞愧异常，不久我自己也盼望去坐监狱了。……这个麻沙秋谢州的伟人是谁呢？他的自叙传刚出版，正放在我的案头。这叫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著者是巴尔托罗美·凡宰特"。纽约《世界报》的主笔布龙(Heywood Brown)也说凡宰特是近代罕见的大人物。至于萨珂呢，甚至麻沙秋谢州州长弗勒的周围的人也赞美他。然而胡适之却"是站在刽子手的一边"而"反对殉道者"的。他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而且还替州长辩护。当他说下而

的话时，我不知道他心理是怎样的："邦长本可以特赦或减刑的，但美国与世界的无政府党人做出了种种示威运动，……这种暴动不能救他们的命，反激怒了一般公民的心理，因为暴力若能影响司法，司法制度就根本不能成立了。"我反对法律这种东西，然而据胡适之的话看来，我懂得法律的程度还比胡先生深一点。照美国的法律，州长是有权力来减刑的。司法制度之能否成立，我且不管，但法官之受贿，审判之不公平，这却是激起暴动的唯一原因。假若故加人罪，枉法杀人，便能保障司法制度，便能维持司法的尊严，那么，你要杀人就杀好了，何必又借"暴力影响司法"的话来做口实呢？胡先生假若肯费一点时间把萨、凡案件的始末研究一下，他便知道那几个法庭方面的证人在法庭上是怎样说的了。攻击萨珂的共有五个证人：三个女的，二个男的，其中有一个是患神经昏乱症的(Mary Splaine)，一个是娼妓(Lola Andrewo)，一个是窃贼(Carlos Goodridge)，还有两个是谎言者(Frances Deslin, Lonis Pelzer)。他们的供词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在法庭说的和在外面说的又自相矛盾。一个人在一秒半钟内在高处可以把二十五米突以外的人的相貌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连那个人有一百四十磅到一百四十五磅的重量也看出来了。这是Mary Splaine的供词，胡先生能相信么？然而根据了这样的供词，法官便判决了萨珂的死刑。虽然有三十二个人到庭证明萨珂的无罪，但裁判官赛叶说他们意大利人的话是不可靠的。同样，有三个证人(Dolbeare, Reed, Vangie 都是说谎者)证明凡宰特有罪，三十一个证人证明他无罪。但法官听了三个说谎者的

互相冲突的证人的话，就判决了凡宰特的死刑。司法制度要靠那些说谎者、窃贼、娼妓、患精神病者来维持，可见它早已倒塌了。假若对于这种制度还不反抗，那个人就无良心，就是禽兽，因为他连一点人的感觉也没有了。胡先生呢，我不敢说他是禽兽，但是他见着不义的罪恶行为，既不反抗，见着好人无罪而被处刑，又不援救，并且在殉道者被害后还作文来侮辱他们，这样我们能说他有一点人的感觉，有一点正义的感觉么？"对于你，我便要代你要求全世界良心尚未丧尽，还知道善恶的人来饶恕你了。"(La Presse)呜呼！资产阶级的学者！

这几月来，我研究萨、凡的案件，常常自问：州长弗勒、裁判官赛叶，以及罗威尔等究竟是怎样的一类东西，现在胡先生的文章已给了我一个完满的答复："他们就是胡适之这一类的东西呵！"胡先生要说什么司法制度，那么我们便来谈谈这事件的法律的一方面罢。赛叶自己承认被告方面的证人多过于法庭方面的证人，他又明白萨、凡两人的 Alibis 是不能推翻的，于是他只得发明出新罪名来。法国人权协会总书记 Guernut 在《晚报》上作文说："新世界发明了一个新的罪名：La conscience de la coupabilité"。这就是赛叶所说 Conscionsness of guilt，这样奇特的罪名不但 Guernut 说法律上没有见过，便是我连翻译也翻译不出来呢！胡先生是要拥护美国司法制度的人，这个新罪名他当然知道的，那么我请他"有以语我"来！

据胡先生及弗勒、罗威尔等说，萨、凡是因谋杀罪而被处死刑的。然而在裁判官向陪审官报告的全案要略里，有十四页

是劝陪审官要像兵士们那样的忠勇，五页是列举责任与良心的事实，只有两页是批驳被告的 Alibis 的，其余的三页尽是夸张的话，与萨、凡并没多大的关系。二十四页的全案要略，便这样的分配了。假若萨、凡是谋杀犯，那么为什么裁判官要提到责任与良心和兵士们的忠勇，更何必提起在法国战场上战死的美国军人呢！

州长弗勒是一个资本家，是一个厂主。他曾叫过，要杀尽无政府党、共产党、I.W.W.以及一切的革命党（在一九二〇年）。他又在《成功》杂志上发表过《我为什么反对废止死刑》的文章，他曾驱逐过他工厂里罢工的工人，他还希望做美国总统。他是一个胆小的懦夫，他几次想杀萨、凡，然而总不敢下手。所以他延迟了两次萨、凡死刑的执行期，而且一面向萨、凡表示好感，一面又拉罗威尔等来做他的帮手，想把责任放一半在那三个学者的肩上。其实凡宰特也知道弗勒的弱点，他在临死前七十多天寄我的信中还说，"我恐怕他们还不敢烧死我们。"实在，在最后的几天中，弗勒因为接到反对萨、凡死刑的函电太多了，心中很畏惧，不敢毅然决然地拒绝减刑。所以在那几天中这个无能的懦夫心中感到异常的苦闷。最后麻沙秋谢州的美军团（American Legion）来了一份电报叫弗勒不顾民意，拒绝减刑。该团的指挥官J.W.Reth还亲到弗勒的办公室去见他说，美军团以有他这样的州长自豪，他们愿竭全力来帮助他。这样弗勒才敢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晚上向萨珂的妻子、凡宰特的妹妹说："我是依着法律而行的！"

至于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呢，他是弗勒所委任的审查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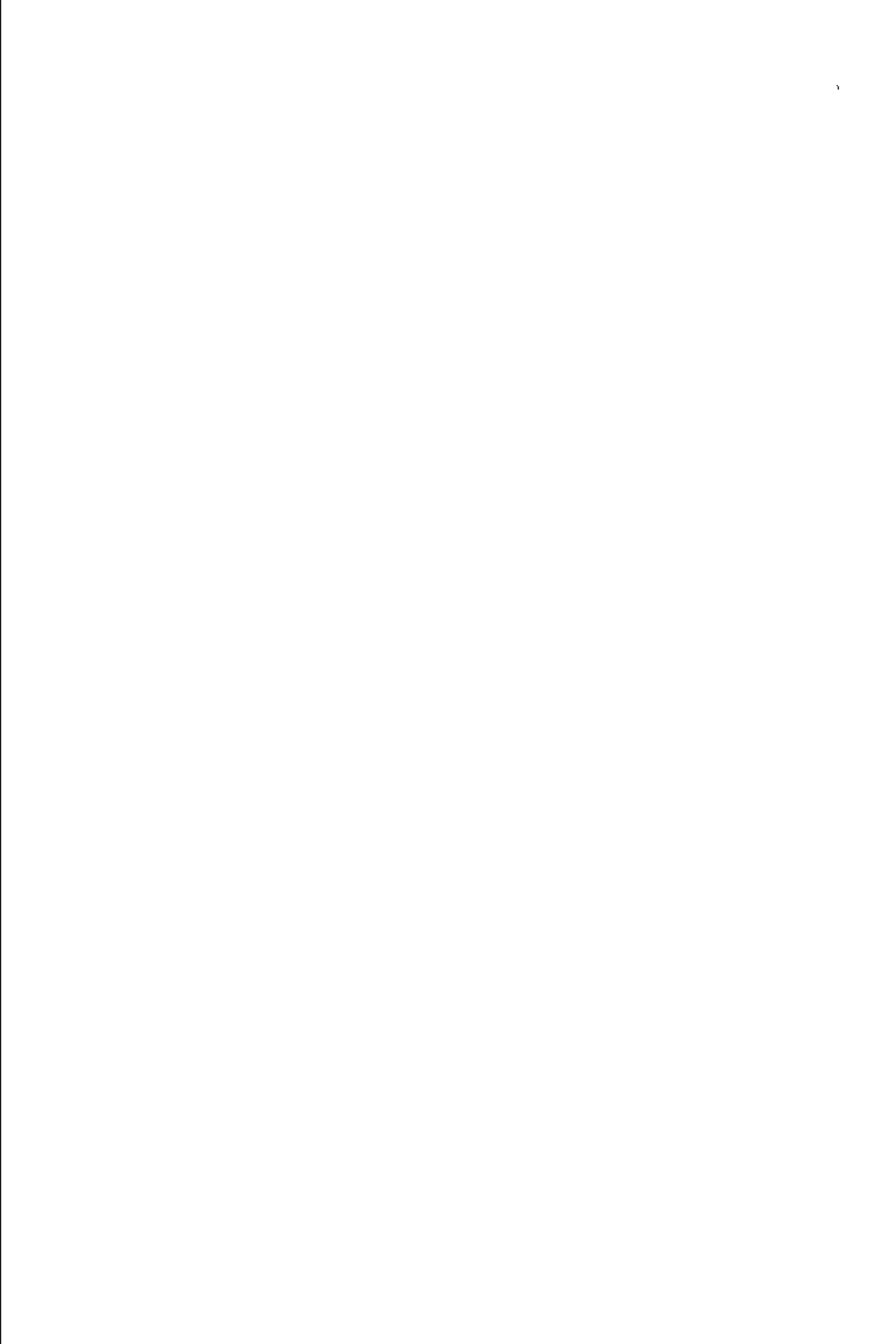
员会的委员。然而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一个谋杀犯。哈佛大学卒业生，《三兵士》及其他著名小说的著者 John Dos Passos 在致罗威尔的信中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的谋杀犯了。"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沾污了哈佛大学了。而且正如名记者布龙所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为什么我说他是无耻之徒呢？请听我道来：罗威尔在审讯时，因为要推翻萨珂的 Alibis，便说那两个重要的证人 Mr. Bosco 与 Prof Guadagni 是伪证。Bosco和 Guadagni 证明四月十五日南布朗垂的强盗杀人事件发生时，萨珂在波士顿和他们一起用餐，因为那一天意大利人有一个宴会，所以他们能把这日子记得很清楚。罗威尔坚持地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绝对没有意大利人的宴会，这两个人完全在说谎，这两个人和他辩论了许久，举出了许多的证据，他全然不理。第二天早晨，这两个意大利人抱了一本很厚很大的书到州长办公室里来，这是意大利文日报"La Notizia"一九二〇年的合订本。Bosco 还把四月十六日报上关于十五日意大利人宴会的记事译成英文，和原书一起交与罗威尔。罗威尔读完了这记事，立刻站起来走到这两个人面前，和他们握手，要求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发表。他的同事（三个审查委员之一）格兰脱(Grant)还不相信，并且立刻打电话去问 Williams 君(因为那天的宴会是为庆祝他而举行的)。Williams 说这两个人的话是不错的，于是谁是慌言者的问题才解决了。假若这两个人话是不错的，萨珂的 Alibis 是不曾被推翻的，那么，萨珂便与南布朗垂的事件无关，他便是无罪的

而死的。

最后，我引我在《平等》第四期中所说的一段话来作这封信的结尾：

> 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两个勇敢的同志却昂然地在电椅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死了，死得极勇敢极高贵，他们死得像殉道者，像伟大的英雄。正如法国《自由人》周报所说：他们像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生，又以伟大以自尊以勇敢而死！就在电椅上，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表示出来他们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而死。而且他们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们还向全世界抗议他们是无罪的人！这样他们的一生真算是"完全"的了。在生，他们是生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临死，他们又死得像一个堂堂的"人"。难道在那一般困顿床褥，带着可怜和恐怖之色，终日哀号，终日呻吟，一秒一秒钟的，像脱了毛的狗一样的死去的资产阶级之中，我们能找着一个这样的人么？那么，究竟谁胜利了呢？

芾　甘 11月5日寄自法国。



一九二八年

祖　国*

——“穷人的话”之一

你们天天说什么祖国，叫我爱什么国。究竟我的祖国是什么呢？我的祖国就是我生长的地方么？就是我的祖宗所耕种的土地么？就是那立满了高楼大厦的城市么？或者就是那大中华民国、大英帝国、大法兰西共和国等等空招牌呢？

我生长的地方已没有我的立足地了。我的祖宗所耕种的土地已被那些有钱的地主带抢带骗的买去了。高楼大厦的城市里没有我的住宿处，而我那大——什么国的招牌，我饿了时不能给我饭吃，冷了时不能给我衣穿，它只是像泰山一般重的压在我的身上，叫我动也不能动。我还要它干么？

假若我的祖国对于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穷了便没有地方住？为什么我到城市里讨饭，而那些警察先生们要把我驱逐出去呢？为什么那般有钱人住的尽是高楼大厦，我却不得不睡在他们的大门口的石地上，而且还要被人凶狠地打骂呢？

“祖国”，我果然有祖国么？为什么我的祖国不保护我，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七期。署名李冷。

去保护那般有钱的先生们呢？为什么我的祖国抛弃了我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会饿死，我的母亲天天哭着，我的姊妹们为着生活问题而卖身与富家子弟呢？“祖国”！“祖国”！我们贫穷的工人果然有“祖国”么？我的“祖国”把我赶了出来，我便不得不跑到别的国家，而别国的人又要轻视我，欺骗我，他们说我是一个“外国人”，那么究竟哪里是我的“祖国”呢？

有人说国家的要素是“土地”、“人民”、“主权”。然而我是没有土地的，我是没有主权的，我们是被人掠夺被人压迫的人民。那么我们还应该爱国么？我们本来没有土地，还怕别人来抢去么？我们本来没有主权，还怕别人来侵害么？我们的国家便是压迫我们、掠夺我们的机关，我们还要爱它么？

有钱人说爱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有土地，有主权，有我们被压迫被掠夺的人民。而我们工人呢，我们是无祖国的。我们要做一个人，为什么甘愿做那吃我们肉喝我们血的资产阶级的牛马？

工人是无祖国的。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同胞。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我们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祖国，凡是拿爱国的话来骗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先打倒这些骗子。

又有人说，要是你们人人都不爱国，那么一旦外国兵打进来，岂不是大家都要做亡国奴么？我说要是我们人人都不爱国，那么全世界上的种种国家都会立刻倒塌了，还有谁来灭亡谁的国呢？要知道我们虽不爱国，而国家却要来管我们，压迫我们；所以我们明白了国家的坏处，我们便要去打倒它，我们不能再受它的害。大家的肩上都没有了这面重的国家招

牌，大家才可以做一个自由的人，而且那时土地也成了我们众人的公有物，我们高兴到哪里，便到哪里，再没有人来干涉了。土地上的产物我们可以自由取用，土地上的房屋，我们可以自由居住，再没有人来压迫我们，再没有人掠夺我们，这样的世界才值得我们的爱啊！

那些有钱的人呢，他们也许要拚命保护他们的国家，来和我们为难。但这是不足怕的。要是我们大家都觉悟了，谁肯去做他们的牛马！至于他们自己只会拿话来骗人，要叫他们牺牲性命来保护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不做的。中国的一般国家主义者不是每天坐在租界里的公馆内高叫“祖国危急”了么，然而外国兵一到，他们又会“身先人民”的逃跑了。只要我们平民起来向他们算帐，他们顾自己性命还怕来不及，哪里会想到国家上面去呢？

起来罢，全世界的工友们，快来打倒那些资产阶级的祖国！

一封公开的信*

——给钟时同志

君毅的信

有一个问题，你也许早已想到："中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了，为什么'大多数'都已变节，都已冷淡了呢？"

最大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中国从前的无政府党，几乎全体是中产阶级出身，几乎都是青年学生、知识阶级。

二是他们在某一时期，都是热心太过，以为无政府革命立刻就会发生，他们几个人就可指挥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理想，马上就可以完全实现。

这两个原因，是有密切关系的。现在不过为了说话便利计，暂时把它们分开。

无政府主义，当初本是从工人运动里发生出来的。在万国劳动会及犹拉同盟会，产生出近代无政府主义。当时参与运动的人，除了少数知识阶级如巴枯宁、克鲁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八期。署名黑浪。

特金等以外，尽是劳动者。

到了后来，无政府主义渐渐发达，才有一些中产阶级、知识阶级里的人，爱好我们底伟大的自由思想，来加入运动。

他们虽然也给我们一时的宣传上的帮助，但是他们底缺点，很难完全消灭。

他们大都胆小怕事，善于谈论作文，但是在行动方面，不及劳动者那样不顾一切，勇往直前。他们里面有时也可以产生几个伟大的人物，但这完全是少数，而且不常见。

“革命”不过是那悠久的“进化”途中一个极小的历程，几乎看不出的一小段。一个人，甚至于一个党，在那无穷的宇宙里，又不过是些小得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分子。但是有些帝王、豪杰、野心家，以及“革命家”，他们底夸大狂，到了那样疯癫的地步，许多的无政府党，也不免受了他们的传染。

“如果我得了势，立刻可以使天下太平，万姓安宁。”无政府党换了几个字眼：“如果无政府成了功，那理想的、美善的、完全的人类社会立刻就会实现的。”

但我们应该问：“下次革命底发生、维持、成功，是否可以由无政府党包办？”换言之，“未来的革命，是否纯粹由无政府党一党来包办？”

在我个人，老实说，是不相信有这回事的。

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不像一间房子那样的简单，

拆了破旧的，马上可以另建新的，不要忘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已经有十六万万人。

多少以前非常热心的同志，后来看见无政府革命，不是如此的容易，不是如此的简单，因而灰心，因而失望，因而冷淡，因而加入别党！

现社会令我们愤恨，令我们不平。

我们看不惯一个人拖着另外一个人，像一匹马似的，拚命奔跑；

看不惯一个年老的人，跪在路旁，向你要个臭铜钱；

看不惯一个美丽的女子，在街上向你卖爱情；

贫苦、愚笨、贪鄙、奢侈、监狱、刑罚、军警、战争……无论到什么地方，随时可以看见种种不平的事，可恨的事。

我们于是希望一个社会，在里面任何人都用不着再去吃人，压制人，也不会再被人吃，再被人压制了！凡是人类可以避免的苦痛，完全消灭，大家同心协力，去谋大家底物质上、知识上、道德上、艺术上的幸福。

所以我们信仰无政府主义。

但是要到无政府主义之路，没有长时期的困苦艰辛的"预备工作"，无政府的社会是不会立刻实现的。

从前中国许多同志大都有一种通病：他们底"治人思想"从小养成，根深蒂固，便是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也还不能把种思想完全弃掉。

他们——我也许也患这毛病——一面"治人"思想没有去尽，一面"求速"念头实在太过，当然不免就去另找一条较容易，较短速的道路了。

怎样办呢？

希望劳动者里面，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渐渐多起来。他们里面，也渐渐产生些可以演说可以作文的人，以后遇见知识阶级、中产阶级里面的人，只让他们立在赞助的地位，如果敢来指挥，敢来命令，立刻驱逐出去。

"劳动者底解放，是劳动者自己底事。"

"只问耕耘，莫问收获。"

君　毅 10月21日

致 钟 时

钟时同志：

君毅的信我读过了。因为《平等》的篇幅有限，我未得君毅的同意，便把他的原信缩短成现在的样子，但里面的语句仍旧没有十分改动过。

君毅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易于变节的原因，发现出两个来。虽然他信里的语句我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他所说的两个原因，我却承认。

君毅在另一篇文里说："黑浪说得好，离了劳动者就没有无政府主义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说过什么新鲜的话，我不过重述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从巴枯宁一直到高德曼）

许多年来所反覆不断说着的话罢了。但也很奇怪，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家和战士不断地重述着，然而无政府主义至今还是在被人误解。有些人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为某一阶级的，是为人类全体的，所以无产阶级不能专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的革命，应有各阶级来合作。我说这是在做梦。

俄国旅法无政府团的组织大纲上有一句很适当的话："人类不是整个的了，人类已分成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实在主人和奴隶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在全人类中筑了一条大沟，是永远填不满的。只有在将来无政府的社会实现后，阶级的区别消灭后，人类才能成一个整体，那时才说得到全人类的幸福。

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几个学者在研究室中空想的结果。它在民众中有深固的根底，它是无产阶级的欲求，又是时代的趋势。它是由生活的实际得来而又由生活的实际来证明。因此它不是浮泛的空想，而又不是适用于"生活情形完全相反对的两个阶级"的万灵药。这并不是我的偏见，我们想一想看，世界上真有能把两个相反对的东西连在一起的宝贝么？所以适用于两个相反对的阶级的，便是对于一阶级也不适用。狼是要吃羊的，要叫狼不吃羊，只有叫狼不要做狼。假若狼还是狼，羊还是羊，那么无论在什么好听的名词之下，它们还是不能生活在一处的。拿人类来说，主人阶级是狼，奴隶阶级是羊，主人阶级的正义人道，便是压制奴隶阶级，若叫主人阶级不压制奴隶阶级，这是做不到的事。所以若说将来有一天主人和奴隶联合起来实行无政府革命，谁也不会相信。

而且一个人要使他的思想脱出他的生活环境，这是很不

容易的事，在主人阶级（资产阶级）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他一定会以为现在的社会是安排得极好的，一切的制度都是能有利于人类的。他自己是现社会的骄子。他靠着一般工人的血汗享尽了现社会所能供给人类的幸福，在他自己是很满足的了。他维持社会，还恐怕力量不够，更哪里肯去推翻现社会呢？固然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是出身贵族的，但这是极少数的例外，况且知道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生活的人，当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革命家，也是从实际生活的体验得来，并非读了一两本书受了感动就甘愿牺牲其地位而侪于平民之列的。

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只有劳动的人才能生存着，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么对于不劳动的资产阶级，无政府社会里就无他们容身的地位了。换言之，一个人要生存于无政府社会，必定要做一个劳动者。资产阶级不是劳动者，当然不能生存于无政府社会。那么无政府主义还能说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吗？离了劳动者还有无政府主义吗？

我们不要忘记许多以人道主义者自命的人，常常假借着人道的名义来维持着现社会。罗曼·罗兰便是一个。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相信罗曼·罗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实际上他反对一切的暴动，便是打倒极凶恶的暴政的暴动，他也反对，他的借口是"人道"。

自然假若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也可以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无权毁灭。但可惜我们不是基督徒。其实那些基督教徒也常常假借"人道"的名义，杀了许多革命家了。难道革命

家就甘愿在这“人道”的名义下被杀；无产阶级就甘愿在“人道”的名义下受压迫；现社会就该在“人道”的名义下维持下去么？自然我们最好是连一根头发也不伤害，连一滴血也不使流。我们情愿揩干人人的眼泪，不使任何人再去哭泣。但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资产阶级不愿意这样，他们希望的只是不伤害资产阶级的一根头发，不流资产阶级的一滴血，不使资产阶级中有任何人哭泣。为了这个目的，虽使无产阶级流出无量的血液，受尽无穷的苦痛，他们也是愿意。

我在《工人的血染红了维也纳》一文里曾说过：“对于那些失了抵抗力的工人必欲一齐杀尽，这便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下，工人只有往死的一条路上走了。”我觉得我的话并没有过分的地方。在无政府的社会中既然不能生存着不劳动的人，那么构成那社会的唯一分子便是工人。要是无政府主义也带上了人道主义的色彩，无政府的社会便永无实现之日，因为人道主义这个名词是资产阶级用来杀工人的最好的托辞，工人杀尽了，哪里还有无政府的社会呢？所以那些要把无政府主义染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色彩的人，简直是不懂无政府主义。

诚然克鲁泡特金在老年也常说他要写的《人生哲学》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是人的。这句话常被人误解。记得有一次一个人反对我的意见，他说：“你所说的正义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我要求的是人的正义。”我至今还觉得说这句话的人的可怜——人是什么？能吃饭睡觉、娶妻生子、杀人抢劫的两手动物便叫做人么？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连禽兽还不如，不知怎么

沾了他祖先的光，居然也披上了人皮，自己也以人自命了。对于这些东西，还有讲什么正义，什么人生哲学的可能么？野蛮人和下等动物的道德是：利于我者是善，利于人者是恶。“我偷邻人的妻子是善，人偷我的妻子便是恶”，这是俄国文学家高尔基描写野蛮人的道德观念时所用的话。近代的所谓“人”中，资产阶级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抱着这样的观念。他们的行动也能照着这样做去，所以为了保护他们一己利益的缘故，他们不惜用种种的方法来残害他们的同类。最近烧死萨珂与凡宰特的事件便很可证明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要忘记当萨、凡的无辜已大白于世界时，那般资产阶级还坚持说他们是罪人。法国许多要求州长减刑的人中，也有不少的人坚持说萨、凡是有罪的，不过因为他们已在死囚牢中过了六年的苦痛生活，为人道计，应该要求州长把他们的死刑减轻为无期徒刑！人道！人道！你难道竟能把两个无罪的人诬为谋杀犯，而要把他们判永远监禁么？）这可见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和野蛮人及下等动物的一样。“他们应该摒除在人类之外的。”只有不愿做资产阶级的奴隶的无产阶级才是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知道做人的道路，正向着做人的路上走罢了。克鲁泡特金所说的“人”便是指生在将来社会中的人，也就是指现在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无产阶级中已觉悟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不是只为无政府主义者写的，是为无产阶级写的，也就是为“人”写的。

从上面的话我们可明白，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从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靠不住的。自然我们不能

否认说由贵族出身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不是很好的无政府党，但我们要记着这只是很少的例外，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巴枯宁自己曾说过："无论何人如生长、教育于资产阶级的社会，苟真欲抛弃原有地位而为工人的友伴，则必须与原来的生活以及资产阶级的习惯思想等完全脱离关系，并且还应该把它们当作仇敌，而与之宣战。"所以一个人虽出身资产阶级，只要他能脱离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关系，而跑到无产阶级的阵营来，则他已不能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了。反之若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的习惯、思想等，则他虽口口声声自称是无产阶级，也是靠不住的；至于出身无产阶级想去做资产阶级中的人，竟不惜卖掉他的阶级观念的那一类的"汉奸"(现在欧美的政界中这类的人倒也不少)也将要和资产阶级同归于尽。在未来社会中他们是不能存在的。

我并不愿挑拨阶级间的恶感，我也怕见人流血，但我不能不说那快要来的事实。只要资产阶级没有真正的觉悟，只要他们还继续用武力来维持着这现社会，那么在最近的将来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一定不能免的，流血的惨剧也是免不掉的。而且我还要说那挑拨阶级的恶感的不是我们，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现在的情势谁都明白；谁都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战略只是防御的；总是资产阶级先挑战，无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才不得不来反抗。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起见，无产阶级才不得不来革命。所以我们可以预料现社会多维持一日，未来的阶级斗争便愈见厉害。资产阶级是在"自掘坟墓"的。

我自己也是出身资产阶级，就在现在也不能把资产阶级的习惯完全除掉。并不是我自己不愿，是习惯太深，一时很难铲除尽净，无意中常流露出来。我承认这是不对，但我现在总是在努力"改过"！我因为见到目前的危机，知道将来的事实，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感化，才极力来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过是知道自己的罪恶，来努力改悔罢了；明白时代的趋势，顺着它而行动罢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资产阶级的批评是公允的。

以上的话不过证明君毅所研究出来的第一个原因是不错的。关于第二个原因，因这封信已写了六页，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下次再谈罢。

黑　浪 28日。

法　　律*

——“穷人的话”之二

一

提起法律两个字真使我不寒而栗！我并不是怕什么刑律第几章第几条；什么死刑，无期徒刑，几等有期徒刑。我也不怕有人拿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我怕的是那两个染满了无数冤鬼的血腥的字。难道你不看见这两个鲜血淋漓的字么？实在，这两个字已不知害死若干人了。

我不是一个法学家，我又不是一个学者，我不过是一个穷人。因此我没有时间去研究法律的起原和功用，也不配写几本大书来解释它，赞美它。我在这里只说从我们一般穷人眼里所看出的法律是什么样子罢了。

说老实话，法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也弄不清楚，我们穷人既没有时间和金钱进法政学校去学习法律，也没有程度去翻阅解释法律的厚书，那么我们只得自认是愚昧无知了。

我第一次知道法律的时候，就是我的父亲病在床上，睡了几天，我的母亲坐在床边哭着。我向他们讨食物吃，我的母亲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署名李冷。

对我摇着头，她说："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说："隔壁大饼店里正有许多新鲜的大饼，等我去拿几个来罢!"我的小心里充满了快乐，正预备跑出去，我的母亲连忙阻止着我："儿呵!这是犯法的事,做不得的!"这时候我才知道法律这个魔王是不许拿新鲜的大饼给穷人吃,宁肯看他们饿死。

有一次我看见邻家的孩子满身绸缎，在挂着破衣的我面前夸耀,我回到家里问我母亲要新衣穿。她望着我哭。我说："大街上的店里不是堆满了绫罗绸缎么?"母亲又说："这是拿不得的,犯法的事呵!"我又知道法律是不许穷人有衣服穿的!

我看见邻家的孩子进学堂多么荣耀，我告诉母亲说，我明天也要进学校了。母亲说："不缴学费的孩子是不许进学校的。"我知道法律又不许穷人的孩子读书了。

最后我的父亲死了。他是短命死的。他病了睡在床上不吃药,也不请医生看。我又问母亲这是什么缘故,她说："请医生买药不付钱是犯法的事。"于是我知道法律是要穷人死的。

过后我又明白了许多犯法的事，我于是恍然大悟：所谓"法律"者,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吃人魔王,一切"不平之事"的主持者。人世间的一切罪恶都是法律造出来的!从此我便立誓要做法律的大仇敌!

二

我也听过有人说法律是如何好，如何不可废。说这些话的人不是"家财万贯"的大地主和资本家，便是"身居高位"的

官僚。他们的话也是不错的。法律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使他们有"家财万贯"，或是"身居高位"，于是大多数人便不得不到了"贫无立锥之地"，"为奴为隶作人牛马"的地步了。

难道大多数的人都甘愿作牛马，做奴隶，饿死冻死么？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拥护这法律呢？

有人说法律是保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的。我们来看什么是现社会的秩序呢？

少数人压迫、掠夺、奴使多数人；少数人全不作工、终日游玩、穷奢极欲，多数人终日作工、颠沛流离、困顿而死。——这是现社会的秩序。

战祸连年，民不聊生，军阀暴虐，土匪横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与人战，国与国战，阶级与阶级战。——这是现社会的秩序。

妇女们卖身养活她的家庭，幼童被逼到工厂里作工，以致夭死；男子们工作过度，像狗一般地死在贫民窟里。——这便是现社会的秩序。

这样的秩序还值得保护么？

有些人开口是社会的安宁，闭口也是社会的安宁。他们说，若无法律则强盗杀人的事件无法制止，那么社会便不成其为社会了。然而我们先问一问为什么人要去杀人，要去做强盗？这是法律逼他去做的。因为法律保障富人来压迫穷人，法律不许穷人有饮食吃喝，不许穷人有衣服穿著。穷人中有一部分强悍的人，他们为饥寒所迫便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偷去盗，去抢去劫，有时甚至去杀人。他们明白这是做不得的，然

而却不能不做。做强盗有时或可不死，不做强盗却不免要饿死。存着这种心理，他们便甘愿去冒险了。杀人的原因甚多，（有因财，有因色，有因仇，有因酒……）但这都是由社会的不和谐所致；要是万人安乐的社会实现了，大家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谁还肯去杀人呢？至于强盗事件，因为那时万物为万人所有，大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谁还有去抢劫偷盗之必要呢？然而法律偏偏要维持现在这个不和谐的社会，拚命阻止万人安乐的社会的实现，拚命杀戮囚禁那般改造社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律便是强盗杀人的事的唯一制造者。

有人说法律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性命的。然而我们穷人没有财产，至于说到性命，法律说没有钱的人是不许穿衣吃饭、该冻死饿死的。可见法律倒是戕害穷人的性命的东西。

三

我们姑且昧了良心说法律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再看法律对于它所认为的“罪人”的处罚。第一，死刑：杀、剐、绞、钉十字架、枪毙、烧死、电椅等等；第二，徒刑：什么终身监禁，一等至五等有期徒刑等等。死刑者，极野蛮极残酷的复仇举动也；监狱者，人间地狱之代名词也；法律之面子至少扫地尽矣。

而且监狱是罪犯的模范制造厂，监狱的生活非但不能使罪犯变好，反而使他们更加变坏。大多数人一旦入了监狱，一生便与监狱为缘，永远享不到人生幸福。（关于监狱，我以后在另一文里再来说。）

四

法律是少数人制定的(不管是国会也好,或……也好),司法的人是职业的,就是说这些人以定人死刑、判人徒刑、杀人剐人(说也奇怪,专门杀人的人倒不算犯罪)、监禁人们为职业的。他们这一般人有多厚的脸皮好意思来冒充为我们推举出来的代表?这是为着我们的利益么?不。立法的人都是富人,法官等也是富人,那么,无怪他们要保护富人了。于此可见,法律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我们不要它!

五

我还要来说,法律是一个欺骗的托辞,便是在法律的名义下,那般司法的法官还要枉法。有的法官受了诉讼人的贿,便故意开脱所谓"有罪的人",冤害无罪的人。有的法官由于自己的偏见故入人罪,有的法官便连他们自已的法律也不顾了,全依着个人的意思去判定人罪。在中国在外国都是一样。我有一个亲戚,他在做律师,他办理的案件我都知道。有一次某一个人犯了八个死罪,他明明杀过人的,然而靠着我的亲戚的辩才,他居然得了无罪的判决。有一次,一件财产诉讼案件,这方面本来有正当理由的,但因对方向法官行贿便败诉了。

支加哥无政府党人案件(见本刊五、六期)正足以证明法官之受贿。萨珂与凡宰特事件更足以证明法官之枉法。谁都

知道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法庭方面仅有五个证人证明萨珂有罪，同时却有三十二个证人证明他是无罪的。凡宰特有三十一个证人证明他无罪，而法庭方面的证人仅有三个。而且法庭方面的证人自己的供词前后不符，有的是患歇斯特里的妇人，有的是娼妓，有的是小偷，有的是谎言者，然而法官便根据这几个人(不要忘记这几个人是被收买来做证人的)的话，判决了两个无罪的人的死刑。不管全世界成千成万人的反对，法律终于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把萨珂与凡宰特烧死了。萨珂与凡宰特事件不过是许多枉法杀人的事件中的一件而已。许多年来死在法律的名义下的冤鬼正不知有若干哩！于此可见，所谓是非曲直都是假话。法律者，一切罪恶之制造机器也。

答诬我者书*

读了《民锋》月刊第二卷第六期吕千的文章与梅梅的杂感，使我感到深深的愤怒。一个人的意见本来不一定就是对的，他人的批评乃是我们的良师，而且是应该欢迎的。然而像那样不在理论上讨论，但拿些含有恶意的语句来诬陷三个同志——三个纯洁的同志(我自己敢这样说)的所谓批评，却使人不能明白其用意之所在了。

我自己敢声明我从来不曾为着生活的问题与任何人妥协过一次，我与一切的政党都没有发生过关系。我除了向家里要钱或译书卖钱外，不曾拿过任何人一个钱。我的行为自信是光明磊落的，没有口里所说如彼而实际所行如此的事。所以我对于梅梅所骂我(所诬我的话)的话，敢恭恭敬敬的璧还。

我与惠林、君毅所作的三篇讨论实际的文章的由来，我现在在此地来说一说。这已是一年前的旧事了。那时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的缘故来法国，离开了正发生革命的中国，这时候我心里的苦痛在一个真实无政府主义者是容易明白的。这种心情就引起了我的讨论实际问题的兴味，我和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十期。署名芾甘。

林、君毅长期讨论的结果，就产生了三篇文章。惠林的一篇和君毅的一篇，意见是正反对的：君毅赞成名义上加入国民党去做解放民众的工作（并不做国民党的工作），惠林极反对，他只主张加入中国革命运动去宣传无政府主义。我呢，我主张中国革命运动是民众的，而非国民党的，不过国民党是领袖着民众运动罢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加入一切民众运动中，把它引到无政府主义的路上，不应该站在旁边乱骂，让国民党（这所谓国民党并包含着共产党在内）去包办民众运动。我又声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我不赞成，我并主张在理论上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文章做好，又经旅法的各同志看过并且讨论修改过几次后，就与《民钟》月刊寄去了。不知过了若干的时候都没有得着中国的消息，忽然在一天下午中国的信来了：《民钟》月刊的编辑震天，放下了《民钟》，去做当时新出版的《革命》周刊的编辑去了，而且中国同志加入国民党的倒也不少。

我们当初寄稿的时候，本来就去信说明若此文登出易引起人的误解，不登亦可。这个意外的消息之来，就使得我们决定去信叫上海同志不要发表我们的文章，而且我个人读了《革命》周刊第一期后，就在《平等》上发表几篇反对的短评（因为我记起吕千他们曾责我不应该用一个名字在《民钟》上发表许多文章，所以这些短评的署名是不同的）。君毅在国民党大杀共产党的时候也做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此时若不脱离便是罪恶，这时候《民锋》第二卷第三期上发现了“就只是在这一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是可以去参加（指国民革命）的”。至此我们坚确的相信我们的文章绝对不

与世人相见(我在一封给钟时的信上也说过这件事)。

至于我们的文章之被印为小册子，直到读了《民锋》六期上吕千与梅梅的文章后我才知道。前一期《民锋》上黑囚批评我的文章(他的态度很好，只是不明白这些文章写成于何时，故不免有误解的地方)我虽然早看到了，但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们的原稿而写的。至于在我们自己主张不发表此文之后而不通知我们，居然就私自印成小册子，这种举动无非是想利用我们的文章来图私利罢了。我借此机会声明我反对这本小册子之出版。

从以上的叙述，就可知道吕千与梅梅的话是全无根据的了。我既从不曾主张加入过国民党，从不曾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哪里还会有刊小册子来骗你们的心思。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因此。

我自己相信我的文章内没有一点违反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我自己虽反对此文之发表，然而我至今还相信我是不错的。你就杀了我的头，我也相信我和自巴枯宁以来直到高德曼诸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并不相反的。我将在我所计划写的一系列的无政府主义者详细评传(巴枯宁、邵可侣、克鲁泡特金、莫斯特、马拉铁斯达、梅晓若、高德曼等等，各一二册不等)中发挥出来。现在呢，我希望吕千及梅梅指出我在哪一点违反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我特别求吕千君告诉我在哪一点"枪毙无政府主义"，更希望他把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研究一

下，以便知道谁“阻碍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我并且还要说我写此文的动机还是深受着高德曼的信函的影响，这也可证明我的动机是纯洁的）。

总之，吕千及梅梅都不曾在理论上纠正我的错误，只不过拿几句诬陷的话来把“妥协”与“投机”的罪名加在这三个纯洁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要抹杀他们的过去的一切，使人相信他们是已经变节到国民党里去了。事实上假若我们的生平行事能证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无的放矢”的诬陷又有什么益处呢？

至于黑囚的批评中只有一处论到我的文章，然而他如果知道我此文写成于什么时候，他就知道他所说的话与我的文章没有什么关系了。国民党未得势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然而我从未有说过帮助国民党的话。我只说俄国同志马哈诺（即吕千所说的“旅法俄国无政府团”的重要同志）想来中国帮国民党带兵打北洋军阀，我虽不曾反对，但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赞同的。

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的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时向前进的，也是我所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们。对于我，这美丽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是我的唯一光明，为了它，我虽然受尽一切的人间的痛苦，受尽世人的侮辱我也甘愿的。然而你要说这个人“枪毙了无政府主义”，说这个人“要妥协”，说这个人“真是投机性重的很”，那却

不能，你真正把你自己也侮辱了。

于此，我再慎重宣言：我永远反对国民党，我不但在过去，在现今，不曾卖掉过我的主义与任何人、任何党派妥协，在将来我也决不会的。从八年前我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一直到我将来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仅反对一切政党，反对李石曾、吴稚晖，连《革命》周报派的震天（即碧波）我也反对的。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不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是如此。至于惠林、君毅两同志，我相信他们也是如此的。

1928年4月3日。

感谢国民党人铮铮君代登广告*

中国国民党驻古巴总支部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财务部长颜铮铮君，在该总支部的机关报《正义特刊》上说："美洲平社印行的《我的国民党观》是无政府党人著的，古巴中国国民党人曾读过该书者很多。既读过该书，近日的国民党又弄到如此不像样，就不免受其影响，对于国民党起了根本的怀疑。我见有数位同志因读过该书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我见其势力如此之大。……"

我们感谢铮铮君替我们登广告。

铮铮君承认"著者的态度是很好，因为完全是客观的事实的批评"，而他对于这些事实又毫不辩正，直是一一加以默认了。那么《我的国民党观》的价值经过这一个国民党重要人物的证实后，更是无可动摇的了。我们佩服铮铮君的真诚，他肯坦白的把《我的国民党观》所说的国民党的劣点一一替该党承认了。

然而他说"这些事实是民十三本党改组后的事实，对于现下已不适宜了"，其实《我的国民党观》里的一篇长序是一九二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十期，署名芾甘。

六年四月十一日写的，凡在这一天以前的事实都说到过，岂仅“民十三本党改组后的事实”而已！至于现在的事实呢？铮铮君自己已说出来了：“近日的国民党又弄到如此不像样”，可见国民党的无望，是无可讳言的了。铮铮不仅证实我们同志信爱对于国民党的死刑判决书，而且他又以该党重要人物的资格再来把国民党判决一次死刑。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真令人钦佩不置！由此我们更有了坚定的确信，敢把这本有价值的书——不仅我们承认，而且国民党人也承认的——介绍与一般读者，特别是国民党人！

同时因为铮铮君可惜《我的国民党观》没有说到近年来的事实，那么，我们愿意把《我的国民党观》的著者所著的另一本有价值的《敬告中国青年》（坎拿大华人工会出版，本社代售）介绍给他。希望他再替我们登一登广告。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答C.A.同志的第一信

为无政府奋斗究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

——凡宰特

假若你怪我很久不曾答复你底来信，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的缘故，我底沈默证明出来我是要给我供献一个慎重的答复。而且我在这反动的时期，在这苦痛的生活中，怀着一个苦楚的心，抑下了奔腾的血潮，以一个冷静的头脑所观察所思索得来的，并没有一点与我几年来所相信的主义冲突的地方。我不但不曾像那一般中途变节的人那样，发现了什么新的道路，违背了自己底真正信仰，而去做自己所反对的事，以求苟且生存于社会，反而我在这时代底前进中愈看出了我所认识的真理是不错的，我所走的道路是不错的。如果我能死一百次，又复活一百次，我仍要走现在所走的道路，我仍要做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既然又如此地将自己底思想和行为判断一番，评价一番，我明白我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平等》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黑浪。

不曾欺骗了我自己，我不曾卖掉过我底信仰，而且我还继续地生存于这浊流滔滔的社会中，并不曾玷污过我至爱的理想，那么我觉得我可以不带点愧色地立在你底面前，以同志般的真诚，兄弟般的友爱，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以我所确实感到而且想说的话语。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你这样地问了。在你底问话中我看出你近来的苦闷，你近来的消极，我知道你对于多年的苦斗已经厌倦了，对于正义胜利之信仰已开始怀疑了。你接着又问道："这样的情形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终局呢？"亲爱的同志，相信我对于第一个问话，我底坚决的答复是："照着我们底信仰所要我们怎样做的做去"；对于第二个呢，"这样的情形总有一天会终局的"。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呢？"这一个疑问把我们引到一个人生底大舞台前面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立在一个浊流滔滔的大海岸边了。我们还有什么路走呢？只有跳上舞台，跳入海里。然而我们在跳上、跳入之先，我们应该以透彻的头脑来把这舞台、这大海观察一下，然后才以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定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毅力投身于其中。在那里我们便可立得定脚跟，不会随世飘浮了。

我们现在且来把这舞台这大海——中国的社会——观察一番罢。不过在我们作这个观察之先，我要告诉你：几十年前在另一个国度里另一代青年怎样得到了这同样问题底解答的故事。这对于我们是一面明镜，我们要从这上面照出自己底面影来。

其实俄国民众主义底创始者巧尔里雪夫斯基在一八六三年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了。他在《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部小说内，所下的答案便是一代青年(旧虚无主义者)底理想之"三位一体"——(一)意志之自由；(二)有知识的女性同伴；(三)适合于主义之职业。这个理想竟渐次实现了。

我现在正以血和泪来写《俄国革命故事》，关于这个题目，我愿意从我所写的书底第七章《毕沙列夫与虚无主义》里引出下面的话：

> ……总之，家庭底羁绊与习俗底束缚皆被打破了。虚无主义已大获全胜了。
>
> "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旧虚无主义者至此已心满意足，不再前进了。巧氏底小说对于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有一天从远方来了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客人，他来拜访他底先生。他以热烈的语调问那旧虚无主义者道："那么以后又怎样做呢？"老主人底答复是："我自己是幸福的了。"充满了热血的青年客人听了这样的答语不禁愤激起来了，又说出比刀剑还要锋利的话："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知道。然而要是你晓得你底乡土的同胞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你还能够是幸福的么？他们快要饿死了，政府夺去了他们所有的钱，强迫他们在街上去乞求一点面包皮。他们底苦痛诉之于人，人不顾；诉之于天，天也不闻。号寒没人给之以衣；啼饥无人给之以食。人生并非无情的，但在他们看来，却不能不说是无情的了。也

许你不知道这个罢；不然你怎么能够享乐呢？怎么能够不去替他们做点事呢？你不是在数年前曾说过你愿意"为人类幸福而奋斗"么？

巴扎洛夫式的旧虚无主义者毕沙列夫等对于这个青年底质问是无法答复的，因此旧虚无主义便不得走上死亡之路了。而那个青年呢，他将抱着满腔悲愤而去了，从此他要用失望的语调来反复地自问道："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然而时节来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发生了。在这一个俄国青年面前现出了一幅图画：一个大的城市为着一个伟大的理想而起了革命了。这个青年用了全副精神注视着法国赛纳河岸上正演着的惊天动地的活剧。他看见洪水一般流着的血潮；他听见在大路上被屠杀的妇人、小孩底沉痛的哭声。他们是为着什么而死的呢？为着什么而哭泣的呢？为的是工人底解放；为的是伟大的社会理想。

同时他又回过头来看俄国。好像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向他说：把你底眼光转到田塍上罢，你且看这一个人。这是一个农夫，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据说在俄国已再没有奴隶了。你再看清楚一点！这个自由的人并不是在劳动或播种。他在吞食土块。固然人把田地给了他了；但是他没有耕田的耒耜和锄锹，他也没有牛马，因此他无法使土地肥腴。他没有吃的东西，饿得急了，只得吞食土块！要是他在土里寻出了树根，他还要留下带回家去给那个在

破屋中等待着的妻子和小孩们。看看农民罢：他们底全生活充满了忧愁受苦和虐待。他们苦于饥饿，疲于劳动，永为特权阶级底奴隶，终日无休息，无慰安，无希望，无快乐地劳苦着；政府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知的状态之下，所有的人都掠夺他们，践踏他们，没有一个人援手救他们的。

热泪从这个青年底眼里流出来了，他底心苦痛着："要是我真受着苦，要是我真在痛哭，这是由于那个苦痛着的俄罗斯老母亲的缘故，她眼看着她底孩子们饥寒困苦地死在她底枯瘦的怀中。俄罗斯呵，我在哀悼你！"

然而徒然哀悼是无用的，于是这个青年便起来了，他现在得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他所下的答案是："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不得不靠刀剑的力量。"他找到了他应该做的工作——"到民间去"，他便向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告诉农民怎样才能够想象他们自己，怎样才可以使他们得着幸福。为着这可怜的受苦者——只能痛哭的农民们，这青年底心像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了。他底额上现出了红光，他底眼里喷出了烈焰。他于是在心里立下了严重的誓愿：愿牺牲他底生命，他底精力，他底一切来解放那般匍匐于特权阶级之下受着束缚和虐待的奴隶们；他知道那一类人曾流了生命之血来使得他——一个特权阶级的后代过着安乐的生活，能够安心读书增长知识。

于是这青年抱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抛掉那烧灼他底

身体的锦衣，弃却那梗塞他咽喉的美食，身着褴褛的衣服，足穿农民底木鞋，离开了华丽的家庭，辞别了亲爱的父母，走上了“到民间去”的旅途。在那里他以一个贵族底后裔而加入农民底队伍，或入山间的僻地，或到田畔风暖之区，和农民把锄推犁，共尝甘苦，在偷闲吸烟的瞬间便把社会主义来宣传。只为了这个，这一类的青年就得了死刑与流放罪之判决。

“到民间去”的运动开始以后，又如何由宣传而进到恐怖主义，而进到皇帝之暗杀，而进到群众暴动，这其间的经过还需要一管调了血和泪的笔来写出的。一个十五岁的英国女孩说得好：“在这些男女底面前我们发觉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我在这里是不再叙述下去了。然而就从已叙述了的一段中，我们也可得到一个教训，一副兴奋剂了。

俄国青年所找到的答复也就是我们现代青年所应当找到的答复：“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为人民解放这一个伟大理想奋斗”，俄国青年在这一句话中找到了他们底生命工作，我们中国青年底生命工作也只能存在于这句话中。

现在鸡已三唱，天色已由深黑变为鱼肚色，快要变成白日的光明了。我见着光明征服黑暗的事实，我底心更是强健，我底信仰更是坚定！我相信终有一天光明要统治全世界！然而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在第二封信里，我们再把注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战场的眼光移到现今的中国去罢！

EN LA MALLUMA NOKTO*

Al mia amiko kaj samideano germana Ernest Liebetrau

Originalo de Bakin (巴金)

Nokto. La scenejo estas tute malluma.

Oni atŭdas ke iu preterpasas en la mallumo.

Frato kaj fratino.

Fratino—Kiel estas la vojo? Ankoraŭ malproksime?

Frato—Mi ne scias!

Fratino—Kiel malluma la nokto estas! Mi povas vidi nenion.

Frato—Mi ankaŭ.

Fratino—Antaŭ mi la mallumo estas pli densa kaj pli profunda.

Frato—Eble.Sed ne timu, franjo.

Fratino—Ŝtonoj malhelpas mian vojon.

Frato—Forpiedbatu ilin.

Fratino—Miaj piedoj doloras.

Frato—Ne zorgu pri ili.

Fratino—Ne zorgu pri ili?

Frato—Ne.

(Momenta Silento)

Fratino—Kio estas la voĉo?

Frato—Mi ne aŭdas.

---

* 本篇(《在黑暗中》)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至十二月《绿光》(世界语刊物)第五卷第十至十二期合刊。译文见于《全集》第十九卷"附录"。

Fratino—Ne aŭdas?
Sed ĝi aŭdiĝas tedege.

Frato—Ne zorgu pri tio, franjo, nur iru antaŭen.

Fratino—Sed ĝi aŭdiĝas je miaj oreloj!

Frato—Kovru la orelojn per viaj manoj.

Fratino—Sed la malagrabla voĉo ankoraŭ aŭdiĝas.

Frato—Ne estas grave, franjo. Enirante la luman mondon, vi ne plu aŭdos ĉiun malagrablan voĉon.

(Momenta Silento)

Fratino—Ho! Kio estas tio?

Frato—Kion?

Fratino—Ŝajne estas kadavro.

Frato—Kadavro?

Fratino—Jes, fraĉjo. Kiel timiga!

Frato—Ne zorgu pri ĝi. Nur iru rapide.

Fratino—Sed ĝi malhelpas mian vojon!

Frato—Surpaŝu ĝin!

Fratino—Ne, mi ne volas.

Frato—Pro kio?

Fratino—Ĉar li estas ankaŭ la serĉanto del'Lumo kiel mi!

Frato—Tamen

Fratino—Fraĉjo, helpu min transigi la kadavron aliloken.

Frato—Bone.

(Momenta Silento)

Frato—Iru pli rapide, ĉar la vojo estas longa.

Fratino—Ho ve!

Frato—Kion?

Fratino—Mi falas sur la teron.

Frato—Lasu min starigi vin.

Fratino—......

Frato—Kie estas via mano?

Fratino—Tie ĉi.

Frato—Ho! via mano estas malseka.

Fratino—Jes.

Frato—Estas sango.

Fratino—Eble!

Frato—Lasu min sekigi ĝin per mia vesto.

Fratino—Dankon!

(Momenta Silento)

Fratino—Blovas ventego.

Frato—Ne estas grave.

Fratino — Estas multaj sableroj.

Frato—Ne zorgu pri ili.

Fratino—Ho, sablero enfalas en mian okulon.

Frato—Elprenu ĝin.

Fratino—Larmoj verŝiĝas.

Frato—Lasu ilin verŝiĝi.

Fratino—Kiel estas vojo?

Frato—Ankoraŭ malproksime.

Fratino—Eble ni neniam atingos la verdan stelon.

Frato—Sed malgraŭ ĉio ni devas iri antaŭen.

Fratino—Mi memoras

Frato—Ne, franjo, ni devas ĉion forgesi.

Fratino—Sed mia koro doloras pro la soleco kaj malespero.

Frato—La verda stelo atendos nin je la fino de la vojo.

Fratino—Oni diris ke la luma mondo estas tiel belega.

Frato—Kiel la belega sonĝo.

Fratino—Mi memoras ke nur en sonĝo mi estis feliĉa.

Frato—Sed en la luma mondo, oni estos pli feliĉa.

Fratino—Eble ni ne havas la feliĉon vivi en la luma mondo.

Frato—Sed nia devo estas pli granda ol ni mem.

Fratino—Por kiu ni devas serĉi la verdan stelon?

Frato—Por ĉiuj kiuj kuŝas en la mallumo.

Fratino—Sed ili ne volas la verdan stelon!

Frato—Ĉar kuŝinte sennombrajn jarojn en la mallumo, nun ili alkutimiĝas al la mallumo, kaj eĉ timas stariĝi kaj vidi la lumon! Ni ne devas ilin malami sed kompati. Mi kredas ke ili stariĝos kiam la verda stelo brilegos sur la ĉielo kaj dispelos la mallumon per sia eterna brilo.

Fratino—Kiel bela sonĝo!

Frato—Sed tio ne estas sonĝo. La tago venos, kiam la verda stelo brilegas tra la mondo, kaj tuta homaro vivos frate kaj pace kiel granda familio.

Fratino—Mi perdas la paciencon. La vojo estas longa kaj ni estas.
tute solecaj. Travojaĝinte tiel longan vojon ni eĉ ne aŭdis iun homan voĉon.
(Ploretas.)

(Longa Silento.)

Frato—Vidu, franjo!

Fratino—Kion?

Frato—Verda stelo! verda lumo!

Fratino—Kie? Mi ne vidas.

(Malproksime je la horizonto briletas verda stelo kies brilo pli kaj pli fortiĝas en la malluma ĉielo.)

Fratino—Jes, mi vidas, Fraĉjo!

Frato—Kion?

Fratino—Mi estas ĝoja.

Frato—Mi estas ankaŭ ĝoja.

Fratino—Estas vere ke post la verda stelo troviĝas la luma mondo belega kiel sonĝo?

Frato—Jes, estas vere.

Fratino—Ni iru pli rapide al la verda stelo.

(fino)

一九二九年

无的放矢*

凡是一个主义者，思想、言论、行动三者必须一致。对于主义，只是想想，只是谈谈而不能见诸行动，或者行动和思想、言论相反，决不能认为一主义者，明白地说，不能认为一纯粹的真实的主义者。把主义看做学术一样，加以精深的研究，即使对于主义的发展，很有帮助，也只能认为一个主义的研究者，而不能认为是一主义者。所谓主义者，是包含思想、言论、行动三者而言的。

吴稚晖、李石曾，以前对于无政府主义，曾经做过介绍的工作。中国首先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不能不推他们在巴黎刊行的《新世纪》(约在清光绪二十五年)上而所发表的文章。可是近几年来，他们是国民党党员；不仅是党员，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不仅是国民党党员，吴稚晖且做过南京政府政治部长；李石曾虽没有在南京政府中担任正式职务，然而他是时和政府中人发生关系，干直接关于政府的事。这是共见共闻的事实。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时候，据说有人请克鲁泡特金做教育总长，克氏说我宁愿做一个鞋匠。这才是真正的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春风。

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已经知道政府是万恶的，自己又跑进政府里面去，三尺童子，也会知道这是如何的矛盾的。世间哪有置身于政府政党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人的思想、行动，都各有自由。吴、李一面虽为国民党尽力，一面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表同情于无政府主义者，这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是若说他们是一无政府主义者，是一纯粹的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但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决不认以为对，就是只懂得无政府三字的人，也知其不可通。其实，在现在，如果和人谈论起无政府主义来，有不少的人都以为它的理想是很好，它是大家所喜欢的；可以说，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表同情于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少数。但是他们有的以为高远难行，有的以为非当务之急，于是在行动上都干别的事去，对于无政府主义，只是随便想想谈谈就是了。他们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敌人，但是也决不能就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

可是一些不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人们，只以攻击吴、李为攻击无政府主义的不二法门。即使吴、李是纯粹的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真的有可以被攻击之处，被攻击的也只是他们二人，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无关，与无政府主义无关。何况他们明明是国民党党员，攻击他们者也明明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员呢？这样的攻击真叫做无的放矢了。

《断头台上》①（广告）

本书是各国革命党人殉道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曾被编入《革命的先驱》一书内。现在《革命的先驱》已经卖完，本店特请著者将《革命的先驱》中关于革命的殉道者的文章抽出加以删改和扩充，编成此书，内含《断头台上》与《自由血》两部分，约四百页。新加入的文章有《断头台上》后半部，《苏菲亚评传》、《死者与生者》、《殉道者的遗书》，都是未发表过的作品。尚有附录一篇《恐怖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也是新加入的。著者的文字，有人说是"充满了血和泪的"，而且在叙述方面，带有深厚的文学意味。可作革命文学读，可作革命运动史读，篇首附有殉道者照片十八幅，都是著者几年来费了苦心搜集起来的，尤为可贵。未读过《革命的先驱》者不可不读，而读过《革命的先驱》者尤不可不读。

① 芾甘著。一九二九年一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革命的先驱》①（广告）

革命不是为解决个人的面包问题，革命者不是为个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为的解决全人类的面包问题，革命者是将他的一生贡献于革命，这简直成为定论了。但是现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的以为革命是为的个人，因之在革命的进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的感伤起来，诅咒革命，歌颂个人主义与感伤主义之伟大。本书特将革命先驱者对于革命的努力和献身革命场中饱尝的痛苦与其崇高牺牲的精神和盘托出，革命的青年读了此书不流几滴同情之泪，也算忍人了。

平装书已售完，精装本定价一元二角。

① 署自由丛书社。一九二八年五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俄国虚无党人运动史》[1]（广告）

这是世界名著《地底下的俄罗斯》的中译本，这部书的名字知道的人也不少了。刺伤麦孙采夫将军的虚无党人司特普尼克是一个血性男儿。他的文章可当得悲壮两字的评语。他的书可以使人流泪，同时又可以使人兴奋。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读了他的书也不得不感动；就是顽固的反动分子读了他的书，也不得不同情于革命党的。司特普尼克在临死前数月曾在一个姑娘的画册上写道："对于你自己要忠实，你就可免掉良心的痛楚，良心的痛楚乃是人生的最大不幸。"据丹麦大批评家勃朗兑司说，司特普尼克是没有这种良心的痛楚的。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全书分绪论、革命的侧面、革命的片断、革命旅行记、结论几部分，凡革命思潮、革命宣传、革命人物、革命党暗杀沙皇的计划、革命党人的逃狱、革命党人的殉道，本书皆有详细的描写。可作小说读，可作历史读。译者根据英、法、日三种译本译出，今年三月内出书。

---

① 司特普尼克著，李芾甘译。一九二九年八月上海启智书局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卖鱼者的生涯》[①]（广告）

萨珂、凡宰特的不白之冤已经洗清了。那么他们两个便是为同胞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殉道者了。这两个有着黄金般的心的人底生涯，我们是不可不知道的。现在凡宰特的自叙传出版了。这篇小小的自叙传乃是血和泪的结晶，据译者说，他是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译成此书的，读的人未有不被感动的。有人曾说过"谁相信写这篇文章的手曾经染过他人的血？"因为这是天地间之至文，非具有伟大的心灵的人写不出来的。篇首有凡宰特和他们的妹妹在死囚牢中诀别的照相，情景非常惨痛。芾甘译。

---

① 凡宰特著，芾甘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篇）》[1]（广告）

这本书是克鲁泡特金的一部遗书。他的目的是想继孔德、斯宾塞、巴枯宁未竟之志，创造一种人类的，科学的综合哲学。这个我们只要读他的《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安那其主义者的道德》和《斯宾塞传》几篇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可惜他的目的没有达到，早就死了，真恨事！不过他自己虽然没有完成这部宏著，其中的一切材料，一切规模却早已立了。全书本分二部，第一部专论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发展，第二部说明实在论的人生哲学的基础与其目的。第一部在他死去不久的时候，就由他友人莱伯代甫整理在现在的题目下出版了。现代世界各国都有译本，惟有中国尚付缺如。现在芾甘根据英、法、日、世界语、西班牙五种本子译了出来。因为篇幅过长，分上下两篇出书，上篇作为克氏全集第四卷已出书，上海江湾自由书店发行。

① 克鲁泡特金著，芾甘译。一九二八年九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1](广告)

读过上篇的人当然知道下篇的价值了。下篇共含有八章，节目如下：第八章：从霍布士到斯宾诺沙与洛克底人生哲学之进化；第九章：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法国道德学说；第十章：沙甫慈伯利到亚丹斯密底感情人生哲学；第十一章：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底道德哲学；第十二章：十九世纪初期之道德学说；第十三章：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人生哲学；第十四章：斯宾塞之道德学说；第十五章：居友之人生哲学；第十六章：结论。此外尚有译者所编“索引”等，准于今年五月内出版。

---

① 克鲁泡特金著，芾甘译。一九二九年七月自由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无政府主义原理*

——为克鲁泡特金八年祭而作

无政府主义之出发点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否定国家，否定个人占据社会财富，否定一切的强权。还可以说把建立在不平等、不公道、压制及自利主义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整个地加以否定，把社会上所认为天经地义的旧宗教旧信条根本地加以否定，总之一切不合理的、旧的，已经属于进化的较低级的东西都在否定之列。无政府主义即以这种否定开始而以种种的形式在历代的平民运动中表现出来。

而第一个使无政府主义成为完全的体系完成了无政府党的纲领的人乃是巴枯宁及其信从者。自然高德文、蒲鲁东已经具有了无政府的思想，蒲鲁东还是第一个公然高呼"财产是贼物"的人，然而事实上蒲鲁东的主张不免有点含糊，他的国民银行也和近代无政府主义差得远，所以他一生很难得人了解（见赫尔岑书），他的书也被人称为工人阶级的难懂的圣经（见波斯格的国际工人协会），著作虽多而翻译成外国文的却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黑浪。

很少。在近代无政府主义战士中蒲鲁东是很少被人提及的了。真正值得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还是巴枯宁。

巴枯宁一派之能完成无政府主义体系者，在顺的方面是得着蒲鲁东的自由联合主义之鼓励 在逆的方面得着马克思的中央集权主义之刺载。巴枯宁派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之初，主张还不十分显明，到了后来在第一个国际中强权与自由之两种倾向才逐渐显著，彼此对抗发展，遂形成了近世两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社会主义)。巴枯宁派退出第一国际后才正式成立无政府主义的团体。

无政府主义虽以单纯的否定为出发点，然而在斗争中是常常会走到积极的、肯定的一条路上去。在历代平民反抗强权的战斗中常常发生出自由社会之理想的萌芽来。而后来在像高德文、蒲鲁东以至于巴枯宁那样深刻的思想家，是绝对不能以单纯的否定为满足的，他们在否定之后便接着来阐明他们的肯定(即无强权的自由社会之概念，在这社会中各个人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是非常幸福)。

"不要国家"、"不要强权"，在形式上虽然只是一个否定，然而在巴枯宁他们的口里说出来，却有了一个很深的肯定的意义。这句话同时是哲学的和实际的原理，其意义乃是指明现今社会生活全体(小自个人间的日常关系大至五大洲各种族的关系)能够而且应该依据无政府的几大原理而改造过。无政府主义的几大原理为何——个人的充分的自由、集体间的自由协意以及成为社会习惯的休戚相关而已。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大的哲学思想。它实在并不只是某种

行动的动机而已，它是一大哲学原理。它是由社会事实、人类历史以及古今来进步之真正原因三者之忠实的考察，而生出来的一个总合的见解。我们要接受这种概念，必须把我们在过去和现今对于社会现象的大大小小的见解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的见解那样一起改变过。

无政府主义是我们日常斗争的一大原理。而且因为它能够把民众的深切的要求和愿望，概括出来，表现出来，所以能够成为这斗争中的一大原理。这个原理虽屡经治人阶级和官僚学者的摧残，却永远保持其寿命，而且一天天地活动起来，促成社会的进步。

无政府主义表明一个理想，就是：全世界生物和人类都具有团结的感情，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使社会进步。这理想并不是新的，自有社会以来，它便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它永远在谋改善人们的互相关系，将来有一天它是会把种种使人们互相隔阂的障碍（如国家及阶级的界限）打破，而实现人类之大团结的。

最后我们还要承认无政府主义是根据最近的科学趋势要将物理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改造过，这种工作已有许多酷爱真理的学者做过了，虽然他们在实际运动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从实际一方面来说，今日之无政府主义所负的使命已较从前的大了许多，它如今不再是工人攻击厂主、百姓攻击官吏、部下攻击首领的一个单纯的斗争了。它虽然依旧把这一

切包括在内，但它的范围却扩大了许多。

无政府主义如今乃是两大原理（即自由之原理与强权之原理）的斗争，二十世纪正是这两大原理决死战斗的时代。在这场大战中一边竖着强权的大旗，立在这旗帜下面的人数是多极了，各党各派都有；一边竖着自由的大旗，团聚在这旗帜下的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人数虽少得多，然而却得民众的暗中帮助，因为民众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强权战斗。

历年来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独力拥护着自由之原理和民众之利益以与强权的党派战斗。所有强权的党徒总是迷信强权，以为非用强权不能使人们幸福。如果他们也高叫"反抗压迫"，则他们不是仅反对别人来压迫他们，便是主张改变压迫的形式，或减轻一点压迫的苦痛。如果他们反对绞刑架，则他们主张用电椅；如果他们反对用牛筋的皮鞭来打人，则他们主张用马尾的鞭子来打人。一旦他们得势，依旧杀人如麻，压迫如故。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懂得自由，才酷爱自由。强权的党派说："没有工钱制度和饥饿，没有法官和警察，没有随便某种形式的刑罚，社会的组织是不成功的。"而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却敢公然地说："这东西决不是进化的要素，有了它们，'自由'便逐渐消灭，社会内部便失其和谐，而社会的进化便停滞了。要谋社会之最大可能的进步与乎人类之最大可能的幸福，非废除上面的那些东西，而单依据自由之原理不为功。"

自强权的党派与自由的党派明显地对抗以来，强权的党

派便感到一大危机，它看见在它的面前有一个有力的原理，这原理如果有一天被民众完全了解，就会起大革命，强权的命运便难自保，因此它便不惜极力拖住一切旧的形式来防止自由，拿旧的成见来欺骗民众，以阻挠革命的势力。

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时期中所负的责任更大了。

第一他们应该把无政府主义的原理之哲学的一方面阐明出来，把它再应用到科学上去，由此便可使得思想界起一大改变：要它来纠正历史、社会经济、哲学等等之谬误，去掉学术上的、社会上的一切成见，把本世纪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化”。克鲁泡特金后半生的工作便是这个，而且已经有了功绩了。在科学上，无政府主义的大师所得的结论和多少爱真理的科学家的结论是极近似的，或者相同的。

第二个工作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同志在做，但离完成之期还早，这就是根据无政府主义原理之实际的部分来建设无强权社会，——即以自由之原理为基础的社会。这种工作只能靠着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之逐渐发展来完成的，现在应该我们来完成这种工作了。

克鲁泡特金说得好：“这种待完成的工作之伟大，对于那个觉得有战斗的人岂不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吗？”

我们记着：“为无政府奋斗究竟是度过生活之最美丽的方法——如果这个人是值得生活的话。”（凡宰特语）

读《木偶奇遇记》*

我费了几点钟功夫把《木偶奇遇记》读完之后，我虽然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然而我也像丰子恺先生家里的孩子们那样被这奇异的故事迷住了。我本想写点"短评"或"读后感"之类的东西，但转而一想，如果照我的意思写出来，除了不满意本书之带有很浓的教训主义色彩（我以为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的）一句话外，便尽是恭维的话了。厚起脸皮来大捧特捧人人皆说好的一本书，也许会被人叱曰无聊，所以倒不如叙述一件事实证明本书的价值，又可免掉自己来献丑。倒是一举两便。

从前，大概就是一九〇五年罢。在这年三月的一家报纸上有一位华德夫人向读者们叙述了一件故事道：

> 我几天前走进了一所育婴堂。四个小孩子围着一个衣服穿得很朴素的老太太坐着。这四个小孩的年纪是从两岁到九岁。那位老太太相貌端丽，灰色的短发向后面梳去，但依然在她底宽大的额上飘舞。她在向这几个小孩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开明》第一卷第八号。署名一切。

叙述一个奇异的木偶冒险的故事。她的眼睛里充满了逸兴，她把木偶的一切事迹说得非常活灵活现，连木偶的跳舞也描写得有声有色。这四个小孩把什么都忘记了，只知道那个叙述故事的可爱的老太太，和她的迷人的故事。她说完了故事后便坐在一个矮凳子上，四个小孩围着她，她一面口里还在继续不断地说些最有趣的话，一面手里很快地摺出各种使人着魔的，可爱的形状——公鸡啦，船啦，篮子啦，木偶啦，应有尽有。几分钟以后，那三岁的小孩便在她的膝上睡熟了，小孩之征服的一件事就做得完完全全了。

这一个叙述故事的老太太非他，即著名的"俄国革命之祖母"加塞林·布烈斯科夫斯加亚夫人是也，她的一生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监狱和西伯利亚的放逐地上度过去的。今尚健在，因与俄国执政者主张不合，亡命保加利亚。去年在布拉格大做其八十五岁寿辰呢！

于此可见《木偶奇遇记》的价值了。

克鲁泡特金八年祭*

克鲁泡特金之死，使科学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文学界失去了一个光荣的作家。在我们的现代真正博学的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家是如是之少，所以失去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人，是一件非常可悲痛的事；不仅科学界文学界受了损失，全人类全世界都受了绝大的损失呢。

然而如今八年又匆匆地过去了。

只有未来的历史才会完全地尊重克氏为一个"人"，人类的伟大的友人，因为只有在将来人们才能够完全见着克氏的学说和社会理想之一切的结果。

历史会把克氏的肖像不加修饰地画与后代的人看，如像一个反抗社会不公道的人，一个为工人争自由的战士，一个无限地爱人类的人。这些在克氏的著作的每一页里，他的每一篇演说里，每一句话里，都曾明白地表现出来。他的理想是改造社会之理想。在将来的新社会中，压迫的事是不能够存在的，各人都能自由过活。只有克鲁泡特金才能够把个人间自由协意的理想，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在工人之前表现得如此有力，如此精美，如此完美。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编者。

萨珂与凡宰特是无罪的人*

在本报第一卷四期悼萨珂、凡宰特一文里，我曾说过：

> 法律果然胜利了么？无政府果然失败了么？告诉你——吃人的魔王，只要正义不死，真理不灭，法律是决不会胜利的，无政府是决不会失败的！杀几个人，烧几本书，难道就杀得死正义，烧得掉真理么？

现在事实证明出来，我的话是完全不错的，是有力量的。在萨珂、凡宰特上了电椅之后，真理果然大白于天下了。凡宰特是一个无罪的人。

原来一九一九年麻沙秋谢州布立奇瓦达地方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带着一万八千元美金去发工资，半路上遇着强盗，幸而他早有防备，把强盗打退了。第二年四月十五日南布朗垂的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和护卫在同样的情形中被强盗杀死了，抢去美金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元。

后来萨珂、凡宰特二人因政治事件被捕时，警署把这两件事推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断定说两件事必定是同样的人做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署名黑浪。

来的。然而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萨珂确实在工厂里做工，所以法庭无法把他牵连进去，只有卖鱼者凡宰特，因为证明他二十四日那一天在普立毛斯卖鱼的证人都是意大利人，而法官赛叶说意大利人的话都是靠不住的，结果便被认为此案的主犯，得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凡宰特既然犯了一件盗劫案，而这两件盗案又经人断定是同样的人犯的，那么南布朗垂强盗杀人案的凶手不消说就是他了。萨珂既然是他的同国人又兼同志，那么萨珂也是本案的一个正凶无疑了。

有了这种奇妙的推论，法庭方面便可以用三个说谎人(Dolbeare, Reed, Vangie，他们的口供不但互相矛盾，而且不合情理)的伪证，抹杀证明凡宰特无罪的三十一个证人的话了；便可以用两个谎言者(F. Deslin 和 L. Pelzer)、一个患歇斯特里病的女人(Splaine)、一个娼妓(L. Andrewo)和一个窃贼(C. Goodridge)的伪证，把三十二个到庭证明萨珂无罪的人的供词抹煞了。

这样，两个无罪的人便被送上电椅了。

然而真理是杀不死的，在萨珂、凡宰特在电椅上殉道之后，真理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布立奇瓦达盗案的正凶西尔瓦(Frank Silva)已正式上书于纽约州，承认此案是他和他的同党所犯，与凡宰特无关。他的原信甚长，我只把中间的两节引出来：

> ……他们都同意了。渐渐，大约在我走开后的十五分钟罢，我看见那车子走下来了，约在二百尺远的光景，我便说"孩儿们，车子来了，我们去罢"。……我说"我们去

罢"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车便立刻向后退了，停在街心附近。你们知道车路在街的中央，在制鞋厂付工钱的车子的后面有一辆电车。我们停车时，离制鞋厂的车子只有十五或二十尺的光景。他们都离了车子，大家叫道："停车。"制鞋厂车子上，车夫坐在前面的座位上，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坐在一边，另一个我相信是坐在银钱箱上。

我们叫"停车"的时候，那车夫并不停车，还是继续开着车前进，突然间枪弹从两面射来。我们中大部分的人都躲在离哈列街几尺远的树木或柱杆后面……突然间我听见一阵闹声。我们又听见玻璃碎声。制鞋厂的车子是再也看不见了。……

这样看来，凡宰特不是与布立奇瓦达抢案无关，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吗？然而裁判官赛叶说意大利人的话不可靠，就把许多证实凡宰特无罪的供词抹煞了，把一个无罪的人判了十五年的徒刑，又以这个罪名做旁证，把两个无罪的人送上了电椅。

法律是什么？不是杀人的利器吗？

法官是什么？不是吃人的魔王吗？

凡宰特是无罪的！

萨珂是无罪的！

强盗西尔瓦还有良心，在凡特宰死后毅然承认布立奇瓦达的抢案是自已和同党的犯罪，来洗清凡宰特的不白之冤，犹

如强盗杀人犯马德诺司还有良心，在萨珂、凡宰特二人定罪之后，毅然承认南布朗垂的强盗杀人案是自己和同党的犯罪，来救两个无罪的人的性命。

然而法官借着法律的名义却把那两个无罪的人送上了电椅。

在萨、凡案真相大白后的今天，我们还不明白法律的性质吗？还不承认无政府主义者的伟大吗？

普希金安慰在西伯利亚矿坑中的十二月党人诗和十二月党人的答诗*

在十二月党暴动失败，五个领袖受了绞刑以后，其余的同谋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坑中作苦工去了，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悲惨的记载，一代优秀的青年就这样地断送了！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受了这种殉道的精神底感动，曾作了一首诗送给冰天雪地中的十二月党之流放者。

消息

我底弟兄们！让那骄傲的坚忍，
照耀于可怖的西伯利亚，如一颗明星；
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毁你们在矿中的悲哀之工作、
你们底行为、你们底思想以及你们底心情！
而且"悲哀"底妹妹"希望"会灿烂地到临，
鼓舞你们底勇气，安慰你们底心灵；
在地中你们会听着爱之声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它到底会使你们达到自由之境。
一切的门锁都阻拦不住我们底友情，
在我底聆唱完毕的时候，她便要飞到你们底矿坑，
她要把这坑里的深夜的黑暗变成白日的光明，
她也要带来荣名与光辉给你们。
到那时粗重的镣铐将落自你们之身，
自由将为你们底大将，指引你们前进，
在它底呼声之下监狱便会成了灰烬，
你们底弟兄要把你们底军刀送还你们。

对于普希金底诗，十二月党人也写了一首回答。回答的诗较之原诗尤为动人，只恨我底译笔拙劣，不能表达出原作底深处，然而冰天雪地中作苦工的革命家底心情和精神，连我底拙笔也不能把它埋没，就在这里面，它仍将它底无所不照的光明放射出来。我们如果看过画家布鲁诺夫(K. R. Bruloff)所绘的《妻儿之梦》(在矿坑中之十二月党人福尔空斯基亲王)一幅名画，再来读下面的一首诗，我们将会感到在革命家面前我们是如何渺小的了。

十二月党人对于普希金的回答：

你底火一般热烈的七弦琴所弹出的诗调，
已达到了我们——深感你底恩惠的人——底耳边；
我们伸出手去摸索我们底军刀，
呵，可是我们只找到那粗重的镣铐在我们底面前。
然而，朋友呵，请不要怀疑我们，

我们是要骄傲地负着那恼人的铁链——我们底命运；
这铁格子门关不住我们底深邃的心，
就在现今呵我们还敢侮辱那盛怒的暴君。
我们底悲哀之工作决不会成为枉然，
看呵，从这火花里将冒出一股猛烈的火焰。
我们底俄国人民也将从长梦中惊醒，
他们要急急追随着自由之旗帜，并不怕那长夜漫漫。
我们要把我们底镣铐铸造成我们底军刀，
那不怕死的自由之神将率领起我们这一般军曹。
前进呵，我们要把所有暴君与主人一齐打倒，
那时候人民到底会走上了自由之康庄大道！

随便写几句话答复钱杏邨先生*

当马拉兄在《自由月刊》第三期上替我登出这篇文章的预告时，我本打算写一篇长的论文把托尔斯太底思想分析一下，让钱先生看看他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然而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有几个某大学的学生预备帮助钱杏邨来骂我，因此我便不得不改变了计画，把我要说的话留着不说，且等他们骂得够了，再出来辩不迟。现在呢只随便写几句话来答复钱先生。

我很惭愧自己的见闻浅陋，不但不知道钱杏邨先生是“现代文坛上最有力的批评家”，而且连在现代文坛上有一位署名钱杏邨的人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写批评文章一件事，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事实是这样：某一天我遇见友人L君，他说：“钱杏邨在《海风周报》上骂你，你可以去买份来看看。”他似乎又恐怕我不知道钱杏邨是什么样的人，便又附加了一句道：“钱杏邨便是专门捧蒋光X的。”原来如此！蒋先生底诗我是读过的，什么“齐燮元拉了小百姓”，什么“听说上海大学被东洋兵占了去，听说我底学生被称为过激”，至今还记得很熟。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蒋先生底小说也读过几篇。从这一点看来，我也就知道钱先生是什么样的批评家了。

很不愿意的花了几角钱，买了《海风周报》，买了《力的文艺》，买了《暴风雨的前夜》。读的结果很使我失望，我怜悯我底冤枉花出去的几角钱。不过《暴风雨的前夜》一本小小的书我却是喜欢的。

钱先生在《力的文艺·自序》底占了两页篇幅的"附记"里，喊了四次"巴金先生！"，而他所骂我的话，也不过是"不但把列宁的话送给了日本的大学教授，而且把脱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当做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经典"。其实钱先生如果还懂得中国文字，他也不会闹"这些笑话"了。现在钱先生，"请你冷静一点仔细的"读读我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原文罢：

> 据说近来在中国有所谓"革命文豪"从日本贩到了一句名言："托尔斯太者，卑污的说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话！其实昆仑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来赞美，托尔斯太的价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来估定。日本的大学教授（？）在高楼大厦（？）中吃过了精美的晚餐（？）后利用他的馀暇，偶尔随随便便地说道："托尔斯太者，卑污的说人也。"倒也无足怪，而中国的"革命文豪"居然把它当作金言似的连忙贩卖过来，就未免有点"出人意表之外"了。
>
> 这几天法国各报为托尔斯太百年纪念大做文章，大出特号；大吹大擂，倒也热闹。我近来读完了托氏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很受感动，现在读到脱洛斯基的文章觉得

有些地方"实获我心"，所以抽出一点时间翻译出来，一则作为我个人对于托氏百年纪念之一点表示，二则让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们祖师之艺术的见解，看看托尔斯太究竟是否"卑污的说人"。……

我之所以写这一段话是因为读了《文化战线》第一期上的一段话有感而写的：

> 中国有革命文学家者，破"二道手"之工夫而从倭国学得老俄罗斯的马克斯主义之父普列哈诺夫之言曰："托尔斯太，卑污的说人也。"……

因为是从倭国贩来的，所以我写"据说……日本的大学教授"等字样，但我又恐怕那般"小贩"一定要咬着牙齿说这是真正的道地货，不是倭国底模仿品，所以我又在"日本的大学教授"字下加了一个"?"。明明是普列哈诺夫底话，中国"革命文豪"从日本大学教授（?，也许不是大学教授，是"普罗"什么罢）那里贩过来，怎么钱杏邨先生反说我把列宁的话送给日本大学教授呢?

"托尔斯太……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即宗教的说教者。"（钱杏邨所引列宁语）

"托尔斯太是卑污的说教人。"（革命文豪从日本转贩来的普列哈诺夫底名言）

而钱杏邨先生混为一谈，自己靦然自居于革命文豪之列。

"这笑话我们也姑且不问"了。

脱罗斯基底《文学与革命》，我在译那篇文章时并没有读过，而且似乎连有这本书之存在也忘记了。我说脱罗斯基是革命文豪的祖师，是因为我听说革命文豪是布尔塞维主义者，而脱罗斯基在斯塔林未专政以前还是布尔塞维主义的一个领袖。至于钱先生说我"把脱氏的《文学与革命》当做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经典"，如果这种造谣"不是一种污蔑"，那么便是钱先生看不懂中国文字。钱杏邨先生，我再声明一句，我译的文章是脱氏一九〇八年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至于什么"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经典"，什么"文学与革命"，那时候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呢！"这笑话我们也姑且不问"了。

钱先生说："说托尔斯太是'卑污说教'也并不是一种污蔑。"他的第一个证据是托氏一九〇六年致辜鸿铭的信中的两小段。（第五第六两段，《东方杂志》十九号八五页）

谁都知道托尔斯太是无抵抗主义者，"不以恶报恶"，"不与恶合作"，便是他底无抵抗主义之原理，我们固然不必赞同他底主义，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说他是"卑污的说教人"，钱先生总该明白卑污的三字是怎样的解释罢。请你再读同信里的一段话：

> 欧洲人的一切吞併和盗窃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个政府存在，对于这个政府，你们承认做它的臣民。如果一旦中国没有政府，外国人就不能够施行他们的掠夺政策，借国际的关系为口实。如果你们不听命于你们的

政府，如果他们不帮助列强压迫你们，如果你们拒绝替他们的机关——私人的，国家的，或军队的——服务，你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就会消灭了。

中国人以及一切东方的民族现在所担负的工作，依我看起来，不仅是把他们自己从他们的政府及外国人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里面解救出来，并且还把这个过渡时代的出路指示给一切民族。(《东方杂志》十九号，八六——八七页)

这封信是处在俄皇底黑暗之势力下的一个俄国人写给在满清政府底横暴势力下的一个中国人的。钱先生用这封信来证明托氏是"卑污的说教人"，是真"出人意表之外"了。试问像托氏底这样的勇气有谁能及得上？这是"卑污的说教"吗？

钱先生证明托尔斯太是"卑污的说教人"的第二个证据是列宁的一段话，我照样抄在此地。

……一方面无忌惮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榨取，剥去政府的暴行、裁判及行政的喜剧的假面具，且暴露了富与文明成果的增大和劳动大众的贫困，野兽化，苦痛的增大间的矛盾之深刻的根据，(钱先生，这是"卑污说教"吗？)但他方面，提出了"抗恶勿用暴力"这个愚劣的说教。虽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剥去一切的假面具，但同时又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即宗教的说教者。

究竟托尔斯太为什么"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呢？列宁并

没有说出理由来，可惜我又不是留声机器。还请钱先生给我解释。难道主张“抗恶勿用暴力”，便是世界中最卑污的人吗？似乎列宁又说过：

> 托尔斯太是一位著作家，著作过许多特色的艺术作品，堪算世界大著作家之一；他又是一位思想家，以他的伟大的精力、信心和真诚，提出许多关于当代政治的、社会组织之根本的特质。……
>
> 托尔斯太将他们（数百万农民）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极真确，至于他自己在他的学说中也带了他们的朴实，他们回避政治的心理，他们的神秘，避世的志愿，对恶事的无抵抗，对资本主义和金钱的权威的诅咒。几百万农民的抗议及其失望——这就是融化在托尔斯太学说中的。

这样看来托尔斯太是最卑污的人，俄国数百万农民也是最卑污的人，伟大的只有中国的文艺批评家钱杏邨先生了。

然而事实上：

托尔斯太——“反动的势力想把俄国的太阳永埋在绞绳密网之下，在那最悲惨最猛烈的反动之夜里，在那正式舆论的底一种极卑鄙的胆小之闷得死人的空气中，这个基督教慈善之最后的圣徒好像《旧约》中的愤怒的先知再现一样，发出他底顽强的呼声：‘我不能闭口！’这一句话像一个诅咒吐在那般在绞刑前俯首或闭口的人底脸上。”（脱落斯基底《托尔斯太论》）

钱杏邨——“这一集文艺批评，本来是题做《力与争斗》的。所以然题做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被批评的各部名著，不是

代表人间的伟大力，就是描写斗争的。因为怕'争斗'一名词易于引起误会，尤其是在这百不自由的时候，所以我把它改了，自然这更改的结果是很不恰当，然而不如此没有办法的。"（《力的文艺·自序》）

请大家看，究竟谁是"卑污的说教人"？

关于《人生哲学》的中译本*

——复中天的来信

马拉兄：

我的敬爱的先生中天最近为了我译的《人生哲学》，特地写了一封信来。现在请你把它发表在《自由月刊》上罢。后面还有我的几句答复的话。

芾　甘

中天的来信

芾甘：

昨日偶然查阅你所译的《人生哲学》第六章，将标目和德译本对照，发见一点不同之处。英译本和中译本都是“基督教与佛教之根本的差异”，而德译本则作“基督教及佛教与以前一切宗教之主要的差异”。意思很不同。因此我细阅全章，觉得德译是不错的。本文说“基督教及佛教与以前的一切宗教之重要差异点，就是这个事实……”这是很好的证明。又一方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由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芾甘。标题为该刊编者所加。

面，本文中好像没有说到基督教与佛教之差异点；它所说的，只是共同点，如瞿昙是愿为贫民，耶稣是一木匠。“这两个教师的生活，不是在寺院中度过的……”“然而基督教与佛教所介绍到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新原理，都是在对于己身的危害之完全的宽恕这一点上。在此时以前……”“……这个抗议最初以一个新宗教（佛教……）底回响之形态出现了，而在约四百年之后又以……基督教之形态再现了。”这些都是说明两教的共同点的。本来的主旨，是在说明基督教与佛教，都是贫民的、人的、爱的宗教，与以前的“神”的，残酷的，威压的宗教不同。这是间接的证明。我们因为不能对证俄文原本，不能断定英译本之错，但从内容上解释，确是德译本好。假使俄文原本和英译本一样，我们可以推定是俄文本编者之一时疏忽（标目是编者所定），我们该从德译本。你以为如何？

因此，又随便翻翻别章的标题，又有一处，我也觉德译本好。“互助、正义与道德为‘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之基础”，德译本把“自然主义”译“科学的”。“自然主义”和“科学”含义很不同。本章末“……科学教我们拿它来制造出一个新的人生哲学体系……而建立起科学的人生哲学来”，他所谓科学，是指自然科学。克氏对于无政府主义，也想与以自然科学的基础，对于伦理学，更不必说。他在第一章中，虽然对于自然主义作“即人类底道德天性之自然”的解释，但是他处处时时说及“科学的”。说他的伦理学是自然主义的，确是说他的伦理学是科学的来的好。我没有将原本仔细查过，或者克氏自己没有说过自然主义的伦理学（这是我的十分无凭据的推想）。我又查

俄国编者序文有一节"克鲁泡特金既然否认道德与宗教及玄学的关系，他便要把他的人生哲学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而德译本亦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克氏平时所谓科学，总指自然科学，针对玄学而言。从这几方面的证明我想德译本在这两点上是对的，特写出供你参考。标目所关虽小，但你既然那样地尽最大的努力去译，苟可多注意，自是注意好。但不知别种译本如何？

至于正文，我的德文还不行，而且此时又无功夫，所以不及对阅，但试读第一章第一节，觉得它和中译本英译本颇有不同之处，不过此时不敢而且不能妄断是非。

你的译文，忠实与否，我不曾校对过原文，不敢妄断，但以你的负责与精细，即不能说一无错误（这原是极难的事，百密难免一疏），但我可以相信是很少很少的。为做到"成为全世界更完备的版本"计，我有一点意见，供你参考。

一、你正在读德文，于五种译本外更可参考德译本。不能（此刻）即断它好，但多有一种参考，总是比较好。

二、我希望你以翻译作研究。伦理学的难译，还是在于内容。如果对于所引用的学说，不能了解清楚，就难译好。第八章以后，如康德、黑智尔等，都是有名难懂的哲学。你最好将他所引用的诸大家的原著，趁此机会看一回，一面可以增进自己不少的知识，一面对于翻译，一定有帮助。又原稿不曾经过克氏整理清楚而出版，其中错误，一定难免。校正和注释，是后死者之责。你既然发了宏愿了，趁此研究一番哲学，伦理学，对于原书的内容上，增加许多的补充，那是为解释克氏思

想的应有的工作。译这种书，却不能同普通书一样，只是介绍文字就算了。

要决定各种版本之是非，最善的标准，就是内容，例如他引用孔德的学说，最好看孔氏原著。如果与孔氏原著不符，无论哪一种译本，我们可确定它是错的。要辨别所译的克氏的解释的是非，最好参考别的地方的克氏学说。

三、一个人的精力，不免有疏漏，你译好后，最好请君毅用世界语、法文、英文本再对照一下。

四、文字，总算很清楚可诵了，但究竟不免还有晦涩之处。例如第二句“他们所预许下的未来的更大希望”不大容易懂（要如何译才好，我一时也想不出）。又第一章标目《生存竟争说及其误解》，“误解”当然可作“错误的解释”讲，是对的；可是近来中国人，有时把“误解”当做“误会”用，例如两人稍有意见，第三者就说这是因为其中有点“误解”。这误解二字，好像是很不关重要的，没有如“错误的解释”的来得严重，所以我想不如译得拖沓点，译作“生存竞争说及其错误的解释”好。

你的译文，我虽不能对照西文，但我是很满意的。不过原著者既以二十年的精力成此一书，译者为不负原著者苦心计，不妨精益求精，所以我就偶然见到的，随便写给你作为参考。未必说得一定对，但供参考是不要紧的。

又译名，前后请保持一致。例如中译本二十四页第十行“互相扶持之所以……”这“互相扶持”四字在德译本、英译本都是“互助”。你在别处都译“互助”，而此处独译“互相扶持”，不知西班牙文、法文、世界语本是否不是“互助”二字，抑是你

译时之疏忽，此等处也望注意。以后如有见到，当随时告你。我十二分确信你决决不会想到以为这是我吹毛求疵吧。

又二十九页四行至六行，怕有错，或印刷时脱落许多字。“……组织他们底生活之固有的倾向底进化”，是不妥的。和英译、德译本也不对。

我的答复

德文本是和西班牙文、法文、世界语各本相同的，我最近也曾校过。

“基督教与佛教之根本的差异”一语确是不对。英、日文本都是这样；我最初依英文本译成这样，但我记得后来我曾根据西班牙等译本加了“和以前各宗教”几字，不过这些字在中译本内却没有了，不晓得是校对先生不留心呢，还是自己记错了。

“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一语，我觉得仍可用，编者序中曾数次用到。如九页“他便要把他底人生哲学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十二页“因此他所计画来解释自然主义的和实在论的人生哲学的基础”。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自然和科学的人生哲学意义不同，但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也就是科学的人生哲学。所以德文本在第一句虽作科学的，第二句便作“自然的”了。而且“自然主义的”正好与实证论的平列。

至于第一章和德译本的不同，这是事实。而且不仅第一章如是，第二、第三章亦如是。其理由见英译者序及我的“例

言”，因为“前三章本是将从前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修改而成，英译者便大半采用论文底原文，只将克氏自己后来编入俄文本时修改了的地方照改了几处，不重要的地方也就没有改”。所以“互相扶持”一语在各本虽作“互助”，在英译本确实为“互相扶持”。我将“mutual aid”译为“互助”，将“mutual support”译为“互相扶持”，不能说是译名不统一。

二十九页四行至六行“组织”两字之上确实被“手民”排落了一行(原稿)，现原稿已被乐夫弃置了，我只得另译来补上：

> 我们若以历史底新研究为根据，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把人类底历史视作一个伦理的要因底进化，视作人们”组织他们底生活(中略)之固有的倾向底进化。

总之本书之付印、校对、出版，我完全没有与闻，而且我在法国时曾寄信君毅要改几个字，也没有照改。校对的人似乎不负责，错了颇多，很难令人满意。不过译本中晦涩之处却应由我负责。

关于“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我又找到了一个证据。克氏一九二〇年致荷兰同志 Reyger 信说：“我现在著述一部论述《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上面的人生哲学》的大书。”①

① 录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版《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附录二。

《革命》的性质*

《革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性质呢，无政府主义呢？三民主义呢？很有许多人怀疑。

无政府主义者中，有不少人反对它。

三民主义者中，恐怕难得找出几个人承认它是提倡三民主义的。

但是各人的批评，总不免涉有几分主观，未必完全真确。我且根据《革命》自己所表示的主张，以判定《革命》的性质。

《革命》名称虽然没有变，但其精神却有二变，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期是初发刊的时期。那时一面主张“互助”，一面主张发挥民生主义。它所谓民生主义，并不是它的方法，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类，而是它的终极目的，如大同的理想，蒲鲁东、巴枯宁共产主义之类。那时的《革命》，可说是以无政府主义精神而去解释民生主义的时期，也可说是在民生主义的名义之下，而阐发无政府主义的时期。

第二期，在发表《我们是谁》以后。那时的《革命》显然揭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平等》月刊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署名春风。

示无政府主义的旗帜。

第三期，是在四十四期竞化答复黄明刚先生以后。这一封信，表示《革命》是三民主义的刊物了。我且举出证据来。

1. 这封信是竞化写的，但是信中常常说我们，可见他代表的，不是竞化个人而是革命周刊社。

2. 常有"忠实同志"字样。

3. 对孙中山称"总理"。

4. 替国民党辩护，十分忠实；赞美国民党，十分透澈。我只摘抄几句话如下：

> "凡在革命军领域内的人民，所受数千年的压迫，一旦霍然解除，开从古未有之局。"
>
> "革命虽不神验，却有几分神验。"
>
> "……装点门面的教育，暂时只好停顿。"
>
> "对于这种土豪劣绅，铲之不胜其铲，只有将他们尽数容留，这是根本解决土豪劣绅问题。"
>
> "至于贪官污吏，并非生来就是贪污……于是从前被环境压迫而成贪污的那些人士……欣欣然加入党里面来工作。"
>
> "……即或迹近发财，只是党员的个人行动，与党并无关系。"

凡是一般人所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如停办学校，收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想升官发财的人，那封信上都以为事实使然，决不足为国民党病。其他如辨明纪念周并非神化，杀共

产党人是应该，在国民党治下“言论真自由极了”，都是连国民党员都不敢说的。

竞化自己虽说不是忠实同志，但在那封信上所说的话，却不愧为国民党的真真实实的忠实同志了，国民党党员中，有那样忠于党而肯十分替党辩解的吗？

以上的话，我只是根据事实而说明《革命》的性质。至于《革命》的好坏，那是别一问题，不是我这里所欲论列的。

读八太舟三氏底《人生哲学》新译本*

近来有机会得读到日译本克氏全集(尚未出全)。已出的几本中我最爱的是能智修弥译的《田园工厂手工场》，新居格译的《俄国文学》和八太舟三译的《人生哲学》。这三种书在日本各都有了二种以上的译本。有的译文不忠实(如内山贤次底《人生哲学》译本)；有的非但译文不忠实，而且还加以"恶骂"的序言(如中山启译，高畠素之序的《田园工厂手工场》)，读起来实在令人愤慨；现在读到这三种完全的新译本，真令我痛快极了。何况译者都是对于克氏学说有过深的忠实的研究的人呢！

现在先说八太氏译的《人生哲学》。据说八太氏就是日译本克氏全集之编辑人。他底译本在文字在内容两方面都的确比其他几种旧译本好得多，"定本"之评语也不全是书店广告中的大话。不过我觉得他底译本中仍有一些缺点。

然而这些缺点并不足为八太氏病。他的确译得非常忠实，不过可惜他所根据的只是英译本，而英译本又有错，所以他便把英译本底错处照样翻译出来了。现在我替他指出来，

* 本篇原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之"附录"二。署名芾甘。

希望他在再版中把这些错误一律改正。

第六章节目中"基督教与佛教之根本的差异"应改成"基督教与佛教和以前各宗教之根本的差异"。其理由见于中天寄我的信中。

八太译本九四页，十二行(英译本七三页第一行)，"权利"二字应改为"祭仪"。

希腊哲学家底生卒年代在英译本中错得很多，八太氏也未曾改正。大错的如一四四页(英一一一页)所记 Ciciro 底生卒年代；错处显而易见的如一三四页(英一〇三页)所记 Epictetus 底生卒年代错误，而一四二页(英一〇九页)所记的又不错，从这矛盾的记载本可以看出错处来，然而八太氏也居然忽略过了。

二一〇页十五行(英一六一页十一行)，一六七六年之后一"六"字应改为"七"字，因为斯宾诺沙死于一六七七年，他底遗著决不能在一六七六年出版。

英译本二四九页二十六行 help them 两字应删去，因此八太氏译本三二六页十一、十二两行也应改过。

英译本二六九页"注六"，蒲鲁东底《经济学的矛盾》有 Tucker 底英译本一八八八年出版于波士顿。事实上《经济学的矛盾》并无英译本，Tucker 所译的是《财产是什么》一书。八太氏译本三七四页也照样翻译了。

英译本二八七页最后一个较长的脚注，本是克氏自己注的，然而英译者误在后而加了一句"俄文本编纂者莱伯代甫注"，八太氏译本二七八页便译作"克氏底这个脚注是俄国编

纂者莱伯代甫加上去的”。其实莱伯代甫所加的注释乃是“第十一章底原稿就这样地终结了”。英译者不小心把莱氏底注与克氏底注互换过，便弄出了笑话。

英译本三一三页第十二行，definite 一字应改作 indefinite。所以八太氏译成“判然”也是不对的。

其余的一两处错落的地方，我也不一一指出来了。

分章方面我以为应依照西班牙文译本，那是更清楚得多，意大利同志发布里译此书即以西班牙文译本作根据。补遗一节应排在论述沙甫慈伯利一段之末，作为脚注，除英文本外，各本都是这样做的。

总之，八太氏底译本是非常可爱。他将克氏致西欧劳动者的信附在书后并且加以解说，的确有卓见。最后他自己著的《人生哲学解说》也是值得一读的。

两 个 质 问*

A A① 大哥：

贵主宰者所宰的《开明》二卷一号，已经拜读了（很抱歉没有焚香）。弟阅后，觉有几句话要说，特为写在这里：

一、第三页，第六行。"（2）创作批评号"，此地创作两字作如何解释，应声明。因照日本原义解，创作者指本国人所写之小说之谓也。但照我国人普通解释，则凡是本国人所写的，无论是诗歌、剧本、小说……都称创作。据我猜想，你所指者，谅系限于小说罢？但我还有意见，为什么不直捷痛快的称为"小说批评号"，与"诗歌批评号"一样呢？

二、第十一页"……一个比较出色的作家总要蓄养许多门客，作为捧场的助手，……"我想要请著者给我们举一个实例（只要一个就够了），究竟现在有谁蓄养许多门客？谁是他的门客？所谓"许多"门客，究竟有几，数十乎，数百乎，抑如孟尝、信陵之有数千乎？所谓"蓄养"，究竟这"蓄养"的制度如何？它的组织如何？又"这般门客也自认不讳地从事去替主人翁瞎吹瞎捧……"究竟门客之自认不讳者有几？能举一实例乎？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开明》第二卷第三号。

① A A：即索非。

因为我很想在三五十年之后，编一部"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史"，想豫先找好一些材料，免得到了那时再下"考证"功夫。谅著者先生总能助我吧！

二弟BB敬上

一九三〇年

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

在从前曾经有人怀疑过：世界语是不适宜于文学的。可是如今却没有人再说这样的话了。我们知道 riĉheco, precizeco与 fleksebleco 是良好文学底三大要素，这在各国语言中都有的，而世界语在这三大要素之外还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 ekstrema facileco。许许多多的古今名著的译文便给我们证明出来，世界语确实能够把人类底情感表现得非常自由非常微妙，并不比别种语言差一点。

在翻译方面世界语学者中出了不少的人才，除原始家Zamenhof 外，如 Kabe, A. Grabowski, Ŝidlovskaja 女士，Kalocsay 以及最近将 Tolstoj 底大著《战争与和平》译成世界语的 A. Fiŝer等都是很有成就的。他们底译本都得着名译的定评。

同时在创作方面我们也有了不少的天才的文学家。靠了他们底努力，世界语创作文坛上已经开放了无数朵的鲜花，虽然与别国的文坛比较起来，还算幼稚，但这是年龄的限制，因为世界语自产生以至今日只有四十几年，而在这短促的年限中竟有了现在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可惊奇的事了。我们如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二、三月《绿光》第七卷第一、二期合刊及第三期。

果把世界语创作文坛底大势概述一下，就可以知道它底前途是无限的。

要论世界语的创作就应该先从诗说起，论到诗人便不得不先说 Zamenhof，Zamenhof是诗人，但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他底诗太直露了，却又没有奔放的热情。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黑暗的挣扎中的呼号和呻吟，但是表现得非常平淡。阴暗忧郁的 nokto，ventego，mallumo，doloro，turmento一类的字，以及反面的光明的充满了希望的suno，espero，flamo，venko，sankta harmonio一类的字，便是构成他底诗篇的要素。在 Fundamenta Krestomatio 中 Zamenhof 原作诗凡五首，都是属于同一典型的，而成了初期世界语诗底范本。

原始家以后倒出了不少的诗人。在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语诗坛极其发达，重要的诗集如 V. N. Devjatnin 底"Verkaro"(1906)，L. Belmont 底"Sonoj Esperantaj"(1908)，G. Deŝkin 底"Versaĵoj"(1908)，R.Frenkel底"Verdaj Fajreroj"(1908)，Wiktor Elski kaj Eska底"Unuaj Agordoj"(1910)，M.Hankel 底"Sableroj"(1911)相继出版，极一时之盛。Devjatnin 底诗中充满了阴暗的苦闷，por mi ne estas suna lumo这一句很可以表示出那般播种者底苦痛的心情。Eska 憧憬着绿星，充满了希望与苦痛地讴歌着诗人底心痛。Deŝkin 不断地问那幸福的美满的世界何时才来，他只是不能忍耐地梦想着。Hankel 底诗表示出女性底温柔的，细致的，多感的心。"Trankvila，alloga，kuraĝa vi estas。"我就拿她自己底话来评她底诗，觉得是很恰当的。她底诗非常可爱，恰如一粒粒的明珠。

Elski底诗多半是赞颂自然之美的，也很可爱。Frenkel底诗集是献给他底亡妻的，里面第一首《无题》就是很沉痛的悼亡诗，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泪。他底诗非常委婉，含意不露，有时又像暗夜里的小鸟底啁啾，渴望着黎明之到来。然而这些诗人如今都成了过去的人物。在欧战以后又出现了另一批更伟大的诗人，形成了活跃的世界语诗坛底现势。

这一批新兴诗人中值得举出的就是Teo Jung, Jan Von Schoor, Dro Kolomano Kalocsay, Julio Baghy几个。

Heroldo de Esperanto周报底总主笔，世界语运动底热烈的斗士，青年作家Teo Jung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叙事诗，显露了他底惊人的天才。一方面歌咏着古代的英雄美人底事迹，一方面赞美着永恒的爱。恰与著Amo kaj Poezio的Schoor一样，Teo Jung也脱出了现代生活，而在暗淡的月光之下的封建生活中去追寻所谓platona amo底幻影，而流于sentimentalismo。匈牙利诗人Kalocsay除了将许多古今文学名著译成世界语外，还给了我们一部创作的诗集Mondo kaj Koro，单从这个题名我们便可以想象到原作底内容。憧憬于verda stelo，标示着homaranismo的Kalocsay底诗是非常之深刻，非常之微妙，在这一点为他底同代诗人Baghy所不及，然而Baghy底诗却是对象更为丰富，色彩更为绚烂。号称为"cent-procenta poeto esperanta"的匈牙利诗人J. Baghy于一九二三年在"Preter la Vivo"题名之下发表了他底七十三首诗篇，马上就成了世界语诗坛的第一人。于一九二六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诗集"Pilgrimo"。他底诗和他底小说一样，

与T. Jung诸人有了显著的差异。他不在封建生活中去追寻理想的爱之幻影，他却在现实的生活中去追求homanismo与romantikeco，其结果便是在现实中看出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期的一个面相，他虽是因此而更为忧郁，但他却仍充满了希望。高叫着“En la sangon verŝitan sur tero, dezirus mi trempi la plumon”的 Baghy 是一个体验了战争之悲惨的和平论者。“Amo kreas pacon. Paco konservas homecon. Homeco estas plej alta idealismo.”这就是诗人 Baghy 底信念了。

像 Teo Jung 诸人占据了世界语的有产阶级诗坛那样，同时形成了普洛诗坛与之对抗的，则有 E. Izgur, Miĥalski, Hohlov 等。

发表了“Nur Volu”与“Je la Nomo del' Vivo”两部散文诗集震惊了一代的俄国诗人 Izgur，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幼儿。他做过各种的工人，受尽了压迫的痛苦，又曾于一九一四年因革命运动被捕判处死刑，仅于执行前二小时遇赦。但这种惨苦的生活并不曾摧毁他底精神。他底诗以他底奔放的思想自由泼剌的有力的文体，在世界语诗坛上放了一道新的光明，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有人曾称他为 Heroo de Laboro，他底诗集也被人称为劳动者底圣书。将来的新社会的人类是 senklasa, sennacieca unulingva，怀着这样的信仰，他在历尽了虐待、穷困、劳役、迫害、桎梏底痛苦之后，依然本着坚毅的精神高叫正义与爱之最后胜利。

Miĥalski 底“Prologo”与 Hohlov 底“Tajdo”也是俄国世界语诗坛之两部重要作品。“Tajdo”曾于去年受世界语文艺

协会底奖金。这两部诗集曾因未脱尽小有产阶级性而受人非难，但是在技巧方面它们确实是很优美的诗。

总之世界语诗坛上确实是非常热闹的。以上所举不过是几位熟知的作家。此外未出专集的诗人还不少，翻译的诗集也很多，可惜我在这里却没有篇幅来论述了。

说到创作小说上来，世界语文学显然是很贫弱的了。但我们也可举出几个有天才的作家。诗人Baghy底小说确实是可以不朽的。

世界语创作小说之出现乃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法国Dro Vallienne底"Kastelo de Prelongo"(1908)与"Ĉu Li?"(1909)便是最初的世界语小说，都是将近五百页的大著。"Kastelo de Prelongo"充满了中世纪故事风的印象，而"Ĉu Li?"则富于电影的兴味，并无何等重大的意义，而且此两书已经绝版，读到的人并不多。后来Luyken出现，世界语创作小说才开始发达起来。

一九一五年在英国出版的Taŭgulo底"Nova Sento"确实曾轰动过一时。这一本用绿色纸张褐色油墨印成的小书是一部理想小说。叙述的是作者因惧怕彗星与地球冲突而乘飞机逃避，偶然飞入火星，看见种种进步的社会状态。诸凡作者底社会改造之理想都借火星里的世界说明出来。这一类描写乌托邦的小说在欧洲大战之混乱中自然易受人欢迎，但后来竟没有人过问了。然在吾语创作文坛中，它也要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可以与英、法文豪Cabet, Moore, Morris诸人底描写理想乡的名著相比。

作了"Paúlo Debenham","Mirinda Amo"(1913),"Stranga Heredajho" (1922)"Pro Iŝtar"(1924) 等大著的英国小说家H. A. Luyken 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底作品虽然都是三百页的大著，但内容并不深刻，不过是些恋爱故事，冒险丛谈而已。趣味是有的，却不能感动人，给人以深的印象。他底人物常是虚构的。譬如"Stranga Heredaĵo"中的英雄英国青年就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是一个绝好的演说家，一个出色的Esperantisto，又是一个天生的侦探家，有福尔摩斯底全副本领。你相信这个人不是一个怪物吗？

以"迎面看见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来了"一句收场的"Abismoj"确实是一部很可爱的著作。这部书不仅是文章非常流丽，非常轻快，又有一种独创的特殊的风格，同时在技巧方面也很有成就。Mateo Ardo, Ernesto Muŝko, 与 Halino Borki 三人也都描写得很好。写两性关系，肉的引诱，灵肉冲突以致酿成恋爱的悲剧，好像这其间有一个必然的命运，颇与左拉底小说相似，同时又使我记忆起都德底 "Sapho"，自然在气魄方面"Abismoj"不及左拉底作品之雄厚。"Abismoj" 确实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所以得被译成了各国文字，而流传于世界，中国也有了锺宪民君底译本。

然而不幸 Forge 底第二部创作却失败了。据说 Forge 是一个青年波兰文学家之隐名。他在病中得友人赠世界语自修书一册，他读着世界语感到极大的兴味，病愈后便动笔草"Abismoj"一书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博得极大的好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部小说"Saltego trans Jarmiloj"，这部书出版

后并不曾引起他所预期的反响，他便很觉灰心，不复再从事于世界语的创作了。“Saltego trans Jarmiloj”如他自己所说是一部幻想小说，并无多大的意义。

姓名不曾见于Dro Privat底“世界语史”中的北欧小说家H. J. Bulthuis却也给了我们几部大著：“Idoj de Merkuro kaj Eroso”(1923)，“Jozef kaj la Edzino de Potifar”(1926)，“La Vila Mano”(1928)。Bulthuis底文体和其他许多世界语创作家底一样是优美的，易懂的，但也富于表现的。然而在技巧方面Bulthuis却常常失败了，他因为要宣传世界语，所以不惜用不自然的方法，譬如三个弟兄每人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三个国度里抚养，约在二十年后偶然在一个外国音乐家演奏会中遇着了，各人靠了世界语才知道他们底家世，因为他们底亡母是用世界语写日记的。这与Luyken底世界语侦探家是一样地滑稽。Bulthuis底中心思想乃是“服从命运满足现状”。有人曾说过“如果你有空时间想娱乐，那么我劝你去读Bulthuis底小说，因为它们是和美国电影一样地引人入胜呢”。Bulthuis底作品底价值就在这里了。

Luyken与Bulthuis底创作是极其杂乱而平凡的通俗小说，而T.Jung底“Landoj de Fantazio”却是在奇怪的幻想之中看到“internaciismo”的创作。离开了现实生活，忽略了全世界民众底团结力而去追寻所谓幻想之国土，这样的作品在技巧方面虽然很有成就高出于Luyken与Bulthuis之上，而在意识方面则显然地失败了。

身为世界语文坛之重镇的匈牙利诗人Julio Baghy乃是

我们底最有成就的天才作家。他出身于优伶之家，自己也是一个优伶。他因参加欧战而作俄军底俘虏，被流放于西伯利亚荒原。在那里，他在孤苦呻吟之际，将他底苦痛的情怀写入诗歌，成了忧郁悲怆的调子。他底长篇创作"Viktimoj"就是他底西伯利亚之生活记录。以冰天雪地的俘虏生活为背景的悲痛的故事，主人翁底超人的性格以及诗人底多感的热情与有力的描写，在读者底心中留下了不灭印象，引起了许多人底同情，无疑地凌驾"Abismoj"之上而成了世界语文坛的第一流创作。虽因描写追求着恋之幻影忽视了现实之恋的romantika人生而为左翼批评家所诟病，然而在小有产阶级的文坛重镇的他，确实是达到了他底艺术底高峰。他底作品有一种俄国的melankolia风，但里面却依然含着希望。他颇像Dostoevski，他底作品是直诉于人们底深心，在他，所有的人无论地位如何惨苦，恰像一块湿漉漉的抹布，从里面依然放射出光芒来。他底短篇集已出有两种："Dancu, Marionetoj"(1927)"Migranta Plumo"(1929)。在第一集的十篇中，我最爱的是已经译成中文的《只是一个人》(锺译)。那一篇写为爱人底幸福而牺牲自己之悲剧，确实是非常深刻。同时把抹布里的灵魂表现得十分逼真。他能够把性欲的面具剥去而将人底深心表现出来，在中国会被人骂为奸夫淫妇的人而在他底小说里却依然是非常善良值得人同情的人物，所以久客归来的丈夫居然为了完成他所爱的人底幸福的起见而去了，"径自去漂泊去——去而永不返了。"这在惯演《耶稣的吩咐》里的悲剧的中国人也许不能了解，然而在别的某一些国度里倒也是常见的事，从这里也

可以看出他们底伟大来。第二集中有诗七篇，小说八篇，戏曲二篇，译文七篇。他平时常在U.E.A.底机关报“Esperanto”上面作文。计七年之中他一共出了五部创作集，算得是一个最努力的作家了。

世界语的普洛文学家中杰出的只有俄国L. Ivn一人。他底创作集“Ruĝo kaj Blanko”使他在文坛上博得好的声誉，其中以“Cimoj”为最佳。这一篇描写着从破坏到建设的俄国底内部情形，一方面要抵抗外国的干涉与白军底进攻，一方面又要应付党内的斗争的人民底勇敢的奋斗被他描写得非常活泼而有力。

此外还有几部书应该举出来的，就是V. Eroŝenko底“La Ĝ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与E. Privat底“Karlo”，这是少年文学中的两部佳作。

“Karlo”自然是一部很平凡的作品，然而却是非常可爱。在简单的体裁，浅明的文字之中作者却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少年Karlo，从他底出世一直看到他结婚服务为止。他描写骨肉之爱，描写师生之关系，描写初恋，描写少年心理都是很有成就的。我想把它比之于亚米契斯底《爱的教育》。虽然在量一方面差得太远，但在质一方面前者也并不十分弱于后者。我还觉得后者太近于理想，比较还是前者近于现实。诚如诗人Hankel女士批评，这短短的二十章恰似二十粒明珠。此书差不多各国都有译本。中国也有两种译文了。

盲诗人Eroŝenko底价值在西欧很少有人知道。固然他底最好的作品并不是用世界语写成的，但“La Ĝemo”已经是

一部不朽的著作。他底世界语文字虽有人訾议，然而我却承认日本平冈昇底话："他底文体像风动水流般的自由、流畅，诚为世界语文学中之白眉。"对于永远保持着童心的自然儿Eroŝenko 底艺术的精能，童话之形式确实是最好的工具。他底童话表示出他底想象力之丰富，技巧之美丽，同时里面又贯串着他底社会思想。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儿。他底叛逆儿底热情使他对于一切权威都起了一种盲目的反抗，诅咒着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渴望着脱离掉狭的囚笼而去到广阔的天空或自由光明的树林。他是一个 esperantisto，但他不是一个说教者而是战士(batalanto)。他底孤寂的呻吟中显露着一个叛逆儿底热烈的爱的心，这部小书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学校生活之一页》底译文已被选作国文教材，确实是值得如此的。《枯叶杂记》底六篇中我最爱《一个小女儿底秘密》一篇，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与安徒生底《卖火柴的女儿》一样可使人流眼泪。

总之在我个人底意见 Eroŝenko 底"Ĉemo"显露出了一个真正的 esperantisto 底心。他底思想乃是真正的 esperantisto 底思想。他虽然用了童话的形式来表现它们，但他却与大部分的世界语创作家不同。他并不曾有一刻离开过现实去到封建社会或幻想之国里去求安慰。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在黑暗的夜里孤寂地叫号，要把他底呼声响彻人间，唤起人们去追求光明的太阳。如果我要做 esperantisto 的话，我决不去做 Luyken 底世界语侦探家，或 Bulthuis 底世界语音乐家，我要做Eroŝenko 式的 batalanto。

文章写了这么长，应该结束了。自然世界语的创作不只

以上所说的几种，然而重要的大概尽于此了。我所读过的还有E.Alleyne Sinnotte女士底“Lilio”(1918)，Argus底“Pro Kio?”(1920)以及短篇创作的选集“Laŭroj”(1908)几种。Laŭroj中只有得最后一奖的“La Sinofero”一篇我以为还好。其余得第一奖第二奖的各篇只是文章写得好罢了。“Pro Kio?”底内容正与它底题目一样平凡，这一部侦探爱情小说，如果摄制成电影，也许可以引动一些美国的观众，在我却以为并无价值。“Lilio”比较还算是好的作品。它表现出了一个勇敢的女性。作者在序言中说“我盼望我底故事至少给一个受着苦难的人带来希望与勇气”，这个意思是值得赞许的。

说到原作戏剧，我读过很少，最近读到一本L.Briggs著的“Cindrulino”(1920)，虽是写给孩子们读，预备给孩子们演的童话剧，但写得很可爱，我读这几篇短剧的时候甚至连睡也不想睡了。Privat博士底诗剧“Ĝinevra”也是有名的著作。

后记：我年幼学浅，于吾语亦乏深刻的研究，所读书籍并不多。写此文时虽曾参考Privat博士底《世界语史》及新近各国世界语杂志，但遗误之处定所不免，尚望各同志不客气地指教。

一 个 更 正*

在《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的续稿里，我曾将 Bulthuis 底“Idoj de Orfeo”(1923)误写为“Idoj de Merkuro kaj Eroso”。后者乃是“Jozef kaj la Edzino de Potifar”之一部分，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共二册。

再者，在原作诗集方面，我遗漏了一个有名的英国诗人 Raymond Schwartz。他底诗集“Verdkata Testamento”于一九二六年在巴黎出版。称赞他的人虽有，骂他的人可也不少，他底诗被称为不道德的诗，如“Epikura Kanto”，“Edza Devo”，“Tute Nuda!”等首，所谓正人君子之流是不好意思读的，不过在我们年青人倒还没有什么。现在且把他的名作“Epikura Kanto”一首录出，以见他底作风之一斑。

Sciu nun, samidean',
Ke dependas via san'
De regula bonhumor',
De ĉiama senlabor'!

Laŭ spertita homa kon'
Plej utila estas mon',
Tial trinku Kun Kuraĝ',
Eĉ dum plej maljuna aĝ'!

Al sanigo de l' stomak'
Helpas ĉefe la tabak
Tial fumusdum la viv'
Pli eĉ ol lokomotiv'!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六月《绿光》第七卷第六期。

Tial do naskiĝu vi
En riĉega famili'!
La virinoj, jes, en ver',
Taŭgas tre por am-afer',
Prunteprenu sen cinik'
La edzinon de amik'!

Kaj por peli zorgojn for
Taŭgas ĉiam la lik vor',
Kaj se malgraŭ la princip
Ne plu fumas via pip'
Estas tial, ke sen dub'
Malpuriĝis ĝia tub'!

Vivu am' kaj bonhumor',
Kaj tabako kaj likvor'!
Post la vivo kun enu'
Dormos ni en tomba tru'!

（像这样的诗我是不高兴的！）

世界语文学论*

文学如何发生，文学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　在现今要说世界语没有文学的话是毫无理由的了。我们许多年来就不断地向人们证明世界语是如何适宜于文学，我在《世界语创作文坛概观》一文里又把世界语创作文坛的奇花异卉展示给读者们。然而至今还有人在说世界语没有文学的旧话。这是很令我惊奇的。

语言没有文学怎么能够生存呢？活语言之需要文学恰如活人之需要心。文学是每个语言之美的中心，血液汇流到它那里以求纯净，过后又流回到活的身体的各部分。语言并不单是商业的与科学的，它还该是文学的。

那么有谁能够禁止人说话比别人说得更美丽更巧妙呢？难道定要每个人都说一定的，呆板的，干燥的话语吗？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对于美之欲望，虽然这欲望有时是潜伏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就在未有历史的远古时代中原始人把倒下的树木做成器具，还用磨尖的石头在那些粗劣的器具上面雕刻种种人物形相，这便是美术之最初的起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七、八、十月《绿光》第七卷第七、八期及九、十期合刊。

在说话中也是如此：也有些人愿意唱有韵的字句或叙说故事，比普通说得更美丽一点。试问有谁能够禁止一个有才干的人，不许他说话作文比他底做买卖的邻人说得写得更精美一点吗？

同样，我们世界语学者也不是例外，我们也需要文学。

举一个例来说罢。在某一次万国世界语大会里一个西班牙青年爱上了一个蓝眼金发的瑞典女郎。会议闭幕后这两个青年都各回家乡，但他们还在继续通信。他不懂瑞典话，她也不懂西班牙文。但他们两人都懂得世界语。那热情的青年想把他的爱情表现得更美丽一点，他便用世界语写出热烈的诗句。世界语是他们俩底爱情之语言，靠了它他们才得连结在一起。他也许以前不曾见过世界语诗，然而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写诗呢？他便写诗寄给她……这也是文学之一个起原。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语是否无传统的　然而还有些人坚持着那种偏见：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学，因为世界语是完全人造的，而且无传统的。

其实这决不是真的。我们底语言里有两部分：就是《第一书》(Unua Libro)底内容与其余的一切。

传统的语根　在柴门霍夫底《第一书》里共有几百个语根，这是一个语言学的天才经过长期的应用、经验与著述之后所精密地选出来的。它们是从欧洲各国语言底共同的字里选取出来的，因此决不是由柴门霍夫底脑筋里随意想出来的。它们是从活语言中取出来，而且还带着这些活语言底长久传统

之全部力量。

每一个语根都有它自己底历史。每一个语根都是被某一个老民族创造出来的，而以后又被别的民族采用。其中有许多已经历过了数千年，从当初被在亚洲山地上的原始印度欧罗巴民族说起一直留传到现今，不过读音渐渐改变罢了。

诚然放在此等语根后面的几个文法语尾是故意造出来的，但甚至这些语尾也是从天然语言中取来。至于世界语发音的缀字法，这是人造的；然而在所有的语言中又有哪一种的缀字法不是多少有点人造的呢？

语言之自然的生长　世界语全部就以这稀少的材料为基础，而自然地生长起来了。柴门霍夫与其他初期作家用世界语的单字抒发他们底情意，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活的空气，在此种空气中那些旧的印度欧罗巴语根居然能够给我们带来它们底长期生存中的全副力量。

新语言一天天被人使用，便渐次添加了所有其他必需的新语根，此等新语根之发生是完全自然的。语言因使用而日趋于完满丰富之域，同时更得着新的信徒使用亦愈广。世界语与所有其他活语言一样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天天走向进步之途。

传统的单字如何地生长与死亡　旧的印度欧罗巴语根在这种新鲜的空气中生活得很好，差不多完全不曾失去它们底古传统。它们被移植在新语言底活的树干像从老树上切下来的小枝，在新的树干上反而更茂盛地发达起来，不久就成了小树，满生着红花与绿叶。

在这几百个旧语根之外，我们底新语言底其余一切便都是完全自然生长的了，这在所有其他的语言中也是如此。事实上现在我们拿起一本新字典来看，其中有许多单字都不是柴门霍夫当初所拟定的了，这是从各国文字转借来的，见于一些著作家底书中，而且经过多次的应用才被认为有存在的价值。

然则我们怎么能够说世界语是人造的，无传统的呢？

不然，世界语是很自然的，它和其余的语言一样，有它自己底传统（自然这传统还是很幼稚），而且它还有它底基本语根之可尊敬的传统哩：这些基本语根没有一个不是活过数千年的。

语言底生命是无处不在的　语言在什么地方？它是在文法与字典里吗？不，完全不，它是在活人底口中与笔下，凡有用一种语言说话作文写信的地方，则这语言必不会消灭的。只要语言底使用是无处不在，则它底生命也是无处不在。它好像青草一样蔓生得很快的，无论你怎么用野火来烧它，但是经春风一吹，它又茂盛起来。这春风就是使用。语言又好比是水，使用是滤器。语言底单字与表现流入世界中以后，经过多年的使用，有些单字与表现就变得不适宜的了，好像经过滤器以后，水里面的沙泥便渐渐沉淀下来，而成为废弃的东西。纯净清澄的水又得以畅快地向前流。

语言就是这样生长繁荣的。语言好比一株花，使用语言的民族底声音好比是春风，它把语言花底花粉吹散在世界。共同的思想与感情便是语言花底养料，它团结起它底民族，鼓舞

起它底诗人，创造出它底精神。

世界语为什么会成功　我们底原始家柴门霍夫完全懂得这一层。所以他只给了我们在可能范围以内的最少的材料，为的是让世界语底使用自己创造出它底习语，它底表现，它底句法．简言之，即造成语言所必需的一切东西。

造成语言的不是单字而是语句　我已经说过语言不是在文法与字典中；不错，它是在习语里，句子里，就是说，在表现我们思想的语句里。

我们底大师与他底初期同志为了表现他们底思想，便造出了世界语的语句。渐渐世界语民族发生而世界语的表现也与之俱长成。像别种语言一样，几个单字习惯结合在一起，得到了一种特别的共同的力量。

这些单字本来是含糊的，阴暗的，可是一旦与别的单字结合在一处，就会放射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光辉，而成了非常明朗的语句。

语言之表现如何发生，单字结合所产生的力量　如果你试取一个 nia（我们底）〔即由 ni（我们）加形容词语尾 a 而成〕，一个 sankta（神圣的）和一个 afero（事务、事业），这三个字分开的时候，每个字不是很干燥很无味的吗？

然而把它们结合起来 nia sankta afero（我们底神圣事业）就不复是干燥无味的单字底结合了。它们就成了一个新的，分不开的，极有力的表现。我们一想到 nia sankta afero，我们底头脑里马上就涌现了一个崇高的观念，激动了我们底最深的感情，为了这个，我们甚至牺牲全部精力亦所甘愿。你

想这力量可是三个干燥无味的字所能产生的吗？

又如把下面的许多单字结合起来就成了一封短信："Ci pagis cian ŝuldon, Mi liberigas cin. Estu feliĉa kun tiu kiun ci amas! Jen estas la lasta deziro de cia edzino,kiu mortas amanta cin. Adiaŭ!—Sabline."① (你还了你底债。我现在给予你自由。愿你和你所爱的人幸福地生活罢。这就是你底死去的妻子底最后的愿望，她依然在爱你。永别了！)

读了这一封失了丈夫底爱而愿自杀，以使丈夫幸福的女人底信，谁能不流下一滴同情之泪，这一群干燥无味的单字集合起来竟然有这样大的力量，真是意想不到的！

语言并不是固定的信号　有的人却又相信国际语应该是像水手底信号那样的东西，由某一个国际委员会来规定，各国同志均应服从。他们果然这样地试了许多年，然而却一点也没有成功。

这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是活的，所以语言也是活的，它是自然地生长发达的，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信号底功用只是在表示少数已知道的命令呼应等等，并非表达人类底情意的。所以信号可以用各种语言死板地翻译。这工作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做已够了。而语言呢，如果要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规定各国人民应该怎样表示他底情意，永远按同一的方式，不得稍有改变，这是做不到的。

语言是活的，只有由实际的使用才能达到一致。原始家柴

① 见 Fatala Ŝuldo P.290 小说。

门霍夫也知道这一层，所以他在"基本文范"中就保留着一些两种表现的形式，任其将来由自然选择而决定。

共同的使用创造出语言底一致　使用乃是唯一的好字典，靠了使用，无论何国的人都可以学习得每个字底正确的意义，不靠翻译，也不靠什么权威的决定。譬如你想用世界语表明你底意思，你先在脑里想出了一句中国话，然后再按字把它翻译成世界语，这样说出来岂不是中国式的世界语吗？结果，别国人是很难懂的。反之如果我们明白世界语字底正确意义，直接用世界语思想，那么说出话写出文章便是十足道地的世界语了，无论何国的同志都可以懂得的。我们应当牢记住：只有共同的使用才能够保存着语言之一致。

世界语的初期的诗　我们底文学是以诗开始的。我们底第一个诗人便是原始家柴门霍夫。他的诗有的是在世界语未公布以前写的，有的是在世界语初期年代中写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在黑暗的挣扎中的呼号和呻吟。我们单读他底那一首 Ho mia kor'，就可以了解那般初期播种者底苦痛的心情了：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阿，我的心呵，不要再跳了，
El mia brusto nun ne saltu for!	如今不要跳出我的胸膛去呵！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我已经不能支持下去了，
Ho, mia kor'!	阿，我的心呵！
Ho mia kor'! Post longa laborado,	阿，我的心呵！经过长久的奋斗，
Ĉ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难道在最后的顷刻我竟不能看到胜利吗！

Sufiĉe! trankviliĝu de l' batado,　　够了，静下来吧，不要再跳了，
Ho, mia kor'!①　　　　　　　　　　阿，我的心呵！

世界语民族之产生　但是不久回答的信件慢慢儿来了。每天都有人来加入作这新语言之信奉者，一个一个地，两个两个地，十个十个地，已经有了几百人，他们能够不顾众人底嘲笑，毅然地来学习那新语言，来加入作新理想之传播运动。我们想象看，当原始家看见在他底周围渐渐地产生了一个新民族，接着别人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写的书函，那时候他是何等地欣慰。

构成一民族之要素为何　法国大思想家、名著《耶稣传》底著者列郎(Ernest Renan)曾经说过："人之所以形成一民族者，实赖于他们对于共同做过的大事业之记忆与夫对于完成新事业之志愿。"此记忆与志愿即是构成民族之要素。而我们从世界语初期时代的诗，即所谓"共同的诗"里面所能够看出来的便是这个。这些诗给我们证明出来一个世界语民族之存在。这民族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已经历过了很多的困难，遭受了很多的嘲笑与迫害，但它还是在勇敢地、坚忍地奋斗着。

初期时代　我们运动底初期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时期中的热诚、献身精神与友爱的团结，真能够使人感泣，就在现今回忆起来，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世界语运动史上的最光荣的一页。我们底初期使徒给这个新语言取了一个新名称"Esperanto"(希望者)。这个名称本是原始家公布《第一书》时

① 见 Fundamenta Krestomatio p 320，胡愈之译。

所用的笔名。因为绿色是象征希望，所以这时候这个新民族便主张采用绿色，而以绿星为标识。于是这个命定了日后要普照全球的绿星就出现了。我们底民族分布各国，我们底赞美歌《希望》为全世界同志所歌唱。

共同的诗之典型——希望　我已经说过原始家是我们底第一个诗人，他是所谓"共同的诗之第一个作者。他底为全世界数千万人熟读的，号称为世界语美歌的《希望》(La Espero)共同的诗"之典型。

这类的诗常常是很单纯，有时候甚至免不掉直率的毛病，但它们是很自然地写出来的，成于散处在各处地方的世界语民族之手。

这些诗本身虽单纯直露，而且表现得非常平淡，但它们也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表现出全世界语民族之感情，我们无论谁一旦触到它们，就会感到一个全群众底灵魂之颤动，而且这些诗句至今还为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所爱好地歌唱与诵读。

我们现在且来读这一首《希望》。

La Espero	**希　望**
En la mondon venis nova sento,	新的感情来到世界间，
Tra la mondo iras forta voko;	强的呼声走遍世界，
Pter flugiloj de facila vento	乘了顺风的翼，
Nun de loko flugu ĝi al loko.	让它到处去飞翔罢。
Ne al glavo sangon soifanta,	它并不牵了人群

Gi la homan tiras familion; 去就那渴血的剑，
Al la mond' eterne militanta 它是对于永久战争的世界
Ĝi promesas sanktan harmonion. 应许那神的谐和。

Sub la sankta signo de l' Espero 在希望之神圣的信号底下
Kolektiĝas pacaj batalantoj, 聚集了平和的战士。
Kaj rapide kreskas la afero 事业迅速地进行了，
Per laboro de la esperantoj. 因了希望者底工作。

Forte staras muroj de miljaroj 千年的墙坚固地立着，
Inter la popoloj dividitaj; 在被分隔的民族底中间；
Sed dissaltos la obstinaj baroj, 但这强顽的障碍即将消散，
Per la sankta amo disbatitaj. 为神圣的爱所打破了。

Sur neŭtrala lingva fundamento, 在中立语的基础上，
Komprenante unu la alian, 彼此互相理解了，
La popoloj faros en konsento 各民族都同意地，
Unu grandan rondon familian. 建设一个大家族似的团体。

Nia diligenta kolegaro 我们勤劳的同事
En laboro paca ne laciĝos, 在平和的工作里将不厌倦，
Ĝis la bela songô de l' homaro 直到那人们底美梦
por eterne ben' efektiviĝos. 为人们底永久幸福而实现了。

（周作人译）

共同的诗之使命与意义　这诗篇正表现出来一个民族底

希望，这里面颤动着全个民族之心灵。这不是一个人底呼声，我们全世界语同志底愿望都由原始家给我们表示出来了。这里面没有枪炮，也没有残杀，却暗示着我们底最大胜利是不杀戮，不破坏，不流血便可得来的。世界语同志底战争是和平的战争，所需要的战士却也要比较普通的战士勇敢万倍。这高贵的诗篇，恰像十八世纪末的《马赛曲》鼓舞着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为自由奋斗那样，也永远地把我们团结在绿帜之下为我们底高贵的理想战争。《希望》照耀在世界如一颗明星将亘万古而不灭。

个人的诗　在共同的希望之后还有个人的悲欢苦乐，所以在共同的诗之后也有个人的诗。我们底同志在这"家族似的团体"中感到了友谊与同情，同时自然不免有人间的种种欢欣和烦恼。一旦到了不得不把这一切吐出来的时候，那般有天赋的诗才的人便开始唱起他们自己底快乐和苦恼来。于是我们便有了所谓"个人的诗"。在艺术方面这时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在我们底创作文学里　便是最谦卑的灵魂，只要天才之火星触到它底适当地方，它也可以放射出最美丽的光辉。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们底诗人里面已经有几个知道利用世界语底优美的柔和的音调来创造更复杂更壮丽的艺术了。他们可以写出非常和谐的音乐的诗。他们从这美丽多彩的语言中居然雕琢出了极精致的珠宝来。如 A. Grabowski, Devjatnin, M. Hankel, R. Frenkel, E. Privat 这些诗人底名字都会历数代而生

存的(在散文作家中除了原始家外，Kabe 是应该举出来的)。靠了这般人底培养，我们底创作文坛才渐次生长成熟，含苞开花，以至于产出像 J. Baghy 那样的大作家，其作品曾经被译为十三国文字而为十三国读者所赞美。

我们底图书馆里有几个书橱，这里面尽是世界语的书籍，各种颜色的封面，大大小小的开本，各种样式的装帧。这是如许多人底心血，这是如许多人底微笑，这是如许多人底泪珠。

我们且把翻译作品放过不提，那些是我们底同志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朽名著。我们只来看创作文学，我们把这些书一页一页地翻开，我们一本一本地读着我们底爱好的作家底作品。

我们底作家在他们底长久的或者还是很短的人生旅程中在绿的岸边找到了美丽的鲜花和刺人的荆棘，荆棘是很多的：

有的给我们做好幸福的花环，鲜花底芬芳把欢乐散布到各处，散布在人心里。

有的温柔地抚爱着他们底希望的花束，然而一阵暴风吹来，便把他们憧憬了许久的希望和暮秋的黄叶一同吹散到远方去了。

有的本来一无所有或者失掉了一切，在生活中没有可留恋的东西，便敢于冒危险到荆棘丛中去搜寻，去销磨他们底岁月，结果居然找到了别人梦想不到的美丽的嫩芽，他们小心地把这些嫩芽培养起来，直到它们在阳光之下生长成熟开花结果。

有的伫立着静听那黄昏远寺的钟声，有的远离尘嚣在乡

村中去享受自然的风趣。有的怀着无限的热情彻夜地呼号，要叫彻人间。有的在残酷的命运下低声呻吟，有的在黑暗的社会里怒吼悲鸣。

还有许多人当夕阳染红了黄昏的天空，给群山和云片罩上了金色和紫色的面纱时，却默默地立在新筑的青冢之旁，在回忆那被埋葬在里面的他们底一生的幸福。

只要人们用这语言哀哭，这语言便是活的 在这些诗人中间有一个人在辽远的西伯利亚荒原唱出他底哀歌，哀悼他底青年的爱妻之死。这一首无题的诗歌刊印在他底诗集《绿的火星》卷首，不知道赚了若干人底眼泪。在这首诗里 Frenkel 这样地哭着：

Nur antaŭ apenaŭ dek jaroj	只不过在十年以前，
Sub la fianĉina vualo,	披着新娘的面纱，
Kun flora ornamo en haroj	发间满插着花饰，
Ŝi staris kun mi ĉe altaro.	她与我同立在祭坛。
Kaj estis senvivaj la floroj	那些花朵并没有生命，
Faritaj per manoj de l' homo,	它们是由人手所制成；
Sed ĝojis en ni niaj koroj	可是我们心里异常欢欣，
Malgraŭ de la vintra malvarmo.	并不管那冬季的寒冷。
Kaj nun post apenaŭ dek jaroj	如今刚刚才过去了十年，
Kaj preskaŭ en sama ornamo,	差不多戴着同样的首饰，
Kun floroj vivplenaj en haroj	鲜花满插在发间，

Revenis ŝi al la altaro.	她又回到了祭坛之前。
Per volo mistera de l' sorto	依了命运之神秘的意志，
Ŝi kuŝis malviva en ĉerko,	她永眠的卧在棺里。
Kaj ploris mi, ploris senforta,	我哭，我无力的哭，
Sed ĝojis la verdo de majo.	外面畅茂着五月之新绿。

只要在一种语言里人能够像这样地哀哭，那么我们便可以断定说这语言是活的，因为人们把自己底灵魂（animo）放在这里面，而且也能够感觉到别人底灵魂。自然这首诗在韵律方面还不免有点单调，并且在世界语文坛中还有比这更美好的诗篇，就是 Frenkel 本人也有许多更精美的作品，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说这首无题的悼亡诗是至情之作，用一只颤抖的手写出来的，我们一读到它马上便感到一颗人的心在跳动，同时我们自己底心里也起了同情的响应，我们与原作者一同在流泪了。

只要人们把自己底灵魂放在这语言里，这语言便是活的我们底创作家给我们带来了他们自己底灵魂底震动，用世界语把它表现得非常完美。他们用他们心血的成绩帮助了我们底语言之生长。他们给一般反对世界语的人证明出来世界语是生存的，活的东西；因为只要人们不复用一种语言呆板翻译，而直接用它思想，并且不仅思想，还把他们底全个灵魂放在它里面，那么它便有了生命，它便是活的，任是你怎样反对摧残也没有用。

世界语并不是一个提议，它是事实 于此我们便可以知

道世界语并不是一个尚待人们赞同或否决的提议，所以像某一些人常说的"如果世界语成功……"的话是不对的，因为世界语已经生存了。

我们底工作也并不是向人们叙说我们底语言是怎样怎样地好，而是不断地去使用它，把自己底灵魂放在它里面，而且从里面感觉到别人底灵魂。这样我们就把世界语底生命散布于世界了。

当这生命从荒漠的田野中发出嫩芽而逐渐生长成了一片新绿的时候，那般厌倦尘嚣的人便会自愿跑到这如茵的草地上来欣赏这真实的美；当这生命像小川般流遍全世界时，那般在烈日炎炎下奔波倦了的人便会到清莹的溪流边来吸取甘美的琼浆，以恢复他们底精力，获得新的勇气。

世界语是事实，不是理想。它是自已生长，自已开花的。我们世界语学者并不是宣传家，我们是散布生命者。文学便是散布这生命的一个必要工具。

我们底文学之将来　诚然因了年龄的关系，我们底文学比较各重要国家的文学要幼稚得多，我们底创作文坛上也仅有数十个作家，但我们已经有了惊人的成绩，这我在《创作文坛概观》里早已叙说过了。新的天才渐渐地生长，等到我们底文学一旦成了人类的文学的时候，它便会大放光芒，它会有伟大的工作和崇高的使命。我们底文学并不要代替任何国语的文学，那些自有其不灭的价值，我们底文学也有它自己底位置，与那些是并存不悖的。它并不破坏什么，它只是建设，它将来也许会建设起真正的人的文学来。

各国的文学是带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的，作家们总是极力表现出他这一国人或一地方人底生活行为与思想状态，从里面我们像一个陌生者似地得知道那一个(或一些)某国人(或某地方人)底生活、爱情、享乐、受苦。我们被感动，但我们如同隔岸观火，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自己。

世界语文学则不然，它所应该表现的(如果它还未曾表现出来的话)不是法国人、中国人、日本人所独有的感情，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感情，无论是对于欢乐悲哀、生存死亡。

这并不是空想，这是的的确确做得到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界语民族存在了。

使人类分离者为何　使人类结合者为何　原始家柴门霍夫在一九一一年曾致书于该年七月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人种大会，详论及分隔人类的诸障碍，其主要的就是语言与宗教之差异。他举出世界语作为消除分隔原因的诸方法之一。

诚然世间有许多事项使人类分离，但也有一些事项是使人结合的。譬如受苦便是一个例子。到处都有人在受苦，苦难会使人们亲密地结合起来。如果大家同处在苦难之中，则大家会生活得像同胞一样，协力工作以谋众人底福利，在这样环境之下，便会生出协同的感情来。

一只船遇了难，乘客不曾被救起一个，在那预定抵埠的一天，家属们聚集在码头，怀着期待与恐怖之心情痴等那永不会生还的人之归来，这里面有男女老少，有贫富贵贱(现社会中的奇异的分别)，他们平时是漠不相关的，这时候这一个苦难便把他们结合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希望：愿他们底亲爱

的人生还。不管是贫苦的工人，富家的太太，阔气的绅士，外国的旅行家，天真的姑娘，劳苦的工女，这时候他们都是同样的人，他们都是母亲、父亲、兄弟、姊妹、夫妻、情人，他们受着同样的苦难，这时候苦难便创造出了一致。

世界语文学之使命　在现今的世界上苦难太多了。天灾如火山爆发，如大地震，在一日之间便毁灭了一城一村，使成千成万的人无家无业无衣无食，人祸如战争使得城廓荡然，街市为墟，不知杀死了若干的人。固然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时候各国人民也互相起来救助，像朋友兄弟一样，但可惜这样的友爱并不长久，因为人类间的隔膜还多着呢！不是共处在同一苦难之中便很难了解。世界语文学便是来去掉人类间的隔膜，激起他们底共同的感情，使他们结合起来应付苦难，来谋全体的幸福。世界语文学是散布同情与友爱之工具，它走遍全球，给那般不幸的受苦的人以一点爱情，一点安慰，一点勇气，使他们不致灰心，不致离开生活底正路。靠了它，许多彼此不相识甚至不曾会过面的人居然会共同地哭泣，共同地欢欣，共同地友爱地生活，互相帮助，他们在孤苦寂寞之际会想到"在这一刻有成千成万的心灵在与我共同受苦，我并不是孤寂的"，他们便又有了前进的勇气了。

世间的苦难太多了。这里是要米饭要空气要阳光的哭声；那里是可怜的母亲们底眼泪，她们祈求她们底患病垂死的孩儿恢复健康；那里又是天灾人祸压迫下的人们底呻吟。怀着对于同胞的真正的同情，以及对于受苦的人们的热烈的爱，世界语的作家便毅然地起来把救济受苦的人类的责任放在自己

底肩上，组成了和平战士的队伍，高唱着他们底军歌：

Forte ni staru, brave laboru,	我们要坚定地立着，勇敢地劳苦着。
Kuraĝe, ho nia rondo!	大胆起来呵，我们底这一群！
Nia afero kresku kaj floru	要使我们底事业生长繁荣，
Per ni en tuta la Mondo.①	在全世界里。

（本文根据 E. Privat 底一篇讲演而作）

① 柴氏诗"Al la Fratoj"，见"Fundamenta Krestomatio"P.320

一九三一年

蒲鲁东与《何谓财产》*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那个被称为近代的基督的意大利卖鱼者Vanzetti在死囚牢中曾写信劝我读蒲鲁东底著作。他说蒲鲁东是比较更为接近真理。我并不全然同意他底话，但我在那时候也因他底劝告读了几本蒲氏底著作，至于蒲氏底风行一时的名著《何谓财产》，我早在一九二五年就读过，而且译过一部分发表于某杂志了，不过当时我还不懂得法文，不能直接读蒲氏底原作。

我爱读蒲鲁东底《何谓财产》，而且我想如果Vanzetti能够知道我第一次得到《何谓财产》时的那种情况，他不知要如何地高兴啊！当时的情况，我可以借用Roussanoff批评P. Lavroff底《历史书简》的话来说明：

> 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底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之渴望。我们底幼稚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同时我们底大师底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底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不认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时代前》第一卷第一号。署名李芾甘。

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叫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然而如今我底激情已经消灭了，在将本书译成中文献给中国读者的当儿，且让理性来说几句话罢：

我虽然爱读本书，而且把它译了出来，但我并不完全赞同书中的议论。诚如赫尔岑所说："读蒲氏底著作和读黑格儿底著作一样，启发人底特别能力，磨炼人底武器，而且只把方法，而不把结果供给与人，"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蒲氏底书不是人人能读，人人宜读的，他底书可比一座金矿，里面有无穷尽的宝藏，但须得由你自己去发掘。他底书内容(英国 Postgae 曾将他底著作比之于古歌中所谓"印刷中的圣经"，说没有人能读它们，这未免过分)太博大太庞杂了。蒲氏固然天分极高，可是不善作文(这他自己也承认)。他不能把他所想到的一切马上全写出来，其结果便是说了又说，甚至于自相矛盾。聪明的读者自然可以从中了解他底思想之真髓，但是像教徒那样去读他底书的人，就不会得着什么有系统的东西了。

再就本书来说，谁一旦读到卷首的"财产是赃物"的名言，一定会以为蒲氏是一切财产之死敌。事实上并不如是。蒲氏本人后来在另一部书中说："我自一八四〇年给财产下定义以来所追求的，以及我今日所愿望的，我已屡次反复说过，并不是财产之废除，因为这样做就会跟着柏拉图、卢骚、路易·布朗及其他反对财产的人一道陷入共产制度里面去了，而那般人本是我极力反对的。我所要求于财产的乃是一个平衡。"(见《在革命与教会中之正义》第一卷三〇二页)这样我们就知道蒲氏

所欲杀死的财产(见《通信集》)是指"使用与滥用之权利"而言，即财产之罗马法的定义是也。如果把财产加以限制，作为所有(possesion)解释，他就不攻击，而且还把它视为对付国家侵略之最好的保障。所以在建立了"财产是赃物"的名言以后，蒲鲁东又承认"财产是自由"了。(见《经济矛盾论》)他并不是财产之敌人，他只是那作为有产阶级支配之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之敌人，他要在财产中间建立一个平衡，一个平等。但这一层是一般责备他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责备他矛盾混淆，就以这名言做证据。而事实上他底矛盾并不在此。

蒲鲁东很清楚地看见目的在他底眼前，他极力向着它走去，毫不踌躇，而且毫无顾忌；在他传播他底理想之二十几年中虽然经历了种种发展，但他底基本思想依然始终如一，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底主张。他底著作中的矛盾更要深得多。这是在于他底思想之形式与夫他所属的时代。当时正是独断与归纳互争雄长的时代，而他底素质是过于诚实了，以至流于naive，所以他显明地表现出来，他立在两者之间，他既无力完全打碎一个，又不能完全驯服另一个。他底全生涯与全思想就是一场苦斗，攻击各种形式的独断之永无止息的苦斗。他反对宗教的独断主义，同时也反对社会的乌托邦主义，他反对政治的权威，同时也反对财产的独断，他要把社会主义放在严格的科学的与实在论的基础上面，使它与一切独断的宗教之羁绊脱离。这一个工作他虽然没有完成，但他已经立下基石了。

我们再把蒲鲁东底社会理想，继续说下去。

蒲鲁东不仅承认"个人的所有是社会生活之条件"，而且

还反对共产制度，(我以为用原始共产制度更恰当一点。)他说"共产制度是压制，是奴隶制度"。他自己用黑格儿底公式把他底观念表现出来是："共产制度——正题；财产——反题"，"拿反题去修正正题所得的结果"便是"自由——合题"。自由是社会之第三个形式，亦即"人类协同之真正形式"。

他说："在决定自由底性质之际，我们并不是把共产制度与财产毫无差别地结合起来，这办法未免陷于荒谬的折衷说了。我们用分析的方法去寻求这两者中间所含有的，与自然法则及社会法则相调和的真实的要素，而摒弃其余。其结果我们便有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之适当的表现——这便是自由。"

但自由究竟是什么呢？

自由是平等；是安那其；是无限的变化；是比例性。这四项在本书中解释得清清楚楚。简言之即权利与义务之均衡。

蒲鲁东称他底理想为"互依主义"(mutuellisme)，这主义底进行方法是缓和的。他甚至不想把现在那般大地主、大房主、矿山主、工厂主之类底产业马上充公。他宁愿设法使资本不能得利息，以达这同一的目的。因此他便预备设立一个国民银行，以生产者底相互信用为基础，这般生产者应同意拿代表生产各物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之工券作媒介，来原价交换他们底生产品。在这制度之下，一切劳役之交换均应该是极其相等的。这种银行还可以出借银钱不收利息，只收一厘息(或更少一点)作管理费用。那么无论谁都可以借钱来购买房屋，不必付出租金去租赁了。用这种办法就可收充公之效。对于矿山、工厂也可以用这办法。

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国家当然变得无用了。公民间的主要关系便基础在自由公意上，而且单用记账的方法处理就行了，如有争端则由公意判断。对于国家以及一切政府形式之深刻的批评，与夫对于一切经济问题之深透的洞察，这便是蒲鲁东底著作中的最精彩的地方。蒲氏底书之所以能风行世界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本书又是他底杰作，所以流传尤广，被译为各国文字。在关于财产的著述中，无论在素质上或分量上都当得“冠冕之作”这名称而无愧。

最后还值得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本书第五章在伦理学上有其绝大的价值。这一章内不仅如克鲁泡特金在其《伦理学》中所说“含有不少关于伦理学与正义之可贵的思想”，而且它使我们知道早在一八四〇年蒲鲁东就在社会性（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中看出了道德意识之起原，在生物学的事实中去寻求伦理学的根原了。

他提出了一个从没有人提过的问题：“人底道德意识与动物底道德意识间之差异是种类上的差异，抑或是程度上的差异呢？”

他底答复是空前的，是前人所未敢言的：“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他将社会性（我想这里也可以用道德）分为三个阶段：（1）同情；（2）正义；（3）大量。前二者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第三者即最后一个阶段，才是动物所不能够达到的。

这样看来，蒲鲁东底伦理学的体系岂不是与后来克鲁泡特金根据数十年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研究所苦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相同吗？然而可惜蒲氏只略略地描写出了这

体系之轮廓而不曾详细地阐明它。虽然在他晚年的著作《在革命与教会中之正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底伦理学说之大成，但实际上这部著作也还不曾含有“一个严密的体系之解说”，而且他误把道德与正义视作同一的东西，而忘了他底道德之三个阶段了。

这样看来，约道尔著《伦理学史》时把蒲鲁东列在造成道德学说之深邃的博学的哲学家之林，他确实是值得这个荣誉。

最后我还有一句话奉告读者：在阅读这本书以前，诸君最好要记着蒲鲁东自己底话：

> “我底使命是……‘应该无憎无畏地说，说你所知道的’……”

一九三二年

“贡献给今日的青年”

最近有一个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写信给我。他说：“我是一个中学生，我更是一个热情而不经事故的孩子；在目前我只有苦闷，徘徊，愤怒，绝望，痛哭……”

我知道他是怀着怎样苦痛的心情来求助于我，想从我这里求得一点安慰，一些鼓励。然而我能够给他什么呢？白纸上写的黑字是没有用处的，它们不能够给人一种力量，也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路。这路是需要自己去走才可以发见出来。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我不能够有什么帮助。

但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我这样说：

“生在这个时代中我们是没有悲观的理由，而且也没有悲观的权利。生活的路是很长的，而我们只走了开始的一小段，我们还要经历更惨苦的岁月，更艰难的日子，但我们是要经过这一切而活下去的。我们生在这世界上，并不是作为一件奢侈品来点缀太平，我们是作为一个劳动者来忠实地工作，在荆棘中开辟一条平坦的路。正因为有荆棘，所以才需要我们来开路，来显出我们底工作的力量。只要我们有能力有志愿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学生》第二十一号，系应该刊“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专栏之请作。原无标题。

工作，这荆棘便不会是我们底危险的仇敌，因为我们可以克服它。同理，这黑暗时代正给我们一个奋斗的机会，一个可以显出我们底力量的机会。显然的，在黑暗底后面便隐藏着光明，只要我们能够把黑暗扫去，我们就可以看见光明时代底到临了。所以在目前我们应该快活起来，以快活的心情去工作。

"我们底前面横着一条路。我们的确是有路可走的。这路是太显然了，我们只要把那迷了我们底眼睛的烟雾扫开，我们就可以看见它。我们现在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让烟雾迷着我们底双眼，因为我们底眼前的烟雾太多了。

"的确我们是有热情而未经事故的孩子，所以我们过于相信人，我们常常盲目地跟着别人走，结果是我们常常受了骗。我们现在应该去走我们自己底路。我们不愿再去为别人牺牲。

"我们底年纪太轻了，我们在生活里也还应该有些享受，至少这读书的权利我们是应该有的，因为知识是人人应有的东西。假如时代真不容许我们有些微的享受，目前的时势真要逼着我们去牺牲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去牺牲的地方也并不是东北的战场，如某一些人所说的，而是中国腹地，是民间，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人需要着我们底帮助，只有他们才是最苦痛的。那些在洪水、旱灾、兵祸之下苟延残喘的人们底悲惨的生存是没有人顾念到的，而且别人还继续在种种好听的名词下去掠夺他们。要是我们能够走入中国底腹地去看看那些人底生活啊！但我们并不去看，而更可悲的是他们负担了我们底生活费用。

“总之，如果目前的时势真正逼迫着我们放弃掉读书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底工作也并不是去和买办阶级商量经济绝交，去向军阀请愿出兵；我们底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底腹地去，尤其是那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底乡村。在那里，在那些真正负担着整个中国底生存的人民中间，我们会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底幸福怎样才可以获得。他们底幸福就是我们底幸福，他们底需要就是我们底需要。那就是我们底路。如果他们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人过问，那么中国是决不会得救的。”

克鲁泡特金*

幼年时代

一

"许多的男男女女并不曾过着一个伟大的生活，却也成就了伟大的人生事业。许多人的生活虽然是十分平凡无足轻重，却也很有兴味。至于克鲁泡特金的生活则兼有着伟大与兴味二者。"丹麦布南德斯在克鲁泡特金的自传的序文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然而我现在所描写的并不是这"伟大与多兴味的"生活的全部，我在这里只想把他的少年时代展现出来，这少年时代正是他后来的多变的生活的根柢，同时从这个我们也可以窥见他的生活之一斑。

要描写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却不得不先略略提说到他的幼年，因为少年时代是从幼年发展来的。

彼得·克鲁泡特金于一八四二年生在一个莫斯科旧贵族家庭里，是他的父亲的第三个儿子；在十五岁以前，即是进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学生》第二十五号"革命者的青年时代"专辑。

侍学校以前，他的生涯差不多都是在家庭里和他的比他年长一岁多的哥哥亚历山大一块儿度过的。他的父亲算得是尼古拉一世时代中的一个模范军官。这种军官并不见得就有尚武的精神或酷爱军营的生活，有些甚至一生不曾参加过一次战争，不过却非常爱穿军服，而且对于操练检阅等等把戏特别擅长。

作为当时的模范军官的他的父亲，同时也正是当时的典型的贵族。老克鲁泡特金和别的贵族一样，也是被尊大、虚伪、冷酷支配了生活的。虽然有时候他也表现出来是一个天性宽仁的人，但他究竟是一个贵族，而且“很知道一个贵族应该怎样生活”，所以他有时也可以变得非常残酷。同样在日常生活方面，他有时很知道节省，但有时他的耗费又是很可惊人的。小彼得叙述他家的那种奢华生活道：

“差不多每晚我家都有宾客。在大厅里绿色的桌子都让给玩纸牌的客人使用了，女客和年轻人却都留在客厅里，或者围聚在海伦姊姊的钢琴旁边。等到女客辞去以后，玩牌的人依旧兴高采烈地玩下去，有时候竟玩到早晨一两点钟的光景。这其间输赢的数目也很不小。……跳舞会也是常常举行的，还不把每年冬季应有的两三次大跳舞会算在里面。在这些情形中，父亲的主张就是不管花费多少钱，总要事事办得很漂亮。”

然而这种家庭在日常用度上面的节省又是非常可笑的。小彼得曾经叙述过邻居的一个贵族的故事，这贵族早晨和厨子讲了半点钟的菜钱，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就非常高兴地驾

了车出去，到了大商店里给妻子买了一瓶上等香水，给女儿买了一件新的天鹅绒大衣。

与奢华的贵族生活同时显现在小彼得的眼帘的，又有那悲惨的农奴生活。这两方面对比起来，是一幅何等刺激人的景象。地主强迫配合的婚姻，违抗时的残酷的处罚，恋爱的悲剧，青春的浪费，悲惨的运命，烦重的工作，这些都是他在幼年时代目睹的事实。还有别人告诉他的：男男女女被人生生地拖走，离开家庭和故乡，被地主买卖，被地主在赌博时输给别人，被地主拿去换一对猎狗，然后被押送到远地方去开垦新地；许多小孩被人从父母的怀抱中拖出来卖给残酷荒淫的主人；农奴中每天都有人要在马房内受着极其残酷的鞭笞；一个少女不堪虐待，投水自杀；一个老人替主人劳苦了一生，到了白发的时节，终于缢死在主人的窗下。这许多故事无疑地在小彼得的精神上留下了不灭的影响。

然而他还更进一步地了解着农奴的生活，因为他和哥哥亚历山大两人是常常在农奴中间生活的。譬如星期日，全家的人都出去拜客去了，只剩了他们两个小孩子在家，两个家庭教师也请了假出去。他们把中饭吃过就赶忙跑进客厅去，接着年轻的婢女们也都跑进来了。于是大家便开始玩着各种各类的游戏：如捉迷藏、老鹰抓小鸡之类都玩过了；过后一个叫做狄公的仆人便带了一只提琴走进来，大家又开始跳舞。到了晚上九点钟光景，一辆大马车开出去接主人。狄公便把地板刷得干干净净，屋内陈设也全都恢复了原状。

有时候他们看了戏回来趁大人不在家时，就在家里和仆

婢们学着演戏。拉了俄国教师，俄国保姆和几个婢女来做看客。譬如他们看了名女伶芳妮·爱斯莱的关于吉普色女郎吉丹娜的戏，回来就叫一个最年轻的婢女来扮吉丹娜。一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人握着椅子的两脚向前推去，就充做小车；两把椅子架上一块熨衣服用的木板就做成了桥；一条蓝色棉布放在地板上代替溪水；又把法国教师剃胡须用的一面小镜子放在桥下，这样吉丹娜走过桥上时也勉强可以装出看见溪水里的面影了。

这样的游戏自然是他们的父亲和继母所不许可的。不过奴隶们做得很秘密，而且他们弟兄也从不曾泄露半句，或者说过奴隶们的坏话。至于奴隶们对待这两个小孩子更是再好没有的了。小彼得叙述过不知道有若干次，在黑暗的走廊下仆婢的手曾把亚历山大和他爱怜地抚摩过。还有一次这两弟兄在大厅里嬉玩，把一盏贵重的洋灯打碎了。于是仆婢们马上聚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议定第二天绝早由狄公冒险偷偷出去买一盏同样的洋灯回来，花了十五个卢布，钱是奴隶们凑集的，这在他们实在是一笔大款子，但是他们却不曾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的精神当然会受了大的影响，所以他看见一个仆人马加尔枉受笞刑就会淌出眼泪，并且还去安慰那人。当那人挣脱开手生气地说："不要缠我，你，你将来长大成人时，难道你不也就是一样的吗？"时，他们却坚决地回答道："不，不，决不会的！"

充满着爱与热情的人道主义的战士克鲁泡特金的面影，

在这时候就像电光般显露出来了。

二

克鲁泡特金把他所受到的最初的道德的感化归功于他的母亲。这个母亲是他在三岁半的时候失掉了的。他说："我们的全个幼年时代都因了母亲的纪念而生了光彩。"他的对于人生的纯真的热情就是在母亲所遗留下来的爱的氛围气中间培养成功的。提到他的母亲，他说："所有知道她的人无不爱她。家中的仆婢想起她，还表示很大的尊敬。德国保姆布尔曼夫人之所以照顾我，是为着母亲的情分；俄国保姆之所以一心一意爱我们，也是为着母亲的情分。……有时候一个农妇在田间遇着我们就会问道：'你们将来会像你们的母亲那样好吗？她真正怜恤我们。你们也会如此，一定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家里仆婢中间，不曾得到一般孩子所应该享受的爱的氛围气，那么不晓得我们以后会变成了什么样子。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母亲的孩子，我们和她相似，他们便热爱我们，而且有时候这热爱还表示得令人感泣。"

可惜这个母亲死得太早了。父亲娶了继母，然而继母并不肯照料这两个小孩。所以这两个小孩的教育责任就落在被聘请来的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和一个俄国大学生的肩上。这两个人对于小彼得日后的智慧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当时莫斯科贵族的子弟多数是由法国人教育的，那般法国人大都是拿破仑大军的余党。小彼得弟兄的教师布南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人。这个教师带了一条猎狗，一把咖啡壶，几本

法国教科书来到克鲁泡特金家里。这样就开始他的教育工作。

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很简单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学生诵读，从书中划得有指甲印的地方起读到有第二个指甲印的地方为止。课本永远是那几种：一本法文文法书，一本法文会话书，一本世界史，一本世界地理。学生必须把文法、会话、历史、地理一一念熟。

小彼得叙述他的每日的课程如下："以'文法者何?——文法者，善言能文之术也'等名句开场的文法书倒还容易读。然而不幸那本历史书却有一篇序言把历史之知识所能给与人们的利益一一列举出来。开头的几句还容易念过去。我们念道：'帝王于历史中可得统治臣民之宽宏的例证；军事领袖于历史中学得高尚之战术。'这一点也不困难地就念过去了。可是一念到法律的时候，就不行了。'法学者于历史中可发见。——'然而那位博学的法学者究竟从历史中发见出什么，我始终不曾知道。这个可怕的名词'法学者'就把我们的兴味完全打破了。我们一念到它，马上就闭口不念了。那时候布南先生便叫起来：'跪下!'我们就一同跪了下来，流着眼泪拚命想把关于法学者的文章完全念熟。可是没有一点用处。

"说到地理，如果布南先生的地理书上也有一篇序言，那么不晓得又会生出什么事。幸而那本书的前二十页已经被撕掉了，所以我们便从第二十一页读起，开头便是：'——灌溉法兰西之诸河。'

"老实说，我们所受的刑罚并不止罚跪一种。在教室里还

有一根赤杨木的棍子。要是我们实在无法把那篇序言念下去，或者关于品德礼让的会话没有进步的希望时，布南先生便会求助于那根棍子了。”后来因了他们的海伦姊姊的干涉，他们才免得再受笞刑。

布南先生给与小彼得的影响，还是课外的时候多些。因为在课外他就由一个面目可憎的教师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同伴了。吃过中饭以后他便带着小孩们出去散步，那时候他的话是说不完的，而彼得弟兄也就“像小鸟般饶舌起来”。所以虽然他教授的范围从没有出过章句法的前几页，而学生们不久也就学会“善言”了。同时虽然他从神话学的专书里摘出一段要学生默写，然后根据原书来改正错误，从来不肯给他们说明为什么一个字应该是这样特别的写法，而学生们也就学会“能文”了。

另一个家庭教师是莫斯科大学的法科学生斯米尔诺夫。彼得弟兄们在中饭后就跟着他上课。他教授的尽是俄文教材——文法、算术、历史等等。同时又教学生们每天默写一页历史，靠了这实习的方法，彼得弟兄很快地就学会写俄文，写得很不错了。

但是给彼得弟兄以更大的影响的，还是布南先生在课外叙述的法国革命的故事和斯米尔诺夫介绍的当时的文学作品。布南先生叙述的一段关于米拉波伯爵自愿废弃爵位的故事曾给了小彼得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自己说：

“米拉波为了要表示他轻视贵族的爵位，便特地开设了一家店铺，招牌上写着‘米拉波裁缝店’（这故事是按照布南先生

所告诉我们的话而转述的)。听了这故事以后我曾费了很久的时间思索我应该学习何种职业，以便将来写着'克鲁泡特金,某种手艺人'等字样。后来我的俄国教师斯米尔诺夫以及俄国文学之普通的共和主义的色彩又给我以同样的影响。所以我在十二岁写小说的时候就单用'彼·克鲁泡特金'这个署名。……我一生从没有用过爵号。"

尤其是斯米尔诺夫，小彼得自己承认这个俄国教师是给他的智的发达以第一回鼓动的人。斯米尔诺夫抄录了许多被当时的检查官任意割裂禁止的文学作品给他诵读。如郭哥里和普希金的作品他都读过了。斯米尔诺夫又指导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小银币的历史》，那时他只有十二岁的光景。不久他又发刊了一份日报,后来又改成月刊,这杂志的唯一订阅者就是斯米尔诺夫。甚至在离开这家庭以后斯米尔诺夫还按期送许多张纸来做他的订阅费。

三

老克鲁泡特金希望他的儿子都成为军人，他的宿愿果然酬偿了。因了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亚历山大进了莫斯科士官学校,彼得也进了近侍学校。

亚历山大是在一八五二年离开家庭的，那时彼得还只有十二岁，他应该留在家里等着到了近侍学校的入学年龄。亚历山大在学校里受了两个文学教师的感化，他的智力便得以迅速地发展，从而他又帮助了彼得的智力之发展。这其间彼得曾被送到莫斯科一个中学校读书，后来却又回到家里和斯

米尔诺夫住在一处，研究学问，有时候跟着父亲到里阿赞领地去旅行。在旅行中他和斯米尔诺夫间的友情变得更为亲密了。同时一路上所经过的多山的地域又给了他深的印象，使得他的逐渐增长的对于自然界之爱好增加了不少。

到了一八五七年秋天，彼得就到圣彼得堡去进近侍学校了。这事情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的。那时他只有八岁，跟着一个贵族妇人去参加莫斯科贵族庆祝尼古拉一世即位二十五年纪念组织的化装跳舞会。他的可爱的容姿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尼古拉凭着一时的高兴，就派了八岁的小彼得做近侍的候补者。这样使得他在小小的年纪就不得不受军人的教育了。

被选入近侍学校，这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间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是一个大的恩典，尼古拉很少把这恩典颁给莫斯科贵族的。所以老克鲁泡特金非常高兴。恰恰在彼得十五岁的时候近侍学校里有了一名缺额，因此彼得不等到入学的年龄就可以进去了。

老克鲁泡特金的多年的梦想到底成了事实。但是彼得自己却没有一点快乐。他说："我带着悲叹离开了家庭，我的悲哀是很大的，特别因为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距离阻止了我和亚历山大哥哥的会面，而且在那时候我就已经把进陆军学校的事情当作我的不幸了。"

学 校 生 活

一

近侍学校兼有着两种性质，可以说是有着特别权利的陆军学校和隶属于皇室的宫廷学校二者之混合物。学生名额只有一百五十人，大都是宫廷亲贵的子弟。在近侍学校毕业出来，马上就可以到自己选择的联队或禁卫队中做一个军官。此外每年最高级的前十六名学生都要受着“宫廷近侍”的任命，就可以亲身和皇帝、皇后、大公爵等皇族接近，而且将来还有做皇帝或大公爵的侍从武官的希望。这自然是绝大的荣誉，并且还是一个繁荣显达的捷径。因此显贵人家的父母都要尽力设法使儿子不要错过入近侍学校的机会。谁也想不到从这种特权的贵族学校里居然培养出一个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家来。克鲁泡特金的全部学问的根柢就是在这里培养成的。

这个学校内共分设五级，最高的是第一级，最低的是第五级，彼得本想进第四级，然而因为入学试验时他对于算术的小数并不十分熟习，并且第四级本年已经有了四十多个学生，而第五级的学生却还不到二十个，所以他便被编在第五级里了。

这个决定使他大不高兴。他本是不愿意进陆军学校的，现在却要在这里多住一年，而且第五级里的功课他已经完全学过。那么他还要在第五级里干什么呢？他含着眼泪把这件事告诉了学校里的监督温克勒(即教务主任)，然而监督却诙谐地回答道：“你该也晓得该撒曾经说过——与其在罗马做第二

人，不如在乡村做第一人。”他也就热烈地声明，他却真正愿意做罗马的第二人，只要他能够早日离开陆军学校就好。但这也没有用，监督并不允许升级，只是劝慰他说：“也许过了一些时候你就会喜欢这学校的。”

他当时自然很不快活，但是后来他回忆遥远的过去的时候，他却觉得“不能不感激被编入下级的事情了”。他解释说：“因为在第一年里只是复习我所已经知道的功课，我便有了一种习惯单靠着听教习在课堂里的讲话来学习我的功课；下课以后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来随意读书作文了。临试验时我从来不去预备功课的，学校里本来定得有准备试验的时间，这时候我便用来向几个朋友朗诵莎士比亚或阿思忒罗夫斯奇的剧本。当我到了较高的‘特别级’的时候，我也已经这样准备得很好，可以融会贯通我们所应该学习的不同的各门功课了。”

校长是一个老年将军，他并不负什么责任。实际的主脑是一个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军官，叫做柔拉多大佐的。这人是个耶稣会徒，身材瘦小，极其狡猾。他非常专制，而且十分憎恨那些不服从他的管束的学生。学生们很怕他。“大佐”两字不绝地悬于众人之口。学生给别的长官都取了绰号，就用绰号来称呼他们，然而没有人敢给柔拉多大佐取一个绰号。大家以为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好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事实上他的整个白昼的时间和一部分夜晚的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甚至学生在课堂里上课时他还是在四处巡行，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学生的抽屉乱翻。至于夜里，他也还要这些时间来用特别的记号和各样颜色的墨水把学生的

功课一一记录在记事册中的各栏里。他所有的这样的记事册差不多可以成了一个图书馆了。

在这人的管理之下学校的内部生活是很苦的。本来在所有的寄膳宿学校里新学生总要受着旧生的压迫。在近侍学校里却是特别厉害。在这学校里第一级的学生即宫廷近侍可以任意虐待下级的同学，不受一点干涉。谁敢反抗就会被他们拖进一间房子里用橡木戒尺痛打一番。柔拉多是知道的，可是他一点也不作声。因此第一级的学生便可以随他们的意思做去。就在彼得入校的前一个冬季，他们的最得意的游戏之一就是在夜里把"新生"聚集在一间房子里，叫他们穿着寝衣，做成一个圈子跑，好像在马戏场中跑马一样。而那般宫廷近侍却拿着橡皮的鞭子，有的站在圈子中央，有的站在圈子外面，残酷无情地鞭打那些跑着的孩子们。

然而一种新的精神在这学校里觉醒了，不久就起了一次革命。第三级的学生起来反抗，居然把那般宫廷近侍着实打了一顿。因此第一级的威权便渐渐失坠了，等到彼得入校的时候，橡皮鞭子虽然还在，但决不再使用了。"马戏"和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然而最低的一级第五级差不多完全是些新入校的年纪极轻的孩子，所以依然不得不服从宫廷近侍们的私意。学校里有一所古木参天的美丽的花园，但是第五级的学生很少能够享受的：他们被逼着推动一个上面有座位的大圆旋盘，而那般宫廷近侍们却坐在里面闲谈，有时候那般近侍先生们玩九柱戏，又要叫他们去拾球。彼得入校

后不过几天的光景，看见了花园中的那种情形，心里很不高兴，便不到那里去了，只是留在楼上。有一天他正在读书，忽然一个有红萝卜色的头发而脸上生满了雀斑的宫廷近侍跑上楼来，命令他立刻到花园里去推动圆旋盘。

“我不去；你不看见我正在读书吗？”彼得这样回答。

那个近侍发怒了，那张难看的脸变得更丑。他正要扑到彼得的身上去，彼得便动手防御。他用制帽去打彼得的脸。彼得尽力防御。他就把制帽掷在地上，命令说：“拾起来。”

“你自己去拾，”彼得强硬地回答。

以后接连几天彼得都受着同样的压迫，但他依旧顽强地留在楼上不下去。他的个性太坚强了。近侍们也把他没有办法。

这种压迫不久就终止了。因为多雨的季节一来，学生便只得在室内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在花园里第一级学生吸烟是自由的，在室内就有一个专门的吸烟室，那里很清洁，常常燃着火炉。第一级的学生霸占着这地方，不许别级的学生在那里吸烟。他们自己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就聚集在火炉旁边一面吸烟一面闲谈，一直到十一点半钟。那时候学生本应该早已睡熟了，所以他们害怕会被柔拉多突然跑来撞见，免不得要受他的干涉。他们便强迫着第五级的学生去给他们守望。每一次两个学生轮流地被他们从被窝里拖出来，强迫着在楼梯旁边徘徊守望，要过了十一点钟才可以回寝室去睡觉。

然而反抗的决心终于产生了。第五级的学生全体决定不要再去给宫廷近侍守望。一天晚上守望的轮值到了一个旧生

和一个新生的头上，那新生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孩子。那旧生最先被叫去守望，但他拒绝了，那两个宫廷近侍也就不去管他，随后便去叫那胆小的新生，他已经睡在床上了，他也不肯去，他们便拿起那重的皮带凶暴地向他乱打。那个旧生唤醒了近旁的几个同学，他们几个人便跑去找柔拉多。

彼得也已经睡在床上了，忽然那两个宫廷近侍走到他的床前，命令他去守望。他拒绝了。于是那两人便抓着两根皮带来打他。(学生睡觉时平常总是把衣服折得齐齐整整放在床前的一个凳子上，然后放着皮带，领带再横放在上面。)他坐在床上用手来防御，已经吃了几下重打，忽然一个命令到了："第一级学生到大佐处去！"那两个凶猛的战士马上变得非常和顺了，急忙把他的东西放好。

"不要说一句话，"他们低声向彼得说。

"领带横放在上面，不要弄乱了，"他对他们说，那时候他的肩上和腕上吃打的伤痕正燃烧地痛楚着。

第二天学生排班预备下楼到食堂去的时候，柔拉多却用细小的声音向他演说道，宫廷近侍居然辱打一个出于正当拒绝的孩子，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不用说守望的事就从此消灭，而且这还给了那种虐待新生之弊风以一个最大的打击；那种弊风以后也就废除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柔拉多对于第五级的学生很不高兴，尤其讨厌彼得，每遇着机会就要来实行报复。彼得自己叙述道：

"幸而他没有责罚我的机会。我不吸烟。我的衣服总是穿得齐齐整整，钮扣是扣着的，皮带也束得很好，晚上又折得

很整齐。

“我本来喜欢各种的游戏，然而因为我终日耽于读书以及与我的哥哥通信，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到花园里去玩球了，我常常急急回到楼上去读书。不过当我犯了过失的时候，柔拉多却不来责罚我，他却去责罚那个做宫廷近侍的我的亲戚。譬如有一天我在食堂里做了一个物理学的发见：我看出来玻璃杯受敲时所发出的声音之高低当以其中所盛的水量为标准，我马上就拿四个玻璃杯来实验，要得出一个完全的谐音。然而柔拉多站在我身后，他并不向我说一句话，他却把我的亲戚拘禁起来。那青年是我远房的堂兄，过后我向他道歉，他连听也不愿听，他向我说：‘很好。我知道他素来就讨厌你。’……”

然而柔拉多势力却很快地消失了。全校校风完全改变。柔拉多实现了他的理想凡二十年，这理想就是：他的学生应该把头发梳得很光滑，而且有美丽的卷发和女孩子似的面貌；他送到宫廷里去的近侍应该是像路易十四的朝臣那样地文雅。他并不大管他们究竟是否学到了一点学识；他所喜欢的学生的衣服行囊应该装满着各种刷指甲的刷子和香水瓶，他们的“阔气的制服”（星期日归家时可以穿的）应该是最上等，最精致的，而且他们知道行最出色的“斜身礼”。

但是这已经成了过去的事情。一种真挚好学的精神在近侍学校里和在一切其他学校里一样地开始发达起来了。在前些年里，近侍们确信，无论如何他们有方法可以得着升进禁卫队军官时所必需的分数，所以在学校内的前几年里几乎完全不读书，只有到了最后的两级中才开始多少用功学习一点。

如今便是下级的学生也非常用功了。道德的风气也和几年前的完全不同。东方式的娱乐已经被众人嫌厌了。至于那一两次想恢复旧风习之企图，不过引起了大的非难，甚至传到了圣彼得堡的交际社会中。柔拉多终于被免了职。

二

在柔拉多免职以后，同时又受着一般教育的改进之影响，近侍学校的内部也大大改革了。监督温克勒本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炮兵大佐，又是优良的数学家而兼有进步见解的人；他想出了一个鼓励学生们的好学的精神之绝好的方法。他取消了从前担任低级功课的那些平庸的教师，尽力给他们聘了最好的来。据他的见解要把一门学科的初步教给极其年轻的孩子乃是最难的事，非有丰富学识的教师不行。因此他便聘了一个第一流的数学家而且是天生的教师苏空林大尉来担任第四级里的代数初步的功课。第四级的学生马上就爱好数学了。

后来监督又给彼得这一班学生聘了两个好教员来。一个是精通俄国文学的大学者克拉沙夫斯基教授来专门教这一级的俄文文法一门功课，一直到这一级毕业为止。另一个是皇家图书馆馆长柏克先生来教德文功课，也是专门教这一级到毕业为止。

对于柏克先生，彼得自己批评道：

"耶位'做腊肠的'马上就获得了我们的尊敬。一个身高的宽额的有着一对很和善而聪明的眼睛的人来到了我们的课堂，用很流畅的俄国话告诉说，他想把我们这一级分成三组。

第一组里尽是些德国孩子，他们已经懂得德国话了，所以应该做烦难的工作；第二组就是普通的学生，他依照着课程表上所定的，起初给他们教授文法，后来教授德国文学；他又带着一个可爱的微笑说第三组就是'堪察加'（在俄国学校内每间课堂里的最后几排都被称作这个辽远的未开化的半岛的名称）。他说：'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每一课要你们抄写四行文章，我会从书里给你们选出来。这四行书写完后，你们便可随意去做你们的事；只是不许妨害其余的人。而且我允许你们五年以后你们总会学到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好，谁加入德国人一组？你，席达克尔堡？你，南斯多弗？也许还有几个俄国人吗？谁又加入"堪察加"？……'五六个完全不懂德国话的孩子便住在那个'半岛'上。他们很忠实地抄写四行德文书（在高级里时便抄十行或十二行），而柏克先生每次选这几行书都选得非常之好，对于这般孩子非常注意，所以五年之后，他们也真正懂得一点德文和德国文学了。

"我加入了德国人一组，亚历山大哥哥在他致我的信中一定要我学德文，因为德国文学是异常丰富，而且每本有价值的书都已经有了德文译本。我便热心地学习德文。我把一页难懂的描写大雷雨的诗的叙述翻译成俄文，并加以彻底的研究；我又依先生的劝告把动词之变化，副词和前置词记得很熟，——我便开始读德文书了。这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好方法。柏克先生还劝我订阅一份廉价的图画周刊。这周刊里的插画和短篇小说常常引起我的兴趣来读几行或者一栏。不久我便懂得德文了。"

克拉沙夫斯基教授所给与彼得的印象又是这样的：

“他的第一课对于我们简直是一个启示。他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当他走进课堂来授第一课的时候，他低声对我们说，他因为患了许久的病不能够大声说话，因此便要求我们坐得靠他更近一点。他把他的椅子放在第一排桌子旁边，我们就聚集在他的周围，像一群蜜蜂一般。

“他担任的功课是俄文文法；然而我们所听到的并不是干燥无味的文法课，却是和我所料想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固然是文法；但有时候却是古俄国民歌的句法和荷马的诗篇之一行或梵文诗《摩诃波罗陀》之一行的比较(自然后者的美丽句子已译成俄文了)；有时候是席勒的名诗，接着又是对于近代社会的偏见之讽刺的批评；然后又是充实的文法了，过后便是一些广泛的诗的和哲学的概括。

“自然其中有很多地方是我们所不懂的，或者我们不能明白它们的更深的意义。然而一切研究的魔力却正是在它能给我们不断地开辟意料不到的新眼界；这些眼界是我们此时以前还不曾知道的，它们却又引诱我们更深入地去看透那个最初看起来只是一个含糊的轮廓的东西。在先生讲书之际，我们中有的把手放在同学的肩上，有的靠着前一排的桌子，有的紧紧地站在先生的身后：我们全都专心地望着先生的嘴唇。钟点快到的时候，他的声音更低了，我们更聚精会神屏息地听着。监督开了课堂的门来看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新教员。然而一看见这一群动也不动的学生，他便悄悄地走了。甚至那个好动的孩子道洛夫也静静地注视着克拉沙夫斯基，

好像在说：'你就是这一种人吗？'连那个没有希望的蠢孩子也端坐不动。在其余大部分学生中有什么善良的，高尚的东西在他们的心底慢慢儿沸腾着，好像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之幻景在他们的眼前打开了。对于我，克拉沙夫斯基也有一个绝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是与时俱增的，温克勒说的我也许会喜欢这学校的预言如今毕竟应验了。"

在这以前还有一个教师以另一种方法也给了彼得以大的影响，这就是教员中位置最低的习字教师犹太人爱伯尔特。戏弄习字教师是近侍们的拿手好戏。他之所以还在这校里授课，完全是因为贫穷。那些在第五级中留了两三年不能够升级的旧学生对待他很坏。不过他也给他们订了一个妥协的条约："每一课只准闹一次，不得再有第二次。"但是学生们并不常常遵守这条约。

据彼得说："某一天一个坐在'堪察加'的学生把擦黑板用的海绵浸湿了墨水和白垩灰向着那可怜的习字先生掷去。'爱伯尔特，受罚罢！'他带着愚蠢的微笑大声叫道。这海绵打着了爱伯尔特的肩头，污秽墨水喷出来溅他一脸，还流在他的雪白的衬衣上。

"我们相信这一次爱伯尔特一定会离开课堂去报告监督。然而他只不过取出手巾把脸拭干净，一面叫道：'诸位，只闹一次——今天不许再闹了！'他还用了捺住的声音再说了一句，'衬衫弄坏了，'依然继续着批改学生的习字帖。

"我们反而呆了，觉得很是羞愧，为什么他不去报告监督却想到我们所订的条约呢？这时候全级的同情都集于他的一

身。我们责备我们的那个同学道：'你所做的乃是愚蠢的行为。'有的人还叫道：'他是穷人，而你却把他的衬衫弄坏了！真可羞！'

"那个犯了过失的学生便立刻去向教师谢罪。'先生，你应该用心学习呵！'这就是爱伯尔特的回答，他的声音里带着悲哀。

"全级的学生都变得非常沉静了，上第二课时好像我们预先商议定了的，大部分的学生都用心好好地习字，然后把习字帖送到先生的面前请他批改。他满面光彩；这一天他觉得很快乐了。

"这件事给了我以很深的印象，而且是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去的。至今我还感激那个人所给我的这教训呢。"

坏的教师依旧是有的，譬如那个叫做甘池的图画教师，学生很看不起他，因为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他在课堂上并不大注意大部分的学生，只是专门去修改那些在课外从他学画或者送钱给他要在考试时拿出好画来博得优等分数的学生们的图画。但这人又不知趣，他对待学生非常严厉，凡有学生在他上课时戏玩，他便要去报告监督。因此学生更加憎恨他。大家就开始想法来制服他。

有一天彼得这一级中两个优秀的同学口里衔着纸烟走近甘池面前问他要火柴。自然这不过是和他开玩笑，在课堂里吸烟，是从来没有人敢想到的。依着校规甘池只应该把这两个学生逐出课堂。然而他却把他们的名字记在日记簿里，使他们受着严重的处罚。

这时候学生们不能够再忍耐了。他们决定立刻要惩戒甘池一次。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议定了一个妥善的办法。彼得叙述当时的情形道：

“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奈沙多夫把他的画送到甘池的面前，甘池拿着画修改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之久。到后来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他先站了一刻，望着我们，才坐下了。……全级的学生突然掉转过身子，戒尺便在书桌上愉快地响起来了，我们中有的人还高叫着：‘甘池出去！打倒甘池！’闹声震得人耳聋；全校的学生都知道甘池受了惩戒了。他站在那里，喃喃地说些什么，最后毕竟出去了。一个长官跑了进来——闹声还不停止。过后副监督便冲进来，随后监督也来了。闹声立刻停止。监督就开始训斥学生。

“‘级长马上受禁闭，’这是监督命令。我是这一级中的第一名，因而是这级的级长，这时候就被带到地牢里囚禁起来。这使得我看不见其后的事。校长来了；校长要求甘池举出几个为首的学生的名字，可是甘池却举不出一个名字来。他回答道：‘他们都掉过身子以背向着我，就开始闹起来。’因此全级学生便被赶下楼去，虽然在这学校中笞刑早已废止，但这一次那两个向甘池要火吸烟的学生却挨了一顿赤杨棍的鞭打，说驱逐甘池的事是为了他们受罚复仇而起的。

“十天以后我被释放出来回到课堂里，才知道这件事。记在课堂里学行优良牌上的我的名字已经被拭掉了。我对于这个丝毫不以为意。然而我必须承认在地牢中没有书读的十天的生活是长得难受，所以我便写了一首诗（其中尽是些粗暴的

句子）来赞颂第四级学生的崇高的行为。

“自然，我们这一级学生便成了全校中的英雄。整整在一个月以内，我们不得不反复重述这件事给各级学生听。他们都祝贺我们能够这样一致地行动，以致没有一个学生单独被查出受罚。

“甘池此后也不再告发学生了。可是我们完全失掉了对于图画的兴趣。老实说，没有一个人肯向那个专门要钱的人学画了。”

三

除了教师外，在彼得的智的与道德的发展上给与重大的影响的人就是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了。所以彼得夸耀似地说：“有着一个友爱而聪明的哥哥，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是一大特权。”

这时候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士官学校里，他们弟兄间书信往来不绝。如今比不得在家里，不会再受父亲的干涉，在信里他们可以随意自由地讨论一切了。但是他们没有许多钱买邮票，因此不得不把字体写得非常细小，在一封信里要写很多很多的事情。亚历山大的字本是写得很美丽的，他的一张信纸上可以容得下印刷物四页的字数，而他的细小的字是和最好的排印活字一样地易读。

“我们的最初几封信大半是描写我们的新环境的详细情形，不过我们的通信不久就有了一种更严肃的性质。哥哥不能够写些琐碎的事。便是他在交际社会的时候，他也只热心

于严肃的讨论；如果他和那些只谈闲话的人在一起，那么，他便感到一种肉体的痛苦了。他在智力之发达上是远优于我，他陆续不断地提出科学上和哲学上的新问题，向我指示应该读什么书，以及应该研究些什么。有着这样的一个哥哥在我是多么大的幸福！——我的这个哥哥并且还爱我至深。我的智力发达之最优的部分皆是他给与我的。

"有时候他又劝我读诗，在他的来信中便把他能够记忆的诗句甚至全篇的诗抄与我。他写道：'读诗罢，诗可以使人变好。'后来不知道有若干次我曾切实体验到他的这句话是多么真实！……然而我必须声明我所喜欢的诗人并不是哥哥所爱的那几个；他的诗的天才，他的富于音乐的两耳，他的哲人的气质使我们两人对于诗人的爱好不相一致。……我爱的是奈克拉索夫。奈克拉索夫的诗句常常是不谐和的，但是这些诗句的对于'被践踏的与被虐待的'之同情却引起了我的内心的共鸣。

"他有一次告诉我说：'每个人都应该具有一个生活之固定的目标。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方针，生活便不是生活。'他劝我选定一个生活之目标，使我的生活不致浪费。我当时还是异常年轻，不能够寻到一个目标；然而在他的劝告之下已经有一种含糊不定的'善良的'东西在我的心里觉醒起来了；虽然我还不能够说出那'善良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我们的父亲只给了我们很少的零用钱，我简直没有钱去买一本书；然而如果亚历山大哥哥从一位伯母那里得到了几个卢布，他决不肯随意花掉一个，他总是买一本书寄给我。他

不赞成胡乱读书。他告诉我：'对于自己所要读的书，必须先提出一些问题。'但我当时并不以这话为然。我如今想起当时所读的各种的书(大都是十分专门的书，而且关于历史的书尤多)数目之多也不禁惊异。

"自然，我们的通信中的主要题目，就是那些关于我们的宇宙之概念的大问题。所谓宇宙之概念即是德国人所说的Weltanschau ung(宇宙观)……我们在幼年就不曾信仰过宗教。"

其次他们又讨论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上的种种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彼得从亚历山大那里得了不少的益处。

这时候他的海伦姊姊已经嫁了，住在圣彼得堡；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便去访她。她的丈夫有很好的藏书，其中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以及近代法国历史家的著作都非常完备，他便耽读着这些藏书。这样的书在俄国是被禁止了的，他当然不能够把它们带到学校里去；所以每个星期晚上他总要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去读百科全书派学者的著作，福禄特尔的哲学辞典，斯多噶学派，尤其是阿勒利奥斯的著述等等。宇宙之广大无边，自然之伟大，它的诗，它的永远悸动的生命，这一切给彼得的印象愈过愈深。那个无穷的生命与其和谐，使他享受到了一般青年心灵所渴望的忘我的赞叹，而他所爱好的诗人又用诗句给他表现出了对于人类之新生的爱以及对于人类的进步之信仰，这种表现鼓舞着青年们走向善良的路，给他们以终生不忘的印象。

四

每年夏天近侍学校的学生总有半数被带到彼得荷夫的野营去。不过低年级生不必加入这种野营生活。彼得就有机会回家去了。他自然是很高兴的。他说："离开学校搭车到莫斯科，在那里和哥哥会面：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希望，我盼望着这个重大的吉日早日到来，我不能忍耐地计算着中间距离的日子。然而有一年我到了莫斯科，却遇着了一个大大的失望。亚历山大在试验时落了第，须得留级一年。事实上他的年纪太轻，还不能够进特别级，不过父亲却很恼怒他，不肯允许我们弟兄两人会面。我觉得非常忧愁。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彼此间有不少的话须得交谈。我试要求父亲允许我到苏里马舅母家去，在那里我可以设法和亚历山大会面，然而父亲绝对不答应。自从父亲续弦以后，我们是从来不许到母系亲戚的家里去的。

"那一年春天我们的莫斯科府第里有不少的客人。每晚上客厅里总是灯烛辉煌，音乐队奏着乐，做点心的厨子忙着在做点心，大厅里客人们在玩纸牌直玩到深夜。我无目的地在灯火交辉的屋子里穿过来，穿过去。

"有一晚上十点钟过后，一个仆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到门口去。我去了。那个老管事佛洛尔对我低声私语道：'到马车夫的房里去，你哥哥在那里。'

"我连忙跑过天井，飞跑上那通到马车夫房间的石阶，进了一间宽大的半黑的屋子，在那里，在仆人的大的餐桌旁边，

我看见了亚历山大。

"'哥哥，亲爱的，你怎样来的?'我们立刻投入彼此的怀里，互相抱吻，非常感动，不能够说什么话。

"'不要响！他们会听见你们谈话的，'那个给下人做饭的厨娘布拉斯可维亚用她的围裙揩拭眼泪，一面说：'可怜的孤儿！只要你们的母亲还活在世上——'

"老佛洛尔站在一旁，头深深地埋下，眼睛里充满了光闪闪的一腔眼泪。

"'小彼得，听我说，不要向谁漏泄一个字，'他这样说；布拉斯可维亚放了一个土罐子在桌上，罐里满满的盛着一罐粥，给亚历山大吃的。

"亚历山大身体很是强壮，穿着军官学校学生制服，大有成人的气概；他一面吃粥，一面畅谈着各种事情，转瞬间他就把一罐粥吃光了。我差不多不能够插口问他，要他告诉我怎样在这夜深到这里来。我们家庭当时住在斯摩棱斯基大街附近，距我们的母亲死在那里面的住宅有一箭之地，而士官学校却是在和莫斯科城正相反对的郊外，整整有五英里的路。

"他把被单做成人形，放在床上，用绒毯盖着；然后他走到塔上，从一面窗户中爬下来，偷偷走了出来，不曾被一个人知道；他一直步行到我家。

"'你在夜里不害怕你们学校周围的那些僻静的田坝吗?'我问他道。

"'我怕什么？只有几只狗在追赶我；我自己把它们惊动起来的。明天我要把军刀挂在身边。'

"马车夫和其他的下人们时进时出;他们望着我们叹息几声,便在远处靠墙壁坐下,低声地交谈着,免得惊动我们。而我们两人互相拥抱地坐在那里一直坐到中夜,谈着星云与拉普拉斯的假设,物质之构成,以及在逢尼非斯八世治下教皇权与王权之斗争等等。

"时时有一两个仆人匆忙地跑进来,说:'小彼得,快到大厅里去,他们在走动,也许会问起你的。'

"我请求哥哥第二晚上不要再来;然而他来了,而且在路上曾和野狗战斗过许久,这一次他带得有军刀防身。这一晚上较前一夜为早,仆人来告诉我亚历山大来了的时候,我非常热心地跑到马车夫的屋子里。这一次哥哥乘了一节路的马车。前一晚上一个仆人把他得到的玩纸牌的客人所给的赏钱送给哥哥。哥哥只收了可以够雇一辆马车的一点钱,所以今晚上他来得早一点。"

这样深的兄弟间的友爱的描写真可以使得每个人流泪的。

亚历山大第三天送了一个短短的字条来,告诉彼得说他黑夜逃出的事并没有被人知道。在家里也没有人泄露出来。全府第里只有彼得和仆婢们知道这件事情。

五

这一年彼得又开始研究平民生活。这个工作使他和农民更一步地接近了,他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的新的一方面。

每年七月到了"加善圣母节"的那一天,克鲁泡特金家领

有的尼可尔斯奎乡就要举办一个很大的市场。各种小商人从四邻的城镇中赶来。这乡村周围三十英里内的农民都群集在这里。市场只继续二十四五点钟。在前一天那个大广场就开始热闹起来了。长排的货摊迅速地建造起来,留作售卖棉布、丝带,以及农妇的各种服饰之用。一所饭店是坚固的石造的建筑,里面陈设着桌子、椅子、凳子,地板上铺满了细的黄沙。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开设了三家酒店,新砍下的帚草高高地缚在高竿之上,招引着远方的农民来喝酒。许多排售卖陶器、靴子、石器、姜糖饼,以及一切小物件的小货摊马上就成立了。在市场之某一隅掘了几个地洞安放着几口大锅,里面煮了几斗黍和荞麦与一只全羊,做成热的粥和肉汤,供给几千个游客吃喝。午后,通市场的四条路都被数百辆农家马车塞满了。大堆的牲畜、谷物、陶器、柏油桶都在沿途展览出来。

凑巧这一年斯拉夫派文人阿克沙科夫出版了他的南俄乡村市场之精美的描写,亚历山大当时正是在他的经济学研究热狂到绝顶的时期,他便竭力劝彼得作一个关于这乡村的市场之统计,来决定从外面运来与卖出的货物之数量与价值。彼得果然做了。而且他的估计是成功的。

在前一晚上夜市开始的时候,他就专心去从事他的调查工作,拉着几百个人问他们带来的货物的价值。这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他同时还得到了村长的帮助。总之"输入品"一方面是很容易估计的。

然而第二天关于买卖一方面就有不少的困难了,尤其是贩卖布帛的商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共卖出了多少货物。过

节的这一天大群的农家少妇真正把各家店铺围困住了；她们中每人把自己手织的麻布卖出了以后，这时节便都去买一些给自己缝衣服用的印花布，一条自己用的上等包头帕，和一方给她的丈夫用的彩色手巾；或者还买一些花边，一两根丝带，以及送给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小孩们的小礼物。至于那些售卖陶器、姜糖饼、牲畜、苎麻等等的农人，尤其是那般老太婆，她们马上就可以说出卖出的东西的数目。"婆婆，生意好吗？"彼得这样问。"孩子，如果再要抱怨，真是辜负上天底恩惠了！差不多全都卖光了。"她们的小的数目加起来，在彼得的记事簿中竟变成数万卢布的巨款。只有某一点是不能决定的。市场里有一片广大的空地，是留给农妇们售卖东西用的；在那里有数百个农妇站在炎热的阳光之下，手拿着自织的麻布（有时候非常精美的）向游人售卖。许多有着吉普色人的面貌和狡猾的样子的顾客在她们丛中穿来穿去，买她们的麻布。这一笔买卖的估计不能是很正确的。不过靠了村长的帮助他也就能够估计其大概了。

彼得自己批评这种工作所给他的印象道：

"我当时对于我的这个新经验，并无何等深的思索；我只是高兴我不曾失败就行了。然而我在这几天中所见着的俄国农民的真挚的善心和健全的判断，却给了我一个久不消失的印象。后来我们在农民中间宣传社会主义原理时，我不禁惊奇为什么我的有几个朋友虽然似乎比我更受过民主的教育，却不知道怎样和农民或出身田舍的工人谈话。他们试仿效'农民的谈吐'加了一大堆'俗语'、'土语'在他们的谈话里，遂

反而使农民更听不懂了。”

六

不久近侍学校中起了一次风潮，是为了反抗代替柔拉多的那个毕大尉干涉学生而起的。结果学校当局开除了两个学生。接着彼得也因为对毕大尉说了不敬的话，被监禁了两个星期，还几乎被开除。

这次风潮刚刚平息，皇太后逝世又马上把学生的功课间断了。

皇太后的尸体安置在堡垒里，近侍学校的学生每星期总有半数要轮流被领到堡垒里来，就住在那里伴守灵柩，每隔两点钟换班一次。他们常常要在半夜里起床穿上宫廷制服走过黑暗而阴郁的内天井，一路上听着堡垒中的悲哀的钟鸣，慢慢走到大会堂去，这时候彼得就会想起幽闭在这号称为“俄国的巴斯底狱”的堡垒中的某一些地方的囚人们，他不觉猛烈地战抖起来。他甚至会想：“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不会到他们中间去吗？”

然而轮值过了，一旦回到学校里，彼得的心情又有些不同了。这时候学校内的情形非常混乱。功课停了；从堡垒中回来的学生都暂住在临时的宿舍，没有一点事做，终日只是嬉戏。有一天他们弄开了房里的一个贮藏教授博物时用的各种动物标本的橱柜。这个橱柜里的标本的正当用处本是如此；然而事实上从来没有人打开橱柜给学生看过，如今他们弄开了橱柜，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用法。他们先用里面的一具人

的头颅骨做成一个鬼的样子，预备在夜里来惊吓别的同学和长官。至于动物标本，他们把它们安排得非常可笑：猴子骑在狮子的背上，羊和豹在一起游戏，麒麟与象一同跳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凑巧几天以后，那位到圣彼得堡参与皇太后葬礼的德国皇子来参观这个学校，校长自然不会忘记夸耀校中设备的完美。他还把客人引到那个橱柜的面前。德国皇子把那种奇异的动物分类法看了一眼，马上做个歪脸，就急忙转身走开了。老校长似乎惊呆了；他差不多失掉了说话的能力，只是不住地用手指着几只海燕，这是放在橱柜旁边墙畔的几个玻璃缸里面的。皇子的随员们竭力装出未看见什么的样子，只匆忙地把那使得老校长难为情的动物分类法看了几眼，而那些站在旁边的小孩子却做出各种的怪相和鬼脸，为的是免得笑出声来。

七

跟着年龄的增长，彼得对于各种科学的研究也益发努力。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但在学问上已经能够作独立的研究了。他自己承应这些研究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他在第四级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历史的研究。他根据课堂里的讲义，又参考了许多书籍，自己写了一部中古史初期的讲义。第二年教皇逢尼非斯八世与王权之斗争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要求柏克先生设法违例允许他进皇家图书馆去阅书（照章中学程度的学生不能够进这图书馆）。他读了许多古

文书。

到了第二级时他又热心于物理学与化学的研究。这两门功课的教师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并不是普通的教书匠。他们都有些创见，而且解说又很明晰而优美，使学生得以牢记不忘。

因为物理学的教科书已经有些陈旧了，教师便使用他自己的教材写成一种短短的摘要，叫学生记录下来，不久这种记录的工作就落在彼得的肩上，那教师以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态度，把这工作完全信托给他一人去做，自己不过校阅一遍罢了。尤其是关于热、电、磁的几章，须得撇开教科书完全另写过。彼得这样做了，就写成一部差不多完全的物理学教科书，印出来供本校讲授之用。

关于化学，彼得又联合了五六个同学设立了一所自己用的简单的实验室。他们用的是席托克哈特的教科书中介绍给初学者的那些简单的基本仪器，地方是在两个同学家里的一间小小的寝室。他们在星期日与假期内就聚集在那实验室里，用席托克哈特的教科书做指导，开始有系统地作一切的实验。有一次他们几乎把房屋烧了，而且很多次他们把所有的房间里都布满了氯气和别的臭气。然而当他们在午饭时分把这样的冒险说给那做父亲的老将军听的时候，他却以为这是很好的事，并且还告诉他们从前他和他的同学们从事没有多大益处的造五味酒的研究里，有一次也几乎把房屋烧了。他那个母亲在一阵咳嗽之际只说道："自然，如果为了你们研究学问起见，是必须用着这样恶臭的东西，那么当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晚饭以后那母亲通常总是坐在钢琴旁边，彼得等便唱着二人合唱曲、三人合唱曲以及歌剧中的合唱，一直唱到深夜。有时候他们取出一两种意大利或俄国的歌剧底乐谱从头唱到尾——那母亲和她的女儿做了歌剧的女领班，彼得等大家充当其余的各种脚色，做得颇好。化学和音乐就这样携手并行了。

高等数学也占去了彼得的大部分时间。这时候他和几个同学已经决定不去加入禁卫队，还想毕业后继续升学。因此他们就开始补习高等几何和微积分的初步，并且请教员在课外教授这功课。同时在数理地理这一门功课里天文学初步已经在开始讲授了。彼得这时又耽读天文学的书籍，尤以最后的一年中所读的为多。

如果学校中的功课只限于上面所述的那几门，彼得已经没有什么闲暇了。但是他们还不得不研究人文科学如历史、法律(即俄国法典之概要)、经济学原理，以及比较统计学之类，他们又必须精通军事学的几种可恨的功课，如战术、战史(一八一二年及一八一五年的战事的详情)、炮术与野战筑城术等等。

在这学校里，因为有好的教师，所以教授法也很不错。教授法在可能范围以内是非常具体的。学生刚刚从书本上学到了初等几何学，便在野外用量地链尺和标柱，其次又用测角器、罗盘针、测量器来复习。这样具体的训练之后，初等天文学对于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困难了，而测量本身又是兴昧之无尽藏的源泉。

关于筑城术一门也适用着这同样具体的教授法。譬如在冬天学生便从事解决下面那样的问题：给你一千人，限你在两个星期内建筑一座最强固的城堡以掩护退兵所通过的桥梁。教师一一批评学生的设计，学生也很热心地和他讨论。在夏天他们便在野外应用他们的这些知识。全靠着这些具体的实际练习，他们大部分学生仅在十七八岁就能极其容易地融会贯通这些种类繁多的学科了。

不管这一切，学生却也还有很多游戏的时间。他们的最快活的时候就是试验完毕和从野营归来以后，因为试验完毕要放三四星期的假才出外过野营生活，从野营归来又放三个星期的假才开始上课。他们一小部分当时留在校中的学生在假期内可以自由出外，学校照常供给膳宿：彼得有时在图书室里用功；有时又去隐庐绘画陈列所把各派的名画逐一分别研究；或者去参观各种皇家工厂，如纸牌、棉纱、铁、陶器、玻璃等等之制造厂，都是任人参观的。有时候，他们泛舟于尼瓦河上，就在河中度过一个整夜；有时候又和渔夫们一起在芬兰湾内荡舟——在一个忧郁的北国的夜里，落日的霞晖是和黎明的曙光相接，夜是非常明亮，就在中夜的时节，人还可以在露天里读书。他们又有不少的时间来从事一切的娱乐。

自从参观了各工厂以后，彼得就很爱那完全而有力的机械。他看见那巨人的手掌怎样从小屋中伸出来，把浮在尼瓦河水面上的木材抓住一根，然后拖进去放在锯子之下，锯成了几块木板；他又看见一根红热的大铁条怎样通过了两个压榨器之间，出来就变成了一条铁轨。他说："那时候我就懂得机

械之诗了。在我们现在的工厂里，机械的工作是戕杀工人的利器，因为工人成了一个固定的机械的终身的奴隶。但这是组织不良的结果，和机械本身无关。……我却完全明白一个人如果认识机械的力量，机械工作之灵妙，机械运动之优雅，机械制造之完备，他便能够得着愉快。”

彼得对于音乐也是非常爱好的。他说："在我的知识的发达中音乐也有很大的力量。我从音乐中得来的欢乐与热情，还要比从诗里面得来的大得多。"那时候意大利的歌剧在圣彼得堡非常流行，他也很喜欢这种歌剧。他和一些同学常常到意大利歌剧院去看戏。他描写当时的那种热狂道："我们不能够去买官厅和花楼的票，而意大利歌剧院里所有包厢座常常在几个月以前就被人通通预订去了，并且只在某一些公馆里辗转传递和遗产一样。然而在星期六晚上我们便可以到第六层楼上的普通座里在和土耳其蒸气浴一般的空气中直立着。为了隐藏我们的惹人注目的制服起见，我们便在外面罩了一件毛领棉里的黑色大衣，虽然空气是那样闷热，但我们把大衣的钮扣扣得死紧。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曾因此得过肺炎，这倒是奇怪的事，特别因为我们时常狂热地欢迎我们所喜欢的歌者之后，带着过高的热度出来，站在戏院门口，再看一眼我们所喜欢的那些艺术家，给他们拍手喝采。在那些年代意大利歌剧凑巧与急进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威廉·退尔》和《清教徒》两剧中的革命的歌调总是得到狂热的欢迎，喝采声一直响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心头；而在第六层楼座中，在歌剧院吸烟室内，在戏院的门前，圣彼得堡青年的精英便结合起来，

对那崇高的艺术作共同的理想主义的崇拜。这一切似乎是儿戏；然而这样对于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家之崇拜，却在我们的心中燃起了许多高尚的思想和纯洁灵感。”

八

每年夏季近侍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要到彼得荷夫去过野营生活，同去的还有圣彼得堡的其他陆军学校。就大体而论，他们的生活是很愉快的，而且对于他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他们睡在宽广的帐幕里，在海里洗澡，这六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用在户外运动上面的。

野营生活的主要目的显然是军事操练。不过学生都讨厌这种操练，他们比较喜欢参加演习，这可以减去不少平常操练的沉闷，譬如有一夜大家都睡了，亚历山大二世忽然敲了紧急集合的钟，叫全营的学生起来演习。数千名学生齐集在各校的旗帜下面，炮兵学校的大炮怒吼着，惊破了静夜的沉寂。漸浓的黑暗，枪炮的怒鸣，马队的蹄声，这一切使得他们那般少年非常兴奋。第二年他们又参加在皇帝指挥下的圣彼得堡的戍兵大操，接连两个整天他们不做别的事，只是在一块二十英里光景的方阵地中进退着。

实际上在野营的时期内，他们用在军事操练和演习上面的时间还是比较地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用在测量与筑城之实地的练习。在几次预备练习之后，教师便给他们一个反射罗盘针，叫他们“去作出某某湖，某某路或某某公园的图，用罗盘针测量角度，用脚步计算距离”。所以一大清早，匆忙地吞食

了早餐之后，每个学生便塞了些小麦面包在军服的衣袋里，出去到公园里度过四五小时，游行了几里路，用罗盘针和脚步计算，作出了美丽的荫路、溪流、和湖滨之地图。地图作成，然后由教师拿来和正确的地图比较，结果给作图的学生以一种奖品：或是光学器械或是绘图器械，由学生自己选择。对于这些测量的实习乃是快乐的一个深的源泉。这种独立的工作，数百年的古树下的独坐，树林中的幽闲的自由的生活，以及对于工作的兴趣——这一切在彼得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说："后来我做了西伯利亚的探险家，而我的几个同学也成了中亚细亚的探险家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当时的这些测量实习真是绝好的预备工夫。"

在最后的一年里，每两天便有四个同学被派出去组成一队到远处的乡村去，靠测量器和望远镜的帮助，作出几方里地之精密的测量。这种在乡村农民中间的生活，对于彼得日后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发达也有优良的效力。

同时他们又要练习建筑城堡的横截面。一个长官把他们引到野外，在那里去建筑一个棱堡或一座复杂的桥头的侧面，把窄板和柱子钉在一起，恰像铁道工程师修轨道那样。当他们建造到炮眼和炮座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仔细计算许久，要得出各平面的斜角。经过这种工作以后，对于他们，几何学便不再是难懂的了。

他们很高兴这种工作。后来有一天在校中的花园里看见了一堆粘土和小石，他们便开始建造一个缩小若干倍的真正城堡，还有计算精确的直的和斜的炮眼与炮座。一切都做得

非常细心，他们这时的野心就是得到几块木板来做安放大炮的露台，而且把他们课堂里的大炮的模型放在上面。

然而他们的裤子弄成非常难看的样子了。“你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的大尉叫道。“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你们简直像铁道工人。如果大公爵来，看见你们这样子不知道会怎样!”

“我们要把我们的城堡指点给他看，要他把炮台的木板和器具给我们弄来，”彼得等骄傲地回答。

但是一切的抗辩都归无效。第二天十二个工人就把他们的美丽的建筑用马车运出去了，好像这只是一堆泥土一般。

九

彼得有一个表姊。生得很美丽，年纪不过十九岁，她与她的一个堂兄相爱，想嫁给他，然而堂兄妹结婚的事在俄国教会看来乃是一件大罪。她的母亲没法，只得把她带到圣彼得堡来，打算给她另找一个更适当的夫婿。

彼得和这表姊的感情很好，他每逢星期日和假期都要到她的家里去玩。他第一次和当时的革命文学接触却是在这家里。著名的亡命者赫尔岑正在伦敦创刊了杂志《钟》，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流布到了宫廷内，在圣彼得堡秘密流传极广。他的表姊设法得到了一份，他们共同诵读，习以为常。她的心反抗着横在她的幸福途中的一切障碍，她的精神更易接受那位大著作家对于俄国贵族政治以及一切腐败的政治制度之有力的批评。他也常常带着一种近于崇拜的感情看那印在

《钟》的封面上的五个人的高贵的头颅——这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暴动失败后被尼古拉一世绞死的五个"十二月党人"。他非常爱读赫尔岑的文章，甚至以全副精神去领会，而不十分加以理智的判断。

在这影响之下，他在一八五九年或一八六〇年初就创刊了他的第一份革命的报纸。那时候他还是立宪主义者。他在报纸上主张要一个宪法，他又述评宫廷的浪费，他还记载出时常听人说起的官吏的不法行为。他把他的报纸抄写了三份，偷偷放在三个高级同学的书桌上，他以为这三个同学对于公共问题一定有兴趣的。他请求这三位读者把他们的意见写下来，放在图书室里苏格兰钟的后面。

第二天他怀着一个悸动的心去看苏格兰钟的后面有没有留给他的东西。果然那里有了两张纸条。两个同学写道，他们对于他的报纸十分同情，并且劝告他不要过于冒险。他又写成了第二期的报纸，言论较前更为激烈，坚决主张各方面均有联合起来力争自由之必要。然而这一次钟后面便没有回答了。那两个同学却亲身去看他。

"我们相信报纸是你刊行的，所以来和你商量报纸的事，"他们说。"我们完全与你同意，我们特来和你说：'我们做朋友罢。'你的报纸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它使得我们三人联在一起了；可是此后便用不着再继续出下去。在全校里只不过还有两个同学会关心这样的事，然而如果有人知道校中出现了这样的报纸，结果对于我们会是很可怕的。让我们来组织一个小团体，讨论一切的事；也许我们会灌输一点东西进另外

几个同学的头脑中去。”

他们三人互相真挚地握手一次，确定了他们的结合。从那时候起，他们三人便成了深交的朋友，时常在一起读书，而且讨论各种的事情。

十

要毕业的那一学年，彼得以最高年级第一名学生的资格被任命为近侍学校中的曹长。这时候他可以别居一室，免掉校中的喧哗而专心读书研究了。但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每天要挟着一本服务簿非常庄重地慢慢走着，不能够像从前那样随意跑步了。此外还有些讨厌的地方。

譬如照例近侍们应该常常到宫中去随侍大小参贺礼、跳舞会、接见、宴会等等。在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里，他们差不多每天要被召进宫中去，有时候还是一天两次。彼得以曹长的资格，应该在每个星期日骑术学校阅兵的时候向皇帝报告“近侍学校的中队甚好”，虽然全校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患着时疫，他也只有报告“甚好”。有一天遇着这样的情形，他便问大佐道：“今天我也应该报告全体甚好吗？”大佐的回答却是“去罢，上帝保佑你，除了学校起了暴动风潮外，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应该这样报告的”。

还有每年冬季宫中要举行两三次大跳舞会，被邀请的人有几千之多。这时候彼得要去伺候沙皇，那职务是非常困难的。亚历山大二世并不跳舞，也不肯坐下来；他不断地在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他的近侍应该远远地跟随着他，一方面不可太

远，以便听得见他的呼吸，一方面又不可太近，恐怕会使他觉得讨厌。这种职务含得有“到场”与“缺席”两种意义，确实是很难办的，而且皇帝也不需要它；他本是情愿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行动，然而惯例是如此，他也只得服从。最困难的乃是当他走进那一群站在大公爵们跳舞的圈子周围的贵妇们的密集丛中，慢慢儿穿过的时节。要在这脂粉丛中走过，是决不容易的事；她们看见皇帝便连忙分开让了一条路，然而皇帝一去，她们又紧紧地合起来了。几百个太太小姐们自己并不跳舞，只是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紧，每人都希望也许会有一个大公爵看中了她，请她去跳一次回旋舞，或一次波兰舞。

然而不管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职务，不管彼得曾经把签发农奴解放的宣言的亚历山大二世当作英雄般地崇拜过，到了一八六二年毕业的时候，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于决定了抛弃贵族生活，并且显明地宣言不愿入禁卫队去做军官，把一生的光阴浪费在阅兵式与宫中跳舞上面了。

他的本意是想进大学去继续研究，但是他一文钱也没有，因为这样做，决不会得着父亲的接济，而他又不愿意要别人的钱。于是他就改变了计划，加入“黑龙江的哥萨克骑兵联队”，利用这机会到西伯利亚去，一方面进行科学的探险，一方面从事改革的工作。

他的父亲竭力反对他的这个决定，甚至从莫斯科打了电报给校长，禁止他去西伯利亚，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劝阻他，但他的决心是无可动摇的。他后来终于到西伯利亚去了。

刚刚在那时候圣彼得堡发生了大火灾，显然是有人故意

放火，而嫁祸于波兰人和俄国革命党人。于是反动和压迫乘机抬头。自此以后，亚历山大二世就完全投降反动派了。

在火灾以后的两个星期，彼得这一级的毕业生被升任为军官，受沙皇的检阅和训话。

那个解放农奴的英雄在二十几岁的彼得的眼前消失了。他看见了那个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面目。他说：

"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用很安静的声调说：'我庆贺你们：你们是军官了。'他又说到军人的义务与忠义，这是他在这种情形中常常演说的老调。'然而如果你们中有谁人，'他继续往下说，他很清楚地高声一字一字地叫出来，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了怒容，——'如果你们中有谁人——但愿不会有！——在任何情形之下有不忠于沙皇、皇位及祖国之行动——注意我所说的话——他将受着极——其——严——厉的处罚，决无丝毫的宽——赦！'

"他说完了。面容非常激怒，充满了一种盲目的愤怒之表情（在我的幼年时代每当地主们拿'用棍子剥你们的皮'的话来威吓他们的农奴时，我就在他们的脸上看见了这样的表情），他凶猛地踢着他的马，跑出了我们的圈子。第二天，七月十四的早晨，便有三个军官被他下令在波兰的莫得林城枪毙了，一个名叫苏尔的兵士死于笞刑之下。

"在我们回学校的归途中，我自语道：'反动，全速力的开倒车。'

"我在离开圣彼得堡以前还见过亚历山大二世一次。在我们受职后不几天，所有的新任军官都要齐集在宫殿里参贺

沙皇。黑龙江哥萨克联队乃是俄国陆军中最近编制的联队，我差不多站在几百个参贺的军官的末端。亚历山大二世走到我的面前，问道：'那么，你要到西伯利亚去了？究竟你的父亲同意吗？'我回答说是。他又问：'你不害怕走那么远吗？'我热烈地回答道：'不，我愿意工作。在西伯利亚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应用现今正在实行的大改革。'他望着我底眼睛，沉思了一会儿；后来便说：'好，去罢；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他的面容现出了一种极其疲倦之表情，一种完全屈服之表情，我不禁马上想道：'这是一个疲乏的人，他预备放弃一切了。'

"圣彼得堡带了一种凄惨的样子。兵士们在街上排队游行，哥萨克巡查队在宫殿四周逡巡，堡垒里充满了囚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见着这同样的事情——反动的胜利。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圣彼得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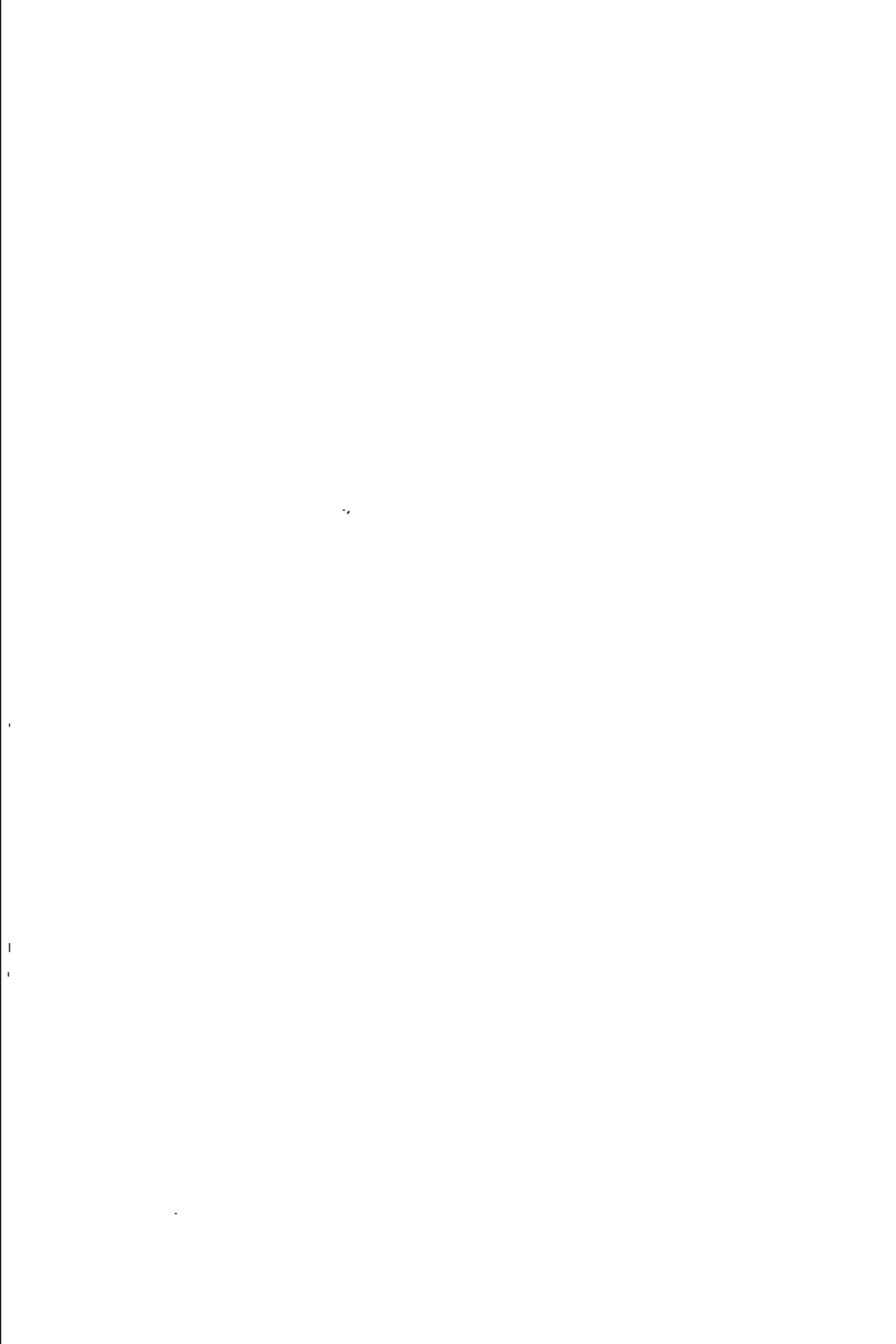
十一

彼得·克鲁泡特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完结了。去到西伯利亚以后，他的生命史上又翻开了一张新页。他的以后的生活是更要丰富得多。他做过军官，做过探险家，做过革命者，做过囚犯，做过新闻记者，做过著作家，做过科学家，做过安那其主义者。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他度过工人的生活。他舍弃了巨大的家产，抛弃了亲王的爵号，去进监狱，去过亡命生活，喝冷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标。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他终于回到俄罗斯之黑土，尽力于改造事

业，最后依然被政府限制了行动，只得以将近八十岁的老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年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朋友和仇敌无不感动，无不哀悼。一个俄国青年批评他"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有岛武郎把他比作"慈爱的父亲"，王尔德称他为"有着最完全的生活的人……从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这样丰富的完全的生活，如果详细地展现出来，使许多中国青年有一个例子，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不知道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但是如今在这里我却没有篇幅和时间叙述下去了。

本文中所引克鲁泡特金的话，大都见于他的自传，这是一部三十余万言的巨著，我曾经译成中文，但译本现在已经绝版，见到的人很少，所以不妨在这里多多引用。——作者附记。



一九三三年

“新年的梦想”*

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那些线装书，那些偶像，那些庙宇，那些军阀官僚，那些古董，那些传统……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所以在一篇小说里我曾写过这样的话：

“我们中国民族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已经是太衰老了。像这样古老的民族，如今世界上再寻不出第二个来。在我们中间并没有多少活力存在着，所以我们的青年是脆弱得很(我自己也是)。我们如果得不着新生，就会灭亡，灭亡而让位给他人。那黎明的将来是一定会到来的，我的理想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梦。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中国民族会得不着新生。想到将来有一天世界上的人都会得着自由平等的幸福，而我们却在灭亡途中挣扎，终于逃不掉那悲惨的命运，这情形真可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系该刊“新年的梦想”专栏之元旦征文。原无标题。

以使人痛心。为全人类的未来计，也许我们应该灭亡。但一想到我们这许多年的苦痛的经验，而且就我们中国人的地位来说，我们对这命运是不能够甘心的。……”

“我要努力奋斗，即使奋斗结果，我们依旧不免于灭亡，我们也应该奋斗。即使我们前面就立着坟墓，但在进坟墓以前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奋斗的生活毕竟是最美丽的生活，虽然里面也充满了痛苦。为了惧怕灭亡的命运，为了惧怕痛苦而去选取别的道路，求暂时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

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

关于生物发生的讨论，乃是自来科学界的一大问题。早先有所谓化生说者，认为生物可以自然发生。但自十九世纪中叶巴斯德的种子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后，所谓化生说的理论差不多已全被推翻。

在二十年代末，广州医生罗广庭氏出版《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书，宣称他已以实验的方法证明生物可自然发生。这引起了不少科学者的责难。在本年八号《东方杂志》上，罗氏又发表《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一文，宣扬他的发见，并攻击进化论。据他所说，他的发明是经三年的研究与千余次的实验而成功的。实验的方法是以玻璃试管盛培养基，经严密封固，再用高热消灭一切种子；结果在三星期之后，管内即发生各种小生物——植物和动物。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生物，其构成的经过五花八门，与由种子生殖而得的有天渊之别"。又说，"在一定环境间，必产生某种生物，在相似的环境，必自然发生相似的生物"；"生物没有变种，自然发生出来以后，其形状怎样就怎样的"。这与达尔文的认生物为由一个祖先逐代变异进化而来，根本相反。所以罗氏就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空中楼阁"。

但罗氏的实验和理论，国内科学界仍多指斥为缺乏科学的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中学生》第三十七号。

据。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地质系及医科诸教授曾和罗氏举行公开的辩论。据《中大日报》所载辩论记录，罗氏对许多质问都不能回答。本文力辟罗氏的实验和理论的谬误；读者从这里可以增进对于科学上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①

在今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我读到了罗广庭先生的震惊一代的短文。作者的那种光芒万丈的发明家的气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巴斯德的种子说视作"谬说"而给以践踏了。② 作者用"科学方法"四个字做武器，以实现他的发起生物学上的大革命的雄图，而结果他却在他的文章里将科学方法根本推翻，尽量地写入了他个人的武断和玄想。这样，他是在科学的掩护下给中国的青年大量地注射反科学的毒汁了。

自然，对于这事情，《东方杂志》不应该负着重大的责任，因为《东方杂志》不过是罗先生的大著的转载者。这文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以前，就已经由罗先生自己在广州刊印单行本散布了(非卖品，本年二月出版)，而且先《东方杂志》转载该文的，还有广州《民国日报》的附刊《现代青年》。

《东方杂志》的销路之普遍，影响之巨大，我们不能够否认，罗先生也一定知道。但是罗先生恐怕不会知道他的文章

① 以上为《中学生》编者所作按语。

② 自然发生说(即化生说)倒是一种很旧的"谬说"，罗先生却说是他发明的，朱洗君曾著有《化生说的进化》一长文。在广州中大《自然科学》发表，并有单行本。

在一般中学生的心理上已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罢。罗先生的气魄雄伟的文章，当然很容易地把中学生的心抓住了。无怪他们就惊惶地问起来："既然罗先生的发明是正确的，如果生物真正可以自然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学校里学习现在的生物学呢？而且许多门科学不是都给那个医生推翻了吗？"救救中国的青年罢，我怀着一颗苦痛的心想向什么人这样地哀求了。

罗先生是以发明家自居的。但是任何发明家却不能够制造一部科学史，至少他没有权利改变过去的事实，这一点一个中学生也会知道。然而罗先生在文章里却偷偷地把过去的事实任意改造了。

罗先生说："瑞典博物学家 Linnaeus 二十八岁时著《博物系统》……他的学说哄动了一时。恰巧这个时候法国有个 Lamark（当为 Lamarck 之误）研究化石及比较解剖学，见生物的化石因地层而不同，在同一时代的各种生物器官又有相似或不同的地方。……"（单行本第三页；《东方杂志》，三十卷八号第三四页）

在这一段文章里，罗先生就改造了两件事实：Linnaeus 生于一七〇七年（一七七八年死）；Lamarck 生于一七四四年（一八二九年死），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权利把他们的生年任意提早或推迟。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当 Linnaeus 二十八岁的时候（一七三五年），Lamarck 的母亲恐怕还是个处女，而且离他出世还早了九年。请问从

什么地方跑来这句"恰巧这个时候"呢？

Lamarck是一个有名的动物学者，谁都知道，我也曾在巴黎植物园看见过他的铜像，那石座上刻得明白他是一个研究什么学问的人。至于"研究化石及比较解剖学……的"，那是Cuvier(1769—1832)。罗先生却任意将两个人的履历改换了。

还有，罗先生说达尔文在大学毕业后，乘探险船比各号游历世界六年。事实上达尔文从一八三二年乘Beagle Liner出发考察，到一八三五年回英，按年头算起来，也不过五年。罗先生却替他加多了一年。

像这类改造历史事实的地方，在罗先生的另一本小册子(《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①里也是有的。如原书第二页上说"百年前欧洲的科学正在萌芽时代，当时的大科学家巴斯德因研究细菌的学说，便以为生物须赖种子而产生。"事实上，巴斯德生于一八二二年，他研究自然发生问题和病理学是在中年时代才开始的(他起初研究结晶学和化学)。罗先生的大著在一九三一年发表，从那时候起倒算到一百年前，巴斯德才只有九岁。而且巴斯德的"细菌的学说"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书内还说："人死后的尸体变化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期有某种虫……至第七时期俱有一定变化而生出一定的生物。"(三十五页)又说："疟疾由于蚊蚋传染病菌，但欧语有说：'社会日文明，疟疾必绝迹，'可见疟菌虽由外界传入，然苟地方清洁，

① 《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共七十页，三十二开本，四号字排印，并有于右任、高一涵、陈济棠、林翼中等伟人题字，惟原书第五页至三十三页完全是从Dastre的《生与死》里面抄袭而成。达氏书成于数十年前，材料已经陈旧。

纵有蚊蚋，也却不易发生。”(五十二页)又说：“每见井旁的植物最初经过许久时间而发现青苔，更经若干时日而产生各种植物。苟其由种子而生成，则生长必迅速，且不必逐渐经过几许变化。”这些都是没有常识的“谬说”，现在却披上科学的外表而堂皇地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

罗先生口口声声说“用科学方法”，我们就应该看清楚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科学方法。

第一他说：“试管里的培养基①是经过最妥当的消毒，保护严密，断没有外界的种子能加入的，我相信。……我便继续试验，足足研究了三个年头，经千余次的较对实验，证明生物确可不赖种子亦能发生，成功了我的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东方杂志》第八号三三页)

“我所应用的试验方法，是很精密的。”(同上)

“在一定环境间必产生某种生物，在相似的环境必自然发生相似的生物，这种真确的理论，我从各方面试验已得最妥善

---

① 罗先生在最近发表的《由存在的种子而发生的生物与自然发生的生物之区别》一篇短文章里说节肢动物不须依靠各种培养基而自然发生。……管内，可挥发的水气凝集于试管壁内，成为小水点，经过三至六星期以上的变化，便自然构造成小虫，可以飞动。”又说：“我们所发见自然发生的虫类……乃是由水气凝集于试管壁内成为细小水点，经过数星期或数月的变化，才渐渐自然构成小虫。”

因此广州医生董道蕴氏便问他：“组织生物之主要物质为蛋白质等，罗先生既然说能由水滴变为生物，能否证实水能固定空气中游离淡气并变成蛋白质等各种物质？”罗先生不能回答。

的证据。"(同上,第三四页)

最妥当的消毒是什么?严密的保护是什么?较对实验是什么?很精密的试验方法是什么?最妥善的证据是什么?作为科学家、发明家的罗先生完全不曾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他的文章里找一个解释,那么就只有下面的一段:

"应用各种物质,如琼脂、葡萄糖、蛋白、醅泼吞等物制成培养基,盛入试管内,以药棉及多层厚滤纸封塞其口,或再放入数个大小不一的玻璃瓶里,面每个瓶口亦以滤纸封之,然后用高温消灭一切种子,经过三星期以上的变化,管内即自然发生各种小生物——植物和动物。"

这一个解释是何等地空洞!请问罗先生用什么方法消灭种子?这所谓"高温"究竟是温度多少,而且怎样把种子杀死,他完全不告诉我们。(在《发明》一书里他曾经说过消毒的手续,但有一半是很可笑的。例如他"先将洁净的玻璃筒用棉花塞密筒口,以一百六十至八十度的干热气消毒半小时后,采妥善的方法,放入四CC蛋白或蛋黄于筒内……"试问消毒后注入培养基,与不消毒又有什么分别?这种消毒是不是多余的手续?)假若一个科学家"打破数千年来的传统的谬说",假若一个发明家证明他的大发明的成功,不靠一点正确的论据,不靠一点精密的实验,单用一些夸大的,武断的,空洞的"最妥善"、"很精密"的字眼来封闭别人的口,像罗先生那样,那么,遍中国都是发明家、科学家了。许多无知识的乡间男女也会像罗先生那样,相信井边的青苔是自然发生,相信苍蝇是自然发生,相信蛆是自然发生。"成功了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的

并不只有罗广庭先生一个。

科学方法是实验的，归纳的，是和武断相反的。科学方法至少应该使人知道它的经过是怎样，而且使人能够判断它的结果是否正确。罗先生要我们相信他的方法是"最妥善"、"很精密"，但他却使我们无法知道那是怎样妥善，怎样精密，而且也无法判断那是否妥善，是否精密。

这样的科学家却使人不禁联想起走江湖的卖膏药者流了。

在前面引用过罗先生的话："在一定环境间必产生某种生物，在相似的环境必自然发生相似的生物。"罗先生说这是真确的理论，而且他"已得到最妥善的证据"。证据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而且更无法判定其是否最妥善了。

其实罗先生所提供给我们的却只有一个相反的证据。罗先生在盛各种培养基的试管里所发见的小虫，却只有相同一种，他曾经为它画出了图形（见《发明》四六页）。罗先生应该知道各种培养基的性质是不同的。为什么在各种性质不同的培养基内会生长出同样的小虫来？这事实岂不是把罗先生的"真确的理论"打碎了么？

也许有人说罗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兔子的证据。他用兔子嘴边生虫来证明"环境与各种生物之自然发生有很密切的关系"。

罗先生说："如将完全无寄生虫的兔在铁笼内养，经三四星期后，兔之嘴唇即可由脱落的表皮，渐变为小粒，集合而成

一种小虫或卵，经过数星期的孵化，方可活动……”(《东方杂志》第八号三四页)

我问一句：兔子是否可以消毒？或者罗先生已经把兔子消过了毒，所以他能够找到完全无寄生虫的兔子，而且在兔子嘴边证明自然发生？

像这样的自然发生多着呢！然而罗先生却用它来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打倒了！(这是罗先生的自夸的话。)

我相信读者是有常识的，让大家来判断罢。

罗先生所发明的自然发生的“小虫”是什么呢？——他不知道。

这究竟是已有的旧种还是新种呢？——他不知道①。

它的内部的结构怎样？习性怎样？——他不知道。

一个发明家不知道他所发明的东西是什么，而且是否已经有过，这已经是够滑稽的了！他只是在《发明》一书里给了我们几个图形(原著四六页)。但那图形上却没有注明放大的倍数。他把一个灰尘般大的小虫画成了蝉那样大的东西，而不写明放大的倍数。这种图形印在“科学的”著作中，这当然是第一次，罗先生不愧为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大发明家！

---

① 罗先生在《东方杂志》第八号三七页论胎生学一段里，承认他的虫不是“由既存的亲体产生的”，那么它当然是新种了。但是要说干酪虫是自然发生的新种，岂不是一个大笑话吗？这种虫我很早就在巴黎的干酪里，上海的陈皮梅里发见过了。老实说蜘蛛类动物的历史恐怕比人类的历史还长久呢！而罗先生却说：只有在他的家乡北海的环境里才能够发生这种虫。

对于罗先生不能回答的上面的三个问题，别人已经代他回答了。关于他所发明的小虫，别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们甚至印发了详细的说明。

那小虫是干酪虫(Tyroglyphus Siro)。

那小虫是旧种，中国古名叫螨，法文名叫 Mite dufromage，英文名是 Cheese mite。

它的内部构造，英、法文的动物学教科书上都有记载。关于它的习性，我可以引几段话来说明：

> 这动物平时生于壁缝墙隙以及尘垢堆积之处，藉腐败的动植物质为生。西人见乳酪干燥时屡屡发生这虫，因此就有干酪虫的名称。
>
> 这类动物富有抵抗力，若把成长的个体浸在纯酒精里，它还可以活动二十五分钟不死。蛹与卵的忍耐性更大(我亲眼看见朱洗君做过这实验)。
>
> 干酪虫传播种子的方法非常多。成长的个体能依脚端的钩爪固着在他物上面，随其移动，或自由行动以散布它的种子。它的卵和蛹能伴着灰尘和其他的生物种子随风飘浮。所以凡含有菌类种子的培养液中，同时又有它的种子。通常它在布满菌丝的培养基中挖掘巢穴，构造隧道，和疥癣虫在人的皮肤中所造的穴道并没有两样。雌虫就在那里面产卵。

我之所以敢于引用这几段话，是因为我自己也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过不少的干酪虫(我看见过肚里有三四个卵的雌

虫)，我也曾亲眼看见过放大八百六十倍的详细的干酪虫的内部构造图，我不是发明家，我并不敢用罗先生的那种以耳代目的"科学方法"。中大董教授问罗先生井边青苔何以是自然发生，罗先生回答："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听见一般人如此说。"这话我亲耳听见，而且六月廿九日香港报上有记载。既然是已有过的旧种，既然连中国古名也有，既然是卵生的动物，那么这干酪虫怎么会是自然发生的生物呢？这不是和说一只鸡、一个蛙是自然发生的一样的吗？

我们知道了上面所记载的干酪虫的习性，我们就可以断定说一定是罗先生的消毒手续并不精密，(他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精密的消毒手续，)让干酪虫的种子跟着胞子跌进了他的试管，培养基一腐败，干酪虫就在那里繁殖起来。不然为什么中山大学生物系所制的许多盛培养基的试管和天鹅颈瓶里就不会发生干酪虫呢？这些试管和天鹅颈瓶，我每天都有机会看见它们。我却不看见那自然发生的现象。只有在向上开口的对证瓶里，干酪虫倒发生了不少，它们是由种子发生的。(空气中的胞子就像雨点那样的多，据巴斯德的实验结果，巴黎城里每一立方米突空气中就含有三千四百八十多个胞子，而且胞子比空气重，因地心吸力的关系，很容易落进瓶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一个发明家当然也知道。)

还有呢，罗先生"以显微镜观察这种生物自然发生的经过"，就断定说："总之自然发生的生物构成的经过，五花八门，与种子生殖的真有天渊之别。"他更详细地叙述这经过道："试管内的消毒物质所挥发的气体，凝集于试管壁上而成水点，由

水点而渐成小粒，复由淡黄而变深黄的颜色。这些小粒有些可产出枝干而成小植物，有些则渐渐吸引邻近的小粒而集为小团。小团更继续吸收物质、水份和已成的小植物等而构成很美丽的小虫，到了相当时期即能活动、行走和吃食物。有些小团渐变成蛋孵化后，即有幼虫破壳而出。构成虫的方法有很多种，或由小粒先成头部，或先成后部，或先成一透明的小胞，再吸收附近小粒而构成多细胞的动物，或由已成的芽胞集合而成小虫。"

这种神话般的奇妙的叙述使人真有些莫名其妙了。幸而罗先生在《发明》一书里还把这发生的经过画成了图形，看他的图形(永远没有注明放大的倍数!)我们才知道他是误将水点(无机物)、青霉(Penicilium Glaücum)的胞子、胞子团(由胞子集合起来而成，大小无定)和菌丝，四种绝对不同的东西认作一个动物变化的阶段，就这样成功了他的《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

罗先生只看见他的试管里面有了干酪虫，他就以为是自然发生了，其实他却忘了去观察干酪虫怎样发生的一段经过情形。这种发明却使我不觉想起了比国医生 Van Helment (1577—1644)的"自然发生老鼠"的实验。他和罗先生一样，也承认他的实验结果是极其可靠的。他的方法是：拿脏的衬衫、麦粉和干酪一起放入开口的瓶内(据说瓶口闭塞，瓶内空气恶浊不适宜于自然发生)，人走开，过几天再来看时，那瓶里就自然发生了一对老鼠，这个发明在欧洲闹了一个大笑话。Van

Helment 只看见瓶里有老鼠，却不曾看见那老鼠怎样从外面跑进来吃东西。有麦粉和干酪吃，有脏衬衫可以住，老鼠为什么不来呢？

罗先生又武断地想用解剖学、胎生学、地质学等等来推翻进化论，以证实他的自然发生说，但实际上他的文章却表示出来他连关于这些学问的一点常识都没有。

关于解剖学，罗先生说："兽类如猩猩、猿猴等雌的皆没有处女膜，而人类则有之；处女膜对于动物的生活全无显著的用处，若说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①，何以要增生处女膜呢？…"（《东方杂志》第八号三四页）

罗先生以为人类有处女膜，而猴类没有，这就是人类和猿猴不同出一原的证据，他便用这个来推翻进化论。单用处女膜之有无来作物种亲缘的标准，这已经是很滑稽的了。

但是我们知道：Deniker 在大腥腥的胎儿的阴道口上曾经找到过一点类似处女膜的东西。（据 Bischoff 的观察，成长的无尾猴类并无处女膜。）

在马和鼹鼠的阴道口上，也有类似处女膜的器官。

这岂不是证明罗先生对于解剖学也没有一点研究么？

---

① 罗先生应该知道：事实上没有一个进化论者说过人是由现有的猿猴进化而来的话；请罗先生拿出证据来。（罗先生在《发明》一书里曾非难进化论者道："若谓人由猿变成，则猿可从什么动物变来的呢？及它为何现在不再变成人呢？"可见罗先生连进化论是什么也不明白。）

关于胎生学，他又说："进化论者以胎生学证明物种的变化，他们说人的胎儿在母体内初数月先生成鳃，其后逐渐消灭，这就是证明人类是由有鳃的动物进化而来……"（《东方杂志》第八号三七页）

事实上胎儿不但没有鳃，连鳃缝也没有；（最初的胎儿颈部每边各有三条下凹处，并未穿孔。）也没有人说过胎儿有鳃。然而罗先生却在下面接着说："我以为人的胎儿虽暂现似鳃的形状，不能指为人类原是有鳃的动物，乃是人类在原始的适应环境里自然发生时所经过的构造程序。"这样一来真把人弄得有些糊涂了。罗先生似乎承认人类在原始的适应环境里是"有鳃的动物"罢，那么这真是大发明了。

关于血统问题，罗先生说："以上所说的四簇互不相同血统的人，必不是由一个祖宗产出，而是在相似的环境里自然发生的，若依照进化论所说是由一个祖宗进化而来的，何以人类会有相异的血统呢？同种的生物的血统既有差别，异种生物的血统当更不相似。"（《东方杂志》第八号三六页）

平常区别人种是以比较解剖学、形态学以及分布学上的各种较固定的特性为标准，决不是以血统不同来判别异种的。像罗先生所说的"四簇"不同的血统，并不是固定地分布在各不同的人种中。便是在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族的子孙中也能有各别的血统。可见这只是用来区别个别的特性，不是区别种族的特性，更不能够用来证明自然发生！

还有一件事实，一九〇二年 Gruensbaum 在利物浦研究

猴类和人类的血统是否亲近这个问题。他把人血注射到各种无尾猴类的血管中，后来这些猴类所给的血清不但能够凝结人类的血球，并且还能凝结其他猴类的血球。又把A猴类的血注射到B猴类的血管里去，后来B 猴类的血清就不仅能凝结 A 猴类的血球，而且还能凝结人类的血球。其凝结的程度都是一样，但对于其他兽类的血球却无影响。(Metchnikoff《人类本质之研究》六八页)

这不是证明人类的血统和猴类的血统相近的么？罗先生用什么来推倒进化论呢？

关于地质学、古生物学，罗先生的论据是更加薄弱了。

所谓古代生物因地层而异，这当然是进化论的证据。古生代地层的含有古生代生物，中生代地层含有中生代生物，新生代地层含有新生代生物，这事实虽像罗先生这样的发明家也承认过了。那么我要问一句：这不是证明生物进化的程序和系统上的关系是什么？

罗先生还承认人类也是自然发生的。他说："在同一时间，在适当环境里，可由无机物质不赖种子而自然发生许多有机生物——动物和植物。由此推论(注意：是推论，不是实验)人、猿、牛、猪……等生物，自然也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当环境里产生的，而不是要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才有的。"(《东方杂志》第八号三五页)

现在的环境当然是比古代的环境更适宜于人、猿、牛、

猪……等等生物的生活了。单拿人来说，现在人类的繁殖可说是打破了过去的任何时代的纪录。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却看不见一个自然发生的人呢？至于猿、牛、猪……等等，谁也不曾看见自然发生过一个！

那么，罗先生还有什么理由拿适宜环境的话来阻塞别人的嘴呢？

够了，一个科学家的假面具已经给人揭下来了。所谓发明家的罗广庭的真面目如今毫无隐藏地展现在大众的眼前。罗先生自夸地说用真凭实据答复进化论者，但我要问真凭实据在哪里？

我写到这里，我没有一点快乐，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忽然想到了罗先生对一个新闻记者说的两句话："我爱真理，我尤爱科学的真理。"

真理，在这个时代，真确的真理是早给人拿来践踏了。虚伪的真理却被人当作神主牌供奉在神龛上。科学，在这个时代，真的科学是早给人抛在毛厕里去了。假的科学却被当作符咒，而做了走江湖卖膏药者流的招牌和餬口工具。在中国不是已经有了够多的科学家吗？不是有了够多的打着科学的招牌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吗？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难道我们也该像买彩票者盼望头奖似地等着罗先生的实验结果吗？

"救救我们青年罢，我们不要什么欺骗我们的发明家，我们只要真正了解科学的指导者！"我终于忍不住要向着什么人

这样地哀求了。我这样说，我是有权利的，因为我也是一个青年。但是有谁来回答这个要求呢？

这篇文章曾经朋友朱洗（他是专门研究胎生学和细胞学的）详细校正，如果没有得着他的指导，我是无法写完这文章的。所以在这里感谢地声明一句。

作　者 七月一日在广州。

再者，还有几句话应该在这里提说。《东方》十五号陆选之君的《用最新实验结果研讨进化论》一文里，后一部分不经“研讨”就承认罗氏的发明“对于生物学之贡献仍属极大”。甚至下了四个武断的结论。我在这里谨以一个读者的资格，要求科学家的陆君给我一个生物自然发生的确实证据，不然一个科学家决不肯轻信上面所引的那些罗氏的论证。

作者校后记

墨索里尼这个人*

近来偶尔读到一本叫做《墨索里尼》的小书，觉得非常不舒服。在《大众文库》这一类的丛书里列入给墨索里尼捧场的宣传小册，在我总觉得是不行的。自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睛里墨索里尼已经成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但我总不佩服这个人，我总高兴说几句这个人的坏话。

有人说过墨索里尼“不是一个凯撒，是一个犹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墨索里尼的确是善变的。他起初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党，现在却是反社会党；起初是无神论者，如今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是共和党，现在是保皇党；起初是反国家主义者，现在是国家主义者。欧战发生时，他在他编辑的《前进报》上反对参战，极力攻击那些主战的党人，然而两个月以后他自己就改变面目，做了一个主战论者。这种改变恰恰可以用法国律师亨利·托列士的一段话来解释：

“欧战初起时，意大利社会党一致反对参战。法国政府担心着这事情，在阁议里曾商量过。他们决定设法收买几个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六期。

会党人出来主张参战。当时提出了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付了一万五千法郎，后来每月付他一万法郎。交款人是盖德的秘书狄马。"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靠了它波洛米尼在巴黎刺杀某法西斯党人的案子才在赛勒省刑事法庭里打赢了官司。但那位写墨索里尼的传记的人却不会知道的。

"进兵罗马"，也是墨索里尼的一件快意事。他当时不过团结了一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向革命的工人进攻而已。军火是由陆军的参谋部供给的，银行家供给他们大批的金钱，法庭保证他们无罪，政府袒护他们。他们拿了手枪炸弹扫荡意大利的工业区域，摧毁了工人的组织。墨索里尼的口号是："我们准备杀人，被杀！"然而他们的敌人大都是赤手空拳的，所以结果被杀的总是别人。

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的十周纪念在去年庆祝过了。意大利成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在那里工人整天听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光荣的演说，为了这光荣的缘故，他们就得着全欧洲最低的工资。

这就是所谓怪杰墨索里尼的真面目了！

关于这，去年出版的两本书："Ten years of Tyranny in Italy"（伦敦）和"Mussolini en Chemise"（巴黎）就记载得很详细。前书著者 P. Nenni 是墨索里尼的战前的同事，后书著者 A. Borghi 是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

批　评　家*

有些作者说近来批评家的气焰太高了。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话。难道那些在报纸副刊上写些印象式的读后感的人就算是批评家么？

随便举一个例罢，谁都知道柏林斯基是一个大批评家，许多作者都受过他的指导。但是他一生写过一篇印象式的读后感吗？没有一个批评家曾拿过印象来做批评的标准。

批评一篇文学作品，不去理解它，不去分析它，不去拿一个尺度衡量它，单凭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单凭自己的一时的印象，这决不是批评，这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事实上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文学和艺术，也许这个人根本就不曾体验过生活。

做一个批评家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识字的人提起笔就可以指导作者，不管他有没有这野心。一个批评家应该理解艺术的基本原理，也应该丰富地体验生活，同时还应该充分地了解他所批评的作品的内容。然而在中国似乎就少有这种人。我们看那大部分的批评文章不是浅薄得令人发笑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余七。

然而那些批评家还闭着眼睛得意地说这篇浅薄，那篇空虚，这篇不好，那篇不坏，这种主人公不会存在，那篇作者不懂得革命，好像一字褒贬就会提高或降低作品的声价，却不知道几天过后这些所谓批评文章就被人用去包花生米、咸菜去了。同时他们所攻击过的作品还依然在读者中间流布，并没有受着丝毫的损伤。

在中国似乎是读者比批评家更能够认识作品的价值。

一个读者的要求*

近来报纸副刊上、小报上刊载了不少的所谓文坛塑像和作家消息，也许是因了一部分读者喜欢看这类文章的缘故。然而我现在却以一个读者的资格向那些编者们说话了：

难道在这样的中国，在这样的时代，就没有一点重要的资料供一个副刊的编者采登么？

所谓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和平常的人并没有分别。他们一样地生活在现社会里面。他们靠了作品才被我们注意。而且我们所注意的只是那些作品，并不是那些作者。假若一个作者不能够用他的作品却用他的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这作者还能够把他的文学的生命继续下去么？假若一个读者只注意作者的行为而忽略了他的作品，那么这读者还能够从作品里获得一点东西么？

况且那些文章所记述的大半是些捕风捉影之谈，有些甚至是闭门创造的结果。拿这些虚伪的消息供给读者，似乎是一个编者所不应该的罢。至于那含有恶意的造谣，我在这里也用不着特别提出说了。在这样的时代里居然还有些人有闲心拿那些正在艰苦的途中挣扎着的中国作者来开玩笑，这事情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不能够了解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余一。

“点　　戏”*

上期《季刊》中提到“文坛塑像”和“作家消息”这些事，后来就引起不少人来反驳来狂骂，再加以半告密式地说了许多许多。仿佛那里面有直接受损失的对方，（这是指写消息，写塑像，写批评，化了几个不同名姓的人，）有拥护副刊编者兼为对方张目的，还有再化了名字替自己来说话的。最后又有了希望来塑造某人的话，据说这种塑像可以帮助了解某人的作品。

这种事很使我想到“点戏”这两个字。

想不到这种臆造的塑像一类的东西，还有人点名道姓来要求塑造。几十字或几百字就能说得清一个人的生活么？知道了一个作者的生活（甚至于比作者自己知道的都详细！）真就能帮助读者来了解作品吗？再说回来的时候，那些塑像又不一定是靠得住的呢！

我敢说聪明的读者是不会来这一套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余五。

再说批评家*

许多人忧心着中国没有批评家，作者们没有得着正确的指导，因而在质与量的方面没有更大的成效。这句话我以为是不错的。在这种说法里所指的批评家，当然不是像中国近日所有的那一群。那一群虽然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批评家了，可是我们却以为如果要中国有更好的作品出来，先要铲除了那一群。

他们所自诩的批评，是把作品分成两种：不是"意识正确"就是"意识歪曲"。正确的自然说上了天，歪曲的骂入了地。最可气的是任意把作品中的句子剪头去尾留中段，引到所谓批评的文字中，然后大加以讥讽。殊不知，也许那一句中的一节是说着反话，摘取了这样的一节，就引以为由，不是太不合理了吗？还有把作品的篇名或是作者的笔名，用来开玩笑，这未免更没有理性了。

近来，又有聪明的"批评法"出现，如果说到一本期刊，故意留下几篇文章不提到，可是文字中却说不提起的是不值得提起。或是说：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写出来那篇名。仿佛这么一来，就把这未曾提起来的打在"未入流"之中，永世不得翻身，我请写这样文章的人自己想想，事实是这样子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佘三。

我的中年的悲哀*

我拣了这题目下笔时，不禁万感交集。我和文学发生关系，时间不算不久，可是在文学上毫无建树，这只怪自己既无天才，又乏修养，且少一番虚心研究的功夫。

当初父母要我习医，又要我研究工业，我却违命选了文学这门学问钻研。我并非没有济世救人的雄心，怎奈过于看重那一点年轻人的热情，以为干燥深奥的学理、实验室内的工作皆会拘束青年的灵魂，阻碍其自由发展。其实这种见解全是错误。再说对于文学，我又何尝下过钻研功夫？文学理论、美学原理等等基本研究，不但我未入门，便是诸位欧美游学归来的堂堂教授也未见得便懂了点皮毛。大学四年中西洋文学系的训练，使我至今还不很清楚文学究竟为何物。我从未得过一个明确的观念。如今我又在中学里靦然为人师了。我也许会再贻误一些更年轻的人像那般教授贻误我一样的吧。每逢清夜自思，我只感到良心的痛悔。

我自小喜读小说，常与书中人共哀共喜，甚且将书中人物与实生活中之人物相混，我可以说自小就生活于小说中。我也

---

* 本篇原收入一九三四年七月生活书店版《我与文学》。署名黄树辉。

读诗词，尤喜背诵诗词中的佳句。长大我学诗，后又学写小说。诗稿我秘藏着，怕给人看。如今连诗情也为生活之洪炉熔化得一干二净。小说倒发表过好几篇，大都在日报副刊上，仿佛不曾引起人注意。

起初我立下了近乎大胆的志愿想凭着些微的热情，在文学园地中做一名园丁，培植几棵奇花异卉。在文学中追求我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我咬紧牙关在艰苦中奋斗了几年，头上的白发一天天增加，而青年时期的理想也跟着一个个落了。

人到中年，心情衰老了。中年人的悲哀又在虫蚀我的血肉。这种又浅淡又痛切的悲哀隐约在我的小说中流露。我的思想渐渐枯窘，笔也渐渐迟钝，只是我不甘寂寞，故未搁笔，每年也还要勉强写两三篇文章。

自己深知，我的小说不为人注意，很合公道。我因为谨守明哲保身的遗训，故不敢抓住时代的洪流描写。我未失恋，亦未打过某一位女人的主意，故不会写爱情小说。我未进过舞场，又未曾到轮盘赌窟巡礼，故不明白都会主义。我生性愚蠢，既不知宇宙之大，又不知苍蝇之微，故不懂幽默。要之登龙乏术，投机无力。我所写的不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的悲哀而已。我仿佛给自己修建了一座堡垒，妄想用来抵御时代的洪流。可是在洪流的冲击中我的堡垒禁不住动摇了。……

我究竟往何处去呢？……

保护动物*

孔诞方过，动物节又来了。这是世界的节日，它的意义似乎要广大一点。中国人喜趋时髦，自然不肯放过机会开一个宣传会来凑趣。

保护动物这意思也许不错，而且既有各文明国家倡之在先，我们如今来附骥尾，也不失文明古国的面子。这至少也是一种点缀。

但是倘使我们把眼睛放开一点，看一看中国的情形，我们就会不禁哑然失笑了。那些提倡保护动物的人眼光似乎小了一点，他们只看得见小小的动物，却忘记了更大的人类，他们甚至连自己也忘掉了。在我们这里，再放大一点说，在世界里，人还没有得到什么安全的保障。到处都展现着人被虐待，人被宰割的事实，何曾见有什么慈善心肠的人出来发起一个保护人的团体呢？虽然也曾有过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侥幸存在的也做不出事情来。

以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如今却来提倡保护动物，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么？所以对于那宣传大会的工作，我认为不是舍本逐末，就是装饰门面。此外再没有别的意义。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漫画生活》第二期，署名竟容。

一九三五年

图 书 馆*

我在《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叫北平图书馆出来说话了。有人说北平图书馆是衙门，(譬如从里面拿东西出来要去找里面什么要人求一张"放行"的条子。里面办事人对读者的态度就和官僚对百姓的一样。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生起气来，几乎要把那位杂志部的职员揍一顿，北平《世界日报》去年正二月内曾刊载好些攻击北平图书馆的文章。)想不到这一次居然没有摆出衙门的架子，真是难得的事情。

北平图书馆的声辩，的确是"一个小小的声辩"，因为它所声辩的就只是关于左拉、霭理斯、加本特诸人的重要著作这一点(其实许多更重要的人的书那里也没有)，但就是这一点我也不承认我说过什么错误的话。去年春天三个月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图书馆翻那"目录屉"里的卡片，虽然这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但我的记忆决不会骗我。我在那"目录屉"里面的确找不着上述那三个人的重要著作。譬如左拉的我只看见一本德文的《巴勒加医生》和英文的一本什么，加本特、霭理斯的著作也有二三本。也许图书馆就把这当作他们的重要著作也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八期。

可知。然而我虽不懂用一千八百块钱买来的《金瓶梅》的价值，(关于这一千八百元，图书馆自然又有理由声辩，因为账上只开着一千元，另外影印了一百部出卖，抽了八百元的版税来补足。)我却也知道什么是左拉的重要著作和霭理斯的“性心理”的价值。加本特的书我也有过几本。法文书据说由邵可侣介绍买了好些，但结果“目录屉”里找不着一本。一说是没有找着一个懂法文的人去编目，但一个教授却说，他曾接到过一本法文目录，真相如何我也不能明白。但直到我离北平为止，“目录屉”里没有法文书目的事我却可以断言的。

现在北平图书馆居然开列出什么表来了，可惜《文学》编者不曾把这表披露给我们看，所以我不知表上是什么东西。假如这表上居然开满了那三个人的著作时，那么，这不是欺骗，就是临时添置的。如果后者是事实的话，我的文章倒有了效果了。

北平图书馆没有的书还多着呢！五四时代的重要刊物如《新青年》、《新潮》之类，那里就只有残缺的几本，假如良友公司编《新文学大系》只到那里去找材料，结果什么也编不出来。我再说一句：北平图书馆只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对于中国的青年它完全没有用。因为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中国青年要读的书决不是《金瓶梅词话》一类的东西。

我没有学过图书馆学，但是我也知道图书馆不是衙门，不是古迹，不是古董商店，不是养老院。一个图书馆纵然拥有价值一百数十万元的宫殿式的房屋(然而里面的大阅览室却只能容二百人)和价值数万元的大门(参见《水星》一卷六期)，收

藏着价值一千八百元的《金瓶梅词话》和这类似的所谓善本书，养活着几十位名流学者以至杂役听差，这个图书馆依旧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忘记了读者大众。图书馆离了读者而存在，这是中国所独有的事实了。这些话自然不是专门对北平图书馆说的。

现在东方图书馆要恢复了。对于这图书馆我的确充满着感激的念头，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时时都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我希望复兴后的东方图书馆更能够满足读者大众的要求，给中国图书馆立一个好的榜样，我们要拥护它。至于花了我们父兄的血汗建筑起来的宫殿——北平图书馆呢？我再没有话可说了。

关于翻译*

——答王了一

来信

编辑先生：

在《文学季刊》第四期第五十四页有余一先生论翻译的一段随笔，其中差不多全是论我所译的书，我似乎应该答复几句。余一先生只就事论事，比马宗融先生说我为名为利，批评的态度好多了。我常常觉得我的翻译的技巧不够，所以我愿虚心的接受别人的意见，希望以后能常看见余一先生这样的就事论事的批评。

余一先生说："左拉怎样会写出这样的作品呢？像王君翻译的东西，能够是轰动过世界的名作吗？"这显然是因为我翻译的技巧不够，所以我的译品不能代表原书。对于这种抽象的责难，我只好接受，无从答复，也不该答复。

关于《屠槌》的译名，我始终认为 l' Assommoir 一字有双关意。"屠槌"固然不能表达"酒店"的意思，而"酒店"或"下等酒店"也把原名的精彩丧失了。当时我自己也觉

* 本著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余一。

得“屠槌”二字用得不尽善，否则我何必加上一段译后赘语，说明 l' Assommoir 也有“酒店”的意思呢？近来我为了更求明瞭 l' Assommoir 的真意义，曾写了一封信去请教于巴黎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他的复信也说 l' Assommoir 确有双关意，而英国人译为“The Low Tavern”、“The Dramshop”等名也不妥当。现在我正在与文学界几位熟朋友商量一个较妥的译名，最好要能表达双关意，至少也要含多少譬喻的意思。等到再版改名的时候，我想把那教授的一封信当做一篇序文。

至于余一先生说 Germinal 不该译为“共和历第七月”，而该译为“萌芽”，我也想要答复几句。余一先生以为“共和历第七月和这书的内容并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我看见了一部 Germinal 的英译本(Germinal or Master and Men translated by Ernest A. Vizetelly, London, Chatto & Wind US 1914)，那译者在他的序文里却说共和历第七月与这书的内容有很多的关系，而且说书名是从共和新历中取出来的。现在我把他的原文抄在下面：

The title “Germinal” was borrowed by M. Zola from the new Calendar which the 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 adopted in 1792. In this Calendar the month “Germinal” corresponded with the latter part of March and the beginning of April, when, in our climes, nature springs into renewed life and germination becomes universal. At the same time, in selecting

this title M. Zola bore in mind certain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Germinal of the year III. of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when hungry, men and women swarmed furiously into the Convention Hall, demand-ling "Bread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98'. Those suggestive incidents inspired more than one page of the book, but the idea which permeates it is that of the germination and fruition of a new social system, the coaition and uprising of the toiling masses, banding themselves together to readjust present-day condition and secure their fair chare of the good things of the world. Even as it was foretold to Eve when she was driven from the earthly paradise that she should in sorrow bring forth children, so it is sorrow and hardship and suffering that attend the advent of all progress. Indeed, progress germinates amidst woe, and though again and again it be impeded it bursts upon the world and last from very excess of suffering. This idea, it will be found, perva des many of the pages of "*Germinal*".

为了省篇幅起见，我想不必把它译成中文了。如果余一先生能推翻这一篇序文里的说法，我仍愿降心相从。

王了一

回　信

了一先生：信得，季刊虽无“来函照登”的前例，但也照先生的意思把它刊登了。先生也许忘记了罢。我和先生在巴黎岳煐兄处也曾见过一次。后来听见岳煐说先生初到法国学习法文两三月就开始翻译左拉的小说，我们都非常叹服，认为先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第一次拜读先生的译稿《沙弗》，以后先生的《屠槌》等等又陆续到了我的手里，这才引起我对先生的反感。先生说自己“翻译的技巧不够”，这是良心话，但先生为什么又毫不惭愧地大量出产呢？关于《屠槌》的译名，无论如何，先生是犯了绝大的错误。我想巴黎大学教授也决不会承认先生的《屠槌》为正确的译名，而且如果根据先生自己的解释，R——M 丛书中《屠槌》以后各篇都可以用“屠槌”来翻译，不但这样，外国有许多小说也可以用“屠槌”来译了。如果说法文原字有双关的意思，那么中文“屠槌”就决没有双关的意思。并且“屠槌”这名辞，在中国就有些叫人不懂。

说到“萌芽”，先生引了一个英国人（他究竟是不是英国人或者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不知道）的话来做护符。先生问我能不能推翻他的说法，我以为他的说法根本就不曾成立。我劝先生把 H. Ellis 的《萌芽》译本找来看看。（我手中只有这一本东西，而且是前两天买来的），E 氏的序文虽短，却比先生所引的有意思。先生如把《萌芽》细读一遍，再来看先生所推荐的那序言中说到法国大革命中那些 suggestive incidents

inspired more than one page of the book 的一段，先生也许会说那个英国人神经过敏罢。要依照他那说法，有不少的作品都可叫做"共和历第七月"了，假若再由先生译成中文的话，那么用"四月"或"五月"不更恰当吗？

最后我对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先生自动地把已经出版的译作全部收回，请人仔细校改一次，譬如莫华的《女王的水土》这个译名(原文是 Climat)就大有问题，其实书里的错误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不是教授，没有闲功夫替先生做义务的校对了。

余　一　4月10日。

再答王了一先生

关于《屠槌》，我相信每个中国人(法国人自然除外)都和我一样，决不会懂得"屠槌"是个双关字，决不会从"屠槌"里看出"酒店"的意思来。

关于 Germinal 我先得告诉先生，这个字本身决不能译作"共和历第七月"，事实上就没有人这样译过。欧洲人用这个字时除借用原文外，譬如英国人便会在这字下面解释说 bloom-month(或 buddy month)，日本人译 Germinal 为"芽月"。因为这样读者才容易明白 Germinal 究竟是什么样的月份。先生该知道大革命史上的所谓"热月反动"罢，就从没有一个人把打倒罗伯斯比尔的政变叫做"共和历第十一月反动"的。

再说到原书是否应该译作“共和历第七月”。现在就照先生所引用的那位英国人的说法，我们也只能说这里的 Germinal 是个双关字，但这双关字，依旧得译作“萌芽”，因为中文“共和历第七月”里并不含有“萌芽”的意思。

那个英国人的说法其实并不高明。固然“芽月”里发生过叫做 revolt of Germinal 的事情，但一个描写矿工罢工潮的作家，不必从将近一百年以前的历史里找材料。事实上左拉为写这书曾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煤矿区域里旅行了半年，并且随时记录得有摘要。我不知道他是否目睹过矿工的罢工，然而当时欧洲的罢工潮，有着不少，还不用说 revolt。米尔波有本戏剧许多地方和左拉的《萌芽》很像，而且那里面的工人似乎还唱着 carmagnole(？)，但没有谁说米尔波受了“共和历第七月”的暗示。

还有，在“共和历第七月”发生的事情多着呢！巴黎公社的埃伯尔派是在一七九四年这月里上断头台的。丹东派也是在这月里被杀的。埃伯尔派的处刑决不是一件小事。先生对这又怎么解说呢？为什么《萌芽》里的 Etienne 又不被枪弹打死，或上断头机呢？为什么他还到别处去预备着将来再来干一次呢？为什么 Etienne 临走时会有这样的感觉呢：……In the heated rays of the sun on this youthful morning the country seemed full of that sound. Men were springing forth a black avenging army germinating slowly in the furrows growing towards the harvest of the next century and this germination would soon over turn the earth.

(我手边只有新买到的蔼理斯的英译本。)希望先生给我一个答复。

关于我的态度，我得声明一句。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态度的好坏。我以为译书要不错并不是容易的事，但错误不该多，而且错就是错，不错就是不错。倘使错了不认错，反而请几个外国人来替自己辩护，这种态度就是坏的。我们并不是不应该引用外国人的话，但我们至少也得彻底明瞭这个外国人的话究竟说得错不错。像先生那样请出一位法国人来证明“居榥”(记住，这是中文)含得有“酒店”的意思；又请出一个英国人来证明“共和历第七月”(中文)含得有“萌芽”的意思；我是一个中国青年，我敢说，即使先生请了法国总统或英国皇帝来，我也不能够承认。从这一点看来，我和先生两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研究学问的态度都差得很远。我以后不愿意再和先生争辩了。我等着读先生的名译《莫利哀全集》呢！

附记：这信写好以后我无意间在一家旧书店里读到先生所说的那个英译本。那个英国人的序文完全读过了，前后矛盾处是容易看出来的。而且连他也曾在 Germinal 下面加上 master and man 另一个标题，为的是怕读者看不懂。

再说《雷雨》*

在上期本刊里写了《〈雷雨〉在东京》的文章，那时我究竟说过了些什么话，现在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在这里每天都可看见种种奇怪的事情，倘使看得不够，那么我手边还有报纸。记得曾写一篇关于这里报纸的短文，但到了上海一个做编辑朋友的手里便永无消息。连他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当然更不会明白。但这并不能叫我从此不看报。一看报依旧要生气。不说别的，别人天天来个“应征”，虽说你能够讲“礼让”，或者你的脸皮再厚，你也会有些“下不去”。又如昨天来个什么贵客，今天再来个盟邦元首，你有钱，当然可以乘这机会到台湾或更远的地方去考察一下；若是个穷学生，就免不掉进拘留所去玩个十天八天，给虱做做朋友，尝尝取调的滋味。……许多事情塞满了一个小小的头脑，我的头脑，比世界有名的归威爱的和屠格涅夫的头脑小得多！我哪里还能够记得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些什么话。

一个朋友问到我那文章的内容，这可窘了我。但恰好《雷雨》要在这里二次公演，我想再去看一回，票子已预先买好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漫画生活》第十期，署名余一。

再看一次，至少可以唤起我的忘却的记忆，或者另为它写一点东西。我这样打算倒不错。可是——可是什么呢？《雷雨》不能演了。据说是公使馆干涉。

这一来我才记起我们的公使已经回来了。台湾地震时我还替他担过心，其实那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关于公使我听到种种的故事，但不必去管他，而且如今升格作大使了。干涉《雷雨》的公演，理由是男女学生合演“有伤风化”。有伤风化四个字是我加的。我究竟很聪明，他没说出口的话（？）我都能够知道。有伤风化四个字是中国人的得意杰作，做官的，办报的都会说，道学先生们更不肯把它忘记。又有一两位留学生攻击《雷雨》是乱伦的剧本，还写了信到公使馆去，这也是说它“有伤风化”，究竟“无伤风化”又是什么，那般喜欢维持风化的人知道吗？性的塔布在原始民族间是最有力量的。而一部分原始民族也很喜欢维持风化，譬如依亚柳人的规矩妻子就不能当着人对自己的丈夫讲话。但可惜那般人不读书，不能够在民俗学、人类学里面去照照自己的面目了。

五四运动时代，我还是个小孩子，但那时候我们一般朋友就办了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刊物，那刊物因了攻击成都警察厅禁止女子剪发的缘故被勒令停刊的，但十年以后一个女子不剪发倒要算是落伍了。现在我还不老。我不相信又该轮到我把那停掉的刊物再来刊行一次。

刊行"文化生活丛刊"[①]的缘起

在闹着知识荒的中国社会里，我们现在来刊行这一部"文化生活丛刊"，这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书读"、"买不起书"……这样的呼声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在欧美，学问的各部门已经渐渐普及到了大众中间，在那里我们遇见过少数的劳动者，他们的学识比得上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但是在我们这里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无论是科学、艺术、哲学，只有少数人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书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赢利，而公立图书馆也只以搜集古董自豪，却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地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

---

① "文化生活丛刊"，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五年五月迄一九四九年八月，共出版四十余种。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申报》。未署名。

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至于以我们的薄弱的能力能否完成这一个宏大的志愿，那就完全靠着读者大众的支持了。

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

“文学丛刊”[①]（广告）

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担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我们的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

① “文学丛刊”，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迄一九四九年六月，共出版十集，一百六十种。本篇曾刊于“文学丛刊”若干单行本附页。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①]（广告）

用小说笔调写成的社会运动史，这是第一部。巴金先生六年前开始写本书，到现在才完成这可以独立的第一卷。这虽是一册不到十万字的书，但作者的如火如荼的笔所写出的先驱者们的英伟的事迹，会震撼每个读者的心灵。

① 巴金译。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回 忆 录》[①]（广告）

这是一本神奇的圣书，一本伟大的自传。从这本书里一个异邦美丽的小姐站起来，在读者面前发育生长，长成一个伟大的人格，抛弃了富裕的家庭，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丈夫，到民间去，把她从瑞士学来的医学知识，用来救济贫寒的农民，后来经历过了种种的阶段，变成了一个最伟大的领袖，一代青年的指路的明灯。于是她在牢狱里被活埋了二十三年以后，生命又来叩门了。她又以新生的精力重回人间。这是何等样崇高的精神，何等样坚决的性格与信仰，何等样的人格的吸引力！

读过柏克曼的《狱中记》的人，不可不读这本比《狱中记》更伟大的圣书，不仅这书的每个字会像火焰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颗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它会使你流泪，它会唤起你的渴望。

本书现由译者参照互有详略的英、法、德，三种译本重译，明年出版。

---

① 妃格念尔著。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狱 中 记》[①]（广告）

柏克曼叙述故事的手腕和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及其他的俄国的写实主义者相似……他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柏克曼在他的热狂里是一个抒情的诗人。然而甚至在热狂里他看事物也很清楚。他解释他自己和他的主张的一部分是一件稀有的心理学的作品……爱好果戈理、杜思退益夫斯基、托尔斯太、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得列夫的著作的读者可以把柏克曼看做那些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兄弟。

——W.M.Reedy

这是一个成熟的心灵的成熟的怪物。

——S.Yanofsky

读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张，他却不能放过本书的深邃的心理学的洞察和优美的文学的内容。

——加本特

柏克曼的《狱中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自传。

——《太阳报·夕刊》

在这本描写他的生活经验的书里柏克曼给了我们一个恐

① 柏克曼著，巴金译。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附页。

怖的记载，这差不多是没有匹敌的。

——纽约《太晤士报》

本书的不可思议的魔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

——纽约《地球报》

著作的手腕颇似斯拉夫的写实主义者，而且被批评家比作杜思退益夫斯基和安得列夫，他的作品必有一种惊人的魔力，同时还有一个社会的价值。

——纽约《讲坛报》

《草原故事》①（广告）

据说做梦的人能够从海岸与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一个仙话，能够从专制与受苦之混乱中创造出一个自由人的国土来。高尔基便是现今的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本《草原故事》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译笔流利畅达，颇能保存原作的那种美丽的，充满了渴望、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嗅到俄罗斯草原的香气。本书前在生活书店出版，现由译者收回重加校订，几与重译无异。而售价却较前减低二分之一。这是“文化生活丛刊”最近给读者诸君的一个贡献。

---

① 高尔基著，巴金译。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狱中记》附页。

一阵春风*

大概在三四年以前，一部分的教授学者名流提议把某一个地方作为文化城，当时这提议没有被采纳，使得教授学者名流之类曾经仓皇地搬过一次家。

现在那地方终于成了文化城，教授学者之类得到了最后的胜利，这自然是他们的光荣。但是别的人却一天天地把头更埋下去了。

教授学者之类是靠文化吃饭的，这是人人尽知的事。要是没有文化这东西，教授学者们岂不是早已躺在枯鱼之市了么？但是为什么最近还有大批的教授嚷着要来建设什么本位的文化呢？也许一个文化城不够养活许多人，所以还有人想来多建设几个。

一提起教授们的文化，我就会联想到那一所宫殿式的图书馆，这东西仿佛是替那般生活在“王道乐土”的人而设的，它若被搬到那里去倒更适当一点。所以倘使将来有一天那所宫殿顶上扯起了五色旗，我也不觉得奇怪。我所痛惜的是中国人民的血汗竟然这么白白地被糟蹋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文学季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余七。

教授学者们近来热心整理旧籍，翻印古书，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事。这般人的原形，这般人的十八般武艺现在是完全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他们除了这便不会再有别的法宝。

“士为知己者用”，他们熟读古书，很知道这个道理。他们等待着出善价来买的主顾。圣人的子孙最近也出过洋，他们是圣人的信徒，当然也有这种种的光荣。

现实的生活愈逼近深渊，大崩溃的征象愈显露，他们便愈赞颂古书的价值，愈加迅速地翻印大批古书来麻醉青年，也许他们把这当作给垂死的病人服用的一副麻醉剂罢。

假若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要代表青年出来说一句话：“我们要生活，我们并不是垂死的病人，而你们却是的，我们不要你们给我们的东西！”

三百年的满清统治，已经把我们这个民族弄成了一个凉血的奴隶的集团，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的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

救救青年罢：我不觉向着教授学者名流之类这样地哀求了。

然而谁肯来听我的这番蠢话呢！他们不过把它当作一阵春风罢了。

一九三六年

大度与宽容*

最近文坛上有人在宣扬大度与宽容了。据说凡具有正义感的，都应该来响应这呼召。

对于这种王道精神我只有低头拜服，因为我已经拜受过它的赐与了。让我来叙述下面的一件事：

我写过一篇短文，那就是《文学季刊》的《告别的话》，我也是季刊的一个负责人，（虽然和靳以比起来我为《季刊》尽过的力量是太少了，可是我做过的事却比另一位挂名编辑多）所以对于《季刊》的停刊我有话说。在北平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三座门大街的季刊社里，已经过了中夜了，靳以发着烧躺在床上，我坐在外面房间书桌旁边，怀着一个苦痛的心，写了这短文。这文章是靳以要我写的，而且得了他的同意由他发排的。我校过清样在那上面签了字。我还看见印局送来的纸版。那文章的内容我记得很清楚。然而今天读到《文学季刊》，却发见我们的《告别的话》和我们在北平排好的不同了。

《告别的话》的第二节里本来有这样的一段："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一期。

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在这下面才接着："在市场上就只充满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现实的书报……”然面被书店印出来以后上面的一段话却不知怎样也“和读者告了别”。

这一段话在全文章里算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说明了《文学季刊》停刊的原因，没有它，别的都成了空话，那篇《告别的话》就等于白写。不但这样，而且没有它，全篇的文气就不连贯，那一节文章简直成为不通了。所以那一段话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删去的，除非它触犯了那些有志操纵文坛的人。《季刊》的纸版落在他们的手里，当然会遭受斧钺了。

一件事情的真相常常会为外间的流言所掩盖了的。关于《季刊》的停刊，外面也有过种种的传说。现在我把被删去的一段话补写在这里，读者便可以明白那真相了。我当初写这一段话，一半还是出于揣测，现在恰恰它被人删去，这事实却意外地给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了。

我的文章遭受凌迟的重刑，偏偏在人家宣扬大度与宽容的时候。我第一次拜受了藏在这大度与宽容后面的刀斧，才认识王道精神的伟大，我怎敢来响应这呼召呢？况且我又没具有这样的一种正义感！

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

徐懋庸在他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私信》①里攻击到我。他的论据是：

> 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

据徐懋庸自己后来声明，这信是未得他同意而发表的，然而——上面的话总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吧。虽然他只是在背后攻击我，不预备给我听见，但既然无意中被我听见了，看见了，我就得出来说几句话，尤其是因为徐懋庸所攻击的那些人永远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文章；我更应该出来为他们辩诬。

我首先应该说我这个人是充满着缺点的。我只是一个还在学习写作中的青年，我从不敢自伍于文学家之林，而以什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六期。

① 引用号里面的字句都是从徐懋庸先生的两封信函里借用来的，另外一信给《社会日报》的编者，"私信"两字就见于该信。

时代的先驱号召。①徐懋庸要攻击我，尽可以抓我的许多弱点来施打击，我决不敢维护自己的短处。但像他现在这样把“法、西两国安那其”的行动要我来负责，并且要我来代表“中国的安那其”，就未免使人疑心他的脑筋是否健全的了。

试问西班牙、法兰西和中国究竟隔了多远的路？一个住在上海的中国青年怎么可以指挥那两个国家里的社会运动？这是每个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够回答的。至于中国的安那其主义者，自然大有人在。但徐懋庸是看不见的。虽然徐懋庸和他的朋友中间也有二三人自称过一回“安那其”，然而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我记得很清楚，距今两三个月前一个曾经教过徐懋庸的法文的朋友告诉我，徐懋庸拿了书向他请教法文时曾对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安那其”，我当时马上替徐懋庸辩明，说徐懋庸并不是什么“安那其”，因为我也读过几篇徐懋庸的文章，也略知道一点徐懋庸的为人。我那朋友似乎也不大明白真正的“安那其”应该是些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还不大肯相信我的话。现在徐懋庸出来堂堂皇皇地责备“中国的安那其行为卑劣”，更可证明徐懋庸之非“安那其”了。其实徐懋庸是不

① 近来小报上常有给现代中国大文艺家歌功颂德的文章，譬如某人带了太太回乡避暑，某人说过了什么漂亮的话，某人几乎被电影公司聘去担任主角之类也被视为嘉言懿行而一再昭示读者。对于这我自然无话可说。我不是一个文艺家，我从不敢为自己发过什么消息。但某一些小报（如《社会日报》之类）却一口咬定，我最近到苏州去喝茶，并对访问者说：我的作品“都是封建少爷小姐的消遣品”。我最近并没有离开上海，我从来就没有会见过什么访问者，而且我决不会对什么人说出这种话。不高兴我的人，尽可以从别的方面来骂我，我也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但若专门在小报上发消息来诬陷我，那么除了暴露自己的“行为更为卑劣”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会看见什么"中国安那其的卑劣行为"的，因为那种人从来不曾在文坛里混过，他们只在一些荒僻的地方沉默地埋头工作。他们不写文章，不办杂志，他们的言行不见于小报。他们的势力固然不大，但他们能够怀着热烈的希望，坚强的信仰，自己牺牲的精神忍耐地工作。而徐懋庸却说他们卑劣，这"卑劣"两字出于徐懋庸之口大概不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吧。我想他们自己将来会用事实来答复徐懋庸的"诬枉"的，用不着我来代他们辩解，我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我的言行也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着那主义，而且我对前面提过的那般人也很敬仰，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我的行为带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坏习惯，甚至我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和我的信仰多少有点冲突，这样我还配做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吗？

我写上面的话，并不是企图来卸责，来替我自己辩白，因为有识的读者根本就会否定徐懋庸的论据的；我是来"揭穿"徐懋庸的"造谣"，证实他的"存心诬枉"。我现在还要来为西班牙劳动者辩诬，证实徐懋庸怎样用他的"含血喷人的手段"，来涂抹在人民解放的战场上英勇斗士的血迹。

徐懋庸说，法、西两国"安那其反动"而"破坏联合战线"。关于法国的运动，我不大清楚，但我这里有 C. G. T. S. R. 的机关报，上面有 C. G. T. S. R. 的书记伯拿和 C. G. T. 的书记石屡的往来信件，足以证明徐懋庸的话是一种诬陷。至于西班牙

的事情，我却有更多的证据来打破徐懋庸的"造谣"。

徐懋庸倘使不知道在西班牙的革命阵营中什么势力最大，最强，那么他最好不要来谈西班牙的事情。徐懋庸倘使不知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革命中破坏联合战线的是 C.N.T. 还是 U.G.T.，那么他最好不要谈西班牙的联合战线。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九三三年的失败以后第二年C.N.T.也还发过一个宣言说明联合战线的必要。C.N.T.的一个领袖甚至在玛德里的《土地》日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个对于联合战线的具体的提议。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答复，不过 C.N.T.也并不曾因此"反动"过。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中 C.N.T.和 U.G.T.的联合战线成立了，产生出很大的效果，但革命终于失败，两个团体的斗士大批地死在战场上，殉道者中有着 C.N.T.的领导者马地涅斯(一个著名的安那其工团主义者)。

这是以前的旧事，这里没有篇幅让我详说，但上面的简短的叙述也可以帮助徐懋庸了解西班牙的事情。这是中国最近的"报章杂志"上所不载的，徐懋庸不知道，还可原谅。至于这一次事变，徐懋庸应该从逐日的报纸上看到详细的(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记载了。我不知道徐懋庸究竟看过"报章杂志"没有，或者他看的是什么样的"报章杂志"，我更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看出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动"来！我知道佛朗科将军部下也有不少的文士，也办了些"报章杂志"来宣扬王道。但有一件事实却是任何的"诬枉"所不能够推翻的：在我写这文章的时候，或者在徐懋庸写那封"私信"的时候，C.N.T.领导的一百二三十万的劳动者和在F.A.I.的旗帜下团结的五万革命

份子，正在西班牙南北两路的各前线上为人民阵线流血战斗。靠了他们，西班牙的自由才能够保持到今天。他们是佛朗科将军所最憎恨的死敌。倘使他们一旦改变心意，真的听从了徐懋庸的吩咐，去"破坏联合战线"，那么佛朗科将军的铁骑早已踏遍伊比利亚半岛了。这事实不是很明显地证实了徐懋庸究竟是谁"派遣"的吗？

我们再来看所谓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动"。第一个"反动"的事实是著名安那其主义者阿斯加索的战死。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事。阿斯加索和他的同志们在 Ramba de Sainte-Moniment 的障碍物旁边奋勇地与叛军搏战，终于受了炸弹而壮烈牺牲。他是为西班牙的自由的第一批殉道者中最光荣的一个。我知道这个人，因为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所谓阿斯加索——杜鲁底——何威尔三人事件正在那个城市里掀起了觉悟的知识份子和劳动阶级中间的抗议的波涛。这三个亡命法国的西班牙安那其主义者因了西班牙国王访问巴黎，遂致无辜被捕，囚在巴黎监牢。这时西班牙、阿根廷、智利三国的政府先后以虚假的罪名来要求把他们引渡，（阿斯加索在南美各国如阿根廷、智利、古巴、墨西哥等都有过活动，而且有巨大的影响。）这引渡几乎成为事实，但靠了人权协会、亡命者权利防护委员会，和别的前进的团体的援救，以及各国劳动阶级的抗议，他们居然获得了自由。一九三一年革命爆发，这三个亡命者和别的许多同志都回西班牙去参加。从那时候一直到最近他们总是站在各种革命运动的前线上。阿斯加索如今战死了，但杜鲁底最近还带着一支兵在萨拉哥萨作战。

这种人，这种举动虽然被中国的徐懋庸所断定为“反动”，却得到了西班牙人民的真诚的敬爱，他们会来拥护（而且事实上已经拥护了）这种人和这种举动的。

说到杜鲁底，我就得提起另一件事，加泰隆尼亚自治省革命防卫委员会之组织，这该是西班牙“安那其”的第二个“反动”吧。我在“报章杂志”上看见过这委员会的名单，十一个委员中“安那其”占了五个，委员人选分配如下：

F.A.I. 的代表两人，其中一个是山提颜，这人在一九二八年曾给我写过一封简短的信，那时他还在南美阿根廷办报；

C.N.T. 的代表三人，第一个便是杜鲁底；

U.G.T.（社会党的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二人；

P.M.U.（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代表一人；

其他的代表三人。

这委员会掌握着统治加泰隆尼亚自治省的大权，至于省政府主席冈巴尼斯不过徒拥虚名而已。

我不再谈西班牙的事情了。但我可以坦白地说：倘使徐懋庸不能够“格杀”那十一个委员，倘使徐懋庸不能够跟着佛朗科将军和穆拉将军的势力攻进巴塞龙纳把这委员会解散，那么他在说过“西班牙安那其破坏联合战线”以后，任是怎样“辩白”，“也不能够扫除他这一次”给人的“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的印象。

我始终不明白徐懋庸为什么要在给鲁迅先生的“私信”里攻击我，而攻击我时，又不拿我自己的言行作例，反拉了“和我无关的”西班牙的事情来“构成我的罪名”。直到我把鲁迅先生

的文章仔细读了几遍，同时又见到徐懋庸在《生活知识》上面发表的小说①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他以“理事”的资格在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挑战。徐懋庸的小说里那位奉命下山组织统一战线的姜子牙自然是一个伟人，这是不是指他自己，我不敢断定。不过甚至那位姜子牙似乎也不曾明里讲统一战线，暗里破坏统一战线的，所以他的统一战线成功，而放出三十六路谣言破坏统一战线的申公豹终于被人骂死，使徐懋庸能够因此写出宣扬“神道”② 的大文章，至于“文艺家协会”的理事之一的徐懋庸呢，他虽然口口声声讲统一战线，而实际上却散放谣言来破坏西班牙的联合战线，这样看来他倒不像自己笔下的姜子牙，却成了申公豹了。我是很赞成联合战线的，不过“文艺家协会”有着徐懋庸那样的人做理事，纵然加我以任何可怕的罪名，我也不会加入。因为破坏统一战线的并不是我，倒是他了。他写给鲁迅先生的“私信”和西班牙斗争的进展不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吗？

① 其实我自己尚未读过，是一个朋友读了向我转述的。

② 因为姜子牙是奉令捧了封神榜下山去兴周灭商的。

一篇真实的小说*

我这次在上海住下来，整整有一年了。我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上海住这么长久。这一年里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做过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在一张小报上有人说我的“生活平凡普通到了极点”，他这话说得十分肯定，好像他知道我比我自己知道得还更清楚，使得我自己也不敢在这里辩解了。但是靠了这种平凡的生活，我得以认识了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的许多人，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面孔，知道了不少平凡或不平凡的事情（纵然我自己住的是上海狭小的亭子间，而我的朋友却把我带到各种复杂的生活里面去）。这些都可以作为创作的题材的，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写。因为我对于生活本身多一番兴味，对创作本身就少一番兴味了。不知怎样我会触犯了那位最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的理论家，他在一封私人的通信里攻击到我。他说到“西班牙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他要我来担负这个责任。我很惭愧，这个重大的责任像我这样渺小的人是不配来担负的，虽然我把这也看作极其光荣的事情。关于西班牙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我的话在那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文艺》。

位国防文学口号家的耳边会变成一阵春风。我们都知道在西班牙目前正进行着一个血的斗争，而这斗争正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对于西班牙的前途和那斗争的成败，我现在还不能够说一句决定的话。但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在C.N.T.的旗帜下团结的一百三十余万工人不是拚着最后的一滴血在各处的前线上战斗吗？在西班牙的斗争中"安那其"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甚至莫斯科《赤星报》的社论也公然承认的。然而我们的国防文学口号家轻轻一笔，就把那为人民阵线牺牲了的无数工人的血迹抹煞了。我自己并没有破坏过联合战线，然而我对国防文学也没有发表过"污蔑的、冷嘲的"理论，但那位理论家的信函却使我对他们所提倡的统一战线起了疑惑，而且感到可怕了。

那天下午我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国防文学的理论家的信函，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没有扭开电灯，亭子间沉落在阴暗里了，我坐在书桌前面，我痴呆似的望着那蓝色的墙壁。我的眼睛渐渐地花了，墙上的雨蚀的痕迹变成了一幅欧洲的地图。我的眼光先定在我住过的那一点上。但过后它慢慢地往下移。南欧——于是那被称为"诗之国土"的西班牙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吸引着我的注意的尤其是加泰龙纳一带。因为那里有着好些我所敬爱的朋友，虽然好几年不和他们通消息了，但我的心却没有一个时候忘记了他们。在这阴暗的亭子间里我看见了西班牙斗争的全景。这生与死的斗争联系着一部分人类的命运。这的确是一场苦斗，那胜败是很难预料的。但是那里没有口号，没有文字，没有创作，有的

只是血和力。那里的人是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他们所宝爱的理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这一个认识使我十分感动，但同时我更加苦恼了。我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垂死的人，极力睁开眼睛带着羡慕的眼光去旁观活人世界里的活动。

楼梯上起了脚步声。掩着的门突然开了。"怎么到这时候还不开灯？"一个朋友的熟悉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响起来。他就伸手去扭燃了电灯。房内立刻亮了。我好像做了一个大梦。

"你一个人坐在房里不开灯，在想什么？"朋友惊讶地问。

"我在想西班牙的事情，"我短短地答道。

"你还在做西班牙的梦吗？"朋友问道。他读过我三年前在广州写的一篇短文，知道我做过"西班牙的梦"。我从前曾向他谈过一些西班牙的事情，都是从到过那里的朋友处听来的。他如今也带着关切的眼光在每日的报纸上去找寻西班牙的消息了。

"嗯，"我点头应了一声。

"几千几万的人牺牲了。"他忽然呻吟似的叫了起来。

"也许还有更多的人来牺牲的。然而无论如何斗争是要继续下去！"我不能忍受他这呻吟似的声音，就愤愤地答道。

"但是据报纸上的消息看来，说不定玛德里很快就会陷落的，"朋友带了恐惧地说。

"那么就让它失陷罢。在一七九二年巴黎也几乎失陷在布龙士威克公爵的复辟军队和普鲁士的八万大军的手里。但是后来结果怎样了？历史是不会骗人的。"我坚定地答道。

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朋友的眼睛上抹了一层希望的光

彩，灿烂地笑了。他说："好，我们等着看那壮剧吧。"

我们还谈了一些话，朋友就告辞走了。临去的时候他交了几封信给我，一面说："你的信。"

我的朋友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了。亭子间又落回在静寂里面。我依旧坐在书桌前，但这一次我并不去望那墙壁上雨蚀的痕迹了，我是在拆开朋友给我带来的信函，我拆开了第一封。三张半西式信笺上面饰满了横写着的细小的字迹。是这样的一封信：

××先生：

请相信我敬爱你的真情吧。我是一个给人家笑话的痴傻的孩子；……现在我冒昧地，羞红着不讨人喜欢的脸庞，战栗着稚嫩的心，淌滴着卑污的眼泪，一堆烂泥似地跪在你的面前……！我敬爱的先生，请你不要一脚踢开我，让我抽噎着难听的语言。

我今年十九岁，在六年以前，我在"工人子弟学校"毕业出来便很容易的钻进这个工厂里了，那职分的名义叫"艺徒"，直到现在我还是初进去时一样的毫无"升色"，成天连夜的锉锉刀，打榔头，搬"生活"，锥红铁，沾黄火……没有一件差事不是不用蛮劲的！我的身体已经有伤了，有的时候发作起来便疼痛，便咳嗽……现在我是瘦得很，不像一个苦力；先生，这样的话是万不该说的吧？然而这也是我知道得最清楚的："我知道我不会活得久了……"可是我应该怎样才"活他个痛快"呢？

我有一个苦难的妈妈，她老今年将近五十岁了；她老可以说是一个奴隶，一天“人的日子”也没过过来，虽然她老现在依然口口声声为了我这个宝贝儿子啊。先生，在这里我也许成为一个哑巴了，满肚子的凄伤，对着你这样慈善的人——我没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为我滔滔动人的哀诉出来——这是多么一桩苦痛的事呵。可是今天，我无论如何得说出来，请饶恕我凌乱无序。

这是一个没落了的小资产阶级的人家。那在外行商的老头子当儿女们尚未要长成的时候便死去了，留下这凶毒的贵家小姐派头的老太婆，和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他们的生活便全倚靠着老太婆的妈家，妈家是开牛皮坊的，现在虽然衰败了，也还有好多房产，当然那鄙视万般的气势依然存在的。可怜我妈，当二十三岁那年，在婆婆家里受够了苦了，等于一匹过累了的老马似的随随便便的就卖到这样的人家里来了；实际上妈不正是春华的年岁吗？可是竟给人家那般苛刻的贬卖了，据说只有三十块大龙洋的代价呢！从此，妈的苦难便更加深痛了；她老不但不容易偷回娘家走走，就连半夜里暗暗地做一个回忆的梦也是多么难得一个甜蜜的梦境啊！尤其是一年过了，一年来，直到儿子长了这么高，那罪恶的苦痛，依然像一把一把死盐样地堆塞到心头来，她不常常这样说吗：“妈的心是给盐塞实了，现在是连叹口气也吃力了，我的儿呀……”做儿子的听了心酸得也如同给盐水腌了似的痛，叹不出一口气来，也咽不下一口气到肚里，便这样悒

郁苦恼着。

先生，说起没有道理的事来真多呢。我的小心儿气得几乎粉碎了。其实也没有多少可以惊奇的啊，这又算得什么呢？——你的命运既然是注定了做别人的奴隶，那么一个奴隶被人压迫了，侮辱了，打骂了，也是值得不平的吗？我可怜的妈妈，便是这样的了。她给我的叔叔侮辱了，一直到现在便等于强占去了似的；竟认我妈妈是他那畜生的妻子。我妈怎敢反抗这个少爷的脾气呢？更可恶的是我的父亲，他死抱着中庸道德，口口声声都说这样的冤孽是注定了的，人力也挽回不得。"忍让吧，能忍自安，"他于是躲到江北乡下弄两个小孩子教书去了；他连半个字眼都没有在他兄弟面前放出来干涉过；于是叔叔快活了。可是妈的苦痛，有谁来同情呢？要知道妈处在那种森严的礼教之下是一个天大的罪人了啊！那凶毒的老太婆便如同一个教皇似的了，可是她对于她那恶魔似的儿子从没有一点责罚的意思，却统统把责罚加到妈一个人的身上；为了要我妈服侍她们到土里，她却不爽爽快快地给妈一个死刑，可怜妈便这样一天驮一个新伤地生活着了。……

现在临近的大街小巷，只要是熟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不同情妈的了，人家都是这样的劝慰她老："嫂子，你底儿子也有这么大了，你将来的福气一定好！你快快不要忧愁！……"妈妈常常挂着希望的老泪这样半吞半吐的对我说，我是她底"儿啊"！并且她老也常常这样说：

“儿啊，要不是有你，我早已寻死去了……”我就会想起妈生育我的苦辛来，这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故事呢！假若问到任何一个，那人都能这样兴奋地告诉你：“那女人才可怜呀，天下少有的难产呀，整整十二天十二夜呀，人事不知，妈家又穷，婆家又凶呀，真是！……”那口气仿佛愤慨的庆幸似地，我每一回忆地想象到那样一个故事上去，再睁开眼来看看妈的驼背和白发，便麻木得像疯狂一样的难受了。我总是死命的咬起牙齿来，狠狠地诅咒：“妈呀，你死吧，你快些死吧！……”我一天一天巴望着她老快些死去，而她老却是凄凉地活着，并且有的时候她老还这样安慰我：“……我烂刀经打哟！我吃来苦，我有的活！……”她老还是以为儿子在祝她康健啊！唉……

我本是想单独出来乱闯的，可是不死的妈妈究竟绊住了我的腿，我的野心碰着妈那苦难的挽留，是多么烦闷啊！但是我又这样快活地想起来，把妈一同带着出去闯不好吗？可是我竟茫茫地抓不定一个方向，我长大以来没有出过门，我的胆小小到不可以形容。我听说这世界尽是恶魔，我怕妈会跟着我遭受更大的苦难……先生，我便这样心痛地彳亍着了。我低低地背诵着，握紧着拳头：

“毁灭不了世界毁自己，造福不了人群造灾殃！”

可是我又这么懦弱的啊，……我不敢十分相信自己，真的我就连一分力气也没有了，毁灭不了这世界的一角？我敬爱的先生，给我一个判决罢！我是毫不姑息我的生命的！妈妈吗？我更不依恋她了，因为毁灭了的，正是她

老的一个有能力的好儿子啊！……

先生：你不讨厌我吗？我还有多少多少的话要说，然而我运用文字的力量已经疲倦了。

敬爱你的一个苦孩子

我读着，我反复地读着，我自己也被这简单的信函所感动了。这不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么？不，我不能够这样来称呼一个真实的悲剧。这平凡的简单朴实的叙述，比任何小说都更雄辩的。

西班牙的斗争去远了，国防文学口号家的评语也消失了。响彻我这亭子间的是一个中国青年的呼号。

> 我们整年整月辛苦地劳动着。我们的父亲病死在监牢里，我们的母亲姐妹被奸污，我们的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从你们那般人中间是找不出一个有良心的。

我在我的一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把它们忘掉了，现在它们却被谁当作控诉似地投到了我的面前来。我恐怖地定神往四面看。房里只有静寂。晚风翻着桌上摊开的信笺。它们分明地摆在我的眼前。每一个细小的字沉重地打进我的眼里。是一个青年从辽远的地方投了这控诉来的。

我将怎样来回答他呢？我们将怎样回答他呢？文字吗？我的小说能够在这个青年的已受过，正受着，将受到的苦楚上添加些什么呢？那般根据一条新闻写成的“概念的作品”又能够在这些苦楚上添加些什么呢？

在各种刊物上，我们青年异口同声的呼号过了。然而在刊物之外一部分青年又以更亲切的调子发出了他们的呼声。而且这呼声是一天天更加响亮了。

“我知道我不会活得久了，可是我应该怎样才活得痛快呢？”

“毁灭不了世界毁自己，造福不了人群造灾殃！”

一个人在绝望的心情中是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倘使有一天这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的呼声真的变成了行动，那将会是一个何等惨痛的悲剧啊！

我怎样才能够向他伸出救援之手呢？他这个急切地需要着别人的帮助的人！

这样反复地想着，我脑里依旧只有“文字”两个字在打转。到现在还想到文字！我真正成了不可救药的人了。

我的头脑胀痛起来，我没精打采地俯下头去拆第二封信。

我们的纪念*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过日子，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决不是健忘的人。不仅那白山黑水，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还非常鲜明地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在那边铁蹄下面挣扎的我们兄弟们的呻吟和呼号，依旧洪亮地响在我们的耳边。我们不会辨别不出兄弟的声音，我们更不会听见他们的声音而不感动的。这几年来我们的确含着眼泪，怀着热血大声疾呼地响应过了。

五年了！我们的呼喊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效果。而那威胁着我们这民族的危机却是更加紧迫了。一只魔手紧紧地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闷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个沦亡的命运摆在我们的眼前。到处现着崩溃的朕兆，到处听见徬徨的呼号。这五年来我们似乎一天天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里沉落下去了。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我们依旧没有失掉我们的自信心。在今天抗敌图存的呼声比在任何时候都响得更洪亮了。便是在最辽远荒僻的地方也有一些兄弟们像赴盛筵一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未署名。

地来参加救亡运动。这一次我们用事实证明出来我们还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们的集合的努力是可以将我们的命运改变而获得最后的胜利的。

五年前我们就说过，那是最后一次的眼泪了。哭泣的确是一件很可羞耻的事情。我们已经流了够多的眼泪，现在该我们来笑了。我们笑，不是因为我们快乐，而是因为我们需要快乐。我们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所从事的斗争是需要着众多的牺牲的。但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不一定就有利于艰苦的工作，和伟大的斗争。真正的战士便在就义的时候也还谈笑自若。我们这民族素来以坚忍沉静著称，那么即便轮着我们来交出我们最后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勇敢地大笑几声么？

五年了！这五年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血的创痛是不能够被时间磨洗掉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笑一次。我们的笑声要飘到那里去，飘到白山黑水那边，飘到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那边，飘到我们的兄弟们的耳边。让他们听见他们所熟习的亲爱的兄弟们的声音而得到安慰和鼓舞罢。让他们也来跟着我们痛快地笑一次罢。这五年来我们把他们抛撇在铁蹄下面过够惨苦的日子了。

但是对于那些把鲜血洒在那土地上的兄弟，我们怎样对他们说话呢？我们永远记着他们，永远敬爱他们。

片断的感想*

前两天一个陌生的孩子写了信给我，第一句话是："在此刻从鲁迅先生的死，你定然又多了许多写作的材料吧。"

这个推想是不确实的。十月十九日以来几天里我的心情，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在那些日子有人向我提过写文章的事情，但我只是茫然，我当时完全想不到我会写什么哀悼文章。我站在灵堂里，望着那一批一批的来行最后的敬礼的人，或者站在那许多花圈中间望着静静地酣睡着的那个伟大的老人的面容，我只感到一种严肃的悲痛。但这些时候我并不想开口，我只愿意静静地沉默一会。

晚上我回到家里，提起笔想写信，但我的脑筋突然变得很迟钝了。我想了许久，愈想愈觉得头沉重，好像被谁放了一块铁饼压在我的头上。我的笔也永远落不下去。一直到二十七日我才替一个刊物写成了一篇一千字的哀悼文章，第二天的晚上熬了一个夜也只写成另一篇短文，字数也仅有两千。

如今我和平常一样的，能够笑，能够兴奋地做种种的事情，在笑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我甚至忘掉了我们最近这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

不可补偿的损失。但是一旦坐到书桌前面提起笔来写文章时，那悲痛就从心底升了上来，我不能够写什么，我只想低着头沉默一会。

但是我读过不少的哀悼文章，我还看见过一些事情，当时我也有过一些感想，倘使现在不把它们写下来，将来也许更没有机会写了。所以我还是写下一点我的片断的感想。

在鲁迅先生逝世的次日，某报短评栏刊出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只有三百多字，却含了不少使人愤慨的话。我觉得那位短评记者的态度是很坏的。

那位先生说鲁迅先生的笔调"尖酸刻薄"，说他的笔调"给了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说"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说他"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

这些都是那位先生所"万分悼惜"的。

说鲁迅先生的笔调"尖酸刻薄"的，似乎还有过别的人，但这样的人并不多，而且都是他的论敌，不然就是一些钦定的文豪学士、骚人墨客。他们的文章可以遗留下来作珍本文学丛书的材料。他们平时自然是温文儒雅，在太平时代作为沙龙的点缀品，也可以给一般青年作个好的榜样。鲁迅先生却不是这种人。他是具有着强烈的正义感的战士，他是跟随着时代而推动着时代的伟大的战士中的一个。对于自己以外的一切都不大关心的人，才可以摆出一副笑面孔讲宽容和礼让。一个爱正义恨罪恶的人是不能够宽容的。因为他的爱和恨都是真

实的，并不是随时都可以照大廉价出卖的货物。残酷无情地暴露了我们这社会的黑暗面，而且对之加以最猛烈的打击，在这之外鲁迅先生还给我们指示了向光明的道路。这是爱的工作。在他的文章里面永远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他今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但他的热情甚至比较许多青年所有的还更多。是什么东西使得他永远年轻呢？我说，就是那个伟大的爱和由此生出来的伟大的恨。他的全部文章所表现的就是这一点。而且就是这一点，才把那成千成万的人都引到他的身边来。的确那无数的国籍不同、阶级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的人都没有差别地在他的遗体面前哀痛地低下了头。鲁迅先生获得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敬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的。

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的确如一位作者所说，因为他是第一个"能够深刻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能够真正表现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喜怒哀乐，而且能够代表着他们向一切敌人作不断的抗议和思想斗争的人"。认识鲁迅先生的人会知道在他的生活里个人的私怨只占着很不重要的位置。他是以人民大众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的。他从不曾躲在角落里发出一声冷笑，他永远站在街头呐喊，给别人指路。他的笔调绝对不是尖酸刻薄的。他写那种种论战文章，也决不是在"打无谓的笔墨官司"。

他的小说固然可以列入不朽的名作之林。但他的杂感也是光芒万丈的。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杂文家的鲁迅在世界散文作者中也不容易找出匹敌的来。"一个西洋人也说："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

而作为中国人的某报短评记者在盖棺论定的时候却坦然地说鲁迅先生“给了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甚至说他在“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这样的见解真是不可思议的。

我遇见每一个朋友，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他们一提到那篇文章，就表示极大的愤慨。

傅东华先生大书特书地写道：

“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拚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做唯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我就断定他自已才是个唯恨哲学者！”

读了鲁迅先生的《〈出关〉的“关”》以后再读到傅先生的哀悼文章，觉得上面的话更值得相信。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也更可以得到证实了。

在鲁迅先生的身上确实是“爱”多于“恨”的。但这事实常常被他的论敌们的诬蔑所掩蔽了。在外面传布着种种关于他的传说。大部分都是为着某种目的而捏造出来的。事实上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或者和他通过信的青年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亲切可爱的人。在报纸上有人把个人主义加到他的头上，然而像他那样的自己牺牲的精神在中国作家中却找不出第二个来。我说过“在中国从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地爱护青年的”，因为我知道许多这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被受过他的帮助的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在各处宣传了。这些才是真的事实。它们会打破那许多谣言的。

平时我很少看见成人的眼泪，然而在鲁迅先生的家里和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内，我却看见不少的人像孩子似地哭了。倘使死者不是一个慈和可亲的人，他决不会和那无数的年轻人发生亲密的友情，决不会使那些人像丧失了亲人一般地伤心。

早晨八点多钟在万国殡仪馆里面，还没有瞻仰遗容的人来。灵堂内颇清静。前面厅子里有几个办事处的人进出。后来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行了礼，经过被拉起了帷幔的门出去。灵堂内又回复到静寂，只听见外面厅里轻声的脚步。有两天，在这种时候，我在灵堂内掉转身子打算向外面厅子走去，就看见一个剃和尚头的短身材的老人远远地对着遗像，暗暗揩拭眼泪。我知道这是内山先生。他是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个好友。这个人的确可以说是“够朋友”的。他这几日整天为丧事奔走。后来他在墓地又作了一篇真挚的演说。在他的演说里他还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里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想，他是了解鲁迅先生的。

鲁迅先生在另一处还说过：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内山先生自然不是鲁迅先生的同志，但我们知道他是鲁迅先生的好友，而且是崇拜鲁迅先生的人。他那友情的表现是很令人感动的。

但是那几天在灵堂里淌眼泪的人并不只他一个。我亲眼看见哭过的人确实很多，而且是各种各类的人。这个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已经略略叙说过了。

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盲人，他穿着一身西装，把一只手扶在另一个穿长衫的人的肩头，慢慢地从外面走进来。到了灵前，那个引路的人站住了。他便放下手向前移动一步，端端正正地立着，抬起他那看不见的眼睛茫然地望了望前面，于是严肃地低下头来，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他默默地退去了。

出殡的行列里面，有"挽联队"和"花圈队"。拿挽联和花圈的一共有两百多人，都是临时征集来的，这些男女青年里面也有不少中年人，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他们也只是在作品里才认识死者。但当有人叫着："现在需要拿花圈的人多少"，"拿挽联的人多少"。"有愿意拿花圈的人请到这边来"，"愿意拿挽联的人请到这边来"时，他们都自动地跑去了，他们把花圈和挽联从殡仪馆一直拿到万国公墓，中间不曾有过片刻的休息。

这许多的人都愿意为死者做一点事情，借着一个机会表示一点他们对于这一个伟大的人的感激。

除了他们外，还有那五六千送殡的人。他们是来自民众中间的。他们伴着他们所敬爱的人直到他长眠的墓地。他们合唱着安息歌，把死者送进墓穴。在那灵柩上覆着民众代表献的旗帜。"民族魂"三个大字，跟着死者的遗体被墓盖所掩了。但是我的眼前许久还有那三个字在晃动。我从没有参加

过这样的葬礼。这民众的葬礼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鲁迅先生这样吩咐我们。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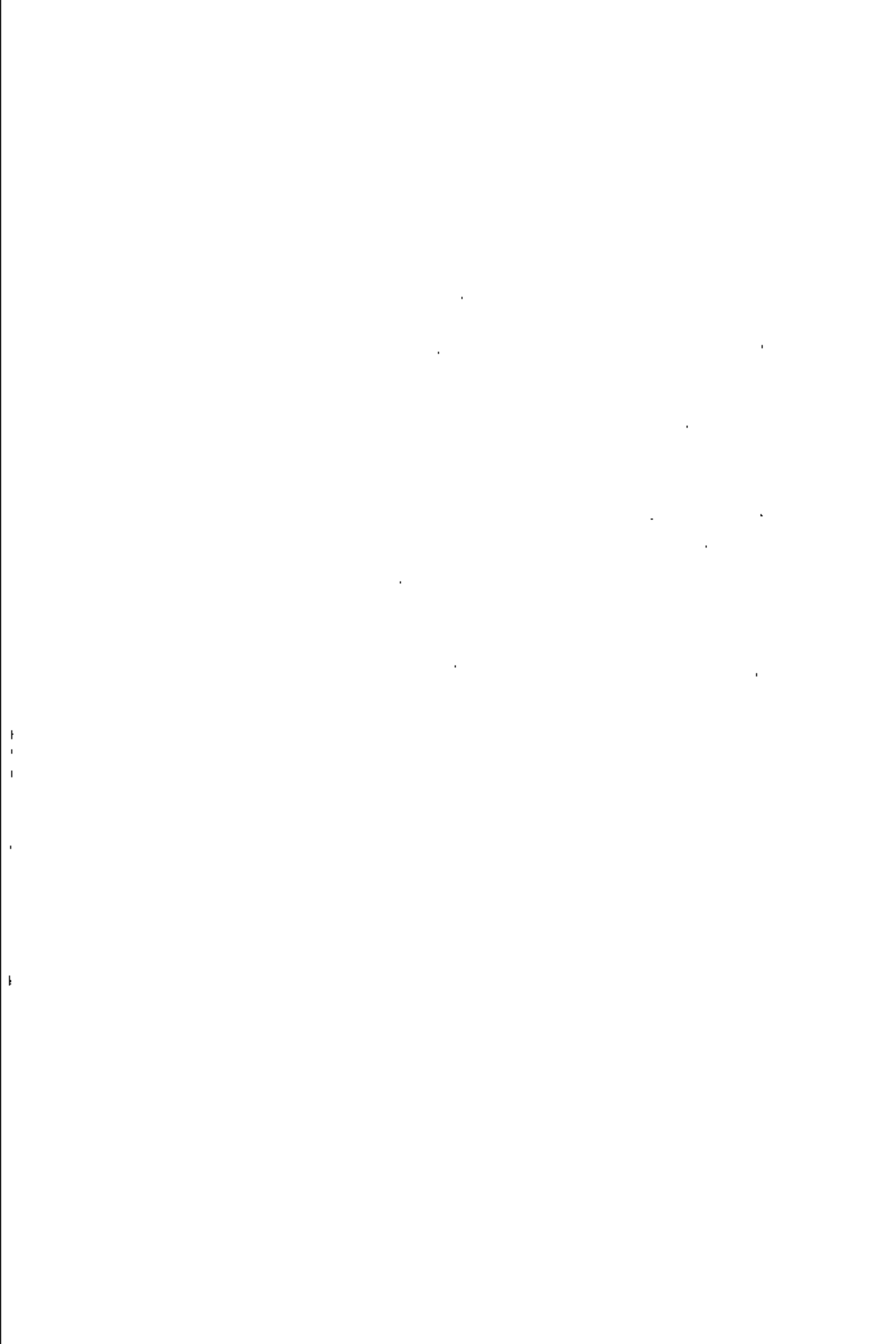
我不相信他真的就死了。许多人也都这样想。甚至在墓地上还有不少的人高叫：“鲁迅先生万岁！”

的确，鲁迅先生是不会死的。他活在我的心里，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他还活在我们大家的工作上。

只是他那和蔼的笑容我却永远地看不见了。

他活着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机会来表示我对他的感激。现在我只有把我的感激埋在我的心里，永远埋在我的心里。

十一月四日，夜三时。



一九三七年

雄壮的景象*

关于《日出》我有许多话好说，但前面已经有了不少的“内行”表示了他们的可贵的意见，我也不想在这里饶舌了。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我是第一个喜欢《雷雨》的人，固然现在已经有许多许多的人在喜欢《雷雨》了。《雷雨》在《文学季刊》发表后的一年间，似乎没有一个批评家注意过它或为它说过几句话。《雷雨》是靠着它本身的力量把读者和观众征服了的。

不过《雷雨》却也有它的一些缺点，譬如作者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我觉得就表现得不够。在我看来，造成那悲剧的并不是“命运”，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已。

这缺陷却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就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这是生活，这是我们大家所身经所目击的生活。《日出》，不像《雷雨》，它触到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大公报·文艺》。

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但另一面还有严肃的工作。

有几个女孩子写信给我说她们爱读《日出》，不过觉得作者的见解太悲观了。不曾给人指了一条出路。这看法不对。我觉得《日出》的结局太不悲观，而且在那末尾明明有一条伸向光明去的路。我也读过一些剧本，我却不曾见过像它这样"雄壮"，这样"乐观"的收场。

夜渐渐地消去了，方达生把窗帘拉开让阳光射进房里，照亮了满屋子。他迎着阳光昂着头从中门走出去。窗外日光耀眼。打夯的工人们高亢而雄壮地合唱着"日出东方"的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落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充塞了宇宙！"

看！这是一个多么雄壮的景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的结局。

作者在书前引用了《道德经》和《圣经》里的话，一共八段，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作者指给我们的路，要我们一步一步地走，最后便会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作者借用《启示录》中的话对我们说："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日出》自然也有一些小缺点，但它仍然是一本杰作，而且我想，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最好的收获。这些话也许会被人看作朋友的捧场，但我觉得能够在这里给曹禺的《日出》捧场，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

我在《大公报·文艺》栏“《日出》特刊”里写过几句话，这只是我的一点零碎的意见。里面有一句是“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这句话想不到会被朱光潜先生抓了去，作为他的“眼泪文学”里一个讽刺的对象，朱先生称我为“一位批评家”，其实我这几年来就不曾写一篇批评文章，倘使严格说来，他又犯了“滥用名词”的毛病了。

朱先生自然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堂堂的大学教授。对于他的智力我们是不应怀疑的。我那一句浅显的话并不含有什么深义，甚至初中学生也可以了解。我说的只是一个简单事实。我看过四次《雷雨》的上演，我流过四次眼泪。我只说我喜欢《雷雨》。我并没有根据《雷雨》使我流泪的事实来论断《雷雨》这剧本的好坏。朱先生把这事实拉到“文学的最高恩惠”、“眼泪文学”、“世纪病”等等问题上去。甚至拿我看戏流泪的事实和他“读文学作品没有流过眼泪”的事相提并论，这倒是朱先生的智力特别发达了。

其实关于眼泪的问题，朱先生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我曾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中流》第二卷第三期。

过几句解释眼泪的话，我觉得倒比朱先生更明白。我说："头脑清楚的人在绝望中是不会落泪的，只有小孩遇着悲痛的事情才放声大哭。我知道许多人，他们在被感动的时候往往会淌出眼泪来。我自己看见别人的慷慨的牺牲或任何大量的行为也会因为感激而下泪。在那种时候我一点也不绝望。我看见的倒是一线光明，而不是无边黑暗。"这也只是很平常的话，连一个高小学生，或者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也能明白的。《雷雨》里使人流泪的处所就是那母亲抱定最大的牺牲的决心要把她的一对儿女遣走的时候。那母亲确实有着绝大的勇气。她这时候在观众中激起的感情也不是同情，而是超于同情以上的东西。

流泪并不是可耻的事。唯有少见多怪、缺乏常识的妄人才敢大言不惭地断定只有悲哀和感伤使人流泪。我虽浅陋，却也读过几本破书，经历过几种生活。我知道许多杀身成仁的志士、牺牲自己为大众谋幸福的革命家也常常淌泪的。这是人类感情的自然的流露。我读过一些殉道者的遗书，这里面常常混合着血和泪。只有少数绿林英雄在判决死刑或绑赴刑场的时候，才唱京调或者高嚷"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但这和学者之类的"天性薄"又是两样了。

"天性薄"自然是事实，犹如有些人"爱流泪"是事实一样。但不能因为自己的"天性薄"就以为别人的流泪不对。朱先生说"像《茶花女》之类的戏我都看过好几遍，每次总听得前后左右的观众哭的哭，啼的啼"。事实上在这种情形中流泪的人总是占大多数（但朱先生的话又有语病，真正在戏园里放声大哭

的人倒是很少很少的)。这大多数人并没有一点过错，他们出钱看戏，一个戏把他们感动了，他们当然有流泪的权利，似乎不能因为流泪就突然变为浅薄。我几年前在广州看过一些机器工人演旧戏，我和别的观众是属于不同的两个阶级的。戏台上的表演常常使得许多工人都落了泪，我一个人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这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比那许多工人更高尚，我没有一点可以骄傲的地方。我以为那剧本实在不好；然而他们比我更了解它，却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生活环境、教养等的不同，使我们对同样一本戏有了两种的估价，得了两种的印象。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倘使我当时像朱先生那样断定他们"生性爱感伤"，说他们会"得到满足'哀怜癖'的快感，久之习惯成自然，他们便逐渐失去'丈夫气'。性格变成女性化"，那么他们会把我当作一个没有脑筋的疯人，而赶出戏园，我也只得低头服罪了。的确连一个普通工人也知道看戏流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其中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值得大学教授研究的。

固然叫人流泪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作品。但是"第一等文学"也无妨叫人流泪。譬如托尔斯太、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小说就使许多人流过眼泪的，然而谁能说它们不是伟大的作品呢？那么朱先生的文章简直是"无的放矢"了。

我对于朱先生的答复到这里便算是结束了。然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对于朱光潜先生，我好些时候以前就想说几句话，可是直到现在我才找到了适当的机会。我想说的自然不是恭维颂扬的话，那些话还是让给一般和他称兄道弟的人去

说。我虽然也和朱先生见过几面，说过几句话，但以年龄、地位、学识而论，我却只能算是他的后辈，应该和那许多《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者一起受他的训诲的。那么我现在就以一个青年读者的资格来向朱先生说几句话。

我是一个“浮浅粗疏”的青年，我不曾在大学里正式念过书，我更没有窥见学术的堂奥。我虽然写过一些不像样的文章，但我也没法文饰自己的浅陋和无学。我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常常会陷在“迷路”中。这时候有人把朱光潜先生的著作介绍了给我。据说朱先生素来以青年的导师自居。他的态度和文章也常为他的同辈的友人所称道。我相信别人的话。我和别的青年朋友一起，怀着求教的心虔诚地一字一字读着那些文章和书册，我们反复地诵读着，我们敬佩朱先生的淹博，我们崇拜朱先生的伟大，我们感激朱先生爱护青年的热诚。我们自以为求得了真知实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迷路”，而且可以更进一步跨入学问的宫殿。我们相信从此我们的“错误”被“矫正”了，我们的“缺失”被“针灸”了，并且我们还得到了“结结实实的鼓励”。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我们不但没有得到真知实学，反而被引入更复杂曲折的迷宫。我们不相信朱先生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然而在“一·二八”以后，内忧外患交迫，使我们这民族的运命陷在泥淖里的时候，他却教训青年说，“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去年华北走私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又大发议论和青年谈什么敬与不敬的问题，要中国青年去学日本人经过明治神宫前低头行礼的榜样。我不知道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朱先生要把中国青年引到什么样的象牙塔里去。

退一步讲，朱光潜先生有一种独特的见解也未可知。他在“美”和“敬”里面看出了抵抗强敌的飞机大炮的方法，这是他个人的得天独厚。我们了解他的本意，也是可能的。然而撇开见解来谈学问或者来谈常识，我们对朱先生又不得不失望了。我们绝不敢说朱先生是个不学无术盗名欺世的妄人。我想也许是因为朱先生诲人心切，急不择言，连自己也没有弄清楚，就“信笔纵横”了。无怪乎梁宗岱先生要责备朱先生常常“滥用名词”，甚至说这种缺点“他每部书乃至每篇文章里都可以发见”。梁先生是朱先生的好友，当然不会存心诬蔑。

什么是“滥用名词”？梁先生举出了几个例子证明朱先生的“七八年苦心研究的结果”《文艺心理学》里面“提到音乐时，(其实岂止音乐)什九是和音乐本身不相干的”。这就是说朱先生不懂音乐偏要冒充内行来向青年谈音乐。梁先生还加了一个注“其实岂止音乐”，这个小注是很有意义的。可见朱先生不仅不懂音乐，而且在别的方面也冒充过内行欺骗了青年读者。梁先生说这是“滥用名词”，这毛病若被一个初中学生犯了，就是“胡说”和“不通”，不过朱先生是大学教授、青年导师，所以“又作别论”了。

梁先生和我不同，他是朱先生的朋友，我现在却以一个青年读者的资格来谈谈朱先生的“滥用名词”。

朱先生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文学史上有所谓‘浪漫

时期'，'浪漫时期'又有所谓'世纪病'，'世纪病'其实可以说是'眼泪病'。在那个时期不爱流泪，不会流泪，就简直失去'诗人'的资格。"(《眼泪文学》)

我们青年人知道文学史上并没有"浪漫时期"，更无所谓"世纪病"。我们只知道"浪漫主义运动"或"浪漫主义时期"，我们只知道"世纪末"。但这和浪漫主义无关。而且在"浪漫主义时期"里也没有不流泪就不算是诗人的事实。

朱先生告诉我们——"会流泪就会显得你不同凡俗，显得你深刻高贵。大家都爱自居深刻高贵，于是流泪本来虽是'贵族的'，也变成'平民的'了。"(《眼泪文学》)

这是什么话？简直是"胡说"和"梦呓"了。

朱先生告诉我们——"人生就有一种爱怜癖，爱流泪，爱读叫人流泪的文学。这是一种饥渴，一种馋瘾，读'眼泪文学'觉得爽快，正犹如吃了酒，发泄了性欲，打了吗啡针，一种很原始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眼泪文学》)

这文章出之于一位大学教授的手笔真叫人不相信了。这不是一个病狂者的谵语吗？

在《眼泪文学》那篇短短的文章里，这样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不便一一列举。我另外从《谈美》里面举出两个例子罢。

朱先生告诉我们——"写实主义最盛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左拉是大家公认的代表。所谓写实主义就是完全照实在描写，愈像愈妙。比如描写一个酒店就要活像一个酒店，描写一个妓女就要活像一个妓女。"(《谈美》)

这一段话里很多语病。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有一点分别。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作家。《酒店》和《娜娜》是他的两本杰作。《酒店》不单是写一个酒店，像一个酒店而已；《娜娜》固然是个妓女，但这小说也不仅是写一个妓女像一个妓女而已。《酒店》和《娜娜》只是二十部连续长篇中的两部。所谓"鲁公马加尔丛书"二十部中间是贯穿着一种理论，一种学说的。这二十部书就受着这理论这学说的支配。这是自然主义的特点。左拉和福楼拜、莫泊桑是不同的。其实连写实主义也不只是"愈像愈妙"而已。福楼拜、莫泊桑诸人的作品里在"像"之外还含有别的意义。若拿酒店妓女等等而论，便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一个酒店也不会活像一所大学，一个妓女也不会活像一位皇后的。

朱先生告诉我们——"艺术家对于他所用的媒介也要有一番研究。比如尼阿那多的《最后的晚餐》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最大的杰作。但是他的原迹是一种不耐潮湿的油彩画在一个易受潮湿的墙壁上，所以没过多少时候就剥落消失去了。这就是对于媒介欠研究。"(《谈美》)

朱先生责备达文奇对于媒介欠研究，这大可不必。朱先生要是生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或许有比达文奇的更高的成就也未可知。不过既然不幸生在今日，倒不必说什么风凉话了。朱先生说《最后的晚餐》是用"油彩"画的。其实那壁画是用一种粉画的。"粉"和"油彩"中间毕竟有一个距离，不能混为一谈。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现代的油画颜料。达文奇只是一个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发明家或工艺化学家。因此对于媒介也无

法作深的研究了。

朱先生又谈戏剧，他在《评〈日出〉》里说："曹禺先生对于第三幕不肯割爱的苦衷我们也不难想象到。割去第三幕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剧景始终是'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重要的剧情也并没有改场换面的必要。曹禺先生要把一篇独幕剧的材料做成一篇多幕剧，于是插进本非必要的第三幕来改换一下场面。又把第四幕的时间不必要地移后一星期。"

朱先生既然老气横秋地摆出专家的架子教训别人，他自己对于戏剧至少应有初步的知识。他责备别人把独幕剧的材料写成多幕剧，他就应该知道独幕剧和多幕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和《群鬼》连初中学生也知道是两本三幕剧。然而《娜拉》的剧景始终是在"郝尔茂家的一间屋子"里；《群鬼》的剧景始终是在"阿尔文夫人家中一间对着花园的大屋子内"。而且《群鬼》的"时间"就只有一天，三幕中的事情都是在同一天里发生的，又还是连续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说易卜生的两本杰作是独幕剧不是三幕剧呢？可见朱先生在戏剧方面也是冒充内行了。

我写到这里，放下笔看表，才知道已经是深夜两点二十分。我不想再写下去。而且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我写这文章并不存心教诲朱光潜先生：第一我没有这义务；第二我没有这兴趣；第三我没有这资格。我不过是一个失学青年，朱先生却是一位堂堂的大学教授，而且他的大著《文艺心理学》又曾被钦定为一九三六年中国文坛的稀有的杰作。倘使一位

大学教授有错误需要人来"矫正"，有"缺失"需要人来"针灸"，有"望名生义"、"道听涂说"、"滥用名词"等等毛病需要人来治疗，也轮不到像我这样一个浅薄的青年来负责。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是以朱光潜先生所教训的青年读者的资格来说话的。我现在给朱先生进一个忠告。我希望他把他的全部著作收回，请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学生仔细修改后再来问世。我们已经从朱先生那里得到够多的益处了。我们不愿意再得着更多的谬误的观念。梁宗岱先生说得好："听说光潜关于《月光曲》那段文章早被选入开明书店中学教科书底《活叶文选》。我们可以想象一班班的中学生对于《月光曲》及其他吸收了怎样谬误的观念；假如一天他们有机会听到这几曲音乐，对于作者又起了怎样幻灭底感想！"岂止幻灭，他们会憎恨的，他们恨那个拿胡言乱语把他们欺骗了这许久的人。要纠正初中时代获得的谬误的观念也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说不定他们会被朱先生害了一生。不知道以青年指导者自居的朱光潜先生清夜扪心的时候想到这事情没有？

我只有苦笑*

我看见了你寄来的那位不署名的书评家的文章。我奇怪你为什么要替我生气。我读完那文章以后自己并没有愤怒。我有的只有苦笑。但苦笑之后我仍有所得，我究竟多知道了一点东西。我看清楚了一种人的面目。我计划中的某一部小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位书评家。倘使我那时要告诉读者我那部小说中的人物典型是怎样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我就得提到这篇书评。这是必需的。因为我读这书评，我研究这书评，我的眼前才慢慢地现出了那位书评家的英勇的姿态。我把这些事写出来，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把我创造一个人物典型的过程向读者说明。我并不是因为怕那位书评家疑心我把他当作模特儿而写给他看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连不会使用"艺术"这法宝的人也能够明白的。

同样我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主要目的也就在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告诉读者。只有那位嗅觉特别锐敏的书评家才会在这文章里嗅出别的气味来。他便武断地说我的文章"应当专给他(指我)那些朋友疑心被巴金先生作为创作的模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大公报·文艺》。

特儿的先生们看的”。我不知道那位书评家有什么权利，可以代表读者们说话。他自己说过“书评”和“批评”不同，但他却忘了“书评”的对象是读者，不是“作者”。他那篇书评明白地摆在每个读者的眼前。我可以斗胆地断定说：不管《爱情的三部曲》写得好或坏，但为了要了解那作品，我的《总序》却比那书评更有用处。

我自己明白地叙说了我的小说中的人物和真实人物中间的距离。那位书评家却因为我把我创造人物典型的过程详细说明，就教训我不懂得小说和历史或传记的区别。他似乎太聪明了。不过我倒疑心他自己就不懂历史。我也略略研究过历史，这类的书籍我也读过几本。但历史并不就是“将现实悉网罗了，一丝不少的都翻译成文字”。历史也并不单是“在实生活中取材”就尽了它的任务。历史是什么？我们随便找个初中学生来询问，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我们的书评家最好还是去和初中学生讨论历史和小说的区别罢。

那位书评家的唯一法宝就是艺术。但艺术这东西无论如何是离不了人生的。而且艺术的标准就并非固定的、唯一的。读者能否了解欣赏一部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高低而定。生活、环境、教养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艺术的观点！那位书评家责备我“和托尔斯泰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不知道托尔斯泰犯了什么错误。至于我，我不过指出来，在一部作品里面常常有些极平凡极简单的处所，因为真实，也能感动人。书评家拿“安排好适当的气氛，多运用点艺术”的大道理来教训我。书评家的生活、环境、教养决定

了他的意识，决定了他的艺术标准。我记起了一件事：从前在俄国当屠格涅夫和格列哥洛维奇的描写农奴生活的小说发表的时候，许多高等俄人甚至惊讶地问道："他们那种人居然会有感情，居然也知道爱吗？"在书斋里生活惯了的人对于《电》里面的许多处所，自然是不能够了解的。

在半年前我还读过另一位书评家的文章。他告诉我，我的某一篇小说里面的一件事情，是不会有的。但不幸我就亲眼见过那事情，而且我知道现在还常常发生那类的事。做了一位书评家，只因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太少，就随意抹杀这抹杀那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只有苦笑。

还有呢！我有个朋友，写了一篇小说，他决不是拿失业做主题的。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就有两位书评家出来把那小说恭维了一通，说那是以失业为题材的佳作。我那朋友读了那些书评，也只有苦笑。

我们只有苦笑，因为在中国就只看见这样的书评家……

几句多余的话*

我在编者处看见宗岱的文章，我想借《文艺》的篇幅来说几句话。最先我得感谢宗岱的指正，因了这指正我才有机会在这里饶舌。我说过我是一个浮浅粗疏的青年，我没有窥见学术的堂奥。我那文章也只能暴露我的浅陋和无学。我既无"学者"之学又乏教授之才，我有的只是一颗青年的心，所以倘使我犯了错误，也得请宗岱原谅我。

关于《最后晚餐》，宗岱的话自然有理，不过他似乎没有说得清楚。最近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读"论骂人文章"》的短文，里面有着这样的话："人家说'《最后晚餐》是用油画的'，话本是对的。"这意思非常明显。那么我似乎应该认错了，因为我对于绘画完全是一个外行人，我的一点点的"知识"都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这自然是"没有根据"。不过我忽然发了奇妙的想头，我冒险去翻 Larousse 大辞典。我居然找到所谓根据了。关于 Fresque 那上面写得很明白：

Fresque–Manière de paindre avec des couleurs détrempées dans de l'eau de chaux, sur une muraille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大公报·文艺》。

fraichement enduite……

《最后晚餐》是一幅 Fresque，十七世纪以前的壁画都叫做 Fresque（十七世纪以后就很少有绘 Fresque 的了）。Fresque 的绘法是将颜料溶在石灰水内，然后用来绘在新涂泥的墙壁上。初期意大利画家 Cimabue, Taffi, Giotto 等等一直到 André Castagno，他们绘画的方法只有两种：不是绘 Fresque 就是用 détrempe（一种水与蛋白或胶等所调和之颜料）绘画。油画发明以后，détrempe 被淘汰了，但是 Fresque 还是很流行，所以在这方面艺术达到了极峰。一部分的 Fresque 已经全然消失，或者剥落毁损。达文奇的《最后晚餐》在 Rubens（1577—1640）的时代就已剥落不堪，然而有许多的出于大师之手笔的 Fresque 至今还是保存无损。

从这一段说明看来，《最后晚餐》当然不是油画了。我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理由一再地断定《最后晚餐》是油画。①

至于《最后晚餐》剥蚀的原因，宗岱说"是受了他要尝试新颜料之累"，我还没有证据反驳宗岱，我相信宗岱一定有理由，

---

① 巴黎鲁佛尔里面有一幅《最后晚餐》的临本，那才是油画。按：本文转载于《中流》第二卷第七号（一九三七年六月）时，作者将这条注文改为："还有，你想必读过巴金底《向朱光潜先生进一忠告》了，关于全篇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因为它底瑜瑕太夺目了。我只想提及一点枝节问题，就是关于达文奇底壁画《最后晚餐》的，那时油画底技术已经很发达，（有名的《曼娜李沙》可不就是油画？）而壁画底技术则远在支荻图（Giotto，1266—1337）时已经达到相当的完备，达文奇《最后晚餐》今天所以剥蚀不堪，的确是受了他要尝试新颜料之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达文奇虽是一个画家，他自己却孜孜不倦地要做一个发明家和科学家，这点事实我想你已知道。不过我想光潜是不会答复的，生怕这点史实在我们文坛又将这样歪曲下去，所以顺笔提及"。——见梁宗岱的《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

不过我想到一句话：C'est surtout de l'enduit des murs que dépend la durée d'une fresque. 我看画之所以剥蚀，这墙壁上的灰泥不能不负责任。

Monna Lisa 是油画，我岂不知道？我在 Louvre 里面看见过它两次，虽然是走马看花，但这一点我不会看不清楚。朱先生认为我说过那时"根本就没有油画"，这又是在运用他那"断章取义"的妙法。但我自己明明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现代的油画颜料。"这话并不错。那时的确没有像现代有的这样完美的油画颜料。现代的油画颜料比从前很有进步，而且有几种颜色如粉绿、粉蓝之类还是后来才发明的。据说，伦敦所藏达文奇的一部分油画就已经变了色（这是一个学习绘画的朋友告诉我的），这便是一个证据。

我并不是一个喜爱强辩的人，但我以上所说都有根据，我应该把那些事实指出来，作为我的辩白。我觉得犯错误并不是甚么大的罪过；可耻的却在犯了错误而不肯应承。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愿意借这里的篇幅附带指出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我说达文奇只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发明家，这话不大对，宗岱说"他自己却孜孜不倦地要做一个发明家和科学家"倒是对的。因为达文奇是近世科学的先驱者，他对于天文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比较解剖学都有研究，而且对于治水、土木机械、航空器、都市设计等等也有丰富的知识。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一切学问真可说是"肯"研究的了。①

---

① 然而朱光潜先生责备他对于媒介欠研究。

我还有一个错误，宗岱忘了在这里提到，现在让我自己来承认。这就是“世纪病”的问题。朱先生说“世纪病其实可以说是眼泪病”。我说“无所谓世纪病”。然而倘使“世纪病”就是Mal du siècle的译名，那么我就错了。这Mal du siècle确实是有过的。不过这种怀疑厌世的苦闷与朱先生的“眼泪病”却是没有关系了。

以上不能算是“骂人文章”，我不过写几句辩白的话和认错的话。这大概和学者之流所标榜的“自爱自尊之道”① 不相违背罢。

① 见《读〈论骂人文章〉》。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晨报副刊》。

《夜 未 央》[①]（广告）

《夜未央》是波兰革命者廖·抗夫的处女作。这剧本描写二十世纪初年俄国革命者的奋斗和牺牲，非常深刻而动人。一九〇七年在巴黎艺术剧场上演时，曾给欧洲思想界以极大的冲动。公演之夜全体观众有若着魔发狂，连演百余次，卖座不衰。批评家一致赞美，推为"不朽的名作"，《巴黎日报》记者说："这是一本很简单、很可怕、很动人的剧本。……你们自己去看罢，我担保你们会被感动的。"《巴黎时报》记者说："我们看了《夜未央》，我们不能够拍掌喝采，我们只有顿脚，我知道这种热诚一部分是由于神经紧张的缘故。然而在我们所感觉到的兴奋之中还有一种更崇高的要素。"本剧前有李石曾先生的旧译本，由巴黎世界社出版，曾风行一时。不过旧译文过于简略，且有删改处所。我们现在刊行的是巴金先生的新译本，书内并附有图多幅，都是在巴黎公演时的剧照。

---

① 廖·抗夫著，巴金译。一九三七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文丛》创刊号。

《死之忏悔》[①]（广告）

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作者因大阪事件触日本国法，身死绞刑台上。在举世滔滔的浊流中，作者决不是时代的牺牲者，作者的死与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药，实有同样的意义。作者如他的父亲所说，有一颗"厚于人情连猫犬也爱的纯美的心"，却不幸犯了杀人的罪。作者解释他杀人的动机是：为了爱。作者对他父亲说："为了真实的缘故，只得不顾亲人之泪与肉身之血做下去了。父亲啊，请给有理解的爱与你的儿子。"这样正如《灰色马》中的英雄弗尼埃说："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日记《死之忏悔》也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而且这还是一部震撼每个青年的灵魂的"圣书"。至于文笔之清丽，思想之深刻，表现之沉痛，那还是余事了。原书数万言，现由伯峰先生择要译出，又经巴金、陆少懿两先生根据原文删改增补，益臻完善。

---

① 古田大次郎著，伯峰译。一九三七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文丛》五月号。

给朱光潜先生*

光潜先生：

你用两个名字回答我的两篇文章我都见到了。想来你不会再用第三个名字写第三篇文章吧。那么请你允许我现在再来饶舌一次，算是把我对你进忠告的问题结束。以后我真的要听从你的"诚恳的"劝告，不再浪费我的精力了。

你的两篇文章，不仅署名不同，连态度也是两样。分明是一个人，署名朱光潜的相信我"是一位有热情的诚实人"，素来对我还有"一点敬意"，"感激"我，希望我"平心静气反省"。署名孟实的却称我为"骂人者"，说我对他"狗血喷头的痛骂"，说我"心里不免有几分醋意，要把心肝宣揭出来就不免令人掩鼻"。你忽而像一位敦厚谦恭的绅士，忽而又学市井无赖的口吻。我没有研究过变态心理学，所以无从分析你的心理。我又不曾学过医，所以不能了解你这两重人格。我想"朱光潜"和"孟实"大概是 Dr. 什么和 Mr. 什么之类罢。我若写小说这倒是好材料，不过现在我是在回答你的劝告，所以我以北大教授、留英学者兼留法学者的朱光潜先生为对象，至于另一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中流》第二卷第七期。

你——孟实 我只得把他撇开了。

我前次给你进一个"忠告",那时我相信你还是一个"诚实人",我以为你会平心静气反省的。却料不到你会写这样两篇文章。你还扯到一些没有关系的事情上去。譬如你提起我代靳以为《文学季刊》向你拉稿子的事,这不过表示我认识过你。若说我代靳以拉稿就是帮助你"误人",就不该向你进忠告,这种说法也只有小孩子才相信。的确我代靳以向你拉过稿子,那时你的《十二封信》和《谈美》都出版了,我却没有功夫读到,《十二封信》从前在杂志上发表时我偶尔读过两段,觉得你的文章写得清楚流畅,见解却很平常,印象还算好的。所以别人要我向你索稿,我就"诚恳地"转达了,那时我们知道你有积稿,并没有要你新写,承你的厚意马上就把稿子交了给我。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有两次之多。我不是《文学季刊》的编辑,所以你的文章还是刊出以后我才拜读的。关于交响乐和月光曲的话,就在那两篇文章里面。当时我还相信你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我对于音乐又是门外汉,我不知道你居然胡乱地说了一些话。我在东京才拜读了你的《十二封信》和《谈美》,那时我就想向你进一点忠告,可是没有适当的机会。去年又读到你在《申报周刊》上接连发表的给青年的信,你那种以导师自居教训青年的"妄诞的态度",(你说这是我给你造罪状,但《申报周刊》上的几封信却是不可磨灭的铁证)你那种谈敬谈美,不断地把毒汁注射进青年的纯洁的头脑的言论,引起了我的憎厌。后来我读到你的《眼泪文学》,我惊讶你的理性的衰退。最后你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发表了《中国思想的危机》,以

学者的态度谈论思想和信仰，要无数热情的青年在"图书馆里困坐数十年"以后再来谈思想。我就忍耐不住出来说话了，我要让那些年轻的人来看看你自己在图书馆里困坐了××年的成绩，所以我写了那篇忠告你的文章。

我不曾在图书馆里困坐过，我也没有听过你们这类教授的讲课，我以为我的冒失和浅陋一定会使我犯许多错误。谁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对于我的文章就只提出两点来反驳。你以为你"捉住"我的"把柄"了。其实并没有。何况我自己早在《几句多余的话》(我要求编者把它附印在后面)里就已经详细地说过了。但我现在还想和你谈谈。

(一)把 Mal du siècle 译成"世纪病"，恐怕不大适当罢，虽然日本人是这样译过的。譬如 l'enfant du siècle 就译作"世纪的孩子"吗？这"世纪"怎样解释？而且这种怀疑厌世的苦闷和你所说的"眼泪病"是没有关系的。

(二)你断定《最后的晚餐》是油画。你居然举出了三本书的名字。你们那里有的是学者，有的是专家。你可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你应该先知道那些书是否可靠。你不能随便抹煞事实，关于《最后的晚餐》是用什么画的，我在《几句多余的话》里已经说过。现在我还可以另外举出一些证据，我要用这些证据断定你的确犯了错误。

《大英百科全书》"达文奇"一条中有一段论《最后的晚餐》的；说到 medium employed (所用的媒介)时有着这样的话：

He painted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u>in tempera, not,</u>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which sprung up within twenty years of its completion, in oil。

这明明说它不是油画了。把它当作油画那只是误传。这以后又说到它怎样剥蚀，于是：

> In the 18th century attempts were first made at restoration.They all proceeded on the false assumption, dating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6th century, that the work had been executed in oil. With oil it was accordingly at one time saturated in hopes of reviving the colours. Other experimenters tried various 'secrets'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meant deleterious glues and varnishes. Fortunately not very much of actual repainting was accomplished, ex cept on some parts of the garments. The chief operations were carried on by Belloti in 1726, by Mazza in 1770, and by Brzzi in 1819 and the following years. None of them arrested, some actually accelerated, the natural agencies of decay.……

你是留英学者，当然读得明白上面的话句，这应该由你自己来翻译，才可以证明这不是我所捏造。你知道这是谁替《大英百科全书》写的吗？作者是 Sir Sidney Colvin。他是英国的文学和美术的批评家，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二一年中间大英博物院绘画部的主任，又是剑桥大学的美术教授。他当然比我懂得更多一点。其实他比你们这类教授也懂得多一点。你

称我为留法学者，事实上我不过在法国吃过两年面包。学还谈不到，哪里配称“学者”，而且我从没有打起留法学生的招牌来混饭吃。中国学生到外国读书，混到大学毕业，就自命学者，甚至觍然执教国内最高学府。有时太不自量，居然信口雌黄，或者见到一二外国人的著作就奉为至宝，引来引去，自误误人，甚至用以抹煞历史上的事迹和定论。殊不知外国人中也有不学无术的人，并非外国人皆是学者；做一位大学教授也不是单单读了两本外国书知道崇拜外国人就行的。你劝青年接收一种学说先要“经过自己的有条理的运思”。你自己读一本外国书也不能胡乱就相信，也该先“经过自己的有条理的运思”才是。譬如你到米兰去看《最后的晚餐》的真迹，你就该先翻一翻百科全书，把这幅画的历史弄明白，看了才不等于白看。不然像你现在这样在那里看见一点油画的痕迹，于是糊里糊涂地断定那是油画，你不知道你亲眼所见的就不是真迹，已经是经过别人修补后的了。S. Colvin的文章里说得明白，什么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料修补，但结果仍不免于剥蚀，可见并非达文奇对于媒介欠研究的过错。你当时若肯虚心查一查百科全书，也不会闹出这种笑话。其实你在米兰看见的《最后的晚餐》应该是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 Cavenagli 修补过的。关于这一点，美国出版的《万国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说得更详细。而且在那书里也说《最后的晚餐》不是油画。请你看下面的话：

It was painted (1494—98) in tempera (not in oil,

as is usually supposed) directly on the walls,……In 1904—08 it was subjected to a scientific and modern restoration by Cavenagli, in which the repainting was removed the flaked color attached to the wall, and the bare spots touched with tempera.……

朱先生，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一次不能说是"无心之失"了。连《最后的晚餐》的历史都没有弄清楚，你居然大言不惭地一再断定它是油画。把我给你的忠告一笔抹煞。你讲美学，连对于绘画的最初级的认识也没有，反而"老气横秋摆出专家的架子教训别人"，要青年像你那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求学问。我现在忍不住又要借用宗岱的一句话："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容许一个最高学府的外国文学系教授这般厚颜地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自然他所指的是别人，不过我想用来指你也颇适当。你觉得怎样？

现在是晚间三点半钟，我还在给你写这信，辩论《最后的晚餐》是否油画的问题！并非我不爱惜自己的精力，也非《最后的晚餐》对于我们这民族的存亡有什么关系。我不过不忍看见你"老气横秋摆出专家的架子教训别人"，把青年一个一个地引进迷途里去，所以才写这封第二次忠告的信，使你知道你自己所知的确有限，而且你的学识也不够使你做一个学者。若说一个人"应该在图书馆里困坐"，那么第一就应该你去，因为对于你，图书馆倒比大学的课堂更适当一点。你不必等着看我的"造化"，你放心，我这个浅薄无学的人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答广州××先生*

你的信已经读过，但被我在一阵忙乱中遗失了。我没法找到你的通信处，只得要求《中流》编者给我一块地方，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因为我要说的只是几句关于《给一个孩子》那文章的话。

最先我得说你还没有明白我写那文章的本意。我并不想让那些纯洁的青年被关在专制的家庭里面。相反的，我希望每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都离开那狭的笼去找寻自己的路——新的路。事实很显明：该没落，该崩坏的是必然会没落、崩坏了。没有谁能够挽救它们，也没有谁有权利强迫年轻的一代跟着它们去牺牲。而且在我的作品里面便写得很明白。有勇气的小鸟是飞向自由的天空去了。胆小的就永远在笼里憔悴哀鸣。我已经见过了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被摧残以至临到那悲惨的结局。我绝不会再劝诱另一些可爱的青年去忍受那个不应得的残酷的运命。而且我还说过，要是一个人遇着了再也不能忍受的情形，那么纵然是孤注一掷，我也希望他或她冒险去试一试。即使得到的会是失败，但轮到应该贡献牺牲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应该踌躇的。我这意思你难道还不明瞭？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中流》第二卷第七期

然而我们平常做一件事情本心总不想它会失败。我们采用一个计划，做一件工作，总要用尽方法使它成功。倘使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为什么就不该用它？所以我说出了“忍耐”，这“忍耐”里并不含有“屈服”的意思。我的意思却在对于未来胜利的准备。这准备是必需的，做任何事都得有准备，有准备才可避免无益的牺牲，而达到成功的路。我们有一个目标就应该下了决心去工作以求达到它。我们不该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偶然上面。我们不碰机会，却要去制造机会。你问起我翻译的《门槛》，那里面有一篇《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那篇真实的故事，便可以给我的说法做一个证据。

我说我劝阻过一个在中学里读书的朋友逃出家庭。但他的决定和我的话语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不离开家庭，因为他目前没有这需要，他在那里还有着较大的自由。而且他平常就住在学校里面，可以不受一点干涉，还可以把精力用到别方面去。倘使将来社会有一个有意义的工作给他去做，那时他会勇敢地承担的。没有饭吃而发笑固然勇敢，但有饭吃而工作岂不更好。

我已经见过不少的例子了，有一些人从家庭出来又回到家庭里去，他们自己以为是理想失败，说奋斗等于浪费精力。其实这应该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认识不足和没有准备，没有方法。这不是理想失败，这只是他们的失败。但这失败会减却后来者的勇气，倒是很可痛惜的。不过我们应该不管他们，但用坚定的脚步走我们自己的路。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

所谓日本空军的威力*

昨天下午日本飞机在南站掷了八个炸弹。死伤的人一共有六七百之多。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当时染红了泥土的腥血虽已洗刷干净，然而日本军人的暴行，却是它的任何巧妙的代言人所不能掩饰的。断颈裂肢的尸体自然不能复活来给我们诉说惨剧发生的经过，但是他们的血会染在日本的历史上，写成日本史的最可耻的一页。

日本空军要世界人士相信它的威力。但是南站的轰炸究竟表现了什么？南站并不是战区，不但没有军事设备，连防空设备也没有。拥挤在南站的全是候车离沪的难民，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妇女和小孩。那里并没有一个士兵。对于这毫无防御的地方，和毫无防御的避难人民，必须加以轰炸，甚至掷下八个巨量炸弹，好像唯恐里而有一个人能够活命似的——这不是战争。这是谋杀！日本空军展露给世界人士看的，并不是它的威力，而是一种虐他性的疯狂！

以残杀妇女小孩为乐，已经成了日本空军的另一惯技，这比较毁坏文化机关的行为更毒辣，更卑劣。不管日本的代言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烽火》创刊号。

用怎样的花言巧语企图蒙蔽世人的耳目，日本军人却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向世界人士证明他们只是一群没有理性的渴血的生物！所谓日本空军的威力，除了“道德的堕落”外，还能有什么呢？

纪念鲁迅先生*

我们刚刚怀着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国万岁”的壮烈的呼喊里，度过了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我们的心和南北各前线、山岭中、战壕内的数十万战士的心在一起跳动，和后方服务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心一起跳动。我们环顾着四周由和平的村镇与繁荣的城市变成的废墟，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压抑住多年来的悲愤，欢欣地狂叫着“中华民国万岁！”

在这一天我们全中国的儿女的心是连结在一起了。这样地结成的一颗心是没有一种武力能够克服的。

如今在一个多星期以后又轮到我们怀着另一种心情来纪念一个人了。想到逝去的鲁迅先生，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失掉这一个我们大家敬爱的老人，中国的青年失去了一个能爱护他们的友人，文艺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导师，民族解放运动中失去了一个热烈的战士，人类解放运动中失去了一个勇敢的先驱。一年前我们的巨大的损失至今还不曾得到补偿，而且这缺陷一时恐怕也不能够被填补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烽火》第七期。

我们的过去的悲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而经过了一年的苦难的日子，临到这一个可悲的纪念日，站在我们的伟大的老人的遗像面前，我们中国的儿女不能够再流一滴眼泪了。我们应该让他也知道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战争已经爆发了。

我们说过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前进。这不是一个空泛的诺言。南北各前线的炮声和山间田畔青年士兵的赤血就是一个凭证。全中国的儿女的心连成了一块磐石，全中国的儿女的力汇集成了一股铁流。这是我们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力量会把那横暴的侵略者打击到屈膝的。

和平地安息着的亲爱的导师，你说"忘记我！"然而我们是不能忘记你的。我们的心到现在还因为思念你而痛楚，而绝望；但是当我们想到那最后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又强健起来了。我们是知道怎样来纪念你的，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实现便是纪念我们的伟人鲁迅先生的最好的纪念碑了。

一九三八年

《烽火》第一册合订本再版出书*（广告）

自从发动了神圣的抗战，上海文学社，中流社，译文社，文季社就联合起来，高燃一支"烽火"。那不是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当时因为交通阻塞，许多外地读者都不能买到，能存得全份的更属少见。现在本社把一期至十期重印出版，另加《呐喊》二期，合订一本，实价国币二角五分。印数无多，欢迎读者直接函购，如寄邮票二角五分，当即寄上一册。

---

* 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烽火》第十三期。

《西班牙在前进中》*

在《西班牙的血》里我介绍了那个国度的名画家的"速写"。最近我又计划编印一本关于西班牙的斗争的真实的画册，用七十多幅实地摄取的照片来表现那里的争自由的斗争的全景。这画册将被称为《西班牙在前进中》，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从在巴塞洛那出版的精美的画报上采取来的。那里面有斗争，有受苦，有牺牲，有建设；有残破的废墟，也有自由的土地；有旧制度的破坏，也有新社会的萌芽。关于这一切，那画报的《献辞》解说得很明白，这是用了C.N.T.——F.A.I.两个团体的名义发表的。我现在把它译出来，和我为《西班牙在前进中》写的《后记》① 一起在这里发表。

献　辞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西班牙的法西斯蒂将军们率领军队叛变。靠了无产阶级(尤其是加泰鲁尼亚省的安那其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英勇的抵抗，葛德特将军领导的加泰鲁尼亚省的叛乱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就被压平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文艺旬刊》第一卷第二期。

① 已收入《全集》第十七卷。

了。但在别的省分里，内战还在进行。

我们在这里想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我们热诚地要求所有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全世界的工人农民来支持我们的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

我们恳切地把这本画册献给同情我们的各界人士。

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

伊比利亚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F.A.I.)

《告 青 年》[1]（广告）

这是每一个青年应该宝爱的小书。不知道有若干人为它流下了感激之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从它那里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它像一位长兄一位教师，谆谆地对纯洁的年轻人说明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周围的一切。全是简明易解的话，里面没有一点欺骗。这样的一本小书曾经震动过全欧美的良心。译者说："我们现在没有一点踌躇了，我们捧着这一册《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实生活走去。"

---

① 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九三七年十月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烽火》第十七期。

《万人的安乐》[1]（广告）

每个人都渴望着万人的安乐，却没有人知道我们所已经有了的那么多的财富。作者用了精密的统计给我们证明出来万人的安乐并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做得到的事实。左拉说这是一首“真正的诗”。其实它不仅是一首诗。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热烈的文笔，挟着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说服了每一个人。它被认为“革命文学中的古典名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

① 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九三八年五月平明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烽火》第十七期。

《西班牙在前进中》①（广告）

巴金编并作序。内含照片七十余幅，展开了西班牙斗争的全景。这里有的不只是血的战斗，与紧张的前线，还有和平的后方与革命的新建设。从这本小画册我们可以知道西班牙的未来。正如《献辞》所说："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① 巴金编。一九三八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烽火》第十九期。

一九三九年

谢绝写序书*

××先生：

信由书店转来，我身体不大好，日内就要离开上海，我只能够给您写这简短的回信。

您把我看得太高了，其实我不过是一个正在学习写作的年轻人。到现在为止的我的作品还是很幼稚的。以后也许会有一点进步。我实在没有资格为别人的集子写序，事实上我就没有写过一篇这样的序。而且我不会写。我素来不赞成替别人写序的办法。我自己的译著也不曾要别人写过序。所以在这上面我无法给您帮忙。请您原谅。

在上海有些作家常常替人写序，他们都比我"有名"。倘使书店老板出书不看内容只看写序人的名气的话，我觉得把书给这样的书店是很可惜的。

祝好

巴　金　5月28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东南风》第一卷第一期。

关于《爱国者》*

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这样地被中国(上海)著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这一本虚伪的书(据说有五种或九种译本)。或者有的人像在北平的毕树棠先生(《勃克夫人访问记》)那样因为"以中国的生活写成书(指《大地》)得世界文学奖金的,这算是第一次","不能不""欢喜",而感到有翻译赛珍珠的近作的义务;或者有的人相信在美国的林如斯女士的话:"虽然书(指《爱国者》)未写完,却已被选为美国读书社本年三月最好的小说"(《赛珍珠传》),以为读书和做生意相同,书未写完,便可以被选作"最好的小说",便有读者知道它是忠实地表现中国生活(还不说抗战)的好书,为中国抗战鼓吹的名著,现在我要请他们以公正的中国人的眼光仔细地读一遍《爱国者》。

我说这是一本虚伪的书,我有不少的证据。最大的证据便是在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有的只是捏在外国人手里的灯影。中国人至少应该知道自己的面孔和《爱国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鲁迅风》第十七期。

中所绘的面孔究竟差了多少。这是第一点。

这书里到处都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今天看见林英先生的文章(《申报·自由谈》)我觉得很痛快。林英先生已经举出了好些证据，譬如关于八路军虐待俘虏的描写就完全与事实不符。这是第二点。

我现在要举出的是作者的胡说：

> 她(以璜的日本妻子)冲到他那里，摇动他的肩膀："可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谁在南京杀死日本人的？一九三二年谁在上海杀死日本人的？"
>
> "你这几年来一向把它当作话柄——反对着我——"他喊道。
>
> 可是她摇摇头："不——只是反对你们国民。"
>
> (见朱雯先生等译本二七一页。别的先生的译本里不知是如何译法。)

假如《爱国者》的每一个翻译人还有着中国人的良心(还不说艺术家的良心)，他们便应该出来证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并没有日本人在南京被杀；一九三二年并没有日本人在上海被杀。(一·二八之役战死的兵士当然不算；中国方面阵亡的人更多，并且还有成千的无辜平民遭害。)而且我还要请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以璜会承认那莫须有的事可以当作"话柄"。倘使他们不出来解说，那么他们翻译《爱国者》便是拿造谣和胡说来诬蔑自己民族的抗战了。

林语堂先生在《白克夫人的伟大》(朱译本附录一)中说，

"白克夫人在美国已为中国最有力的宣传者。"大概我们自己太缺乏宣传人材了，竟然把赛珍珠也当作了我们的宣传者，连"大世界"炸弹事件也让人拿去做了宣传的资料。(《爱国者》二七四页)别人诬蔑了我们，戏弄了我们，捏造出我们未犯过的杀人罪名，我们还要称颂她的"伟大"，将她的书当作恩物似地抢着翻译出来。这是我们自己把诬蔑当作夸耀地接收了。

我们这里的确有着不少不可了解的人。但是糊涂到将财主当作父母，连自己的是非都不知道的人，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罢。

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爱国者》的翻译者便不能不愤怒地叫出："我控诉！"

附记：我在这里引用朱雯先生的译文，因为我手边只有这一种译本。朱雯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起我劝过他翻译这书。这是他记忆错误。我记得那天遇见他时他说以后要努力做翻译工作。我说了一句"很好"。后来我知道他在"抢译"《爱国者》时，我曾当着几个朋友的面明白地表示我不赞成。我素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大地》不是一本坏书，但作者对中国人还是用外国传教士的眼光去看的。这里面并没有同情，有的只是怜悯和外表的了解，或者更可以说是误解。)我说过，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只是中国书贾的看法不同罢了。我不是书贾，当然不会劝人翻译赛珍珠的书，而且我至少还把朱雯先生看作一个朋友；我更不会对他说："这工作只有你担任"的话。

“八·一三”*

去年八月初，在广州惠新东街我们书店那间小屋子里，我每天下午坐在对着窗户的那张桌子前面写字。在这些时候我常常听见警报或飞机声。巷子里很清静，有时半天我只听见两三下脚步声。阳光停滞地照在寂寞的路上。我有一次沿着这路走出巷口，再转进大街。在汉民分局门前人们正忙着搭献金台，这是为了“八·一三”献金搭的。同样的献金台有好几座，是在这城内的几个重要街口。在热闹的街中我常常看见手执白旗的宣传队，旗上写着“八·一三到献金台去！”

八日下午这城市遭了一次×机①的大轰炸，我们书店附近也落了几颗弹，九日早晨西关一带居民又遭了残酷的屠杀。这天午后在惠新东街的巷子里更少听见人声，我还是坐在我的桌子前面。我放下笔抬起头，穿过窗户，我看见在对面人家门前石阶上坐着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这只是一个平凡的面貌，他不是从今天起才坐在这阶上的，不过我这时才注意到他。他安静地坐在那里，埋着头，拔起阶下青草，拿起它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① “×机”：即日机或敌机，以下的“×人”、“××仔”同此。当时的政治环境非此则不能发表，这里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

放进嘴里嚼着。我觉得我的喉管被堵塞了，我用力挣扎，半晌才咳出一声嗽，好像我自己吞食了这青草一般。

这汉子依旧安静地坐在那里，他又拔起第二把草，照样地放进嘴里，默默地吃着。他没有发出一声呛咳，仿佛他吃惯了这种东西。我望着他，我甚至忘了自己的事。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我无法询问他关于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乞丐，我没有看见他向着谁乞讨过什么。

第二天下午我坐在这同样的房间里，窗外仍旧坐着这同样的黑衫人。我听见两次警报，又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我看见黑衫人默默地站起来了。

“八·一三”的傍晚我和一个朋友从书店出来，走过汉民分局门前。献金台上悬着干电灯，转着走马灯，一个年轻人拿着扬声筒，嘶声哑气地在台上演讲。台下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挤进人丛中去，我听见一阵拍掌声。我站定了，举起头再向台上望去，一个穿黑色短衫裤的瘦汉子立在台口，这平凡的面貌是我熟习的。他在这里！黄瘦脸困窘地微笑着。细小的眼睛睁大起来惶惑地望着台下，年轻人在旁边鼓动着。他的脸色忽然发红了，他张开口，吼叫似地开始说话，他一面挥动着拳头。他说话不多，我不能听懂他的每一个字。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以为：我们要保全自己性命，要保全兄弟姊妹父母妻子的性命，就应该拿出我们的一切来打倒×人。他说到轰炸，他说到单顾自己是不可靠，他说到他很高兴把乞讨得来积起的一元多毫洋拿来献金。他最后贼着“打倒××仔”的口号。

我相信这个人的话，我可以为他作证。我现在才知道他真是一个乞丐。他并非英雄，只是一个被践踏被遗弃的人。但是低下的阶级地位等等并不能取去他的中国人的心。他说的正是每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所要说的话：为解放的战争贡献出一切，在解放的战争中争取民族的和个人的自由，维持民族的和个人的生存。他高呼着打倒侵略者，这是一个何等正确的口号，在我们和侵略者中间没有妥协的可能。要向侵略者乞求苟安的和平，无异乎伸出颈子任人宰杀，只有在完全摧毁了侵略者的力量以后，我们才可以过着安宁的日子。

这个乞丐交出他的微小的财产，兴奋地走下台去了，他的话语却留在我的心上，他的话直诉于我的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话，这是我们大家的话。我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响彻了我的全身，我感到一阵热，一阵颤，我热狂地拍起手来。

以上是去年的事。现在是第三个"八·一三"了。我想起那个平凡的人的不平凡的故事，我还是感到一阵热，一阵颤。我听见了一年以前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那么有力，那么真实。它是中国人的语言，而且永远是中国人的语言。这语言在任何时候都会压倒那些从阴暗角落里发出来的投降论者的呓语，因有那已经不是中国人的声音了。

那个平凡的人应该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他立在献金台上，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代表着我们全民族。他充分地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牺牲精神和坚强的信念。他行动，他说话，

都遵循着一个民族的渴望和要求。他的心和我们的是同样的一颗心。生存和独立是神圣的权利，时间不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渴望和要求，倘使解放的战争还没有达到目的。用自己的力量维护生存和独立的权利，打击×人，在不断的斗争中培养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的弱点，英勇的斗争会使我们逐渐成为健全。在全民族的坚决的意志支配下的斗争绝对不会带来失败的结果，这两年来的经验便给我们证明了这个事实。

我们进行的是必胜的战争，但这胜利并非一举手就可以取到。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用全力来支持它。假使把这比作一段艰难的路程，则最初走的可以被视作泥泞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两年中所过的困苦的日子，以后我们应该渐渐地走入坦途了。这不是空话，有许多事实可以给我们作证。在这时候倘若还有人以为应该中途转身退回出发地点，去找寻和平，他便不是一个中国国民，这是在出卖民族利益，谋个人利禄了。其结果不过用×人的金钱给他自己筑好了坟墓。他不会改变什么。抗战仍然继续进行，它会不管一切障碍，达到它的目的。

今天我想起了那个平凡的人的故事，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这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故事。在今天，我和在去年一样对抗战的前途还是充满着坚强的信念。我愿意跟在我们的整千整万的同胞后面高呼一声：

“勇敢地支持下去！”

一九四〇年

关于赫尔岑和他的《一个家庭的戏剧》*

亚历山大·赫尔岑(A.I. Herzen, 1812-1870)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解放运动的智的领袖。马沙立克在《俄罗斯的精神》中说他是"个人主义者,联合主义者,自由社会主义者",他的生涯里充满着波涛。他生在一个莫斯科的富裕人家,二十二岁时因研究社会主义被捕,处了六年的流刑,后来回到莫斯科,但不久又被流放到他处。过了两年,一八四二年回莫斯科,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一八四七年,便离开俄国,到意、法、瑞士等国。一八五二年定居伦敦,创办俄文印刷局,并先后刊行《北辰》和《钟》两种刊物,攻击俄国专制政治及其一切反动的设施,对当时的俄国青年有着极大的影响。克鲁泡特金在《自传》中说:"赫尔岑的文体之优美(屠格涅夫说他是用血和泪写文章的,在俄国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写过),思想之广大,以及他爱俄国之深切,使我受着无限的感动,我再三诵读不忍释手。"后来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之理想与现实》中又论到赫尔岑的《回忆录》,说这是"全世界的诗的文学中最优

* 本篇原题作《关于作者和这本小书》,刊于一九四〇年八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一个家庭的戏剧》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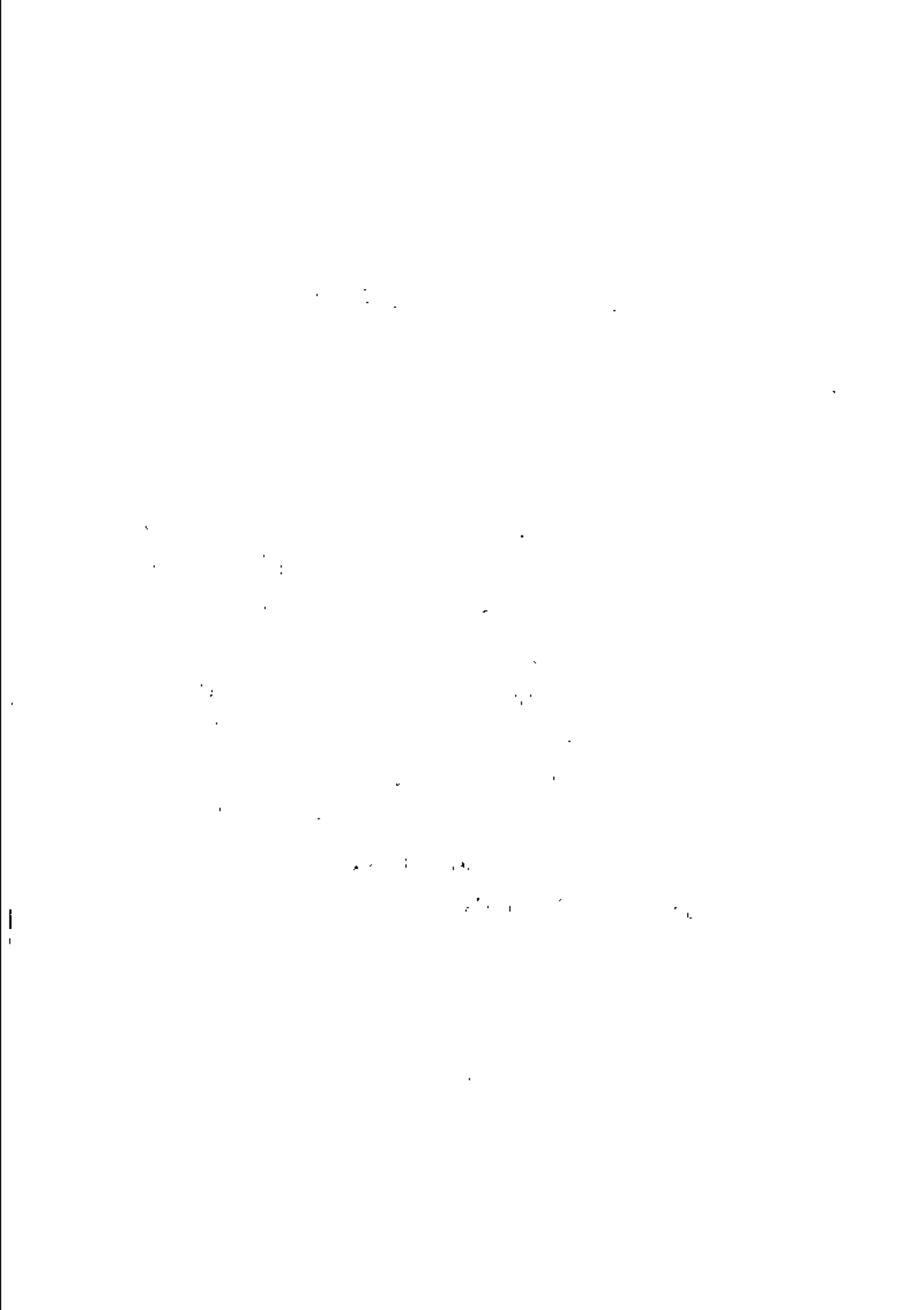
美的作品之一”。这一篇《一个家庭的戏剧》是在作者死后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才发表的。屠格涅夫说这一篇“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克鲁泡特金说它是“有着最高的美”的作品。赫尔岑一八七〇年在巴黎病故，葬于尼斯。

《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1]（广告）

本书是克鲁泡特金毕生的科学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见解之节要。在某一意义上说，它还是《互助论》的续篇。作者在本书中想解决两个问题：人类的道德概念从何处来？道德命令与其标准的目标为何物？现在被整理出来的第一卷单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作者在自然界与原始氏族中找到了道德的原理，又仔细研究了古希腊以来各时代中道德学说之发展。他否认道德与宗教有何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企图为伦理建立一个纯粹科学的基础。根据他的理论，互助、正义、自己的牺牲，乃是道德的三要素。他以为连带性与公平是社会的正义之必要的条件，自此构成了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公平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他要使人相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欢喜，真正的幸福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公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

---

① 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九四一年六月平明书店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国与世界》第六期。



一九四一年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

像《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典那样,《伦理学》也就是克鲁泡特金的经典。不,它不仅是经典,它是克鲁泡特金的遗言,它是克鲁泡特金的预言。

——八太舟三(《克鲁泡特金全集月报》,一九二八年十月号)

一 执笔之前

克鲁泡特金在一八八〇年就开始研究道德问题了。然而他特别注重于这种研究,却是一八九〇年以后的事。一八九一年他的最优美的论文《安那其主义的道德》出版。据说他写这论文的动机是这样:一个英国同志开设了一家商店,有些同志以为他们有权利去取用各种东西,不付代价,他们认为这就是所谓"各取所需",那个同志便诉于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不仅反对那种主张,并且还有感而写了这篇论文。①

---

* 本篇原收入一九二九年七月上海自由书店版《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一九四〇年经修改后移入一九四一年六月上海平明书店版《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

① 见 Roger N. Baldwin 编辑的"Kropotkin's Revolutionary Pamphlets",第七九页(一九二七年,纽约版)。

这论文是克鲁泡特金的最优美，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不管在量一方面是薄薄的一小册。它虽是克鲁泡特金动笔写《伦理学》以前三十年的著作，但实际上它可以算是那部未写完的著作《伦理学》的结论，可以来补足《伦理学》一书的。

其实，在《安那其主义的道德》之前，大约在一八八九或一八九〇年，克鲁泡特金还写了一篇叫做《正义与道德》的讲演稿，一八九〇年讲演于曼奇士脱恩考特同胞会，后来又扩充内容，再讲演于伦敦伦理学会。这篇讲演稿并未发表过，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前后（或较早一点）克鲁泡特金写《伦理学》时，才找出了它，便把它译成俄文，决定先印作小册。后来由莫斯科劳动之声社出版（一九二一年）。那时克鲁泡特金已经去世了。①

克鲁泡特金写《正义与道德》之动机，正如他自己在俄文本序言中所说，是来反驳赫胥黎的主张"道德并无自然地发生于人类间之痕迹，自然界只给人以恶的教训"之讲演（一八八八年在牛津大学讲演，后在《十九世纪》二月号发表）。在这小册子里他所表示的见解与他后来在《伦理学》中所表示的并无多大差异。我现译出其中的一节：

事实上，道德乃是在人类间慢慢地发展而且至今还在发展的感情与观念之复杂的组织。人必须将道德分类

① 见《正义与道德》俄文本第三至五页（一九二一年莫斯科，彼得格勒劳动之声社版）。

为三要素：1.本能，即社会性之习惯；2.正义之概念的表象；3.理性所支持的感情……我们所称为自己牺牲，自己剥夺者。①

倘使我们不曾读过原文，单看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知道《正义与道德》与《伦理学》二者在基本思想上是如何地一致了。

我们读了这两本小册以后便可以明白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轮廓早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构成了，其后一八九一至九四年间发表的《互助论》，就是他的道德学说的一个绪论。在一九〇二年他在致奈特劳的信中就正式表示创造一种新伦理学之必要。他说："现在我们就遇着一个问题了，这是今日以前所不曾发生的：一个绝对自由的平等人的社会之伦理学，基督教的伦理学是抄袭佛教、老子等等的伦理学，不过把它们用水浸过而且缩小罢了。我们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之新伦理学。工人安那其主义者之群已在动手创造这个伦理学了。……"②

克鲁泡特金之所以有最后的一句话，我想洛克尔告诉他的一件事情对他一定有影响。洛克尔说："有一次犹太工人罢工。这次真苦极了……我将这事告诉这个'老头子'，他非常用心听，并且记录下了许多话。我又告诉他，犹太工人自己已

① 见《正义与道德》，俄文本，第五一页。

② 见《克鲁泡特金的一封论个人主义的信》，载"Plus Loin"月刊二三号（一九二七年二月）。

经穷得不堪，还能设法去帮助英国码头工人，设法去养活好几百个他们的小孩。克鲁泡特金的两眼湿了，他一声不响地紧握着我的手。我说：'这是《互助论》的好材料了。'克鲁泡特金说：'一定的，一定的，在民众中只要还有类此的力量存在，我们对于将来是没有理由可以失望的。'……"①

这一类的事情克鲁泡特金一定见得太多了。他的这种心情在他后来写《伦理学》时，甚至就在他临死时，也依然没有丝毫的变更。

我在我的解说的开始，所以要写一节"执笔之前"者，为的是证明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是他最后三十多年间的思想之表现，并且在执笔之前三十年就完成了它的轮廓。

二 执笔之动机

要了解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对于他写此书之动机是应该知道的。他写此书之动机有三：（1）证明安那其主义者并不是无道德论者，而一种指导的道德原理，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乃是社会革命中所必需的；换言之，人类的道德感情与正义之概念对于人类解放的运动并不是无意义的。（2）然而那些基础在宗教的启示或者形而上学上面的道德不但不能使人营正当的生活，反而只能束缚人们，使人陷于完全的虚伪之中，真正的道德之起原与支持只能求之于自然科学中，博物学

① 见J.Ishill编印的"P.Kropotkin,Rebel, Thinker and Humanitarian"，据诚言的译文。

中。(3)解放论者之二倾向(强权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都不能了解道德之真义。

第一，打破过去一切传统的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历史上打开了一个新纪元。对于以前一切的东西如今全都要加以一番新的评价。于是"不要道德"的呼声就起来了。俄国的虚无党青年，法国的安那其个人主义者，哲学家尼采之类都自称为无道德论者。

我要做不道德的人，为什么我不做呢？难道因为《圣经》要我不做吗？然而《圣经》不过是巴比伦与希伯来的传说，像荷马的史诗那样地搜集起来编在一起的传说，现今巴斯克人的诗歌、蒙古人的传说也是这样搜集起来的。我难道必须回到东方半开化人的精神状态去吗？

难道因为康德告诉过我一个至上命令，一个从我自身的存在之深处来的神秘的命令，我就必须行道德吗？然而为什么这个"至上命令"是比较别的有时叫我去喝酒的命令更有威权地管理着我的行动呢？这也不过是像"上天""运命"之类那样的发明出来掩饰我们的无知的空话罢了。

或者我行道德是听从边沁的话吗？他要我相信如果我看见一个过路人落下河里，我为着救他而溺死，却比我袖手旁观更快乐些。

或者因为我的教育要我去行道德吗？或者因为我的母亲教我以道德吗？难道只因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无

知识的母亲教了我们许多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就要去跑到教堂里跪着祷告，去尊敬皇后，去在那个我们明明知道是一个无赖之徒的法官面前低头行礼吗？

我和其余一切的人一样，都有着成见。我要试来去掉成见！虽然现今不道德算是可厌的，我也要极力做不道德的人，恰如我做小孩时极力不要害怕黑暗、墓地、鬼和死人——这一切都是别人教过我要害怕的。

去打碎宗教所滥用的武器，这就是不道德的行为，然而只要这行为是对于借着所谓道德之名来欺骗我们的伪善之反抗，我便要去做它！①

这是一个俄国虚无党青年的热烈的反抗的呼声。他的话是有理的，然而他因为受压制太深，所以一旦起来反抗，就不免走到极端了。

克鲁泡特金却看出来这一般人的错误，基础在科学上面的道德是不应该被排斥，而且也不能够被排斥的。伦理学的本来目的应该是去鼓舞人类中的实际的活动。而且人群解放运动中确实需要着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过去的革命之所以不能达其预料的目的，皆由缺乏此种道德理想所致；俄国革命之不能完成其目的，而走上独裁与强权之路，更是因为没有一种道德理想作革命之指导原理所致。

因此克鲁泡特金想把道德的真正面目显露出来，以他的

---

① 见"Anarchist Morality"，第四页（一九〇九年。伦敦版）。

伦理学来“鼓舞后代的青年去奋斗，把对于社会革命的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的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里的自己牺牲之火”。

然而这并不是说克鲁泡特金发明或创造一种理想教别人去相信，去实行。不，决不是如此。克鲁泡特金自己说过伦理学要求决定而且说明几个根本原理，没有此等原理则无论动物或人都不能够在社会中生活。……伦理学更说：“去看自然本身罢！去研究人类的过去罢！它们会告诉你实际上这是如此的。”①

自然克鲁泡特金的道德学说是那般以为除经济学之外无科学，除辩证法的考察以外无无产者之思维形态，除机械的必然力以外无社会动态的人是不能了解的。然而如果他们能放下书本去观察民众生活，去观察大自然，或者去饮一滴从那巢居在大森林中的无数群鸟，造穴于大自然怀抱中的哺乳类之互爱社会里流出来的互助之道德的清流，那么他们的被一些抽象的符号缠昏了的脑筋也许可以清醒一点罢，那时候，他们就可以了解克鲁泡特金的学说的真正价值了。克鲁泡特金著述《伦理学》之第一动机，就在证明“社会主义中有着一个绝大的伦理潮流，离了它我们再也不能够创造出任何新的伦理学体系来”。

第二，然而基础在宗教或形而上学上面的道德却是完全虚伪的。宗教家宣传说，人是完全邪恶的，他之所以营道德的

① 见克鲁泡特金的“Ethics, Origin and Development”，第二章(一九二四年，纽约版)。

生活全出于神的启示。他们又造出什么天堂地狱之说以威吓人民，使人们屈服于现社会制度之下做忠顺的奴隶。这种宗教的道德完全束缚着人类精神使之不得开展，而且阻碍了社会进步。

同时又有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们用了什么“至上命令”，什么“良心”等等名词来代替宗教家的神，然而他们依旧在自然界以外去寻求道德之起原，有的甚至依旧去求神的保护。结果，他们把道德说得非常玄妙含糊，令人堕入云雾之中，莫名其妙。在这种情形之下，克鲁泡特金就感到改造伦理学是刻不容缓的工作了。克鲁泡特金写《伦理学》之第二个动机，就是要把伦理学从天上，从云里带下来，带到日常生活中。

第三个动机是从解放论者中对于道德之两位对立的倾向来的。其中一个倾向就是个人主义者的无道德主义。这是对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虚伪道德之反动。个人主义根本否定了道德，以为个人超于一切。上面所述的虚无主义的青年也就是属于这一派的。他的错误乃在忽视了自然界的事实，不免陷于独断与形面上学的病癖。

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倾向。这就是强权共产主义之阶级斗争的伦理学。他们以为既然有了阶级斗争之事实，就有两种不同的对于正义之认识，从而就有所谓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无产阶级的道德——两种相对立的道德。然而克鲁泡特金是反对这种主张的。他以为道德是整个的，从在大森林大原野结群而生活的动物以至于人，只有一个一贯的道德。无论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总是建立

在共同的人种学的根基上面，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因为不管我们属于何阶级何党派，我们总是人，总是所谓 Homó Sapiens（智人）一类，社会本能是人所必有的。那么阶级的区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绝不能完全剥夺掉人（就一般地说）的社会本能的。

然而克鲁泡特金的这主张是从生物学、人种学来的，与普通人道主义不同，他是鼓舞着无产阶级进行解放的战斗的。而且他要把他的伦理学当做社会革命之指导原理。

个人主义重视个人，而强权共产主义又蔑视个人，抑制个人。二者皆走极端，实有纠正之必要。在这种情形之下，研究人类的道德之起原，其发达与其归结，而建设新的实在论的，自然科学的伦理学，真是当今之急务了。不幸死亡阻止了克鲁泡特金，使他不能完成他的《伦理学》第二卷，即论道德基础与目标的一部分。

然而最大的动机还是：克鲁泡特金带着垂死的老躯和热烈的希望回到俄国，去参加俄国革命的建设事业，而结果在那里他不能够做一点事情，连他和一些经济学的专家组织团体，调查俄国经济力量，以便帮助俄国进行改造的工作，也受到了革命政府的干涉。团体被解散了，材料被没收了。他的家中还受着两次搜查。他只得迁居到乡村里从事《伦理学》的写作。[①]他明白自己"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所以想在未死之前纵不能全部地完成新伦理学，至少也应该把它的基石预备好，

---

① 见E. Goldman："The Crushing of Russian Revolution"。第十节。

"指出一条路给大家看"。于是这个老革命家便幽居在一个冷僻的乡村中,在俄国民众啼饥号寒苦苦挣扎的时候,开始一字一字地写他的《伦理学》。他无时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快要停止了",然而心里又怀着崇高的人类爱,恨不得尽全力来为人类,为困苦的俄国人民服务,但他的生命力已经竭尽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便一方面不顾自己的健康工作着(我想如果不写《伦理学》,他也许可以多活一两年),一方面又在极力寻求一个能将他的理想表现于实际行动的人,所以他在这时候曾打电报给奈斯脱·马哈诺(南俄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克鲁泡金特的一个信徒)说:"希望你好生保重,因为在俄国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① 在这种情形下面写成的《伦理学》真是一字一滴血泪了。

三 伦理学的目的和基础

人们常常不了解伦理学的目的,因此便发出一些奇特的议论。有的人把伦理学视作法律一类的东西。对于这种人,克鲁泡特金的答复是:"最好不要把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混为一谈。……事实上有多数伦理学的著作家否定任何立法之必要,而直接诉于人类的良心。伦理学要求决定,而且说明几个根本原理,没有此等原理则无论动物或人都不能够在社会中生活。……伦理学说,只有树立个人与其他万人间之某种和谐,才有

① 见 Hazeland,"La Révolution Russe en Ukrane",载"Plus Loin"月刊第四十号(一九二八年七月,巴黎)。

接近这样完满的生活之可能。伦理学更说：'去看自然本身罢！去研究人类的过去罢！它们会告诉你，事实上这是如此的。'"

伦理学丝毫不含有强迫的性质。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说得好："伦理学并不来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做；'它不过来讯问他：'你所实际地、明确地愿望的东西是什么？'"克鲁泡特金更说得好："当个人依此种或彼种理由踌躇着，不知道在某种特别的情形中应采取的最好的道路时，伦理学便来帮助他，而且向他指明，他希望在同样的一个情形中，别人对他应如何行为才好。然而就在这时候，真正的伦理学也不来指出一个严格的行为准则，因为这应该由个人自己评定那些影响着他的种种动机之比较的价值。"克鲁泡特金又明明白白地说："本来对于不能忍受灾祸的人，是不必去劝他冒险的；对于充满了精力的青年，向他说老年人的谨慎也是没有用的。"（均见本书第二章）

又有人否定了自达尔文到克鲁泡特金所说的社会本能（互助），并且否认了克鲁泡特金所说的道德之三要素：互助、正义、自己牺牲。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在某种生活的情形之下，完全是漠不相关，而且还如仇敌，总是要将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面。"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阶级把它的快乐建筑在其他一个阶级的痛苦上面，这并不是生活的常态，这种情形是应该去掉，而且完完全全可以去掉的。社会革命第一就要去掉这个。而且一切伦理学体系都是反对"将我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上面"的这种情形的。其实据一般伦理学家说，美满的幸福生活是不能够由损人利己的道路达到的。而克鲁泡特金还说："它（伦理学）又告诉人说，如果他希望过着一个美

满的生活，在其中他能够完全发挥所有他身体的、精神的，和情操的力量，则他必须永久抛弃‘此种生活可以由不顾他人的道路来达到’之概念。”

然而伦理学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在个别地去劝告人们，而且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它是放一个更高的目标，一个理想在全体的人类之前，此种目标，此种理想会引导人，而且使人本能地依着正当的方向去行为。“……伦理学的目的也是要在社会中创造出一种空气，使人类中大多数都全然依着冲动地，即毫不踌躇地，去完成那些最能产生万人的福利及每个单独的个人的完全幸福之行动。”（本书第二章）

如此，则伦理学不但不束缚个人的自由，拘束个人的发意性，妨碍创造理想社会之努力；反之，伦理学正是去鼓舞人为着真理与正义奋斗，创造理想社会的。实则没有崇高的理想，则理想社会之创造实是不可能的事。并且“近代伦理学体系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乃是它不应该拘束一切的‘个人的发意性’，而且甚至为着像共同社会之福利或种之福利那样崇高的目的，来拘束‘个人的发意性’，也是不应该的。”

这样，伦理学便不是人们所畏惧的，而是人们所愿望的了。“事实上如果道德的生活会使人得着不幸，那么，世间一切道德便早已消灭了。”（本书第七章）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地行为，或是第一寻求快乐与个人的满足也好，或是甘愿为着某种更好的东西而抛弃即时的欢乐也好，我们都是向着在一定的时间会使我们得着最大满足之方向而行为的。”（本书结论）不过克鲁泡特金更进一步说：“这样的概括是不够的。”亚里斯多德

说，我们追求欢乐，名誉，尊敬等等，不只是为着它们自身的缘故，而且主要地还是为着它们所给与我们的理性之满足的感觉的缘故。（本书第七章）于是克鲁泡特金便说："如果理性的职务在这个形式中被人承认了，那么，又生出了下面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理性中有什么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中会得着满足的呢？"克鲁泡特金的答复必然是："正义之需要（即公平之需要）。"他又更进而自问道："为什么一个更发达的精神却在那些最有利于万人的利益之解决中，找到了最大的满足呢？这个事实难道还有某种根深的生理学的原因么？"

克鲁泡特金先举出了培根与达尔文二人的答案：在人类中与在一切群居动物中一样，社会性之本能是发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变成了一个比较那些类集在"自己保存之本能"这一个名称下面的其他本能更为强固，更为恒久的本能了。（本书第三章及第七章）

达尔文的结论："社会本能是一切道德所从出的共同的泉源，"是不错的。他又给社会本能下了一个定义道：社会本能是一种特殊的本能，与其他的本能是不同的。自然淘汰为其自身之故，而使此种本能得以发达，因为此种本能对于种之福利与种之保存都是有利的。他还说，此种本能"恐即亲子间的感情之扩大"（《人类由来》）克鲁泡特金更附加道："在许多下等动物中……此种本能倒不如说是兄弟或姊妹的关系或友伴的感情之扩大。"达尔文说："丝毫没有此种本能的人，便是怪物。"（本书第三章及《人类由来》）

达尔文在日常生活中举出一个实例来：譬如有一个人願

从了自己保存之意识，不曾冒危险去救一个同胞的性命；或者因迫于饥饿而偷窃食物。在这两种情形中，这个人是服从着一个十分自然的本能。然而为什么他过后又感着不安呢？为什么他现在又觉得他应该服从其他一种本能，不应当这样做呢？达尔文回答道，因为在人类天性中，“更能永续的社会本能战胜了较不能持久的本能。”（《人类由来》及本书第三章）

在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如饱足饥饿，发泄愤怒，逃避危险，或占有他人的东西等），就其本性讲，只是暂时的。此欲望之满足常较欲望本身为弱。……因此假使一个人为着要满足这样的欲望，违反了他的社会本能而行为，过后他对于这行为又加以反省（我们常常这样做），他就会不得不“拿过去了的饥饿，满足了的复仇，牺牲了他人来逃避自己的危险等等印象来和那差不多永在的同情之本能，而且和自己关于别人所视为可赞赏或可责备的事物之最初的知识等比较一番”。这时他便会觉得“好像他误从了一种眼前的本能或习惯，这在一切动物便会生出不满足，而在人甚至会生出不幸来。”（本书第三章及《人类由来》）

既然证实了社会本能之存在，而且此种本能是更永续恒久的。培根与达尔文对前述问题之答案又继续论下去：而且在人类中，如在数万年来，就营着社会的生活之一个合理的生物中一样，理性助长了此等风俗、习惯及生活规则之发达与遵守，而导引到社会生活之一个更完全的发达，——其结果，各个别的个人的发达就生出来了。（本书第七章）

然而“根据我们的个人的经验，我们便知道如何在互相冲

突的冲动间的斗争中，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感情屡屡占着上风，而把带有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感情克服了。这样的事实，不仅发生于个人中，而且也同样发生于全社会中间”，因此，克鲁泡特金便说：“这个答案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了。”克鲁泡特金便达到了下面一个结论：“如果人类理性没有‘把一个矫正的社会的要因采纳入它的一切决定中’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倾向，则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决定一定会永远支配着那些带有一个社会的性质之判断。”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矫正的要因果真是被应用了的。……一方面，它从我们的根深的社会性之本能中，以及从对于那些与我们共同运命的人的同情中发生出来；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来自我们的理性中所固有的正义之概念”。(第七章)在本书第八章以下所讨论的道德学说之发达史便把这个结论完全证实了。

四 第一卷内容

第一章《决定道德的基础之现时的需要》 十九世纪一百年间科学与技术之空前进步，新学问之发达，使得超出人们需要以上的丰富的物质之生产成为可能。万人的安乐便不再是梦想，而人类把他的全社会的生活改建在正义之基础上，这也是可能的了。于是伦理的观念也就不得不根本改变。在此时以前的伦理学不是宗教的工具，便是形而上学的玩物。然而十九世纪中产生了不少的伦理学体系。其中有两大体系(孔德的实证论与边沁的功利论)对于同代的思想尤其有大的影

响。靠了过去一百年间各种伦理学体系之成就，伦理学已经能够脱掉宗教与形而上学之羁绊，而改建在自然科学上面了。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完全被人误解了。达尔文所说的生存竞争并不是指同种间的。实则生存竞争并不是自然界之根本事实。自然界之根本事实乃是互助。自然界并不是无道德的。人类最初得到的道德教训，还是从自然界中得来的。因此目前之最大急务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决定伦理学之基础。

第二章《新伦理学之渐次进化的基础》 新伦理学之基础就是互助本能之事实，即从社会生活发源来的社会的感情，它渐次发达而进化。最后发达到三个连续的递升的阶段：互助——正义——道德。这三者就构成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之基础。

第三章《自然界中的道德原理》 自然界并不以生存竞争、以恶、以无道德教人，反之自然界教人以道德。自然界乃是人类的第一个道德教师，原始人民就从自然界中演绎出他们的最初的道德规则来。本章中又论到达尔文的道德学说。达尔文的著作并不仅限于博物学一方面，在道德科学一方面，他也有很大的贡献。他的结论是：社会本能是一切道德所从出的泉源。

第四章《原始人民的道德概念》 原始人并不是像野狼猛虎一般的东西。他们有着很好的伦理与社会。他们的部族间的道德要求有着两重性质：某种要求之履行为义务的，其他一种之履行则仅为可愿望的。个人若不履行义务的规则时，则以社会的强制的手段对付。克鲁泡特金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

蒙昧人与野蛮人的道德概念。

第五章《古希腊道德学说之发达》 本章研究古希腊哲学家的道德学说。先论诡辩学派，其次苏格拉底，其次柏拉图，其次亚里斯多德，再其次伊壁鸠鲁，最后斯多噶学派。不管他们这一辈人有种种不同的道德观，然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人的道德之泉源是在他的自然的倾向及其理性中。人靠了他的理性及其社会生活样式，便自然地发展而且巩固了他的道德倾向，此等倾向对于维持他所需要的社会性一层，是有用的。

第六章《基督教的伦理学》 基督教乃是作为对于罗马帝国支配阶级的邪恶之反动而产生的贫民的宗教。它的根本特征乃是1.提倡对于被压迫者之爱；2.以社会的幸福作为人生之中心原理；3.主张万人平等；4.主张对于危害之宽恕。但此等特征后来就逐渐软化而消灭，基督教染上机会主义之色彩而逐渐堕落。后来基督教教会非但抛弃了宽恕之原理，而且对异教徒实行空前绝后的大惨杀，在历史上留了一个大污点。

第七章《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道德观念》 在中世纪中教会的黑暗的势力下，道德学说之更进的发达差不多成为不可能的了。不过中世纪的自由都市中也有很好的伦理与社会。在其中互助之事实非常发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一切学问之复兴，道德学说也就大大发达起来。培根的道德观中的主要点乃是：便在动物中间，社会性之本能也会较自己保存之本能更为强烈，更为稳固这一个事实。其后格劳宿斯又将这

个观念确定地表现出来。

第八章以后便叙述近代道德学说之发达。 所有伦理学家都不能够说明人类的伦理感情之起原。我们可以把他们大体分类为二大派。一派是在社会的和个人的利害之考量中看出了道德之起原的功利论者。另一派是把道德当作本有的，固有的神秘力之直观派。前者至小弥尔而完成；后者到康德而达于极致。然而两方面都陷于错误。克鲁泡特金将每个哲学家的道德学说一一加以周密的检讨，他发见了一部分思想家企图在这两大体系之外另建立新的实在论的伦理学之努力。对于蒲鲁东与达尔文有很高的评价，对于斯宾塞有详细的论述，对于居友有充分的赞赏。

第十六章批判无道德论者，而下最后的结论，但本章没有写完，其中批评斯丁纳、尼采诸人的学说之部分来不及写，克鲁泡特金就逝世了。

五 中心思想

人并不是单有着非常强烈的利己倾向的生物，他的天性并非除了自身的利害以外就不会想到别的一切。因为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那么人决不会营着社会生活了，社会的进步也成为不可能了。然而克鲁泡特金也不是一个相信性善说的乐观派。他并不否定人的利己的倾向。人的行为之动机总含有多少的利己的倾向乃至功利论的倾向。无论何种行为，如果它不能给人以某种满足，人决不肯去做。不管自己牺牲也好，

献身也好，以及其他一切可称为利他的行为也好，在其中总含有利己的要素。我们都是向着在一定的时间会使我们得着最大满足之方向而行为的。

然而在人类中间，除了这种利己的本能外，还有一种社会的本能。因为人类不营社会生活，则不能生存，所以社会本能就逐渐发达到一种高度，甚至于比较利己的本能还要更强固，更长久。此种社会的本能乃是亲子间感情，乃至兄弟或姊妹的关系或友伴的感情之扩大。这种本能我们又可以称为伦理的本能，没有它，则人类社会之发展成为不可能。所以伦理生活与社会生活二者是分不开的。

然而这种社会生活并非人类的特有现象。差不多全动物界也都营着社会生活。动物并不是无道德的东西。"强嘴利爪的血战"并不是自然界中常有的现象。动物也有它的社会与伦理。凡不结成社会，不营伦理生活的物种必不能残存于对自然之生存竞争中，而陷于灭亡。动物界中的伦理生活有时甚至是非常美满，原始人最初还是从它们那里得着道德教训的。

虽然我们常常轻视动物，以为它们不知道伦理与社会，但是动物也决不是单独地生活着的。它们也是密集群栖的。不管珊瑚也好，软体动物也好，昆虫也好，哺乳类也好，总之一切动物未有不结成社会而生活，从而也各有各的伦理。蚁有蚁的伦理，蜂有蜂的伦理，猿有猿的伦理。然而因为它们的社会生活之形态不同，所以它们的伦理也各异。不过虽然社会生活之样式不同，从而伦理之形态也各异，但其为社会生活，其

为伦理则一。而且事实上一切的动物都有社会的感情或社会的本能。从这共通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本能，便生出了共通的一个伦理，这就是互助。不管蜂受了它们的社会生活之影响，身体之构造就因分工而变化（如工蜂、雄蜂、蜂王等分类），不管千万匹的猿有着同一的身体之构造，然而它们的社会本能，从而伦理之本质都是同一的，皆依着互助之法则而行为。营着这样的道德生活的动物在抗拒自然、抵抗异种之侵害时，便能得胜而生存而传种至于今日。

我们若在动物之后更进而考察到原始人，则发见出霍布士的把原始人视作互相吞噬的野狼之主张乃是大错特错。实则狼对于狼也实行互助。至于原始人则已经有了十分优美的社会样式与伦理形态了。

原始人有着固有的社会本能。这种本能在长时间的进化中伴着社会生活而发达起来。在这种本能之外，他们又从当时与他们生活在一处，而且有密切的交接的动物中间，学到了社会生活之方法及其伦理。这样一来，他们的道德便适应着他们的知识与生活样式而向前发达；虽然在各时代各部族中道德概念是不同的，但在原理上却是一致。原始人的伦理在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义务的；第二种则单是可愿望的。第一种是对于他们的社会生活最有重要性的道德，所以便带着义务的性质；第二种是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各人的自由意志而行的。这二者都是从原始人的社会本能，即互助之原理中生出来的。固然各种原始人的生活样式与知识之不同便产生出道德概念之差异，但此等道德概念在根本原理上是同

一的，他们总是本着互助之原理来树立，保存那些有利于社会生活的习惯。这一件事实是共通的。

人类的历史中有进步的时代，也有退后或停滞的时代，而事实上，人的天性中利己的倾向也有变成强烈的时候，所以有时人的道德本能之表现不免常为利己的本能之表现所蔽。然而事实上无论何时代，总有社会存在的，离开了合作、协力，则人便不能够生存。现代社会的一切优越的知识、发明、便利，无一非社会的生活之结果，都是社会全体分子之合作、协力造成的，而且社会愈进化，则个人之孤独的生存愈成为不可能；人们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彼此依赖愈深。这其间社会的感情，即互助之本能当然愈加发达，于是道德又发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个阶段便以社会本能当作基础而发展于其上，而且当同情与仁慈之感情逐渐自行发展时，这阶段也以同比例地向前进化，遂引起许多道德规则之创造，在此等规则的根基上便存在着正义与公平之概念。这是初步的道德，日常的道德，为各个人类社会之存在所不可缺少的。

固然各时代中的道德概念是因各民族的生活样式之不同而差异，然而正义之概念总是存在于其中的。公平，自己与万人的一视同仁之原理在各时代各民族中并无大的差异。自古希腊以来有许多著书论述伦理学之思想家，有的在功用（即对于个人的与社会的利害关系之考量）中看到正义，有的以为正义乃是人所固有的神秘力。然而事实上前者根本不懂正义之概念，即道德之概念；而后者又不知自然界之事实。第一，道德概念所从出的道德感情是比较一切功利之打算高得多，深

得多，广得多，丰富得多，——故正义之概念不存在于功用之考量中。第二，人类的道德感情与动物的道德感情是同质的，只有程度之高低而已。固然它是固有的本来的东西，然而并不是上天给与的，它并无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起原；它是动物从长期社会生活之间自然地积蓄而遗传下来的固有感情。它的活动的方式就是平等之要求，自己与万人的一视同仁。——故正义又不能是人所固有的神秘力。

其次在互助——正义之外，还有一个道德的第三要素，这就是所谓"大量"、"宽宏"或"自己牺牲"。我们各人都有着过剩的活力，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可以无报酬地给与他人，这种行为，就可以归列在这第三个要素之内。居友说得好："我们单为自己是不够的：我们有着更多的眼泪，为我们的苦痛所流不尽的；我们有着更多的快乐，为我们的生存所享不完的。"这种"自己牺牲"乃是生命之满溢。

在人类中间有着两种倾向。一方面人要求着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发意性；另一方面人又倾向着共同的善与万人的福祉。这两个倾向都是不可忽视的。种族忽视了此等个人的要求，则此种族衰灭；个人忽视了共同的善，则此个人衰灭。现社会中宗教、强权、资本等等把这两个倾向皆忽视了，所以现社会之衰灭乃是不可避免的事。

在现今如果不将这两种倾向调和在一起，则决不能创造一个可以鼓舞人类的崇高的道德理想。在科学与技术发达、生产力大增的现代，新伦理学之建立已成为可能，而且更是不可延缓的工作了。要把成就这巨大发达之知识与丰富的物质之

生产力应用到万人的安乐上，而不供少数特权者享乐之用，非求助于新伦理学不可。没有崇高的理想则革新为不可能。而这样的理想又不是宗教、形而上学、强权共产主义，被错误解释了的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或尼采之流的无道德论所能给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只有那个基础在社会本能上而的、科学的、实在论的伦理学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克鲁泡特金的新伦理学确实给我们证明了“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是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①

六　伦理学与安那其主义

俄文本编者莱伯代甫在他的序言中说过：“许多人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定是特别‘革命的’或‘安那其主义的’伦理学。假若有人向他说起这样的话时，他总是答复道：他所欲著述的是**人的**伦理学。”

这一段话是常常被人误解的。有的人真正以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不是安那其主义的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伦理学并非为个别的个人而存在的，它是为人类全体而存在的，正如安那其主义是以追求人类全体的幸福，促成人类全体的解放，扶助人类人格之完全的与自由的发展为其最大目标。所以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正是安那其主义的。而且他

① 这一节中有不少的话句是从八太舟三的《伦理学解说》中引来的。见日译本《克鲁泡特金全集》第十二卷。

的伦理学是他最后三十年间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思想之结晶。这还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伟大的安那其主义理论家所能够制出的唯一的伦理学体系。他的伦理学和他的世界观一样，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面的。凡是头脑明晰，观察深透，永远信赖着自然科学的方法(归纳的演绎法)的科学家，纵然他会攻击安那其主义的社会学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安那其主义的世界观。对于安那其主义的伦理学也是如此。

安那其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与其说是唯物论者，不如说是实在论者。他常常称他的伦理学为实在论的伦理学。实在论者排斥一切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实在论者的克鲁泡特金便把伦理学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打成一片，而且完全用自然科学来作他的伦理学之支持。他的伦理学正是从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制成的一个伦理学体系。因为在这方面，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就是实在论的立场。

而且我们从安那其主义者的眼光看来，便知道对于我们，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有着一个独创的特征，这并不是在他的书中解说与批评伦理学诸体系的地方，这在别的哲学著作中，如克鲁泡特金引用过的约道尔、包尔生等人的伦理学史中我们也可以见到。克鲁泡特金的书中的特点乃是他将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打成一片。在他，学者与战士是分不开的。他并不单是一个学者，也不单是一个战士。在他的精神中，这二者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倘使把他的伦理学体系略微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这个社会性(社会的本能)的问题正是对于那些

把社会视作一个强制之事实，而非基础在自由合意上面的人的一个自然科学的回答。正义之概念不就是立在一切过去民众运动的根基上吗？社会主义不就是劳动群众对于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之追求的表现吗？①就因为这个缘故，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书中便把社会主义视作伦理学说之一部分，还特别详细地讨论过蒲鲁东的学说。而且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在批判各家的道德体系时，便随时指出来，多数哲学家的遗漏，就在不曾充分地反对（或者竟然完全不曾反对）当时的社会的不义（奴隶制度、农奴制度、工钱制度）。而且更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正义之观念与平等之观念连结在一起，从而他的伦理学也和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安那其共产主义）连在一起。他的社会主义之原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的伦理学之一原理也就是"无报酬地给与他人"。他的伦理的公式，"无平等则无正义，无正义则无道德"也就由此构成了。

七　克鲁泡特金与个人主义

还有人从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批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对它发出不满的言论，如英国安那其主义者奥因②一九二五年在伦敦《自由月刊》(Freedom)上发表的主张。奥因的

① 参看M.G.对《伦理学》的批评，载"La Voix du Travail"第二年第九号（一九二七年四月，巴黎）。

② 奥因(W.C.Owen)已经在一九二九年七月病故了，这位七十五岁的老革命家的人格却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意见，我觉得是应该纠正的，因为他似乎不明瞭克鲁泡特金平日对于个人主义的态度，再不然就是他的个人主义的偏见使他不能了解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之故。

我深深感觉到《一个反抗者的话》的著者与《互助论》的著者虽同是克鲁泡特金，却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人。前者只想到打碎奴隶制度的镣铐需用打击，后者乃是宣传安诺尔德所谓"温柔与光明"之使徒。……

我自己的个人自由之伦理是和集团的伦理完全对立的；而且不管许多的相互同情，我愈加觉得那个个人主义的反抗者的见解与老年克鲁泡特金的见解之间有着一条很深的鸿沟，也许现代哲学并不能在这二者中间建造一道桥梁。

据说克鲁泡特金在晚年常常害怕个人主义学说在安那其主义运动上的影响；而别的人却深觉得安那其主义的主力便是从那些个人主义学说来的。我们相信此等学说供给了安那其主义之伦理的，智的脊骨。

在我们与克鲁泡特金中间有着重大的伦理学的差异，——这差异只能够由不妥协的，无畏的斗争来解决。为了这个理由克鲁泡特金的最后的一部大著就应该慎重仔细地研究才行。……①

① 见Freedom月刊第四三〇号(一九二五年十至十一月)。奥因指出克鲁泡特金的书中一个遗漏，就是完全不曾论到巴枯宁的学说，只把他的名字提过一次而已。奥因的话是不错的，特别在克鲁泡特金知道巴枯宁曾有创造新伦理学的企图以后，这个遗漏更使人觉得可惜了。

然而奥因并不了解克鲁泡特金。不错，克鲁泡特金（不仅在晚年）非常憎厌个人主义；他说这是spurious（假的，虚伪的）个人主义。甚至纠正个人主义之错误，也是他著述《伦理学》之一个动机。并且早在一九〇二年致奈特劳（Max Nettlau）信中他就猛烈地攻击过这种虚伪的个人主义了。

> 从孟特微尔以至于尼采与法国青年安那其主义者所提出的狭义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是不能够感动任何人的。它丝毫不曾含有伟大的，动人的东西！……
>
> 人们至今所谓“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使个性减少之愚蠢的利己主义而已。它是愚笨的，因为它决不是个人主义；它不会达到人们所提出作为目标的东西——即人格之可能的最完全而广泛、完满的发展。在我看来除了易卜生而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懂得真正个人主义之概念，而且易卜生也不过靠了天才的视力瞥见了它，还不能用浅明易解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使人明瞭。
>
> ……我所懂得的个人主义乃是：个性由于在某一些最大的需要方面以及在个人与一般的他人之关系中最高的社会性之实行，而达到可能的至高的个体的发展。资产阶级主张要成就个性之繁荣便需要着奴隶，因此就应该牺牲他人，而不牺牲自己，……其结果却使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提倡的个性反而减少了。——这就是个人主义吗？……这样的个人主义会使歌德笑煞！就拿歌德这

一个如此显著的个性来说罢。如果他有一件工作需要共同来做的，他会把它抛开吗？——不。他一定会给他同社会的人谋幸福的！这样他会带来生活之快乐、欢喜、精神、社会的共同的兴趣。而同时他又不会失掉他的个人的诗，他的哲学；他在那里还因学得人类天才之新的一面，而得着一个共同工作中的自然之享受的快乐，他的个性就这样地发展了。……我又知道在俄国共同生活中的那些人物，他们一方面是俄国人所谓"mirskoi tchelovick"（共同生活者）中最完全的人物，而一方面又是或为了个人之政治的反抗，或为了个人的习俗之叛逆，或为了反宗教的，恋爱的，以及其他的叛逆，——而甘愿破除他们的乡村的成见，孤独地走自己的路。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法国青年安那其主义者从前向我们说过的个人主义是无价值的，渺小的，虚伪的，因为它并不能达到它所提出来的目标。而且正因为有过那些在高声主张了个人人格之后明白地为公共事业而登断头台的人，所以这种个人主义在我便觉得更是虚伪了。就只因为个人主义的概念还是混同的缘故，以致那些自称为个人主义者的人还相信是与此等牺牲的人属于同一的政治的、精神的阵营的。实则那些自称为个人主义者（资产阶级之所谓个人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一样，都没有权利把此等牺牲的人算做"他们的"一边的。……

从这里可见克鲁泡特金对于现代所谓个人主义是如何地

憎恨了，因为它是虚伪的个人主义。“在破坏基督教教义上尼采是壮伟的”，然而“尼采的金发野兽就使得我发笑了”。①

说安那其主义的主力是从个人主义学说来的，这是不明瞭实在情形的话。奥因如果把法国运动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所谓安那其个人主义对于纯正安那其主义运动曾经有过何等的妨碍了。我自己和克鲁泡特金一样，觉得虚伪的个人主义之侵入乃是安那其主义运动之大害。资产阶级出身的安那其主义者受个人主义的毒颇深，所以结果他们常常不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共同工作上。在法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之意见分歧，未始不是受着虚伪的个人主义之赐。现在各国的运动的新倾向就是扫除个人主义的影响。而克鲁泡特金在一九〇二年就大声疾呼地提示过了。

> 有人以为几个人的有力的推动便可以使革命爆发，这是梦想；应该依赖着一切革命前的预备运动。而且革命需要一个理想，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可以做革命的理想吗？——不！

这种理想已经由工人安那其主义者在创造了。“为了逐渐造成各种利益间的连带性，为了造成各民族间的连带性，为了扩大连带性之观念使国际劳工协会得以建立，”劳动者的力量是不可少的。

---

① 均见《论个人主义的信》。

我所知道的是，劳动者至少习惯于一些不适意的工作(这不是愉快的工作)，这对于将来是一个重要之点；劳动者因为习惯于手工作，那么在他的将来之梦想中就不会去找一个治人者的位置；他因为今日被人掠夺，受人压迫，所以有权利要求平等，他从来不曾停止要求过；他为平等而战斗，将来也要为平等而战斗的；而贪婪愚笨的资产阶级却相信维持不平等乃是他的利益。为了这个，他就造出他的科学，他的政治，他的权力。每一次别人为平等而战斗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为不平等而战斗，为统治权而战斗，但民众总是立在他的反对的一面。……①

在写了上面的话十八年以后，即在他逝世前一年，在一封信里他又写道：

我深信于将来。我相信工团主义运动(即在最近一次会议里有着二千万工人的代表参加的职工组合运动)在近五十年间将成为一个巨大力量，来建立无国家的共产社会之基础。如果我是在这个运动之中心地法国，如果我是健壮的话，我就马上投身于这运动中来拥护第一国际的原理。②

在写这一封信的前一月，在《致西欧劳动者的信》末尾他

① 均见《论个人主义的信》。

② 见文字宣传团的出版物《克鲁泡特金纪念刊》第二号，二三页(一九二一年，法国 Robinson)。

又写道：

> 然而这改造之成功，大部分是要靠着各民族之密切的合作之可能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各民族间劳动阶级密切地联合起来，而全球工人的一个大的国际协会之思想又应该重新采用。……①

这样的主张并不与《一个反抗者的话》中所说相差，可是与奥因的个人主义就差得远了。在我看来，写《一个反抗者的话》的克鲁泡特金与写《互助论》乃至写《伦理学》的克鲁泡特金依然是一个人，这其间只有表现的方法之差异，而根本思想依然是同一的。我可以说这是克鲁泡特金的两面，犹如他的两重性格一样：他在讨论《互助论》时使人觉得"恰如柔顺的小孩在老亲的膝下静听慈爱的训言"②，而"他骂俄皇政府的时候，他的平时面孔上的可爱的温和表示已没有了，两眼像出火似的，他的灰色的长须抖得很厉害"。③难道我们能说在这两个克鲁泡特金之间有一道鸿沟么？

---

① 见 Les Temps Nouveaux 月刊，《克鲁泡特金纪念集》第十六页（一九二一年，三月，巴黎）。

② 见有岛武郎的《克鲁泡特金访问记》（原文载《新潮》），从森户辰男的《克鲁泡特金的片影》书中转引来（东京版，一四九页）。有岛武郎自述道："谈话时，我向他问起关于他的《互助论》的话，他为了要回答我的质问，便把我引到楼上书斋中——他让我坐在长椅上，他坐在旁边，详细给我说明，我忘记了是在英国，也忘记了自己是日本人，更不知道这书斋是在何处，恰如柔顺的小孩在老亲的膝下静听慈爱的训言。"

③ 见 Ishill 编的书中洛克尔的文章。借用诚言的译文。

如果说写《一个反抗者的话》的人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反抗者，那么写《互助论》、写《安那其主义的道德》、写《伦理学》的人又何尝不是呢？实则正如哥尔斯德密斯所说“克鲁泡特金是把他的道德建筑在个人上面，在个人的肉体的与精神的本性上面”，而且又如加巴诺夫所说“只有克鲁泡特金才特别提出了人类人格之进化的广泛的理想……他还论到‘保证个人及其意志的行动之表现有完满的自由’的社会生活之理想……”事实上只有在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中，个人的发意性与创造力才找到真正完满的表现。至于虚伪的个人主义只有促成种之衰灭而已。

八　克鲁泡特金的道德性

这一节只是以上两节的补充。我从那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威的历史家奈特劳那里为我的见解找到了有力的证据。的确克鲁泡特金的道德性是一致的，一贯的。思想家，科学家，伦理学者，革命者的克鲁泡特金是和谐的，是一致的。

日本自由主义者森户辰男在他的论文《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中说过这样的话：

> 我会见安那其主义的博学的学者奈特劳时，曾听到一段可注意的话。……我以下面的问题问他：“照克鲁泡特金特别用英文写的著作看来，他是一个所谓天生的和平主义者，暴力的革命好像是与他不相调和的；请你根据

你平日与他的个人的交际下一个判断。"奈特劳对我的质问，大体以下面的话来回答：第一，克鲁泡特金用英文著的书，特别如《俄国文学》与《自传》，是为着极其保守的美国一般教养阶级写的，为了不致使他们恐惧起见，便完全避开一切露骨的描写，因此，仅仅靠着这些书，到底难窥见克鲁泡特金的全人格，全思想。第二，奈特劳和克鲁泡特金在伦敦会面之际(大概是在本世纪的初年代，克鲁泡特金每周出外练习射击。某一天他抚着枪欢喜地向奈特劳说："一旦俄国革命爆发，我一定马上回去参加，……"①

我对于奈特劳的回答之第一点，甚觉奇怪，故在某一次寄他的信中，曾将此事质问过他，我并引证了一些事实，证明森户所转述的他的话是错误的，——如果这真是他的意见。

奈特劳这样回答我道：

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难道不该一生一世都做一个好人么？一个人能够接收或抛弃一种学说，然而道德性却是生了根的，不能随时抛弃的。因此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任何著作中所看见的道德性，必定是属于同样性质的。

然而克鲁泡特金生活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遇着各

---

① 见《我等》第七卷，第一号(大正十四年，东京)。

种不同性质之公众的，一般的生活，这必然地影响了他的悠长生涯的各时代中之见解。

当他还是一个哥萨克队军官旅行西伯利亚时，他把他的全副精力与热诚完全用在考察上面，为着俄国与西伯利亚的利益——恰与后来他把他的全副精力用在《反抗者》上面；用在“互助”与法国大革命研究上面；或者历在观察合作，集约农业上面；或者更后用在他所理解的欧战的主张上面。……他每做一件事，便专心一意地，极其忠实地做去，然而这种环境的变迁便免不掉使他在悠长生涯之各时代中生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评价，进化等等。

我在我的用德文写的《从蒲鲁东到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1859—1880)[①]中，曾将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八〇年的，详细地讨论过，在以后的一册中还要继续讨论下去。[②]我在我写的德文《邵可侣传》[③]中，也曾将克鲁泡特金的生涯之一部分详细讨论过——这使得我看见他的生活之“节奏”——环境，人格，事实对于他的影响，而且这个又如何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

---

① 《安那其主义的思想史》的第二卷，共三一一页，一九二七年，柏林版。

② 《安那其主义者与社会革命》，《思想史》第三卷，共四〇八页，一九三一年，柏林版。

③ Elisée Reclus, Anarchist und Gelehrter，共三四四页，一九二八年，柏林版。

我相信，以这样的方法，我便发见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间的各种影响使他在那些年代中看见革命的事实，一个民众的革命快要到来了，而且就近在目前了！——这个见解便产生了他写出《一个反抗者的话》当时的精神。

过后，监狱的生活便开始了，这是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五年；在那时期中，他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存在着的，但至今尚未刊行。在我未考察过这著作之前，我不能够断言：这些年代是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年的收场，或是一八八六年起到九十年代或较后一点之英国时代的开幕。接着“俄国革命”及“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之时期就开始了。一九〇五年以前，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及较后一些年代中，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左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时期以及欧战时期（战前及战争当时），及其后的时代。

我确实觉得他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三年之间所抱的，在法国及拉丁诸国，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公社之一切希望都消失了，后来在英国看见了英国的巨大工业组织之奇观，以及关系着战争与海上霸权时在英国常常讨论的粮食问题；又看见英国工人的真正广大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在那里分配合作社之普及，并且他又看见英国的社会党与急进党的人物和环境，在其中（至少在当时）讨论，辩驳，宽容都是极平常的，没有暴力，激情，狂信等等，——上述的这一切不免使他大大地注意到创造的努力及进步之一切形式（只是在志愿的，而非在强迫的路

线上），那么对于单纯的破坏与一个对于自发的改造之多少带点狂信的信仰，他便不十分注意了。

因此这时代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便有了一个不同的性质。他的英国的读者与听众希望被事实与论证所说服，并不愿为热情的话语激动了感情。而且在著作或讲演俄国政治犯的惨苦生活、俄国政府对于革命党人的迫害时，可以多用热情的语句来激励人，然而在讨论安那其主义，搜集材料证明互助、小工业等等时，他便不得不用教育的而非用感情的方法了。

当森户君和我会面的时候（我想是在一九二二年），我还不曾作上述的，特别的研究，然而大部分的事实我是早知道了的。因此我告诉他的话决不能和我现在所告诉你的不同。

如果克鲁泡特金在他的一生的任何时期中，果真遇着一个革命的情形，他一定会是一个极其活动的，非常完全的革命者。他不会在著作上那样努力了。然而这样的革命情形是不曾发生的。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俄国革命爆发时，他还在伦敦；在一九一七年他又老了，而且被欧战问题扰乱了，他虽然回到俄国去想为革命尽一点力，可惜太迟了：因为他所不满的马克思派的革命者已经得势了。

意大利同志波尔基最近在美国出版的意大利文刊物上说过，他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在莫斯科会着克鲁泡特金时，克鲁泡特金曾告诉他，他去见过列宁，劝他不要摧残

俄国合作社，只要利用这个分配的器具——然而没有用，列宁是不听人劝的。

至于你说你读过的关于"练习射击"的文章，一定是我在一九二四年替美国出版的一本书①写的那篇东西，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森户君了，我的话一定会是这样：

在一九〇五年十月，或十一月，或十二月(不会早，也不会迟，因为只有在这几个月内，我才在伦敦；到了一九〇六年十月我又到伦敦，但那时俄国的革命已经完结了)，克鲁泡特金在大英博物院附近住了一两个星期，因为他正在博物院中从事研究。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曾在射击场中练习过一两次射击来服枪，因为他很想知道在长久荒废以后，他是否还能够打中鹄的，他居然打中了，他因此甚为满意，他说如果他回到俄国(已在一九〇五年大赦之后)，革命爆发，需要巷战时，他虽然老了，也有一点用处。……

奈特劳的信函便打碎了奥因和森户的论据，(我想，森户或者受到奥因的文章的影响，也未可知，虽然他们两人的主张并不相同。森户有一个时期还想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来补足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希望"这两个伟大的灵魂互相握手")使我们更加明白地了解了克鲁泡特金的真面目和他那构成他的全人格全著作的基础之道德性。

---

① 就是易缅尔(J. Ishill)编的那本书，一九二四年，新杰穆州版，限定本七十五册。

在克鲁泡特金与安那其主义者或自由社会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像奥因所说的什么“伦理学之差异”。而克鲁泡特金遗留下来的一切著作将永久是我们在正义之恶斗中的指导原理。

1929年6月14日写成，
1940年6月15日改作。

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兄：

对你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我虽然也写过几部小说，被人勉强算作一个文艺工作者，其实我对文艺还是一个门外汉。我第一次提笔写小说时，我只是"为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为了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为了替那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面的牺牲者呼吁叫冤。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做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这是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过的话。我为什么会写出类似小说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我从前读了不少的小说（特别是翻译的），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在寂寞痛苦，心受熬煎的时候，拿起笔想写点东西，就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小说的形式。

自然我写第一本小说时，我心中也并不是空空的。我多少总算有一点计划；我先有了一些事情，后来便有一些人物。我想好书中应该有几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才在实生活里去找寻类似的面貌。最先我想写一个有着许多缺点，但有一颗伟大的心的革命者，我在实生活里去找寻面貌，找到的不只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发表时题为《关于两个三部曲》。

个，我就慢慢地把他们拼凑起来，成了一个新的人。起初我只得到一个轮廓，我又陆续放进一点自己的想象，于是一个人的面目和性格明显地露了出来。这个人就是《灭亡》里的杜大心。他开始在我眼前活动，在我脑里活动，他说话，他愤怒，他爱，他受苦。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仿佛是我的一个朋友。在一个短时期中我的心灵全被他占去了，好像不是我在写这文章，却是他借我的笔在生活。我甚至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那时我每天早晨和晚饭后常在树林里散步），我还看见他在激昂地挥着手讲话，我这样写出了杜大心，我也同样地写出了《新生》中的李冷。这两个人和我的小说里面的人物不同，他们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国革命家的传记）里来的。这样的两个人我在实生活里并没有遇见过，虽然李冷的在N地的日记还是根据一个朋友的狱中日记改写的。

这里叙说的并不是"人物描写法"，只是个人的一点小小经验。我虽然写出了上面那两个人物，但是我写得失败了，不过我想，失败的经验略略讲讲也无妨。

我以后还写了《爱情的三部曲》和《激流的三部曲》，这都不是像样的东西，它们现在还能够存在，那是由于批评家的宽容。似乎有人说过现在不需要这样的作品，其实我自己也就祈祷着它们早一天被淘汰，落进遗忘的墓里去。不过说句老实话，我私心颇喜欢这两个《三部曲》。我知道作品是失败的，但是我深爱那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这些人都不是从我的想象中生出来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是我最熟习

的，而且是我热爱过的。我很了解他们。他们的面影长留在我的心上，二三十年来从没有淡过。有时我一个人坐在静寂的屋子里对着书发呆，他们就会在我的脑里活动起来，像演戏一般地使许多旧事在我的眼前重现。是回忆，是怀念，是惋惜，常常使我的心落在无可补偿的过去的悲剧里再受一次煎熬。热情积起来成了一把火，烧着我的全身。热情又像一条被堵塞了出口的河水，它要冲出去。经过了长久的内心的斗争，决定了再拿笔写小说。这一次是人物，事情，地方一齐出现了。我把这一切组织起来，安排起来。人物是真实的，不过所谓“真实”在这里还有一个界限：我如果拿熟人做“模特儿”，我取的只是性格，我不取面貌和事实。我借重自己的想象，给这个人安排了一些事情，给那个人又安排了另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可能的，却不全是实有的，这里面甚至还有我自己做过的事。我偶尔把个人的经历，放进我的小说里，也只是为了使我的叙述和描写更近于真实，而且我同时还留心到全书的统一性，我极力保持着性格描写的一致。

这两个《三部曲》花费了我几年的工夫。不过我写得很顺利。那些人物，那些性格，我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们说话，他们动作，他们哭，他们笑，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我都可以详详细细地描写出来，我认识他们就像认识我自己。所以写起来我毫不费力。我只要把背景布置好，事情安排好，然后从从容容地把人物一个一个介绍出来，让他们慢慢发展下去。固然是我拿起笔在写，其实倒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在生活。许多事实我以前完全没有想到的，这时也自然发生了。有时我以

前安排好的事情反而无法写在书里，性格的发展使我明白自己想象的错误，我不能把一些不适当的事情硬加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既然让我的人物自己去生活，我在没有遇到障碍时，就索性让他们自由地走他们的路，反正背景是固定的，性格也是有了限制的，他们无论怎样活动总跳不出我的小说的圈子。

我就是这样地一直写下去的。从开始写到尾声，我觉得那些人在我的小说里活起来了。在我看来，他们就同活人没有两样。他们在我的眼前活动，受苦，哭，笑，以至于死亡。我分享他们的一切悲欢的感情。我悲哭他们的死亡。

这几本书永远保留着我的一些熟人的纪念。它们使我的记忆活起来。我在我的小说里找着了那些我最亲爱的人，靠了它们我居然还能够和那些人在一起过些可纪念的日子。我说我喜欢这两个《三部曲》，这是由于我的私人的情感来的。我没有写过一部我自己满意的小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怎样写出一部好的作品。我写了十二年的小说，到现在还只能说是"开始学习"。我实在没有资格被称为小说家。你这次向我征求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可以说是"问道于盲"了。倘使上面的几段话不能算做答案，还请你原谅我，替我把这封信丢进字纸篓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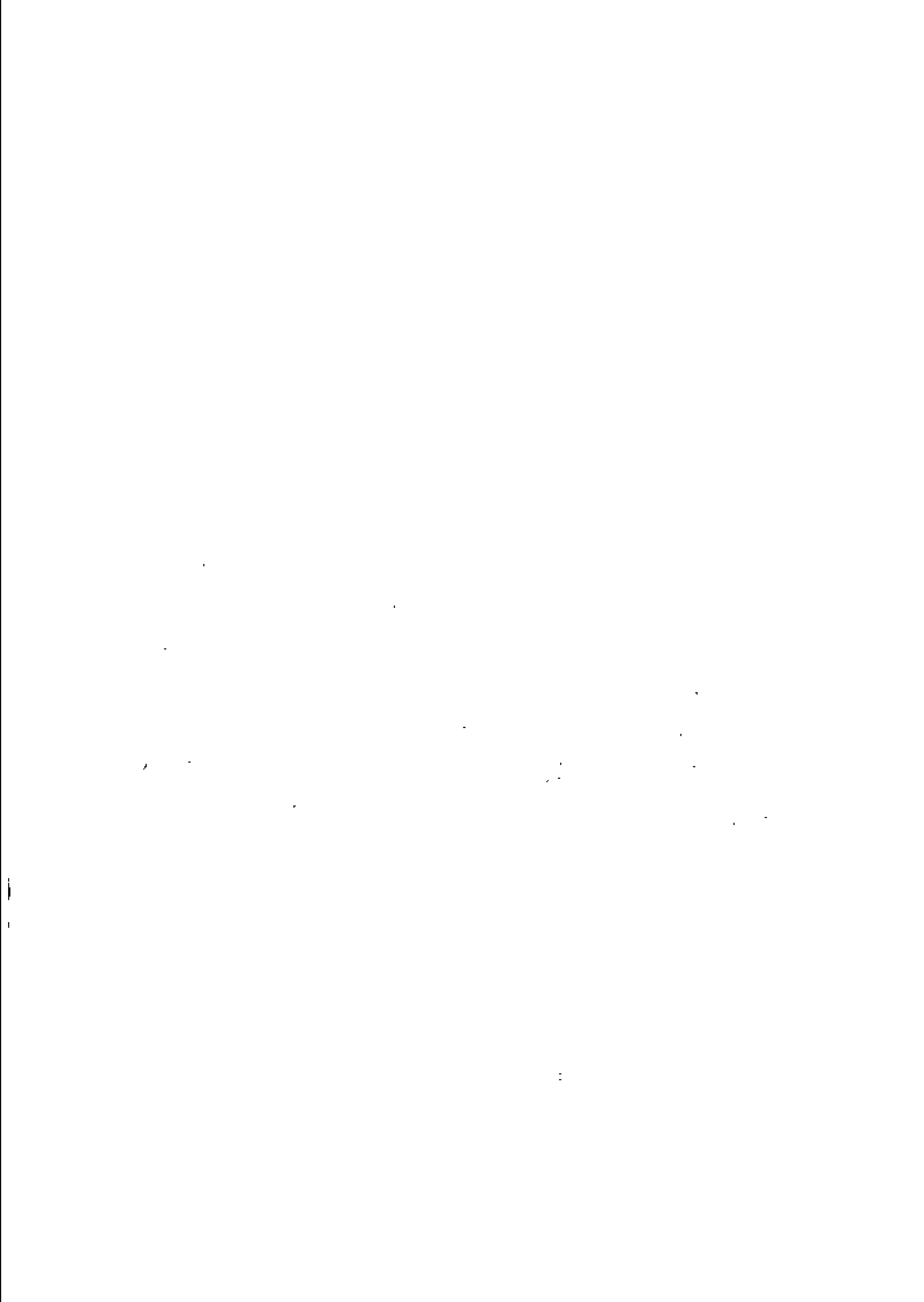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

《悬　崖》[1]（广告）

《悬崖》的主题是“激情”；但在人物描写这方面却和《父与子》相似。在这书中所谓“虚无主义者”马克的描写虽然成了一幅讽刺画，不能与《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相比，但女主人公薇拉却很完美地体现了旧俄罗斯少女的固有的美，成了一个光耀千古的典型，较《父与子》中安娜夫人更为成功。薇拉的祖姑塔夏娜和表兄莱司基也是非常生动的人物。作者使我们跟他们一道笑，一道哭，一道顺着激情的发展生活下去。文章流畅得像水一般。而在一些动人心魄的篇页中，又含有使人颤栗的力量。至于伏尔加河畔优美风景与旧俄地主生活的卓绝的描写那倒是不必提说的了。译笔流畅，且能传达原作风格，堪称名著名译。

---

① 冈查洛夫著，李林译。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一九四三年

一个中国人的疑问*

前天读到赖诒恩神甫的《在西方的山巅上》第二二一、二二二两段，觉得很奇怪。赖神甫说林语堂先生在他的近著《啼笑皆非》中"指出一事，触着许多人的痒处，而又不能反驳的"，这件事便是，许多人谈到"提高生活标准"问题，"林氏问这些人为什么特别关心提高世界生活标准，而忽视了提高道德标准呢"。

林先生的原作我没有拜读，不敢批评。不过单从赖神甫所赞美的这点看来，我对它也不能有什么高的评价了。

"提高道德标准"并不是一句新话，从有历史到现在，不知讲过多少次(这是统治阶级和帮闲阶级所最喜欢讲的)，平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呼吁了，并且实行过多少次，可是并没有多大用处。主要原因是主张"提高道德标准"的人对道德并不了解。

"提高道德标准"这句话就有语病。若说"提高"，则我们的"道德标准"在什么时候降低了呢？现在的标准又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呢？又所谓"道德"是指"道德学说"呢，还是指"道德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十八日《广西日报·漓水》。

方式"？若说"道德学说"，则从古希腊诸哲学家一直到法国的天才青年居友，这中间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完美的道德学说体系，连经济学创立者亚丹·斯密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这方面也有过不小的贡献。至少我们现在还不曾有过比这些更高的体系（并且连蒙昧人和野蛮人也有极高的"正义与邪恶的见解。据罗曼纳斯的记述，非洲的半蒙昧人把鳄鱼当作人类的近亲，称它们做"老祖父"，他们跟鳄鱼往来，彼此都受着原始的正义的概念的约束）。若说"道德方式"，则从原始的蒙昧人如亚柳人，褚克起人等一直到现在自以为最优越的亚利安人，这中间也有着不少很高的道德生活的方式。甚至大多数的动物也营着道德的生活（关于这个，许多卓越的博物学家如奥杜邦、亚查拉、韦特等都有详尽的记述）。此外，我们还有很好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这些宗教的虔诚的信奉者也会遵守他们教主遗下的道德的教训，过着模范道德的生活。赖神甫说："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那些自称为进步的国家，近年来有一种可悲的堕落现象。"我们姑且承认这是真的，不过话里也带了一点谦逊的口气。他没有提到东方，他跟林先生不同，他大概看见自己眼中的刺忘了别人眼中的梁也未可知。事实上，若就一部分人的道德生活的堕落而论，在东方、尤其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实在比在西方厉害得多。这是不用讳言的，犹如求医的人不应该讳病。

既然承认"堕落"，就得承认有过"高"的时候。那么大多数人的道德生活怎样会由"高"降到"低"，发生了"可悲的堕落"现象呢？赖神甫没有说明。可是事实上这问题是很容易

解答的。我以为，道德的堕落便是从大多数人生活标准的降低这一事实来的。救济的方法正是赖神甫和林先生两人所不高兴谈的"提高生活标准"。并且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可以从我个人身经、眼见、耳闻的许多事实证实我这个论点。我并且还可以从书本中找到我的论据。道德的研究早已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伦理学，在大学里也要讲授这一个科目。我们现在要研究道德的由来和道德的目的，并不是一件难事。关于感情的起源，从古希腊以至现代的一般哲学家研究的结果，可以分作两大学派。一派主张，这是由上天启示给人的（因此他们常把伦理学和宗教连在一起）。另一派在人类自身中看出了道德的起源，他们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的主要原动力，就是那个有人叫作"快乐"，有人叫作"福祉"或"幸福"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给人以最大的快乐或欢喜的东西。我们若研究近代道德学说的发达，更易看出这样的区别。近代道德学说的两派：一是功利论者，他们在社会的和个人的利害的考量中看出了道德的起源；一是直观派哲学家，他们以为道德是一种本有的、固有的神秘的力量。前者至小弥尔而完成，后者到康德而达于极致。另外还有一派便是进化论者，达尔文是其最有力的代表，他的结论是：一切道德都是从"社会本能"这个共同的泉源出来的。我们现在分别研究这三种说法。根据康德，则"我们依照道德的法则行为"是服从"至上命令"，这个在我们自身最深处存在着的神秘力量。小弥尔却以为全部道德学说可以建立在一个根本原理上面——就是对于最大的幸福的追求，根据功利论者的说法，我们遵行道

德是在寻求给我们以最大满足的东西，避免给我们以痛苦的东西。另一个功利论者边沁还制定了一种“快乐之等级”和一种“痛苦之等级”。他以为，道德的行为是一个正确的计算，不道德的行为是一个不正确的计算。人总是追求他个人的快乐，他个人的利益，人也会为了未来的更大快乐牺牲目前的快乐。达尔文则认为，道德意识是从社会的感情得来，这种感情是本能的，为下等动物所固有，人类也有的。他又说：“无论何种动物，只要它赋有显著的社会本能（亲子之爱也包括在内），当它的智力发达到跟人的智力一样，或者相似的时候，它必然会获得一个道德意识或良心。”“社会的本能是永远存在，永远持续的”，它可以“战胜那些较不能持久的本能”。由这种本能渐次发达便成为人类的道德。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认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与动物的道德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道德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一，同情；二，正义；三，大量（包括自己牺牲）。前两者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第三个阶段却是只有人才可以达到的。人先有社会本能，同情和互助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义务的；由社会本能再发展为正义与公平的概念，这个阶段也是义务的；最后由正义发展到大量、慷慨、自己牺牲，这个阶段却不是义务的，而是可愿望的了。居友认为“世间有一种不能与生存分离的大量，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会死亡。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之花”。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则道德的由来不外乎这三者：“至上命令”，“最大幸福的追求”（或功利的考量）和“社会本能”。要是我们承认“至上命令”，则无须乎用外部力量去压迫人或鼓

鼓舞人遵守道德,并且亦不可能。要是我们承认"最大幸福的追求",则违反人的利益与幸福去提倡道德,绝不会有效果。要是道德能给人好处,则已有的道德标准不会降低。要是我们承认"社会本能",则那个本能"软化而让步于其他的本能"(达尔文语)时,绝非一些"计划"、一些空言所能挽救的。总之,若见到"可悲的堕落现象",便去"提高道德标准",这等于中国一句老话:"缘木求鱼",毫无用处。

我自己是相信进化论的道德学说的。我们还可以说它把直观派、把功利论二者都包含在内。把康德的"至上命令"换成"社会本能",在"幸福的追求"外添一个"社会本能"和道德发展的三阶段,则都和进化论的伦理学相似了。我们过道德的生活,是受着社会本能的指使,可是这样做,对我们自己也有利,我们永远追求着幸福和满足。不管我们怎样做,做什么,或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满足,或是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或是甘愿为着某种更好的事物舍弃目前的欢乐,我们都是向着在一定的时间会使我们得到最大满足的方向做的。一个道德哲学家说:"事实上如果道德生活会使人得着不幸,那么世间的一切道德都消灭了。"这是不错的。道德必须给人利益,人们才遵守它。连宗教也得先给人们种种的预约,佛教有"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有"天国"。为什么要有这酬劳的允许呢?为什么要有"地狱"的威吓呢?单是"爱的福音"不能改造世界么?在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有赖神甫所说的"堕落现象"?为什么基督教的两大基本原理——"平等"和"对于危害的宽恕",会被中世纪

教会所反对，为什么到现在它们在一般信奉者中间会成为具文？为什么这个人神，这个伟大的道德教师的"山上垂训"常常会被忘记，而单是仪式神话，天国的传说，却普遍地存在着呢？

我们现在应该明白道德的目的是什么了。保身和传种是人类同一切生物的两大本能(生物学家这样告诉我们)，而社会本能(道德的泉源)不过来辅助它们发展。道德必须帮助维持生存，求得最大的幸福和繁荣。人类活着除了维持生存，发挥力量，追求、创造或实现全体的幸福和繁荣外，还有什么呢？完满的生活是人类共同的目的，道德的存在即是为了帮助人类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世间绝无对人无利的道德，亦无教人求死的善行。犹如没有一个宗教家会宣传善人堕入地狱、恶人登上天堂。或在目前，或在将来，或在来世，却总不脱幸福与满足的范围。完满的生活、幸福、满足——这不是一种高的生活标准还能是什么？难道"生活"、"幸福"、"满足"这些字眼里就没有精神的成分？难道"提高生活标准"就是像赖神甫所说"使人民有……更多的金钱"？而不是提高到一种与我们的正义的观念相合的生活？(我们从古希腊以来甚至从蒙昧人以来，就有了够多的正义的观念)。我们是理性的动物；我们需要理性来判断。既说"人民"，当然指大多数的人，对于他们，的确应该把生活的标准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工做这五点。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意大利鱼贩子说过："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

明。”这是一个平民对提高生活标准的呼吁。谁能够反驳他的话？这简单的话语里面不是闪耀着爱与正义的观念么？这不是人类追求的目的，这不也是道德的目的么？事实上教育普及、生活安定，各人在自由的空气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全体谋福利，那时即使没有人出来讲道德，说仁义，没有人出来“提高道德标准”，也不会发生堕落的现象的。

现在再回来说堕落的现象。我在前面说过，姑且承认赖神甫关于道德堕落的话是不错的。事实上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据我所知，“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可悲的堕落现象”，那些国家的大多数平民至少还能够维持跟赖神甫和林先生所遵守的一样的道德标准。我们也用不着降低自己民族的身份去奉承另一种民族(同样我虽承认在中国有着比较严重的堕落现象，但我得声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至今还遵守着旧有的道德)。赖神甫也用不着请林先生去计划提高英国人的道德标准。作为一个信奉爱的福音的神甫，赖神甫应该注意的倒是“提高生活标准”的问题。这在目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战后，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过了这样的大战事、大残杀、大轰炸、大饥荒以后，复兴工作的第一步应该是“生活问题的解决”，人第一需要食粮，然后才需要别的。对挨冻受饿忍苦的人民空谈“道德标准”，这是奢侈，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这里面没有同情，没有爱。先帮助他们解决这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达到平均的标准，才是道德的行为。至于自己不做并且反对别人去做，那就是罪恶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漠视在德国占领区的普遍的饥荒呢？我

们有什么理由忽略德国征服者那种减少人口的饥饿政策的后果呢？现在欧洲被征服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标准已经减到无可再低的了(我们应该特别提出波兰、捷克、比利时、法国等)。在中国大部分的沦陷区里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在抗战的中国，虽然也有不少发国难财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虽然在桂林也有“梅蕙丝”、“梅尔勒奥伯浪”一类人开设着漂亮的咖啡店慰劳盟友，可是大部分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连最起码的生活也过不了。教书的人不能供给自己的孩子上学，大学生被逼得偷蕃薯给人枪杀，在有些县份里人卖儿卖女以求餬口，我自己亲眼看见无数的同胞(这里面有我许多的朋友)一天天瘦弱下去，对我们这些同胞，赖神甫将说些什么呢？对欧洲波、法、比、捷等国的亿万饥民，赖神甫将说些什么呢？对集中营里无数的人质和战俘，赖神甫将说些什么呢？他们不再需要道德，因为他们的道德标准从未降低过。他们需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过着一个人应该过的起码的生活。他们有着过这样的生活的权利。并且事实上到了某一个时期他们会起来自己争取的。要是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是最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生活标准不提高，那么纵使有千百个道德的教师，计划出千百种“提高道德标准的办法”，也“决不能产出一个较良的世界”。撇开大多数人的幸福和痛苦来谈道德，等于抓起一具枯骨来硬给他装上一个灵魂！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薄的见解。因为赖神甫说过“那不能反驳的”。我只好把这篇小文称作“疑问”了。我在题目上加

了“一个中国人”这些字，在抗战的六年半中间，我始终跟我的同胞在一块儿生活。我同他们一起欢呼过，也跟他们一道受过苦，我有权利在这里用中国人的名义讲话。

什么是较好的世界*

——质赖诒恩神甫

赖诒恩神甫的答复很使我失望。他不仅没有正面地回答我那些疑问，他甚至用一句简单的话巧妙地卸去他在《山巅上》发表议论所应负的责任。作为"宗教的仆人"，赖神甫的这种态度未免有点不光明了。

我现在再把赖神甫的《山巅上》二二一节原文的要点和我的疑问的要点提出，希望他对自己的议论给一个解释，对我的质问给一个答复。

赖神甫在《山巅上》告诉我们，林语堂博士在《啼笑皆非》中指出了一件事，许多外国批评家谈到提高世界（尤其在中国）生活标准，"林氏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特别关心提高世界生活标准而忽视了提高道德标准呢？"（赖神甫原文）。赖神甫武断地说：这件事"触着许多人的痒处，而又不能反驳的"。他更说："林语堂博士说得好，提高道德标准比别的事情更重要。"他并且认为"这是不幸而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许多西方国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广西日报·漓水》。

家，包括那些自称进步的国家，近年来有可悲的堕落现象”。

这个“不能反驳的”的武断激起我的愤怒。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有权利对赖神甫写出我的疑问，我的良心要我这样的。

我的疑问的要点有六：

一，就一般来说，就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道德标准并未降低，并且从古希腊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很高的道德学说的体系，从原始的蒙昧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但是他们也过着相当高的道德生活。）到现在自以为优越的亚利安人，这中间也有不少很高的道德生活方式。此外我们还有很高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等。……我们为什么要提高道德的标准？又所谓“提高”究竟要高到怎样的程度？

二，若承认世上有“道德堕落的现象”，而且是普遍的，则挽救的办法是提高生活标准（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而不是提高林博士和赖神甫的生活标准），因为生活标准确实“降”得很厉害，而道德堕落的现象便是从生活标准的降低来的。为什么要反对提高生活的标准？（从赖神甫的文章看来，林博士是反对提高生活标准的。）

三，就道德堕落的现象论，则在中国比在西方厉害。可是甚至在中国，这种现象也只是在一部分人中间发生的。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够维持跟赖神甫、林博士所遵守的一样的道德标准（虽然他们的生活标准低得多）。在西方更不用说，堕落的现象也是并不普遍的。现在成问题的倒是生活标准的降低，尤其是在中国，可说差不多低到无可再低了。为什么不提

高呢？

四，从哲学、从生物学，从人类学等观点看，道德是为了帮助人类谋幸福、发达与繁荣而存在的。道德必须于人有利，世间绝无加害于人的道德（道德的基础是爱、同情、互助。从动物间的亲子爱到我们的同胞爱，道德的发展所经过的再没有别一条路）。宗教家也说，善人登天堂。道德的目的便是帮助人类达到完满的生活。这完满的生活可以用意大利凡宰底的一段话来解释："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这是人类要求的共同的目的，这便是提高生活标准的意义，这是道德本身。为什么撇了道德本身，而谈提高道德标准？

五，提高生活标准在目前是严重的问题，在战后更是严重的问题。在纳粹铁蹄下的欧洲沦陷区和在日寇魔掌下的中国沦陷区，多数人民的生活悲惨到了极点。他们需要过得好一点，至少过得像人一点（在抗战中的中国，一般人也过得相当苦，也盼望着早日改善）。他们不需要人去提高他们的道德标准，因为他们并未堕落，至少我们不能说他们堕落。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不热心谈论这个问题时，赖神甫以为林博士应该责备他们，并且要他们先去提高道德标准呢？

六，因为赖神甫是"宗教的仆人"，我便问他：为什么基督教也有"天堂"的预约？为什么在那些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国家中会有神甫所说的堕落现象？为什么基督教的两大基本原理——平等和危害之宽恕——会被中世纪的教会所反对？为什么那个伟大的道德教师耶稣的"登山宝训"在一般的信徒

中间会成为空文，而仪式和天堂的传说却普遍地存在呢？（在法国小说家尤敬·西的小说《巴黎的神秘》中有一个场面描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责备基督对人们过于仁慈的过错。俄国小说家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卡拉玛左夫兄弟们》中也有跟这类似的场面。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存在最久，直到一八〇八年才被法国军队所毁。在三百二十年中间，因不信仰宗教而受审判的人在三十四万以上，其中三万两千人被焚死；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受着用“肖像”代替“肉身”的火刑；二十九万一千四百五十人受着种种的拷打。法国的宗教裁判所废于一七七二年，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废了又重建起来，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的中叶。这是宗教统治的成绩。这是撇了爱、撇了人民的幸福来谈宗教的结果。）

对于以上的六点，赖神甫完全没有答复。他整篇文章只支持一个论点：道德标准的改善“比使人们暖衣饱食为更基础的需要”，他并且认为“这话殊无证明的必要”。（他又在这里把“生活标准”改作“生活程度”了。事实上这两个字眼的含义是不同的。谁愿意提高“生活程度”呢？）

这不是答复，也不是解释同发挥他的论点，这只是固执己见罢了。不过我们的问题还是应该辩明解答的，因此我要再向赖神甫请教一次。

现在我们问题的要点还是在这三层：一、为什么“提高生活标准”的主张和努力应该受着赖神甫和林博士的斥责？二、为什么在大破坏之后，人们不应该先去尽力于复兴的工作，却要埋头去干那无补实际的道德标准？三、所谓宗教的精髓和道

德的基础的"爱"字究竟是空话，还是应该表现在行为中？

战后复兴的问题关系着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我们只要睁大眼睛看一下：在这大战争中许多的人死亡，许多的房屋成为废墟，许多的农田荒芜，许多的工厂专门制造战争武器，许多的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还有遍欧洲大陆的粮荒，和在暴力下实行的强迫的移民。……自然，直到今天人类中的精英还在"为了生存的问题"互相毁灭，一切复兴的工作在目前还是不可能。可是有一天胜利来临，和平恢复，人民回到残破的家中坐下来，看看自己的周围，那时候他第一件工作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必请教书本，求助宗教，也可以知道他要在废墟上重建他的住宅，耕种他的荒芜的田，养活他一家人。在这以后他才有余力来谈道德的问题。这是很自然合理的事，倘使有一个神甫跑去阻止他重建房屋、耕种田地，却对他说："你应该使你自己变得更好，你应该牺牲，你不应当先来建造房屋、耕种田地、养活一家人。"这倒是不近人情的举动了。这里面没有爱和同情，只有约旦河施洗者的威吓和警告，这甚至还与耶稣的教训与行为相反，耶稣实际上是一个最有人性的人神。基督教在罗马势力的摧残下能够发展，就全靠了这一点人性。（基督教当时是以反抗富人堕落之贫民的新宗教这个姿态出现的。它提倡对受压迫的牺牲者之爱来代替对一个复仇的上帝之恐惧和对体现自然界恶势力的人格化的神之恐惧。它的道德教师不是一个复仇的神，不是一个僧侣，也不是一个知识阶级的思想家，他只是一个平民，一个简单的木匠，它的最初的信从者里面并没有罗马人。）那个道德的教师不让人们用石头

打死一个行淫的妇人，却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并没有拉住她作一番道德的说教。对抹大拉的马利亚，他还让她吻他的脚，并且对她说："你的信念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为了回家的浪子，他赞成父亲宰杀他的肥牛犊。对钉十字架上的盗贼，他还说："今天你要同我在天堂里了。"这不是深厚的人性的表现么？

个人的问题还是容易解决的，更严重的倒是民族和人类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一个人自己饿死是平常的事，可是没有谁能够睁着眼睛让一个民族毁灭，甚或全人类走向死亡。所以战后复兴工作是必需的。残毁的房屋应该重修起来，田地应该大规模地耕种，工厂应该改换工作和生产品的种类。教育应该普及，残废的人应得着教养，最重要的两点：贫乏应该消灭，愚昧应该扫除……这种种问题对人类的前途能给与世界的和平有极大的关系。这绝不是宗教所能解决的。宗教能给人以心灵的慰安，却不能满足人的饥饿。要"祛除贫乏"（赖神甫语）必须先使生产增加，分配合理。犹如战后灾民的供养，疫病的预防。必需品的分配，必须靠科学的技术的工作和精确的计算。单是好意不能完成什么事情，犹如单是善心绝不能治人重病。事实证明出来，暖衣饱食的确比道德的改善"为更基础的需要"。林博士忘了一句中国古话："衣食足而礼义兴"。古圣一言一动均有所依据，从不信口开河。直到现在又何尝有过"礼义兴而衣食足"的事实？赖神甫和林博士未免把事物的秩序颠倒了。

赖神甫向我们侈谈"走向较好的世界"，什么是较好的世

界呢？我敢问一句，在“较好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应该人人都有衣穿、有屋住、有饭吃、有工做、有书读呢？倘使赖神甫否定我这个论点，那么我可以想象到：许多衣不蔽体、面黄肌瘦、认字不多、走路无力的人在啼饥号寒之余，到礼拜堂或者公共集会地方去听一番道德的教训，虔诚地表示愿意遵行，走到街上看见大人先生、神甫博士饱食暖衣从容过市，彼此含笑、互相祝福，然后客气让路。人人信仰宗教，大家相信未来。这是不是较好的世界呢？礼义兴了，万人信仰宗教了，可是这个世界里还缺少一点东西。不幸，那却是最重要的东西。

赖神甫愿意称自己为“宗教的仆人”。可是作为宗教的仆人，他的职责并不单是奉主的名传道。耶稣自己在“登山宝训”中说过：“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是仁爱的主的声音，也正是对他的仆人们说的。或者准备跟他走进天国，或者离开他去吧——在宗教的仆人面前，再没有第三条路。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写文章了。将来有功夫时，我倒想谈谈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教会。）

一九四四年

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一封信*

——致《广西日报·漓水》编者

编辑先生：

今天读了赖神甫的“再答”，我说过关于“道德与生活”的问题我不再写文章了。并且赖神甫的“再答”与我的“质问”根本不生关系，他似乎没有读懂我的文章，甚至没有抓住我的“质问”的要点（我明明列举了六个），我这次对他提出“质问”，并非故意说着不相同的话，使世界热闹一点，也并非玩着笔墨游戏，开什么“笔战”。我只是说出我对大战后复兴工作的一点意见。赖神甫始终避开我们的根本问题。他所反对的、所讥讽的那些意见，那些话，全不是我的，甚至是与我的意见、我的话多少冲突的。我至今还是主张，这次大毁灭的战争中应包含着建设的工作（事实上是有的）。所以战争停止和平到来时，就应该“先”使一般人民的衣食住和教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因为在这次战争中一般人（尤其是在欧洲沦陷区和一部分中国沦陷区中）的生活标准实在降得太低了，而他们的道德标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广西日报·漓水》。发表时题作《巴金先生致编者——关于“道德与生活”问题的一封信》。

准却并未降低过。美国运粮接济法、比沦陷区的人民这是很正当的措施。关于流亡人民的救济，各处都有专门的组织来做这种工作。在战后这种工作更是严重。因为这是空前的大规模的战争，将来复兴的工作也必是空前地困难的。倘使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个工作，则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幸福绝对无法实现。赖神甫不赞成这个主张，他以为"道德的改善比人民饱食暖衣为更基础的需要"，他以为应该先把道德标准提高，然后才来谈衣食住等的问题。他并且认为这件事"是无可反驳的"。我不了解他的立论的根据，要他说出"无可反驳"的理由来，他却始终没有说明，反而怪我讲了许多离题太远的话。事实上讲离题话最多的倒是他自己，他在"再答"里面讲的差不多全是离题的话，譬如"财富与廉耻心何者较好？"对一般人，这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一生连梦也梦不到财富，却有了够多的廉耻心。而且这与战后的复兴工作并无关系。我们没有权利拿这问题去问欧洲的饥民(中国的也在内)。譬如，说沦陷区人民的道德问题，我比赖神甫还说得更早：他们的道德标准始终没有降低。

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过，就"大多数人"而论，则我们的道德标准现在并没有降低，用不着提高。只是生活标准降得太低了，提高的需要倒是很迫切的。赖神甫倘使不回答这两句话，则他对我的一切答复都是"离题太远"。

不说了，这封信希望你在《漓水》发表。

巴　金

读《两个标准》*

一

赖诒恩神甫的"再答"使我失望，我承认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可是我却抓不住他的要点。赖神甫花费了那么多的笔墨，企图回答我以前对他提出的六个问题，并且解释他自己提出的三点。结果他全没有办到，他还只是抽象地谈他的"道德标准"，他甚至没有较为具体地告诉我们他那"两个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不但没有提供新的，他连我们讨论的要点在什么地方也始终没有找对。因此我虽然说过"不再写文章"的话，现在也不得不提起笔写几句来提醒他。

说到我们辩论的要点同我自己的主张，我在给副刊编者的信(一月六日《广西日报》)里已经说得很明白：

> 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过，就"大多数人"而论，则我们的道德标准现在并没有降低，用不着提高。只是生活标准降得太低了，提高的需要倒是很迫切的。赖神甫倘使不

---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广西日报·漓水》。

回答这两句话，则他对我的一切答复都是“离题太远”。（“离题太远”四字是从赖神甫的文章里借来的。）

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声明我们谈生活标准、谈道德标准，都是就大多数人立论的。事实上我们不能拿少数人的言行代表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这一层赖神甫也知道。那么要是赖神甫不能指出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的降低，他便无法证明提高道德标准在目前比提高生活标准更重要。

二

我们再看关于“道德标准的堕落”，赖神甫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明”。

一、他说：“公私生活上不诚实的增加，傲慢与残忍的增加，家庭生活的堕落。——这就是目前道德标准堕落的证明。”

二、他认为战争的发生也是由于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但除非世界的道德标准是被提高了，否则战争会再降临，使他们的命运比以前更坏。世界上的道德标准假如有了最后的改善，也会减少给不幸的人民带来新战争的危险。”

三、此外他常常提到“个人的自私心”，譬如他说，“贫困的起源不是财富的偶然，而是其他人的贪婪和自私。”又说：“改造社会的梦想永不会实现，因为对于公共利益的梦想，在过去常常会被毁于个人自私心的礁石上。”他甚至把一切罪恶都归罪于自私，说“使全世界受难、压着无数人在仅能餬口的

生活水准下的是它”，造成奴隶制度的是它，“给无辜的人民以战争的恐怖”的也是它。

但是他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把少数人的行为来代表多数人，因为大多数人至今还是在艰苦的生活中挣扎，他们并没有做过什么违反道德的行为。（他们并没有不“尊重诺言”，并没有做过不诚实的生意，“政治的腐败”与他们无关，他们也没有“欺凌弱者”，他们也没有“不尊重婚姻诺言的神圣”，也不曾有过“放荡的性行为”，也不是不留心儿童的道德教育。）这是中国的农民，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和许多的人。他们遵守的道德标准并不比赖神甫遵守的低。至于少数人的堕落，我在第一篇文章里面就谈过了。

第二，他把我们这个世界看得非常单纯。他认为一切罪恶，一切败德，一切痛苦都是由“个人的自私心”来的。可是这“自私心”从什么地方来？天赋的还是学得的？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三，他信口开河，不要立论的根据。譬如他把战争的发生归罪于道德的堕落，却没有用事实或理论来证明他这个“信仰”。

因此他始终没有能把我的“世界道德标准并未堕落”这个论点推翻。

三

我们再看“生活标准的降低”这一个论点。

关于这个，赖神甫承认他同意我的主张。他并且说：“在

一些地方，它已低落到可怜的程度，在另外一些地方和在某阶级间它一向就是低得可悲。”

那么赖神甫还有什么理由说，提高道德标准比较提高生活标准更重要呢？

的确，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就坦白地说："我从没有反对过生活标准的提高，相反地，我曾主张并且承认它的重要。"又说："我只能再声明我从未说过提高生活标准是不对的。"

但是，赖神甫自己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山巅上》里明明说过这样一段话：

> 林语堂博士近著《啼笑皆非》……指出一事触着许多人的痒处，而又不能反驳的。他论及许多人所谈"提高生活标准"问题，这是外国批评家对中国贡献那么多所谓有用的评论的论旨。林氏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特别关心提高世界生活标准，而忽略了提高道德标准呢？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高谈道德的赖神甫竟然忘了一个最普通的道德教条——诚实么？事实上他已经否定了他自己的话。那么我写第一篇文章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一部分了（赖神甫又说："在原文中提高生活标准的问题……是指一些爱吹毛求疵的人的批评，这种人说像洗澡间、汽车和冷藏箱之类的东西在东方是不够多。"可是《在山巅上》和以后的那篇文章里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其实汽车、洗澡间之类，要是在东方普遍地使用，让大多数人都享受到它们的便利，这也不是一件坏

事，与道德并不违背）。

四

现在他退一步承认“提高生活标准是必需的”了，不过他还说：“但同时提高道德标准根本上比较重要。”这个“比较重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这个“断定”的立脚点在什么地方？我在《两个标准》里面简直找不到。他只是概念地说了这类的话：

> 我相信他宝贵公正与荣誉甚于宝贵物质的东西。
>
> 人不是机器，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作同一模型制造出来的东西：他们不会自动的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和愿望。他们是有个人的愿望和意欲的动物。而这些愿望和意欲是要用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把它控制住。

在《走向较好的世界》里他说过：

> 我宁愿一个国家里的人都是善良的，而不愿他们是富足的。
>
> 今日世界上这些东西的需要改善，这话在我看来殊无证明的必要。它们的改善比使人们暖衣饱食为更基础的需要。

在《何者较好》里他又说：

> 当我说人类和其行为及生活中应该廉正诚实比他们

应该富足为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假如沦陷区内的人民完全不顾及道德价值，他们大可以做汉奸以改善其生活状况。

这些并不能证明"提高道德标准"的"比较重要"。神甫说："殊无证明的必要"，可是事实上我们讨论一切问题，提出一个论据，要是不用"证明"，那么谁都可以信口乱说，哪里还有是非呢？

赖神甫说，他宝贵什么，他宁愿什么，人类应该怎么做，倘使他没有学理与事实的根据，那么这些只是他一个人的梦想了，我用不着去管他。他提起沦陷区内人民不做汉奸的话，只能证明沦陷区内人民道德标准已经很高，因为他们已经"自动地"做到了赖神甫认为"人不会自动地"做的事情，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了他们自己的幸福和愿望。他们已有了赖神甫所说的"很大的力量"。对他们提高生活的标准倒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剩下来的只有一个论据："人不会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和愿望"。这大概就是他常常说的"自私心"吧。可是他这个唯一的立足点实只是一个荒谬的假定。事实上，不说是人，就是昆虫、飞禽走兽也常常实行牺牲的。为着一个蚁巢的利益，或为着一个鸟类集团、一群羚羊、一队猿猴的安全之自己牺牲乃是自然界极普遍的事实。一个生物学家说，这是"一个在自然界中每天发生的动物学上的事实"。俄国动物学家凯斯勒说过："各种动物——尤其是各纲中最进

化的物种，总是实行互助的。”另一个生物学家说：“当我们在动物的各纲中，从本纲的下等代表者研究到高等代表者（如昆虫类中之蚁、黄蜂、蜂；鸟类中之鹤、鹦鹉；哺乳类中之高等反刍类、猿、人）我们便会发见在那里面“个体与集体的利益之一视同仁”，有时甚至发见“为集体利益的自己牺牲”的事实……。我在我第一篇文章里就引过达尔文的话，说：道德意识是从社会感情得来，这种感情是本能的，为下等动物所固有，人类也有的。他又说：“社会的本能是永远存在，永远持续的。”他解释这种本能说：“那些使动物从它的同伴的社会中得到快乐，感到对它们的某种程度的同情，并且为它们去做种种的事务之本能。”现在我们至少还没有论据推翻达尔文的学说，决不能随意把它抹煞，毫无根据地强调人类的自私心，断定人不会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愿望。（我随便举出几个例子、蚂蚁的“胃内分食生活”〔福勒尔〕，白尾鹫的“会食”〔谢威尔左夫〕，知更鸟哺养戴菊鸟的幼儿〔歌德对话录〕，冠凫被希腊人称为“慈母”，鹤类与邻种动物实行互爱，蒙昧人与野蛮人的共同生活的方式，自然力的征服，中世纪自由都市的光荣的历史，现代人的互助的组织，科学与艺术的伟大的成就等等……）

这样，赖神甫的最后一个论据也不能成立了。

五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他对我六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当我们谈到提高道德标准的时候，和我们发生关系的便不是理论

而是实践了。"他认为我说道德标准并未降低时，我举出的只是些道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过："从原始的蒙昧人(如亚柳人、绪克起人等)一直到现在自以为最优越的亚利安人，这中间也有着不少很高的道德生活的方式，甚至大多数的动物也有着道德的生活。"第二篇文章里我又说："蒙昧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可是他们也过着相当高的道德生活。"可是我并非只谈理论。我知道赖神甫的意思是，现在许多人受了狭义的利已心的支配，做着违反道德的行为。但我在第一篇文章就说过：这只是少数人的堕落，大多数人能够遵守旧有的道德标准。赖神甫如不能证明大多数人确已堕落，他便无法推翻我的论据。

二、三、赖神甫在《山巅上》确实表示过不满意别人高谈提高生活标准，现在他既然否定了自已的话，我不必再谈这两个问题了。

五、关于沦陷区的问题，我在给编者的信中已讲得很明白。

六

现在还剩下第四和第六两个问题。这其实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赖神甫却认为与本题无关，甚至控诉我"离开了原来的辩论点，而对道德及生活标准作一般性的辩论。但甚至这样，他的问题也不是逻辑的或基本的。在答复他的时候，我也被迫离开本题"。

他真是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我头上来了。

他以为我们的讨论只限于"两个标准"。事实上我们的问题的要点却在这标准本身跟它与生活的关系。道德是不变的，它的教条，它的标准却常常因时代、地域或种族而改变。(我本可以举出许多实例，不过为了避免赖神甫再说我"渊博"起见，我不想在这里"罗嗦"了。)倘使我们不弄清楚道德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能够谈它的标准？赖神甫以为我同他辩论的只是"两个标准的孰高孰低"，其实我所争的却是这一点：道德并非脱离人类生活而单独存在的。人没有"为道德而遵守道德"的义务。道德是为了帮助人类谋幸福，求发达与繁荣而存在的。人类的完满的生活便是道德的目标(我引了理论与事实来证明)。我还解释"生活"这个名词也包含着精神的部分。我甚至说过："难道提高生活标准就是像赖神甫所说'使人民有……更多的金钱'而不是提高到一种与我们的正义观念相合的生活？"我想"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这是一个卖角的意大利人说的话。我说过这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的。这便是生活标准的意义。我的意思非常明显。可是赖神甫却认为"这是很混乱的推论"。他甚至武断地说我的论证是"道德就是以善为目的的意向"。凡宰特所建议的目的是善的，所以构成道德。因此我们不需谈道德，只求达到这目的便可。

我请问赖神甫：我在什么地方说过"道德就是以善为目的的意向"这样抽象的话呢？我又在什么地方说凡宰特"所建议的目的是善的，所以构成道德"呢？我引凡宰特的话不过用它

来比较具体地解释什么是理想的生活，因为我说过道德的目的是在追求人类的幸福、发达、繁荣，也就是人类的完满的生活。我素来就不高兴用"善"这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个字太抽象了。一般人都把合于道德的行为叫做"善"，要是不先把道德这个东西弄清楚，只说道德的目的是"善"，岂不是等于没有说！……

赖神甫始终没有讲明白道德是什么东西，道德的目的是什么，他却只谈道德标准，并且连道德标准也没有讲清楚，翻来覆去谈的也不过提高道德的标准的重要罢了。他在《两个标准》中提出的三点都是枝节问题，但我在这文章的前面一部分中也已驳斥过了。究竟谁离开本题，读者自然会知道。我总结地再问他一句：先不把道德本身讲明白，他怎么能站住脚跟！

七

赖神甫的文章东拉西扯，左弯右拐，叫人抓不住他的中心点。因此我也只能一段一节地回答他。但是现在我也接近我的结论了。我要来谈谈我那第六个问题。

赖神甫一则说那是"算学或历史的问题"，再则说它"不是逻辑的或基本的"，三则说它"离题太远"。

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中，我列举政教分离的天主教教会所统治的国家里面宗教裁判所的存废。以及他们所烧死和拷打的不信教的人的数目来证明一件事实，这是撇开了人民的幸

福来谈宗教的结果。

我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赖神甫说过：

> "……这正是西洋宗教领袖所要问的话。他们的计划较政治家的更为繁杂，因为法律不能制定道德。"(《山巅上》)
>
> 又说："至于提高道德标准的方法……我不妨在此地提出我们的以历史的例证及个性为根据的信仰，就是这只有通过宗教始有可能。"(《走向较好的世界》)
>
> 现在还说："假如有人问我道德标准怎样能够提高，我只能指出经验，它显示了没有宗教，德性是不能长久旺盛的。"(《两个标准》)

这才是他的基本的论点。但是我用了那个算学和历史的问题把它推翻了。历史是一个残酷的审判官，当时那班西洋宗教领袖讲的话跟赖神甫现在所讲的并没有两样。可是到了他们得到多数人民的信从以后，他们却利用他们的势力来残杀异教，阻碍进步。赖神甫难道能够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不是虔诚的信教者？黑暗时期的教会领袖不是"宗教的仆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提高道德标准，反而接连制造残杀拷打的惨剧？

我相信赖神甫回答不出这个"为什么"的。因为那原因正是我在第六个问题中所指出的：撇开了人民的幸福来谈宗教。结果呢？结果——不是毫无用处，便是回到宗教裁判所去！甚至赖神甫也不能够抹杀历史的教训！

《柔蜜欧与幽丽叶》[1](广告)

《柔蜜欧与幽丽叶》是一部伟大的典型的爱的悲剧。也是青年莎士比亚的抒情诗。

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蓝天之下，在风暖花香的南国月明之夜，在互相仇视的两个古老贵族家庭环境中，展开了热烈，坚定，强烈，不幸的爱，唯其热烈，所以它冲破了一切藩篱；唯其坚定，所以它在幸福和死亡之间找不到一条中间的路；唯其强烈，所以它把两颗年轻的心永远系在一起；唯其不幸，所以爱的陶醉之后紧跟着就来了死亡。德国戏剧作家勒辛格说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由爱本身完成的悲剧。

德国革命诗人G.郎道埃尔则赞美说不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民族、任何阶级，这都是永远年轻，永远活泼的爱的悲剧。其中成为千古绝唱的阳台上的一景(参看插绘)达到了莎士比亚青年时期艺术的极峰。

---

① 莎士比亚著，曹禺译，一九四四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怎样做人及其它*

××先生：

你的信都收到。我忙，生活乱 没有能早给你写回信，应该求你原谅。

这一年来我接到好些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来信，我都没有回答。我害怕写信，我也不想讲话。我知道我的对善恶是非的观念跟别人的不同。我不会讲别人爱听的话。可是我又不能撇弃我的理性。因此我只有封住自己的口，等着时间来给我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官。

这一年来我用沉默来养我自己，我没有得胃病，倒是一件幸事。朋友们不明白这情形，他们也许不会原谅我。他们会憎厌我的傲慢，责备我的懒惰。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为自己辩解呢？

你像一些年轻的朋友那样，要我回答"怎样写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把我窘够了。老实说一句，我答不出。我实在没有想过它，从来没有想过它。你以为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知道怎样写作，你自然有你的理由。现在一般书店里堆满了谈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人世间》第二卷第一期。

写作和教人怎样写作的书。每本书都有不少的读者。可是我始终没有读过一本，虽然我知道有几个年轻朋友熟读了它们，仍然写不好文章。

你说得对：现在不仅有不少的人爱读“怎样写作”，还有更多的“著作家”喜欢教训人“怎样做人”。我称那些人做“著作家”，我觉得自己脸红。我翻过几本这一类的书，我不解为什么别人让它们毫无顾忌地传播。难道大家就不为这个民族的前途着想？对人讲手段，讲应付；处世要“教育”，要“秘诀”。——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将来”呢？大家都有了“秘诀”，大家都会“应付”。什么“理想”，什么“正义”，什么“诚实”，什么“牺牲”都会变成梦话了。

不错，你最近一封信里讲起的那位赖诒恩神甫说过这样的话：“人不会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幸福与愿望。”你不要相信他。那只是一句话罢了。他为了证明对于宗教的需要，为了证明提高道德标准的“比较重要”，他竟然把人当作一个富于自私心的动物，要是不用道德教条来束缚他，不用宗教来感化他，好像人们就会互相残杀似的。

这位天主教的神甫关在教堂里制造人性，可是事实上他却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然而要是他放下《圣经》，走出他的圈子，去观察民众生活，去观察大自然，或者去饮一滴从那在森林中巢居的鸟群和在大自然怀抱里造穴的哺乳动物的互爱社会中流出来的互助的清泉，他便知道，不但人，便是动物也是有道德的。法国福勒尔和于伯关于蚁类生活的研究，俄国谢威尔左夫关于鸟类生活的叙述，德国普列姆的巨著《动物的生

活》，毕黑勒尔的《动物界的爱与爱的生活》等等（这类书太多，现在只好随便举出几本），都证明一般的动物，并不是生来就有自私心，它们并且能够为群体的利益牺牲个体的愿望。福勒尔描写过蚂蚁的胃内分食的生活：饥渴的蚂蚁遇见它的吃饱的同类，要求分给它一点饮食，它的同类马上张开大颚，吐出一滴透明的养液，让它舐食。彼此满足，大家相安。谢威尔左夫叙述过白尾鹫的"会食"。那天他隐在草原的坡下走近它们，看见它们围着一匹死马。老鹫先吃，吃完便退到近旁的岩上，担任瞭望工作，让年轻的同伴安静地吃饱，大家和睦，绝不争夺。冠凫被希腊人称为"慈母"。鹤类与邻动物也实行互爱。知更鸟哺养戴菊鸟的幼儿。像这类的例子实在太多。所以有人说自然界是人类的第一个道德教师。

原始人更有着很好的伦理与社会。甚至在冰河时代和第三纪末期中的原始人，他们也有着把自己的"我"跟社会的"我们"看作一样的习俗。直到现在无论是蒙昧人——Savages（如蒲系满人、霍坦脱人、亚柳人、埃斯基莫人等）或野蛮人——Barbarians（如博牙特人、卡巴尔人等）都把同胞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利益更重。李席顿司太因看见蒲系满人怎样牺牲自己援救落水的同胞。传教师维尼亚闵诺夫收回他半年前忘记在亚柳人那里的一包干鱼。博牙特人与卡巴尔人有着很好的共同生活的习惯。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人"，无论从人种学、人类学、生物学、或社会学方面看来，我们绝不是贪婪而自私的动物，在道德上还不如野蛮人、蒙昧人，甚至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我可以举出千万件事实，我可以指出无数的组织

(过去的和现在的)来证明人的确"常常自动地为了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愿望的"。

人是道德的生物。他过惯了共同的生活,他知道该怎样公平地对待他的同胞。自有人类以来,他走的总是这样的一条路: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这是唯一的生活的路。自然力的征服,中世纪自由都市的光荣的历史,近代科学与艺术的伟大的成就,……无一不是人类的联合力量与牺牲精神的结果。道德的教条,宗教的束缚,在这些成就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只除了宗教有时阻碍科学的进步,道德教条(道德与道德的教条是两样东西)有时妨碍社会的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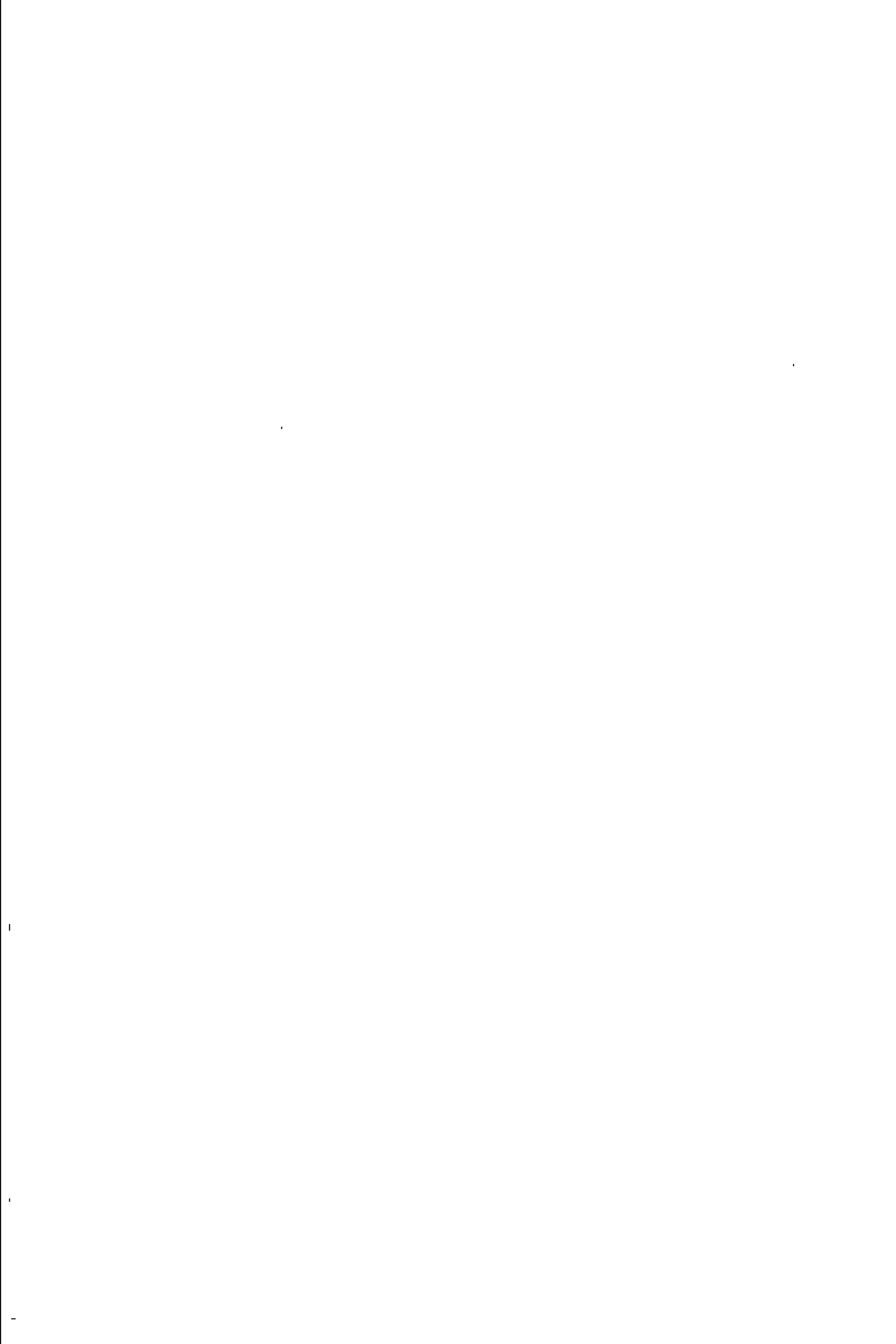
至于人的自私与贪欲,社会的不满,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们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制度不能产生于一朝一夕,犹如个人不能一旦突然变好或变坏。我们的"存在的一切"都是逐渐演化来的。若将人类当作一个整体看,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永远是向前进的,虽然他有时也走着弯曲的路。

为着将来,我们实在没有悲观的必要。我们还可以看见人类的更光辉的成就。求生的力量,生存的需要,社会的本能逼着人走向联合的路。现代社会的一切优越的知识,发明,便利都是社会全体分子的合作、协力造成的。并且社会愈进化,个人孤独的生活便愈成为不可能,人与人间的关系也愈密切,彼此依赖也愈深。人对他的同胞必须真诚,必须互助;离开了合作与互助人便不能够生存。一个最深刻的伦理公式是:"没有

平等便没有正义，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一个社会学家说得好：“一个人如果不使他周围的人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便是我的自由。”另一个伦理学家说：“真正的幸福是从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着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要说“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处世教育”；要说“秘诀”，这才是真正的“处世秘诀”。甚至下等动物也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要谈“怎样做人”，还不如揭下自己的文明的面具，像原始人那样，去向自然界学习吧。从小虫、小鸟，以及种种的动物那里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正确的知识，都是那些所谓“修养书”里所没有的。你要是不想做一个小滑头，我便劝你不要去读那些“修养书”。

至于我自己怎样做人，我觉得这是值不得提说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背诵法国地理学家邵可侣的一段话：

> 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在我自己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不曾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只有那对于一个大的祖国内所有居民的尊重与同情的感情，才可以支配着我。我们的地球这么快地在空间旋转，好像大无穷中的一颗砂粒，难道在这个圆球上面，我们还值得花费时间来彼此相恨么？……



一九四五年

一点感想*

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不过说句老实话，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胜利"这两个字。我感到的并不是胜利的喜悦。我只觉得压在我头上的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去掉了。一个浓黑的暗夜发白了。这八年来我走过了好些地方，经历了，看见了许多事情。我自己当然不能说对抗战尽过多少力。但我却看见那无数的平民为着这个战争流了血，流了汗，牺牲了他们所有的、所宝贵的一切，他们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去。他们没有要求过什么，也没有得到过什么。发财的不是他们，说漂亮话的不是他们。说是一切都为了这个圣战，他们受苦、牺牲，都并无怨言。现在圣战成功了，那么他们的牺牲和受苦也应该终结了。那些血，那些残杀，那些大破坏，我在上海、在广州、在桂林……看见的种种可怖的景象都应该消灭了。的确我仿佛是从一个可怕的长的梦魇中醒了过来似的。所以八月十日之夜晚，我挤在"精神堡垒"前面狂欢的人群中大声笑着。这些年来我闷得够了。

可是这样的喜悦在第二天早上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五月《抗战文艺》第十卷第六期。

我觉得昨晚上做了一个快乐的梦。这天报纸上充满着"胜利"和类似胜利的字眼，我才想到了"胜利"。他们说得似乎都不错，很有理。但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总觉得我脑子有些糊涂，我想起昨夜狂欢的事，更觉得不好意思，我似乎不配跟着别人欢笑，因为这个胜仗不是我打出来的，而且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胜利自己就送过来了。我更耽心，这个胜利纵使我会有一份儿，它分到我名下，我也不会抓住它，它会飞走的。我对这胜利没有一点准备，我狂欢得太早了。

"那么赶快准备迎接胜利吧，"一个朋友鼓励我说。他是一个乐观派。

准备，迎接都不错。但是怎样准备呢？我正为着这个"准备"发愁。

单是"胜利"两个字并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狂欢得太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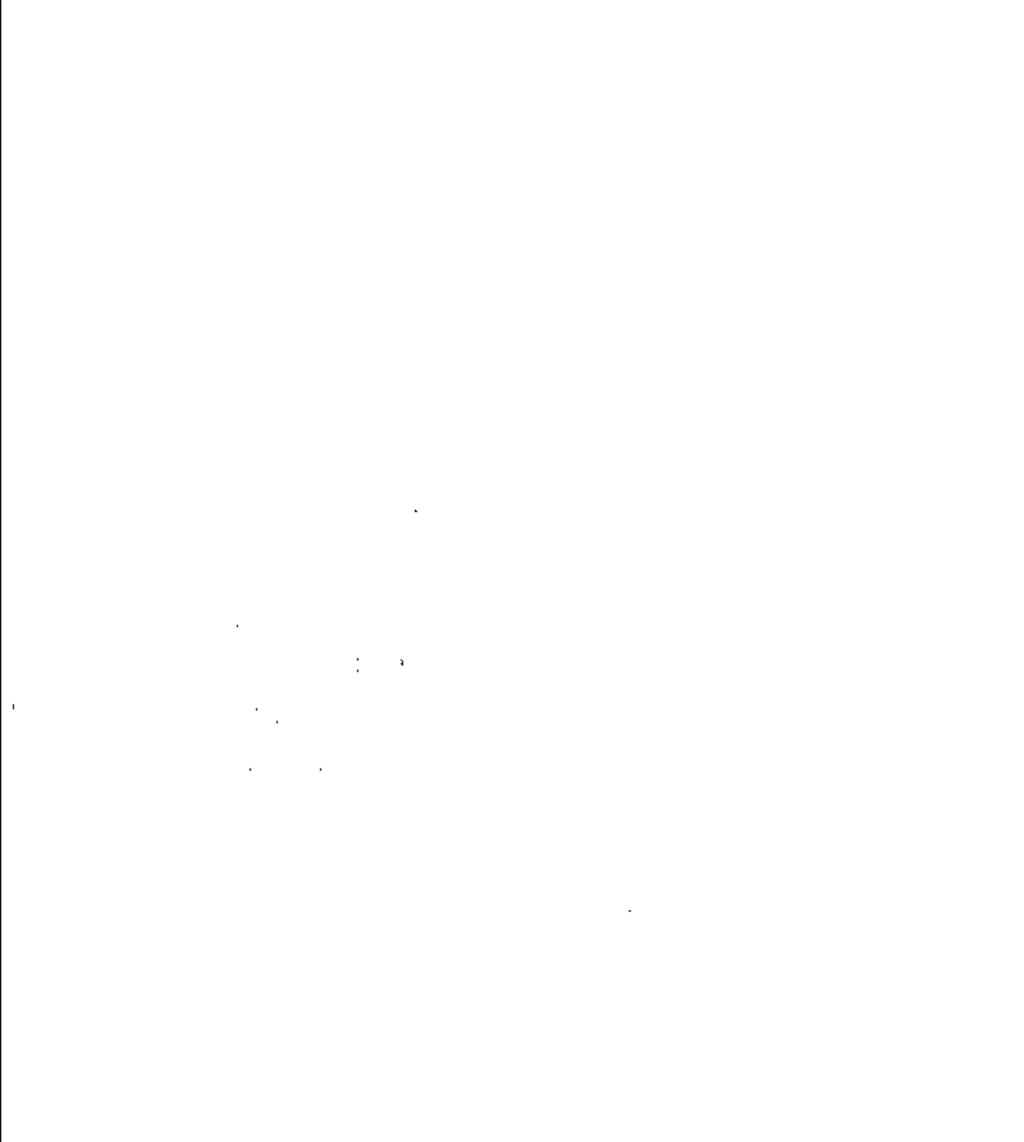
8月14夜。

《夜　店》*

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本戏，但是它却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好些年前我读过高尔基的原作，今天又读到了柯灵、师陀二位的改编剧本。但人物、性格、气氛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在石小妹和杨七郎身上我认出了那两个老朋友：女孩娜达夏和小贼瓦斯加，两个简单的灵魂。不仅是他们，夜店里还住着败家子、下等娼妓、落魄戏子以及别的所谓社会的渣滓。他们全都有过野心，有过幻梦，可是因为自己缺乏意志力，又由于现社会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他们全被当作垃圾似地抛弃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了。他们屡次想爬起来，却落得更深一点。我们这阶级的人自然不屑于去认识他们，跟他们做朋友。但剧作者却不留情地为我们揭去他们的肮脏的外衣，让我们看见他们的赤裸裸的心。多么善良的灵魂！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同类，甚至超过了我们，他们懂得爱，懂得恨，也能够爱，能够恨，而且他们还懂得怎样为这爱牺牲。这不是戏，这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报》第十一期。《夜店》为柯灵、师陀改编，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一九四六年

“封”和“禁”*

《周报》奉令停刊，这该是你们的光荣。要是刊物办得不好，没有人看，不发生影响，别人就不会麻烦它，他们会让它自生自灭。

“封”和“禁”都是很旧很旧的办法。我们的祖先们用过它，却从来没有得着预期的效果。现在自然更不会。奇怪的是，二十五六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在成都办的一种刊物，也得着同样的命运：奉令停刊。我们那时出过一期“停刊号”。现在又轮到你们来出“休刊号”了。从这件事来看我们中国，我不能不说她进步太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报》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鲁迅先生十年祭*

十年前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曾代表文季月刊社同人写过一篇悼文：

>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上海的一角传出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
> 鲁迅先生逝世了！
>
> 花圈、唁电、挽辞、眼泪、哀哭从中国各个地方像洪流一样地汇集到上海来。任何一个小城市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哀悼的文章，连最僻远的村镇里也响起了悲痛的哭声。全中国的良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悲痛的。这一个老人，他的一支笔，一颗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业。甚至在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的时候，他还把成千上万的人牵引到他的身边。不论是亲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敌，都怀着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遗体前哀痛地埋下了头。至少在这一刻全中国的良心是团结在一起的。
>
> 我们没有多的言辞来哀悼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因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少年读物》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

一切的语言在这个老人的面前都变成了十分渺小；我们不能单单用眼泪来埋葬死者，因为死者是一个至死不屈的英勇战士。但是我们也无法制止悲痛来否认我们的巨大损失；这个老人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个爱护他们的知己朋友，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个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的一句话。然而我们并不想称他做巨星，比他做太阳，因为这样的比拟太抽象了。他并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壮观。他从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一个不识者的简单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的胸怀的吐露；一个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会得到他同情的帮忙。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爱护青年的。

然而把这样的一个人单单看作中国文艺界的珍宝是不够的。我们固然珍惜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我们也和别的许多人一样以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们更重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在人类解放运动中，他是一个勇敢的先驱。

鲁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伟大。近二三十年来他的正义的呼声响彻了中国的暗夜，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举着思想的火炬，领导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从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他的

死是全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尤其是在国难加深、民族解放运动炽烈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导师，我们的哀痛不是没有原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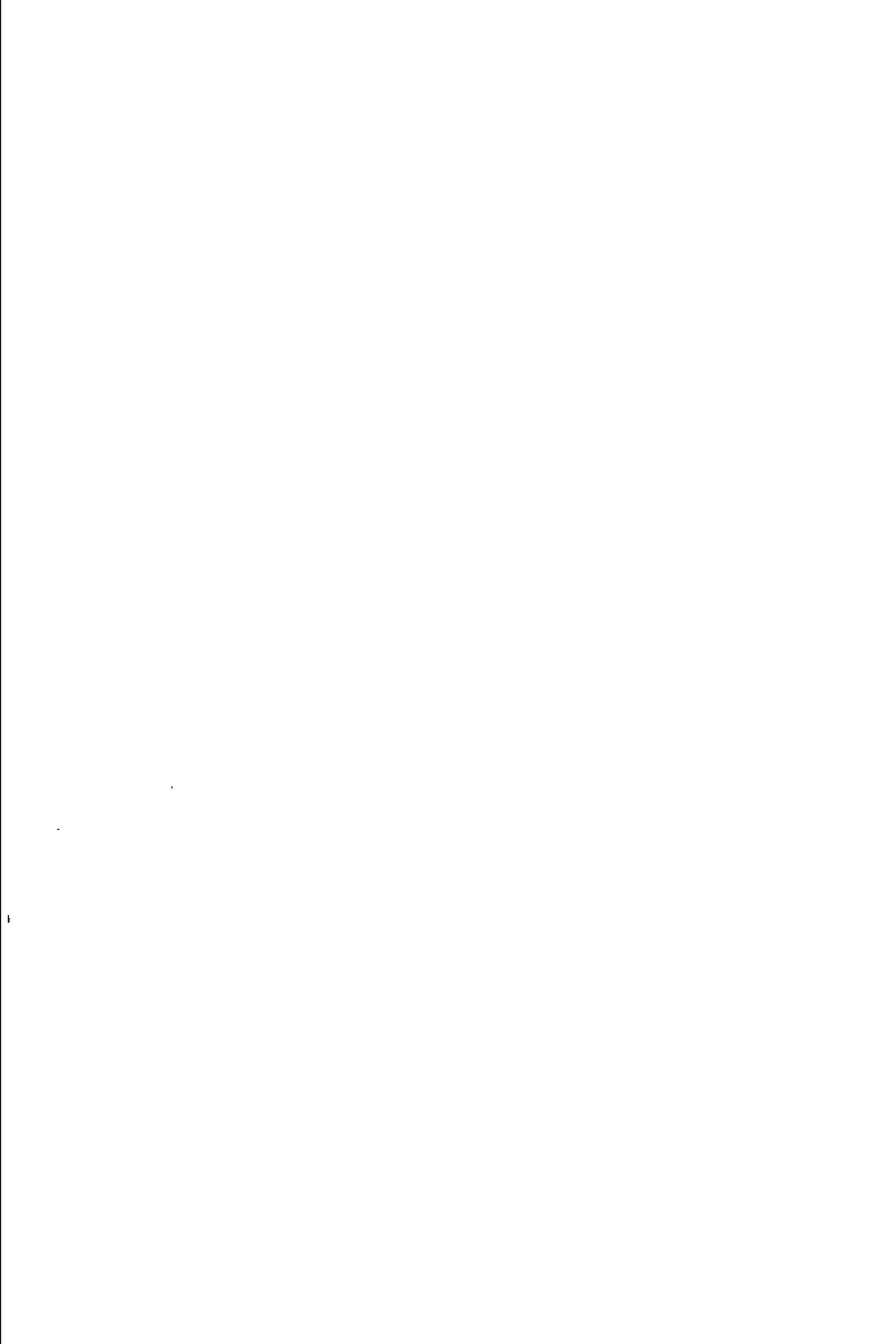
别了，鲁迅先生！你说："忘记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我们不会让你静静地死去，你会活起来，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着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迈进！

十年像飞箭一般过去了。今天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中我望着那一幅巨大的画像，想起先生的一生，想起我和先生几次短短的会见，想起先生逝世时的情形，十年前写的那篇文章又很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我对着先生的遗容，默诵了我十年前的悼文。

今天要是谁（譬如说《少年读物》的编者吧）逼着我拿起笔写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也不会说另外的话。十年了。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今天在这广阔的会场里成千的眼睛连闪也不闪一下地凝望着栩栩如生的先生的遗容，年老的和年轻的声音一齐叫着，继承先生的遗志。

在先生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民族解放的战争虽已获胜，但内战还在扩大，社会秩序仍然混乱，人民生活反更艰苦，我们这民族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先生所追求的并未到来，而所憎恨的亦未消去。在这时候，逝去十年的先生呼声仍然是极其响亮的。我仿佛还看见先生执着思想的火炬在荆棘遍地的荒野中领着无数的青年向着远远的一线亮光前进。

十年了，鲁迅先生，让我再说一次："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你的。"你已经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你活着来看大家怎样继承你的遗志向着建设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道路迈进。



一九四八年

《快乐王子集》[1](广告)

英国王尔德所作童话九篇全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王尔德的"童话"并非普通的儿童文学，却是童话体的小说。在这九篇童话里，作者仍然保持着他那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英格列比认为"这些童话表现得精妙绝伦，丰富的想象给每篇故事装饰了珠玉，作者有着驾驭文字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熟思后写出来的，但同时却有着自发的动人力量"。

① 王尔德著，巴金译。一九四八年三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封底。

《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1]（广告）

这是一部俄国文学史的名著。作者比许多作家都更了解他的本国人和他们的文学。什么抓住了俄国人的心，也就抓住了作者的心。而且他还会用适当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他是俄国文学的最好的解释者。在本书里他不但忠实的绘出俄国文学的全貌，抓住俄国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及背景，还在俄国文学中看出了争自由斗争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的渴望。作者在《面包与自由》中所表示过的艺术观念和社会思想在这里也有阐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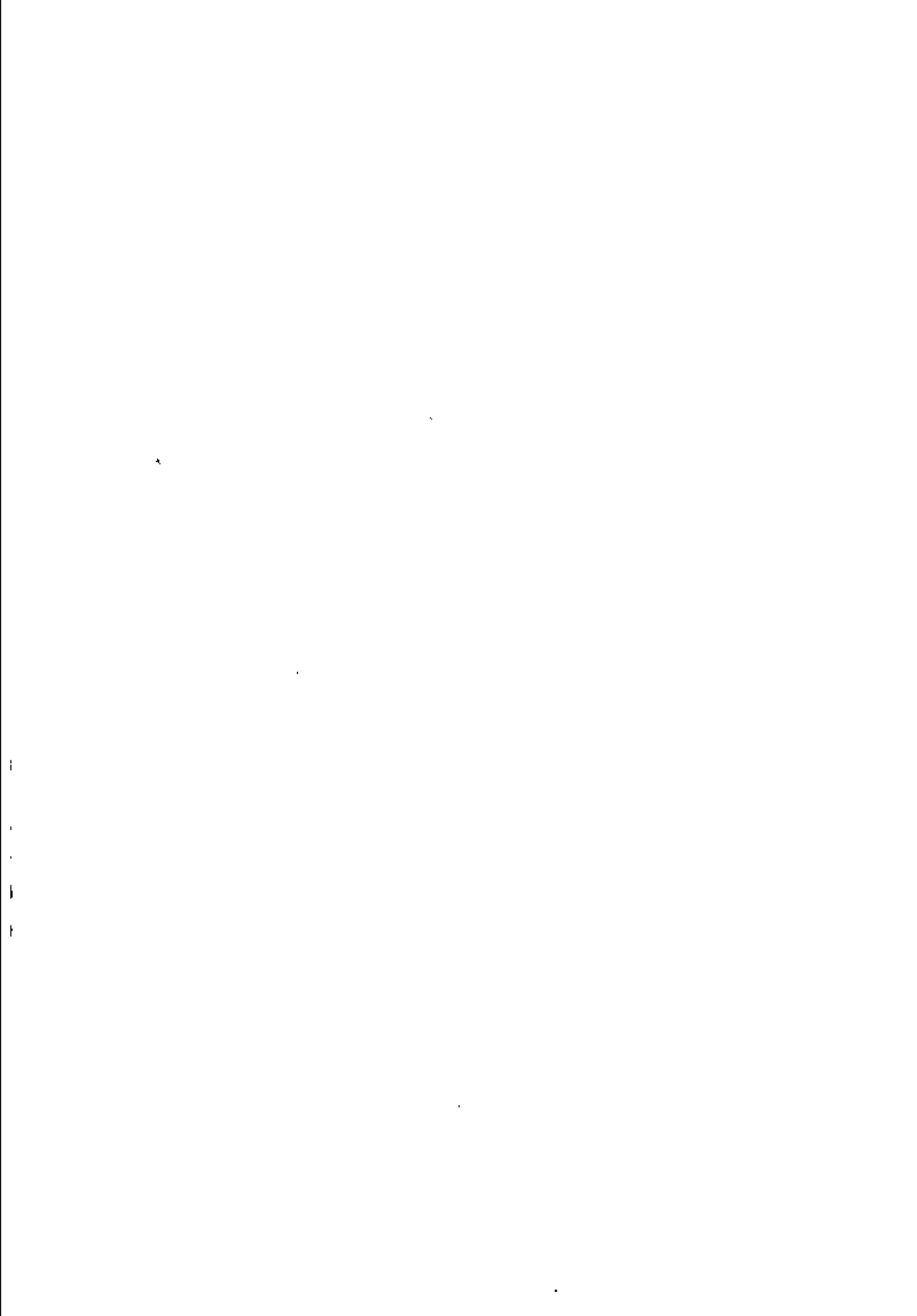
① 克鲁泡特金著，丽尼译。后未出版。本篇原刊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平明书店版《面包与自由》附页。

《俄法狱中记》[1]（广告）

这是《自传》的姊妹篇，叙述作者在俄、法两国牢狱中的见闻和感想。作者更着重牢狱生活给与囚人之道德的影响，因此本书曾被H.霭理斯视为犯罪学方面之重要的参考资料，本书因忠实地描绘了俄国监狱的黑暗面，深触帝俄政府之忌，刊行不久，即由帝俄政府利用外交与经济的力量使出版书局毁版。全世界中仅少数公立图书馆藏有此书。

---

① 克鲁泡特金著，后未译成。本篇原刊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平明书店版《面包与自由》附页。



一九四九年

《狱中二十年》[①]（广告）

这是妃格念尔自传的第二部。也是她在席吕塞尔堡要塞中二十年生活的记录。妃格念尔曾被法国文豪法朗士称为“俄国革命的贞德”。她的书不仅每个字像火一般点燃你的血，并且，字里行间还跳动着一个温柔的，敏感的，无所不爱的女性的心。她会使你流泪，她会唤起你的渴望。全书共三十一章，重要章目如下：

第一天；最初的几年；我找到一个朋友；惩戒室；纸；同盟绝食；母亲的祝福；司令官；别；通信；工场与花园；书籍和杂志；十八年后；肩章；死的威胁；绞刑；违约；生活的恐惧；母亲；前夜；“帕龙德拉”；第一次重逢。

---

① 薇娜·妃格念尔著，巴金译。一九四九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六　人》[1]（广告）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国革命者洛克尔从世界文学名著中借用了六个人物和六个解答——六条路，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阐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六人》便是他对那个曾经苦恼着无数人的大问题的一个答案。

浮士德在书斋中探求人生的秘密；董·缓在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疑惑腐蚀了哈姆雷特的生活力；唐·吉诃德的勇敢行动又缺乏心灵来指引；麦达尔都斯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自己；冯·阿夫特尔丁根完全牺牲自我，却也不能救助人们。

但是最后六个人联合在一块儿了。六条路合成了一条路。

新国土的门打开了。新的人踏着新的土地。新的太阳带着万丈光芒上升。

“充满希望的早晨，我向你敬礼！伟大的奇迹就要来临，时候到了！”

作者用这样的欢歌结束了他这本被称为交响乐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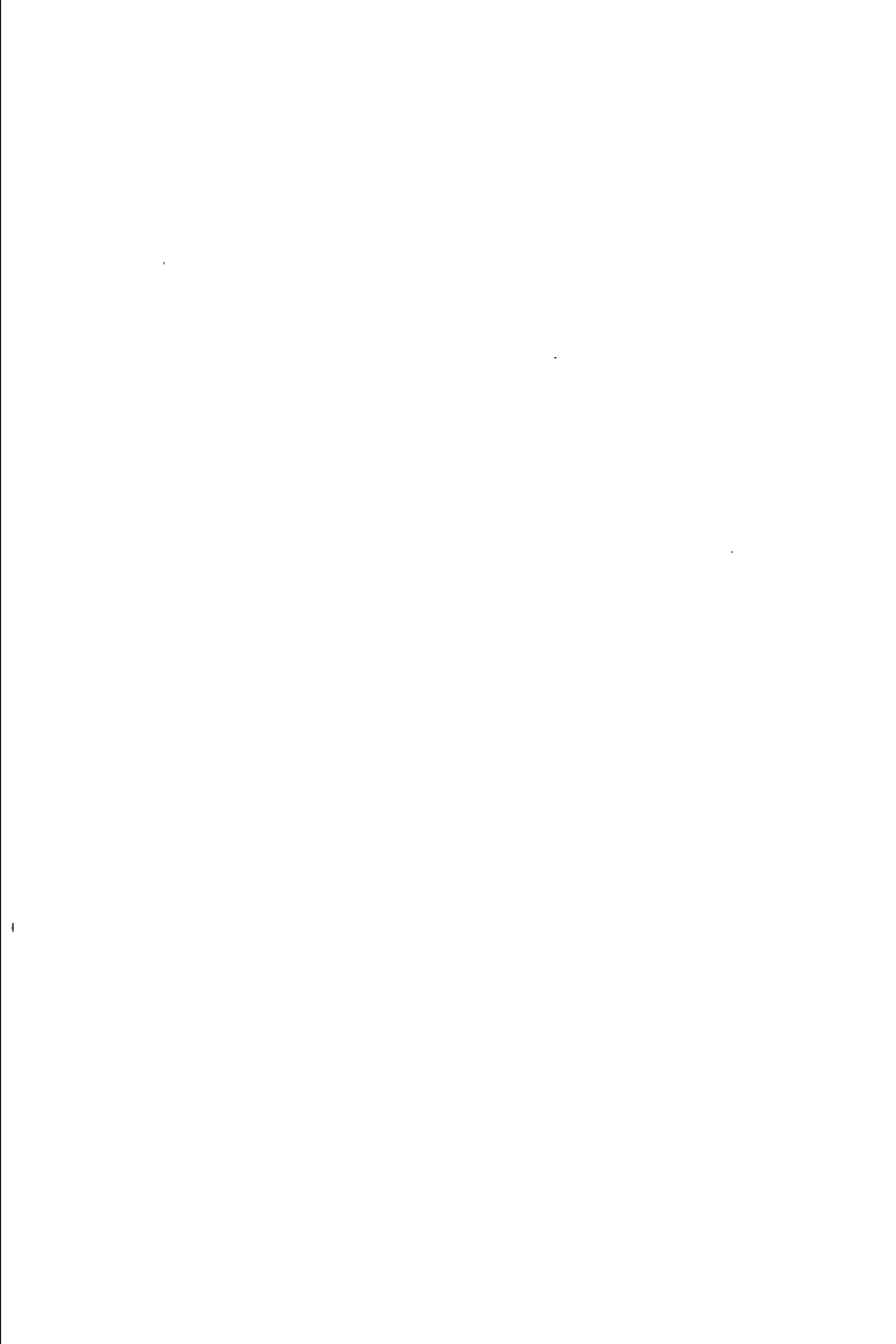
---

① 鲁多夫·洛克尔著，巴金译。一九四九年九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安娜·卡列尼娜》[①]（广告）

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震人心魄的瑰丽史诗以后，托翁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从篇幅上说，它仅次于《战争与和平》；而它的艺术价值，却是托翁的主要著作的代表。《复活》倘说是托翁艺术上的一个遗嘱，那么，《安娜·卡列尼娜》便可以说是他的一部分艺术的财产了。小说一开始，便以抒情诗般的文字把我们摄住：恋爱的疯狂，凄苦情操造成的悲剧，从安娜认识佛隆斯基直到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这整个故事是如此逼取我们的泪水。安娜，高傲、勇敢，受得了爱的煎熬，但终于在破碎的爱情中毁了自己。舞会、赛马、戏院和沙龙，都在列车经过的一瞬间完成了。——只有托翁能写出这样的悲剧。环绕着这悲剧的，是一八六五年俄国社交生活的场面，和在另一主人翁列文身上显露的托翁自己的面影。

① 托尔斯泰著，高植译。一九四九年四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篇原刊于该书护封。



一九五〇年

愤怒的哭声*

二月六日的夜晚，我走过冷清清的一条马路，还不到十点钟，马路上就不见行人了。当我转进横街的时候，从一个墨黑的弄堂口送过来一声低泣。黑暗中我看不出人影。寒气透过衣服刺到我的背脊，我立刻打了一个冷噤。我加快脚步往前急走。哭声似乎从后面追过来，而且声音提高了。我迈着快步子不停地走着，我想躲掉那哭声。可是哭声却越来越高。我整个脑子都给哭声充满了。

我走进一个没有灯光的弄堂，我摸索着回到了自己的家。我点燃了煤油灯。我对着灯光坐着。我仍然听见那哭声。我赶不走我脑子里的哭声。我听着，我静静地听着。

我不是在做梦。我知道，这哭声并不是空虚的，并不是假的。在这个时候全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哭。不知道有多少家庭残破，多少生命毁灭。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冷风里，马路边，弄堂间度过这一个寒夜。因为我用自己的耳朵听见，用自己的眼睛看见：从台湾飞来的十二架最新式的飞机，十二架美国文明的产物给这个和平的、欢乐的城市带来了毁灭与死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

夜更冷了，灯光照不亮整个房间。到处都是黑影。在我的四周听不见一声欢笑。哭声继续着，提高着。我的心更加烦躁不安了。我呆呆望着煤油灯玻璃罩内的一团火光。我的眼睛发痛。我的手脚发麻。我站起来。我在屋子里走了两步。我又坐下去。我觉得我的眼前是一片血迹。我又看见了血。我不能再看那灯光。我快要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了。我拿了一本书，翻开来，我读着我自己的文章：

> 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淋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捫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膀还紧紧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自己躲在上空挟最新式的利器攻击下面没有防卫能力的人民，杀死无辜的母亲，流年轻儿女的血，这不仅是冷静的屠杀，便称之为卑劣的胆小的谋害，和变态性的虐杀狂的表现也不为过……。

这是我在十二年前写的文章。那是日本法西斯蒂的侵略者开始用最新式武器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

我又翻开另一本书，读着：

我压抑下愤怒的火焰看了那些残毁的房屋，我看见连头发和衣服黏贴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我看见排列在郊外街巷里的无名的尸体。有一次我踏过还在冒烟的瓦砾堆，陪着朋友去探望他的故居，我们已经无法在火堆中找出遗物了。……我望着一家旅馆的高门楼烧断，让砖石和焦木带着千百点细小的火星崩塌下来。在那山洪暴发般的巨响之后，我听见一个男人尖锐地在废墟上发出“救命”的呼号……

这是我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写的短文，那一天桂林城刚刚遭了日本飞机的第四次的狂炸。

但是今天，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战败之后，我居然又看见了那一切景象的重演！十二年前，十一年前……的血跟今天的血混合在一块儿，那是一样的血，一样的中国人民的血！

我的心跳得更急。我的头脑发热了。我阖上书。我制止不了我的心发问：

是谁使得中国人民的血在流呢？难道是中国的孩子飞在中国的天空中来残害他们的父母兄弟？

“不！”我这样地叫起来。不会是中国的孩子。人不会没有心肝到亲手杀害他的父母兄弟的。我的周围明明在响着中国母亲的哭声。

那么十二年前，十一年前——的惨剧又在我的眼前重演了。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日本的法西斯蒂和中国的残余

反动派联在一块儿利用着美国文明的产物对这个和平的欢乐的城市在开始新的屠杀了。

那些染满了同胞鲜血的手又牵着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帝国主义者的手来谋害更多的中国人民的生命了。那么今天的还有上一个月的，上一个月以前的断肢残臂、血肉模糊的景象还只是一个开始吧。帝国主义者、法西斯蒂以及中国反动派的好梦中最完美的景象，大概是：全中国人的鲜血把土地与河面染红，尸体狼藉地阻塞着道路吧。

但这是办不到的。全上海的人民以及全中国的人民也不会让它办到的。而且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大城市的战斗的精神，人的死亡和血的奔流只能够增加我们的战斗的决心。四万万七千万人的团结的力量是任何暴力所不能阻止，所不能抗拒的。而中国残余反动派的消灭、法西斯蒂的灭亡和帝国主义的溃败倒是指顾间的事。偿还血债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到。现在他们在替自己挖掘坟墓了。

我想到这个，我的心倒宁静了。我明白我四周的哭声并不是悲伤的哭声，这是愤怒的哭声，控诉的哭声。它是从无数的受害者的心底发出来的。它不会停止，它会造成巨大的力量，它会照亮这个黑暗的寒夜。

在愤怒的哭声之后，就会有欢乐的笑声。

“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是从北京赶回来参加上海的首届文代大会的。

在火车的车厢里，我看见在晨光中微笑的江南的景物，我制止不了我的心的狂跳。“我赶回来了。”我高兴地想着。我没有来迟。巴望了两个月，我一直耽心着会错过了的大会，现在到底给我赶上了。

“会”，“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我们五百多个从同一个大家庭出来的儿女在外面工作了长时期以后，现在第一次回到老家来。这应当是一个多么欢乐的聚会。我们会亲切地相对微笑，我们会关心地互问健康。然后我们会无拘束、无顾忌地谈论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互相交换经验，互相贡献意见。我不是带着空虚的心回来，我更不会带着空虚的心离开。我需要友爱，“会”要给我温暖；我感到能力薄弱，“会”要给我帮助。离开了“会”，我只是孤立渺小的个人，生活在自己弟兄姊妹的中间，我对工作才有更大的信心。“会”把我们大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会”加强友爱的空气。团结是为了工作；友爱可以鼓舞工作的热情，把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各人尽自己的本分去参加新中国新上海的文化建设的工作，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我们的工作地点又是在上海。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为一年伟大胜利而欢呼*

一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夜晚十点钟以后，我从天安门回到了宿舍，听着远远近近的锣鼓声，我兴奋得不能阖眼，我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着，我一直写到深夜。我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要是我们回想到过去的那些日子，那些痛苦的日子：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当猪狗看待；让人随意炮轰枪杀，拳打脚踢；土地让人随意占据，家屋让人随意破坏，生命让人随意毁灭；自己忍饥挨饿，受冻耐寒，养肥了冒险家让他们来加强地剥削，把美丽的土地变成了他们的乐园；自己为奴为隶，让妻女受侮被辱，小孩流浪在街头；在工厂里廉价地出售劳力，在写字间单调地消耗生命，使得白手的冒险家建造了高楼大厦，享受了无比的豪华……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还有无数说不尽写不完的奇耻大辱啊！然而现在那一切，那一切都过去了，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是永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上海《解放日报》"为一年伟大胜利而欢呼——各界人民国庆发表感想"专栏。此处即借用该题。

远不会再来的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怀着快乐的、感激的心来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

一点印象*

二届世界和大闭幕的那天，散会的时候，好些人走到廊上还回头去看会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真不愿意跟这地方、跟这许多人分别。大会给人的印象的确是太深了。

华沙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和睦的大会。参加的人连代表，连来宾，连列席旁听的，连记者，连工作人员都算在内，数目将近三千。我们来自八十个国家，大多数的人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以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可是我们在会场遇见，可以随便谈话，不必知道彼此的姓名，却能够互相了解。我们谈和平，谈别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常常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有诚意，我们都愿意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将来。

华沙的大会跟去年巴黎——布拉格的大会不同。华沙的大会是一个行动的大会。华沙大会召开的时候，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地扩军备战，而且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朝鲜的人民正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任意屠杀。和平不仅受到威胁，而且横遭蹂躏了。所以单是用话语和文字来要求和平是没有用的，人们必须用行动来保卫和平，必须反抗侵略，制止侵略，然后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解放日报》。

才能够得到和平。在这一方面华沙大会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它谴责了侵略，发扬了正义，团结了大多数人，制定了具体的和平运动的纲领，选出了最高的领导的机关——世界和平理事会。我们可以说，这以后世界的和平是有了保障了。

世界和平理事会是建立在全世界和平人民力量的大团结这个基础上面的。当全世界的人民下了决心起来保卫和平的时候，他们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已经在这方面表现了他们的力量了。苏联代表法捷耶夫在大会中说得好："中国人民说朝鲜人民军不是孤立的，侵略者就被拴在朝鲜，它的胜利幻灭了。"这句话给了大会以极大的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英勇的战斗和辉煌的胜利更加强了全世界和平人民的信心。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中，在国外各地受到热烈欢迎，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壮大，而且对世界和平运动有了大的贡献。但同时大家也可以想到，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每一次的正义的行动都受到了全世界和平人民力量的热烈的支持。

我也参加了关于文化交流的小组会，那是一个友爱的讨论会，各国代表自由地发言，贡献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想出方法，作出决议，来帮助各民族互相了解，促进他们中间的和平的合作。关于文学艺术方面，决议中间有着下列的几项：

一、组织剧团、乐队、芭蕾舞剧团以及艺术界优秀的代表们的游历演出，和分送影片。

二、组织音乐会，使听众熟悉其他国家的音乐。

三、组织美术品和民间美术品的展览会。

四、邀请其他国家的代表们参加文学艺术方面重要节日的本国的庆祝纪念，并且在其他国家内纪念这些节日。

五、翻译文学作品，宣扬并演奏音乐作品。交换这些作品以及有关的介绍、评论和文章。

六、广泛传播文学与音乐方面世界有名的古典作品，以及翻印油画、雕刻和世界著名的建筑典型。

七、在各国内发展对其他文字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技术。

一九五一年

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我从中国来。这个一直被西方人当作谜一样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曾经发过灿烂光辉的文化。这个国家有着广大的山明水秀的国土，丰富的地下宝藏和四亿七千五百万刻苦耐劳的人民。但也就是这个国家，它的人民一代一代地呻吟在专制独夫的残暴政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手段下面憔悴死去。他们忍饥受寒，像牛马似的劳动着，换得他们的简单的生存。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失去斗争的勇气，反抗的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燃烧，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终于到了这样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炼钢的烈火，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于是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

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都市，有人唤它做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从海外运来原料，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制成商品，取得了广大的市场。他们建造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人民日报》编者作有如下按语："这是中国出席华沙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巴金先生准备在大会上发言的稿子，当时因各国代表团发言的人很多，此稿未用。"

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人民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内，摇动的搁楼里，坚硬的人行道上，甚至在苏州河上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着微小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被浪费被糟塌。这就是帝国主义百年来蹂躏中国的成绩。然而在今天这一切都像梦魇似地消灭了。上海跟别的中国城市一样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革命的洪流把帝国主义的肮脏污秽冲洗干净了。新的上海产生了。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我在这里提说这个，并不是有意夸耀人民革命的成就，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恐惧。我只是来说明：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反动的统治者，是为着一个和平的企图——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丽，而且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同时也给世界一个榜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怎样可以新生。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的任务是把人类连结在一起。我愿意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不少光辉的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的诗篇。我们需要和平，因为只有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建设的机会，而且我们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战争之后才达到和平的。

但是现在这和平受到威胁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让我们

享受和平的幸福，不给我们以和平建设的机会。他们的铁蹄已经踏到我们的国境，他们的烽火已经烧到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土地被轰炸，我们的人民被扫射。在太平洋的彼岸还有人发出“战争的畏惧掩蔽了人类的希望”的叫嚣。似乎大残杀马上便要发生，大毁灭立刻就要到来。在今天的确有一片大的乌云盖在人类的希望上面。落在朝鲜领土上的成千成百吨的美国的炸弹便是对人类文明的严重的威胁。

但是人类的希望是任何大的乌云所掩蔽不了的。特别是在今天和平不是一个梦，一个理想。它是万人的愿望。它已经有了团结在一起的八亿的保卫者，不，这只是一部分的数目。因为谁都知道在全世界的人民中没有一个人不爱和平，没有一个人不恨战争。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他的同胞、跟他的邻人和睦相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劳力来共同创造新世界的文明。渴望战争，想从战争中得利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这一小撮人我们称他们为战争贩子。他们鼓动战争，发动战争，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年轻人骗上战场，用种种的野蛮残暴的手段把和平的年轻人驱入战地，杀害无辜的生命，毁灭和平的城市，替他们开辟广大的市场，奴役弱小的民族。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轻有为的生命牺牲在这样的战场上了。

侵略者的王国就是用这些白骨赤血造成的。他们不断地用种种渴血的方法扩大它，巩固它。现在他们更想拿我们祖先累世的劳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文明作代价，换取他们宫殿的金顶，完成他们的“万世不朽”的霸业。

但是他们的这个好梦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中国人民不让它实现，全世界的人民也不让它实现。他们要扩大、巩固他们的王国，我们要摧毁它。我们用语言，用行动，用事实来摧毁它。

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结合人类，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撇开不同的信仰，撇开不同的宗教，撇开不同的语言，只要是善良的人，只要是爱人类的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和平而奋斗，为创造新的文明而奋斗。我们有力量使受骗的人睁开眼，我们有责任救出那些即将充当炮灰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更有把握看见侵略者的王国的崩溃。

"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驼背的暴君理却三世曾经这样吼叫过。可是到了那时候他连一匹马也得不到了，他失了他的王国，也失了他的生命。有一天那些新的暴君也会发出同样绝望的叫声。在败亡的时候暴君们是多么地没有力量，他们的王国也就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的东西了。

我离开我的家动身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的五岁的女儿依恋不舍地抱住我的颈项说，要爸爸早回家来，要爸爸带礼物给她。我爱我的女儿。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孩子。年轻的一代的确是可爱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受够战争的苦难了。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年轻的小眼睛上有一滴泪水，我不愿意看见谁伤害一根柔嫩的头发。我相信所有的父亲都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个更美丽的将来。为着年轻的一代，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谈二届和平大会*

英国工人热烈欢迎和平大会
反动派竭力阻止和大的召开

第二届世界和大本来决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英国的设菲尔德召开，因为设菲尔德是一个钢铁的城市，又是英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在那里召开和平大会，可以提高一般工人的警觉性，并且可以使许多受骗的人睁开眼睛，让他们看见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召开和平大会自然是一个和平的企图。可是英国政府却想尽千方百计，阻挠破坏，扣留请帖（筹备会发往中国的三十七件请帖都被扣留了），割断电话，甚至出动了海陆空三方面的人员，阻止各国的主要代表进入英国国境。世界和大的秘书长拉斐特已经飞到了伦敦，可是他刚刚下飞机还没有走出机场，就被英国的军警拦住，接着就被逼迫搭原机回巴黎去了。意大利代表，世界和大的副主席南尼也是到了英国又被赶走的。苏联代表法捷耶夫、爱伦堡、西蒙诺夫和别的许多人，中国代表团团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劳动报》。

长郭沫若和大部分的中国代表都没有得到英国的签证。英国政府不敢公开禁止二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它只好假造一些别的理由。它说设菲尔德城容纳不了两千多个客人，没法给那许多代表们找到适当的住处。可是立刻就有七百个工人出来说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家让出给代表们居住。英国政府又说，“你们不能使他们住得舒服，你们更没有好的饮食招待他们。”那些工人马上答复它，“那没有关系，我们正可以让他们看见我们英国工人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狡猾的英国政府还是不肯让和大的代表入境。在这种情形下面，二届世界和大实在无法顺利召开，所以和大执行局临时决定把大会延期三天并且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没有一个国家比波兰更懂得和平的意义

本来波兰政府早就要求二届世界和大在波兰境内召开。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比波兰更了解和平的意义了，因为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了五分之一的人口，华沙城被毁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房屋。到今天还有一百万的孤儿在哀哭他们的父母，希特勒匪帮曾经想杀绝波兰的三千万人民。可是他们只杀了六百万波兰人就让别人把他们消灭了。波兰的人民在复兴工作中表现了奇迹。华沙城被毁的房屋已经恢复了大半。新的波兰不仅从废墟中站了起来，而且它还由农业

国家走入了工业化的大道。在克拉科古城的郊外新的钢铁工业建立起来了。整个波兰正在埋头建设，在建设中它需要和平，它热爱和平。所以它热烈地欢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到它的首都来。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果然都到华沙来了。一共有八十个国家的代表。连波兰本国的代表算在里面，代表人数是一千七百五十六，加上来宾和列席旁听的人数目在二千三百以上，再加上各种工作人员，算它三千人，也不为多。要在华沙找到一个能够容纳三千人的会场，而且要给这些人每人一个可以放文件、可以记笔记的桌子，而且还得在每一个座位上装设一副能够随意听八种语言的翻译的耳机，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只有五天半的时间留给华沙工作人员去布置这样的一个会场。

波兰工人对和平的贡献

英国政府以为它的阻挠会使得世界和大在短期内开不成，即使开成了，也不会开得好。可是波兰的工人用行动来答复了英国政府的诡计。他们不睡眠、不休息，整整地工作了五天半，居然把一个正在建筑中的印刷出版的工厂改造成了一个漂亮、舒适、宽敞的大会场，使得大会在十六日傍晚如期开幕。工人的力量创造了这样的惊人奇迹。这是每个代表亲眼看见的，这个奇迹增强了代表们对和平力量的信心。

中国代表受到热烈欢迎

大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因为从八十个国家来的一千七百几十个代表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和平；都有着一个相同的任务：争取和平。大家远远地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商讨一个具体的争取和平的办法。大会一共开了七天，到二十二日闭幕。在大会中发言的人一共是一百二十个。他们讲的是世界各国的语言。不过我在前面就说过，会场里每个座位上都装得有耳机，可以听到八种语言的翻译。这八种语言中间自然也有中国话，因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有人说过中国代表团被重视的原因，是今天的新中国有办法，有经验，有希望。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担任执行主席的时候，曾经受到全体代表的极热烈的欢迎。他登台发言时，那种盛况是没法用几句简单的话形容得了的。

大会之外还有七个小组委员会。其中政治委员会是最重要的一个，它负责起草大会的两大文件：《告全世界人民书》和《致联合国书》。其他六个小组的决议的要点，都包含在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件里面。这两个文件是和平运动的具体纲领。大会还选出了一个"世界和平理事会"，二百二十二位理事都是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届和大的伟大成就

二届世界和大澄清了那些错误的"等待"和"妥协"的观

念。大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用行动保卫和平。两大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反抗侵略。因为在朝鲜已经发生了侵略的战争，朝鲜的人民成千成万地死在美国侵略军队的炸弹下面。和平不仅受到威胁，和平已经受到了打击。要是在这个时候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还不起来保卫和平，那么他们便会遭受到战争的灾祸了。所以朝鲜人民的坚强抗战和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英勇行动，得到了大会全体代表的热烈的支持，大会谴责了美国军队在朝鲜的罪行，并且主张组织国际法庭追究麦克阿瑟的责任。

大会的代表具有很大的广泛性，各界人士都包括在内。工人代表就有三百四十一位，占代表总数五分之一。中国代表团中的几位工人代表，都是工人阶级中杰出的人物。他们有艰苦的斗争历史和长期的劳动经验，有从太原来的机器工人，也有从汉口来的纺织女工，有国际知名的工人领袖，也有在香港苦斗多年的工界战士。他们不仅得到各国代表们的尊重，而且在中国代表团中间也得到大家的敬爱。

大会在华沙的成功，证明了英国政府阴谋的失败。我们到不了英国，这是很小的事。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到了波兰，却是一件大事。他们亲眼看见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和人民生活。他们看到了在英美所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那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明白了所谓“铁幕”只是一些阴谋家的恶意的捏造。美国代表团在大会闭幕以后还到过苏联，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他们离开苏联的时候，在告别书中曾经说过，要把他们亲眼看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

形告诉美国人民。英国代表团也会把波兰的真相告诉他们的同胞。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的一切宣传都会"不攻自破"了。英国政府不让世界和大在境内召开，无非想遮尽英国人民的眼睛，可是现在英国人民的眼睛反倒大大地睁开了。有人说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挖自己的坟墓，这倒是一句真话。

欢乐的节日*

今天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住在上海，我也可以想象到莫斯科庆祝这个节日的盛况。中苏两国人民同样热烈地庆祝这个日子，因为中苏互助盟约巩固了这两大民族的友谊。全世界的人民也在庆祝这个日子，因为中苏友好合作奠下了世界和平的基石。每一个到过苏联的中国人都可以叙述许多关于中苏友好的故事，这都是他或她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甚至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也饱尝了这种友情的温暖。在苏联我觉得好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到处都有人向我伸出友爱的手，到处都有人用感动的、欢快的声音祝贺这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到处都有盛满伏特加的酒杯举起来为着中苏人民的持久的友谊干杯。

我们的欢乐也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痛苦。中苏两大民族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庆祝的欢呼会使得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们以及一切的反动派惶恐战抖，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虽然他们不甘于死亡，但是在中苏两国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民紧密团结的力量的打击下，他们也无法延长他们的寿命。

让更多的酒杯举起来，更多的欢呼响起来，更多的友爱的手伸出来，今天的确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一 点 感 想*

我虽然译过十几本书，可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过去我常常说我的翻译是“试译”，而且我只是选译我喜欢的、笔调跟我的相近的书。二十多年来我也犯过了一些错误。虽然我也不是没有小小进步，虽然我现在仍旧在译书，但我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试译。所以我不敢以翻译工作者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今天我只想以一个读者的资格写下一点感想。

我希望任何一本书的译者在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要想到他是为着谁在做这工作。倘使他是为着读者译这本书的，他就应当对读者负责，他至少应当让读者看得懂，而且也应当让读者看了觉得好（倘使那是一本坏书，就用不着翻译了）。“忠实”自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有人借口“忠实”，把一篇漂亮的文章译成疙里疙瘩的念不懂的东西，有人甚至把外国文法原封不动地搬到译文里来，有人喜欢用“如此……以致……”一类从字典里搬来的字眼，以为非这样不能算是“忠实”，这就有问题了。真正的“忠实”，应该是保存原作的风格，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翻译通报》（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五期。

而不是保存外国文句的构造。真正的"忠实"应该是对原作的每一整句的"忠实"，而不是对原文的每一个单字的"忠实"。外国文的一个单字往往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意义，把一个形容词译成中文，也有好几种译法，每一个单字都是跟上下文有密切关系的。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那些改变了原文风格，改变了原文语气，改变了原文意义的翻译并不是"意译"，那只是编译，或"改编"。流畅或漂亮的原文应该被译成流畅或漂亮的中文。一部文学作品译出来也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我读过一些欧洲大小说家的作品。不说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文章绝不是生硬、笨拙、死板、疙里疙瘩的，更不是含糊得有时叫人读不懂的。而且外国人谈话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们说的是活的语言，绝不是像我们在一些翻译小说中念到的对话那样的东西。

这是我（一个读者）的一点感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点意见。我还想举几个小小的例子说明它们。刚巧我手边有一本今年三月出版的"改订初版"的《复活》，刚巧它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我不是在批评或指摘这部名著的译文，我只是借用几个例子罢了。

七十一页，第二、三行，"纯正的年轻男子和纯正的年轻女子……"

其实 невинный 这个形容词在这里应该被解释为"天真烂漫"。

同页第十一、十二行，她最喜欢屠格涅夫的"静寂"（原文，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ей правилось «Затишье» Тургенева.)。

Затишье 有"静寂"的意思，但在这里它的意义是"不挡风的地方"或"僻静的角落"、"隐蔽的地方"等等。这是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小说。C.Garnett 把它译作 A Quiet Backwater(静静的死水)。I. Hapgood 译作 The Region of Dead Calm (非常平静的地方)。这小说已有中文译本(《静静的回流》)。

一九四页第二行，正和昨天一样有了休息，同样地又是吸烟：(原文：Так же, как вчера, делались перерывы, так же курили.)

"吸烟"上面应当有一个在中文里不能省去的主词。这个主词在英文里也是不能省略的，所以 Maude 就把 так же курили 译成 again they smoked. 否则我们怎么会知道谁在"吸烟"呢？

同页第六行，"这个青年现在受审问，被当作了应该保护在免受其害的危险人物。"

原文：Мальчика же вот теперь судили, как опасное существо, от которого надо оградить общество.

英译文：The lad was now being tried as a dangerous creature, from whom society must be protected.

译者为了"保持原文的形式"，反倒把一个重要的名词"社会"漏掉了。照原文的意思"应该保护"的是"社会"，照译文看来"应该保护"的倒好像是这个"青年"了。

一〇一页第三行，"呵，你是那么忽然爱中了你的姑妈们，在她们这里住了一星期……"

这不像是活人的说话，而且也没有把原文的意义和语气完全表达出来。

原文：То-то ты так вдруг полюбил тетушек, что неделю живешь у них.

英译文：Ah, I see how it is you have taken such a sudden fancy to your aunts that you have been living with them nearly a week.

一九五二年

欢迎吉洪诺夫*

看见你的满头的白发和发红的脸庞，看见你的亲切的愉快的微笑，我就想起了我在你们那里过的那些快乐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眼前常常现出你的亲切、愉快的笑容，你，尼古拉·谢明诺维奇，伟大的苏联诗人，伟大的和平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你认识中国人民的"健康、愉快而纯洁的灵魂"，因为你热爱着中国人民。你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关心着我们的斗争，你在那时候就写过叫做《约翰·亨卜登》的小说，希望把中国人民从外人租界解放出来（你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自传中提过这部没有发表的作品）。现在我们人民的斗争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推翻了反动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国家。他们能够用最热烈的心来欢迎你，他们能够用热爱来回答你的热爱，他们因为这个感到荣幸。上海的人民更加兴奋地等待着你的来临。他们愿意让你看见你少年时期的梦在这里怎样成为现实。人民革命的洪流洗净了帝国主义留下的污泥，今天欢迎你的是一个光辉的新的上海。这里的一切应该是你熟习的，因为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早已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日报》。

生在你的理想中，发生在你的梦中。你，伟大的诗人，在这里你一定会得到丰富的诗的材料，因为激动着你的心灵的理想，正激动着这里的人民，他们正走着你们走过的道路。他们的眼前出现着你们追求过的远景，他们的心里激动着和你们一样的感情。你不会因为语言的隔阂感到不便，因为在你和我们中间还有一种语言，那就是爱的语言。爱的语言，友情的语言，常常是简单的，共同的。中国人民愿意把心献给他们热爱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是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为着人类的美好的将来奋斗。上海的人民在解放后的今天，更愿意用热爱来报答在他们受苦时期不断地帮助和鼓励过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以接待你这样的客人为光荣。

我到过你的国家，所以我也更深切地了解爱和友谊的语言。从你们那里我得到很多的东西。每一个到过苏联的中国人都有他的不少的宝贵收获。有人说："你们好像下了决心，要把你们的丰富的宝藏尽量地分给我们带回家去。"另一个朋友说："我们的收获太多了，我们要好好地消化它，利用它。"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曾经列举过我个人的收获。我在"阿斯坦基诺宫"中了解了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发展，也看到农奴出身的天才艺术家的高度的成就。在列宁格勒的"冬宫"里，我参观了一个文明大国的美术宝藏，看到不少的世界珍品。在莫斯科的"特列杰雅柯夫画廊"中，我看出俄罗斯美术发展的道路，而且从许多现代的巨幅油画中认识了苏联人民拥护领袖热爱祖国的深情。在红军博物馆里我看到苏联军队在卫国战争中的辉煌胜利和他们解放欧洲国家的英勇战绩。我到过金碧辉

煌的“大戏院”，我到过富丽堂皇的“红军剧场”，我到过简单、朴素的“高尔基艺术剧院”，我也到过漂亮、大方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厅”。“大戏院”是我常到的地方。在那里我听过人民演员米哈伊洛夫和盖达伊的歌声；看过乌兰诺娃和康德拉托夫，加博维奇和谢米诺娃，斯特鲁奇可娃和拿泡里的舞姿，欣赏过柴科夫斯基和阿沙也夫的音乐。我陶醉在苏联艺术的最高表现中，跟社会主义国家的健康的人民一起欢呼、拍手。再没有比你们的舞台上所表演的更健康、更成熟的艺术了。也再没有比你们的人民更爱好艺术的了。每晚节目完毕，人们站起来疯狂地拍手欢呼的热烈情景至今常在我的眼前出现。他们在为米哈伊洛夫欢呼，在为盖达伊欢呼，在为乌兰诺娃欢呼，在为谢米诺娃欢呼，……你们的人民热爱自己的艺术家，你们的艺术家也了解人民。在“高尔基艺术剧院”看契诃夫的剧本的时候，在“红军剧场”看新编的历史剧的时候，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厅”看苏联民族舞蹈的时候，我也看到同样的热烈的情景。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有了这样高度的艺术成就，而且你们也知道怎样爱它们；你们是慷慨的，因为你们毫不自私地把它们介绍给我们。

所以你可以想到每个中国人听到你说的“将各以所长贡献给中国人民”那句话时是多么地兴奋。我们已经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太多的东西。现在我们带着感激的心情来欢迎你们，我们将从你们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的确应该感激你们。可是再多的话语也表达不出我们的感激的心情。因为有些感情是语言表达不出来，文字说不完全的。今天在这里我能够用

什么话来说明我们的欢迎和感激之情呢？我能够用什么文字来说明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呢？

我想得出你的回答：在这方面语言文字都是不必要的了，因为你们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们。这是不错的。两年前我们在你们那里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们在公共场所被你们的青年包围着，他们对我们微笑，跟我们握手，请我们签名，送我们礼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地址；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爱的语言的确是共同的。两个民族彼此相爱，这就是一切。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是很自然的，很牢固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破坏的。

所以你，尼古拉·谢明诺维奇，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代表，请你和代表团的同志们从这里每个人的笑容中，接受上海人民的热爱和他们的衷心的欢迎吧。

一九五三年

悲痛会给广大人民以更大的力量*

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在苏联，在东欧民主国家，在朝鲜，在中国的内地，我都听见广大的人民敬爱地谈起斯大林同志。他们把他看作最亲近的亲人，最热心的朋友和最好的先生。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斯大林同志给他们带来幸福，带来希望，带来生活里最美好的东西。对他们，斯大林同志是不会死的。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他们中间。他的爱把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宝爱他遗留下来的事业。悲痛会给他们以更大的力量。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个逝世的伟大的人，他们要献出一切力量来使他的事业继续发展，来实现全世界的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幸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各界人民悼念斯大林同志逝世"专栏。

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

全世界的良心因为一个人的逝世悲痛着。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小角落都响起了沉痛的哭声。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爱把所有进步人类的心牵引在他的身边。孩子哭着，年轻人在心里唤着这个亲爱的名字，老年人掉泪叹息，劳动人民以沉痛的心情加紧工作，战士们表示要更坚定地站在战斗岗位。死来得太突然了。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的夜晚，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回这个巨人的生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惋惜自己没有力量挽回这个不可补偿的损失。

今天全世界的良心都向着莫斯科，都在倾听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全体进步人类跟苏联人民一起哀悼这个逝世的巨人。这个人正如中国的一群“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所说，“使饥饿的人得到了饱饭和棉衣，使没有自由和快乐的人得到了解放和幸福。”他是受苦的人的忠实的朋友，他帮助被压迫的民族争回自由。他照亮黑暗的世界。他使荒地开遍花朵，沙漠变成绿洲。在战争贩子们叫嚣着、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向世界人民指出和平的道路，他还用他的全部力量保卫和平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月报》三月号。

的事业。多年来他始终维系着进步人类的希望。苏联人民尊敬他做父亲，全世界劳动人民称他为朋友和导师。当战争蹂躏着、威胁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当饥饿、寒冷和瘟疫使一部分人类受苦的时候，他的事业一直在放射万丈的光芒。克里姆林宫塔顶上彻夜不灭的五角红星告诉世界劳动人民：斯大林同志整夜睁着眼睛在守卫他们的幸福。他为了人类的美好的未来一直不倦地工作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二十几年前说过："我今后也决意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能力，必要时甚至把我的全部热血，到最后一滴，献给工人阶级，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事业。"他真可以说是为了劳动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对于他没有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没有阻碍是不可以战胜的。他是和平与幸福的象征，他是坚定与胜利的化身。他的慈祥的笑容给了劳动人民以无比的勇气，他的光辉的著作是引导劳动人民走向胜利的巨大力量。今天在苏联人民、进步人类与和平事业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声音是再也听不见的了，他的活着的面容是再也看不到的了，谁也不能够到他面前使他亲自倾听自己的感激和决心了。全世界的普遍的悲痛不是没有原因的。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到莫斯科把藏在心中的千言万语向伟大的死者的遗体倾吐！尤其是多年来一直得着他的援助和支持的中国人民！

我的思想也到了莫斯科。我仿佛站在红场上，站在勇敢而善良的莫斯科人民的中间，我的心跟他们的心一起跳动，我的眼睛跟他们的眼睛一起望着克里姆林。我好像听见一群天

真的儿童用非常亲切的声音唤着斯大林的名字，我好像听见许多人用庄严的声音表示决心。再没有比从悲痛中产生的力量更使人感动的了。全苏联的人民都怀着感激地把他们的心献给伟大的死者。他们要保卫斯大林留下的事业，他们要巩固、要发展他的事业。

我的思想又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还在落雪的朝鲜。在那个受难的、英雄的国土上，我曾经听到一位老太太谈起她的恩人斯大林的事情。她说："斯大林把我们从日本强盗手里解放出来。现在在美国强盗侵占我们国土，我们受难的时候，斯大林给我们送面粉来了。斯大林能够长寿多好啊！只要斯大林活着，我们一定会过好日子。"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对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我想得到她今天的心情。她的眼泪会增加她的勇气。朝鲜的英雄的、热情的女性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她们的热爱和感激的。

今天全体进步人类都在说斯大林活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仍旧照常地放射光芒，斯大林的事业也像星光一样地照耀在人间。他的事业吸收了他一生的心血，他的事业里贯穿着他的全量的爱和他的全部理想。他的事业永远存在，他也永远活着。

爱是不死的。崇高的理想是不死的。伟大的人民事业是万古不朽的。斯大林的名字将活在万代人的心中，活在万代人的幸福生活中。世世代代的诗人和歌手将歌唱斯大林的光辉，将歌唱未来人类的幸福、美满的生活与他们感激斯大林的心情。

一九五四年

给小朋友们的祝贺信*

亲爱的小朋友们：

阳光照在我的书桌上，我摊开纸给你们写信，向你们问好，祝你们身心愉快地欢度这个节日。

就在这个时候，窗外响着你们的歌声和笑声。这是多么快乐的声音。我记起来：两年前在朝鲜的山沟中和坑道里，跟志愿军战士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多么想听见这样的声音，他们也多么想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们多么想念你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洞子墙壁上贴着你们的照像（那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就忍不住微笑。你们的照像给了我们多大的快乐。志愿军叔叔们常常在照像下面写着"为了下一代"，或者"保卫我们的下一代"。的确有不少的英雄为着保卫你们流尽了他们的血。同时，你们寄去的慰问信和红领巾，也给了不少的英雄以莫大的鼓舞。你们这样地被人热爱着，你们是多么幸福啊！

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孩子。可是我们的"儿童时代"全是些多么痛苦、多么黑暗的日子。我们那一代的孩子，有多少人流落在街头，有多少人在家里揩眼泪，有多少人望着学校的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儿童时代》第十一号。

门痛哭。

今天在你们前面却是一片阳光，却是一条大路。旧时代、旧社会的黑暗、罪恶都退在后面看不见了。你们安静地在课堂里学习，快乐地在公园里游戏。不论在家中，在学校里，你们的周围都只有爱——不仅你们的父母，你们的教师，而且全国人民都在热爱你们。做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儿童，的确是莫大的幸福。你们要珍爱这个幸福。你们要珍惜你们的学习的光阴，要爱惜你们的美好的环境。你们比我们这一代有着更多、更好的机会，因此你们将来长大起来，也应当比我们这一代更结实，更健康，更有用，也能够比我们这一代做出更多、更有用的事情。这就是全国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也就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教师对你们的期望。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万分紧张，因为六万万人民在倾听从这里发出的声音。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兴奋。这个报告又真实又正确地总结了我们国家五年来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全国人民亲眼看见的。这五年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四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不必依靠数字，谁都可以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国家的飞跃的进步。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自己的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结束了过去受冻挨饿的痛苦日子。六万万人民团结成一个整体，用忘我的劳动，参加祖国的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每一双手都在动，每一个脑子都在思索，每一颗心都充满着爱，每盏灯都发光，每块炭都发热，每个齿轮都在转动，每样工具都在使用。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一个共同的事业。在一个统一的计划下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个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方不在改变？哪一个地方没有斧头和铁锤的声音？哪一处听不见笑声、歌声？哪一天看不到新人、新事？对四川人民来说，再没有比听见成渝路上火车的放汽声更令人感动的事了。还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四川人民四十年的愿望？

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而且正以无敌的力量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面对着这个伟大的现实，我们文学工作者固然感到非常兴奋，但同时也感到万分惭愧。我们不能否认这五年来在文学部门中也曾产生若干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变化，也创造出一些有高贵品质的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一点成就是配不上新中国的整个局面的。王芸生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提到"在文化部门尤其缺少创造性的工作，小说、剧本少得可怜"，这正说明了今天文学艺术落后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人民中间，跟人民一同欢笑，一同前进，却没有充分地表现出人民的欢乐、热爱和团结一致的感情。这个光辉的时代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也显得黯淡无光。我们的作品常常因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稳、照顾周到、人人满意，而变成既不生动又无力量的东西。这些年来有多少文学工作者写过像王芸生代表所说的"干干巴巴、缺少情感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倘使我们不能克服我们的缺点，我们就会被读者抛弃。

我们的缺点的确不少：我们一方面没有用充分的热情歌颂我们国家的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对我们社会中一些不健康

的落后的现象也没有及时揭露和批评。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里充满了新鲜的、光明的东西，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垂死的东西并没有全部消灭。这些东西在新的力量的打击下还时时抬起头来作最后的挣扎。而我们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正好帮忙延长了它们的寿命。有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一再提到官僚主义。的确官僚主义不是经过一反再反就会绝迹的。今天我们还常常从人民口中听到官僚主义的故事，仿佛在读果戈理、谢德林的小说。例如，有些干部来自人民中间，却喜欢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在文牍中消磨日子。还有一些干部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只喜欢听奉承，不高兴听批评，对人民的意见也常常不加考虑。也有一些领导部门常常不经过详细调查、全面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作出决定，发布命令；下级就机械地执行，也不反映真实情况，更不考虑这种办法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这些事实虽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若干损失，但是我们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并未因此而减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和政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跟一切不良的倾向作斗争，我们文学工作者更应该用自己的笔来展开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助政府克服各种落后的现象。在宪法实施以后，我们的政府一定更有办法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坏现象彻底肃清。

各位代表，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区来到北京，我们都记得我们动身时的情景：多少只手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多少亲切的眼光望着我们，多少激动的声音向我们嘱咐。我们把六万万

人民的心带进会场，我们不会忘记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为国家安排一个光芒万丈的前途，为子孙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将来。我们的工作是庄严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回顾了过去五年来的光辉灿烂的成就，再看到全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的欢腾的景象，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更有了信心。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作为人民的代表，我们必须把整个心献给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

谁没有这样的幸福的感觉呢？*

讨论我们的宪法草案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今年的国庆节。想到这个快要到来的全国大欢乐的日子，我就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兴奋得好像心也要跳出来了一样。人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关闭自己的心，不能够不让个人的思想溶化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中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兴奋过，因为我在普遍的快乐中间找到了个人的快乐。我的心跟着六万万中国人的心在跳动，在六万万人的笑声中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的确，六万万人中间的每个人，谁又没有这样的幸福的感觉呢？今天，六万万人摆脱掉长期受压迫、被奴役的历史，挺着身子站起来了。六万万人在自己生长居住的美丽、丰饶、广大的土地上做了主人，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建设更美好的将来。六万万人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过去那些痛苦的日子，阴暗的日子，饥饿寒冷的日子，受人践踏的日子，充满了血和泪的日子，在谁的记忆里都还很鲜明。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经过了什么样的路程走到今天的。今天再没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文艺报》第十八号。

有人关在自己的破屋里流泪呻吟了，今天再没有人冤死在黑暗的监牢里了，今天再没有人饿死、冻死在大街上了，今天再没有人为着衣食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心灵了，今天再没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多数人的痛苦上面了，今天再没有人在外国冒险家的面前低头了。……要是拿“今天”跟“过去”相比，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列举出来，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写一本大书。我们喜欢讲“翻身”两个字，却很少注意这两个字里含得有多少的意思！这是由死到生，由痛苦到欢乐，由黑暗到光明。

这五年来我们读过了多少人的自白。上千上万的人怀着感激的心在报纸上讲他们的翻身故事。对于那许多人，迟一天解放都关系到生死的问题。在旧社会里他们的才能和精力白白地被糟蹋了。今天他们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积极分子，正在用他们的忘我的劳动来改变我们国家的面目。这五年来许多在生产战线上和工作岗位上有特殊表现的模范人物，在过去都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践踏，浪费了青春。过去在贫穷惨苦的环境中，不知道夭折了多少青年有为的生命。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发挥他的才能和精力，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参加国家的建设，改善同胞的生活。今天在我们国家里，每一双手都在动，每一个脑子都在思索，每一颗心都充满了爱，每一盏灯都在发光，每一块炭都在发热，每一件工具都在被使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个地方不在变动？哪一个地方没有斧子和铁锤的声音？哪一个地方没有笑声，没有青年人的歌声？哪一个人不换上一件新衣服，不添一样新东西？不论热闹的城市或偏僻的乡村，都在不断地改变面目。新的道

路修筑了，新的工厂修建了，新的学校开办了，新的农场成立了，更多的矿藏开发了，更多的铁路建筑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有的东西现在改善了。谁没有亲眼看见这一类的事实？谁没有亲身受到它们的益处？谁不因为这五年来的成就而对前途充满信心？谁不因为自己的心和六万万人的心结合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努力而感到幸福？个人为集体服务，而在集体的幸福中得到个人的幸福。每个人在勤劳地工作、和困难斗争的时候，他想到六万万颗心跟他的心在一起跳动，六万万双手在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工作，他会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信心，他会发挥更大的力量。因此他也能忍受更大的艰苦，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不是夸张的话。六万万颗心结合成一颗心，六万万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是多大的力量，多深的爱！靠着这力量，靠着这爱，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有什么事业不能够完成？更不用说使荒地变成花园，在废墟上建造高楼。今天的幸福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始。我们还没有在地上建造了天堂，共产主义的社会更远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还得走长远的路程。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这五年来的成就，望一望前面的美好的远景，再想到我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似的任人宰割的生活，谁能不兴奋欢呼？谁能不对着我们的第一部宪法快乐到流泪？谁能不充满感激之情下决心为着它的每一条款的实施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九五五年

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

我坐在火炉旁边对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他们的母亲面带笑容望着他们。隔壁人家的无线电收音机送来幸福人民的歌声。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四周的人也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更希望各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我们愿望和平和建设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我们愿望各国人民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共同为我们的后代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将来。

坐在火炉旁边，望着孩子们的可爱的小脸，我忽然想起我在朝鲜看见的阵亡美国士兵威尔生的家书。母亲在信上说："你听得见我的声音吗？我在给你唱生日歌，你能够回来多么好。"妻子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我每夜祷告上帝保佑你早日平安归来……天冷，整天看不见阳光，我真愿意盖上十床毯子，免得我冻死！"这就是美国的母亲和妻子的声音，也就是她们对侵略朝鲜的战争的看法。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候，他们真的忘记了美国人民的声音？他们真的不知道美国人民对这个条约的意见？显然，他们害怕母亲们要求和平的祷告，害怕妻子呼唤战场上的丈夫回来。所以他们把“侵略”硬说成了“防御”。

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把它的防线建筑在别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也没有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侵占另一个国家的土地来维护和平和安全。只有希特勒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一类的法西斯国家才这样做。但是它们的下场是人人看见的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和他们的追随者们都说这个条约是“纯粹防御性的”，是“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这是美国侵略者使用惯了的托辞，他们每一次发动侵略的时候，他们总说是在保护自己，是为了和平，这种虚伪的宣传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何况台湾是连美国自己也承认的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跟美国又隔着一个太平洋，台湾的飓风和地震也不会给纽约或华盛顿带来任何损失。只看见美国的飞机、大炮运到中国的台湾，只看见美国军舰侵占中国的领海，只看见美国间谍空投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毁坏美国的一草一木，侵占美国的一山一水。难道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国母亲的笑容、中国城市里的歌声危害了美国的安全和领土的完整吗？难道在工厂、在矿山、在农村用忘我的劳动建设自己国家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危害了美国的和平吗？连年年等着圣诞老人送礼的美国儿童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但是“条约”居然签订了，美国军队居然在中国的领土台湾及其海面上实行他们所谓的“防御措施”了，那

么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打着和平的招牌来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近几个月来在美国的追随者中间常常听得见叽哩咕噜，有人怕得不偿失，抱怨美国统治者犯不着为蒋介石集团出死力。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让美国一部分城市淹在水里，让洪水冲走美国母亲怀中的孩子，却把若干亿美元送到台湾。难道他们特别爱好那一小撮被中国人民赶走的民族败类，不惜派遣军队横渡大洋准备用美国人的血来巩固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其实做惯买卖的商家决不肯做亏本生意。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所爱的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中国领土。他们已经利用蒋介石卖国集团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他们跟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不仅阻止这个三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岛屿归还中国人民，他们还想用台湾做跳板来侵略中国大陆。

美国和它的追随者们用尽漂亮的话来掩饰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所犯的罪行，这些罪行连美国的一些报刊也曾揭露过的。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已经成了一个大集中营，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义中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彭孟缉，就是今天在台湾掌握军权的人。残酷的榨取、压制、屠杀成了蒋介石特务统治的特点，甚至最安分的人也在贫病中坐等死亡的命运。现在到了八百万人的生死关头。台湾人民的苦难激动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良心。台湾人民的求生的权利不是卖国贼用一纸“防御条约”就抹煞得了的。中国人民有权也有责让自己亲爱的同胞脱离苦海。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不过赶走强盗让受害的亲人得到安宁，世界上没有人开门揖盗，也没有人把家屋让给

盗贼，自己甘受欺侮。要是有一个国家借口防御侵占了美国的珍珠港或旧金山，美国人能够容忍么？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对中国人民极尽恐吓之能事。但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吓倒的反倒是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准备拿美国人民的鲜血来做生意的资本了，他们挂起了“防御”的招牌。但是，美国人民了解这“防御”的真正意义。在朝鲜的一次所谓“防御”就给美国人民带来三十八万的伤亡。美国人民还肯为着这样的“防御”再尝妻离子散的痛苦吗？

中国人民的确是吓不倒的。这几年来美国的统治者哪一天停止过对中国人民的威胁？可是今天中国的孩子还在火炉旁边发出快乐的笑声。幸福的中国孩子的声音会传到美国孩子的耳边的。中国的孩子也想听到美国孩子的笑声。而美国的孩子呢？我不禁想起了四年前一个美国朋友讲的一件事：一个旧金山的小女孩听见她哥哥讲述原子弹的恐怖后对她母亲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到一个没有天空的地方去？”这并不是一个小女孩的傻的想法，这是对发出战争叫嚣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及其追随者们的警告和讽刺：美国并不是“没有天空的地方”，世界上也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天空的地方”。

杜勒斯得意地谈他的“选择”，但是他忘记了美国人民也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在和平与死亡之间，美国人民会作出决定的。至于中国人民呢，过着幸福生活的人知道怎样来保卫自己的幸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江山岛的解放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么？

“圣人出，黄河清！”*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见人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我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就读过“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跳进黄河洗不清”，不知道说了多少年代了。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黄河，哪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没有几件与黄河有关的悲惨的故事。今天的中年人一定还记得二十五六年前陕西的大旱灾吧：成群的人饿死在街上，甚至没有破衣掩盖他们的身体，有人把惨相摄成电影，到处放映募捐，可是并没有救活一个灾民。今天活得健壮的人一定还记得十七年前蒋介石政府掘开花园口河堤造成黄河大改道的惨剧吧：灾民一千二百五十万，死亡八十九万人，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五县千里无人烟的“黄泛区”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其实这不过是最近的而且最大的一次水灾罢了。根据历史记载，黄河下游平均每两年多发生一次泛滥、决口的灾害。黄河流域平均每三年半有一次旱灾。多少人为了这条河家破人亡，多少人为了这条河卖儿鬻女。二十九年前的一个春夜我在上海弄堂里听见的山东汉子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日报》。

叫卖小孩的凄凉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荡漾。我和许多人一样，提到黄河就不能不心惊！我和许多人一样，把黄河想象成一条不可制服的吃人的泥龙！

我们的祖先一直不停地在跟这条泥龙斗争，而且早在周朝的时代就不止一次绝望地悲叹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的勤苦耐劳的善良的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遥远的将来："圣人出，黄河清。"这个希望一代一代地传了几千年，人们几乎感到"希望"已经变成不可实现的"梦想"了。

黄河成了一条古今中外著名的灾害性的河流。西方人称它为"中国的灾难"，近代资产阶级的水利专家一则说"根治黄河是不可能的"，再则说将水土保持工作"推行于整个区域而生效，需时或将数百年"，最后说"若干年后黄河下游所有平原将为沙漠所掩盖"。再没有比这个更悲观、更吓人的论调了。

然而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邓子恢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黄河规划的报告拨开了过去一切的乌云和烟雾，让我们看见一个明朗的天。他用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他接着充满信心地用激动的声音说下去：

"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能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谁都可以想象到：迎接这个好消息的是多么热烈的掌声。代表们忘了自己地用力鼓掌。在这一片响彻怀仁堂的掌声

中，应该有全国人民的掌声，也应该有过去几千年的人民的掌声。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天大的好消息：黄河就要变清了！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而始终见不到的这一天已经近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是一步一步地走近了“河清海晏”的盛世。过去那些“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的惨痛日子是一去永不复返的了。我们居然等到这一天，我们居然看到这一天！跟几千年来抱憾终身的我们的祖先比起来，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在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新的黄河像画图似地在我们眼前展开来：一碧千里的河流，两岸碧绿的庄稼，繁密的树林，肥沃的棉田，茂盛的草地。我们看到了一条完全驯服的、细水长流的清河，四十六座拦河坝把它变成了一条“梯河”，在苏联伏尔加——顿河上航行过的旅客会亲切地想象轮船关在闸门里升降的情形，没有人再想到过去那些原始的牛羊皮筏子和独木船了。这四十六座拦河坝要发电二千三百万瓩，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九五四年全年发电量的十倍，以后兰州以下的各个工业城市都可以得到廉价的电源，过去荒凉的西北城市会变成电气化的世界。三门峡的水库可以蓄水三百六十亿公方，比新建成的官厅水库大十六倍。等到三门峡等四处大型水利工程完成以后还可以灌溉土地一亿一千六百万亩。从此万壑千沟的黄土高原将变成良田万顷、果树成林的绿色花园……

我不在这里详细描写黄河的美丽的远景，那是说不尽、写不完的。千百本大书也容纳不下我们祖国的光明的前途。这

不仅是六年后、十二年后的事。我们现在做的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事情。

邓子恢副总理最后结论说："在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一致支持下，在苏联的慷慨援助下，我们一定能够征服黄河，征服长江和其他河流，使它们为我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为我国人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多么有力的声音。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他们的大胆的梦想中也从没有想到积极地利用黄河来为人民造福！

把一条不可制服的吃人的泥龙变成为人民服务的驯服的清流，把"无法防止的灾害"变成人民幸福的根源——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这几年来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们已经看惯了人间的奇迹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顺利执行不就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李赋都同志是一位在黄河岸上消磨了很长岁月的水利专家，他在小组会上作了两小时的发言，最后感动万分地说："圣人出，黄河清"，这是千真万确的话。这个"综合规划"只有在毛泽东的时代才办得到，在过去任何时代都行不通。过去即使有很好的"规划"，也没法执行，即使修好了水库，水库寿命的问题也无法解决，用不了二十年水库就会让泥沙填满，因为做好保持水土的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有充分发挥的可能和机会。

我同意他的意见。的确"圣人出，黄河清"。我们已经看到"圣人"了。今天的"圣人"是党，是政府，是毛主席，是人民。

最美丽、最光荣的事情*

在怀仁堂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出席会议的一千一百多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致用热烈的掌声来表示他们的兴奋和喜悦。在鼓掌的时候，我常常掉头去看那些我认识的脸，没有例外，我的眼光接触到的全是愉快万分的笑容。在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内，我们遇见每一个熟人，彼此含笑地打招呼，声音和握手都含有祝贺的意思。会场里好像在办喜事，代表们互相祝贺，不仅为了我们国家过去几年在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而且还为了我们更光辉的前途和更美好的未来。连以前难得见面的人现在也像老朋友似地在一处畅谈美丽的远景。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社会主义近在眼前，它是可以摸到的实在的东西了。大家还有一个同样明确的感觉：活在这个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文艺月报》八月号。

时代是万分幸福的。

我们这一千一百多个代表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民族：我们的年龄不同，服装不同，口音不同，习惯不同，职业不同。但我们的心却是相同的，我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不论在大会上或小组会上，我们发表意见的方式即或不同，我们的意见却还是一致的。我们去年在这里一致通过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宪法，一致地选举了我们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一致地在这五个报告里看到六万万人民的指路标，看到我们国家的飞跃的进步和光芒万丈的前途，看到我们后世子孙无限幸福的保证。我们一致地看到了"河清海晏"的盛景。有的代表充满感情激动地说："'圣人出，黄河清'，这是何等样的太平盛世啊！"有的代表用自豪的口气说："我们现在有充分的力量保卫自己的国土了。兵役法就是一个保证！"有的代表欢欣鼓舞地说："反革命分子的揭露和逮捕是我们工作中的一大胜利。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更有了保证了！"

连平日害怕"枯燥无味的数目字"的人对报告中的数目字也发生了浓厚的感情。大家都说要把数目字全部牢记在心中。的确，每个数目字都有一种丰富的内容，都有一种说服人的力量。每个数目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一个动人的故事，一首鼓舞人的诗，一盏给我们照路的明灯。

倘使我从书本上和口语中找出最漂亮的话来赞美这些数目字，也不会有人责备我过分，因为代表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数目字集中了六万万人民的感情，体现了六万万人民的

共同愿望。有了它们，我们决不会走弯路；靠着它们的指引，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稳步地走到社会主义。

所有的代表都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在大会里一致通过这些报告，大家尽早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全国人民，让我们大家，让全国人民用实际的行动来迎接这个喜讯。没有全国人民的忘我的劳动和献身的精神，什么伟大的事业也不能完成。但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谁又不愿意献出他的全部力量呢？

现在大会的全部议程已经圆满地进行完毕，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闭幕了。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预决算、黄河规划和兵役法在全体代表的热烈的掌声中一致地通过了。国歌奏完以后全体代表热烈地鼓掌、欢呼。大家把手都拍红了，还不断地在鼓掌，全会场的眼光都集中在毛主席的充满信心和喜悦的笑脸上。大家实在不愿意离开会场。甚至在走出怀仁堂以后我的耳边还响着大家的热烈的掌声，我的眼前还现着毛主席的笑脸。我想起了我去年说过的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事业奋斗，这是人生最光荣、最美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难道今天还有比为着实现五年计划而奋斗更美丽、更光荣的事情么？

7月17日写，31日改写。

迎接我们祖国的明天*

一连串的汽车从旅馆门前广场上开走了，车窗里好像还有人在挥手，好像还有人在说“再见”。整个旅馆突然静下来，灯光也突然减少了。这些汽车在一个月前把代表们从火车站接到旅馆里来，现在又把代表们送到火车站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动身离开北京了。

火车在铁轨上飞奔。这些列车要把代表们送回到各个地区去。火车带着一种不可拦阻的巨大力量向前奔驰，车轮的声音使人想起我们国家的前途。新中国正以一种不可拦阻的巨大力量走向社会主义。每个人都应该听见它的前进的声音，每个人都应该看见它发出来的光辉。

火车在铁轨上飞奔。汽笛声好像要划开黑暗的天空。灯火万千的北京在后面已经很远了，可是代表们的心还留在我们的首都。代表们一直在回忆过去一个月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生活：那些具有说服力的报告，那些动人的场面，那些热烈的讨论，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忘掉一切的尽情欢呼。

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觉得有满腹的话要倾吐，有满腔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九月《西南文艺》九月号。

的热情要宣泄。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看透他的心，让别人分享他的欢乐。再冷静的人也要大声欢笑，七十以上的人也觉得自己年轻。因为他们全看到了更广大、更光明的幸福世界。我们的祖先想望了一生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我们自己想望了半生而一直看不到的东西，现在就在我们的前面发光——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有着强大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不再是空想的、或者遥远的东西。它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用了多么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我们在小组会上所热烈讨论、在大会中所一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非常明白地给我们说明了未来的美好的前途，给我们绘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图。它还用具体的数目字来解释我们怎样一步一步地接近我们的目标：多少公里铁路，多少个矿山，多少吨钢铁，多少辆汽车和拖拉机，多少个工厂，多少斤粮食和棉花，……凡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没有一项遗漏，而且照我们力量所能办到的逐年建设，逐年增加产量。不夸大、不保守，它说明我们国家正在脚踏实地地前进，而且快要走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半的路程了。看到那些内容丰富的数目字，每个人眼前就立刻出现了冒烟的高烟囱，发亮的新轨道，碧绿的贮水池，人声嘈杂、机器轰鸣的工地，起波纹的稻田，堆满粮食的仓库，和书声琅琅的学堂……难道还有比这些更具体的？难道还有不曾包括在那些数目字里面的？难道还有比五年计划更切实可靠的指路标，和更具体的幸福的保证？我们接着一致通过了国家的预算和

决算，那许多数目字给了我们更大的鼓舞和信心。它们使得连最会挑剔的人也没有怀疑的余地了。事实胜于雄辩！过去一年的成就保证了今后更大的胜利。而且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学会了不少的本领。我们的建设工作上、生产战线上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的模范人物。在我们中间就有王崇伦、张明山、孟泰、郝建秀、李顺达、曲耀离、申纪兰、陈树兰、陈永康、陆阿狗……我一下子写不完那许多光辉的名字。但那些名字却是顺利完成五年计划的一个很有力的保证。

我们一致通过了兵役法。兵役法，这不是我们完成五年计划的一个最有力的保证么？这不是巩固我们祖国国防的一个最有力的保证么？"我愿意把我的青春，把我的光和热献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如彭德怀副总理在报告中所说，"我国有无数（像许元清）这样忠心报国的青年"，他们把保卫祖国当作他们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我们的国防才能够长期巩固，国家的建设计划才能够顺利完成，不会受到外部敌人的干涉破坏。"保卫我们祖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我们哪一天没有听见解放军战士的这样响亮的声音？公安部队也百倍警惕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让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破坏我们的建设。

我们一致地通过了"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再没有比"模型展览"更具体的说明了。讲解员那么流畅地解说黄土高原变成肥沃良田的远景，那么自然地叙说未来的"黄河清"的故事。在苏联伏尔加一顿河上航行过的人，对于四十六座"梯坝"感到特别亲切，对三门峡水库的美好的远景也更容

易了解。然而最使我们的心激动的还是邓子恢副总理在报告中所引的两句诗：

> 我若不把洪水治平
> 我怎奈天下的苍生

郭沫若副委员长就这么恰当地写出了"禹的这种伟大的抱负"。这抱负对今天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位黄河水利专家兴奋地说："'圣人出，黄河清'，这说明我们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人的幸福。"他举出不少的事实说明，只有在今天才可能有"黄河清"的奇迹出现。改变大自然的面貌，使这条"古今中外著名的灾害性的河流"变成对人民有利的东西，这样的大事只有在人民掌握政权的今天才能够实现。我们不但有力量征服黄河，而且征服长江的计划也已经在草拟中了。对西南人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火车不停地向前飞奔。它像一条火龙似地冲破黑暗，载着六万万人民盼望着的好消息向各个地区驶去。它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散布到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让六万万人民用忘我的劳动来迎接我们祖国的明天。

明天的太阳一定比过去的更亮。明天的大地一定比过去的更美。我们祖国的面貌天天在改变。火车本身就是一个光明的使者，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建设计划的一个最好的说明，我们国家的飞跃进步最有力的证据。谁没有看见丰沙路上的六十五个隧道？谁又能忘记宝成铁路的艰巨工程？这几年来

修建的铁路哪一条不说明中国劳动人民的无比的智慧、无穷的力量和无限的为祖国建设事业献身的精神！这一切不就是完成“五年计划”实现六万万人民共同愿望的必要的条件和最可靠的保证？

火车带着巨大的吼声继续向前飞奔。车窗外的夜色渐渐减淡，天开始发白，平原上天边出现了一抹浅红。天快亮了。全中国的人民将以无限欢快的心情和无比坚定的信心迎接我们祖国的明天。

一九五六年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

在这个会上我很兴奋地听到了茅盾同志、周扬同志、老舍同志、刘白羽同志、陈荒煤同志和康濯同志的内容丰富的生动具体的报告和补充报告，这些报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和出席会议的同志们一样，对六位作报告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们的报告我没有多少值得提说的不同的意见。我也不是代表我们的小组发言。请允许我在这里谈一点个人的感想。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被人称为作家的。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只是因为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没法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我把写作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写就没法安顿我那颗痛苦的心。我并没有想到发表、出版的事。然而等到我的小说出版了几本，我被人称为作家以后，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五、六号合刊"在中国作家协会……发言"专栏。发表时有如下编者按语："这里发表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一部分发言。有些发言，由编辑部作了一些节略。……"

我就觉得我的肩头挑上了沉重的担子，我的责任感也加重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更清楚地感觉到我不配接受作家这个称号。我并不是在这里作自我批评，或者表示谦虚。我是说，要做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同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承认作家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就必须拿出好作品来，免得辜负这个称号，免得辜负这个任何人不能不热爱的时代。作家的称号只能加重写作者的责任，它并不是装饰才能的花冠。单靠作家的称号并不能保证好作品的产生，单靠才能也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常说才能不是完全可以培养的。然而对作家来说，才能并不是一切。无论如何现在已经不是"出口成章，一挥而就"，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时代了。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缺少了这些，最有才能的作家也会写出失败的作品；写过一本好书的人也可以写出一本坏书。我们都知道，连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凭空捏造生活；一个从未见过英雄人物的作家，即使搞通了写不写缺点的问题也写不出一个英雄来。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然而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就没法正确地认识生活，分析生活，他会把全副精力消耗在表面的现象上面，他即使见到英雄人物，他也不会认出英雄气概来。没有正确的立场，没有爱憎，就写不出活生生的人；对新事物没有感情的人就写不出值得人欢迎和热爱的新鲜事物。作家要是没有一肚皮的话想告诉人，他

怎么能写作？作家要是没有自己想说的话，他为什么要写作？现在谁都承认文学是教育的工具和战斗的武器了。要是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分明的爱憎，没有对生活、对人的热爱，没有感到有使用这个工具和武器的必要，那么拿这种工具和武器做什么用呢？有人下决心要做作家，请别人告诉他写作的窍门。我觉得写作是没有窍门的。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窍门。我们固然可以把写作看成一种职业，但是作家跟民间手工业者不同，写作也和做桌子椅子两样。这里只是性质的不同，并没有高低的分别。固然任何工作都需要强度的劳动，写作也不是例外，但是我们可以造一万把式样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个美观的图样做一百个景泰蓝花瓶，我们却不可以写一篇内容和已发表作品相同的小说。要是我们这样做了，就会有人说我们"抄袭"，因为创作里必须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完全摹仿就不是创作了。不久以前曾经有人主张用"合作"的办法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把几个人的译本揉在一起成一种新的译文，说是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我想原作者一定不会同意这个办法，因为它抹煞了作品的个性。也有人把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拆散，交给几个人翻译，这是同样地看不起原著，也不尊重原作者。我并不是说创作不是集体的事业。相反的，我强调地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而且完全不是作者个人的事业。但是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吴敬梓写不了《红楼梦》，曹雪芹也不会想到写《儒林外史》。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人是好朋友，但是

李白写不出杜甫那样的诗。高尔基的《草原上》和契诃夫的《草原》完全不同，萧洛霍夫的小说与法捷耶夫的小说完全两样，不管高尔基和契诃夫是好朋友，法捷耶夫跟萧洛霍夫是同时代的大作家。即使是具有同样正确世界观的作家，也会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面，也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我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因为任何天才的作家也得依靠当时的社会和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也会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受到影响；像普希金那样的大诗人也曾得到他那个会讲故事的老保姆的帮助。即使写历史小说，也得先了解人，了解生活。人们从前喜欢挖苦亭子间的作家，其实做一个亭子间的作家也得先在社会里混了一些时候，才关在亭子间里写作。一辈子关在亭子间里的人，连活都活不下去，哪里谈得上创作。我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还因为作品必须在读者中间起作用，在群众中间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即使一个作家花去五年十年的劳动写成一本坏书，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发表他的作品，让它在群众中间产生坏的影响。他应当考虑怎样再花若干时间重写他的作品。作家没有理由要求保留他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或每一本书；相反地他得要求自己严肃认真地、全心全意地使用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工作。一个作家即使写过十部好作品，但是他写第十一本小说的时候，他还是应当像初学写作者那样拿出他的全副精力。对于作家来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而且今天的作家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面，现实跑得太快了，坐汽车坐飞机去赶都怕赶不上，倘使还满足于过去一点小小的成就，不肯向前看，那

么他一定会被人民抛弃，掉在泥坑里爬不起来。

倘使大家认为以上的说法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请允许我说出我的一个结论来：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至少也得有拿起笔写完若干字的时间，而且也得有执笔以前的酝酿、思索的时间。我想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去年十二月我送一位西德政论作家上飞机，我们都到得很早，正坐在候机室谈应酬话，他忽然说，近两个月你们这里外宾多，你们像这样接送客人，恐怕没有时间写文章吧。我不知道这是关心还是挖苦。我只好说，我也不常接送客人。但是我得承认这只是我个人的愿望。事实是：有一个时期火车站和飞机场已经成了我们几个人(有作家也有音乐家)的会客室了，一天跑两次也是常事。我承认这种工作很有意义，而且我出国访问，外国朋友们也在车站、机场接送。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否则，我们在为上面所说的必要的活动花去大部分时间以后，还得检讨自己没有完成创作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检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所以必须有作品。但是作家写作品也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时期。现在大家一致谴责"一本书主义"，这是对的。"一本书主义"必然会把作家(即使是很有才能的作家)引到堕落毁灭的路上去。所以我们应当敲着警钟把相信"一本书主义"的人从陷坑里拉出来。我们也应当帮助写了第一本书的人写第二本书，不要旁观着一

个刚发表一两篇小说的作家给几个出版社的合同弄花了眼睛，或者把时间完全花在做报告、讲创作经验、出席各种会议上面。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他离开生活。固然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工作方法，但是谁都离不了生活，谁都不能不热爱生活。特别是今天的朝气蓬勃变化万千的生活会使得最冷静的作家也不能无动于衷。先进人物的忘我的劳动对于作家也是很大的鼓舞。写作也需要强度的、忘我的劳动。即使有人从火车站、飞机场、会议室回家以后马上就拿起笔写小说，然而也有人在思索了几小时以后才能够动笔，也有人工作一旦被打岔，就没法即刻回到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上。草率决不是成功的方法，我们单单看一页托尔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创作需要着什么样的劳动了。而且既然承认文学是教育的工具和战斗的武器，我们就更不能容许草率。要繁荣创作，要提高创作的质量，就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作家的学习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改造对每个作家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们也得跟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产生效果。学习和改造都是没有止境的，改造得好些的人工作也做得好些。但是我们决不能等到改造好了才动笔，犹如我们不能先学好一套描写英雄模范的本领，才到生活里去访问英雄模范那样。对于某一些人，最好是让他先跟英雄模范们在一起生活一个时期，等到他有了描写英雄模范的创作欲望时，再同他讨论怎样描写英雄模范，或者就让他多写英雄模范，然后就他的作品的优点和缺点来讨论，向他指出他应该努力的方向。倘使一个作家装满了一脑子的优点缺点去找英雄模范，

结果他看见的不是人，只是一些优点缺点。作家离开了创作实践，是不会有进步的。作家必须不断地写作。写作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作家用写作来为人民服务。广大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更多的作品，而且更好的作品。所谓创作繁荣就是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地发表、出版。我已经说过，创作不是个人的事业，这是集体的事业。因此对于作家单是责备和期望是不够的；让所有关心创作的人一齐努力，帮助作家完成文学创作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发言，我想起了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去年对上海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苏联朋友的热诚的鼓励多么使人兴奋。我们的确是幸福的：我们生活在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多么可爱的国土上，多么勇敢勤劳的人民中间，在我们周围有着充实、多彩的生活，在我们前面展开更光辉、更美丽的未来的远景，我们有取之不尽的丰富题材，我们有千千万万的爱护创作的热心读者。我们的作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着作用，我们自己也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教育。我们跟着时代前进，时代推动我们前进，我们的作品也可能推动时代前进。德国作家亨利希·曼说过："今天的书就是明天的行动。"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开放花朵，我们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主义大建筑物中加一块小小砖石，我们正在做着我们前辈作家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在六万万人民用整齐步伐大踏步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每一个作家都会感觉到人民的心、读者的

心、跟作家自己的心挨得多近。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的确是莫大的幸福。为了不辜负这种幸福，为了配得上“今天的中国作家”这个称号，让我们的血沸腾，让我们的心激动，让我们点起不灭的心灵的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我们的事业，用我们的全力，朝着现实飞奔，跟着六万万人民一同前进。真正的文学繁荣的时期就在我们的眼前！

工程师周启章*

第一次看见周启章工程师的人，会觉得他是个极普通的人，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个。他不大爱讲话，脸上常常带一点谦虚的微笑。还有，他个子不高，眼睛小，戴着近视眼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老蓝布制服。倘使你去了解一下这位一九五四年上海市工业劳动模范的生活，你就知道，他今年三十四岁，一家三口人加上一个保姆，住一间屋子，烧饭的炉子就放在房门口。晚上等小孩睡觉以后，他才坐下来用心读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电机方面的书籍杂志。他跟他的爱人感情好，他喜欢他的三岁的小孩。厂里同志们称赞他的生活朴素，喜欢他的谦虚、亲切。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当然不只周工程师一个，但这也不是说周工程师没有特点。他的确有特点。他的特点在他的心里，我指的是他的责任心。他有着很强的责任心，所以他能够比其他同志做出更多的成绩。替他算个账：单单在一九五五年里面，他就设计制成了十六种新产品，提出了技术改进四十七件。今天他手里还有四种新产品在设计制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二日《光明日报》。

里面就有达到国际水平的新产品。他自己不喜欢谈这些，他跟人谈起来，总说是靠大家帮忙，把领导和工人同志都包括在内。但是别的人却喜欢谈他的事迹，觉得这是值得谈的，那么现在就举出一件事来谈吧。

一九五五年四月里，有一天一位采购员到公私合营上海新安电机厂来定货。他要定一批交流发电机，交货期限是四个月。他的要求是电压调整率在10％到15％之间。他还添上一句话：最好在10％以内。

这张定货单接下来了。不过厂里还没有制造过这种规格的产品，所以厂长关心地问周工程师："老周，你看能行吗？"周工程师含笑点点头："能行！"他照例话说得少，可是心里想得多。厂长知道这个人的脾气，他在工作上最爱动脑筋，也最肯负责。他说"能行"，一定有把握。

周工程师的确有把握。他知道这种产品按照老式设计制造，也很简单，而且可以如期交货。但是像周工程师这样的人，凡是可以动脑筋的地方，他都要动动脑筋。说起"钻研"来，他的思想真要钻到机器的"灵魂"里去。他也知道按照老式做，并不经济，要浪费很多材料，而且调整率很难做到10％以内。凑巧他心目中有一架更好更省的交流发电机。两年来他在这上面已经花了很多心血了。倘使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新产品，那些难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制造新产品，他现在有没有成功的把握，他不怕耽误四个月的交货期限？……

一直到下班以后坐电车回到家里，周工程师还在想这个问题。到了家，照例是爱人的笑脸和孩子的笑声欢迎他。他脸

上虽然带着笑容，可是他的爱人已经猜出他的心事来了。她半怜惜、半体贴地看了他两眼。吃过晚饭以后，她就抱着孩子出去串门，让他一个人安静地想他的事情。

他的确反来复去地想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他的思想老是围绕着他心目中那架交流发电机转来转去。他在一九五三年夏天，亲眼见过它。那个时候，他跟厂里许多工人一起到文化广场去参观民主德国工业建设展览会，在那里一架古怪的发电机吸住了他的眼光，机器上钉着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着“自动调压交流发电机”。他在机器四周走来走去，看了又看。这架发电机是半封闭的，内部的构造他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心里暗想：“是不是里面装得有电压调整器？不然怎么能够自动调整呢？”他看了好久，还是得不到答复。他走过去，又回转来，终于开口问讲解员，能不能拆开看一下，讲解员摇摇头说：“不能拆。”这个回答并没有使他灰心。他仿佛看见了远远的一股亮光。他得到启发了。他记得他还在交通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想到设计制造一种不带外加电压调整器的发电机，一九四三年毕业出来，一直到一九五〇年进新安电机厂，尤其是在新安厂公私合营以后，他才有机会把他的技术和知识用到正路上去。他才有机会学习，有机会改进技术，有机会设计制造新产品。每当他得到一点点小成功的时候，他就想到更多的新产品。这样的发电机也是他常常想到的，因为倘使能够制造出来，它的成本低，效用大，而且在农村使用很方便。现在他亲眼看见这样的发电机了。他想：“既然民主德国可以制造，我们中国也一定能够制造。”但是怎样制造呢？他在书本

上、杂志上去找材料，却始终找不到。过了一年半，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他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一本电气杂志上，意外地发见了一篇关于这种发电机基本原理的论文，他兴奋地读了几遍，他觉得眼睛一下子亮多了。厂里总工程师是他的老师，他拿着论文向老师请教，又去找别的两三位工程师共同研究。经过相当时间的反复讨论和研究，他对于基本理论总算是了解了。虽然对它的内部构造还没有一点把握，可是他觉得他已经找到一把开门的钥匙了。他没有理由站住不朝前走。……

就是在这个时候，机会自己找来了。这是机会，但也可以说是"考验"。他面前现在有两条路：按照老式做，虽然有缺点，但是可以应付过去——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另外的一条，试制新式，却是艰难的路。"要是失败了，怎样按期交货呢？"他在一阵兴奋之后，就会想到这个上面来。他好几次提起笔进行设计，可是一想到失败，他就把笔搁下来。但是搁下笔他又不能不想：照老式做，太浪费材料，而且调整率又不太好，对客户不能说是尽了责。他想来想去，一直不能决定。他后来轻轻吐一口气，对自己说："算了吧，等到研究好了再来设计试制也行。"可是他刚刚这样一决定，马上就觉得心上搁了一块石头。他仿佛看见一吨多的铜堆在他眼前。"这样宝贵的东西，我不能白白浪费！明明可以节省的！这样实在对不起国家。这是不负责！"他暗暗地责备自己。他想着，想着，连午觉也睡不着了。想来想去，他毕竟想出了一个办法：老式的和新式的每样都先试做一架，看哪一样好，就照哪一样做。"可是照这样做，就更得抓紧时间了。

他马上去找厂长，提出了这个办法。厂长听到他那激动的声音，望着他笑了笑。厂长了解他的心情，也重视新的产品，就立刻召集生产科同绘图组有关的同志开会，讨论周工程师的办法。在这个会上，一些实际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周工程师开始紧张地工作，他在三天里面就把新产品的设计全部搞出来了。其他部门的同志也没有人愿意落在后面。不到两个月，新产品就制造成型了。在制造期间，周工程师不断地到车间去，跟工人一块儿研究，向他们讲解，也向他们征求意见。全厂的同志们对他的新产品都感到兴趣，也热烈地盼望着新产品的成功。

新产品"校验"的那一天，周工程师很早就到了"校验间"。他设计制造的新式发电机被一只马达拖着转动得非常快。校验工程师忙着接线，扳各种闸刀开关，来回看电表。到了应该发电的时候，新式发电机却发不出电来。原来槽子打穿了。马上请了老师傅来抢修，修了一天半，修好了。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一天半的特别长的时间，周工程师心里想："这次应该发电了吧。"他没法制止自己的激动。

第二次还是发不出电来。周工程师急得满脸通红，到处检查，他以为是线接错了，便请章嗣法老师傅把线拆掉重接，拆掉以后才发见线并没有接错，仍旧得接回去。线很多，忙得章嗣法满头大汗，忙了半天，仍然没法叫机器发电。章嗣法没有一句埋怨话，反倒用同情的口吻安慰周工程师。

失败的路就摆在周工程师的眼前了。他有点灰心，他又有一种抱歉的感觉。许多人为着他的新产品忙了好些天，花

费了多少的心血，要是真的失败了呢？离开“校验间”的时候，他真有一点懊丧的样子。可是回到家，他翻开民主德国的那本电气杂志，他觉得又有勇气和信心了。他想来想去，想了一个晚上，他对自己说：既然理论上有把握，又有条件，决没有搞不成功的道理！要是不成功，一定有原因。我明天找技术检查科同志一块儿好好研究一下。

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技术检查科的同志们商量，大家在一块儿仔细研究，终于找到了毛病的根源：明明是稳定器气隙不对！“气隙”调整好了再开车校验，只听见校验工程师高兴地叫起来：“发电了！”“发电了！”

“发电了！”整个“校验间”都响着这种欢乐的叫声。

周工程师做梦似地朝校验工程师看了一眼，他对着自己想望了好久的这架“自动调压交流发电机”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畅快地笑了。

这个新产品后来经过许多次试验，都合标准。谈到它的优点时，大家都说：电压调整率只有2%，成本比老式的降低14.6%，而且对农业电气化会起很大的作用……后来这种产品改由华生电器厂生产以后，它的全套图纸也就毫无保留地转给华生厂了。周启章工程师对这件事情只感到高兴。他的技术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有一点点的贡献，他已经感到万分满意了。

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萌芽》半月刊的创刊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以后青年作者就有了自己的园地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园子里"百花齐放"的美丽的远景，同时也可以想象到你们编辑工作者责任的重大。希望你们发挥社会主义的热情，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个工作。

听说有人不喜欢"萌芽"这个名称，以为"萌芽"就是幼稚，就是弱小，我却觉得"萌芽"正可以说明这个刊物的内容和意义。任何美丽的花朵，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由萌芽长成的。而且任何萌芽只要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养，就会展开它那"欣欣向荣"的前途。谁都可以在萌芽上看到蓬勃的朝气。《萌芽》半月刊发表的绝不是"弱小"、"幼稚"的创作（大家不要低估刊物的水平，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的作品），相反的，刊物应当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绍给读者。同时，刊物的编辑部也应当以细心、周到和热情的态度对待来稿，而且有责任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进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萌芽》创刊号。

们的"文坛"。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摸索地走了二十几年，我至今还不配称为"成熟的作家"，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培养工作的重要。(降低刊物的水平发表粗糙的作品，并不是培养；所谓培养应当是：帮助作者认识生活，扩大他的眼界，启发他的心灵，丰富他的修养，使他逐渐掌握艺术技巧，并且了解创作是如何艰苦的劳动。)我感谢若干年前把我的第一部小说介绍给读者的刊物编辑人，我也为我后来在摸索中浪费掉的二十几年的光阴感到可惜。我常常想，倘使我能够在什么地方得到更多的阳光和雨露，我今天或许有值得提说的成就也未可知。过去的时日是追不回来的了。在这方面，今天的青年作者是值得羡慕的。

亲爱的编辑同志，在《萌芽》创刊的时候，请你们接受我的诚挚的敬意，我祝你们工作的顺利，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祝我们的文学事业光辉灿烂，万古长青！

1956年6月。

“鸣”起来吧！*

现在没有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不同意了。

可是还有人在担心会不会“鸣得好”。也有人主张只有成“家”才有“鸣”的资格。更有人在“百家争鸣”四个字上面下了不少测字的功夫。

大家谈的无非是“百家争鸣”的好处；大家关心的无非是应当怎样“鸣”的问题；大家害怕的无非是没有领导的“乱鸣”。

我觉得这些已经谈得够多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让大家先来“鸣”一下吧。倘使把时间大量地花在事前的讨论上，等到得出结论，定下不少新的清规戒律，号召大家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

“百家争鸣”并不是运动，也不是大张旗鼓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绩、胜利结束的。这是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长久方针。所以还是大胆地让大家齐鸣吧。请不要低估群众的水平，因此也用不着害怕“乱鸣”，群众不会拥护“乱鸣”的。

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要是没有人“鸣”，那么一切的讨论和号召岂不是成了多余的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署名余一。

“独立思考”*

读了玄珠同志的《谈独立思考》，我有点感想。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怎样独立思考呢？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我想，绝不是。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署名余一。

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要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说　忙*

余今同志在那篇叫做《忙》的短文里用教训的口气说："'忙'的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必须老老实实地工作。一切说'忙'的人，请拿出些真正的工作成绩吧！"

余今同志一定知道今天凡是有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不忙的事实吧。

忙的人中间现在的确有不少说"忙"的人，譬如劳动模范开会忙、社会活动忙、做报告忙，不能在岗位上"老老实实地工作"；学生负担过重，常常在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有些地区百分之十以上的中学生患肺结核、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症；教师负担过重，还要加上校外活动，没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作家没有时间从容地写作……这些事实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已经有人提过，而且报刊上也已经指出过好多回了。但我们现在也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把事情看得非常单纯，把生活看得非常单纯，把人看得非常单纯。听见人说"忙"或者叫"负担过重"，立刻就想到"偷闲"，想到"个人主义"，想到"小资产阶级思想"，觉得非给以闷棍不可。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署名余一。

希望余今同志不是后一种人，希望他在短文内所指责的不是前一种人。否则劳动模范、教师、作家等等……都可以向他要求：给还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工作"吧。

余今同志能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呢？

他们正是为了想"拿出些真正的工作成绩"，才说"忙"的。

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近两年来各方面对我们的图书发行工作提过不少的意见。可是新华书店至今没有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大概又是"一拖了之"了。我们不是有过一句俗话："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吗？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报纸上可能又会发表一篇"一九五六年图书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成就"，不论是消息或报告，说我们出版、发行了多少种、多少册书，而且数量增加得很快。质量呢，好像这是不值得考虑的。

读者抱怨买不到书；出版社抱怨好书销得少，而新华书店决定印数时又太武断；新华书店抱怨出版社的新书内容介绍写得简单而不可靠。始终不见有人出来考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只要完成任务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上级"给的任务偏偏又是多少种和多少册。倘使出版社出不够多少种和多少册，新华书店销不到多少种和多少册，就得受批评作检讨。只要出的、销的不是反革命的书刊，那么即使不出、不销一本好书（这自然是假设的话），也会受到表扬，因为任务是超额地完成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署名余一。

大家都在为着完成任务努力。为了完成任务，出版社只消出足那许多种和许多册书，反正一本书付印前新华书店就定了销货数字，照“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老规矩，用不着愁书销不出去。新华书店虽然没有看到图书，单凭百十字的内容介绍就代读者决定了他们的需要，但是分店负责人心里想：这些数字是从门市部营业员那里来的，总不会错。书印少了，读者买不到，这叫做“控制发行”。读者应该学会“有啥买啥”，要是书印多了，而读者又不肯买，还可以大批地送到图书馆去，而且还可以利用发动赠书的机会。后一种尤其是出色的推销办法。例如今年上海发动赠送农村青年图书的时候，东郊区高桥镇就收到一千五百册赠书：一种九百册，一种六百册。新华书店的销售任务完成了，而农村青年看书的权利就给剥夺了。又如今年上海发动“六一”赠书的时候，新华书店一次销出了四十万册的存货。上海新华书店可能因为完成了销货任务受到表扬，可是多少儿童就失去了看书的机会。单单从最近新华社记者杨瑛同志揭露的事实看来，我们的图书发行工作也有彻底检查的必要了，新华书店的销货办法也有认真改革的必要了。

我们应当记得一句老话：“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他也需要精神的食粮。希望在图书发行工作这方面有职有权的同志们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

观众的声音*

刘金同志在讨论“百家争鸣”的座谈会上讲过这样的话：

> 这出戏(指越剧《箍桶记》)本来是以九斤姑娘的胜利为结束的，旧社会的民间艺人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使九斤姑娘在石家占上风。可是华东戏曲研究院的某些同志却没有这个气魄和信心，而要给九斤姑娘一个悲剧的下场。……我也曾间接的提过意见，但戏曲研究院的同志认为他们是专家，不会错的，对我的意见“相应置之不理”。……

这段话在那些陶醉于戏曲改革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的人听来也许是新鲜的吧。其实这几年来已经有不少的观众这样地“鸣”过了，不过这些鸣声一直给压在“保守思想”的大帽子下面，没法引起“专家们”的考虑。有人把戏曲界的“百花齐放”归功于戏曲改革的工作，却似乎忘记了观众、忘记了艺人，也忘记了过去那许多优美的剧目。有人强调戏改工作的必要，却似乎忘记了多年来我们许多优秀的艺人就一直在改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五日《文艺月报》八月号。署名余一。

而且用他们继续不断的创造给我们的古老剧目以新的生命，像梅兰芳、周信芳这些大艺术家就是戏曲艺术的革新者。戏曲改革并不是从最近几年、也不是从演员以外的人开始的。但是撇开演员的舞台的创造，用大刀阔斧把剧本斩来砍去，将观众爱好的保留节目改得面目全非，或者在地方戏曲音乐中加上西洋旋律和开幕前的合唱，使古代的才子佳人在中西合璧的音乐伴奏中谈情说爱，叫许多不同的剧种渐渐成为一个同样的新歌剧，这却需要着更大的勇气。从"百花齐放"做到"百花一放"，这也需要艰苦的劳动。我佩服这些"专家们"的勇敢和毅力，可是我却不能赞美他们工作的成绩。随便举几个例子：叶盛章的名剧《三岔口》多少年来受到观众的欢迎，现在一被"改革"，黑店主改成英雄，真打改为误会，武丑变成武生，使得叶盛章的许多拿手绝技都没法在戏里施展了。有人说，西洋的观众欢迎它，因此中国的观众就更应当欢迎。有人认为戏出了国，得到了掌声，算是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的观众就永远失掉了发言权。但是我还有疑问：西洋的观众就只喜欢"误会"、"虚惊"和莫名其妙的一场白打？西洋的观众就不能容忍舞台上坏人的出现和我们武丑的表演艺术？难道西洋的观众就只能够欣赏没有"戏"的新戏《雁荡山》？（这个戏，要是不先看说明，我也不会懂！）拿外国观众的掌声来衡量他们的艺术欣赏的水平，这个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有人认为外国观众就只会欣赏不中不西或中西合璧的戏曲音乐，有人把拉幕的频繁当作艺术进步的表现。准备出国节目时，都要作这一类的加工。倒是看过我们的加工戏的外国朋友，例如印

度的索克，劝我们多注意我们戏曲音乐的民族风格，希望我们不要随便丢掉自己的东西。

我们的“专家们”不但为中国的观众改革戏曲，还要为西洋的观众改革戏曲，而且那么自信地认为中外观众一致满意。难道他们就那么学贯中西？就那么了解西洋观众的心理？请他们听听观众的声音吧。

外国的观众说：

“我们并不是只会看翻筋斗，我们也懂得看‘戏’，我们也喜欢情节……”

中国的观众说：

“不要把我们的水平估计得太低，不要拿你们的好恶来代替我们的好恶吧……”

笔下留情*

关于编辑同志们删改文章的问题，有不少的人发表了意见，意见不外乎下面两种：编辑同志认为别人的文章必须删改，删改只会增加文章的光彩；作者同志不同意删改，认为文章一经编辑同志删改，弄得面目全非。自然也不能绝对地说就没有第三种意见，例如有一两位爱主持公道的人看见编辑同志和作者同志"争鸣"的时候，会出来说："他处理别人的文章也许有缺点，可是处理你的大作时并无错误。"（《新民晚报》：《理智一些吧》）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哪一方面，因此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官司可能还要打一些时候。

最近在《文艺月报》上读到杨文斌同志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说那些成熟的作家吧，也该承认编辑的劳动已经渗入自己的作品，算不得合作者，也算得上作者的忠实助手。……一篇好的文章问世，读者激赏赞叹之时，很少会想到编辑所费的心血。正相反，作者倒反而常常大发脾气，责怪编辑损伤了自己的佳作。世上不平之事，这该算是一桩了吧?!"（《一个编辑的意见》）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文艺月报》九月号。署名余一。

好大的口气！可是这段话仍然不能说服人，因此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有一个很肤浅的疑问：是不是成熟的作家的"佳作"都是编辑修改出来的呢？随便举几本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父与子》、《红与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它们是经过谁删改的？哪一位编辑给它们在文字上添过光彩？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鲁迅……这些成熟的作家的文学生活中就没有一位这样的"忠实助手"。不错，沙皇统治时期中在俄国有人喜欢删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文章，但这种人绝不是编辑；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也有人删改过鲁迅的文章，但这种人也绝不是编辑。

我也曾做过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也曾看过"成熟的作家"们的来稿。我一字一字地校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我不但没有在那些原稿上删改一个字，我反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不仅从成熟的作家的原稿中得到好处，就是不成熟的作家也常常成为我的益友。我开始懂得个人的知识有限，而生活与文学的天地广大无穷。跟成熟的作家接近，我受到很大的教育。鲁迅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对我有更大的影响。在二十年的编辑兼校对的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虚心"、"认真"、"负责"。我懂得关心人、尊重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品，尊重别人的风格。我懂得：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并非站在作者的头上"拿起笔来，自我称雄，高声叫道：'我有笔如刀。'"（《人民日报》：《关于删改》）

鲁迅先生也曾做过相当长时期的编辑。他的确"有笔如

刀"，但是他绝不用来乱砍作家的文章，他用它来冲锋陷阵向敌人进攻。他绝不以删改别人的文章自豪，他反而虚心地尽量发现别人的优点。他不仅看自己文章的校样，在清样上签字，他还看别人文章的校样。他并不认为校对的工作是低级工作，他倒认为肯负责任的编辑是应当看校样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文学》杂志编者不得作者同意删改了周文的小说《山坡上》，作者提出抗议，认为捂着打出来的肠子作战并非不可能，不应当删改。后来作者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请他主持公道。我听见鲁迅先生说：盘肠大战古已有之，并非新从外国输入，可见过去的编辑比今天的编辑开通。他劝作者：将来编印单行本时，照原稿改回来就是了。他说，有些人觉得不改别人文章显不出自己的本领。其实改了别人文章，不但没有显出自己的本领，反倒现出了原形等等。他又说，对这类编辑应当要求他们"笔下留情"。

我觉得鲁迅先生这段话在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确应当向今天的某些编辑同志要求："笔下留情"。

“恰到好处”*

姚文元同志“近来看了某些尖锐的和不尖锐的文章”，“深感矫枉过正的现象的严重”，因此大声疾呼：“恰到好处的批评是最尖锐，最正确的批评”。他给我们指出了“说话恰到好处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扶得东来西又倒》）

其实谁又反对过“恰到好处的批评”呢？谁又主张过把“温吞水”或“过火”当作“我们的努力方向”呢？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常看到“恰到好处”的批评呢？为什么在座谈会上站起来发言的人很难得讲到“恰到好处”呢？姚文元同志认为“很多人不习惯于这种恰到好处的艺术”。我觉得“不习惯”的说法就不是“恰到好处”的说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说话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的水平的人并非“不习惯于”“恰到好处”，而是这个水平不容易达到，绝不是单凭个人主观的努力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我们固然看见过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却是那些喜欢在“报告”或“发言”后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见不一定妥当”的人。我觉得后一种人更可爱，因为他们实事求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达到了“恰到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署名令一。

处”的水平以后才出来发言，还不如有多少讲多少，即使没有说得“恰到好处”，也可能对人有益。据我个人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至少不排斥这么一个作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因此发生辩论，这种辩论也有助于阐明真理，人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这并非一句空话。然而要是人一动脑筋，就想到说话应当说得“恰到好处”，自己没有说得好的把握，就只好挂上“沉默如金”的招牌了。

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嫌鸣声聒耳，他们害怕“百家争鸣”会造成一个思想混乱的局面，于是挖空心思在考虑防止混乱的办法。其实这番苦心也是多余的。正因为在我们学术界中，“守口如瓶”、“惜墨如金”的人到处皆是，“人云亦云”有了广大市场，“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提出来的必要。现在是不是有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呢？倘使鸣声真正多得像汽车喇叭那样叫人厌烦了，我们自然会静下来听“恰到好处”的指示，等“恰到好处”的结论；倘使只有寥寥几声低鸣，就还得鼓励大家“争鸣”。既然鼓励别人讲话，最好还是少来些限制，暂时不必发什么“恰到好处”的通行证之类。发通行证的办法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会起一种抵消作用的。

所以最好还是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害怕“百家争鸣”。让大家“鸣起来再说”。不会乱的。因为“争鸣”当然有目的。既然有了方针，怎么会没有目的呢？而且绝不会造成思想混乱的局面，因为我们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学术界的思想水平并不太低，而且我们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也并不太低。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鲁迅先生。关于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我知道得不深，倘使要我发表意见，我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活人的形象。我想到鲁迅先生，就好像看见他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我跟他也只见过十多面。我没有看见先生板起脸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先生挺起胸膛的时候。我倒听见过他的爽朗的笑声。据我看，先生使敌人害怕的是他那管锋利如刀的笔，而不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某种姿势。有的画家同志喜欢把先生画成横眉挺胸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人，壮年时期的先生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所看见的晚年的先生了。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下，先生会发出衷心愉快的笑声呢？我想，理由很简单，这是先生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先生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先生爱年轻人，爱他的朋友们。而在先生的朋友中间还是比他年轻的人占多数。

先生一直被称为青年的导师，他自己说他并不是。其实称他为年轻人的朋友倒更恰当。他是把年轻人当作朋友跟他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萌芽》第八期。

们交往的。他不教训人，不说教，他以身作则，处处给年轻人做榜样；他帮助青年，扶持青年。他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工作，并且引导他们工作，指导他们工作。他经常把一些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是年轻人的最好的合作者。过去好些文艺刊物都有他的心血，好些出版社都靠了他的支持才得到发展。这不过是他跟年轻人合作的例子。他跟年轻人一起追求真理，参加斗争，把多少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像先生这样懂得所谓“人情世故”而且知道旧社会很深的上了年纪的人，怎么能够跟年轻人做朋友而且有亲密的关系呢？也许有人不了解。其实先生跟别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不同的是，他由壮年到老年，还是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也显得年轻，而且跟年轻人一样地纯真。对付敌人他可以利用他那些关于旧社会的知识，可以利用他那些“人情世故”；对待青年他却非常天真而且善良。以前他同他的学生孙伏园同志一起旅行陕西、厦门、广州，他看见伏园体弱，便常常自动地替伏园打铺盖卷。这一类帮助年轻朋友的事，在先生的一生中，其实是很多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地爱护青年。我记得有一回有人请先生吃饭，几个有地位的人在席上一致指摘一个年轻编辑的缺点，先生不满意这种缺席裁判，不待终席便拂袖而去。这个年轻编辑就是黄源。这以后《译文》停刊了，黄源也失了业。他为了《译文》复刊的事情四处奔走。他常常去看先生，有一回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了，我觉得难过。”这是很自然地说出来的。

正因为先生对每一个年轻朋友都这样深切地关心，所以在柔石等五位烈士牺牲以后，他会写出像《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样充满悲愤的文章。同样他在跟一个年轻朋友长谈以后，会写信答复那个青年："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背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这封信是在他逝世前几天写的。可见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对青年感到失望，而且始终如一地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信任青年。即使他受了某些青年的欺骗，他也从不利用这个经验去对待别的年轻朋友。对于青年，先生是有分析的。他在一九二七年写过这样的话："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对于这一类青年，先生是十分憎恶的。至于那些在反革命屠刀下而英勇就义的青年，先生对他们无限热爱，称他们为他的"很好的朋友"，中国的"很好的青年"，为他们的牺牲感到万分悲痛。先生得到青年们的热烈拥护、真诚爱戴，并不是偶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跟先生来往的许多青年在先生身上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先生能够保持他那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原因之一就是：他跟青年的交往始终未断。

我每次跟先生见面、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先生是个爱憎极其分明的人。

对于敌人，对于一切阻碍进步、摧残进步的东西，他绝不妥协。他甚至主张"打落水狗"。可是对于敌人以外的人，他处处流露出他的热爱。这种爱发出了光辉。这光辉温暖了人们的心，在人们心上产生了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说的"无言的激励"。鹿地说得好："这不是向人'指示行为'的东西，而是唤醒'对于行为的热情'的东西。"先生的思想，先生的人格，都融化在他这种爱里面。翻读他那二十四册日记（尽管他记得那么简单），我们会惊讶他对于人们的爱竟然是那样广泛而且经久不变。先生热爱朋友，热爱青年，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工作，热爱真理。他的感情贯彻到他的行为上，贯彻到他的日常生活里，贯彻到任何巨细的工作上。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不苟且的。就拿他印的那本《珂勒惠支版画集》来说吧，"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他"赔钱、赔功夫印画册"，是为了培养新的战士，甚至在把印好的画册分送朋友的时候，他也要郑重地包封。他写文章，翻译书，连选择一个字也十分认真；他总是把原稿写得很清楚，不肯给排字工人添一点麻烦。他替年轻朋友校阅稿件，向各处介绍这些稿件；他出钱刊行年轻朋友的"处女作"，并且作"序"推荐，甚至一字一字地看校样、批格式。他回答年轻人的来信，替年轻人解决问题，都是一样地认真、负责，即使偶尔因此招来麻烦，他也从无怨言。他有时批评几句，也无非出于好心的关怀。他为了编印《海上述林》，花去了多少的精力和心血，连《海上述林》的广告也是他起草的。他替别人办事就跟替自己办事完全一样。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工作，而且他有责

任做好。

谁要是有耐心，仔细地算一算账，就会明白在先生的五十六年的生活中，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多少事情。在这些工作、这些事情里面都有先生的心血，先生的爱，先生的人格。凡是接近过先生的人，都能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最后，什么是真理。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你这些。他的思想和信仰都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间。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说了就要做。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十分严格，比对别人的要求更严格。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先生最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通过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战斗追求真理、找到真理的。他是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很好的榜样。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导师，然而他的确把许多青年引上了通向真理的路。他是带头走，同青年一路走，或者甚至扶着青年走。

所以在当时的青年的眼睛里先生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良的朋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爱护青年的导师。

1956年9月26日夜2时，

1977年6月15日修改。

论"有啥吃啥"*

文木同志的《有啥排啥》说出了一部分人心里的话。倘使他的文章能够促成买菜排队紧张情况的改善，那么受益的不知道有多少主妇、多少保姆，甚至多少孩子了。中秋节的早晨在某一个菜场就有两位排队的妇女当场晕倒，让救护车来载了去。有些人家不忍心天天叫保姆或主妇在清晨两三点钟开门出去，在寒风里站几个钟头买几两肉，便趁着星期六或星期天一家团聚的时候上馆子吃一顿经济小餐，结果被人扣上了奢侈浪费的大帽子。有些人只看见酒楼菜馆的拥挤，却不去听听主妇和保姆们的牢骚，以为只要大声一呼，馆子的营业马上清淡，菜场上从此再看不见排队的人。其实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人民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既然号召了"有啥吃啥"，那么人们把"有"的一"吃"而光，也不过是响应号召而已。可见"有啥吃啥"的说法是有毛病的。

我并不同意某些人的"有啥吃啥"的要求，目前的确存在着困难，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因为我们正在用全力从事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日报》。署名余一。

这个道理是人人都懂的。所以今年天气最热的时候，许多吃不到棒冰的人，即使事前听够了种种花色棒冰的宣传消息，也不曾发出一声怨言，大家一致同意，没有就不吃。但是后来天气一凉，棒冰出现了好多，人也不要吃了。这就是说，人们并不愿意"有啥吃啥"。"有"了，他们也可以不吃。然而他们的需要也应当受到尊重。倘使一味地推行"有啥吃啥"，结果一定会弄到强迫不能闻牛羊味的人大吃牛羊肉了。我们国家里现在的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图自己方便，宁愿叫多数人不方便。对于他们，"有啥×啥"的说法就是一个"锦囊妙计"。过去有一个时期，有些省里连老头子也穿起花花绿绿的汗衫来了，因为有人在鼓励"有啥穿啥"。花布订多了卖不出去，连小学校的男老师也得买几尺花布。今年全国人代会小组会上就有农民代表反映，农民手里刚刚有了钱的时候，推销工业品的任务又来了。这些农民不是吃了"有啥买啥"的亏么？但是对于推销存货或"完成任务"的人，"有啥买啥"倒是无上法宝了。

所以最好少发"有啥吃啥"的号召，还是让人们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吧。他们当然只能在"有"的东西里面去挑选，这是用不着担心的。

秋夜杂感*

一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好几个月了，可是到现在还很少听见真正的“鸣”声。发牢骚、提意见的人倒不少。有些挨了棍子没有给打死的人出来叫冤，有些对现在的某些工作有不同看法的人出来提意见，这都是人情之常。倘使把这些叫做“鸣”，那未免大题小做了。吃够了过早下结论的苦头的人容易了解“争鸣”的重要，可是习惯了“人云亦云”的人反倒觉得“争鸣”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要“鸣”必须先有“独立思考”，就说自己不“鸣”吧，要是“百家争鸣”起来，自己到哪里去找“结论”呢？现在的问题绝不是“鸣”声多，而是“鸣”声少，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人并非电铃，只要给手一按就会发出“鸣”声。就拿我来说吧，即使有了这样好的方针，也得让我对一些问题好好思考一下，我才可以“鸣”出我个人的意见，万一我对某一个问题实在没有研究，说不上有见解，就是有人拿着鞭子在后面打，我也“鸣”不了。就说一按便“鸣”的电铃吧，要是断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上海《文汇报》。署名余一。

电，哪怕人用小锤敲它，也敲不出“鸣”声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问题来，实在太早了。究竟怎样才算“争得好，鸣得好”呢，就是最近《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苏坤同志的《不需要‘争得好，鸣得好’些吗？》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来。其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早就有一句老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换句话说，就是：“鸣起来就一定要鸣得好！”然而有这个抱负的人总是不鸣的居多。因为我们是世界闻名的谦虚的民族，真正认为自己有了“一鸣惊人”的把握的人毕竟不多。所以要是未“鸣”之前先听惯了“争得好，鸣得好”的话，不管是苏坤同志所说的“祝福”也好，“希望”也好，“要求”也好，“鼓励”也好，那么没有“好”的把握的人只好“噤若寒蝉”了。只有寥寥几下正确的“鸣”声来点缀“百家争鸣”的局面，拿世界强国之一的新中国来说，未免显得寒伧吧。

也还有一些喜欢打懒主意的人，他们听见别人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要求，就有这样一种想法：请那些主张“争得好，鸣得好”的同志先来“鸣”一下，作为示范，以便大家照办。不过这样一来，说不定恐怕又会成了“人鸣亦鸣”了。

二

我在八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过一篇《观众的声音》。标题不用“鸣声”，唯一的原因便是：“鸣得好”的“要求”使我胆怯。我想，对于一般“观众的声音”，可能没有较高的要求吧。

然而挹松同志马上在《文艺报》上升起了“持平之论”的大

旗。我看旗子扯得太早了吧。几年来一直给压在“保守思想”这顶大帽子下面的“观众”今天刚抬起头来发出点声音，就只见“持平之论”的大旗在前面迎风招展。他只好埋下头去不响了。照例总要等到诉苦诉得太多了时才出现“持平之论”的。

但是这所谓“持平之论”究竟是不是“持平之论”呢？

抱松同志首先断定我的文章“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最近几年的戏曲改革搞坏了一切事；似乎……；似乎解放后强调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是毫无必要的”。其实我的文章写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绝不需要抱松同志替我加上几个“似乎”。在那篇短文里面，我只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只指出了戏曲改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我并不想把文章写得“全面”，如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然后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等等。这一类文章，写的人已经够多了，用不着我来写。倘使因为我在一篇短文里没有肯定戏改工作的成绩，就替我的文章加上几个“似乎”，那么，这几个“似乎”也只能说是抱松同志自己的意见，没有必要把责任加在我的肩上。关于戏曲改革工作本身，我觉得有些问题是值得大家研究讨论的。例如由专家把古典名剧修改成一个定本交给各剧团照样演出好呢，还是加强戏曲导演制度，让不同的导演和演员用各人的艺术的创造在演出上加工好呢，等等，倘使将来我考虑成熟了，我自然会发表意见。上次那篇短文没有讲到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我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意见。

为外国观众改革戏曲的问题是我那篇文章的一个要点。抱松同志说，我“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作为‘专家’破

坏遗产的罪证”，他还在“专家”下面加一个注：“新文艺干部”。事实上，一，我根本不知道从事戏改工作的是新文艺干部，而且作为观众，花钱看戏，或者参加招待晚会，欣赏节目，就戏论戏，用不着知道其它；二，我只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做例子，对我们的“专家”为西洋的观众改革戏曲，和他们认为西洋的观众不喜欢情节的看法提出疑问。我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回答。现在挹松同志首先证实《三岔口》“这出戏在出国表演的时候越压越短，情节越来越简单”。他还说“这是大家都不赞成的”。可见我的疑问并非提得“毫无必要”，而且正相反，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大家都不赞成的程度”了，然而挹松同志却又说：“这是京剧名演员张云溪、张春华同志的创造，这出戏已经经过几年来舞台的考验了。”这就叫人弄不明白了：究竟“大家不赞成的”是谁的“创造”？“名演员”的“创造”呢？还是“新文艺干部”（挹松同志的用语）的“创造”？关于《雁荡山》，据挹松同志说，这是一个“尝试”，他又说：“人们可以批评这出戏单注意形式而忽略了内容。”他接着还加一个注：“我就有这样的看法。”可见即使根据“持平之论”，这两出百演不厌的出国戏本身也有不小的缺点了。

那么我更有权利提出我的疑问：

为什么我们必须把“大家都不赞成的”和“忽略了内容”的“尝试”拿去招待我们的国外友人呢？（既然我们的国外友人把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来招待我们。）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国外友人，我们都应当把我们自己认为最

好的东西介绍给国外友人，否则所谓“文化交流”就会失其意义，哪里还谈得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影响”呢？

只要这个问题得到重视，得到合理的解决，我愿意向挹松同志和他所说的“新文艺干部”道歉认错，因为我们是在为着国家的利益争论，而不是在做文字的游戏。

9月10日。

描　写　人*

我见过初生的婴儿，他睁着一只眼睛呱呱地乱叫；我见过从地里冒出来的幼芽，浅绿色的豆芽似的小小两瓣。幼稚，难看，完全不可爱。但是婴儿可能长成我们在小说中常见到的一对大眼睛、两根小辫子的圆脸姑娘，也可能长成像娄阿鼠那样的杀人凶手；幼芽可能长成美丽的花树，也可能在中途枯萎，枝叶凋零。大圣大贤也都是从在地上乱爬的小孩长大的，连他们也不可能生下来就高谈阔论，发表意见，而且就是在他们成了圣贤之后，他们也不可能一开口就是圣人之语，圣人之言。人是活的东西，他不断地生长，发展，变化。要了解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描写人，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工作简单化，有人把人分作三类，一是正面人物；二是反面人物；三是动摇人物。正面人物永远正确，好像从出世起就没有犯过错误；反面人物仿佛一生下来就面带凶相，或者獐头鼠目；动摇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动摇。这样分类之后，写起文章来的确容易多了。可是人并不因此而简单化。生活也并不因此而简单化。读者也并不因此而简单化。为了应付新的需要，有人注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上海《解放日报》。署名余一。

到了优点和缺点，于是在正面人物身上加入一些缺点，在动摇人物身上加入一点点优点，总之使得每个人甚至反面人物都带“人情味”。但是作品里面的那些人仍然没有血色，不像真人。为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原因是：除了优点和缺点以外，活人的身上还有别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单靠访问所不能了解的。要了解一个人单听他的高谈阔论是不够的。每个人都会讲一套话，尤其是那些讲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的人，你更难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你记录了一个本子的谈话，你也不见得会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要写人，得接近人，关心人，了解人，而且爱人。这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这需要长的时间和多的劳动，但是也会给你带来较大的成功，即使没有大的成功至少也会使你明白许多事情，例如可爱的姑娘不一定都有一对大眼睛和一张圆圆脸、梳两根小辫子；正面人物并不成天摆起正确面孔教训人；反面人物并不从出场起就随时随地告诉人：“我要做坏事。”

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为了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先生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在上海逝世。十月二十二日，上海人民公葬先生遗体于上海西郊的万国公墓。当时六千人参加的送葬行列，不顾帝国主义者的马队和反动政府警察刺刀的威胁，将先生的遗体送到墓地，并且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民众的葬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先生所期待的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已经到来，先生所预言的"将来的光明"已经普照中国的土地。先生用心血所培养的人民文学事业也已开花结实。先生三十年的战斗生活与二十卷的辉煌巨著更是鼓舞中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巨大力量。中国人民为了纪念先生的不朽的功绩，在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迁葬先生遗体于上海市区虹口公园的新墓，并举行迁葬仪式与墓前先生雕像的揭幕式，同时园内新建的"鲁迅纪念馆"落成开放。从此先生的遗体得到永久的安息；景慕先生的人们也有瞻仰与学习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

机会；先生留下的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将更广泛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先生的智慧的光芒将更普遍地照亮中国青年的心灵；先生的战斗的精神将更有力地激发中国人民前进的勇气。虹口公园将成为全世界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我们将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怀着尊崇与感激的心情向鲁迅先生致敬。鲁迅先生在二十年前说过：“忘记我。”可是没有人能够忘记先生。鲁迅先生并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永远活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心里。鲁迅先生的精神将永远鼓舞中国人民前进！

“艰苦”和“浪费”*

我在《论“有啥吃啥”》中主张：不论在吃的，穿的，用的各方面，都让人们在“有”的东西里面去挑选他们喜欢的。这就是说我不拥护“有啥吃啥”的口号。省三同志却不然，他把“有啥吃啥”的口号，“理解为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他甚至认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今天，即便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必要的，正确的”。我很奇怪，省三同志的这个“必要”和这个“正确”是从哪里抓来的。大家都看得明白，人民从来没有要求为他们特别生产任何一种消费品，他们一直在“有”的东西里面挑选吃的，穿的，用的。即使他们挑选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使他们只能买到一些他们并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也并无怨言。他们体谅“负有供应专责的部门”的困难和苦衷，他们期待着这些部门的工作的改善。这种体谅和期待都是无可指摘的。但倘使因此就抹煞了人们的各个不同的嗜好，不允许人们按照嗜好挑选他们的消费品，甚至强调地主张人们必须毫无选择地接受供应部门供给他们的东西，像过去某个时期那样，连老头子也得穿花布衬衫，小学校男教师也得买几尺花布，机关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署名余一。

干部大买橘子果酱，买鲜肉的得搭一点咸肉，买好的得搭一点坏的，这不过是打起"艰苦朴素"的招牌，替不合规格的产品或次货推广销路而已。照省三同志的看法，困难的存在既然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那么要求克服困难，要求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当然不符合"艰苦朴素"的精神。然而照我的看法，在消费品供应不足的条件下，提倡大家"少吃一点"，提倡大家"省吃俭用"，倒符合"艰苦朴素"的精神，而鼓励人"有啥吃啥，穿啥，用啥"，用各种方式推销次货和不合规格的产品，倒是在提倡"浪费"了。

关于"艰苦"和"浪费"，竟然会有这么不同的两种解释，可见要统一人们的嗜好和口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单靠省三同志所说的"宣传"和"说明"，并不能解决问题。

其实上面提到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或看法，在好些事情上都存在着。例如搭牌楼，这是一件有目共睹的事。这两年来并不见有人把搭牌楼理解为发扬"奢侈浪费"的精神，好像非搭几座大牌楼不足以表示今天的新上海的局面似的。所以北火车站广场入口和长乐路茂名路口的两座大牌楼就一年复一年地用光辉灿烂的装饰来点缀气象万千的上海的市容了(可惜外滩的大牌楼被今年无情的台风"拆除"了)。但是有人发生过疑问，为什么北京人把真牌楼全拆掉，而上海人偏偏要搭起假牌楼来？也有人这样回答：北京人拆真牌楼因为它们妨碍交通，而上海人搭假牌楼是以壮观瞻。倘使这个答复是"正确"的话，那么为了壮观瞻而妨碍交通，也就是"奢侈浪费"了。至于因这大牌楼而引起的许许多多的小牌楼更与"艰苦朴素"无

关。拿交通要道来说，当然是：安全第一。今天的上海跟北京一样，需要展宽街道，即使“人们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办事”，至少也不应当搭几座假牌楼来把不够宽的交通要道弄窄。这样的“建设”并不符合今天的都市的需要。

别的例子打算以后再谈。

挨自己人的耳光*

九龙国民党特务暴乱事件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当地中国居民的屠杀。这种暴行发生在香港英国当局统治的地区，国民党特务分子事前有周密的布置，事后又作有计划的撤退，主要犯罪分子干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以后始终逍遥法外，有的还转移阵地到澳门去布置新的工作。像这样进进出出，来去自由，要说香港当局事前不知、事后心中无数，恐怕连住在伦敦的英国绅士们也不会相信吧。现在事情过了两个多星期，英国政府并不责令香港当局惩办凶手、恤死救伤，伦敦和香港两地有责任的先生们却不断地发表公报、谈话和评论，甚至对我们报纸的真实报道提出抗议，一则说：下结论"为时过早"；再则说：这是"两派华人的冲突"；三则说："均由三合会及类似之非法组织所策划"；最近英国新闻处又弹起了"冲突"的老调，而且创造出"一批无赖和抢劫者"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可见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只顾一心一意替他们所偏爱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责任，洗刷罪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香港英国当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署名余一。

局甚至逮捕了一批所谓"干犯宵禁"的平民，做替罪的羔羊。好像香港的统治者对和平居民的惨遭屠杀并无丝毫的责任，对"纳税华人"财产权的横遭侵犯也无任何的责任，而他们唯一的责任便是替国民党特务分子开脱罪名。有一个英国记者批评香港当局的"行动"说是"笨拙"。其实从英国来香港的先生们没有一位是"笨拙"的，他们都是聪明人，连那位自己说是"爱香港的人民，而且为他们感到骄傲"的葛量洪先生也不是例外。他们在暴乱事件前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别有用心的。葛量洪先生等等有意纵容、包庇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九作为对中国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基地，想利用特务分子的暴行来"寻求政治资本"。可是他们的用心是白费的了。连日本的公正人士和英国右翼报纸的主笔和记者都说"九龙的暴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划的"，荃湾受难者的控诉更是无可推翻的证据。其实撇开铁一样的证据不谈，单单根据文明人的理性来判断：要说是"两派华人冲突"，为什么死伤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工人和妇女呢？为什么连瑞士驻港副领事和他的夫人也不能幸免呢？为什么香港当局会袖手旁观让暴乱继续"六十小时"之久，以致死伤三百多人呢？（根据香港英国当局本月十二日发布的公报死伤三百四十多人，实际死伤人数要超过许多）这些问题都是葛量洪先生和其他别有用心的英国先生们所不能回答的。其实即使他们强辞夺理地回答了，他们的花言巧语也不能抹煞中国政府的合法的权利。"中国政府要保护海外的一切中国人。这种保护当然是任何政府对其守法公民应负的责任。"这是本月二十三日伦敦《泰晤士报》社论中的"警句"，

这也是打在葛量洪先生和其他别有用心的英国先生们脸上的耳光。

1956年10月27日。

“救救孩子”*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在我住处的附近，一个六岁的女孩给汽车辗死了。据说汽车开得慢，是女孩自己跌到车轮下面去的；女孩穿着木拖鞋在街上走，不小心，脚一滑就跌下去，而且跌得远。我听见人讲到女孩的压扁了的头，我心里难过了几天。车子辗死小孩的事情，今年我就听见人讲过好几次，都是目击者的口述。可是本地的报纸对这种事情似乎不感兴趣，不见有只字的记载，唤起为父母者的注意。也还有人根本否认这种不幸的事情。他们认为今天的小孩处处得到照顾，好像连汽车在小孩面前也会后退三步，所以他们不但把自己的孩子完全交给保姆或者完全交给学校和社会，即使他们看见几岁的小孩在马路上乱跑，没有大人在旁边照料，他们也只会面带笑容地想到今天小孩们的幸福。这种人要是读到本月十六日《新民报》上那篇《谁应该负肇祸的责任？》的报道，他们一定会摆起正经面孔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刺激。我们不需要眼泪。”的确，只要是做过父母的人，读到报道里交通民警的那段话：“我去抱那个孩子，她还对我说：‘叔叔，叔叔，抱我起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上海《新闻日报》。署名余一。

啊。'后来她就……，"读到五岁女孩罗小妹的妈妈晕过去的那段描写，他们一定会流泪，他们一定会同情那个不幸的母亲，他们一定会更深切地感觉到对自己的孩子应该负的责任。这样倒更合乎今天的做人的标准。做父母的应当多关心自己的孩子，也应当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孩子，不要把责任完全推在保姆的身上（我常常看见幼儿园或小学放学后，两三个保姆一路闲谈，让孩子们在街上乱跑），也不要把责任完全推在汽车司机的身上（司机同志也并非高兴闯祸。有意杀人）。负责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同志也应当关心别人的孩子。我们常说："一切为了下一代。"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也正是为了下一代。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完成任务。倘使只管超额完成任务，不惜让下一代多死几个，这不但在道德上是犯罪，而且连社会主义也给根本否定了。至于闭上眼睛不敢面对现实的"无冲突论者"，他们把自己关在新的"象牙之塔"里面，当然看不到汽车轮下的鲜血。

每一个死在车轮底下的小孩的血都涂在我们的脸上。上海的人民能够洗掉这些血迹，也一定要洗掉这些血迹。必须制定计划，想尽办法，各方面一齐负责，消灭这种交通事故，使今后再没有一个可爱的小孩死在车轮底下。可爱的，不错，今天我们的小孩的确都是可爱的。让我们借用一句鲁迅先生在三十七年前写的一句话："救救孩子！"

给青年读者们的信*

——略谈影片《春》和《秋》

首先让我感谢你们给我的鼓励。你们看了影片《春》和《秋》，把我当作你们的朋友，对我谈你们心里的话：你们想知道那几个你们所关心的人的下落，你们愿意跟影片中几个年轻人做朋友，让他们了解今天中国青年的幸福，你们想知道我对影片的意见。你们的富于同情的善良的心使我深受感动。接触到你们的心，我好像又接触到了觉民那班人的心。我又想起了过去的许多事情。想到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有为的生命，我至今还不能没有悲愤。我也像你们那样，希望那些不幸的人活起来见到新中国的光明，可是我更因为不能看见那些憔悴的脸上绽出笑容而感到痛苦。我的那两本小说是跟我的过去十九年的生活分不开的。我在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都看到我自己熟悉的影子，看到那些影子，我就无法制止我的感情的波动。因此我们同样看这两部影片，我的感受就跟你们的不同。我的意见跟你们的也可能不完全一样。我是在银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电影》十二月号。

幕上找寻我熟悉的影子，匆匆地看画面的变换，我可能忽略了一些详情细节。而且正如有些观众所说："影片并不是原著的复制，而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①，《春》和《秋》虽然是根据我的两本小说改编的，它们跟我的作品中间却有一些距离。在影片中，背景改变了，风俗习惯改变了，因此人物的面貌也不得不改变。我要在影片中找寻那些跟我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我当然会感到一点失望。所以影片带给我的感动反而比它们带给你们的少。

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完全没有否定这两部影片的意思。一个多月前，《秋》的编导秦剑先生参加港澳同胞归国观礼团路过上海，曾经来看我，跟他一起到我家里来的还有演周蕙的白燕女士，演翠环的红线女女士，演觉民的张活游先生同别的几位先生和女士。我才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面拍摄了这两部影片的。秦剑先生花了五天功夫改编《秋》的剧本，又花了不到三个星期的功夫拍好这部影片。并非他不愿意多花时间，而是别人不给他更多的时间。摄影棚又只有那么大，香港本来就只是一个岛，摄影师即使有最新式的机器，美工师即使有很高的修养，也不见得有"用武之地"，何况公司又没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在两部影片中，像高家那样的大家庭居然开门就看见山，而且转来转去都是那个不像住房也不像私人花园的地方，好像一家人都住在公园里面。像这一类的缺点自然还不只这些，但要是因此责备他们，我觉得也有点不公平。秦

① 见一九五六年九月号《文艺学习》，《看电影〈春〉和〈秋〉有感》。

剑先生和《春》的编导李晨风先生倘使回到国内进行拍片的工作，他们一定有更高的成就。一年的改编时间，半年的拍摄时间，再加上大的摄影棚和祖国的广大美丽的河山，还有种种便利的条件，这些都会帮助他们发挥更大更多的创造性，显示更高的才华。所以要是拿这两种条件来比较，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就不得不作更高的评价了。

正因为受到了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才不得不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另一个地方，把时代也往后移动。我们单看几个主要人物的服装也就知道地点不在成都，时间也不是一九二三——二四年，还不说那些在我这一辈的四川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周蕙被人像口袋似的背走送到花轿上去的那个镜头。然而影片原本不是拍给我这一辈的四川人看的，只要影片抓住了原著的反封建的精神，我对两位编导也就不能有更多的要求了，何况我的小说并非可以传世的佳作，它们也只是因为那一点反封建的精神才"流传"到今天的。倘使从这一方面来看影片，两位编导先生的"艺术的再创造"是成功的，它们产生了艺术的效果，你们的喜爱和感动就是一个证据。固然使观众流泪的不一定是好影片，但是使观众在流泪之后，强烈地憎恨封建制度而且更加热爱生活的影片就不能说是坏的影片了。有人批评这两部影片"投合小市民趣味"，我想你们首先就不会同意，因为你们就不是小市民。所以对于两部影片的编导先生，我始终充满着敬意，我不能说他们的改编和拍摄的工作中没有缺点，但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工作的态度是很严肃的。这在香港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几个主要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出色的演技给这两部影片增加了光彩。我首先得提起吴楚帆先生，论他的外形，他绝不能扮演觉新。倘使觉新有那样魁梧的身材，就不会事事让人，处处退缩；别人看见他即使不退避三舍，至少也不敢任意欺侮。可是觉新时时在人前低头，事事体谅别人，委屈自己，忍辱苟安，任人摆布，把痛苦咽在肚里，用叹息安慰寂寞，看见自己的幸福一个个让别人毁掉，仍然怀着一片好心空等将来。这一切吴楚帆先生演得入情入理，十分自然。甚至在他帮忙别人把他所爱的人送进虎口，自己躲在房里为这个损失落泪的时候，观众也忘记了他那个巨人般的身形。他的痛苦和挣扎得到了观众的同情，观众真替他耽心，时时都想伸手拉他一把，让他勇敢地站起来。他最后终于站起来了。这个镜头使得观众多么高兴地吐一口气，吐出这口憋了好久的闷气。

蕙的形象也常常留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她疯狂似地挥动着双手哭着、嚷着，不肯穿嫁衣、不肯上花轿的那个镜头。好心的观众谁不愿意拉住花轿给她另外安排一个前途呢？导演在她身上花的力气比在淑英身上花的多，所以她的命运更系住观众的心。她的死亡跟她的出嫁一样，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她生在那样的家庭里，有着那样一个古板、顽固的父亲。我赞美白燕女士的演技，她让人看到一个可爱的多情的少女，却掩饰了编导先生在她的性格处理上的缺点。影片中的蕙跟我心目中的蕙是有距离的。蕙离开省城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以后她也少有跟觉新通信的机会。这个少女怎么会暗暗

地热恋着觉新呢？自然，蕙回到省城跟觉新重见以后，由于相同的命运，他们中间很可能渐渐地产生一种类似爱情的关心与同情。但是象蕙那样的少女绝不会把她的没有多少根据的单恋轻易地告诉别人，哪怕就是她的堂妹，何况堂妹并不了解她（影片中把芸处理成封建婚姻的拥护者，她知道了蕙的单恋甚至在蕙第一次重见到觉新的时候，就干涉蕙跟觉新的谈话，其实芸不会是这样的人）。在影片中蕙有时显得非常胆大，有时又只会流泪．既然终于嫁到郑家，甘心让人折磨到死，而临死居然又会当着公婆和丈夫的面把一张绣着诗句的手帕送给觉新。觉新也会目中无人地在别人家里接受别人妻子的纪念物，甚至在她丈夫的面前读出妻子绣在手帕上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这些都是"吃人的礼教"所不允许的。觉新既然毫无顾忌地做了这种事情，他就不会低下头来再受束缚；蕙要是毫无顾忌地在人前大胆表示爱情，她一定不会死在郑家。

翠环的遭遇跟蕙的悲剧一样，曾经引起你们的眼泪，深夜的更锣和湖畔的蛙鸣也同样使我的心激动。我至今还记得她悲痛地在桥头唱歌和怀着绝望心情想在湖水中找寻归宿的两个镜头。我很感谢红线女女士的无言的表演，她让我看到一个纯洁的少女的内心，她对不幸者的同情，她跟恶势力的挣扎和她对幸福的渴望。她和另外两个婢女偎在一起为自己的命运叹息的时候．我们家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保姆简直没法制止畅流的眼泪。我们常说"心心相连"，她的演技的确把观众的心跟演员的心连在一起了，正因为她不发长篇大论，她跟观众"以心相见"，所以一声叹息，一瞥眼光，一个简单的动

作，或者一句短短的话，都能打动观众的心。她的演技使人忘记了剧本中那个不自然地发展的悲剧。事实上在当时的高家她不会走鸣凤的老路，因为老太爷和三老爷都死了，五老爷没有权力强迫他的三嫂把翠环送给他做小老婆，除非他先用种种手段取得三嫂的欢心，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固然事前人们可以无中生有，编造、散布关于觉新和翠环恋爱的种种流言，这些流言也会给觉新带来损失，然而要是觉新发觉自己真正爱上了翠环，他很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三太太把翠环给他，而且他一定会得到允许，因为在三老爷夫妇的心目中觉新是高家唯一的好子弟，他的确又需要一个服侍他的人。三老爷去世以后，即使只留下寡妇孤儿，他们也不会在五老爷面前低头，因为死者还给他们留下一份相当大的家产。官僚地主的高老太爷过去是这个大世家的唯一的统治者，因为经济权捏在他的手里：他创造了这份家业，他养活这一家人。三老爷虽然也是封建制度的忠实而顽固的拥护者，虽然从老太爷那里继承了统治权，可是这个权力到他的手里已经打了一个大的折扣。即使大家承认他是家长，他也只是形式上的家长，因为分了家以后，他捏在手里的就只有他那一房的经济权，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以外，他就没法叫别人听他的命令(觉新是唯一的例外)。要是他的女儿一直留在家里，他可以把她逼上死路，就像周伯涛眼睁睁把蕙送进地狱一样。可是淑英一旦逃出家庭，他为了保全家声(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面子问题)，不敢追究，也不愿意多生枝节。高克明的确是给家里的人气死的，因为他有心无力，眼看着自己走到了穷途没路。他一死，就像

招牌倒下来，真是所谓“树倒猢狲散”，四老爷即使自封家长，也不过像袁世凯自封皇帝那样，拥护他的就只有几个劝进的人，在影片中高克安做家长还不到八十三天，全家的人就提着大包小包地四散了。淑英逃出家庭的确需要一个生死的斗争，而翠环为自己的爱情奋斗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毕竟时代不同了，高公馆马上就要换主人了，五老爷不过是个纨袴子弟，他没有力量伤害三房的丫头。

影片《秋》以大家庭的分散做结束，是不错的，但是影片的最后的镜头处理得不大真实，这不像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从容的迁居，倒像是这一家人在军阀混战中慌慌张张的逃难。整个高家的彻底的垮掉应当在解放以后。在《秋》的结尾，高家还是富豪；在抗战期间高家的人有的破了产，有的却靠收田租发财买进了更多的田。只有在土改以后高家的人才得到了真正的改造。自然像觉民和琴这样的人是另有光明的前途的。至于觉新是否会得到新生，这要看他跟翠环同居以后的所作所为了。在真实的生活里觉新并没有找到像翠环这样关心他的人，他也并未得到新生，甚至在搬出大公馆以后，他仍然无法摆脱旧礼教的残余东西的束缚，他已经习惯了旧的生活方式了，他没有勇气为自己开辟新路，又没有人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他终于让“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把他送上死路，在他知道自己已经走到“破产”路上的时候，他从容地服毒自杀，留下妻子和五个年轻儿女，柜子里只剩了十几块钱，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的小说《家》刚开始在上海的日报上面连载。

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五老爷克定。我看见他，就起一种厌恶的感觉。他不是我的小说里的那个纨袴子弟。克定固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他并非天生怪物，也不是流氓瘪三。有人认为做坏事的人一定生成怪相。我那个男孩看电影，银幕上每出来一个人，他马上就要问这是好人或是坏人，他一见克定，连问也不问了，指着克定说："坏人"，因为面孔摆在那里。然而生活并不常常是这样简单的。倘使克定生成那个怪相，高老太爷一定不喜欢他，而且会严加管教，他就不可能走上"吃喝嫖赌"的路。事实上克定是高老太爷的最小的儿子，眉清目秀，聪明过人，而且能诗能文，父亲的溺爱使他有机会在外面交结一些"白相朋友"，这些朋友把他引上了堕落的路。看了影片，我才发现自己的缺点，我的小说中这方面的描写也是很不够的，一直到上一个月我才在《家》的改订本中作了一些补充。克定的另一面我后来在中篇小说《憩园》中有过较为详细的描写。他最后过着乞丐的生活，一九四〇年病死在监牢里。他的悲惨的结局固然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但是我常常想，倘使他不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或者他生在另一个时代，他很可能做出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应当说封建家庭的生活毁了他，就像它毁掉觉新那样。

其他的人物我不想再讲什么了。觉民是以正面人物的姿态出现的，观众欢迎他，但是他的笔挺的西装我看起来总有不舒服的感觉，倘使他少讲几句话多做几件事，除了"劈兰"以外他还有更多的鼓舞妹妹们的办法，那么会给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周伯涛的无能和顽固似乎写得不够，他应当是那种不

关心子女幸福的专制父亲的典型，对于蕙和枚的死亡他应当负更大的责任。我至今还憎恨这种人。

以上这些意见似乎近于挑剔，不过对你们讲话我用不着顾忌，何况我同时还是观众。对于两位编导先生我们不应当再有苛求，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作为观众，我还想提出一个意见：倘使把死亡的场面减少一点（例如枚的死就不必用画面来表现），而且不把那些镜头那么近地连在一起，也许更能产生悲剧的效果。照现在这样处理，觉新好像成了一个忙乱的"送终者"，只要他一到，观众就知道病人一定死亡，因此有人看到这样的镜头，反而发出了笑声。

关于这两部影片我讲了这么多的话，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一点用处，但是现在我应当结束了。请允许我最后撇开个人的情感，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说一说我对这两部影片的总的印象：

"它们有缺点，但也有好处。它们还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因为两部影片里有编导和演员们自己的东西，而且他们多多少少发挥了各人的创造性。值得提出的是，这样的影片并不是那种非常正确，叫人找不到一点毛病的富于教育意义的论文，它们是激动人心的戏。即使你不满意它们的某些情节甚至整个的故事，然而你只要看下去，你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1956年11月9日。

辞"帽 子"*

读了《文艺月报》(十一月号)上发表的出版社编辑同志们的文章，我很感谢他们坦白的、尖锐的批评。我觉得他们已经把他们对编辑工作的看法和进行工作的态度解释得非常清楚了，细心的读者要是把我那篇短文跟编辑同志的文章拿来对照地细读一遍，就会看出来我们的不同的意见和论点是从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编辑工作的看法和态度来的。

我说："在二十年的编辑兼校对的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懂得，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吴丈蜀同志一则说："编辑的职责是不是仅仅局限于上述的范围呢？当然不是的；"再则说："在余一同志的笔下，编辑的工作不过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这种含混的说法，不免轻视了编辑工作，抹煞了编辑人员的劳动，显然是不全面的。"可见我是以服务为光荣，而吴同志却认为"服务"的说法轻视了编辑工作。——这是我们中间的第一个分歧点。

我说："我不但没有在那些原稿(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上删改一个字，我反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是在叙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文艺月报》十二月号。署名余一。

过去的事实。吴同志说："要是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当时交给余一同志发表的文章中，偶有瑕疵，而经余一同志改正过来，我相信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不但不致起反感，还会感谢编辑的帮助的。"吴同志只是在叙说他个人的幻想，因为事实上那些原稿中并无"瑕疵"，而且一部分原稿还由我保存下来捐献给博物馆了。

我说："我不仅从'成熟的作家'的原稿中得到好处，就是不成熟的作家也常常成为我的益友。"吴同志说："如果从实际出发，改正了原稿中存在的或大或小的毛病，那么被改动了文章的作者，不论是'成熟的作家'或初学写作者，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接受。"翟永瑚同志说："一个真正尊重别人作品的编辑，就必须要对它爱护和关心，尽量做到使它完美无疵。"我的着重点在于：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益处。作家们的原稿本身就有很多优点。吴、翟两同志的着重点却在于：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益处。作家们的原稿经他们修改后才"成为完美无疵"。——这是我们中间的第二个分歧点。

究竟谁是谁非，用不着我在这里唠唠叨叨。不过吴丈蜀同志要扣在我头上的没有划清界限和影响作者和编者之间的团结的大帽子，我也没有遵命戴上的必要，因为今天并非乱扣帽子的时候。为了辞谢这顶帽子，我还想作一点补充的说明。

那篇《笔下留情》是我读到杨文斌同志那段关于"成熟的作家"的话以后有感而写的，因此有"好大的口气！"这句话，因此也举出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成熟的作家的作

品做例子，说明那些作品并未经过当时的编辑们的“删改”，我还说“删改”他们文章的却是另外一种人。在这里和在我那篇短文的其它地方一样，我只叙述事实。这事实就可以说明杨文斌同志的看法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明另一个问题：一件有创造性的杰出的作品并不需要别人“删改”。既然叙述事实，倘使我说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的作品从未经过任何人的“删改”，那就是我有意替当时的图书审查老爷们开脱罪名了。我绝不会像吴同志所说的那样，拿“今天的某些工作方法上有缺点的编辑”跟那些图书审查老爷相比，因为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今天的某些”编辑同志即使他“工作上有缺点”，他也绝不会想到删改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就说他想做那些作家的“一字师”吧，今天的读者也绝不允许他这样做。

所以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绝不是“师”与“生”的关系。我倒赞成刘金同志的意见：“作家和编辑之间是应该建立，而且能够建立亲密的友谊的。”但是倘使编辑同志一心要做作家的“一字师”，那么就得委屈作家做学生了。老师删改学生的文章是不需要取得学生的同意的。然而编辑同志似乎无权在别人署名发表的文章里加上自己得意的话，除非事先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甚至在《笔下留情》里，我也没有断定说文章完全不能删改，因为这个问题可以由编者和作者双方协商解决。在这方而鲁迅先生已经给今天的编辑同志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下面便是三十一年前鲁迅先生写给李霁野同志的一封信（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前几天收到一篇《生活!》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这就是我所说的鲁迅先生"绝不以删改别人文章自豪，他反而虚心地尽量发现别人的优点"的意义。所以李霁野同志在三十一年后提到这封信，还充满感情地说："先生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竟这样周到，实在令人感愧。"

一九五七年

在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据说四川人会讲话，我可是例外。解放前，我很少在公共场所出现。解放后参加集会讲话，也只是拿着稿子念。

我被人称为老作家，这一方面也许是我已年过五十；另一方面也许是我写了二十七八年的缘故。但在外国，作品写得少，就是五十几岁了也是青年作家。

过去也有人要我谈谈创作经验，我一直没有谈过。我觉得自己的经验是不科学的。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创作方法和经验，有的人的经验也许对别人有帮助，我的，恐怕对大家没有帮助，所以一直不愿意谈。

我不是为了想做一个作家而写文章的。二十几年来，我写了一些东西，有些还勉强可读，有些写得很坏。倘使是我真正想说话时写出来的东西，就勉强可读；而当有人把我当作作家要我写，又非写不可，不得不写时，我写出的东西就是很坏的。

我写第一篇小说，是三十年前在法国的时候。当时很年轻，远离祖国，人地生疏。我是个内向的人，很多话想说又说不出

---

* 本篇由任丁记录。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十日《草地》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巴金谈创作》。

来。当时我很寂寞，想念祖国，想念熟人，特别是晚上从法语补习学校走回旅馆，听到圣母院钟声的时候，倍加寂寞，心情很沉重。我闷得发慌的时候，就走到先贤祠广场在卢梭铜像前徘徊很久，心里有很多话想说，回到公寓拿起一本练习簿，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以后，凡是寂寞的时候，就拿起笔来写一点，有事就搁了下来。当时有两个意大利工人，被美国法庭判处电刑，在法国掀起了抗议的运动，我也给其中一个工人通过两次信，那还是因为自己苦恼而感到必须申诉的缘故。全世界抗议无效，他们终于在电椅上死去，我心里很难过，于是，拿起笔来又写一点。我写，只写那时的心情。为什么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呢?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小说看得很多，小说是个什么样子自己知道，认为用小说的形式可以把那种苦闷寂寞的心情写出来。以后，凡是自己想说话而找不到人听，就写到纸上。写多了，就想把它们连贯起来编成小说来试试。于是就把这些东西连起来，后面补一点，前面加一点，像现在拍电影的剪接方法似的。这样写东西的方法，今天对大家来说是不适当的，而我的第一篇小说的确就是这样写成的。当时也并不想发表或出版，只想给住在成都的一个哥哥和几个熟人看。上海的几个朋友看了后，给《小说月报》的主编看见了，他说可以，也就把它发表了。以后就有人来要我写文章。回国后，我也写了些东西，这样慢慢就成了作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也没有准备过要成为一个作家。

恐怕大家不会相信，我写《家》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结构"。我在旧家庭里生活了十九年，一直到离开四川，这

个家庭里的人和事我都很熟悉。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过体验生活，也没有想到过要写文章，而是生活在这个家里，常常要接触和应付这些人。对这些人、这些事有爱有恨。对很多事非常不满意，想挽救也没办法，而且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从这里面出来，对这些情况就很熟悉，闭起眼睛也能看到那些人物的笑貌、动作，知道他们的思想感情。当自己向旧势力反抗身受痛苦的时候，或是别人受痛苦自己想帮助的时候，或是看到一些年轻有为的同辈，原有很好的前途而终于在旧家庭里葬送一生，甚至死掉的时候，心里就有很多的恨，同时也有很多的爱，这些事情永远也不能忘记。后来，上海一个报馆要我写部长篇小说，我答应了。自己想，就把我家庭里的事写写吧，于是就开了头。我从没有想到过如何“结构”。我常说，我写文章就在生活，创作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写的时候就生活在自己描写的生活里。如果我有的作品还写得好一点的话，那就是我写作时也生活在文章里面。读者会流眼泪的地方，也是我流过眼泪的地方。我写东西时是有感情的，没有感情时，我就不写。

我写，并没有想到过要做作家，只是心里有话想说，要写；如果不写，心总是定不下来。在写的时候，人物是自己在生活，自己在发展。只在《秋》里，按觉新自己发展下去，其结果是很悲惨的，他可能自杀，但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我不愿给青年带来过多的沉痛，愿意多留点希望，就没有写他自杀，而给他留下了两条道路，即可能自杀，也可能新生。

这些人物和事情自己储藏得很多，要写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出来了。如果说《家》《春》《秋》有点真实的话，那首先是人

物的真实。但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许多彼此相似的人物的总和；事情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把许多人的事情集在一起。因为我熟悉这些生活，所以人物能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而自己的笔只是跟着他走，我也才能写出这些不算成功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生活，我就写不出来，或是写出来也一定会完全失败。我另外写的一些东西中，如果有些还可以看的话，大概都是这样写成的。但我也有时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样的作品不但别人说不像，自己也知道不真实。

所以，创作这回事，并不是了不起的天才的结果。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是不同的，几百年才有一个。我感到，普通人也可以写出一部好东西，只要他真正有生活，认认真真地写。写作是种艰苦的劳动，必须要全心全意，把全部心血放到里面去；否则，即使伟大的作家也会写出很坏的作品来的。恐怕托尔斯泰也不例外。果戈理写的《死魂灵》是杰作，但他曾把写好的第二部烧掉了。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没有真实地反映生活，而自己感到不满意的缘故。

写东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创作需要创造性，特别需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如果别人已经说得很多了，就用不着我们再来说。一部成功的作品，总是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而且又说得好。创作不是摹仿，而是在同一的大方向下，各人去寻找自己的创作道路。有人常讲写小说，人物要怎么样，情节要怎么样，但作家在创作时，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些，这些东西是分析研究作品的人所注意的，是文学教师为了讲述而注意的。现在有些人常常谈典型问题，关心这回事很好，但真正

创造出成功典型的作家，并没有先考虑到这个问题，即典型应该如何创造的问题，而是创造出来后，人们研究它、分析它，以作品为依据所得出的结论。

我很羡慕大家，我们过去写东西，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压迫。从前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写作条件也很艰难，没有任何帮助。你们有这样好的环境，有这样好的条件，而且又能大家在一起来座谈，又能找过去写得多一点的人来交流经验，又得到国家的重视、培养和帮助。你们有这许多很好的条件，应该比我们有几倍几十倍的成就，应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才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我相信你们办得到。

祝大会成功，祝你们产生更多更好的东西，祝中国文坛达到真正百花盛开的境地。

1956年12月。

对文艺和出版工作的意见*

——在作家座谈会上发言的摘要

上次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顾虑，报纸发表我的发言摘要倒像是有顾虑似的，不是没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来，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想这样做对"百家争鸣"不会有好处。

一　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

我说市委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是对作家的安排不够、照顾不够，也许对有些人还照顾太多了。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受照顾，而是能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过去有些作家穷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却流传万世。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我们

---

* 本篇系作者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共上海市委邀集作者及靳以、傅雷、陈山、罗稷南等二十余位作家进行座谈时的发言。次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对党的领导和"放"、"鸣"等问题，作家们提出尖锐批评》为题，发表了作者等的若干发言。本篇系对该发表稿的补正，刊于同年五月八日《解放日报》。

常常谈领导，可是我作为作协分会的主席，就感觉到作协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在领导。就是在作协里面也没有人专门研究创作上的问题；对怎样发展创作、组织创作等等问题，也没有人认真考虑。究竟谁在领导作协，我也始终搞不清楚，只有在党支部通知我写某人某人的材料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被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要，我就得在什么时候写。

《文汇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作协召集剧作家座谈会的消息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这方面的选题就很少。"我就不知道，作协分会怎样在领导新文艺出版社，它连自己本身的工作都做不好。

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一，关于文艺俱乐部的问题，赵丹同志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某一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希望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的话。后来在全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协总会提出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服务的文艺俱乐部的计划。周总理找作家们谈话时，看到这个计划，答应把上海某处房屋给我们，并说我们的要求不高。可是我们回到上海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办文艺俱乐部还有许多困难，我们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过了几个月，提倡精简节约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倒记得这件事，还批评要"什么家"是铺张浪费，我读了就不服。其实，有个文艺俱乐部，全上海文艺工作者在那里可以交换意见，作观摩演出，对文艺工作有好处，并不违背艰苦朴素的精神。

二，关于杂文问题，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遇见乔木同志，他鼓励我们写点杂文。七八月间，茅盾同志、夏衍同志都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杂文，我也写了几篇。《解放日报》找我写，不好不写，就写了"有啥吃啥"几篇。听人家说，解放日报社里有人化名在报纸上写文章反驳。后来，《解放日报》开座谈会，有位负责同志说，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抓主流，还要求我们向群众解释商业部门的困难。我当时听了就不大满意。我想，谈鲁迅杂文，应该拿出书来研究。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他否定了当时整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制度不变更，缺点就没法改正。我们现在写的杂文是针对着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点，而且要纠正缺点。难道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

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又听到林放同志写了关于片面性的杂文，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遭到所谓"围剿"。领导上希望我们写文章全面，事实上提意见的人就不可能全面，因为他们没有搞实际工作，没法了解许多内部情况，难免片面；可是搞领导工作的人倒应该全面，而事实上却常有并不全面的时候。比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层楼，在报纸上也大事宣传，甚至拍照，写访问记，好让人家知道领导上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高高乎在上，脱离群众。等到群众有意见了，领导上又不出来讲话，替他们分担责任。

又，近两年来，报纸上拚命宣传我们今天的生活怎样美满，举办时装展览会、烫发的式样都登报了，还拍成了电影，使

人们向往享乐、奢侈的生活。当时鼓励人们吃好穿好，唯恐别人艰苦朴素，现在又批评别人不艰苦朴素了。这些工作都是做得不全面的。

再谈谈作协分会本身的问题。我觉得作协分会对文艺上的问题也从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要搞好作协的工作，得有人认真研究问题。我是专业作家，也只能做个挂名主席，有些问题我和作协的看法也不相同，有时我代表作协在会上讲话，也不是讲自己的意见。

我曾当过三年多《文艺月报》的挂名主编。曾经有人批评《文艺月报》编委只注意艺术水平，把政治放在第二，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文艺月报》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而且艺术和政治应结合在一起，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感染读者，不能起政治作用。又如在检查《文艺月报》工作时，批评《文艺月报》压制新生力量，优待老作家。当时《文艺月报》副主编黄源同志也曾在理事会上代表编委检讨，但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

《解放日报》曾经批评《文艺月报》没有刊载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此，《文艺月报》的销路从二十多万份跌到二三万份。其实《人民文学》就没有刊载这份材料。倘使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错误，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党内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不必要公开批评，使读者莫名其妙。批评文章发表后，《文艺月报》编辑部许多同志心里都不满意。这本来是出于爱工作爱事业的热情，可是这些表示过不满的人在反胡风材料的学习中，都给整得

哑口无言了。我当时还是个挂名的主编，不便讲话，但我在私人谈话时，不断表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把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整成了应声虫，等于损害作家的独立思考。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上海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好多的问题了。

二　出版工作混乱

跟创作有关的是出版。从现在出版工作又缺又滥的混乱现象看来，好像这方面并没有领导似的。一方面有很多书堆在栈房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买书却什么都买不到。有些人认为这是必然的现象，说读书的人多，纸张不够，非缺不可；那么对"滥"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比如书的积压，就是发行人心中无数。有些书全国积压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而在号召大家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时候，《鲁迅全集》一次只印二万本，很多人都买不到书，如何向鲁迅学习？印刷、出版、发行三方面脱节，各管各，互相推诿责任，有助于"缺"与"滥"现象的造成。四川有个县人民银行批评新华书店支店说：像你们这样开书店要饿饭，人家要买的没有，有的卖不出！

文艺出版社上海只有一家，因为"只此一家"，就没有社会主义竞赛；而且繁荣创作需要多出书，但是编辑同志的看法各有不同。假使只有一家出版社，它不出，那么作品就见不得天日了。例如曹禺同志的《原野》和《蜕变》，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版权转给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初，我又向新文艺出版社领导人介绍，并且把修正本送去，可是新

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两本书“没有重版的必要”，就不出了。今年才商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在北京出版。再如平明出版社转给新文艺出版社的《白求恩大夫》译本，新文艺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提倡个人崇拜”就不要。我向“新文艺”表示，这是一本好书（书前还有宋庆龄同志写的序文），绝非提倡个人崇拜的。究竟是不是个人崇拜，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不能由领导随便决定。

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去年五月，我视察出版发行工作，向出版处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是：一，重复的书是不是由出版处通知出版社或新华书店不要印？二，关于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吸收私营出版社参加合营后，原单位的图书的重版问题。出版处给了我书面答复。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重复的书由出版社自动停印，出版处从不干涉出版。”事实并不是这样。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当时平明出版社打好纸型，新华书店已同意印若干册，而出版处认为过去有译本，不让这个译本印行。其实这本书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多印一些对读者只有好处。后来我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视察，查过卡片，那边负责人也承认不印这本书并不是他们决定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出版处曾交给我一份表，我曾向平明出版社了解了一下情况。我看到“新文艺”给平明出版社的一张表上，有好些书下面都注明“未定”，我写的《谈契诃夫》，被列入翻译书，下面也有“未定”的字样。我当时还不明白“未定”二字的意义。出版处给我的表上写着：“未决定者主要对译者

情况尚未了解，一经了解，即可决定。”我便笑着问“新文艺”负责同志：“是否我的情况你们还不了解？”他自然说“不是”。出版处的同志马上说，这个表是新文艺出版社送给他们的。我说我很清楚，这是官僚主义者闭门造的表，社长交给主任办，主任交给科长办，科长交给科员办。因此，这样的书面材料往往不符合事实。

其实这也难怪，新文艺出版社的两位社长外面事情多，整天在外面开会，当然没法了解社内的情况。要把工作搞好，就要有个人专门在社内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且认真地负责领导工作。

让话剧这朵花开得更灿烂*

对话剧的问题，我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上海的文艺领导部门对话剧并不重视，因此也就没有周详地考虑过发展话剧的问题。这几年来上海好像重点地在发展地方戏。发展地方戏，这自然是对的。我们也可以看见某些地方戏一天天趋向话剧化，灯光、布景、话剧表演方法都在地方戏舞台上出现了。这更说明上海的观众喜爱话剧。而且话剧是最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战斗性最强的宣传武器。话剧在中国，在上海都有过光荣的斗争史。解放以前有一段时期上海有好几个剧院同时上演话剧。可是今天上海的话剧剧场就只有一个。即使这不是领导上有意的安排，我们至少可以说领导不愿意提倡话剧。现在摆在话剧前面的实际困难很多。如《文汇报》所提出的剧本荒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写出来的剧本，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书店也不愿意推销。他们好像认为剧本是为演出写的，而不是为阅读写的，买剧本和话剧票一样困难。即使有机会出版，印数也不多。如曹禺写的《明朗的天》好容易才出版了六千本，而他写的《家》、《北京人》等剧本，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时，

---

* 本篇系上海《文汇报》记者就上海话剧界情况向作者采访时作者所作谈话。刊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该报，标题为该报编者所加。

初版都是一万本。是不是群众不要看呢？我看不见得，我认为这是"有啥买啥"和"有啥看啥"的问题。我的十一岁的女儿就喜欢读剧本，《剧本》月刊一寄到，她总要抢先阅读。现在在上海上演的《布谷鸟又叫了》她早已读过了。

由于剧场少、剧团少，所需要的剧本也就少，剧本上演的机会也跟着少，再加上出版社又不肯出版剧本，要繁荣剧本创作是很困难的。剧本创作和整个文艺创作是连在一起的。作协对领导创作的工作过去没有好好管，今后应当多管，多帮助。但是它作为一个人民团体，也只能起一些推动作用。实际困难还要靠各方面协助解决。如前面所说的出版问题就是这样。现在出版社因纸张缺少，要求每个作者写的东西都是杰作，可出可不出的则不出，而剧本上演的机会又不多，这如何是好呢？

上海拥有一些全国最好的演员，但是这几年来就没有几个能够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对他们的名字渐渐感到生疏了。去年北京纪念易卜生曾演出过《娜拉》，但上海只演了《娜拉》的片断。在易卜生、萧伯纳纪念会上，丹尼和石挥演过一幕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两个戏都是演员们排演了六、七天赶出来的，效果很好。尤其是石挥的表演得到了参加纪念会的爱尔兰导演的赞美。为什么不可以全部演出呢？有演员，也有观众。在舞台艺术上有成就的演员像石挥、项堃、张瑞芳、黄宗英、章曼蘋……不是都在上海吗？这里当然也牵涉到剧场问题，但主要是领导没有很好组织这些力量，没有关心话剧的发展，让有才能的演员今天分散在各个单位里，上海的

观众便很少有机会看到角色整齐的演出。

演员总要演戏，不演戏就不叫演员；一个演员几年不演戏，领导上不在乎（过去上影和上海人艺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对国家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损失。如果领导上认为某人完全不适合作演员的条件，那么，可以尊重他们本人意见，干脆改行。

培养一个演员是很不容易的。听熊佛西院长说，上海戏剧学院几年培养出来的人材，分配到工作岗位之后，常常得不到重视；应该让年轻的演员都有舞台实践的机会，都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新人。

一切为了社会主义*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终于发表了。可以想象到全中国人民怎样兴奋地反复读着这篇讲演。三个多月前我听过主席讲话的录音，也作了笔记。这次读完全文，觉得有更深的体会。主席讲话总是句子简单而含义丰富。他不但讲得明白，而且讲得深，讲得全面；你如果更仔细地思索他的话的意义，你不仅可以了解他提到一件事，一个问题，而且可以"以此类推"地了解更多的事，更多的问题。所以主席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在上次全国宣传会议上我们向主席提过一百几十个问题。主席要我们"自报公议"，自己讨论，自己解答。主席在会上只谈了几个问题。其实真正了解了那几个问题，对其他一百几十个问题也容易了解了。主席要我们学好怎样掌握辩证法，运用辩证法去思考问题。

目前大家争论的一些问题，在主席的讲演中已经谈得很清楚。一切都是为了搞好工作，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一切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非常正确，也可以说是全国人民努力的共同方向。我们已经在社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几年了，而且以后还要大步向前走去，一直走到共产主义，因为这是一条光明大道。谁也看得见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我们人民也有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取得幸福的机会。主席在他的讲演中提到的十二个问题已经把目前的形势讲得非常明白。

有人奇怪，那些否定一切的别有用心者都是"聪明人"，为什么他们连浅显的道理也不懂呢？这就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了。他们的个人的利益和他们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使他们看不见人民看得清楚的道路。他们也会独立思考，而且很会"独立思考"，可是，他们的"独立思考"把他们越引越远，不仅引入牛角尖，而且引进了死胡同。他们把死胡同当作大路，无怪乎他们会欣赏毒草，迷恋剥削，甚至于狂妄到想利用不了解目前形势的若干知识分子做他们的政治资本了。这种人碰了壁，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以后还要碰壁。可是一再碰壁之后他们就应当趁早回头。不然在死胡同里撞来撞去，他们决不会找到出路。他们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他们就成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除非他们，我再说一句，趁早回头，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谈影片的《家》*

——给观众们的一封回信

两个月以前，《大众电影》编辑部转来了你们的信，要我对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家》表示意见。我几次提起笔，终于不曾写出什么。我觉得要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也许需要写许多在别人看来是废话的东西。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部影片，因此我也害怕听见人提到它，更不愿意自己谈它，正如有缺点的人害怕对人多谈自己的毛病一样。

我一开头就提到"缺点"两个字，因为在你们的来信里，你们直率地讲出了心里话："影片不能使人满意"，"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失望"。其实这一类的话我自己也听见过。我还记得这部影片在上海新片展览周展出的时候，一个糕饼店的职工摇头说："这是一本流水账"。面对着你们这些忠实的观众的意见，我感到一种负罪的心情，因为对这部影片的缺点，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我看过《家》的电影剧本的初稿本和四稿本，我只说过几句鼓励的话；我看过两次片段的"毛片"，我也没有提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大众电影》第二十期。

过多少意见；我参观了两三个镜头拍摄的过程，我对演员同志解释过我对几个主要人物的看法。但是我从没有提过具体的要求。因为我知道我的小说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本身就有不少的缺点，我不能要求编导同志“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我私下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以群同志所说的：或者“选取其中的一个部分作为再创造的主体，而舍弃其他的部分，使它成为一个自具中心、自有特点的新作品”，或者“作较全面的改编，拍上下两部”。我并没有向谁谈过我的这个愿望，但是我常常向担任编剧兼导演的陈西禾同志暗示：改编也是创作，改编者必须增加或删去一些东西，使改编本成为有创造性的艺术品，不要让影片变成我的小说的注解或翻版。陈西禾同志是我的极熟的朋友，他曾经把我的小说《春》改编为舞台剧。我在香港影片《春》里面就看到了他的剧本的影响。他在才能和修养两方面都要比我高若干倍。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体会我这个意思。可是等到全片拍完，我看了最后一次的“毛片”，向他简单地表示我的不同的看法，并且打电话告诉副厂长张骏祥同志时，景已经拆了，不能作较大的改动了。我后悔没有在影片开拍前正式提出我的意见，否则我的意见一定会受到重视。那么这部影片或许会以另一种面目与观众见面，也未可知。

作为影片的观众，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影片抓住了不少的东西，样样都不肯放手，但样样都是一瞬即逝，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好像影片只是在对我们讲故事，并不让我们看清楚人物的面貌和内心。例如像瑞珏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

不让她在我们的面前多停留一些时候，让我们看清楚她的可爱的精神面貌，那么她的命运也许更能紧紧抓住我们的心，激起我们对旧社会的更大的恨。又如觉新，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匆忙地闪来闪去，不肯停下来为我们打开他的"灵魂的一隅"，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矛盾？那么他的处境会唤起我们的同情，他的悲剧也更能使我们的心激动。作为作家，作为读者，作为观众，我都有这样的经验：要先熟悉了某一个人物，对这个人才能够有较深的爱或憎。匆匆的一瞥不能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倘使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枝节，在主要人物的刻划上，在主要事件的描写上，多花费一些镜头，那么这部影片也许更能打动观众的心。

我刚刚提到同情觉新，有些读者也许不会同意我的说法。我自己的确是同情小说里的觉新的。不但同情，我还爱他。唯其爱他，所以我更憎恨他的软弱和妥协，我更憎恨使他受苦、使他毁灭的旧社会制度。我说同情觉新，并不是叫人把他当做学习的榜样，我是通过他的悲剧来鞭挞旧社会制度的。影片的编导者在这一点上似乎另有不同的看法。他好像很害怕观众会同情这个旧社会制度的牺牲者，他甚至不敢让觉新享受一点"闺房之乐"，免得观众误认封建婚姻会给人带来幸福。我曾经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你把觉新同瑞珏婚后的幸福生活描写一番，影片的青年观众也不会回家去请父母用花轿给他抬一个陌生的新娘来。"他可能以为我只是在跟他开玩笑。其实别的人也有跟他的看法相似的意见。我记得当初讨论电影剧本（初稿）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就耽心今天的青年很

难理解觉新的思想感情。编导同志和演员同志可能也有这种耽心，所以他们有意地使觉新的复杂的内心"简化"。觉新不能跟所爱的人结婚，他当然"终日以泪洗面"。他得不到梅，非哭不可；他软弱，受人欺侮，非哭不可。这样他的行为就容易被人了解了。影片中觉新跟瑞珏在一起的时候，他从不肯对她露一下笑脸，甚至在瑞珏的生日那天，他还喝得醉醺醺的，做出痛苦的样子去刺激她。这似乎不大近人情。贾宝玉可能这样地对待薛宝钗。然而高觉新不是贾宝玉。他要是没有在"新发祥"重见到梅，他要是不曾听见人谈起梅嫁后的痛苦生活，他就不会常常想念她，他甚至会忘记她。我的小说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的幻梦，忘记了另一个女郎(指梅)，忘记了他的前程。他满足了，他陶醉了，陶醉在一个少女的爱情里。他的脸上常常带着笑容，而且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婚的妻子。周围的人在羡慕他的幸福，他也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了。"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

我在前面提到觉新的软弱。但软弱和所谓"无抵抗主义"也只是觉新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而且就拿软弱和"无抵抗主义"来说，它们跟眼泪也不是一样的东西。影片中觉新哭得太多，哭得叫人生气。我曾经向陈西禾同志暗示过：尽可能叫觉新少哭。去年年底我在成都和陈荒煤同志谈起觉新哭得太多。他也说他并不同意。他看到觉新一共哭过八次。他曾经表示意见：像这样哭哭啼啼，愁眉苦脸，怎么活得下去？现在影片上觉新哭的次数已经减少了。可是他在不应当哭的时候仍

然大哭。例如在灵堂中陈姨太逼着他把瑞珏送到城外生产的时候，作为瑞珏的丈夫，他应当有所表示，不能把责任推给妻子，自己只说一句："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就伏在桌上痛哭。这好像在耍无赖，又像是故意哭给瑞珏看，否则他对瑞珏实在无法交代。事实上觉新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站起来表示："办不到"，但觉新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要么忍住眼泪一口答应："没有问题，一切照办。"马上找好房子搬出去。觉新就是这样的人，他爱面子，他做事情要做得"漂亮"，他不肯输一口气。为了这个他宁愿让自己、让自己所爱的人受苦吃亏。他的眼泪不会少，但都是吞在肚里去了的。他常常在人前露笑脸。只有关上房门他才会伤心地哭一两个钟头。倘使觉新习惯了在人前大哭，那么他就有了对付陈姨太甚至几位老爷的武器了。别人要瑞珏搬出去，觉新只消大哭一场，说一句："这日子活不下去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没有人敢用武力把瑞珏抬出高公馆。倘使我们把觉新换成克定，陈姨太纵然花样很多，即使也得到了克明的同意，她仍然没法叫克定低头。克定是会耍无赖的：克定会大闹，沈氏会大哭，哪怕到法庭见面，反动政府的法官也不会判决孕妇搬出城外生产。但是觉新不会闹，瑞珏也不会哭。大家都说："搬"，瑞珏就答应"搬"，觉新就看好房子把瑞珏送出去。觉民和觉慧虽然反对，可是他们的话在高家起不了作用。觉新也不会听从。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冬天我祖父逝世以后，我的嫂嫂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搬到城外去生产的。我的嫂嫂跟我祖父的姨太太之间并没有矛盾，这件事在我们家里也没有引起风波，好像这是一件很平常的

事情。因此我当时非常愤慨，而且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想借它来说明我的创作方法。我习惯于通过人物来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我所有的作品里面我认为有罪的是制度。倘使有人问：是人坏还是制度坏？我的回答自然是“制度坏”。所以我们必须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倘使仅仅是人坏，冯乐山和陈姨太是整个悲剧的制造者，那么去掉这两个人，制度还可以保存。你们中间有人认为瑞珏的死应该由陈姨太负责，像影片那样处理把主要责任放在“迷信”上面，你们不同意。邱扬同志在他的文章《后生谈〈家〉》里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他认为这“多少和要控诉这个家的主题脱了节”。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承认我写《家》的时候，我恨陈姨太这个人。我们老家从前的确有过一个“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黄老姨太”，我一面写陈姨太，我一面就想到“黄老姨太”。不过我恨她不如我恨陈姨太那么深。我在陈姨太身上增加了一些叫人厌恶的东西。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不能说陈姨太就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坏女人。她没有理由一定要害死瑞珏，即使因为妒忌。陈姨太平日所作所为，“无非提防别人，保护自己”。因为她“出身贫贱”，并不识字，而且处在小老婆的地位，始终受人轻视。在高家，老太爷虽然不讨厌她，但是除了老太爷外就没有一个人对她友好。甚至在老太爷跟前的时候，她也会想到老太爷死后她的难堪的处境。因此她不得不靠老太爷的威势过日子，而且她更不得不趁老太爷在时替自己打算。她不曾生儿育女，自己家里的人也已死绝，老太爷是她唯一的亲人，也是她唯一

的靠山。她当然比别人更关心老太爷。她没有知识，当然比别人更容易被迷信俘虏，她相信"血光之灾"，她不能想象老太爷死后满身浴血的惨状。高家的太太们不一定真相信，也不一定不相信，但是她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克明三兄弟当然不会相信"血光之灾"，不过他们不愿意让那些女人批评他们不孝，反正搬出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妻子。这才是我控诉的那个家。在那个家里，暴君是旧社会中的好人高老太爷，那些年轻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把人命当作儿戏，把婢女当作礼物。克明是他的忠实的学生兼儿子。克安和克定都是他培养出来的。陈姨太也得拿他做护身符，她只是一个旧社会中的牺牲者。真正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在坏的制度中好人也往往作了坏事。倘使把一切坏事都推在"出身贫贱"的陈姨太身上，让她为官僚地主家庭的罪恶负责，这不但不公平，也不合事实。鞭挞了人却宽恕了制度，这倒不是我的原意了。

同样，把觉新处理成了只能引起人厌恶、轻视的人物，观众反而会觉得还是让旧社会把他毁了的好。这样倒减弱了我的控诉的力量。我相信觉新要是生在今天的新社会，他一定是个有为的青年。是旧社会害死了他，而不是他应当被旧社会所毁。

影片中对觉慧的处理，据说有好些人满意。但是我觉得觉慧也被"简化"了。我们只看见他的勇敢、天真和热情，只看见他那坚强而单纯的信仰，却看不见他的内心的斗争，他的变化和生长。我喜欢张辉同志那个纯洁而充满朝气的形象。但

是可惜他没有机会充分了解“五四”前后那一种青年的思想感情。

你们很惋惜琴和觉民在影片中降为不重要的配角。但是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面，编导同志怎么能够让那么些人全发出夺目的光芒！“简化”的办法倒容易解决问题。还有四老爷和五老爷这两个人在我的小说中本来就写得那么简单，影片上再把他们简化，就成了逗笑的丑角。杨华同志的出色的表演也不能给克定添一点光彩，我不能否认这是“纨袴子弟”的一面，但是拿他们放在高家的灵堂里，总叫人起一种不调和的感觉。

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人物了。谈到人物我不能不起一种惋惜的感觉，连像张瑞芳同志那样优秀的演员在影片中也没有“用武之地”……剧本限制了演员，导演同志也不曾想到在别的方面来补救。撇开人，我还想简单地谈谈整个影片的时代气氛、布景、服装、道具、摄影等等。要是参加影片工作的同志们在这几方面肯多花一点功夫，那么影片也许更能使人满意。在影片中高家那许多人就住在一个古庙似的小小“四合院”里，再加上一个不大使用的大厅和一个外天井。即使他们还有一所与住房太不相称的大花园，也无法显出四世同堂的热闹气象。任何时候公馆里都是冷冷清清的。连吵架的时候，也少有看热闹的人。整个公馆里听不见小孩的声音，也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好像那许多人全关在自己的房里，彼此不相往来。影片中自然也有做寿演戏和新年玩狮子的热闹场面，但是这一类的场面似乎跟其他的连不起来。而且就拿玩狮子

那一个镜头来说，全家人挤在大厅上，显得地方多么空阔，人多么少，并没有增加热闹的气氛。甚至在吃年饭的时候，也带了强为欢笑的味道。我在前面几次提到“简化”，的确影片把“五四”前后成都官僚地主的生活也“简化”了。冯乐山出门会坐一乘那么寒伧的小轿，连一个打灯笼的听差也没有，让写了“冯”字的灯笼冷清清地挂在轿杆上。事实上冯乐山坐的是三人抬的拱杆绿呢大轿，三个轿夫一面吆喝一面抬着轿子飞跑，一个听差气咻咻地跟在后面。连觉新也有一乘这样的轿子和三个轿夫，更不用说老太爷和老爷们了(这五乘轿子都放在大厅上)。在高家每逢新年玩狮子的时候，不仅大厅上，天井的四面都挤满了人，因为整个公馆里所谓上上下下就有七八十个人。从隔壁邻居可能还有好些熟人来看热闹。“老虎”还能吃人的时候，它总是气势汹汹的，倘使它已经奄奄一息，它也就只能“摆尾乞怜”了。倘使每天看见的就只是一个冷清清的家，高老太爷凭什么还会让“这个家一定要兴旺”呢？服装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不赞成香港拍的那部影片，叫三十七八年前的女人穿类似今天的服装的办法。但是三十七八年前的太太、小姐们也讲究穿戴，衣服的剪裁不但合身，还要使人显得好看。头发的样式，也因人而异。这就是所谓“三分人材七分打扮”。我几次提醒陈西禾同志：“让女演员们打扮得漂亮点吧。”我认为这才合乎当时的真实生活。倘使裁缝同志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办法，化妆师同志也不能把女人的头发梳得好看一点，还可以请摄影师同志多多帮忙。摄影师能够“美化”人物的面貌。我在莫斯科见过几位苏联的演员同志，她们在影

片中往往显得更年轻，更美。苏联的摄影师在这方面的确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不说人，就是拍摄一个普通的镜头，也要经过仔细的研究。但是拿我们的影片《家》来说，有些镜头好像只是为了赶时间匆匆地拍下来似的。摄影上并没有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点。

其实不仅摄影，我觉得整个影片的编导上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到电影艺术的特点。影片只叙述了故事，却没有多少打动人心的戏。编导同志似乎想用尽力气来解释原著，却忘记了他应当做“艺术的再创造”的工作。他放弃了他的责任，所以他失败了。

我在这里用了“失败”两个字，这是你们的意见，也是我的意见。花去两年多的时间（改编剧本花去一年半以上，影片摄制花去半年），拍成了一部这样的影片，陈西禾同志的确弄得焦头烂额。那么“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陈西禾同志谦虚地说，他的水平不高，他拍片较少，缺乏经验，不能充分掌握电影艺术的特点。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各个部分的工作同志间缺乏紧密的合作。张骏祥同志曾经对我说过，作为主要导演的陈西禾同志缺少组织的才干。所以在工作中集体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常常称赞陈西禾同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当过演员，导过戏，写过剧本，在大学里教过中国文学，又是研究罗曼·罗兰的专家。但是他有一个显著的缺点：优柔寡断，缺乏自信。他买一本书要经过几天的考虑，说一句较重的话也害怕会得罪别人。《家》开始拍摄的时候，有两位演员同志对我提起，他担

任了《家》的编导工作，感到万分紧张，唯恐失败。任何人说一句话都会引起他的顾虑。在电影剧本讨论会上，我看见他记下那么一大堆意见，我就耽心他会弄得张皇失措。他想拍出影片使人人满意，结果连他自己也不喜欢。他并不是没有付出辛勤的劳动。领导上也没有干涉他的工作，更没有强迫他删改剧本。但是他常常机械地理解领导同志的一句话（他倒是真心地尊重领导的），却忘记了根据领导上的意见，认真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的才能。对一些小的可以改变的细节，如衣服的样式、头的梳法等等，他常常坚持己见；但在重要的地方他却摇摆不定。有人这样说，他听进去了；另一个人那样说，他也听进去了。在影片的摄制中他常常根据演员的意见修改情节。领导上并不主张觉新多哭，他自己也不赞成觉新多哭，但是拍出影片来，觉新却成了一个"哭包"，所以有几位演员同志送他一个外号："陈大悲"，他有觉新那样的性格，也有过觉新那样的处境（他也曾经是大家庭的承重孙），他比任何人都熟悉这个主要人物的精神面貌，也更了解封建大家庭的一切。倘使他当时更严肃地对待他的工作，用艺术的再创造来代替单纯的解释，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他也许会拍出更好的影片来，也就是更好地实现了领导上的意图了。我当时几次这样地劝告他，今天我还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我在这里对你们批评影片《家》，我觉得我也应该责备自己。我虽然不懂电影艺术，但是作为原著的作者，作为编导同志的熟朋友，我不曾在工作上认真地给他帮助，我就应当替他分担"失败"的责任。……，

全体进步人类的节日*

我拿起笔就没法制止我的手的颤动，我的心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之情，我向苏联的朋友们问好：在这个无限美好、无限欢乐的节日里，请接受我的热烈的、衷心的祝贺。今天世界善良人民的心一致地向往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彻夜发光的红星吸引了全体进步人类的目光。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环绕地球运行，向全世界宣告人类征服宇宙的伟大开端。六万万中国人民为着他们的苏联"老大哥"的辉煌成就齐声欢呼歌唱。四十年前在俄罗斯黑土上发生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像初升的太阳似地照亮了当时乌云蔽天、杀声四起的世界，给人类开辟了一条走向光明的道路。苏联人民脚踏实地，历尽千辛万苦，在人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乐园，而且一步一步地向着共产主义的前途迈进。四十年来苏联人民创造了多少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奇迹，完成了使整个世界震惊的光荣事业。甚至在战争蹂躏着世界的一部分的时候，在饥饿、寒冷和瘟疫使一部分人类受苦的时候，苏联始终是保卫和平的巨大力量，苏联人民一直不倦地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着人类美好的未来工作。苏联是和平与幸福的象征，是文明和进步的旗帜。不说在朝鲜的山村，在中国的工地，在越南的田上，在蒙古的包内，甚至在美国的黑人区，西德的大工厂，南洋的橡胶园，东京的贫民窟，人们一想到苏联，就充满了希望，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对于今天还被剥削、受压迫、过着奴隶生活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在失业中憔悴受苦的人，苏联人的形象永远鼓舞着他们，苏联人放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在他们的眼前。在苏联人身上他们看到了崇高的理想的光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上他们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领导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多少万人受到了苏联的鼓舞，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开始站起来作自己的主人。今天在各种不同的语言里，"苏联"和"十月革命"这两个专门名词包含了说不尽的亲爱的感情，和讲不完的动人的故事。

不论是访问过苏联或者从未到过苏联的人，他们一样地看得见这个伟大国家的惊人的成就和无限美好的远景，而且会感觉到这些成就和远景跟他们个人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连那些很长的数字也像音乐的符号用激动人心的乐曲引起他们的共鸣。第一次走进苏联国境的人也不会感觉到陌生，他们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不仅因为苏联人对待朋友像对待自己的兄弟，而且因为在苏联他们找到一个和平幸福、充满朝气、丰富多采、变化万千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梦想在这个国家里变成了现实，他们的个人的感情融化在那么普遍、那么自然、那么深厚的"同志爱"里面。每一个来到苏联的客人都有一种

特殊的幸福的感觉，就像一滴水放进海洋里一样。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七年来我三次踏上苏联的黑土，每一次我都像是回家一样。在任何地方我都听见爽朗的笑声，看见亲切的笑容。连默默注视的眼光里也含着深的友情。一次紧紧的握手就把两颗心拉近贴在一起，甚至第一次见面的人都恨不得把他的最好的东西交给你带回去。我生活在苏联朋友的中间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家里，彼此非常了解，没有一点拘束，仿佛从来就在一起生活，并无语言的隔阂。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我无处不看到：严肃的工作，负责的态度和献身的精神。全国的力量都放在和平的建设事业上面，全体人民踏着整齐的步伐，万众一心地向共产主义大步前进。……这个景象叫人多么兴奋！我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所读到的一切全活在我的眼前，（苏联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中国读者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它们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了中国人民，苏联作家在中国青年的心中占着多么高、又多么近的地位！）而且比任何小说中所描写的更生动，更具体，更抓住我的心。我真愿意交出我的一切，参加在这个巨大的行列中间，在这个伟大的建设工作中做一个小小的石子甚至一颗砂粒。这时候我才深切地了解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事业中产生的友谊的意义。我更深地爱着苏联和苏联人民像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样。我也更深地懂得中苏两大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多大的关系。我也更深地明白苏联人民四十年来的光辉的成就对中国人民有多大的影响。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不仅是一个中国作家的感受。到过苏联的中国人岂止千千万万！我可以说他们全有这样的感受，也许还有更深、更强的感情的流露，和更多、更浓的友爱的表现。但这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感受还是一样的。我们用不着找多少话来说明中苏人民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苏联"老大哥"挽住中国弟兄的手在光芒万丈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一同前进。六万万中国人欢欣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第八个国庆节以后，今天又以同样欢欣愉快的心情来迎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四十周年纪念日。这个大欢乐的日子不单是苏联人民的节日，它还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它还是全体进步人类的节日。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一

这几年我同你长途跋涉，回顾了我六七十年的创作道路，我说应该给自己做总结，路已经到了尽头了。其实不是前面无路可走，而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移动脚步。我浪费了那么多的珍贵的东西，留下的只是疲劳和叹息。我怎样给自己下结论呢？一卷一卷的书就是用来判断的物证吧。

摆在我面前的这两卷"佚文"（十八卷和十九卷）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我并不因为这收获感到喜悦，是我丢失了它们，或者当初我有意扔掉它们。总之，我早已忘记了它们，现在它们一下子全给找了出来，要我一一介绍，并为它们作种种解释，我有点为难。究竟要或者不要？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大批判、大揭发还未到来的时候，我经常战战兢兢，感觉到过去许多作品都是压在自己身上的罪证。终于"文革"来临，无限上纲，冤冤相报，每个人都为自己留下的任何东西付出代价，即使是扔在垃圾箱里的几十年前的佚文，我也无法不拾起它们，记入账册。既然把这些佚文保留起来，那么就准备再接

受一次更大的批判吧。

我有一个想法：把一次又一次对我的批判集中起来，大概不只这么两卷。为什么不把它们同我的作品编在一起呢，它们从来不让我的作品单独存在，可能我的作品需要这样的养料。我觉得这样安排也很有意思。但我也知道你不会同意这个古怪的想法，而且我也得尊重著作权，不能随意采用别人的文章。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二

请原谅，我不是在搞文字游戏，我这样说，无非为了争取别人对我的理解。我要给自己做总结，回顾一生的道路，我为什么在泥泞的巷子里长途跋涉？我没有双翼，不能展翅高飞，必须顺着一条道路向前或后退或拐弯。我不能忽天忽地。为了求得读者的理解，我应当解释清楚，让人们看见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无法掩盖自己的脚印。我从“牛棚”回到家，还有勇气重新拿笔。我用不着吞吞吐吐顾前顾后了，我写自己想说的话。我得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怎样写出文章。

梦醒之后我写过好几篇“讲真话”的文章，当时害怕误会，还一再解释：我并非在传播真理，只是讲心里话，我的日子已经不多，我不想骗人骗己，浪费时间。既然我的脑子还可以使用，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为什么不讲自己的话？我这一生写过多少这样的“佚文”，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不止

这么两卷，内容复杂，有时甚至互相矛盾，而且最初在成都《半月》上发表的三篇短文都是东抄西凑写成的。我自己害怕翻晋旧账，所以请你替我把住“关口”。我曾几次要求严格，你的确比较“严格”。(没有给放进来的大约也有一卷左右吧。)我想，你能够理解我，我就放心了。讲真话，不是搞什么阴谋，只是希望得到理解。没有料到有人听说“讲真话”，以为要挖别人祖坟，连忙打开他们的“聚宝瓶”，放出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明枪暗箭，一齐出动，想堵住真话的路，让大家说假话过日子。可是中国人并不认为讲假话是光彩的事情。讲真话，和提倡讲真话并不犯罪，我没有被骂倒，仍然活下去，我的作品照样存在，它们能活不能活，要看它们是真话还是假话。我现在懂得作品本身也有生命，它也在成长，也在发展。我们在作品中看到艺术家的良心。倘使没有这种良心，作品就会枯死。

批判并不起作用。我还是要讲真话。

三

三十年代我就常说自己不是文学家，又说是个门外汉，今天我仍然不是文学家，但根据六七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对文学也并非一无所知。几十年来我就记住这样的话：

“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希望读者根据它来判断我写出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佚文。

最后，我还要说：请根据这个座右铭来回顾我创作的道路吧。我希望读者理解文学，也理解我。

萧　　甘 1992年9月2日—9日。